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大全

主编 / [英] 阿诺德·托因比

希特勒的欧洲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 1920 年，是一个非官方的和非政治性的团体，旨在鼓励和促进国际问题的科学研究。按照皇家特许状的规定，本研究所不得就国际事务的任何方面发表意见。因此，本书所发表的见解并非研究所的见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第一编希特勒的欧洲的政治结构
克利夫顿·J·蔡尔德

第一章 1939—1945 年的德国

第一节 巩固政治权力，为战争作准备

1939 年 9 月 1 日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德国的权力实质上已经完全集中在国家社会党的手里。德国政治生活方面的许多“调整工作”实际上在国家社会党执政的头十二个月内已经完成了。根据 1933 年 3 月 24 日颁布的授权法——或者所谓“人民与国家保护法”，著名的领袖原则（纳粹党一开始就受它指导）代替了多数裁定的原则，立法的权力（大体上）已经由国会移交给了内阁，于是内阁在制订法律时可以不受宪法的条款和精神的拘束。根据 1933 年 12 月 1 日的“争取党与国家统一法”，纳粹党成为唯一的“国家观念的代表”，党和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副元首和冲锋队（SA）的参谋长成为德国政府的成员，“以便使纳粹党和冲锋队的机构与政府机关之间保持密切的合作”。最后，按照 1934 年 1 月 30 日的“重建法”，中央集权制的过程（纳粹党有时候称它为“丰富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以前各州（Lander）享有的全权、选举出来的议会和行政权力一律都被取消，州政府完全被置于中央政府之下。这样的中央集权制，无论是俾斯麦或是魏玛宪法的制订人，都未能理所当然地坚决贯彻到底，因为在 1871 年和 1919 年各州的地方情绪还很强烈。

12 在地方机构改组完毕后，国家社会党便在最高部门进行权力集中，因为当希特勒向国外四下看望，寻求新的冒险场地时，他已打定主意只向最亲信的几个顾问透露自己的计划。所以，他逐步不让德国内阁作为一个整体参加国家政策的讨论（当时，内阁中有一部分阁员对纳粹主义的忠诚是多少令人怀疑的），因此在 1933 年 10 月德国退出国际联盟以后，希特勒始终没有预先向内阁报告他打算采取的步骤，而到 1938 年 2 月 4 日以后，他干脆不让内阁召开会议了。同时，他还逐渐使内阁丧失了立法的权力，方法是让个别部长颁布法令，事先仅把该法令交给有关的其他部长过目。

由于德国内阁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希特勒便着手（好象主要是在书面上）试行较为适合于应付国内或国际紧急情况的其他宪法形式。因此，1938 年草拟了一项新的德国国防法，规定在发生战争时把职权集中在三个人手里：即德国行政工作的全权代表弗里克、经济方面的全权代表沙赫特（后来是丰克）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的长官凯特尔。这就是所谓“三人枢密院”。这个枢密院除了发布一些不重要的命令之外，事实上始终没有开过会，起过应有的作用。在进攻波兰前两天，希特勒将“三人枢密院”撤销，代之以“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它是当时由戈林主持的德国国防委员会的一个“常设委员会”。这个有权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的机构，是特地为了“在当前国际紧张局势下”确保“行政与经济方面的统一指挥”而建立起来的。可是，这个内阁国防委员会象它的前身德国内阁一样，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就失去其审议的作用。事实上，在 1939 年 12 月以后，要说召开会议的话，那也是难得有的事。在那个日期以后，每当有法令要公布时，委员会的成员只不过用书面方式相互联系一下。结果是，甚至连通过“国防委员会”来管理这一概念最后也被逐步抛弃掉了，因此在战争的年代里，德国不是象一般所想象的那样有一个相当正式的政府。事实上，从 1940 年以后，德国政府已经退化成为一种拜占庭式的朝廷，除希特勒本人掌握的权力外，其余的实权不是操在国家部长们手里，而是操在一小撮技术专家、官僚和纳粹党内的“实权派”诸如施佩尔、拉默斯和博尔曼这一类人的手里。

第二节希特勒与将领们

希特勒是在兴登堡逝世后根据1934年8月1日的那道法令接过总统兼总理的双重职务的。理论上讲，这道法令使他成为德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武装部队应立即宣誓对他效忠并无条件地服从他的命令。可是，仍有许多权力，特别是向武装部队直接发布命令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的手里，他在希特勒之下统率着武装部队的所有各部门（即海军、空军和陆军）。起先，把军事方面的这种权力留给勃洛姆堡和他的国防部很合希特勒的意思。一个原因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担任军事领袖。同时，在1934年6月30日罗姆事件发生时，他也深信需要保持军队的独立（即便仅仅作为防止党内再度发生叛乱的保障），因此他坚决站在武装部队一方去反对冲锋队。他与陆军达成了一项默契——武装部队（第一次）参加1934年纽伦堡纳粹党的大会，便是这项默契的象征——只要陆军无条件地支持重整军备和纳粹党的其他措施，纳粹党将不干涉军事事务。可是，有两个因素损害了这项默契：一个是党卫队不断玩弄的阴谋（党卫队正在逐步排挤冲锋队），另一个是参谋总部的有些成员和象哈默施泰因之流的较老的司令官，对于他们的同事施莱歇将军和冯·布雷多上校于1934年被“清洗”的事，仍然耿耿于怀。纳粹党与14陆军之间的默契总算维持了三年半，到1938年2月初突然终止了，当时德国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同柏林的一个妓女结婚，玷污了军队的名誉，因而被迫去职。

勃洛姆堡的丑闻，给了希特勒向军队下毒手的机会。党卫队早已在伺机打击参谋总部的“铁腕人物”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现在党卫队果然捏造了一项关于弗里奇搞同性恋的罪状。2月4日，希特勒终于宣布弗里奇和勃洛姆堡两人全辞职了。弗里奇由勃劳希契接任，可是希特勒并没有另行任命一位新国防部长，而是亲自承担起“直接统率”全体武装部队的职务，同时成立了一个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去执行以前由国防部办理的例行公事。根据勃洛姆堡的推荐，希特勒任命国防部武装部队处处长凯特尔为新的最高统帅部长官。然而，甚至在这一阶段，希特勒仍然感到有必要全面改组一下政府各部来掩饰他对武装部队的夺权行为。在这次改组中，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由里宾特洛甫接任，冯·巴本则从维也纳应召回来。原来希望接替勃洛姆堡出任国防部长的戈林被晋升为元帅。同时，在陆军高级司令官中也宣布进行了一次“人事变动”，大约有十二名过去曾触犯过纳粹党的将领都被迫引退。

这样就结束了希特勒同将领们友好和睦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们之所以能维持友好关系，仅仅因为希特勒同意保持旧德国国防军的“非政治性”军队的传统，以及他能够使军事领袖们追求强硬的外交政策和重建德国国防力量的愿望得到满足。但是，在弗里奇—勃洛姆堡危机出现之后，将领们立即开始接近文官中的反对派，这在当时是以沙赫特、格德勒和德国外交部的一些人为代表的。他们中的有力人物，这时和后来一直是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中将，他认为弗里奇事件在希特勒15同军官团之间造成了无法弥合的鸿沟。贝克特别担心希特勒外交政策当时的倾向，所以一再向他的上级勃劳希契提出备忘录，企图说明希特勒的轻率行动只能导致战争。1938年7月和8月里，贝克试图说服勃劳希契采取一种集体行动的办法——由将领们向希特勒发出一份最后通牒，指出同捷克发生的一场冲突必然会把法国和英国卷进来，从而将导致一场德国无法指望战胜的世界大战。当贝克看到新的

陆军总司令过于意志软弱，不能给他必要的支持，而他又坚信，只有把希特勒搞下台才能使国家免于灾难以后，他终于在 1938 年 8 月 27 日辞去了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此后他就秘密地致力于推翻希特勒政权的工作。

贝克的辞职大大鼓舞了文官中的反对派。他们也深信一切和平抵制的尝试都必然会遭到失败，“只有采用暴力手段”才会成功。因此，他们就着手准备 1938 年 9 月的那次密谋，其目的在于通过武力搞掉希特勒，以制止德国走向战争。起初，这个密谋似乎颇有成功的希望，因为德国人民普遍对希特勒的备战工作开始显出不安的迹象——例如，当希特勒煽动人民反对捷克斯洛伐克达到高潮，让一个新的装甲师列队通过德国首都时，柏林居民竟然冷冰冰地静立在一旁以示反对。这时军队中的一些关键人物显然都准备采取行动。他们中有新上任的参谋总长哈尔德（他同贝克一样也对希特勒的政策感到忧虑）和柏林军区司令冯·维茨勒本，他部下的师长冯·勃洛克道夫-阿尔菲尔德将军将负责执行政变的具体计划。在德国外交部内，反对派的计划已经发展到更为具体的阶段，他们已经谨慎小心地向国外去试探意见。甚至勃劳希契这时也确信，采取行动的時刻已经到来了。可是，当万事俱备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说，墨索里尼出 16 面调停苏台德区的危机，而希特勒又决定接受张伯伦所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强会议的建议。据沙赫特说，这“完全破坏了”起义的计划，因为“外国政治家的干预”是这些密谋人士“不可能估计到的”一种情况。这样，慕尼黑的解决办法似乎摧毁了这次秘密计划，并使任何其他计划也毫无希望，因为既然希特勒不通过战争便达到了他的全部要求，那就很难唤起德国人民去反对他了。过了不到十二个月，贝克和他的同伴们一直想方设法避免的这场国际战火，终于爆发了。可是希特勒和将领们之间的斗争却方兴未艾，到 1939 年 11 月初，将领们又在为发动政变进行广泛的准备工作。激起这次行动的信号，是希特勒向法国发动一场冬季攻势的决议。参谋总部反对这一行动，部分因为他们对德军突破马其诺防线的的能力缺乏信心，部分则因为他们认识到一旦发动攻势，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就完全消失了。密谋者的力量基本上和以前相同，所不同的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比以前更坚决地参与其事。事实上，他们两人于 11 月 5 日上午飞往西线，表面上是去作一次视察，实际上是去作好安排，如果希特勒发布命令展开进攻，西线的司令官就将拒绝把这项命令下达给他们的部属。同一天较晚的时候，勃劳希契由西线回来，向希特勒说明了他认为无法发动攻势的理由。与此同时，在措森的陆军总司令部（OKH）变得紧张起来，准备行动，而以格德勒为首的文官集团则准备掌权，甚至还拟订好德国新政府向盟国提出的和平解决的方案。万一在西部发动的政变失败了，就设法在总理府干掉希特勒。可是最后，这个秘密计划竟毫无结果，因为象往常一样，这些将领，特别是勃劳希契，经希特勒一威吓就屈服了，而希特勒偏偏又把那道关系重大的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命令一再推迟，没有发布。其次，那个暗杀计划也变得无法实行，因为自从 11 月 8 日一个不知名的“共产党人”企图在慕尼黑市酿酒厂炸死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袖之后，要想弄到必要的炸药而不引起怀疑就不可能了。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要想成功地进行抵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事实上，有一时期元首同军队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而在法国覆没以后，当希特勒宣布晋升许多将领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简直是亲切的。可是，1941 年夏天对苏联发动的进攻却引起了新的争执，使关系又紧张起来，因为有些陆军领袖认为这次进攻既是鲁莽的，又是不必要的。在希特勒那方面，他显然对一

件事不满意：虽然在 1938 年 2 月勃洛姆堡—弗里奇危机时期作了一些变动，陆军的作战指挥权仍旧操在总司令勃劳希契的手里，将领们对战术问题也仍旧保有重大的发言权。所以，希特勒的下一步便是拆散陆军的领导成员，使自己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最高作战统帅”。1941 年冬季东线出现的危机终于给了他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

这里无法详细讨论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在东线作战的问题上出现的许多意见分歧，尽管这些分歧终于导致了最新的这场危机。概括起来说，他们之间的基本分歧是：陆军总司令部极力试图在军事上打垮俄国人，而希特勒却追求一系列“政治”胜利。因此，当勃劳希契极力主张进攻莫斯科时（当时，苏联最精锐的部队全集结在那里），希特勒却要求首先攻占布尔什维主义的“滋生地”列宁格勒，后来当这项计划行不通时，又要求南方集团军朝着乌克兰东部的重要工业区发动进攻。只是到了后来，俄国的冬季已经迫近时（这年的冬季比往年至少早来一个月），希特勒才命令中央战线的德军朝苏联首都发动进攻。同时，他可以说是向德国人民作过保证，说东线的战事很快即将结束。1941 年 1 月 1 日，在向武装部队发布节日文告时，他曾经预言，“1941 年将是我国取得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的一年”。10 月 3 日在体育馆发表 18 分钟的演说中，他甚至声称，布尔什维主义已经被打垮，它的最后消灭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他既然作出了这些保证，就不让最高司令部向部队发放特殊的冬装；他争辩说，由于部队只需要执行守备的任务，通常的冬季补给品就足够了。

说明希特勒的估计误差多大的那场军事灾难，意想不到地突然一下子来临了。11 月底，俄国军队在各个战区成功地抵挡住了德军的推进，甚至在许多据点还进行了反攻。12 月 10 日，他们在东线全线发动了攻势。几小时后，希特勒召开了国会，宣布进攻莫斯科的冬季战役业已结束。到 12 月 16 日，德军到处都在撤退。在莫斯科前线指挥德军的冯·包克将军已于 12 月 12 日被免职，由利斯特将军接替。勃劳希契则由于新近这几星期工作过分紧张而弄得身体虚弱，又因军事上的挫折和冬季装备的不足而受到戈培尔的责任（这是通过戈培尔搞的一次最阴险的诽谤运动来进行的），所以也恳请准予辞职。他的请求获得了批准。12 月 19 日，希特勒亲自接过了陆军的指挥权。这一步骤，正如官方后来的通告毫不犹豫地承认的那样，乃是 1938 年 2 月元首接过国防部长以前执掌的权力后，开始加强其政治和军事领导地位的那项过程的一部分。从这时候起，就军事行动的指挥而言，这个以前的伍长的“直觉”就是法律。他以前在将领们面前有过一种自卑感。现在摆脱了这种自卑心理后，希特勒认为他可以用政治狂热弥补起自己在军事方面所缺乏的正规训练。在接过陆军指挥权时，他曾向哈尔德说：“任何人都能够做一点领导作战的工作”，但是最高统帅所要做的是“用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军队”。他认为没有一个将领能把这项工作做得使他满意，这就是何以他决定亲自接过最高指挥权的原因。在他看来，要打赢战争，没有什么比士气更重要的了，而象他在战时会议上和在公开演说中煞费苦心时常强调的那样：旺盛的士气的实质，就是使前线的士兵彻底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鼓舞。除了良好的军事训练外，我们认为思想训练十分重要（他后来对墨索里尼说），这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说明：在当前战争时期，我们却继续着手来完成对武装部队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作，我们要求所有的军官无条件地忠于国家社会主义。因此，武装部队的纳粹化运动是通过两个阶段来完成的：

首先建立所谓“人民军官团”，然后在最高统帅部内成立了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指导部”（Nationalsozialistischer Führungsstab），它可以同纳粹党办公厅紧密合作去“协调”武装部队的政治训练工作。作为走向建立新的人民军官团的第一步，废除了以前为军官职业所规定的教育条件，在选拔未来的军官时，又以“无条件地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而战斗的意志”，代替了“家世、教育和经济地位”等条件。

与此同时，希特勒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鸿沟不断地加深。1942年1月，希特勒授权戈培尔在武装部队与宣传部之间的联络官的协助下，起草一份有关陆军总司令部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内部的所谓“失败主义倾向”的书面报告，目的在于制订“适当措施”防止这种倾向。三个月后，希特勒于1942年4月26日向国会讲话时，含糊地把这场冬季危机诿过于陆军司令官，并且断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惶恐不安，不服从命令或者在执行任务时缺乏责任感”。后来在9月里，希特勒又一次大发雷霆，免去了哈尔德的陆军参谋总长职务，因为哈尔德显然主张放弃对列宁格勒的已经日见减弱的攻势。根据约德尔所述，希特勒的乱发脾气使元首大本营“最终成为将20名将领们受难的场所”。在罢免哈尔德以后，希特勒便离开了由作战部和最高统帅部共同使用的军官俱乐部，同时又与卑躬屈节的作战部长约德尔争吵得很凶。根据戈培尔所述，到1943年5月，希特勒对将领们已经觉得“讨厌透顶”，以致他“简直不想同他们再打交道了”。他显然对他的宣传部长说过，他不能“再容忍看到这些将领了……。所有的将领都说谎……。所有的将领都不忠诚。所有的将领都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于是，他开始鼓励党卫队，特别是武装党卫队的发展，用来抗衡陆军。在哈尔德被撤职以后，元首大本营的日常会议经常邀请一名党卫队的军官参加。党卫队的将领奉命在前线指挥作战。

希姆莱本人也获准接过了许多纯军事方面的职务：他于1944年2月负责军事情报机构以取代谍报局，7月间（在那次起义失败后），他成了国家军总司令，9月，又兼任战俘管理局局长。

第三节 1939—1943年国社党内部权力均势的变化

希特勒维护自己在军队中最高权力的这场斗争，对德国作战行动的统一起着破坏的作用，可是希特勒自己的亲信中某些人经常想在国社党内部取得权势的尝试几乎也起着同样破坏的作用。这场发生在纳粹党中坚人物之间的所谓“迪亚多希之战”，大部分应归咎于希特勒本人，因为他在战前巩固党的权力时，未能在纳粹领袖之间培植起一种集体的责任感。因为尽管他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完全掌握了政权，他却没有采取步骤在党的各个机关及社团的领导人中发扬一种真正的团结协作精神。的确，在他生硬地试图实施一套平衡监督的制度时，他甚至还怂恿党内不同集团之间展开一定程度的对抗，例如，他建立党卫队来抵制冲锋队，首先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结果是，尽管对领袖原则的运用字面上说得很好听，纳粹党组织内部却仍然存在着派性，甚至在危急的战争年代里，协调的领导一直只不过是宣传人员的一种虚张声势的愿望。

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的时候，“元首的干将”戈林正权势烜赫，他起先担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是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创始人），后来又担任空军总司令和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作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因此希特勒承认了他的地位，于9月1日指定他为合法的继承人。在以后的两年中，

戈林在策划占领区的掠夺工作时，他的话就等于法律。在军事领域里，他在法国沦陷后被晋升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德国元帅，从而使他的卓越地位也获得了承认。在这一阶段，他的确没有什么潜“第三帝国的真相：这个‘元首领导的国家’处于这样一种混乱状态，它的经济组织和军事方面的效果在许多方面全显得更加不可理解。一位记者在战时曾称它为‘独裁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这句话的确击中了要害。”

〔彼得·克莱斯特：《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1939—1945年》（Peter Kleist：

Zwischen Hitler und Stalin, 1939—1945），波恩，雅典那出版社，1950年版，第208页〕德国报刊于1942年1月12日戈林四十九岁生日那天，曾这样评述他。

关于四年计划，见下文，原著第173—174页。

参阅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人民观察家报》，1939年9月2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510页。

参阅1940年7月19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的演说（《柏林图画晚报》，1940年7月20日）。如同德国报刊（例如，同上报）指出的那样，德国元帅这一军衔是特地为戈林设置的。欧根亲王曾经获得德国陆军大元帅的头衔，继任的一些奥地利将领也获得了同样的军衔。有些德国贵族也具有世袭的德国大元帅头衔，但这不是属于军衔性质。因此戈林是独一无二的德国元帅。

在的敌手。拿希姆莱来说，他当时还满足于自己所担任的德国党卫队头子和德国警察总监这双重职务，负责1936年从戈林手上接下來的国内保安工作。至于宣传部长和首都行政长官戈培尔，他这时还准备尊重戈林的权力，诚然，遇到必要时，还准备支持戈林的权力。打倒戈林，不论希姆莱或戈培尔都决不可能指望由此直接得到好处，因为排在戈林后面的希特勒的继承人是副领袖鲁道夫·赫斯。上文已经提过，根据1933年12月1日的法令，赫斯成为德国内阁阁员，又根据1934年7月27日的一项未公布的法令，他取得了参加有关德国政府所有法律的起草工作的权利。因此，他成为党和国家之间的主要桥梁，拥有广泛的权力。他没有象他的继承人博尔曼那样运用自己的权力，那是由于他个性软弱和出名的心神不宁症阻碍了他这样做。

1941年5月，赫斯突然逃往苏格兰，这件事使纳粹32党的领导中原来有些不稳的均势遭到巨大的冲击而垮掉了。副领袖的这次轰动一时的逃亡，使里宾特洛甫“既紧张又沮丧地”赶往罗马向墨索里尼解释说，赫斯内心并不是一个叛徒，他只是“他自己的和平主义幻想的牺牲者”。赫斯的逃跑，给了他的助手和元首大本营的特别

联络官博尔曼高升的机会。博尔曼不象赫斯那样软弱和古怪，是一个坚决、冷漠、残酷的阴谋家，他早已在阴谋取代他的上司赫斯，博得希特勒的信任。象戈林作证时所说的那样，博尔曼从这时候起便对希特勒起着“最为决定性的影响”。

希特勒对副领袖的行为感到十分恼火，因此决定，如果他有天回到德国来，就枪毙他。在赫斯离开后两天，他就任命博尔曼为纳粹党办公厅（副领袖办事处当时的名称）主任。1941年5月29日，希特勒颁布了一道法令，授与博尔曼过去赫斯作为德国部长和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成员的所有权力。

贯彻这项法令的具体指示由博尔曼本人和德国总理府主任拉默斯拟定。他们在 1942 年 1 月 16 日发布了一道补充命令，确认博尔曼有权参加全部立法工作，并规定党和国家的最高机构之间除通过他以外，不得进行任何联系。现在，博尔曼可以使自己成为党、国家和元首三者之间的主要桥梁了。在这项工作上，他获得了希特勒本人的十分重要的支持。希特勒这时坚持说，首先是中央行政长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其次是各部部长全必须通过博尔曼向他呈报公务。同时，他又任命博尔曼为他的正式“秘书”，从而使后者成了元首大本营里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在希特勒纠集到自己周围的那伙令人惊异的机会主义者和阴谋家当中，博尔曼在多方面都是最一帆风顺的。²³ 他的实力不仅是由于他在元首大本营中窃据要职，而且是由于他能够集中在德国各地他的党羽手中的那股权力。事实上，在他担任纳粹党办公厅主任以后的几个月里，德国国内的权力均势出现了剧烈的调整，政府方面也起了彻底的变化。过去，纳粹党接受了这一原则：国家和党必须完全分开，党只不过设法去“领导”国家。现在，党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力，往往甚至还在政府内部享有行政职能。例如，根据 1942 年 3 月 26 日的一道法令，博尔曼的直属人员——地方行政长官——有权监督文职人员的升迁事宜。一个月后，他们担负起了在行政区内指挥劳工征募计划的责任。随后，他们又通过行政区经济管理局接过了对地区经济机构的监督工作。最后，根据 1942 年 11 月 16 日的一道法令，行政区同防区合而为一，这使行政长官有权管辖行政区内的全部“民间防卫组织”。

在国家一级上，自从博尔曼出现以后，就试图把管理权移交给党内的“积极分子”，并把纳粹党办公厅不合意的那些人（不问是不是老党员）全部清除出去。因此，1942 年 1 月，行政长官约瑟夫·瓦格纳被解除了全国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由赛斯-英夸特的门徒汉斯·非施伯克博士接任（和瓦格纳同姓的、慕尼黑-上巴伐利亚行政长官阿道夫·瓦格纳在六个月后也奉命“长期休假”）。3 月 21 日，原来负责在四年计划体制内总管劳动力的国务秘书聚鲁普博士也被免职，由纳粹党一名出色的“老卫士”，行政长官弗里茨·绍克尔来接替。5 月 22 日，博尔曼的死对头，德国粮食和农业部长瓦尔特·达雷被迫把职务移交给他的国务秘书，党卫队分队长赫伯特·巴克。这样，纳粹党办公厅在物价管制、劳动力和粮食等重要经济领域里的权力，仅次于主管四年计划的那个权力极大的机构了。²⁴ 起初，宣传部长戈培尔显然对博尔曼和三头政治的其他两个成员拉默斯和凯特尔在元首大本营中的飞黄腾德国派驻被占领的荷兰的长官，以前是奥地利联邦总理。瓦格纳由于反对党卫队的种种办法，显然触怒了希特勒。他后来被送进了监狱（参阅沙赫特：《清算希特勒》，第 30 页）。

《法令公报》，1942 年，第 1 部分，第 179 页。见下文，原著第 227 页。

达雷对博尔曼的态度，从朗格和申克所报道的他与罗森贝格的谈话中便反映出来了〔见泽尔热·朗格和恩斯特·冯·申克：《种族灭绝犯的画像——摘自前纳粹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遗留下的回忆录》（Serge Lang and Ernst von Schenck: Portrait eines Menschheitsverbrechers — nachdenk hinterlassenen Memoirendesehemaligen Reichsministers, Alfred Rosenberg），圣加伦，措利科费尔出版社，1947 年版，第 301 页〕。沙赫特（前引书，第 27 页）叙述，达雷是被“忿怒地免去了部长职位的”。

达觉得不满。据沙赫特说，戈培尔是希特勒政府中唯一真正的“智囊”，

他于 1943 年 3 月曾经试图拉拢戈林去说服希特勒，把“政治领导的职责……”移交“给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从而“把‘三人委员会’排挤掉”。戈林在他那方面也很乐于支持这样一个计划，因为他必然看到，自己也在逐步被“东方来的这三位贤人”搞得日益失势，这“三位贤人”这时在元首大本营里已经把持着一切了。戈林“从内心里”憎恨拉默斯，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正企图恢复文官政治。他认为，凯特尔是“一个绝对无足轻重的人”，只不过受博尔曼和拉默斯两人的操纵，“使人看来好象武装部队也参预了他们的各项措施”。但是，戈林显然“不十分拿得准博尔曼本人”和他的意图。1943 年春天当戈培尔叫戈林采取行动时，可能就是这种拿不准使他变得犹豫不决。无论如何，这使宣传部长得出结论：戈林不再有力量去完成他的计划了，戈培尔因此打定主意不去反对纳粹党办公厅主任，却去同他妥协，认为这样对自己最为有利。于是从 1943 年 5 月到战争结束时，戈培尔和博尔曼始终能十分融洽地一起工作，并且能同心协力地去应付党内的共同敌人（例如，弗里克、里宾特洛甫和罗森贝格）。至于拉默斯，戈培尔也不再害怕他的势力，因为博尔曼本人已经在利用他作为希特勒秘书的地位，把总理府主任排挤出元首大本营，从而逐步解决了他。

这样，戈培尔和博尔曼“谅解”的开始（这与其说是友谊的表现，不如说是工作上的谅解，因为博尔曼在希特勒的班子里始终没有一个朋友），标志着戈林权力衰退的一个 25 个重要阶段。由于他未能应付盟军日益猛烈的空中攻势，他在全国各地的声望本来已经大大低落。的确，在 1943 年夏天，他的威望降低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 8 月间不得不在报上发动一场特殊的宣传运动，使德国人民相信戈林并不是永远黯然失色。只要希特勒本人信任他，他的地位就很牢固。而希特勒却没有露出一丝迹象来表示戈林现在已经不中用了。诚然，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垮台之后，希特勒面临新的危机时，他还安慰自己，认为自己仍然有一个“十分冷静的”戈林可以依赖，他说，在“这样的时刻”，他不可能“有比戈林更好的顾问了”。四个月以后在慕尼黑每年举行的纳粹“老卫士”的大会上，他公开拿一种传说——说希特勒“罢免了”他的“朋友戈林”——开玩笑。到 1944 年 9 月那么晚的时候，他还再次任命戈林为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从而重申了对戈林的信任。可是，博尔曼为了排除他实现个人野心的主要障碍，一直在伺机使希特勒对戈林产生恶感。1945 年 4 月 23 日，戈林终于被撤职并遭到逮捕，这就明明是博尔曼所使的一条诡计。

象戈林一样，直到这个政权的最后一星期，希姆莱一直都成功地充作希特勒的一根支柱。诚然，希特勒的“直觉”在前线越是失灵，他就越需要一个“忠诚的海因里希”那样有才干的人去应付国内和被占领国家内可能出现的反抗行为。所以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他让希姆莱担任了多种多样的职务，这在纳粹史上甚至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党卫队头子原来已经是德国警察总监和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后来又成为德国内政部长、政治和军事情报局局长、国家军司令和战俘管理局局长，而已同博尔曼一起还是人民冲锋队的总指挥。此外，他对德国防空体系的管理也有发言权，因为防空警察归他管辖。1944 年秋天，他还从德国财政部接过了海关和边防机构（Zollgrenzschutz）的管理权，从而使他在这方面也有发言权。希姆莱能够这样接管这么多职权，这对于党内外他的敌人不是没有影响的。对博尔曼来说，这就引起了相当顾虑，使他力图树立起希姆莱手下那个野心勃勃的

卡尔登勃鲁纳的势力，尽量让他接近希特勒。对反对者来说，的确呈现出这样一个特殊的困难，即“没有希姆莱参加，任何人几乎不能想象这种制度会有所改变。”这就是说，如果不归功于这个党卫队头子，不让他的“威望”相应地增高，那就很难干掉希特勒。

第四节 德国司法方面的危机

正象在战争年代里纳粹领导人之间经常争夺权力那样，原则方面偶然也有些根本性的冲突。因为在纳粹运动内部，对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究竟要进行到何种程度，一直有相当多的争论。如果按照道理把革命进行到底，那就要同过去的事物彻底决裂，就要把德国政治生活过去一直依据的制度和传统全部否定。在1934年的“起义”以后，这种争论一直在幕后悄悄地酝酿着，可是在1942年德国司法方面发生危机时，这种争论又到了严重的地步，如同纳粹运动的法律专家汉斯·弗朗克指出的那样，这种争论使司法危机不仅成为“法律的危机，而且也成为国家的危机”。

对纳粹党的激进分子说来，战争为彻底实行“社会主义”规划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在法律领域里，这就意味着使司法完全为政策的目的服务，因此象蒂拉克（当时的人民法院院长）所说的那样，法官变成“不是监察官员而是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助理”了。最赞成这种司法改革的人中有戈培尔、蒂拉克、法赖斯勒（当时是德国司法部的国务秘书），尤其重要的是，还有党卫队的机关报《褐衫队》。这份报纸的态度从希姆莱的一句“名言”中便反映出来了。他说：他的行动是否“破坏了某一项法律条款”，他可不在乎。1941年1月在德国司法部长居特纳逝世之后，希姆莱曾向希特勒建议，德国司法部应完全予以撤销，民法的执行归内政部，刑法的执行归警察部门，这也反映出《褐衫队》的态度。反对他们的是由汉斯·弗朗克领导的一批势力较差的人，他们得到胡贝尔（司法部顾问）、比勒（弗朗克在总督辖区内的国务秘书）和一些行政区司法长官的支持。这些人认为，如果平民没有法律保障，任何政治制度都不会长此稳定，甚至连纳粹国家也必须是一个法治国。

纳粹激进分子在要求彻底改革司法制度的叫嚣中，可以很恰当地指出，尽管在1933年以后曾经试图用可靠的国社党员来充当法官，但是同德国公共生活的其他部门比较起来，司法部门的清洗工作始终落后。事实上，在1939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在职法官都是在希特勒执政之前任命的，而司法部长居特纳本人也只不过名义上是党员。此外，大学里青年律师的培养方式并不完全符合纳粹的原则。另一方面，1933年后建立起的政治警察见乌尔里希·冯·哈塞尔：《来自另一个德国：摘自遗留下的日记，1938—1944年》（Ulrich von Hassell : Vom andern Deutschland : aus dem nachgelassenen Tagebuchern 1938—1944），苏黎世，阿特兰蒂斯，1946年版，1941年3月16日〔这部书已译成英文，书名是《冯·哈塞尔日记，1938—1944年》（The von Hassell Diaries, 1938—1944），伦敦，哈密什·汉密尔顿，1948年版〕。

参阅弗朗克的“终结性的考虑”（《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556页）。

沙赫特（《清算希特勒》，第47页）说居特纳是一个非纳粹党人，他曾经“帮着希特勒政权和纳粹党掩盖所有违法乱纪的行径”。也许，颇值得重视的是，居特纳个人的助理，最高法院顾问冯·多纳尼，是德国反对派的中

坚人物之一。

参阅法赖斯勒在《德国司法》(DeutscheJustiz)上发表的文章,1941年8月19日《科隆日报》(KölnischeZeitung)曾加以引用。

和新型法院(即人民法院和所谓“特别法院”)则完全置于纳粹党的支配之下,检察官大部分都是狂热的国社党员。

因此,这些人和一贯墨守着传统的独立性的法官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摩擦。

激进分子从一开始就获得希特勒本人的决定性支持。希特勒本来已经把所有的律师看作“反对他的政权的捣乱分子”,这时他又开始严密注视着法院的工作,并且亲自干涉判决似乎过于宽大的案件。居特纳显然反对这种干涉,特别不愿把法院业已判决的犯人移交给盖世太保或公安部门。可是,1941年居特纳逝世以后,代理司法部长施勒格贝格尔竭力讨好希特勒,训斥法院,甚至把一些执法不够严厉的法官撤职。但是,激进分子却继续要求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当这片叫嚣正沸沸腾腾的时候,希特勒于1942年4月26日突然召开国会,在他指责将领们惊慌失措的那篇讲话里他还警告法官们,如果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不理解当前的需要的话,那么不 管他们“既得的权利”,将一概予以撤职。国会接着正式宣布,元首有权“不受现行法律条文的任何约束”,把他认为不称职守的任何大小官员全部撤职。

对激进分子来说,希特勒的这一行动等于暗示他们去加强他们的运动。5月11日,汉堡汉萨同盟上诉法院院长罗滕贝格尔写信给施勒格贝格尔说:元首1942年4月26日的演说并不使我感到惊讶。他的话证实了这一令人遗憾的事实:元首不信任德国的司法部门和德国的法官。几年以来,我在口头和书面报告里一直建议对法律制度进行一次彻底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现时这已经成为迫切的了。在以后的三个月里,戈培尔和纳粹党的报刊在斥责法官方面变得比以前更为激烈。宣传部长在7月22日的一篇讲话中这样警告人民法院的人员说:“法官是不能罢免的这种意见……来自一个敌视德国人民的外国知识界。”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希望法官“在工作中少依据法律,多依据这一基本观点:即罪犯应从社会中清除出去”。

另一方面,当时在波兰任总督的弗兰克则打定主意,他必须坚决抵制这次对司法独立的最新攻击。因此,他回到德国,在6月和7月里向柏林、维也纳、慕尼黑和海得尔堡等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惊人的坦率演说,猛烈地谴责支持“警察国家的理想”而压制“德国人由来已久的对法律的尊重”的行为。他还设法晋见希特勒本人,以便指出当前这种政策所包含的种种危险,但是尽管他一再请求,还是没有获得接见。这时候,希特勒也已经决定,他必须毫不含糊地出面来支持他的比较狂热的拥护者了。因此,1942年8月20日,他任命人民法院院长蒂拉克为司法部长,并发布了一道命令,委托蒂拉克遵照他的“训令和指示”,同博尔曼和拉默斯配合一起,“建立起国家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在进行这项工作中,希特勒还授权蒂拉克可以“不受现行法律的约束”。与此同时,他采取各种措施去肃清弗兰克在德国和党的法律事务方面的影响。为了“外交政策上的原因”,他认为不便把弗兰克的波兰总督职务撤掉。可是在把弗兰克置于警察监视下好几天以后,他终于免去了弗兰克在党内的所有职务,撤销他的部长身分,并禁止他再发表任何演说和出版已经发表过的演说稿。同时,希特勒解散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法律处(弗兰克是该处处长),并关闭了各弗兰克几篇演说的全文载《纽

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29 卷，第 518 页以后（2233-PS）；节录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4 卷，第 883—918 页。

“终结性的考虑”（《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29 卷，第 554 页）。

《法令公报》，1942 年，第 1 部分，第 535 页。

拉默斯在纽伦堡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11 卷，第 42 页）；
弗朗克的证词（同上书，第 12 卷，第 25 页）；《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 3 号》，第 290 页。

行政区和地区内该处的办事机构。至于弗朗克原来担任的德国法学院院长和国家社会主义律师联合会会长的职务，他全委派蒂拉克去担任。

可是，要想压制这时已经蔓延很广的抗议声，毕竟不是容易的。国家保安警察（Sipo）和纳粹党保安处（SD）的头子卡尔登勃鲁纳在报告希特勒最近采取的各项措施的效果时，不得不承认：这些措施遭到司法界猛烈的反对。同过去盛行的关于地方官独立的概念彻底决裂……据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方官深为不满的批评。据说，在某些情况下，这甚至引起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公开加以指责。党外的报纸继续发出一些克制性的呼声，重复着弗朗克为“法律保障”和“法律感情”提出的要求。最后，按照弗朗克的想法，他的立场起了这样的作用：使《褐衫队》不再攻击律师，使戈培尔也下令禁止报刊进一步发表贬低律师的言论。

另一方面，新的司法部长蒂拉克也发觉，要建立起希特勒所指望的那种“国家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并不容易。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设法使法官更为彻底地从属于司法部，从而促使司法部门纳粹化。1942 年 9 月 18 日，蒂拉克在希姆莱的“司令部”里同他会谈了五个半小时后，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蒂拉克尽力使“司法”工作同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活动更为一致。他还想简化刑事裁判。然而，尽管他可以象 1942 年 9 月 29 日在柏林发表的演说中提出的那样，声称自己已经克服了“党对司法方面的不信任”，但是他的激进派同伙却对他大感失望。据戈培尔说，人们结果发觉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司法部长”。虽然蒂拉克总算一直留任到德国投降时为止，他的国务秘书和得力助手罗滕贝格尔却于 1944 年 1 月被解职，由部内秘书长赫伯特·克勒姆接替。克勒姆是纳粹党办公厅 -C 组的组长，一直负责处理纳粹党对“不满意的”法院判决所提出的控诉。因此，德国司法方面的这场危机最终造成了一种僵持状态，其结果《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 3 号》，第 259 页；《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26 卷，第 200—203 页（654-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467—470 页。

《德国司法》，1942 年 10 月 16 日。

《戈培尔日记》，第 384 页。据戈培尔说，“法学家总是法学家。元首从蒂拉克的实例中刚发觉了这一点。”

德通社，1944 年 1 月 3 日；《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 3 号》，判决书。第 10796—10797 页。

既不能使彻底的革命派满意，又不能使反对派满意，因为革命派想同过去完全一刀两断，而反对派则认为：至少在德国生活的这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必须准备同传统妥协。

第五节斯大林格勒和墨索里层的垮台

希特勒于 1942 年 9 月 30 日在体育馆发表演说时，竭力向德国人民保证：

比 1941—1942 年冬季“更为严重的”危机，“不可能，也决不会临到”他们头上。这种保证是必要的，因为在战争余下的时期德国国内生活方面一直存在的逐渐束紧裤带的苦日子业已开始。德国人已经经历了 1941 年禁止投递圣诞节祝贺信的禁令，开始征收寒衣的工作，工业的初步“集中”（包括许多小企业的歇业），绍克尔对不必要的工厂的淘汰，以及征募劳工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作。此外，德国人还开始感觉到盟国空军日益强大的攻击和盟军在北非的军事胜利所带来的影响。士气正在低落，看来只有在东线打一个大胜仗，才能把日益萎靡的士气振作起来。

斯大林格勒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个“滋生地”，它同列宁格勒一样，一直是希特勒的主要进攻目标之一。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战这时正在展开，希特勒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攻占该城。虽然结果还毫无把握，但是德国官方 PGN0036.TXT/PGN>通讯社却受到鼓励，十分冒昧地作出最为乐观的预测。1942 年 9 月 3 日海通社宣布，斯大林格勒的陷落“只是 31 时间问题”，胜利的消息“即将由德国电台予以广播”。此外，9 月 30 日希特勒在体育馆发表的那篇演说中还亲自作出有力的保证，说德军将占领那座城市。但是，即使在当时也已经变得很明显，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战并不是“按照计划”在进行。10 月间，在苏军钳形攻势的压力下，当希特勒的军事顾问极力主张撤兵时，希特勒却命令军队在十分不利的形势下坚守阵地。如果他不能攻下这座戈培尔所谓的“命运之城”的话，他就下定决心要他的部队在那里战斗到最后一人，使这一战役成为德国军事史上伟大的英雄史诗之一。这样，这场战斗越是毫无希望，德国的宣传对斯大林格勒的鼓噪就越大。

希特勒深信，在斯大林格勒指挥作战的第六军团司令官保卢斯会按照他的意图干下去。11 月 30 日，他晋升保卢斯为上将，1 月 30 日又晋升他为陆军元帅，相信他一定会宁可开枪自杀，也决不向俄国人投降。可是，保卢斯即使是要报答晋升元帅之恩，也不准备最后英勇地切腹自杀。1943 年 1 月 31 日，他率领着他指挥的所有军队投降了，至少有二十名将领同他一起被俘。希特勒听到这个“叛逆的消息”时，气得简直发狂。他打定主意在眼前的这场战争中，保卢斯是他任命的最后一个陆军元帅施蒂尔弗里德的声明，海通社（德国电讯社，主要向国外发布新闻）.1942 年 9 月 4 日。

帅，此后他决不再做这种“蛋未孵出先计算鸡”的事情了。他预料，一星期之内保卢斯和他的将领们将在俄国电台上发表讲话。这个十分准确的预言在几个月后果然见诸事实了，斯大林格勒的这些将领果然象希特勒所说的那样，呼吁其他的德国部队投降。然而，希特勒本人却丝毫不准备为这次惨败承担任何责任。相反，他命令 32 德国法院以叛国罪缺席审判这些司令官。事实上，这些人的唯一罪行就是执行了他的命令。

同时，所谓保卢斯奋战到底的这出宣传笑剧却继续演下去。首先（2 月 1 日），他们对这位新元帅被俘的消息进行辟谣，随后便报道了他如何“同他的士兵作战到最后一刻”，接下去（2 月 3 日）元首大本营就发布公告，大意是说，斯大林格勒战役已告结束，“第六军团在陆军元帅冯·保卢斯的典范式领导下，忠于战斗到最后一息的誓言”，在“敌众我寡”和德军所面临的“种种不利形势”下战败。最后，德国报上还刊登了各式各样的挽歌，哀悼保卢斯的“英勇牺牲”。

这场大赌博既然输掉，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全国放在“总体战”的基础上，虽然从 1942 年已经采用过的措施看来，这个办法也不大可能导致任何根本性

的改变。1943年1月27日，绍克尔奉命发动一次新的搜罗劳动力的运动，他下令强迫每周工作不到四十八小时的所有德国男女登记参加战时工作。两天以后，又颁布了一道法令，勒令大批小型企业和工厂歇业或者合并。同时，纳粹党被指定为“祖国总动员的代表”。希特勒在执政十周年纪念日向德国人民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强调说，“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威力”将“要求所有的人履行自己的责任，并将消灭所有想逃避自己责任的人”。在2月24日的另一篇声明中他重申，纳粹党将“无情地消灭破坏者”，并将“以十倍的恐怖来打垮任何恐怖行动”。目前“我们要求德国人民作出这样艰苦的牺牲”时，“对外国人的生命也不会有所顾忌”。这就是说，必须把党内“半心半意的分子”清除出去。事实上，他的确下令把那些热忱开始减退的党内工作人员成批地清洗出去。党的所有支部全都举行“全体党员总点名”（Generalmitgliederappelle），每季度都要举行检阅，在检阅时要求“全党”“象以前那样齐步前进”。

可是“总体战”的号召刚发出以后，墨索里尼于1943年7月25日垮台了，这一来使这个政权又遭到另一次挫折。希特勒对这一新的“背叛”消息气得和以往一样暴跳如雷。这件事成了德国国内行政机构进行一次新的大改组的信号。那个日见衰老、工作无能的德国内政部长弗里克由于多年来为纳粹运动忠心耿耿地效劳，先前一直保住了他的职位，这时却被调到布拉格去充当德国保护长官，原来的职务则由希姆莱接替。弗里克在部内的主要国务秘书汉斯·普丰特纳是一个不十分拥护纳粹党的老职业官僚，所以也由一个干练而积极的党卫队官员威廉·施图卡尔特博士所接替。据说，任命希姆莱为内政部长，目的在于完成“进一步集中兵力和加强国内战线所必要的基础”，他不负使命，以他的全部残忍无情的手段从事这项工作。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处理五十二岁的旧文官、政府顾问特奥多尔·科泽尔特的案件，后者因为他有失败主义言论被判处死刑而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希姆莱驳回了他的上诉。8月25日，科泽尔特被处决了。处决他的消息由《人民观察家报》和纳粹党的其他报纸用粗体字加以报道。好几百名其他人士——有些是贵族，有些是专业人员，还有少数仅仅因为过分大胆、过于直率地评论了意大利事态最近的发展——不久也都遭到与科泽尔特同样的命运。事实上，在以后的十二个月里，德国判处死刑的有五千三百三十六人，其中因“叛国罪”而处死的不下于一千七百四十四人。

同时，希姆莱还制订了许多严厉的措施去对付纳粹党内的蜕化分子。9月间，他发布命令说，凡是不愿佩带徽章的党员，必须亲自把徽章交给行政长官，并承担全部后果。10月4日，在波森举行的一次党卫队将领集34会上，希姆莱清楚地表明，他准备“毫不留情地去”执行他的新任务，他阐明他的新任务是：（1）“恢复帝国已经很受损害的权威”，（2）“分散对帝国关系不大的一切职能”，（3）要在“整个国家机构内和一切情况下”“彻底根除贪污和其他不良行为”。那些已经事实证明是“无用的人”，目前就要“清除出去”，这一条也同样适用于“党卫队内部”不能令人满意的人。三天以后，在元首大本营召开的国家长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会议上，希姆莱宣称，“德国人民中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个别不忠诚的人正被“无情地消灭掉”。可是，他所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口是心非的，因为他本人这时正若即若离地搞着叛国的勾当。当他推行新的恐怖统治以对付所谓“失败主义者和口出怨言者”时，他却一直在同德国反对派的两名成员朗格贝恩和

波皮茨接触，他知道他们都是同反对希特勒的一场密谋有关的。

第六节 1941—1944 年德国国内的反对派

意大利停战后，希特勒于 1943 年 9 月 10 日在他的军事司令部里发表的那篇讲话中坚称，“要想象在意大利那样〔在德国〕找到叛徒，这种希望完全是出于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误解”，指望德国也会发生 7 月 25 日那样的事件，那是“幼稚的”。这多少代表了纳粹党对待反对派的态度，因为纳粹党一直在吹嘘说，他们的实力如何如何强大（诚然，就象过去吹嘘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实力那样），领导人也深受这种宣传的迷惑，以致他们拒绝认真考虑有可能出现有组织的反抗运动。事实上，希特勒于 1942 年 4 月曾向墨索里尼保证，他“在德国已经不再有任何反对派了”，在一个象柏林这样的大城市里只有一个“大约二千人”的小集团反对现政府。戈培尔也倾向于轻视德国首都这些抵抗集团“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而把他们的活动看作是“业余的”和“无害的”，虽然他知道某些知名人士（哈尔德，可能还有波皮茨）也参与其事。含有讽刺意味的是，盟国方面有些人竟然也持这种态度，他们认为，在战争年代里德国竟会有人对希特勒进行强烈的抵抗，这是难以相信的。

（一）教会

当然，希特勒对来自教会方面的反对并没有估计过低，他在德国保安总局内设置周密的机构来应付“政治天主教”和“政治新教”便是明证。尽管他指望往后再同教会算帐，他却感到在战争年代里要随心所欲地对付教会是力所不逮的。可是，教会反对派起先也一直默默无声，后来才真正讲话了——当时博尔曼领导的纳粹极端分子终于表明：他们决心要利用战争的种种紧急需要（例如，对医院的需要便成为接收修道院和教会的其他财产的借口）去消灭对基督教的信仰，象他们已经消灭了敌对的政党那样。的确，教会方面为了国家的团结，起初准备默默地忍受迫害。偶尔，一个宗教领袖甚至同他的迫害者站到了一起——例如，在法国沦陷后，天主教随军主教拉科斯基向德国军队发表了一封教书，赞扬希特勒，还有，福音派的总监督蒂格尔在《汉堡教会日报》上发表文章，把元首说成上帝的工具，并且说恢复德国在欧洲的权力是执行了上帝的法律。

然而 1941 年初，纳粹党与教会的关系起了决定性的变化，结果天主教主教们反对纳粹的声明变得越来越坦率。3 月，弗赖堡大主教格勒贝尔（他是希特勒政权最大胆的批评者之一）发表了一封教书宣称，面对着当前纳粹对教会的迫害，“天主教徒不能只是逆来顺受”，他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袖手旁观肯定是罪孽深重的”。三个月以后，在富尔达起草、并在德国所有天主教教堂中宣读的一封联合教书回顾了近几个月内教会所面临的严重障碍（征用修道院，关闭学校，压制主教教区的刊物等等），并且指出，排除这些障碍应是教会和国家之间真诚合作的必要条件。

由于这封教书是在对俄国发动进攻仅仅四天后发表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面对着布尔什维克这一共同危险时，主教们提出的和解建议（拿福音派宗教事务会议来说，它正准备打电报给希特勒向他提出保证，福音派全体教徒在这场反苏斗争中一定忠诚合作）。可是，纳粹党人对于以思想意识方面的妥协为代价去换取国家团结并不感兴趣。1941 年 6 月 6 日，博尔曼向全体行政长官发出了一个秘密通报，强调基督教与国家社会主义是不能共存的，并且坚持“凡是会限制或者妨碍元首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协助下所

行使的对人民的领导权（Volksführung）的种种势力”，例如教会，“必须全部消灭”。在这方面，对于宗教信仰无需加以区别，因为新教徒同天主教徒“一样抱着敌意”。因此，所谓“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非但没有成为宗教和平的信号，反而标志着一场全面的宗教战争的开端。以前授予天主教会的特权——例如，为波兰工人（德国统治下人数最多的非日耳曼天主教团体）举行礼拜的权利——立即被撤销，而富尔达会议主席贝尔特拉姆红衣主教为这件事一再提出的抗议，却被故意置诸不理。甚至主教们联名写给希特勒的一封抗议书——指责德国政府违反了同罗马教皇签订的宗教契约——也被置诸脑后。因此，主教们决定通过教书和讲道方式使德国人民注意他们所提出的抗议。

有一时期，主教们对纳粹的种族仇恨学说，以及故意使青年人堕落和杀害病人及精神病人的做法，一直进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5卷，第7—13页（075-D）；《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1035—1039页。参阅1942年12月7日贝尔特拉姆红衣主教的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2卷，第106—111页（3266-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1031—1036页。1941年12月10日贝尔特拉姆红衣主教递上的这封联名抗议书的内容披露在进尔次堡主教签署的一封教书中，并于1942年3月22日耶稣受难日在各教堂宣读出来。据贝尔特拉姆红衣主教说，对这封抗议书“没有一个字的答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2卷，第106页；《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1031页）。关于抗议书的全文，参阅英国广播公司1943年8月22日对德国天主教徒广播的节目。

尖锐的批评。现在，他们开始对纳粹党非宗教性方面的政策——象干涉法官的独立性问题和人种试验问题（例如，用“科学育人法以繁殖一国人民”的人种试验）——也进行抨击，人种试验问题在1942年的富尔达会议上受到特别强烈的谴责。他们还开始对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正义问题公开表示怀疑，指出（在1943年8月19日富尔达的联名教书中）凡是违背基督教信条的纯世俗思想，都已37经暴露出来是错误的道路，已经以痛苦失望而告终，他们还谴责那些“单把自己的国家和人种奉为特殊神明”的人。最后，在1944年发表的许多篇四旬斋教书中，他们公开提出疑问：在道义上纳粹党是否有权充作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基督教文明的卫士？他们描绘了战争所带来的种种恐怖行为，认为这些全是人类激怒了上帝后的直接报应，同时对那些指望“单靠政治和经济措施去征服布尔什维主义”的人提出警告：“布尔什维主义固有的邪恶只能用基督精神的内部力量去战胜”；他们还向德国人民发出呼吁，要他们提防那些已经使“他们的灵魂受到凌辱和兽化”，并使他们“非但没有战胜，反而”沦落“到马克思唯物主义水准”的人，不要让这些人把他们“引入歧途”。

（二）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反对派

在1939年11月那次密谋失败以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反对派蛰伏了一个时期，这时又活跃起来，尽管到这时为止他们并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成绩。因为虽然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有人在保卢斯的帮助或默许下曾企图组织一次起义，但是直到这时所发生的两件最值得注意的反抗事件都是同反纳粹的主要团体没有关系的人搞的。一件是1939年11月9日共产党在慕尼黑市啤酒厂置放炸弹的事件，另一件是1943年2月19日汉斯·朔尔和索菲·朔尔在同一城市内散发传单的事件。还有，1943年3月13日法比安·冯·施

拉布伦多夫想炸毁希特勒座机的尝试，结果没有成功，虽然侥幸并没有被人发觉。此外，在 1943 年 1 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盟国坚持要德国“无条件投降”，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反对派意气沮丧（反对派的成员后来这样说）。反对派又 38 分成各个小派系，这种派系反映了成员们所属的集团或阶级的职业或社会观点，或是反映了他们所赞助的主义或政党。

在军队方面，有一个反纳粹将领的小核心组织，由贝克（前参谋总长）、维茨勒本（他于 1942 年担任西线总司令时退役）、赫普纳（东线的一名将领，1942 年由于违背希特勒的命令擅自撤退而遭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奥斯特（谍报局中央情报处主任）所领导。自从 1939 年 11 月的那次密谋失败以后，这些人一直在等待一个采取行动的机会。在战争期间参加进来的人还有：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国民军团司令），冯·哈泽中将（1940 年后任柏林驻军司令），冯·特雷施科夫将军（东线冯·克鲁格的随从参谋之一）和林德曼将军（隶属于陆军最高统帅部的一名炮兵军官）。通过奥斯特关系，同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所谓“卡纳里斯集团”（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是谍报局的首长）。这个集团几乎完全是由陆军反谍报机构的军官和文职官员组成的。它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为反对派的活动提供了“掩护”。虽然它提供了一些很有能力的组织者，如奥斯特、拉豪森将军和汉森上校，但它的领袖卡纳里斯的高尚品格和反对暴力的主张，却使它成了希姆莱的一个易于袭击的目标。希姆莱于 1943 年下半年突然袭击了这个集团，先将奥斯特撤职，后来又将卡纳里斯撤职，并且逮捕了他们的许多助手。在贝克集团和卡纳里斯集团的外围，还有一个将领们的小集团，代表人物先是冯·克鲁格，最终是隆美尔，他们看到有必要去掉希特勒，但是要他们无条件地支持起义的计划则又犹豫不决。

同反对派有牵连的文官中，有的是纳粹政权早期的官员，还有几个是仍在任职的官员。他们的领袖卡尔·格德勒博士从 1930 年到 1936 年间曾在布吕宁手下任全国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后来又任来比锡市长。沙赫特在 1938 年前是德国经济部长，1939 年前是德国银行总裁，1943 年 1 月以前则是不管部长。波皮茨仍然是普鲁士的财政部长。吉泽纶乌斯先在盖世太保后在谍报局里工作。党卫队将领内贝是刑事警察的头子，他成了反对希特勒的秘密计划中最出力的人物之一。沃尔夫·冯·黑尔多夫伯爵是柏林警察总监。这个集团中的其他重要成员——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奥托·基普、汉斯·贝尔恩特·冯·黑夫滕、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茨和埃里希·科尔特与特奥·科尔特弟兄等——过去都是在外交界服务的。

这个退職官员的集团大部分（绝对不是全部）是同实业家、大企业和旧贵族有密切关系的保守主义者。比这个集团组织得更为严密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以及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也参加的所谓“克莱骚集团”。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人是：古斯塔夫·达伦多夫、尤利乌斯·勒伯尔（1944 年他受审时，法赖斯勒把他说成“德国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列宁”）、威廉·洛伊施纳（前工会领袖和黑森的内政部长，同天主教工会领袖雅各布·凯泽有密切关系）、卡洛·米伦多夫（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之一）和特奥多尔·豪巴赫（德国国旗的设计人）。“克莱骚集团”的中心人物是赫尔莫特·冯·毛奇伯爵，他是俾斯麦手下那位陆军元帅的侄孙，是谍报局国外科的国际法专家。该集团就是以他在西里西亚的庄园命名的。“克莱骚集团”的成员包括彼得·约克·冯·

瓦滕堡（施陶芬贝格的表兄）、欧根·格斯登美尔（路德教会的领袖）、阿道夫·赖希斯魏杜勒斯：《德国的地下组织》，第107页。

同上书，第106—107页。

因（社会民主党人）、特罗特·楚·佐尔茨和一些自由职业者、文官以及纳粹执政前各工会的代表。

尽管克莱骚集团一般是反对暴力的（因为他们对于促进精神新生比较感觉兴趣），它却作了不少工作去保持反抗运动的精神动力。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集团多少有点倾向于社会主义，它在右派与左派之间起了桥梁作用，从而促使密谋分子思想上的分歧调和起来。可是，密谋分子之间的有些思想分歧和不少个人之间的意气，仍然直到最后都没有得到解决。举例来说，贝克不喜欢波皮茨，波皮茨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也不受欢迎，而且（似乎）与格德勒也经常意见相左。社会民主党人泽韦林显然不愿意参加有沙赫特在内的任何政府。那个终于把炸40弹放到希特勒脚下的施陶芬贝格，急于想同莫斯科恢复友好关系。他在政治方面完全不赞同贝克和格德勒的主张，甚至计划委派一些“军事行政官”同格德勒的内阁共掌大权。然而，尽管他们之间的分歧根深蒂固，格德勒在1944年夏天却能够使不同意见的派系接受一项共同纲领，并说服他们商定未来德国内阁的班子。按照那时格德勒所拟定的内阁阁员名单，贝克将成为“国家元首”，格德勒本人将出任总理，社会民主党人洛伊施纳将担任副总理。外交部长将由冯·德·舒伦堡或者哈塞尔担任（这取决于最初的和平谈判是同东方还是同西方举行），内政部将由社会民主党人勒伯尔负责，司法部将由天主教徒维默尔主持。维茨勒本将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赫普纳则将出任陆军司令。

到1943年底，格德勒已经把密谋集团的政府所奉行的纲领拟订就绪。它强调了新政府祈求和平的愿望。这个纲领还提出要彻底抵制极权主义，要建立一个以西方基督教传统为基础的国家。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向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作出了让步：主张把公用事业和重工业收归国有。可是这个纲领对共产党人却没有吸引力，虽然赖希斯魏因在最后一分钟曾经力图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参加到这项秘密计划中来。由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潜伏着一名盖世太保特务，这个企图没有成功，结果还使赖希斯魏因和勒伯尔于7月4日和5日遭到逮捕。这件事情促使他们更想把希特勒尽快干掉，所以仅仅两星期后，施陶芬贝格终于下手了。

1944年7月20日午后，施陶芬贝格置放的炸弹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元首大本营内爆炸以后，接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富于戏剧性的，但是大部分又是极其混乱的。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无法在这里详加叙述。总的说来，这次起义没有击中要害，因为希特勒没有被炸死，事实上只受了一些轻伤，在以后紧要关头的二十四小时内并没有丧失工作能力。对密谋分子来说，同样具有灾难性的是，通讯大队的费尔吉贝尔将军未能把元首大本营的通讯中心炸毁（这就使元首大本营同柏林仍然保持着联络），而他们的其他关键人士又未能把主要的无线电台加以控制。此外，柏林军事领袖们的犹豫不决也同样是致命伤，他们呆在本德勒大街陆军最高司令部内等待官方证实希特勒业已毙命，同时还无休止地争论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另一方面，戈培尔以柏林行政长官的身分，却采取了坚定果断的行动打击这场起义的组织者以保卫首都。由于密谋分子未能抓住时机，结果这场政变到那天傍晚基本上已告

失败。晚上6时30分前，德国电台宣布暗杀希特勒未遂的消息时，已经能叫德国人民放心，元首只受了“轻微的烧伤和脑震荡，但是没有受重伤”。这关于这次谋杀希特勒的计划的详细情况，见惠勒一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635—693页；又见吉泽维乌斯：《坚持到底》，第371页以后。

那枚炸弹是为了用于爆炸一个混凝土地下掩蔽部而设计制造的，可是在最后一分钟，希特勒把开会地点改为一所极易损坏的木营房，爆炸的气浪从木营房的墙壁和屋顶冲出去了。

当大德国警卫营司令雷默尔少校报告说，他奉命要逮捕戈培尔时，戈培尔坚持要这个青年军官亲自在电话中与希特勒通话，以证实希特勒仍然活着。结果，希特勒就派雷默尔负责保卫柏林，打出那些参与起义的人。

项广播，以及元首大本营一再发来的叫人不要听本德勒大街陆军最高司令部的一切命令的那些指示，使一些摇摆不定的人缩了回去，千方百计把自己的罪证掩盖起来。

这些动摇的人中有国家军司令弗罗姆，他强迫贝克自杀，又派人把奥尔布里希特、施陶芬贝格和黑夫滕打死。

希特勒和纳粹宣传机器对这次起义的反应是和他们一贯的作风完全一致的。一切都归咎于那“一小撮”将领——那些“愚蠢并糊涂到犯罪地步的军官”，对于他们，如同希特勒在7月21日的广播中所说的那样，“这一次”

将按照国家社会党人惯常采用的方式同他们算帐。实际上，对于牵连在内的文官，特别是党内高级人员，象黑尔多夫和内贝，政府始终保持沉默，直到9月才发表了一项相当简短的公告，宣称这些人经过审判已予处决。

8月4日，军事“荣誉法庭”开庭，把维茨勒本和其他活着的军官清出军队，并交给人民法院去审理。这一件事使人深切地感到，这场密谋主要不过是将领们搞的另一个秘密勾当。

第七节 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末日

42 在这场起义失败后的几星期里，希特勒想的只是对所有同图谋杀害他的案件有关的人进行报复，不论他们关系多么间接。正象他在1934年抓住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一个小集团的反抗作为对整个运动进行一次清洗的借口那样，他在1944年11月13日向纳粹党作报告时说，他主张把这一新的“叛乱”作为“彻底检查一下整个国家机构”的时机，而“妥协与折衷办法”都将成为过去的事了。因此，象一个纳粹评论员所说的那样，1944年7月20日“将完成1933年1月30日的工作”。

在这场起义失败后，希特勒发表了广播讲话，在讲话中宣布：“为了最终创造秩序”，他已经任命希姆莱为国家军司令，并且指派古德里安接替蔡茨勒（先前接替哈尔德的那个多少庸庸碌碌、无足轻重的人）为参谋总长。这是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即将对7月20日事件残存的密谋分子，以及那些看清楚这项秘密计划不会成功后企图退缩的较为软弱的分子发动强有力的搜捕的信号。在这次搜捕中，希特勒甚至要求每天向他汇报进展情况，至少有七千名反对派的成员遭到逮捕，大约有七百名军官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对军事领袖们的处置办法，由于剥夺了武装部队法庭的裁判权，改由人民法院审理，因而大为便利。在第一批遭到逮捕和拷问的人中有前国家军总司令弗罗姆（虽然他到1945年3月19日才被处决），他于7月20日在本德勒大街干的自相残杀的勾当并没有能把他自己同这场密谋有关的证据全部毁灭掉。西线总司

令克鲁格自杀身死，总算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不过在自杀之前，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希特勒，要求他在西线结束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10月里，隆美尔同这次密谋的关系也被查明了，于是给了他一个选择：自杀或是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这位元帅知道，后一种办法意味着肯定判他有罪，还要影响到家庭名誉，他因此在10月14日选择了自杀的途径。然而，这时候已经很清楚，如果大家知道这两位卓越的军人也同密谋有牵连，那么德国军队和人民的士气都将大受打击。为了这个原因，希特勒下令，克鲁格下葬应不举行仪式，同时也不向其他将领宣布他同密谋分子有关。至于隆美尔，希特勒举行了一场令人作呕的国葬，希望这位元帅死亡的真相因此便不会被人知道了。

当希姆莱忙于整顿军队这一任务时，在镇压柏林叛乱中立下大功的戈培尔，则奉命向国内进行新的勒索。7月25日，由拉默斯主持的国家最高当局的一次特别会议结束之后，这位宣传部长奉命出任“总体战动员委员会主任”，有权使“官方各项计划”符合于“总体战”的需要。特别是他将检查“包括德国铁路[和]邮政在内的全部国家组织”，以保证“为武装部队和军备提供最大限度的人力”。为了这个目的，他有权“要求同家最高当局提供情报，并……向他们发布指示”。这样，除了希特勒、希姆莱和博尔曼之外，戈培尔成了德国最有势力的人物，有权对政府所有部门和德国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下达命令，规定它们在人力方面对“总体战”应作出的贡献。一个月后，他行使了这项新职权，颁布了一道命令，在德国几乎取消了各种形式的公共娱乐。所有的戏院、音乐厅和酒吧间尽数歇业。德国电台不需要的乐队一律解散。所有“小说和类似的文学作品”的出版（当然，纳粹党的“标准政治著作”的出版不在其内）一律暂停。日报的篇幅进一步减少（自从1942年以后，报刊已受到严格的限制）。许多教育机构，“例如家政学院和商学院”，一概停办。

1944年10月18日来比锡战役（1813年）纪念日那天，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子一律应召参加人民冲锋队，44万同军队并肩在德国本土上继续抵抗入侵的盟军（这时候，美国第一军已于9月12日越过德国边界，进入了亚琛，而在东线，俄国军队也在东普鲁士边境上作战）。虽然人民冲锋队名义上是“武装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象博尔曼承认的那样，对人民冲锋队的控制则“纯粹是党的事务”。人民冲锋队是根据希特勒10月18日的那道法令成立的，由各行政长官负责其兵员的征集工作和指挥工作。冲锋队参谋长舍普曼是人民冲锋队“步枪射击训练的督察”；希姆莱负责它的全面组织、训练和装备工作；博尔曼则是它的政治事务首长，他显然不愿意向正规的军事当局（包括凯特尔在内）提供关于人民冲锋队的任何情报。这就是说，在战争的最后六个月里，西线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几乎完全操在纳粹党的手里，因为就军队来说，希特勒本人这时已经接管了安排全部作战细节的职责。

在1945年1月30日的广播演说中，希特勒严厉地批评了“那些不肯承认资产阶级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中产阶级笨蛋们”，从而讲出了最后失败接近时，纳粹宣传中经常讲的一套老调子。在这种宣传中，他们把垂死挣扎讲得倒象有格外深奥的革命意义似的，而且把投降或是退却又说成是等于叛国。党卫队在绝望的形势下没有能继续作战时，甚至他们也遭到了贬黜。希姆莱已经以国家军总司令的身分下令枪毙逃兵的家属。2月12日，凯特尔对帮助部下非法离开作战地区的军官判处死刑。戈培尔曾经劝说希特勒撕毁日

内瓦公约，而跟着可能发生的枪杀战俘事件，便会阻止德国士兵向前进的盟军投降。希特勒有一时期的确有过这个念头。事实上，45 只是由于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坚决反对，似乎才使他没有干出这一新的疯狂行为来。

与此同时，希特勒和戈培尔用尽了人所共知的全部宣传伎俩——v-武器运动、文克将军驰援柏林的种种奇闻、希特勒亲自在分别举行和谈的问题上耍的花招、“狼人”运动，以及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阿尔卑斯要塞”周围作最后抵抗的诺言——竭力想使德国军队和人民相信，即使不能获得全面胜利，战争至少还可以打到一个相持不下的局面。最后，作为阻挡盟军前进的垂死挣扎，希特勒于 1945 年 3 月 19 日下令实行焦土政策。“所有军事设施、交通运输、通讯、工业和后勤设备，以及国内当前或将来可以被敌人用来继续作战的一切有内在价值的物件”全应予以破坏。甚至鲁尔区的重要工业城市倘使在盟军进攻时无法坚守的话，也应予以毁坏。可是，这时候党内外的许多人都开始认识到，希特勒的政策是毫无意义的。例如，拿汉堡行政长官考夫曼来说，他就故意不理睬希特勒的命令，拒绝把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再加以炸毁。同样，他的亲密朋友，德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施佩尔，则下定决心，为了战后德国人民的利益，尽力保全一切可以保全的东西。他于 4 月 16 日在汉堡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禁止继续进行破坏，并号召武装部队和人民冲锋队枪毙所有违背这项命令的人。党内和军内的其他人士这时也认为，除了全面投降外，并无其他切合实际的办法。因此，古德里安先在 1 月里后来又在 4 月里两次去见里宾特洛甫，要求在西线立即实现停战。这时候，希姆莱和戈林显然也深信必须采取这一步骤了（事实上，前者正在准备通过伯纳多特伯爵同西方大国进行和谈），但是里宾特洛甫（象在紧要关头常有的那样）却显得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

关于希特勒独裁政权的不光彩结局，其他书刊里已经有了详细的报道，因此这里只概括地提一下。希特勒于 1945 年 4 月 30 日在德国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自杀之前，曾起草了一份政治遗嘱。在遗嘱中，他指定海军上将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在这以前，希特勒已经把北方的全部军权授给了他。邓尼茨将成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戈培尔将担任总理，博尔曼将担任纳粹党总裁，赛斯-英夸特则将成为外交部长（过去曾被指定为希特勒继承人的戈林，这时遭到怀疑，认为他不忠于希特勒，已经被开除出党。希姆莱也是如此，他的党卫队头子和德国警察总监的职务则由行政长官汉克继任）。当时，邓尼茨本人在荷尔施泰因，他通过两份无线电报获悉了自己新职务的消息。第一份电报授权他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第二份电报则详细告诉了他希特勒所作出的其他任命。邓尼茨的直接反应就是：根据第一份电报采取行动而无视第二份电报。

邓尼茨的唯一想法是，在投降的细节安排好以前，为德国提供某种形式的看守政府。5 月 1 日，在向德国人民发表的一篇广播演说中，他说明了他的主要任务是，“拯救德国男女，不让他们被正在推进的布尔什维克敌人所消灭”，他还清楚地表明，只有在英美两国妨碍他“完成这项任务时”，他才有意同这两个国家继续作战。两天后，他派了以海军上将冯·弗雷德堡为首的使者赴律内堡荒原蒙哥马利陆军元帅的司令部去。5 月 4 日，邓尼茨下令停止潜艇的作战活动，第二天他又下令禁止“狼人”活动。希特勒想煽动德国青年在盟军战线后方进行抵抗，这些狼人便是残存下来的一些倒楣

蛋。当时，荷兰、德国西北部和丹麦德军的无条件投降业已生效。5月6日，邓尼茨写信给希姆莱（希姆莱要求允许他在德国新政府中成为“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可是没有成功）、戈培尔（那时候，他同希特勒一起在地下避弹室里自杀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德国西北部）、罗森贝格和蒂拉克，免去了他们的职务。几小时后，邓尼茨的外交部长施威林-克罗西克向德国人民宣布，德国的所有武装部队已经向西方国家和俄国无条件投降了。5月23日，邓尼茨海军上将和他的“内阁”的所有其他成员都被盟国作为战俘予以拘留，德国在随后的四年零四个月中完全处在盟国军政府的管制之下。

第二章新秩序的概念

第一节德国所宣传的新秩序

虽然自从战争爆发以后德国报刊和无线电台不时讨论改组欧洲的计划，但是关于德国打算如何实现新秩序的第一篇有条有理的声明，是德国经济部长瓦尔特·丰克——他生性是一个宣传家而不是一个计划和行政人员——于1940年7月25日向本国和外国记者讲话时所发表的。然而，丰克的主要兴趣在于从商业方面剥削欧洲（新秩序的不少宣传起了有效的烟幕作用），所以他的建议的要点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根据他的建议，人们看到欧洲在德国的指导下从一种双边贸易协定的体制走向多边贸易协定的体制。关于新秩序的政治意义，直到1940年9月27日德一意一日三国签订了三国公约——《科丰克原来是一个新闻记者，在成为经济部长之前曾经是德国政府新闻机构的负责人。《东南回声报》（SudostEcho），1940年7月26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9页。又见下文，原著第166—169页。

48 《隆日报》称它为“新秩序的大宪章”——之后，它才开始变得明确起来。公约的第一条和第二条，为强调轴心国在东两两方的目标基本一致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文本（根据这两条，日本承认并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德国和意大利则对日本“在亚洲的新秩序”作出了同样的声明）。可是，它们还是十分强调轴心国之间经济方面的合作。根据里宾特洛甫的意见，德国领导下的“欧一非半球”与日本领导下的东亚势力范围之间应当“按照宽宏的方针”进行“自由贸易”。这种贸易关系不是以地区对地区，而是以国家对国家为基础的：象以前那样，“日本将同欧洲地区的独立国家直接进行贸易和签订贸易协定，同时德国和意大利将同日本势力范围内的独立国家，如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等直接进行贸易和签订贸易协定。”欧洲国家（例如荷兰）有殖民地在远东的日本生存空间之内的，将从欧洲大空间的剥削中得到一份补偿。对整个欧洲来说，新秩序将带来的好处有：消灭失业现象和保证粮食生产国的剩余农产品有销路，并且可以不受世界物价波动的影响。同时，“德国的生产斗争和四年计划’可以作为蓝本，“经过适当的修改，在欧洲付之实施”，这样欧洲大陆依赖海外供应的程度就将减少。但是在这阶段，关于欧洲未来的经济组织并没有作出较为明确的承诺。事实上，想要知道新欧洲将“象一个卡特尔、联营机构，还是康采恩”的“形式主义者”受到了告诫，他将“不得不等待一个长时期，直到他的法律上的愿望在新秩序本身中得到满足”。

在签订三国公约时，罗森贝格通过1940年10月27日《人民观察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阐明了新秩序的基本宣传概念。这个罗峻的纳粹理论专家争辩说，德国支持划分生存空间来取代十九世纪的经济与金融帝国主义，同49时互相保护属于“生存空间”的各国人民。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这种意见时，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那类事件就不会重演了。因此，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欧洲大陆，一个经济上大部分是自给自足的，政治上则是完全独立的大陆。在那里，大德国将起着“波罗的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联系作用”。如同德国内政部的施图卡尔特所说的那样，当前的这场战争已经扩大了德国人民团结的概念，使之成为欧洲人民团结的概念。这一发展的结果，据另一个纳粹作者说，将是生存空间的法律来取代国际法。在这场新的“革命”中，指导原则将不是民族自决，而是生存空间的自决。

由于意大利成为三国公约中名义上平等的伙伴，地中海和非洲就受到了重视，因为该国的主要野心据认为是在那里。“欧洲—非洲”地区被认为是一片单一的“大空间”，而地中海则起着“连接欧、非两个地区的水桥”作用。德、日两国承认意大利的主要利益在这个地区，而德国对非洲的权利要求据说是极为适度的。据里宾特洛甫说，“如果德国能够收回以前属于它的殖民地，它大体上就满足了。”意大利将获得非洲土地的最大部分，至于英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属地，那“可能将由德国、美国〔原文如此〕和日本三国瓜分”。

在这阶段，纳粹时事评论员显然觉得很为难，不知如何来说明苏联在轴心国侵略计划中的作用，它即便不是积极的伙伴，也是一个关心的观察家。这并不是说，纳粹评论员清楚地看出，三国公约同1939年8月的纳粹—苏联协定有着基本的矛盾。相反地，他们费尽心机来着重说明，三国公约（俄国在1940年11月差一点也参加了这个公约）并不是针对苏联的，因此不会影响到德苏关系。根据雅赖斯博士1940年10月6日在《科隆日报》上50发表的文章，当前这场斗争的结果将是建立一个“政治的欧洲”，它和所谓“地理的欧洲”是不尽相同的。这个“政治的欧洲”到俄国的边界为止，因为俄国本身是一个大陆，所以它可以说是德意两国势力范围以外的一片截然不同的大空间。

但是，如果德一意的生存空间到那累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便中止的话，那就没有满足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在东方扩张领土的愿望。因此，直到1941年对俄国发动进攻后，生存空间的鼓吹者才能强调新秩序转向俄国扩展的种种利益。根据1943年3月21日《德意志总汇报》的文章，大欧洲的生存空间“只有伸展到东方草原和四周沿海地区时”，才有可能永远获得保障。而同大亚洲空间的联系也就得以建立起来了。正象一个作者所说的，对苏作战并占领东方领土，能使原来已经过于偏西的重心移回到大陆的中央，从而达到恢复欧洲均势的目的。因此，把东方地区合并进来，乃是一个联合的欧洲当前的任务之一；各国的舆论都开始认识到这项任务的重要性，而不只是把战争当作保卫欧洲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的一种手段了。因此，每一个国家必须考虑一下自己对这一共同事业将作些什么贡献，并且“必须以合作者的姿态参加这个宏伟的欧洲大厦的兴建工作”。那些新空间的鼓吹者还坚持说，每一个国家必须“完成自己的革命”（即按照纳粹原则进行政治刷新），因为这种国家革命将是欧洲全面奋起的一部分，而欧洲的全面奋起将会带来一种“欧洲大家庭的感情”。

德国报刊和电台正是以这种精神欢呼轴心国及其卫星国的代表应召到柏林去，重订大肆宣传的1941年11月25日的“国家法”中的反共公约的。德国外交部的发言人称这次会议为“第一次欧洲大会”。据说，这次大会表明：新秩序与战斗在东方的欧洲“十字军”具有共同的意义。为了纪念这次大会，德国电台播送了一支名为“欧洲之歌”的新歌，鼓励欧洲大陆各国人民为团结和消除国际51上的不和而战斗。与此同时，柏林邮局使用了一种特制橡皮邮戳，上面刻着“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欧洲联合阵线”字样和一张饰有剑与卐字的欧洲地图图案。1941年11月28日的《德意志总汇报》趁着当时这股热情发表文章说：

梅格勒在《柏林金融日报》上发表的文章，1941年10月26日。

据保罗·施密特说：“新总理府会客厅里场面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施

密特：《外交舞台上的龙套》，第 540 页）

据说，这支歌的歌词是由克里斯蒂安·阿伦斯布格写的，乐曲是“由库特·霍伊泽尔按照现代革命进行曲的节奏谱的”。

“欧洲合众国终于摆脱了不和、斗争和苦难而诞生了。”

这时，他们开始讨论一些异想天开的计划：以西欧最优秀的人民去开拓俄国被占领区，因为在这些日子里，他们经常鼓励青年人和农民承担起到东方地区去建立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农民壁垒的工作，党的冲锋队（即 SA）被派遣到东方去促进殖民计划，而德国许多大学里则全开办了“东方问题研究”的讲座和机构。据称，自从 1942 年 6 月荷兰东方中队成立以后，三百万荷兰人可以在俄国被占领区内开辟的“现代殖民地”上过起较为美好的新生活。就德国本身而言，开拓东方地区据望可以大规模地重新分配边远地区农民的土地，而这久已是纳粹最渴望完成的计划之一。

纳粹技术专家和宣传人员提出的另一个同样狂妄的计划是：开发大空间的自然资源，并使成员国在物质方面彼此更为接近。为了弥补这个地区燃煤供应的日益减少，他们打算利用地中海和刚果河流域“潜在的水力资源”供欧洲工业使用，并在直布罗陀海峡兴建一座巨大的发电水闸，利用“大西洋流入的海水”去推动涡轮机。同时，还计划铺设一条“横跨欧洲的铁路”，把顿涅茨盆地同威斯特伐利亚的工业区连接起来，使西方可以较为方便地获得东方的丰富矿藏。将来有朝一日整个俄国“向欧洲开放”的时候，可能还将铺一条四米宽轨距的铁路，连接东西两方，上面行驶六米宽和七十米长的大型客车，其车速将高达每小时二百五十公里。欧洲的运河系统也将大规模地改进——包括完成奥得河—多瑙河之间的运河工程，使黑海与波罗的海连接起来，还要开掘一条“欧洲苏伊士运河”，通过阿尔卑斯山，使上莱茵河与波河连接起来。德国的邮电部门也将把电报和电话设备改进得焕然一新。据说，他们已经同“欧洲的所有邮政管理部门”合作，“正在制订一项成立一个综合性欧洲邮政联盟的计划”。

就领土方面讲，要建立大空间就需要接受许多全新的概念，并且要修订一些原有的概念。以德国本身而论，它必须突破“俾斯麦帝国”的狭窄边界，因为今天的德国是“作为一个超国家的主宰者”，正“承担起超出民族国家范围的责任”。因此，“德国的概念”不再受“地图上标明巴黎电台（RadioParis），1942 年 4 月 22 日。

德国运输部顾问温斯博士的文章，引文见《瑞典日报》（SvenskaDagbladet），1942 年 3 月 2 日。

《信号》（Signal），1942 年 7 月 1 日。关于纳粹改造欧洲运河系统的其他计划，多阅《新维也纳日报》（NeuesWienerTagblatt），1941 年 9 月 10 日。

德国邮政部长弗里德里希·里施在《德国邮政》（DeutschePost）上发表的文章，1942 年 9 月 7 日德新处曾引用。

海因里希·沙尔普在《法兰克福日报》上发表的文章，1942 年 3 月的任何边界”的约束。还有，大空间本身“并不是一个地球物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因为“整个领土可以成为凌驾于国家领土之上的一个统一体”（人民空间）。这样，大空间的地理界限不需要以任何现存的边界来划定。维尔纳·戴茨这时提出了“真实的和幻想的大生存空间”这个令人争论不休的课题。他称真实的大空间为“国际大家庭的自然生存空间”，

它的特性、范围和形式，都是来自这种“国际大家庭”的“生物本质”。他把“欧洲国际大家庭”的大生存空间列为地球上六大主要地区之一。1942年3月8日的《德意志矿业日报》曾经较为含糊地提到一个“大西洋欧罗巴经济空间”。

就行政管理方面讲，大空间的组织所引起的问题，显然将通过把主宰民族理论同领袖原则密切结合起来的方法加以解决。前者是纳粹在对外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后者则是他们在管理国家方面坚持要遵守的。因此，大空间行政管理的拱心石是“领导民族”，他们把“大空间结成一个统一体”，并且“制订出大空间秩序”。领导民族行使领导权的方式必须根据“实际观点来决定”，所以大空间的行政管理可以是以下四种形式之一：（1）结合管理：领导民族将通过外交代表“制订和指导”政策；（2）监督管理：领导民族将行使严密的监督权；（3）政府管理：“所有主要的行政工作将由领导民族的行政管理机构办理”；（4）殖民管理：“在这种管理形式下，大空间的人民根本不可以参加行政管理工作”。不论采用这些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整个格局都将发生剧烈的变化。国际法不可避免地将被抛弃，因为如同维尔纳·贝斯特指出的那样，“大空间的秩序和大空间的行政管理，构成了一种新的共存的法律宪章，以前自由主义时代的‘国际法’和‘宪法’这些名称都不再适用了。”中立的原则也不能接受。“世界的改组”，其“结果可能产生出几个大区域，区域之间仍有可能发生战争”，但是这些大区域内的个别成员国要想“不参加这种战争，特别是欧洲的战争”，那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象另一个纳粹评论员更加露骨地所说的那样，有哪一个小国有充分的独立性，能够在大国面前保持中立呢？中立的危机实际上是我们大陆结构的危机，是旧秩序和帝国崩溃的危机，也是新朝代诞生的危机。小国已经成了无情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牺牲品，唯一的问题是：它们在屈服时是不抱任何希望呢，还是充满希望。

德国对大空间宣传的基调总是随着军事形势而变化的。在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惨败的冲击下，主题就完全改变了。这时，他们不仅把殖民主义扩张的调子小心谨慎地降低了些，而且对帝国主义空间的谴责也变成了当时的风气。他们强调指出，德国正从事于保卫整个欧洲大陆的一场战争，新秩序的建立只有在布尔什维克的危险过去以后才能加以考虑。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会谈⁵⁴后于1943年4月11日发表的冗长的公报中，德、意两国强调了这一意见，它们着重表明决心消除来自东、西两方的对“欧—非”地区的威胁，作为它们对保护欧洲文明的共同贡献。在1943年2月3日德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布的新的宣传指示中，国外的德国使团奉命采取这一方针：“英美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不会带来和平、安全和繁荣，只会带来另一场残忍的战争”，而欧洲则应被描绘成只有一个选择：“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混乱，便是有利于所有国参阅 E·H·博克霍夫博士在《布鲁塞尔日报》（Brusseler Zeitung）上发表的文章，1942年8月6日、7日和16日。

甚至维尔纳·戴茨也加入这种谴责，他强调说，德国新秩序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参阅《卢卑克日报》（Lubecker Zeitung）上的文章，1944年3月14日。

《法兰克福日报》，1943年2月7日。

《人民观察家报》，1943年4月12日。

家的欧洲新秩序”。欧洲军事堡垒内的“欧洲合作”，这时成为德国最

流行的宣传口号，甚至促使绍克尔在结束他对外国工人的发言时也高呼“新秩序万岁！”尽管戈培尔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德国人过去一直“象魔鬼避开圣水那样”避免使用这种词句。有一时期，有人甚至建议，轴心国可以把它们的国际义务正式订入欧洲宪章。事实上，2月底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归来后，他们的确宣布要制订一项共同的欧洲纲领，并且给人以“欧洲法”随时即将公布的印象。

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那天起，到战争结束时为止，除了涉及俄国的威胁外，很少议论到新秩序。在这时期，德国宣传机构所关心的一方面是尽量缩小自己在领土方面的愿望和野心，另一方面却是夸大苏联的侵略计划。为了想把苏联宣传成为最可怕的怪物，戈培尔于1943年11月命令他的所有宣传机构搞一次他所谓的“新的大规模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利用红军军事方面的胜利，借题发挥，“使欧洲和我们的敌人毛骨悚然”。同时，德国在欧洲称霸深为可取云云的暗示，宣传起来比以前要谨慎得多。这时，他们只强调这一事实：德国仅仅希望在邻国中居第一位。戈培尔在1943年3月1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德国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不是凭武力和强权来维持的，而是以自愿为基础的”新秩序。据说在这种新秩序中，“没有‘大国’、‘中等国’和‘小国’”，只有“历史上独特的有形实体，它们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同整体的关系，不可能也毋须建立在一种抽象的理论公式上”。为了使这种论点听来可信，宣传部现在发现有必要收回在对苏联发动进攻后自己向中立国所说的一些刺耳话。因此，它的语气变得痛苦惋惜，说是可惜这些国家对布尔什维克带来的共同危险和德国作战的真正目的全没有较为注意。在这一问题上，有一家报纸甚至断言，德国发动战争不是为了征服邻国，而是为了履行一项有利于欧洲各国人民的使命：“我们不是盲目而疯狂地想征服其他国家的人民才跨越过边界去的……我们是以新秩序和新正义的先驱者身分前往的”。笔者希望，本书以后的章节将对这种说法提供一篇适当的评论。

第二节 希特勒与新秩序

读过希特勒在1939年到1941年间这段时期里发表的演说的人，一定会注意到一项显著的差别：关于德国对欧洲新秩序的计划，希特勒闭口不谈，而他部下某些人却口若悬河。的确，尽管在1941年初纳粹曾开动全部宣传机器为新秩序这一概念进行宣传，尽管三国公约的第一条和第二条措词那么明确，但是希特勒本人对新秩序却始终没有加以详述，甚至也没有试图说明它的意义。诚然，1939年10月6日他在国会发表讲话时曾经用过“新秩序”这个词，但那只是涉及两件具体的事情（解决东欧的问题和改组国际贸易）而已。其次，在1940年的新年文告中，他提到德国人是“为了建设一个新欧洲而作战”的；在1941年1月30日的演说中，他称1941年为56“伟大的欧洲新秩序年”。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时，似乎决心要把“欧洲和亚洲的新秩序”这句话的真实意义搞清楚。但是当他要求希特勒阐明他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时，希特勒只从“自然利益”出发来说明三国公约的目的，显然并没有提到纳粹宣传中所解释的新秩序的较为广泛的目标。在1941年的新年文告中，他露骨地承认，战争时期急需解决的问题不是什么政治制度，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国际结构。只是到了1944年1月30日，新秩序的寿命显然已经指日可待时，希特勒才在他的一篇讲话中勉强提到纳粹自称代表“欧洲国家大家庭（die europäische Völkerfamilie）”所承担起的任务。甚至在

那个时候，他也还是没有把霸占外国领土的行径说成是代表欧洲的一项行动，他只是说要把那些德国人居住的、过去属于德国的、或者经济上是德国所不可缺少的国家加以统一。

希特勒本人对新秩序的种种宣传一般总抱冷漠的态度，这一点不仅在他对德国作战目的的公开宣言中有所反映，而且也表现于他不愿意考虑他的顾问们向他提出的某些建议。这些顾问建议按照德国政论家不时提出的比较开明的方针去改组欧洲大陆。德国外交部显然至少有两次向他提出了这种性质的建议，可是两次都立即遭到拒绝。第一次是在比利时投降之后，冯·施特恩格拉希特（后来是德国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向他建议成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第二次是在1942—1943年冬天，当时里宾特洛甫显然已经拟好了一项计划，准备在德国的领导下使各被占领国家重新取得一定分寸的独立。

每当希特勒考虑重新安排欧洲地图时，他所想到的就是征服，接下去在可以办到的地方就直接并吞。戈培尔曾经扼要地说明了希特勒在这方面的态度。1941年2月11日，他在体育馆发表演说时，直截了当地说明德国是在为它的生存空间而战，“至于生存空间是怎么一回事，⁵⁷我们可以等到战后再去讨论”。关于希特勒如何追求生存空间一事，在1940年法国沦陷后暴露得特别清楚。他对法国战败的第一个反应是强迫法国割让大片领土，把它们并入德国版图。接下去，经过仔细考虑后，他打定主意：从英帝国方面或许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他推迟了肢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工作，以便使后者能追随德国进攻英国。最后，当英帝国拒不屈服时，希特勒又把注意力转向东方，因为对苏联发动进攻似乎使他可以获得他在其他地区不能得到的大片领土。

希特勒改组西欧的初步计划，载在1940年6月19日在戈林总部召开的一次会议的报告里，因而保存下来了。该报告表明，希特勒当时已经决定要把挪威和卢森堡变成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利时的地位则仍在考虑之中，因为德国有可能给予“佛兰芒人特殊的待遇”并建立“一个勃良第邦”。至于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将“重新并入”德国，同时还将成立一个“布列塔尼自治邦”。法国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还不仅是这一点，因为希特勒显然还想并吞法国北部和东部的大片地方，“这些地方根据所谓历史的、或者政治的、人种的、地理的理由，或是根据任何其他理由，可以被认为是不属于西欧而属于中欧的”，因此他授权内政部的施图卡尔特根据这种方针去拟订一个肢解法国的计划。

可是，希特勒经过仔细考虑后，似乎已经断定，“将来对英国作战时，倘使以可能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同法国人“合作”，那就对他更为有利。在这阶段，把力量集中存英帝同的“破落产业”（1940年11月13日他同莫洛托夫谈话时这样形容它）上，似乎可以获得较多的利益。因此，⁵⁸希特勒决定：他“不准备并吞法国（看来俄国人原是这样揣想的），他只是想组成一个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大国的世界性联盟，包括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苏俄和日本”，并且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从北非到东亚”想牺牲英国来满足自己的所有国家的“一个联盟”。如同里宾特洛甫所说的那样，希特勒对俄、德、意、日四国势力范围的划分问题的确作了长时间的全面的考虑，并且开始意识到，“使它们的生存空间发展的势头正常地全部指向南方，将是明智的方针”。日本已经转向南方了，但是它不得不工作几世纪，才能巩固在那里获得的领土。同样，意大利也将向南方，向北非和东非扩张。至于德

国本身，它已“同俄国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等到西欧的新秩序建立起来后，它也将向南方，即“在中非境内德国以前的殖民地”寻求生存空间。作为德国的势力今后将向“南方”扩张的一个保证，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显然准备在使苏联加入三国公约的那项协议草案的第一个“秘密议定书”内写入一项声明，大意是：除了“在缔结和约后，欧洲各国的领土将进行的调整”外，德国的领土要求将指向“中非地区”。

因此，在1940年夏末和1941年春天之间的几个月里，希特勒的真正意图这一次倒是由纳粹宣传人员忠实地反映出来了，因为希特勒显然准备承认，德国的命运（至少是它最近将来的命运）在于南方的非洲。如同希特勒在1940年9月17日同苏涅尔会晤时告诉他的那样，他并不把德国在中非获得“一大片殖民地”看作是一片“移民区”，因为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已经“拥有足够的”这类土地了，他只把它看作“一种提供原料的殖民地”。这将意味着，对法国作出某种让步，并对维希政府的各种缺点假装没有看见，只要他的计划在开始时不会由于法国和它的北非领土之间的关系破裂而注定失败的话。因此，法国暂时将承担起非交战国的任务，这就是59说，它必须“在它控制的地区内，特别是在非洲殖民地内，容许并尽力以它所能支配的一切支持德国军事领导当局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然而，由于西班牙最后不愿意同新秩序共命运，这项重大的非洲事业终于落空，因为“向非洲进军”取决于西班牙的合作。佛朗哥将军从一开始就为西班牙的合作索取很高的代价。他在1940年6月提出的西班牙参战条件的一份备忘录里，坚持要满足西班牙对直布罗陀、法属摩洛哥、奥兰、里奥德奥罗附近地区和几内亚湾各殖民地的“民族的领土”要求。希特勒并没有因此灰心，他还是设法使西班牙和法国的观点调和起来，并说服马德里和纶希，使它们认识到，倘使轴心国在非洲的事业成功了，它们将会有“更为广阔的前途”。但是尽管佛朗哥一再保证说，西班牙“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同轴心国完全一致”，尽管他公然承认“历史的命运”已经把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他“牢不可破地”团结在一起，但是当轴心国联合进攻直布罗陀并向北非进军的日期确定下来后，佛朗哥却认定西班牙在经济上无力参战。于是，所谓“费利克斯战役”（占领加那利群岛、北非和直布罗陀的代号）只得无限期地推迟下去，而希特勒也就开始再一次把野心转向东方，因为他心里一直感到他所追求的生存空间应该在那方面。

虽然1941年德国人对俄国采取的冒险行动有一个特色：即在发动军事进攻前先作了周密的政治策划，但是这种策划主要并不是为了要实现新秩序所标榜的目标，60而是为了保证对有关地区实行残酷的剥削。1941年4月20日以后，罗森贝格以希特勒“东欧地区问题中央研究代表”的身分制订了一项改组东方地区的宏大计划。他或许会争辩说，这个宏大的计划同他过去在《人民观察家报》上说明的新秩序的广泛概念是一致的。但是他的计划的重点在于德国将要获得的利益，而不在于欧洲的总的利益。按照罗森贝格的想法，德国必须集中力量在苏联被占领的地区内建立“三个庞大的国家单位，按照三种不同的法律加以管辖”。第一个是波罗的海地区。它开始时将成为“德网的保护国”，尽管最后“通过对适当的种族成分德意志化，通过德国移民向该地的迁徙，再通过把不良分子全部清除出去”后，它将变为德国本土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个地区不仅将移去一些伏尔加河居留地的德国人（“在不良分子全部被清除以后”），还将移去“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

而且——在战争胜利结束后——还有英国人”。但是，对原来的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土和它们的内陆地区——白俄罗斯之间，将作出显著的区别。白俄罗斯由于“性质完全不同”，只能用作该地区的其余地方和总督辖区以及瓦尔特兰的种族渣滓的“垃圾堆”。第二个地区是乌克兰。它将成为“与德国结盟的一个独立国家”。第三个地区则是高加索，它“同北面毗邻的地区一起”将成为“一个有一名德国全权代表常驻的联邦国家”。

总而言之，这根本不是希特勒本人所关注的那种大空间的规划。这一点，1941年7月16日在元首大本营召开的讨论东方领土组织问题的会议上，他已有所表明。这时候，他关切的只是德国能够并吞多少被征服的领土。所以，在7月16日的会议上，他着手挑出可以立即并入德国的地区。他说，奥地利从前的行省加利西亚应当成为“德国的领土”。“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罗森贝格所建61议的“德国保护国”地区——也应成为大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东北方面，列宁格勒必须夷为平地，然后再把它交给芬兰人，而且芬兰人还“要东卡累利阿”。在南端，必须把所有的外国人从克里木“和可能的最大的内陆地区”清除出去。然后，由德国人移居进去，再使它象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侨民居留地和“巴库周围的地区”那样，成为德国的领土。

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还表明了他对这一意见的看法，即对苏战争是代表全欧洲的一场战争，因此不仅是德国，而且所有同德国合作的国家都应该从中得到好处。这是宣传人员特别喜欢的一个话题。他们认为，东方战役已经使德国能够用苏联的自然资源“供欧洲使用”，而发动这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战争，现在意味着“欧洲的公益应当放在民族的私益之上”。这也是遇到合适的时候希特勒本人在演说中乐于利用的话题。不过这一次是开诚布公说话的场合，希特勒并不是在作宣传性的演说。当时，维希有份报上恰巧刊登了一项声明，强调在反苏战役中所有欧洲国家的共同利益。这促使希特勒在会议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怒气发泄出来了。他坚持说，主要的问题是：德国人自己知道他们要些什么。德国人不需要把他们的目的向全世界公布，德国的道路决不应因为这种宣言而弄得较为艰难。实际上，这种宣言是多余的，“因为只要我们武力所及，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在我们权力所不及的地方，我们反正也无可作为”。虽然鉴于德国人在东线遭到的挫败，希特勒后来的语气变得缓和了一些，但是我们应当把他的这些话看作是对俄国发动进攻时他的真正的态度和实际的意图。假定希特勒发觉自己可以任意胡为的话，那么东方的生存空间无疑将按照他在1941年7月16日的这次会议上所提出的这样组织起来，该地区里新秩序所标榜的目标将被人悄悄地忘得一干二净。

62 第三节新秩序的外交结构

在纳粹宣传人员致力于说明新秩序外交结构的大量文件及评论中，他们总是费尽心机地强调轴心国的合作要比盟国阵营中的合作优越。据他们认为，极权主义运动之间观点的相同，以及轴心国领袖之间的友谊，使三国公约在国际关系中独具一种“特质”，并且赋与轴心国一种其敌人无法与之竞争的团结精神。因此，当英国、美国和苏联各自追求自私的、往往相互冲突的目标时，德国和它的盟国却能够集中力量，致力于实现新秩序这一目的。只要轴心国——至少，在欧洲地区——完全由希特勒支配，这种说法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德国、意大利和各卫星国之间所存在的

关系来看，纳粹宣传人员所描绘的卫星国如何自觉地、和睦地为达到共同目标而奋斗的那幅总的画面，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

就德国和意大利而言，人们一般认为这两个国家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分享新秩序的领导权的。因此，当所谓“欧洲青年协会”——轴心国和各卫星国青年运动的联合会——于1942年9月在维也纳成立时，它既有一个德国主席也有一个意大利主席，而为了实际的目的，该组织的管理工作则交由德国青年领袖阿图尔·阿克曼和意大利法西斯青年组织（Gioventuitaliariadell’Italia）总指挥阿尔多·维杜索尼共同负责。这件事最后证明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姿态，但却是德国人企图培养起来的德一意平等这种假象的典型事例。希特勒本人经常煞费苦心强调这两个主要轴心国家的平等地位，以及纳粹德通社，1942年9月14日。

“革命”和法西斯“革命”目标方面的“绝对相同”（absolutel’identit t）。其次，他还一直坚持强调他同墨索里尼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并认为墨索里尼的“命运”在许多方面都和他自己的命运完全相同。

事实上，这两个独裁者简直难得在对等的条件下会晤。早在1940年，希特勒就已经——引用一位几乎经常出现在他们会议上的观察家的话——“接过了领导权，并迫使墨索里尼退居小伙伴的地位”。希特勒不仅完全支配着几次著名的勃伦纳会议，“会议期间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三”都是他发言，只让墨索里尼“在会议结束前说上几句话”，而且他总把自己的意图隐瞒起来，不让他的意大利同事知道。因此，在1940年3月18日的第一次勃伦纳会议上，他故意一点儿也不让墨索里尼知道即将在西方发动的进攻，也不让他知道已经部署好的对挪威和丹麦的进攻，尽管这次进攻在会议结束后仅仅三星期便发动了。夏天，他拒不允许墨索里尼参加同法国的联合停战谈判。十二个月后，当他向俄国发动进攻时，他事先并没有向墨索里尼透露一点风声，直到德国部队即将进军时才告诉了他。

就墨索里尼而言，他对希特勒把他看作小伙伴的这种倾向深为不满。据齐亚诺说，早在1941年6月，墨索里尼就承认：“拿我个人来说，我对希特勒和他的作风已经受够了。”显然，他对轴心国的会议一点也不感兴趣，因为他发觉自己“被人撤铃地”召唤了去；象“主人叫唤仆人那样”，而且在会议上还不得不听上几小时元首的“丝毫无益和令人厌烦的”独自。仅举一例来说，他不能宽恕德国人在克罗地亚对待他的那种方式，而且希特勒没有预先告诉他要对俄国发动进攻的那种傲慢作风，也使他感到非常恼火。如同日本人一样，墨索里尼也对德国人在占领区内犯下的暴行感到担心，在他看来，这种暴行“使欧洲变得象火山那样炽热而变化莫测”。因此，1940年秋天当他自己对希腊发动进攻时，他打定主意即以希特勒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等到意大利部队准备进军时才通知柏林方面。其结果是，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这一行动气得“发狂”，并且发觉自己仓促地介入了一场他完全没有准备的新战争。如同他几个月后很牵强地向国会解释的那样，他感到不得不介入这场战事：倒“不是为了帮助意大利去攻打希腊”，而是为了防止英国利用希一意冲突在巴尔干地区获得一个立足点。⁶⁴希特勒甚至在演说中也倾向于把墨索里尼和意大利人民区分开来。他赞扬墨索里尼是当代出人头地的“天才”，是“古代世界瓦解以来，意大利国土上最伟大的儿子”。在墨索里尼垮台后的几个月里，希特勒继续声称对他具有最为深厚的友情，而且说他已

经“决定永远依靠墨索里尼，并断绝了同意大利的所有其他关系”。可是对意大利人民，他却非常蔑视。在同日本人的谈话中，他清楚地表示，他不准备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意大利人，甚至在同墨索里尼举行会谈时，他也毫不掩饰他对意大利人民的看法。例如，1943年7月19日在意大利北部费尔特雷举行会议时（即在墨索里尼垮台前一星期），他曾经严厉地责备墨索里尼，说意大利地面部队的“笨拙的、不象军人的举动”使停放在意大利机场上的许多德国飞机都损失了。在1944年4月23日的克莱斯海姆会议上，他对意大利率队在战争中所有“丢脸的”行为，特别是意大利“军官团”和在东线的阿尔卑斯团及其他团队的作战表现，大发雷霆。

在这方面，纳粹党的其他人士也抱有同希特勒一样的看法。表面上，纳粹党还是坚持德意联盟不能“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因为它是以“法西斯革命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甚至在1943年9月停战协定签定以后，德国所采取的方针还是，不应因为“罗马一小撮财阀政客犯下的罪行”而责备意大利这个国家的人民。可是，希姆莱由于他本人不象博尔曼那样是制订纳粹党这方面政策的人，不大担心意大利法西斯的垮台对纳粹党士气的影响，所以他对意大利人的缺点倾向于采取一种远为严厉的看法。1943年10月4日，他在波森向党卫队将领们讲话时曾经指出，意大利人中只有墨索里尼是“伟大的罗马传统的继承者”。他坚决认为，德国人一定“要明白”，意大利人的软弱在于“他们的血统和他们这个人种”。如果意大利是一个同德国“骨肉相连”的邻邦的话，“那么，要是它保持强大，事态将会大好”。可是，事实证明它始终萎靡不振，“能维持现状也就不坏了，非常之好了”。

这种见解并不完全是由于1943年9月意大利的垮台，这一点可以从居住在德国本土和占领区内并在那里工作的意大利人所受的待遇上很清楚地看出来。在保护国内，意大利人受到的待遇，象意大利总领事于1942年2月有理由向齐亚诺抱怨的那样，“即便不比捷克斯洛伐克人差些”，至少“的确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在其他占领区内，移民计划所带来的大批驱逐外国人的行动，也没有把他们列为例外。事实上，意大利人始终就没有被看作在种族上是同德国这个主宰民族平等的。他们一般不准同德国人通婚。三国公约签订才三个月，纳粹党就向德国境内各级党部发出秘密通知，提醒他们，这项禁令已经通过了。

在德国人和他们的另一个主要盟友日本人之间，广泛的合作就自然条件而言是不可能的，看来合作主要限于根据1941年3月5日希特勒发布的“第24号基本命令”互相交换技术情报。甚至连里宾特洛甫在三国公约签订后特别重视的经济合作协定，也直到1943年1月20日才付诸实施，而且鉴于盟国控制住这两个轴心国“领域”之间的海运路线，这个协定主要也还是一纸空文。可是，德国的宣传机构却迅速提出了可以用来实现更为积极的合作的种种方法。它还大肆宣传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于1942年1月签订的军事协定，欢呼它确保了“兵力的适当配置，以便为具有强大打击力量的作战计划做好准备”。它还强调日本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和德意两国66陆军在非洲的行动这两者之间的联合作战意义，企图暗示轴心国正在采取一种“内线和外线”的战略，即由德国和意大利在陆上负责“内线”作战，而由日本在海上利用其“外线的有利条件”。然而，就连最乐观的德国发言人也不得不认识到，

这种合作至多也将是偶然的。为了充实德日联盟的内容，他们便侧重于德日文化方面的合作，由德国海军上将弗尔斯特主持的德日协会的分会在德国许多大城市里成立起来。对德日文化委员会的种种活动，也给以广泛的宣传。这个委员会是根据 1938 年的德日文化协定组成的，由外交部文化政策司的西克斯教授负责。

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尽管德国报刊和宣传机构对东方这个新盟国的英雄事迹给予热烈的赞扬，但是有些人显然感到，在对德国负起的“北欧人的”使命写了和说了那么一大套以后，现在又同日本联合起来去攻打它的欧洲姊妹国家，这就德国说来是很不合适的。1942 年 1 月 1 日，《巴塞罗那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阿尔瓦尔·范内斯的很长的文章，指责德国人“背叛了白种人”并“犯下了雅利安人的变节行为”，因为他们“为欧洲未来最大的威胁……‘黄祸’效劳出力”。这篇文章的发表使原来已经不安的情绪变本加厉。由于这种指责来自一个早已被认为在政治上（即使不是在军事上）和新秩序共命运的国家，这就使德国宣传部显然特别为难。它连忙在它的国外主要宣传刊物《信号》上发表了一篇专题文章进行答复，说“欧洲团结”的事业早在 1870 年和 1914 年使用有色人种的军队来攻打德国时就已经被出卖了。这件事在德国外交部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外交部于 1942 年 3 月派该部新闻司的乌拉赫亲王到罗马去，就这个问题向齐亚诺的秘书达那塔进行试探。与此同时，德国的公众也开始对德日联盟是否恰当这一问题普遍感到怀疑，因此 1942 年 6 月 5 日博尔曼不得不向纳粹党发出了一项特别通知，要求全党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制止有关“黄祸”的进一步议论，他把这种议论说成是相当于“叛国罪”。但是，这种怀疑显然继续存在，甚至在最高阶层里也不例外，而希特勒本人则对日本人当时正取得的惊人的进展也开始不安起来。据戈培尔说，希特勒对“白种人在东亚遭到的惨重损失”“深深地”感到遗憾，有时还“忧虑地”问自己，“白种人最终是否能对具有巨大潜力的东方人民保持他们的优越地位”。

德国与其他轴心国伙伴和卫星国家之间的关系，同它与意大利的关系比较起来，甚至更为全面地受到希特勒本人的控制。严格他说，西班牙既不是盟国也不是卫星国，尽管佛朗哥很早就向元首和墨索里尼表示过忠诚，可是就西班牙而言，自从 1940 年底它退出“费利克斯战齐亚诺：《日记（1939—1943 年）》”，1942 年 3 月 10 日和 11 日。据齐亚诺话说，“墨索里尼对乌拉赫的声明感到愤慨”，同时“证实了……他的极端亲日的态度”。

《训令》，第 1 卷，第 407—408 页。显然，这个通知是在宣传部的要求下发出的。

《戈培尔日记》，第 26 页和第 280 页。可是，当希特勒想到“在欧洲未来的组织方面，欧洲大陆上并没有日本人”来充当“劲敌”时，他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又觉得相当放心（同上书，第 279 页）。

役’以后，希特勒显然已经不再把它当作轴心国事业中一个得力的正式伙伴了。他得出结论，西班牙“只有在战争的结局已定时，才会出来支持一方”。然而，他认识到，“至少在表面上”同西班牙“保持友好关系”对德国是有利的，由于他看清楚“西班牙的立场极为可疑”，甚至到 1944 年 1 月那么晚的时候，他都不敢采取任何“可能会促使西班牙加入敌人阵营的措施”。另一方面，他也不阻止德国报刊对西班牙的态度进行越来越直率的批评，特别是在 1943 年底蓝色师从东线应召回国以后。德国新闻界态度的这种

改变，其更加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强调西班牙渴望合作建立新秩序的，是报刊上的撰稿人，而不是德国官方的发言人。原先，每当一支西班牙“志愿兵”分遣队到达东线时，或者每当志愿兵频频赴德国作宣传性访问时，他们总是十分显著地加以报道，甚至象 1942 年 4 月西班牙与德国之间的国际足球比赛这类体育活动，也被急切地用来作为西班牙同轴心国“团结”

的证据。另一方面，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提到西班牙同轴心国的关系时，则谨慎得多，只把西班牙的态度说成是“非交战国”，或是“强调”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有“特殊情感的中立”。

在卫星国中，希特勒认为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同德国“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其意义和意大利并不一样。可是，拿罗马尼亚来说，他个人同扬·安东尼斯库元帅的关系在某些方面比同墨索里尼的关系还要密切。事实上，他向墨索里尼承认，他“十分尊重”那位罗马尼亚元帅，虽然他“对米哈伊·安东尼斯库并不信任”。安东尼斯库元帅是希特勒遇到困难时曾经请教过军事问题的唯一外国人，也是在元首大本营中敢同希特勒毫无拘束地直率谈话的唯一客人。他还受到特殊的礼遇，希特勒从来没有给予其他卫星国领导人这样的款待。1941 年 6 月，他事先便获悉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当他于 1942 年 2 月访问希特勒时，纳粹党报以头版新闻报道了他的访问，而对当时也在德国的吉斯林，却只给以简短的、不十分显著的报道。在这次访问时，希特勒亲自授给安东尼斯库金质鹰徽大十字勋章。6 月里，他成为第一个获得骑士十字勋章的外国将领。

就政治方面而言，希特勒对安东尼斯库的这种偏爱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大大加强了后者同匈牙利人的对抗。显然，这并没有使希特勒觉得遗憾，因为他象这个罗马尼亚元帅一样，也“看不起马扎尔人”。何况希特勒本人对霍尔蒂的感情始终就不是很真诚的。首先，那个匈牙利摄政未能全心全意地合作去“解决”犹太人的“问题”，这一直使希特勒感到恼火。其次，他对匈牙利人不愿全力支持东线的战事也非常不满，甚至在公开演说中也流露出这种不满的情绪，时常用不同的词句提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同他的合作。在演说中，他还倾向于把匈牙利人同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混在一起，而对罗马尼亚人则另眼相看。他认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由于对轴心国的忠诚，在领土方面都已获得了不少的好处——匈牙利根据维也纳议定书获得了特兰西瓦尼亚，又在对南斯拉夫发动进攻后得到了普雷克穆尔耶、巴奇卡和巴兰尼亚，罗马尼亚在对俄国发动进攻后收回了比萨拉比亚，并且并吞了外尼斯特里亚。在希特勒同墨索里尼的会谈中，他主张“轴心国的外长有责任心平气和他说服这两个国家”，使它们之间敌对的情绪不至于发展到“公开决裂”的地步。他还说，他本人已经告诉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如果他们双方不顾一切想要打仗，他决不会阻止，但是他们双方都会因此得不偿失的。”可是，暗地里，他显然已经向那个罗马尼亚元帅暗示，他往后会让那个元帅放手去对付匈牙利的。米哈伊·安东尼斯库第一次到东普鲁士访问德国元首大本营后一个月，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 1942 年 3 月 19 日的攻击匈牙利人的演说，这不大可能是一个巧合。这篇演说一时使轴心国内部很有发生一场战争的危险。

至于保加利亚，希特勒似乎接受了这一事实：即保加利亚人民的亲俄情绪使他们不能参加这次进攻苏联的“十字军”。他同博里斯国王的关系一向并不错，即使不是真正友好的话，因为国王的“自然的”和“谦逊的”态度

显然给希特勒和他的随从留下很好的印象。希特勒因为保加利亚参加了对南斯拉夫的战役，所以给了它相当大的报酬，正如希特勒 1941 年 5 月 4 日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所说的那样，从而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忠实的盟友付清了“历史的债务”。如果不是由于保加利亚同莫 70 斯科保持外交关系的话，他无疑会给予它更多的报酬的。这意味着，提到保加利亚在新秩序中的作用时，德国宣传的重点不得不放在德国和保加利亚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上，放在亲德派人士在保加利亚政治生活中正起着的作用上，而不放在可能牺牲苏联而作出的领土调整上。

至于芬兰，希特勒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它同盟国方面的一个主要国家（指美国）仍然保持着外交关系，而且象中立国的记者指出的那样，芬兰同德国之间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协定，只是由于对一个共同敌人开展斗争而必须进行切实可行的合作。虽然如此，根据作者写本文时（1953 年）业已掌握的证据来看，希特勒的确非常重视北方的这个盟邦。在 1941 年 12 月 11 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他在赞扬各卫星国时特别提到了芬兰，并在 1942 年 6 月专程去芬兰进行访问。

就德国同各卫星国的关系而言，军事合作或许并不那么突出（有时候的确非常脆弱），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倒是希特勒所采取的两个步骤：第一，“保护”轴心国内的日耳曼人，第二，在德国试图“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时，保证使这些国家同德国合作。关于日耳曼人的问题，德国的政策是：坚持这些日耳曼人可以享有自己的法人团体，有权成立自己的地方政府，制订法律以维护他们的日耳曼民族精神，参加武装党卫队和德国其他军事组织，以及一般说来，同德国当局保持它可能要求他们保持的那种关系。例如，斯洛伐克是 1939 年“战争爆发时手持武器参加德国方面作战”的第一个卫星国。在那里，德国侨民团体的领袖弗朗茨·卡马辛便同里宾特洛甫经常保持联系，里宾特洛甫就用他作为非正式的德国专员。71 卡马辛在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过程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他对于自己是德国特务一事也从不隐瞒。根据 1940 年 7 月 21 日的斯洛伐克立宪法令，在斯洛伐克的德国人将由一个国务秘书处来代表。1940 年 5 月，据宣布，他们是一个自治团体，除斯洛伐克政府征收的各种赋税外，有权征收自己的赋税（Vclkssteuer）。在克罗地亚，根据 1941 年 6 月 21 日的克罗地亚国家法和同年 10 月随后公布的一些法令，德国侨民团体也获得了自治团体的各种权利，其结果是：（1）他们的领袖布拉尼米尔·阿尔特加那尔博士成了国家行政长官，在日耳曼族人的所有内部事务方面拥有最高权力；（2）日耳曼族人的文官都宣誓既效忠于希特勒又效忠于德国占领下的克罗地亚的首领帕韦利奇；（3）日耳曼族人可以按照纳粹党的仪式悬挂德国国旗，唱德国歌曲，穿制服和行纳粹党的敬礼。在罗马尼亚，德国侨民团体的地位，是在 1940 年 8 月 30 日签订维也纳议定书时由里宾特洛甫和罗马尼亚外长马诺伊列斯库签署的一项特别议定书规定的。后来，这项议定书又由一个协定和一项法令加以补充。前者是 1940 年 10 月 6 日由安东尼斯库与侨民领袖安德烈亚斯·施密特签订的，后者则是同年 11 月 21 日使侨民团体成为自治团体，并授权给它颁布自己法规的一项法令。象在克罗地亚一样，侨民团体的成员被迫既向当地政府（所谓“罗马尼亚军团国”）宣誓效忠，又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在匈牙利，侨民团体的地位也是由维也纳议定书签订时签署的一项特别议定书规定的。这项议定书赋予当地的德国人毫无阻碍地保留他们民族风俗的权利，并允许“匈牙利境内德

国人民族同盟”在弗朗茨·巴施博士的领导下，有权决定哪些人可以被承认为侨民团体的成员。日耳曼人将有自己的德国学校，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将有适当的人数参加。可是，同其他卫星国家的日耳曼人享有的权利比较起来，匈牙利境内日耳曼人的权利仍然受到严密的限制。他们没有获得法人团体的地位，他们领袖的权力也不能同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侨民团体领袖的权力相比拟。地方当局禁止他们在国旗旁边悬挂卐字旗。在匈牙利议会的辩论中，议员们常常流露出对日耳曼少数民族领袖们敌对的情绪，而在种族上属于日耳曼族的人们，大多数又都拒绝参加纳粹党控制的侨民团体。

象日耳曼人那样，犹太人也成为德国干涉卫星国内政的一种借口。1941年12月，外交部主管“德意志领土”司的副国务秘书路得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方面德国的计划究竟要求各卫星国参加到何种程度。根据路得的意见，犹太人“问题”的彻底解决只能通过下列方法：

1. 将居住在德国及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所有犹太人押送到东方去；
2. 将占领区内已经丧失公民权的所有德国犹太人押送出去；
3. 将所有塞尔维亚犹太人押送出去；
4. 将匈牙利政府移交给德国的所有犹太人押送出去；
5. 向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说明德国准备把居住在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押送到东方去；
6. 促使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两国政府制定类似纽伦堡法令的法律；
7. 劝说欧洲其余各国政府颁布有关犹太人的法律；

8. 并象以前那样“自觉地”与盖世太保“合作”以执行这些措施。有一时期，纳粹当局显然妄想起草一份有关犹太人问题的共同条约，要求防共协定的所有签字国予以签署，从而使他们的“彻底解决”计划对各卫星国都有约束力。可是，这项计划似乎遭到了反对，因为意大利、西班牙和匈牙利都不愿意对这种多边的谅解承担任何义务。因此，德国最后决定对各卫星国分别施加压力，迫使它们一个个同德国签订双边协定，允许德国人把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押送出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匈牙利还是拒绝听从德国人的号令。为了要澄清有关“彻底解决”建议的许多问题，纳粹于1942年1月20日召开了著名的“万湖会议”。在会上，海德里希发觉不得不指出，尽管“在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这项问题已经不再有什么困难了”，尽管“罗马尼亚也已经委派了一名主管犹太人事务的专员”，在匈牙利“却仍有必要在不久的将来迫使该国政府接受一名关于犹太人问题的顾问”。但是，事实上，正象里宾特洛甫的特使费森迈尔于1943年4月和12月两次访问布达佩斯回来后不得不汇报的那样，外交上的任何威胁都没有能促使匈牙利人改变态度，事实上匈牙利押送犹太人出境的工作直到1944年3月德国人占领该国后才开始。

第三章党卫队与新秩序

如果我们不提党卫队在新秩序的筹划和组织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篇概括的研究就不是完整的，因为党卫队对那个议论很多的（即使是多少有些模糊的）政治概念的形成无疑起着极其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影响。的确，我们甚至

可以说，希特勒的欧洲主要就是党卫队的帝国。元首本人特别赞赏地看待这一帝国，就因为它体现了那么许多他自己的思想和原则，可是象我们往后即将看到的那样，这一帝国也是占领区内民政和军政机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常徒劳地尽力加以反抗的。由于这个原因，一般很难把德国大空间的历史同党卫队的历史和它的政策与活动分割开来。

党卫队的登场一点不是因为它在国家和纳粹党的结构内享有特别有利的地位，而是因为它在初期就具有许多有利的条件。有好多年，党卫队一直独断独行，成了国中之国，象波森军区司令官佩策尔将军早在 1939 年 11 月就很有理由抱怨的那样。希特勒为了奖励党卫队“在 1934 年 6 月 30 日事件”中立下的功劳，不仅把它提升到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结构内一个独立组织”的地位，而且还容许党卫队的官员象盖世太保的特工人员那样，实际上不受正常的德国司法机关的管辖。党卫队遇到可能的时候，总避免通过正规的国家和党的机构发挥作用。它从一开始就保有自己的情报体系，而且在很早时期这个情报体系就成了纳粹党和它的各个组织的唯一情报机关，后来还取代了正式的军事情报组织谍报局。其次，它还设立了自己的一些从事政治、思想和“社会学”研究工作的独立机构——其中包括由希姆莱担任主席的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党卫队研究和训练协会”（遗传研究所）。

在各项活动中，党卫队具有一个有利条件（这是同希特勒的欧洲有关的许多其他机构所没有的），即在自己组织内享有协调的、有效的领导，因此，象时常发生的那样，如果它在工作中同国家和党的其他机构发生矛盾时，它对于自己的目的应是什么至少十分清楚。总的说来，就它乐于宣布的政策而言，它在说明自己的目标方面要比其他那些机构直率。党卫队看不起那些“计划制订人”，它的机关报《褐衫队》专爱拿那种人取笑；它对于那种建立在许多宣传人员所鼓吹的广泛基础上的新秩序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它深信，在德国领导下经过改组后的欧洲的任何地区，首先考虑到的应是“血统、国土和种族”，尤其是种族，以及某一个党卫队发言人所谓的“武力全能这一概念”。因此，党卫队在这方面工作的重点在于德意志各族人民和日耳曼侨民，即希特勒保证要“收回”到德国来的那些国外的德意志人。

象在德国本土上那样，党卫队在被占领的国家内也成了执行希姆莱这个德国警察总监所必须承担起的许多特别“保安任务”的主要工具。1939 年 10 月 7 日，希特勒颁布命令，任命希姆莱为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Reichskommissar für die Festigung deutschen Volkstums），根据这道命令，党卫队又取得了广泛的权力。这项任命（我们随后即将谈到）实际上给了这个党卫队头子无限的实权，使他可以在占领区内指定“居留”区，从而根据他认为种族上和人口统计上合适的情况调整欧洲的地图。结果，不仅是党卫队（由于它的警察权力）成了新秩序的保护人，它的头子希姆莱在某些方面也成了新秩序的缔造人，正象希姆莱自己的一群大空间计划制订者——施图卡尔特、贝斯特、赫恩等人——于 1940 年他四十岁生日时献给他的那卷关于党卫队地缘政治学的专论集中正式承认的那样。

第一节 党卫队与“日耳曼民族的”理想

1942 年 8 月 12 日，希特勒颁布了一道法令，授与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全权处理纳粹党同丹麦、挪威、比利时和荷兰的所谓“日耳曼民族团体”的意识形态关系，从而大大扩张了党卫队在国际领域里的权力。起初，这种职权只涉及纳粹党同有日耳曼人的国家内亲纳粹的组织所保持的关系。可是后

来，由于被占领区内的德国代表事先未同希姆莱商量，在涉及日耳曼人团体的事务上便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所以这种职权也就应用到了这些国家的官方机构。结果是，党卫队竟然认为自身对这些日耳曼人将向新秩序作出的贡献享有绝对的留置权，它还认为自己是负责计划和监督大空间未来发展中指派给这些日耳曼人的任务的唯一权力机构。

希姆莱权力的这一新的扩大成为一种信号，德国及其占领区内的报刊随即发表了大批文章和讲话，强调德 76 国人、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之间的关系，并且鼓吹要建立一个以这些人民和其他“日耳曼族人民”组成的牢固的“日耳曼人联盟”为基础的新秩序。《褐衫队》这时热情地采取的这一思想并不完全是创新，实际上，这个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日耳曼人国家本身。例如，1942 年 2 月，吉斯林（他在 2 月 1 日成为挪威亲纳粹政府的首领）曾经向希特勒献策，主张把欧洲的领导力交给在德国指导下的一个“大日耳曼联盟”。这个联盟将由一个定期在柏林召开会议的“日耳曼联盟理事会”予以管理，并由联盟的一支共同的陆、海、空军来提供防御。吉斯林期望得到希特勒赞同的答复——结果却杳无音信——于是把自己的挪威党卫队组织（即“SSNorge”）改名为“日耳曼挪威党卫队，同时声称它是“大日耳曼党卫队的一个小队”，将“贡献其一份力量向各日耳曼族人民指出走向一个崭新的未来的道路，并为一个日耳曼大家庭打下基础”。吉斯林还鼓励在挪威全国发行一篇由克努特·克努松·菲恩写的专题理论性文章“日耳曼联盟”，旨在作为宣传日耳曼联盟的官方指导性文献。鼓吹成立这样一个联盟的日耳曼族合作者，也不仅是吉斯林一个人。在荷兰，荷兰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袖米塞先在 1942 年 5 月 17 日于海牙宣誓就任德国党卫队直接统率的荷兰党卫队队长的仪式上（希姆莱亲自参加了这一仪式），后来又在 7 月 31 日子隆特伦发表的一篇讲话里，极力要求成立一个“日耳曼联盟”。米塞在这两个场合都表示希望最终组成一支日耳曼军队（“新的荷兰军队”将是这支军队的一部分）来保卫“日耳曼各族人民的联盟”。他认为，这样一个联盟应是建立新秩序的第一步。然而，这个联盟将不是德国某些报刊和电台评论员所鼓吹的那种紧密团结的组织，而是相当独立的“日耳曼族国家”的一种广泛的邦联。

在德国方面，纳粹发言人也讨人欢喜地提到使日耳曼族同家同德国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在挪威，特博 77 文（1940 年 4 月以后的德国专员）力图强调挪威人“不是波兰人或亚洲的布尔什维克”，而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同德国人有着“共同血统”的“民族”。他还说，因此他认为“促使德国人和挪威人作为平等的伙伴在一个日耳曼大家庭内团结起来”是他的使命。在荷兰，赛斯-英夸特好多次都力图说明，没有把荷兰置于军政府管制之下，而由一个德国专员来治理，这是因为它是一个日耳曼族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他这样希望）不久将准备并乐于为建立一个新欧洲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样，在丹麦，诺尔-斯勒斯维的德国人领袖帕斯托尔·施密特表示，正因为认识到斯堪的纳维亚人“血统相同”，德国人才决定不在北方扩大其征服区，这同他们在东方进行的广泛的进攻适成对照。其他人士则着重指出，所有日耳曼族国家都将获得参加这场重大的东征的机会。就在这时，荷兰为了发展在东方地区的民族利益，宣布成立了荷兰东方中队。的确，这件事或许不止是一个巧合，然而，突出的是，希特勒本人对于在俄国建立大片非德国人的殖民地显然并不十分热心。

在德国本土，有一时期，纳粹当局即便的确未曾加以鼓励，却给予日耳曼族内奸团体相当的自由，容许他们向在德国工作的本国工作人员进行宣传，尽管对其他亲德组织的活动则严加取缔。举例而言，根据海德里希（当时的保安警察和保安处头子）1941年9月3日和12月6日发布的两道命令，挪威民族统一党、丹麦国家社会主义劳动党、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佛兰芒民族同盟和比利时雷克斯运动等组织的代表，都明文规定不受那项取缔外国政治组织在德国境内活动的禁令的限制。同样，属于“国家社会主义瑞士联邦”和“大德意志瑞士联邦”的瑞士国民也可以举行集会。另一方面，当驻柏林的斯洛伐克公使馆要求德国当局同意在德国设立一个格林卡党国外办事处，以便把德国境内的五万名斯洛伐克工人组织起来时，这个要求竟遭到拒绝，理由是，德国政府认为，在战争时期采取这样一个步骤不会有任何益处。同样的禁令也推行于法国的所有同纳粹合作的团体和塞尔维亚的所有团体，“包括目前参加塞尔维亚政府的利廖蒂奇集团（兹博尔运动），以及斯托亚迪诺维奇的追随者。克罗地亚纳粹党虽然被认为是“特别亲德的”，却也没有获准在德国建立组织，德国境内克罗地亚人中的政治活动只能在乌斯塔沙运动的照管下进行。

德国纳粹党全党这时对日耳曼民族的问题十分重视。希姆莱在在这种情况下鼓励下，指定南汉诺威一不论瑞克行政区作为党的单位，负责“利用其影响促使日耳曼德国的所有日耳曼人组成一个联盟”，同时还在1943年5月在行政区首府汉诺威建成了一座“日耳曼大厦”，参加大厦落成典礼的有德国党卫队的领导官员和西欧各国内奸集团党卫队组织的代表。在党卫队内部，希姆莱委托一个所谓“党卫队日耳曼大空间工作组委员会”去研究有关日耳曼民族的理想的各项问题。这个委员会由所有对日耳曼民族事务感兴趣的党卫队机构的代表组成（遗传研究所、第六局、德国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办公厅、日耳曼族中心、种族与移民总局等）。

然而，作为一种学术性的，甚至思想性的活动来促进日耳曼民族的理想，党卫队倒并不是迫不及待的。事实上，它的主要兴趣在于日耳曼民族的实际团结方面，即推动武装党卫队各日耳曼族分队的招募工作。由于这些分队都宣誓效忠于“日耳曼民族的元首”希特勒，同时它们又都被正式称为“新秩序的党卫队突击队”，所以这些分队的招募工作在政治上对党卫队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它事实上扩大了党卫队对占领区内各内奸集团的影响，并在制订纳粹党的占领政策时使党卫队“日耳曼总部”（所谓“德国控制区党卫队总部”）有了发言权。不过这种招募工作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用途：它补充了德国武装部队在东线挫败后兵员方面的损失，这在斯大林格勒惨败后到达了顶峰。当时他们作了疯狂的努力，把日耳曼民族的党卫队分队扩充成为正规编制的装甲军。只是当这种征募运动没有能达到预期的结果时，支持日耳曼民族的理想的大量宣传才开始减少了。这时，他们对非日耳曼族的武装党卫队队伍开始越来越重视。这些队伍在招募“志愿兵”时不是以种族为根据，而是利用人们对布尔什维主义共同怀有的恐惧心理。

虽然这些队伍中有些是在战争初期组成的，但是它们的实力也是在斯大林格勒溃败后才开始扩充的。拿瓦隆军团来说，它原来只是由一小群狂热的雷克斯党徒组成的，1943年5月却扩充成为党卫队瓦隆旅，并成为一次重点招募运动的对象。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所有适龄的人都被迫应征加入拉

脱维亚党卫队军团和爱沙尼亚党卫队旅。希特勒原来坚持只有日耳曼人才可以携带武器，现在这种主张已由在东方这些地区和其他地区大规模强迫征召人员的政策所代替了。偶尔，就以加利西亚师为例——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施图姆称这一师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同从前的奥地利军队一起作战的当地退伍军人”所组成的队伍——征召起来的部队即使在战斗力方面不十分可怕，在人数方面却确实令人生畏。但是，总的来说，正象军事评论员迪特马尔中将在 1943 年底觉得有必要指出的那样，征募这些“志愿兵”和东方其他“志愿兵”的工作，只不过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已。

然而，日耳曼民族理想的真正黯然失色，并不是因为征募了一些非日耳曼族的党卫队队伍，而是因为希姆莱 80 决定使用俄国“志愿兵”，并使党卫队支持安德烈·A·弗拉索夫将军的“俄国解放军”。这件事象这个党卫队头子本人在演说中表明的那样，起初是一剂他很难吞服下的苦药。在 1943 年 10 月那么晚的时候，他对弗拉索夫的建议（“俄国只能由俄国人去征服”）曾经表示非常愤怒，他曾经强烈谴责“弗拉索夫的大惊小怪”（Wlassow-Rummel），这件事在德国其他部门已有不少传闻。然而，到 1944 年 11 月，东线战局的变化迫使希姆莱加入了支持这个俄国将军的那批“卑微的政治流浪汉”（用他本人较早时候所说的话）的行列。从那时以后，他同弗拉索夫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变得极其亲切。他时常同那个“R.O.A.”司令互相致意。1944 年 11 月 5 日，当“俄国解放委员会”在布拉格成立时，希姆莱就选派了自己的一个幕僚洛伦茨代表德国政府前去祝贺。

第二节 党卫队与重新定居的计划

希特勒于 1939 年 10 月 6 日在国会发表演说时，提到需要“重新安排人种分布关系，即让各民族重新定居”，这样将使东欧和东南欧各民族之间的“界线更为鲜明”，从而“消除掉欧洲冲突的一个起因”。第二天，他颁布了一道法令，任命希姆莱为德国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肩负起双重的责任：把分散在这个地区的德国人和日耳曼人组织起来送回德国，以及把可能“对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大家庭构成危险”的大德国新边疆内的各外国民族分裂集团的“有害势力”消除掉。在执行这两项任务时，这个党卫队头子将负责“通过重新定居的办法，特别是通过为回国的日耳曼族人提供住处”，来建立和发展（Gestaltung）新的德国居民区。为了办理这项工作，他 81 可以向财政部支取他所需要的全部经费。这个著名的移民计划就这样开始了。它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所有的德国人返回德国，象希特勒 1939 年 10 月 7 日的法令中所说的那样，而且还要利用波罗的海国家、意大利、俄国和巴尔干国家的日耳曼人从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来巩固德国征服和并吞的原波兰领土。

理论上讲，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应山政府而不应由纳粹党或党卫队委派。根据 1939 年 10 月 17 日的法令，希姆莱可以利用现有的“权力机构”和“公共团体”，因此在 1939 年 10 月 17 日关于成立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办公厅的命令中，他规定，在贯彻重新定居的计划时，国家和党的机构应在以下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 （一）德国人和日耳曼人应由日耳曼族中心和国外组织负责接回德国；
- （二）重新定居人民的健康检查工作，应由德国卫生当局领导人和党卫

队种族与移民总局负责办理；

(三)“对日耳曼民族性有危害性的外来分子”应由保安警察配合民政当局的首长加以处置：

(四)农民的定居问题应由德国粮食和农业部长负责办理；

(五)有关公寓和郊区住宅区的营造事务应交由德国劳动部长和德国劳工阵线负责办理。有一时期，这项工作至少实际上是按照这样分工去进行的。可是，尽管希姆莱利用德国总督、州长和市长作为他在接收地区的工作人员，他却任命党卫队高级官员和警察头子作为他的“地区专员”，从而把这项移民计划的实际指挥权牢牢地掌握在党卫队手里。由于党卫队高级官员和警察头子实际上不受德国民政当局的管辖，这就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使重新定居的计划同德国行政工作的其他方面相互脱节。

1939年10月7日的法令指派给希姆莱的职务中，有许多最终全交给了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的“总办公厅”(Stabshauptamt)和“日耳曼族中心党卫队总办公82室”负责办理。1941年6月11日，希姆莱正式组成了总办公厅，委派他的副手党卫队大队长乌尔里希·格赖费尔特负责主管。这个人据说是党卫队头子手下“整个德意志化计划的主要推动力”。根据官方的记载，该办公厅应负责“定居和重建的全部计划与执行工作，包括同它们有关的所有行政管理问题及经济政策问题”。日耳曼族中心在大战爆发前几年便成立了，它原来是国家机构，不是纳粹党的机构。这个机构负责处理“民族问题，尤其是德意志民族的问题”，并且照料着使“党卫队首长所决定的有关各民族的政治措施”全付诸实行。1937年初，它归维尔纳·洛伦茨负责。在希姆莱本人于1939年就任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后，他派洛伦茨负责移民的但是有两个例外——即巴登—阿尔萨斯和西里西亚，因为有一时期巴登—阿尔萨斯的行政长官和西里西亚的副行政长官也是“地区专员”。

《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8号》，第37页。

同上(第1号判决书)，第5387页。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的组织》(Organisationsbuch der NSDAP)，慕尼黑，埃赫，1943年版，第421—422页。

登记、移民由旧居撤走，以及移民迁移到德国本土或德国占领区内收容营等工作。1941年6月11日，日耳曼族中心无论是名义上或是实际上都成了“党卫队的总办公室”，由洛伦茨充当它的主任。

在重新定居计划中起重要作用的其他党卫队部门有：德国保安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简称“RSHA”和种族与移民总局(Rasse-und Siedlungshauptamt)。这两个机构都有专门负责处理有关新秩序事务的部门。这项计划各个方面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安排放逐“不良的”异族分子的问题——一般总包括这两个局，以及日耳曼族中心和总办公厅，但是有关授与移民公民权这类十分重要的事务，则只能由保安总局(“第三分队日——民族精神”)作出决定。

这项重新定居的计划，在任命希姆莱为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后，马上就着手实行。根据1939年10月15日同爱沙尼亚签订的协定和1939年10月30日同拉脱维亚签订的协定，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侨民迁移到了新合并进来的波兰领土上，并且还企图根据1939年6月23日和10月21日的德一意协定把居住在南蒂罗尔83的德语居民也迁往那里。下月，根据1939年

11月3日的德—苏协定，这项计划扩大到了波兰俄国占领区内的德国人。他们将与德国“势力范围”内的乌克兰人和白俄人进行交换。后来，根据1940年9月5日德—苏的另一项协定，苏联并吞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地区的十三万二千名日耳曼人也列入交换计划之内。接着，根据1940年10月22日德国与罗马尼亚签署的一项协定，南布科维纳和多布罗加的日耳曼侨民团体也包括在移民范围之内。随后，重新定居的计划仅限于轴心国控制下的地区，主要是把分散的德国侨民团体迁移出去，因为他们可能会被所谓“外国势力”所吞没——例如，1941年初迁往德国的、华沙的九千名德国人，根据同年11月的德—意协定撤走的卢布尔雅那省的一万四千名国外德侨和日耳曼人——包括一万名戈特沙（科切维耶）德国人。同一时期，保护国内某些小飞地中的德国人也被迁移出去重新定居。

为了腾出地方来接纳这些移民，希姆莱利用1939年10月7日的法令授予他的权力，把所谓“异族分子”全部从接纳地区迁移出去，因为这些“异族分子”的存在可能会妨碍德意志化的进程。因此，在日耳曼人由国外迁移回国的同时，非德国人却遭到冷酷无情的驱逐，他们不仅从新并进来的波兰地区，还从象阿尔萨斯那样的西方地区被驱逐出去。从新并进来的波兰地区移送到德国和总督辖区“居留地”内的有几十万人，从西方地区被迁移出去的，据官方承认，在1940年7月到12月之间的第一阵驱逐高潮中，大约有十万零五千人。事实上，到1943年夏天，移民这个词有了一个基本上十分消极的涵义，因此不得不向纳粹党发出指示，要求把这个词专用于希姆莱的较为积极的活动，并且建议，对于驱逐应当只用迁移这一词。⁸⁴如果照原定的时间表实行的话，重新定居的计划应在1942年内完成。然而，当时希姆莱的想象力丰富的头脑里，充满着漫无止境地扩大移民活动的卤莽计划。事实上，他这时已经决定，重新定居工作的黄金时代将在战争结束后到来。届时，根据“重新定居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新的东方地区将住满德国移民，“大约有二十二万五千户农民”将由旧德国的边远地区移往那里。下一个目标，将是为克里木和波罗的海地区“至少”提供“一个德国上层社会”。在总督辖区，也许将有更多的德国“移民居住的‘岛屿’”。无论如何，在桑河和布格河流域，一定要有强大的德国移民居留地（Ansiedlung），这样，波兰的非德国人地区就将完全被“包围起来”。这些计划和其他一些计划，显然将由总办公厅的“C分队”详细加以拟订。1942年，该分队的头子党卫队高级首长康拉德·迈尔-黑特林为整个东欧的人种重新安排问题拟定了一项全面的计划。这就是所谓“东方总计划”。这个计划建议把俄国的列宁格勒、克里木和赫尔松的周围地区同立陶宛境内美美尔和那累夫的周围地区改变为纯粹的德国殖民地，在未来的二十五年中向这些地区移去大批德国移民。当这个计划呈报给希姆莱时，他十分热心地表示赞同，并且授权迈尔-黑特林再起草一份二十年的计划，把并进来的波兰领土、波希米亚—摩拉维亚、阿尔萨斯—洛林和下斯蒂里亚及上卡尔尼奥拉全包括在内。

可是，德国在东线的溃败不久便促使任何这种长期的规划彻底完蛋了。从1943年初开始，重新定居的计划就变成把日耳曼人从苏军进逼地区撤走的一项无组织的混乱工作。据官方报道，到1944年7月，有三十五万这种日耳曼人已在日耳曼人中心的照料下返回德国。其中有将近一半人是1944年2

月至7月间由德涅斯特河与乌克兰布格河之间的那片地区撤出的，其余的人则是在早一时期从下列地区撤走的：（一）列宁格勒和英格尔曼兰地区（1942年1月至3月，撤走了三千八百人）；（二）“军团总部”地区和白俄罗斯地区（1943年1月至7月，5撤走了一万零五百人）；（三）北高加索地区、卡耳马克草原和顿巴斯地区（到1943年2月为止，撤走了一万一千五百人）；（四）乌克兰（1943年10月至1944年3月，撤走了七万二千人），（五）黑海地区和南乌克兰（1943年8月至1944年5月，撤走了七万三千人）；（六）日托米尔地区（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撤走了四万四千六百人）。这些日耳曼人中大部分都被送往瓦尔塔兰，因为该地彼指定为一个主要的“居留地”，其他的这类地区有：但泽—西普鲁士、上西里西亚、下西里西亚、洛林、卢森堡、上卡尔尼奥拉和下斯蒂里亚。有大批日耳曼族移民被送进这些地区，以代替被驱逐出去的非德意志人。

希特勒在批准重新定居的计划时，曾经希望它能加 N0128.TXT/PGN>强日耳曼民族。结果，希姆莱在这方面的活动对于加强日耳曼民族并没有什么贡献。事实上，这种活动有时还造成了莫大的混乱和不安，因此德国政府的其他部门对允许这种活动继续下去是否明智，显然怀疑起来了。这些移民大半是在德国本土的居住问题还没有得到适当解决时便被迫迁离了，因此很多人在战争时期一直就在德国或者边沿地区的营房里憔悴呻吟，而“临时性的营房”，象洛伦茨本人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就变成了“几万户移民家庭的住所”。这句话对于由南蒂罗尔迁来的移民特别恰当，因为他们集体迁徙到这片乐土的工作办理得那么糟糕，以致博尔曼不得不于1943年向纳粹党的所有办事处发出通知辟谣，否认业已放弃由该地移民的计划这种传说。偶尔，政策的彻底改变也会给移民增加痛苦，由立陶宛迁来的日耳曼人就是一个实例。他们在瓦尔塔兰刚住定下来，政府立刻又决定要再送他们返回原地（当时，德国已经向苏联发动进攻），尽管实际上直到1943年秋天才有些人回去。然而，有许多立陶宛德国人既没有抵达新的家乡，也没有返回老家，而是象1942年5月罗例如，在总督辖区，弗朗克发觉，重新定居的工作在居民中造成了不安，并且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下降（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2卷，第67页；又见下文，原著第559—560页）。

德国新闻报刊处，1942年8月6日。

《训令》，第4卷，第484—485页。由南蒂罗尔迁来的移民应该迁移到卢森堡和洛林（海通社，1943年4月5日）。有些人在上卡尔尼奥拉和下斯蒂里亚定居下来〔《卡恩特纳日报》（Karntner Zeitung），1943年2月4日和《格拉策每日邮报》，（Grazer Tagespost），1943年4月11日〕。

森贝格所说的那样，在移民营里“坐以待毙”。86德国人不时发表的表明重新定居的计划正在取得进展的那些官方统计数字，最为有力他说明了党卫队在这方面处理的不当。根据这些统计数字，原来大约有五万名立陶宛德国人迁移回国，可是其中只有三千四百八十二人最后获准留在德国本土（其中只有一百七十六人留在东普鲁士）。在同一次迁移行动中，大约有八万名日耳曼人也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被送回大德国来，但是到1941年底，这些人中显然只有五万六千七百二十一人在瓦尔塔兰、但泽—西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确实找到了住处，其余的大概一直就住在临时性的营房里。至于根据1939年11月3日的协定从苏联“势力范围”内迁回的那些日耳曼人，他们的情况也相去无几：根据“德国移民托运公司”的报告，1941年有十六万四

千人响应了希特勒的号召，愿意返回德国，但是到 1941 年底，显然只有十万零三千八百五十八人找到了固定的住处——其中有九万二千九百六十人是在瓦尔塔兰。尽管如此，这些人显然要比那些根据 1940 年 9 月 5 日的德—苏协定由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以及根据 1940 年 10 月 22 日的德—罗协定由南布科维纳和多布罗加选择回国定居的日耳曼人较为幸运。因为尽管根据德国移民托运公司的报告，1941 年这批移民的总数约为十六万四千人，但是到 /PGN0130.TXT/PGN>第二年年底，只有八万五千八百零三人抵达了常住的目的地。至于从南蒂罗尔迁回的移民，情况显然更糟，因此当局决定予以保密较为妥善。发表的统计数字只是说，牵涉到的人数从 1941 年的二十二万人上升到 1942 年的二十三万七千八百零二人——披露出的这些数字本身多少是有点令人惊讶的，因为从官方当时的声明看来，在 1939 年举行的公民投票中选择“遣送回国”的总人数只有十八万五千三百六十五人。但是，博尔曼 1943 年 5 月 21 日发给纳粹党各级办事处的通知却泄漏出了一点实情。该通知透露。到那天为止，在公民投票中选择重返德国的人里，只有“大约八千人”在德国确实重新定居下来。

第三节 德意志化 87

希姆莱和党卫队在“加强日耳曼民族”方面的职责，上述统计数字系根据德国报刊上发表的德国移民托运公司的年度报告和卡尔·C·冯·勒施所写的“欧洲移民运动”，《世界政治年鉴》（Kar1C.VonLoesch：“Die Umsiedlungs-bewegung in Europa”，Jahrbuch der Weltpolitik），1942 年。根据 1942 年初格赖费尔特的总办公厅进行的统计调查，到 1942 年 1 月 15 日为止，有五十万零七千名以上的日耳曼人从东方地区的一些国家被接运回来。大约有二十八万九千人被送往新并进的地区，有九千四百八十人到德国当劳工。其余的人都留在日耳曼人中心的移民营里（《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 8 号》，第 68 页）。

《人民观察家报》，1943 年 4 月 4 日和《慕尼黑新消息报》，1943 年 4 月 7 日。

《德国政治文件》，第 7 卷，第 2 编，第 652 页注。

《训令》，第 4 卷，第 484—485 页。

不仅涉及日耳曼人的重新定居工作，而且涉及接纳种族上合适的人重新加入德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切有关事宜。这种为德国民族团结恢复所谓“失去的同胞”的工作，当时常被称为“德意志化”（Eindeutschung）的过程。但是，对党卫队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重新德意志化”（Wiedereindeutschung）的过程，因为在党卫队人种研究专家看来，设法使纯外国血统的人变为德国人的这种想法是十分令人厌恶的。的确，希姆莱本人坚决认为，“按照以往的那种意义使东方地区德意志化，即教育那里的人民懂得德语和德国法律”，这不是他的任务；他的任务是，“照管着只有德国血统，即日耳曼血统的人”居住在那个地区。据《褐衫队》（1942 年 8 月 20 日）说，这就意味着“新赢得的生存空间”必须用“德国血统和德国生命，而不是用德意志化的人”去建立起来，因为“你不能把外国人变成德国人，正象德国人不能被变成外国人一样”。因此，必须用尽一切力量在新并进的地区“搜罗”一切可能“具有德国血统的人”，杂婚的子女和所谓“叛变者”（例如，已经“波兰化”的德国人）的子女，也将包括在内。诚然，德国人同在德国工作的合适的外籍工作人员的非婚生子女（不论法律对这种关系会多么

反对)显然也没有被排除在外。东方占领区内的瑞典后裔也当作潜在的德国人被接纳,甚至德国血统的美国战俘也照样可以“重新德意志化”。

可是,为所谓“捷克问题”寻求一项解决办法的种种尝试,已经说明了德意志化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的根本差别。在这方面,希特勒的顾问们向他提出了三项供他选择的办法。第一,由德国人渗入摩拉维亚,并将捷克民族的地区缩小到残余的波希米亚;第二,将所有的捷克人驱逐出去(“最彻底的解决办法”);第三,使捷克人同化,这就是说,将大约半数的捷克民族吸收进德国人中 88 来。希特勒“经过考虑后”,显然决定采用第三种办法。这意味着,“虽然表面上保持保护国的自治”,德意志化的工作却不得不“由德国保护国主管机关在往后的岁月中集中去执行”。党卫队认为德意志化一定要有选择性,而这种做法却使这一论点完全成为笑柄。因为虽然卡尔·赫尔曼·弗朗克也许会争辩说,“上千年的”民族通婚已经在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和德国人之间造成了“广泛的种族平等”,但是希特勒决定要利用德意志化作为战胜抵抗的一种手段,而希姆莱则坚决主张这项计划必须严格地仅限于挽回“优良的德国血统”,我们怎么异想天开也无法把希特勒的决定同希姆莱的主张调和起来。

然而,重新德意志化的计划主要关系到的是新并入的波兰领土,而不是这个保护国。在新并入的波兰领土内,瓦尔塔兰东半部地区以前是波兰王国的一部分,尽管在 1793 年后有一时期曾被并入普鲁士,却始终没有被德国人变为殖民地。所以除了瓦尔塔兰东半部地区外,这主要是一个“夺回”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波兰影响的德国血统或部分德国血统的人的问题。希姆莱用来着手挽回这些失去的德国人的方法很简单,即使在某些方面确实不是很粗糙的话。他的方法是:使他们分组登记,然后给予每一组必要的纳粹宣传教育和其他“待遇”(有时候,包括拘留在集中营里),直到他们重新认识到自己是德国人为止。为了这个目的,希姆莱于 1940 年 9 月 12 日采用了德国“种族登记”或称“民族登记”的办法,把合并区内以前德国血统的波兰公民或部分德国血统的波兰公民划分为四类,并且规定了一些批准他们成为公民或国民的原则。第一类人包括那些参加过一个德国组织等等,在波兰统治的年代里一直积极地致力于“德国民族斗争”的日耳曼人;第二类人包括那些只不过是消极的,但一直保持着 89 德国民族性的人。这两类人自动取得德国公民和国民的身分。第三类人包括受到波兰影响的德国后裔(Deutschstammige),以及那些同德国人结婚并接受了德国风俗习惯的外国血统的人;第四类人则包括“政治上已经完全成为波兰人”的德国血统的“叛变者”。列入第三类的人可以立即成为“德国国民”(但并不是德国公民),可是列入第四类的则只能成为“预备”国民。理论上讲,登记应是自愿的,可是希姆莱不久便坚决主张,凡是没有参加民族登记的人都将被送进集中营。在决定日耳曼人应列入哪一类时,“当地的和本人的因素”都应加以考虑,语言不能被看作是人种的决定性证据(据指出,“在罗兹和拉维奇地区有些新教教区内,全体居民”都讲波兰语,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是德意志人的)。宗教之所以重要,是由于波兰人在他们“民族的天主教教士”的影响下,几世纪来一直坚决认为:德国人就代表新教,波兰人就代表天主教。因此,在同天主教徒打交道时,需要谨慎小心,尤其因为“人数相当有限的德国天主教教士”在德国利益与波兰利益发生冲突时,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但是,一般说来,网应尽可能撒得大些,因为总的原则是:决不丧失一个德国血统

的人，也就是说，决不让一个德国血统的人为外国所利用。

为了协助地方当局（主要是州长和市长）对参加民族登记的日耳曼人进行分类，党卫队设立了一些分支办事处（Zweigstellen），其职务是讯问申请登记的人和调查他们的历史。对这些分支办事处的决定不满时，可以向设立在每一区内的地区办事处（Bezirksstellen）提出申诉，必要时，还可以向柏林希姆莱的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总会内设立的“最高调查法庭”（ObersterPrüfung-shof）上诉。这样，党卫队便能够监督这个计划的全面执行，尽管有关地区的行政长官在当地应用德意志化的 90 原则时，似乎拥有不少自由处理的权力。不同的行政区应用了不同的政策，所以取得的结果也就各各不同。在上西里西亚，行政长官布拉赫特迫使波兰人和德意志人一起作为日耳曼人登记，结果列入第一和第二类的有十三万五千至十四万五千人，列入第三类的有九十万至一百万人。但泽—西普鲁士是希特勒决定要在十年内使它变为“完全是德国居民的”地区，行政长官福斯特因此不得不采取一种强有力的德意志化政策，结果到 1942 年 8 月，列入第一类和第二类的有二十万日耳曼人，而后来经过选择列入第三类的则大约有十万名卡舒勃人和七十万名“不同民族的”波兰人。另一方面。在瓦尔培兰，行政长官格兰泽尔处理民族登记工作则要慎重得多，结果到 1943 年 2 月，只有大约七万人被列入第三类和第四类，大概只有二十五万人（即所有公认的日耳曼人）被列入第一类和第二类。

然而，这些数字中没有一项可以被看作是德意志化计划成功或失败的可靠指标。现有的其他证据在这一点上也并不更为确凿。由于德国人的工作遭到行政方面的混乱所带来的阻碍，事实似乎是，他们在这项工作上象在同新秩序有关的那么许多其他工作上一样，始终无法真正确定他们正在取得多大的进展，如果有所进展的话。党卫队当局自身承认，到 1942 年 6 月，他们发现“只有百分之三的波兰居民”“可以德意志化”。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们正在取得惊人的进展。其次，他们当时还不得不向纳粹党员发出警告，告诫他们在家里不要讲波兰语。这种警告表明：即使在民族登记时列入第一类的人，也并不是非常可靠的德意志人。因此，结论似乎是：在这方面，象在党卫队与之有关的新秩序的其他方面一样，这个组织对于实现德国的目的来说，与其说是一种资产，不如说是一种债务，而它的成绩，既同希特勒对于它的活动所给予的特殊信任不相称，又同这些活动所消耗的庞大的人力和物力不相称。PGN0138.TXT/PGN>

第四章 91 行政管理

第一节 德国占领区的分类

尽管纳粹国际法专家强调希特勒的欧洲需要有所规划，德国大空间的行政管理却不是有系统地逐步形成的，而是主要通过不断摸索、反复试验才决定下来的（就 1941 年后所占领的苏联领土而言，可能不在此例）。结果，各个地区的行政管理形式有了相当大的差别。概括地说，到 1943 年底，德国占领区有五种不同的类型。它们是：

1. 合并区 2. 民政长官管辖区 3. 附属区 4. 占领区 5. 所谓“作战区”关于对苏联发动进攻前的规划，见上文，原著第 60 页。

（一）合并区

政治上和组织上同德国关系最密切的是所谓合并区（Eingegliederte Gebiete），它或是以德国新行政区的形式，或是以原来存在的州、行政区或省的增添部分的形式，由德国直接统治。在东方，这类合并区有：（1）但泽—西普鲁士行政区（包括但泽、马林韦德尔和布罗姆堡专区）和瓦尔培兰行政区〔包括霍亨扎尔察（伊诺弗罗茨瓦夫）、波森和卡利什〕专区；（2）并入西里西亚省的卡托维兹专区；（3）并入东普鲁士省的泽希脑专区；（4）并入东普鲁士贡宾南专区的苏道恩专区；（5）并入东普鲁士阿伦施泰因专区的佐尔道地区。在西方，这类合并区有 1939 年以前比利时的圣维特市、欧本市和马尔梅迪 92 市（在德国的那道合并法令中，称该地区为“欧本、马尔梅迪和莫雷斯纳”）。为了便于管理，它们被并入了来因省（亚琛专区），但是政治上却隶属于科隆—亚琛行政区。

（二）民政长官管辖区

在东南方，这类地区有过去属于南斯拉夫的下斯蒂里亚地区和上卡尔尼奥拉、米埃斯塔尔和西兰乡地区。根据希特勒 1941 年 4 月 12 日颁发的“分裂南斯拉夫的紧急指示”，他决定将这些地区分别划归施蒂里亚马克行政区和卡恩滕行政区。在西方，这类地区有：（1）法国的摩泽尔省（洛林）和上来因与下来因省（阿尔萨斯），摩泽尔省并入萨尔—法耳茨行政区，成为新的威斯特马克行政区，上来因和下来因并入巴登行政区，成为新的巴登—阿尔萨斯行政区；（2）卢森堡，它于 1941 年 2 月划归科布伦茨—特里尔行政区，成为新的摩泽尔行政区。

虽然德国人始终没有通过法律宣布并吞这些地区，但是他们清楚地表明，他们完全有意把这些地区最终并入德国。例如，在阿尔萨斯，身为民政长官的瓦格纳行政长官就说，他的任务“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是一项将阿尔萨斯收回大德国的任务”。据说，希特勒本人曾经限地方民政长官在十年内使阿尔萨斯和洛林完全德意志化。为了使阿尔萨斯—洛林和卢森堡的那套行政管理形式同德国的那套完全一致，这三个地区的立法由各地的民政长官和柏林的政府部门共同提出。义务兵役制于 1942 年 8 月开始实行，接着德国内政部长颁布了一项法令，把德国公民的身分授与参加德国武装部队或武装 93 党卫队的人，或是在其他方面表明自己不愧为德国人的人。在所有三处地方，他们还采取了各种步骤使地名甚至姓氏德意志化，同时还强迫居民讲德语以代替当地的语言或法语。就海关、邮电的管理以及铁道而言，这三个地区全被当作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1 年 8 月，对俄国发动进攻后六星期，比亚威斯托克省，大约只有比

利时那么大的前波兰“公国”，也归入了民政长官管辖区这一类。东普鲁士行政长官科赫奉派出任民政长官，该地区则改隶于东普鲁士行政区。虽然比亚威斯托克丝毫不受各项管辖东方合并区的法律的约束，但是德国人象对待阿尔萨斯、洛林和卢森堡那样，坚持该地区最后注定应并入德国。由于比亚威斯托克的民政长官，不仅是东普鲁士的行政长官、而且是驻乌克兰的德国专员，因此，在东方新秩序的结构中，比亚威斯托克地区有时被说成是起着东普鲁士与乌克兰之间的桥梁作用。

（三）附属区

下一类地区的行政机构也几乎完全是德国式的。这类地区包括波兰“残余地区”内的总督辖区、德国专员管辖下的乌克兰和德国专员管辖下的奥斯兰的白俄罗斯地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虽然在法律上有着本国的“自治”政府，上面还有一个德国监护机构，却可以被认为也属于这一类，特别因为它们已经被官方看作是“大德国”的组成部分了。这一类地区与德国的关系始终没有很明确地规定过。至于总督辖区，官方曾经声明：这一地区的“特殊地位”使之无法按照国内法和国际法的一般概念来予队分类。它自身就代表一个独特的法律概念。它既不是德国的一部分，也不是大德国的一部分，在关税和货币方面同德国和大德国全分隔开……。但是它是大德国的一个势力范围，也是大德国权力范围的组成部分。据总督弗朗克说，总督辖区“不再是占领区，因此与德国无关，它是大德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也“不单纯是一个殖民地”或是“一个自治领或保护国”，而是大德国的一个“附属地区”（Nebenland）。

弗朗克和德国报刊都费尽心机想把总督辖区的地位和保护国的地位严格地区分开来，同时指出，虽然这两类地区同样有可能成为大德国的一部分，它们的地位却不必相仿。这种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当的，因为就组成方式来说，保护国不仅同总督辖区有某些相同的特点，而且同所有占领区也有某些相同的地方。象总督辖区乌克兰和奥斯兰那样，它被剥夺了作为“国际法上一个实体”的全部地位，并被指定为一片专供掠夺的、可能加以德意志化的地区。象合并区那样，它成了“德国关税区”的一部分，并受到德国许多法律的管辖。另一方面，它象丹麦那样，保有在柏林派驻外交代表的权利，自身有着一个名义上“自治的”行政机构，其首脑享有“主权政府的首脑所享有的全部荣誉”。

95 奥斯兰和乌克兰的地位也一直不很明确。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德国人象对待总督辖区和保护国的问题那样，不愿把它们地位固定下来，以免不利于将来把这些地区并入德国。罗森贝格（象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原来曾经设想使奥斯兰成为一个广阔的殖民地式的“保护国”，由来自各日耳曼民族国家的合适的移民移居到那里，并使其德意志化，不过他曾主张，乌克兰应成为一个与德国紧密地结盟的自治国。然而结果，情况恰巧相反，当奥斯兰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治时，乌克兰却基本上仍然是一个遭到掠夺的殖民地区，由一个几乎完全是德国人的行政机构加以统治。

（四）占领区

这一类是指德国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很感兴趣、但大抵又认为不适宜于立即并入德国的地区（可是，就连对丹麦，也没有排除掉最后加以并吞的可

能性)。只要战争继续下去，这些国家在军事上和战略上就对德国有着不同程度的重要性，而它们的行政机构的性质往往也就视其重要性而决定。例如，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法国被占领区、希腊和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残余”地区等，由于 PGN0146.TXT/PGN>在战略方面极其重要，都被置于军管之下，由德国武装部队通过军事司令官直接控制，可是，由于政策上的一大改变，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于 1944 年 7 月突然改由一个文职的德国专员前去主管，军事司令官的职位最后同高级党卫队和警察头子的职位合而为一。另一方面，由于挪威和荷兰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同等重要，因此这两个国家几乎从一开始就置于德国专员主持的民政机构的管理之下。

在一个突出的实例中——即所谓丹麦“模范保护国”这一实例——德国人起初力图把军事占领同有限地干涉当地事务结合起来。在这一点上，原来的计划是，通过外交途径——即通过德国驻哥本哈根的公使——实行控制。因此，在入侵的那天，德国政府就宣称，它无意破坏 96 丹麦的领土完整或干涉丹麦的政治独立。结果，不仅丹麦议会制度继续发挥作用，甚至连丹麦军队也完整无损，尽管他们被限制于一些特殊地区。其次，德国人也没有象在其他占领区那样，试图利用丹麦境内的少数民族德意志人。这一点使《北石勒苏益格日报》感到很恼火。然而德国人要求丹麦在外交政策方面作了重大的改变，尤其在 1941 年对俄国发动进攻以后。那时，丹麦被迫同苏见下文，原著第 491 页。毗邻的科隆—亚琛行政区长官约瑟夫·格罗厄被任命为德国专员。官方称这项任命为“战争过程中的一种改组措施”（德通社，1944 年 7 月 19 日）。它的目的显然是使人民受到比军事司令官法尔肯豪森原来所实行的更为全面的德国管制（参阅拉默斯给德国当局的信件，1944 年 7 月 14 日，见《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 11 号》，第 985 页）。

联断绝外交关系，并且参加了防共协定。丹麦还被迫同意建立丹麦自由团，并宣布丹麦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后来，它同德国的整个宪政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五）“作战区”

1943 年 9 月意大利的崩溃，带来了德国占领下的另一类地区——即所谓“作战区”（Operationszonen）。这类地区以前属于意大利，或者在意大利管辖之下，但是这时为了军事安全的原因，德国人确实认为不得不予以接管。这类“作战区”有“亚得利亚海沿海地区”（Adriatisches Küstenland）和“阿尔卑斯地区”（Alpenvorland）。亚得利亚海沿海地区包括意大利的乌迪南、戈里齐亚、的里雅斯特、普拉和阜姆等省，以及由意大利占领的卢布尔雅那省、苏沙克与巴卡尔地区、克尔克岛、路辛岛和刻索岛。这一地区归卡恩滕行政区长官兼德国总督弗里德里希·赖纳博士管辖。阿尔卑斯地区包括意大利的波尔萨诺、特兰托和贝卢诺省，由蒂罗尔—福拉尔贝格行政区长官兼德国总督弗朗茨·霍费尔管辖。赖纳和霍费尔在他们负责的“作战区”内都享有“最高专员”（Oberster Kommissar）这一头衔。

在亚得利亚海沿海地区，赖纳声称，他的“首要任务”是不让敌人入侵和不使该地区内出现“政治真空”，而在 PGN0148.TXT/PGN>阿尔卑斯地区，霍费尔说，他的职责是“在勃伦纳山口以内地区促成正确的态度、安定和秩序”。这两项声明在一定程度上都符合于 1944 年 4 月德国成立“作战区”时希特勒就这项行动向墨索里尼所作的解释：即如果德国人继续在意大利作战的话，他们就不得不使后方“畅通无阻”，而且还“不得不确保阿尔卑斯

各山口，从而使游击队无法威胁这些狭隘的补给线”。

尽管德国人起初不承认有把这些地区并入德国的意图，他们不久便很清楚地表明，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和阿尔卑斯地区在政治上最终将并入邻近的德国行政区。在南蒂罗尔，他们尤其鼓励那场同德国“重新联合起来”的运动。意大利语逐渐被禁止使用，意大利机构也被有系统地消灭掉。在德国本土，纳粹报刊提到南蒂罗尔时，同提到奥地利、苏台德区、东方合并区和阿尔萨斯—洛林参阅《多瑙河日报》，1944年3月16日，3月30日，4月24日和4月28日；《德意志日报，克罗地亚版》（Deutsche Zeitung in Kroatien），1944年5月16日；《因斯布鲁克新闻》（Innsbrucker Nachrichten），1943年9月27日，10月27日和11月17日；还有赖纳在纽伦堡的供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6卷，第130页）。

希特勒同墨索里尼在克莱斯海姆堡的会谈记录，1944年4月23日（详见《国务院公报》，1946年12月8日，第1044页）。

1943年9月10日，戈培尔写道：“目前，我们还不能占须南蒂罗尔，因为这绝对会使意大利人大吃一惊，并且使所有新的法西斯政府无法进行政治活动。”（《戈培尔日记》，第345页）。

从1938年后，纳粹党便禁止在德国进行“收回”南蒂罗尔的宣传；参阅1938年5月20日的A.5438号命令和1938年6月3日的R.65/38号命令（《训令》，第1卷，第413—414页）。纳粹官方的态度以前一直是：“德、意两国的边界问题早已解决了”。

一样，开始把它说成是德国居民已经重返德国的地区之一。

第二节 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的内部疆界

虽然德国人在上述各类占领区内建立的行政管理制度各各不同，但就它们同德国的关系而论，这些地区至少在最初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同德国之间由“内部疆界”分隔开来，德国平民除非持有德国内政部长颁发的特别许可证，否则不能进入这些占领区。就东方地区和保护国而言，这种特别许可证的颁发是根据德国内政部长弗里克1940年7月20日颁布的一项法令办理的。这项法令载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东方合并区（不包括但泽、以前属于普鲁士的上西里西亚和以前属于奥地利的弗赖施塔特、切欣与拜利茨地区，以及比亚瓦城），总督辖区和“德国内政部长规定的任何其他地区”，都是需要特别许可证的地区。后来，乌克兰和奥斯兰也列入了单子。这就使德国占领下的东方地区几乎全部需要入境许可证了，尽管希姆莱于1942年5月撤销了所谓“东方地区的警察界限”，从而使德国平民无须办理其他手续便能赴但泽—西普鲁士行政区和瓦尔塔兰行政区的其余/PGN0150.TXT/PGN>地方旅行。据称，赴东方地区其他地方的通行证“原则上只在申请的理由就作战努力而言是关系重大时，才予以颁发”，而接受这类申请的行政区警察当局都奉命“对每一份申请书进行严格的审查”。未经批准而偷越“内部疆界”的人，一经捕获就严加惩办，这一点自不待言。

至于西方的某些被占领国家——特别是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及法国被占领区——希姆莱于1942年4月实施了一种特殊的签证办法（Sichtvermerksverfahren），以代替先前发给来往于这些地区的平民的军事通行证。可是，据指出，只有下列几类旅行可以获准：（1）为国家和纳粹党因公出差，（2）商业性的旅行，（3）由比利时和法国来的外籍工人的旅

行。其他各种旅行一概都被禁止。为党务出差不在这项旅行禁令的范围之内，这一点虽然并不令人惊奇，却十分有趣，因为党内工作人员赴其他地区旅行是受到禁止的。在其他那些地区，甚至通常在社会上享有特权的那些人，没有特殊的许可也不能越过一道“内部疆界”。例如，1941年4月29日，纳粹党办公厅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纳粹党各办事处和附属组织与有关团体的所有人员”越界进入下斯蒂里亚、上卡尔尼奥拉、西兰和米埃斯塔耳等置于民政长官管辖下的地区。“为紧参阅希姆莱1942年5月12日的命令(《训令》，第2卷，第409页)。

德通社，1943年4月20日。

1942年4月24日的V.I.30/408号命令(《训令》，第3卷，第219—220页)。

“急公务”出差，首先须经纳粹党办公厅批准，尽管民政长官也可以批准这类出差。

第三节 德国最高代表在占领区内的地位

德国最高代表(即行政长官兼总督、民政长官、德国保护长官、德国专员、军事司令官等)的地位，往往在这一类地区和另一类地区互不相同，尽管委派这些官员的根本目的——即为了维护德国的利益——在整个希特勒的欧洲却完全是一样的。拿合并区来说，最高权力在当地是由行政长官兼总督行使，如果它们隶属的行政区是普鲁士的一部分，则由行政长官兼省长来行使。象所有其他行政长官兼总督那样，他是“德国政府的常设官员”，在德国内政部长的全面监督(Dienstaufsicht)下进行工作，负责督促人们遵守希特勒制定的政策方针。在但泽—西普鲁士和瓦尔塔兰，由于官方规定“所有行政部门”都归行政长官兼总督管辖，他又成了诸如司法、财政、铁道和邮电等“特殊行政机构”(Sonderverwaltungen)的首长。因此，正象德国报刊指出的那样，他的“地位”较之其他各省的德国总督“无可比拟地强大”。不象德国国内官职和他相当的官员们，他也不受任何传统类型的德国省一级行政机构的妨碍——事实上，在他管辖的地区内，“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彻底予以贯彻”，“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可以百分之百地付诸实行”。

在比亚威斯托克、下斯蒂里亚、上卡尔尼奥拉、西兰、米埃斯塔耳、阿尔萨斯、洛林和卢森堡，民政长官就是德国最高代表，其职责同挪威和荷兰的德国专员的职责相仿。不过他同时又是这个地区所隶属的附近那个行政区的长官兼总督(科赫是一个例外，他是东普鲁士行政长官兼省长)。但是，光是这片地区这样隶属于一个行政区，不足以使它的行政机构就成为国家行政机构。“只有在特殊的领域里——即邮电、铁道和海关——国家才直接接管”。在所有其他领域里，最高权威就是民政长官，他通过若干相当于柏林中央政府各部的行政部门来进行管理。甚至当中央政府的一个机构，例如粮食管理局，在这些地区设立分局时，它们也不归柏林而归民政长官管辖。除了那些明确地获准可以为全部占领区制订法律100的政府当局所发布的命令外，民政长官只接受经由德国总理府主任(即拉默斯)传达下来的希特勒的指示。但是，在颁布新法律之前，他们有必要同有关的中央部门进行磋商，而在有些地区(例如，阿尔萨斯、洛林和卢森堡)，德国内政部门内设立的所谓“总办事处”有权来调解民政长官和中央部门之间发生的任何争执。可是柏林当局并不行使任何“财政权力”，因为希特勒本人坚决认为，民政长官

“决不应”在财务方面受到任何严格管理的“妨碍”。因此，他们“获准编制范围极其广泛的独立的预算”。

在总督辖区，总督汉斯·弗朗克象上述地区的民政长官一样，也是直接对希特勒负责，尽管在其他方面，他的地位多少比他们还要高些。在许多方面，弗朗克是所有德国代表中最志得意满的，因为他领导的行政机构不仅几乎全部是由德国人组成的，而且实际上还享有“政府”的地位——所谓总督辖区政府。在总督下面，有一个国务秘书领导着这个“政府”，国务秘书下面设有一整套完善的行政机构，上面由十二个“中央部门”的首长组成一种内阁。在地区一级上，有五个地区长官，每一个管理着相当于德国行政专区那样的一片地区。鉴于有一项决定，要求除次要职位外使所有职位都由德国人担任，这一雄心勃勃地规划的行政机构有一部分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也有不少显然是弗朗克本人想在行政方面享有自治的那一众所周知的愿望的结果——这个愿望终于使他被控企图把总督辖区变为一个独立国家。弗朗克不仅 101 在柏林保持着一个规模很大的机构（包括一个特设的宣传处）来维护他的利益，而且在克拉科夫的办公厅下面还驻有军事司令官和空军总司令委派的“联络官”，以及外交部、总理府、军备与军火部（施佩尔部）、纳粹党办公厅和德国青年领袖等机构的常驻“代表”（Beauftragte）。此外，弗朗克也不反对外国政府向他派遣代表的这个主意，他把法西斯代表福索姆布龙伯爵“当作意大利的某种外交代表”来接待，便是一个明白的表示。

虽然驻乌克兰的德国专员科赫和驻奥斯兰的德国专员洛泽具有同挪威和荷兰的德国最高民政首脑一样的官衔，但是严格地说来，他们的地位却比不上那两个德国代表。因为根据 1941 年 7 月 17 日希特勒发布的命令，他们隶属于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罗森贝格和他的常务次长阿尔弗雷德·迈尔。按照这道命令的规定，在这些地区内行使最高立法权的是这个德国部长，而不是这些专员。可是，当所谓“特别行政机构”（Sonderverwaltungen）侵入这个德国部长的职责范围时，他的权力便逐渐受到限制。例如，德国运输部长接管了东部交通管理处的铁道系统，而德国邮电部长又对邮电事业承担起了责任。戈林、施佩尔和希姆莱在他们各自负责的领域里也代表最高当局，虽然有明文规定，“所有这些权力机构”应与该部长保持密切联系，并应相互保持联系，以保证“对各项事务有统一的指挥”。罗森贝格的权力所受到的这种限制，使名义上隶属于他的德国专员比较易于摆脱他的控制。实际上，科赫在同东方事务部的关系方面至少取得了相当的独立。由于这两个专员象占领区 102 的所有其他德国行政首长那样，是由希特勒亲自委派的，不是由罗森贝格委派的，这个德国部长的地位在他们眼里无论如何是相当软弱的。

至于挪威和荷兰，两地德国专员的地位是相同的，尽管特博文仍然保有党的行政长官的地位，而赛斯—英夸特则具有德国部长这一多少较为崇高的衔头。事实上，希特勒 1940 年 5 月 18 日颁发的任命赛斯—英夸特为“德国驻荷兰占领区专员”的那道命令，显然是仿效 1940 年 4 月 24 日颁发的任命特博文为“德国驻挪威占领区专员”的那道命令的。这两个德国专员都被明确地指定为“德国利益的监护人”，他们都对希特勒直接负责，并接受希特勒本人的“指示和命令”，这两个德国专员都有权通过法令来制订法律，两地的“最高军事权力”仍然属于当地的德国武装部队司令官，他所发布的“民政范围”内的命令则由德国专员予以执行，两地德国专员都可以“要求德国

警察机关协助”去执行他们的命令，尽管“在军事需要的范围和德国专员工作许可的范围内”，这些警察机关也听候武装部队司令官的指挥。事实上，特博文在挪威的地位和赛斯—英夸特在荷兰的地位，两者之间的唯一基本区别似乎在于这一点：1942年2月以后，特博文是通过吉斯林领导的一个当地政府推行他的许多任务的，而赛斯—英夸特则继续通过前荷兰各部的常务秘书长组成的一个所谓“无头政府”去管理荷兰。

至于军事管制下的那些国家——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法属被占领区、塞尔维亚和希腊——德军司令部严格他说来也是武装部队的一个执行机关。军事司令官必须执行的法律有许多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或陆军总司令部颁布的，虽然象文职的德国专员那样，他也须执行有权为整个德国占领下的欧洲制定法律的德国那些中央机关（四年计划组织等）发布的命令。至于塞尔维亚，由于那103里的军事司令官同萨洛尼卡和爱琴海的驻军司令官以及希腊南部的驻军司令官一起都隶属于雅典的武装部队东南欧司令官，所以他作为武装部队代表的地位获得了加强。但是，所有这些军事司令官的司令部里，都有一些文职专家，协助他们搞好行政管理工作。在塞尔维亚，虽然从理论上说来，地方事务是1941年8月29日成立的、由米兰·奈迪奇将军主持的“自治”政府的责任，但是事实上，控制塞尔维亚的大权却掌握在“军事司令部行政长官”（Chef des Verwaltungsstabes beim Befehlshaber）国家行政顾问图尔纳的手里。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军政府的首脑，党卫队大队长埃格特·雷德尔在军事司令官冯·法尔肯豪森将军的领导下，行使着类似的（虽然也许是较有限制的）权力。在这一情况下，德国的行政机构划分为许多专家部门（一般经济工作、运输工作、司法工作等），以适应德国人特别关心的不同方面的地方事务。在法国被占领区，由于德国人严格他说来只对维希政府主管的法国行政部门进行控制，因此情况多少有些不同。但是，象在军事管制下的其他地区一样，这里的民政事务也是由属于司令部的一个行政部门负责办理的。

至于保护国的特殊地位同其他各类占领区的地位的比较，上文已经叙述过了。那种特殊的性质也反映在赋予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国最高代表德国保护长官104的地位与权力上。希特勒1939年3月16日颁发的关于建立保护国的法令和1939年3月22日颁发的补充法令都规定，牛赖特（象弗朗克、特博文、赛斯—英夸特和继他之后被委派的所有其他民政长官那样）将是希特勒的直接下属和“唯一代表”，并将直接“接受他的指示”。象所有其他德国代表那样，德国保护长官也被称为“德国利益的监护人”。可是，不仅某些行政部门，例如交通、邮政、电报和电话事业，都不归他管理，而且柏林的德国政府还有权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设立行政办事处，不受他的管辖。这种情况在司法方面尤为突出，在那方面，行使最高权力的不是德国保护长官，而是德国司法部长。

因此，牛赖特的职权主要限于监督捷克的“自治”政府，而且就德国政府在保护国内设立的办事处而言，他的权力也受到严格的限制。根据1939年3月16日的法令，他可以向捷克政府“提出意见”，捷克政府须经他批准方可就职，他还可以对据他认为是“有害于德国”的措施表示异议。可是，牛赖特不能成立自己的监督机构，象其他地区里他的同事那样，尽管根据1942年5月7日希特勒颁布的一项法令，他终于有权可以“同德国内政部长磋商”后，根据战争的需要，采取简化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行政机构的种种

措施。

至于丹麦，德国全权代表的地位是独特的，无法同任何其他占领区德国最高代表的地位相比拟。诚然，由于丹麦的安排十分特殊，所以它起初甚至在德国国家和党的机关内部全引起了很大的混乱。这些机关似乎发觉很难不把驻丹麦的德国全权代表看作一个德国专员，停止向他直接发出各种公文，它们甚至发觉很难停止对丹麦政府直接发出命令，并且很难停止把只发给其他占领区的通知送交给他们。由于这样不恰当地但也许是可以理解地违反了外交礼节，纳粹党办公厅于1941年3月20日认为有必要将德国外交部魏茨泽克的一封信予以传阅。信上指出，驻丹麦的德国全权代表的地位有一点不同于挪威和荷兰德国专员的地位，即：他“必须通过外交途径105去执行同丹麦当局有关的各项工作”。因此，这封信坚决认为，“凡是德国国内当局”向丹麦发出的“各种指示和要求”，必须仍以德国外交部作为适当的中转机关。

然而，希特勒那样的人决不会允许任何这样比较开明的安排无限期地继续下去。1942年10月初，他作出决定，丹麦同德国之间的关系原来所依据的1940年4月9日的宣言已经“过时”了。他辩解说，“在德国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新欧洲内部，不能容忍有这样一种国家存在：即一个民主政府，而且还在一个迄今只怀恶意的王室的统治之下”。因此，丹麦必须“成为德国的一个行省”。该地行政机构的目的必须是“尽可能迅速地成立一个”由丹麦国家社会主义者领导的“政权”，“任何反抗行动，即使是最微小的，也必须用武力镇压下去”。因此，他将委派一个“强硬的国社党员”为全权代表，而“军事司令官和武装部队都应把自己看作是驻扎在一个敌对国家，而不是在一个友好国家内”。这是委派冯·汉内肯将军为军事司令官和委派维尔纳·贝斯特接替原来的德国全权代表冯·伦特-芬克的前奏曲。冯·汉内肯将军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以前曾在俄国“奥尔登堡”经济部门的“w组”里工作过。

这也不是所谓“模范保护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中所出现的最后一场变化。在1943年8月的“危机”过去后，德国全权代表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时大举开来的德国警察和保安处人员并不归他管辖，而归高级党卫队和警察头子潘克统领，后者又向希姆莱负责。因此，在德军占领的最后两年里，丹麦是由谁也管不了谁的三个不同的德国当局加以管制的：（1）德国全权代表维尔纳·贝斯特；（2）军事司令官汉内肯将军（后来是林德曼将军）；以及（3）潘克指挥下的德国党卫队和警察。因此，丹麦陷入了一种啼笑皆非的处境：就理论上讲，它继续保持它的“自治”，宪法也仍然生效，国外的外交代表在106某些情况下也仍然在职，可是实际上，它的国务受到德国党卫队和警察的监视大概比西欧任何其他国家更甚。

第四节 德国中央政府和占领区的行政管理

（一）德国内政部

尽管某些德国机构有权为整个希特勒的欧洲制定法律，但是柏林的中央政府除了绝对必要外，一般总避免干预占领区的事务。理论上讲，占领区的事务是归“德国国外事务总署”（Reichsaussenverwaltung）负责的，这是“德国政府新设立的一个部门”，它尽管这时还刚成立不久，但最终希望可以“同内政机构和外交机构共同发挥作用”。然而，事实上，对德国代表及其工作人员说来，德国国外事务总署还不过是一个一般名称而已。它并没有

一个可以协调本身活动的总机构。的确，由于占领区的所有德国代表都是由希特勒亲自任命的，而且也只对他负责（科赫和洛泽可能是例外），所以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即使是可能的也是困难的。因此，遇到各个德国代表的活动需要有所联系时，就只得由“德国内政机构”来提供。但是希特勒对于德国政府当局干预占领区的行政工作一向十分猜忌，因此除了极少数的事例外，这种联系仍然仅仅是有名无实的。德国总理府在拉默斯的主持下，可以，也的确接受德国专员和军事司令官就国家和个人事务提出的建议，有一时期甚至还采取步骤，要求他们就他们管辖的地区按月呈递报告。但是，德国总理府的主要职责看来是在德国专员和军事司令官同希特勒之间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把他们的报告加以挑选后呈给元首审阅。只有在司法领域里，以及在其他纯技术性的事务上，“德国内政机构”才对德国国外事务总署产生一点明显的影响，而这是通过德国内政部来施行的。

德国内政部通常总在刚开始占领，占领区同德国的组织关系还有待具体规定下来时，便奉命参与其事。例如，拿保护国来说，内政部负起了同其他有关部门商定后发布“贯彻实行”1939年3月16日的法令所需要的“所有一般的和行政的规则与条例”的职责。根据希特勒1939年10月8日颁布的法令，内政部被指定为“改组”波兰合并区的“中央机关”，并负责推行德国法律、划定边界和使地名德意志化。同时，根据希特勒1940年5月18日和23日颁布的法令，内政部有责任从事使欧本、马尔梅迪和莫雷斯纳同德国“重新联合起来”的工作。名义上，内政部里有一个专门处理占领区事务的完备的组织，因为当一个地区并入德国或由德国占领时，通常总由内政部负责成立一个“总办事处”。战前，为奥地利、苏台德区以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都曾成立过这种总办事处。战争期间，最重要的总办事处是为挪威、阿尔萨斯—洛林和卢森堡，以及所谓东南占领区设立的那些。这些机构，即使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是由施图卡尔特主持的。他后来成为内政部的国务秘书，并且主管1和IR两个司，前者掌管“宪法、立法、行政管理和合并区”的工作，后者掌管“德国和占领区的民防工作”。¹⁰⁸就合并区而言，内政部是德国政府各部门中最有影响的，因为在涉及这些地区公民权的所有问题上，它的意见就是法律。然而，在其他方面，内政部能为德国代表所做的唯一重要的工作似乎就是，向这些代表提供指派给他们的德国文官并加以照料，同时还在公布法律和法令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和意见。在弗里克的控制下，内政部逐渐陷入戈培尔所说的“官僚脑积水”的状态，这使它“完全不适宜于政治领导”。如果不是施图卡尔特“执掌大权，在日见扩大的范围内成为真正的内政部长”，那么内政部的作用无疑还会进一步受到限制。施图卜尔特是一个积极、干练、富有野心的党卫队军官，对大空间行政管理具有强烈的地理政治倾向和浓厚的兴趣。1943年8月，当希姆莱接管内政部以后，他力图改善这种情况，他定期召开德国行政官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占领区行政机构的官员和德国中央政府的代表。然而，希姆莱在占领区主要是以党卫队头子兼德国警察总监和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的身分，而不是以内政部长的身分行使职权的。因此，在接替弗里克以后，他的主要兴趣总的说来，仍然是加强党卫队和警察在这些地区的权力，而不是树立内政部的影响。

（二）德国外交部

德国外交部拥有最多的欧洲各国问题专家，在正常情况下，原可以指望它在占领区的行政管理方面同德国国外事务总署保持密切的联系。可是，希

特勒认为，外交部是“反动思想和失败主义的发源地”，因此“在战争结束以前”应“尽可能不让它出场”。所以，正如冯·施特恩格拉希特在作证时所说的那样：“当德军一越过国境，外交部就失去了对那个国家的权109PGN0167.TXT/PGN能”。因此就某些占领国家而言，“外交部甚至连派遣一个代表的权利”都遭到拒绝，而实际上“这些代表的职位仅仅为了观察〔目的〕而已”。但是，对德国外交部职权的这种限制也有某些例外情况——譬如，法国和丹麦的被占领区的例子。

1940年8月3日，奥托·阿贝茨被任命为法国被占领区内外交部的全权代表。鉴于他对法国非占领区和维希政府能够发挥一些影响，这个职位具有了相当的重要性。根据里宾特洛甫1940年8月3日通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关于阿贝茨任命的那封公函，希特勒在作出这项任命时曾亲自明确地指示，“只有阿贝茨大使”应“对法国被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的所有政治问题负责”，他应“同当地军事司令部取得一致意见后再采取行动”。他的职务，如同那封公函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将包括：（1）在政治事宜上向军事机构提供意见；（2）同维希政府及其在占领区内的代表经常保持联络；（3）对“重要的政治人物”和“从事于制造舆论这项工作的敏感人物”施加适当的影响：冯·施特恩格拉希特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0卷，第109页）。严格地说，南斯拉夫并不是这样，因为在那里外交部于1941年4月参加了应由意大利占领的地区的移交工作〔参阅希特勒分割南斯拉夫的紧急指示，同上书，第27卷，第60—62页（1195-PS）；《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29页；《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838—839页〕。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0卷，第109页。

他在那里一直逗留到1945年5月（同上书，第127页）。

（4）对占领区内的报刊、电台和宣传机关提供必要的政治指导。这就使阿贝茨担任了德国外交部在希特勒的欧洲的行政管理中所能取得的少数重要职位之一。结果，阿贝茨不可避免地成了其他德国机关（特别是盖世太保）阴谋陷害的目标，而且由于这种阴谋，希特勒后来也对他“多少有点猜疑”了。

在丹麦，德国全权代表维尔纳·贝斯特严格地说来根本不是外交部的官员。他在哥本哈根的总部通常不是称为德国公使馆，而是称为“德国全权代表办事处”。1943年1月，德国总理府甚至说他“不再是派驻丹麦政府的德国外交代表，而是一种驻丹麦的德国专员”。贝斯特除110了是大空间问题的专家并在1941年和1942年担任过驻法德军司令官的行政官员外，还曾做过党卫队律师，是德国警察问题的权威和（如同里宾特洛甫不得不承认的那样）“海德里希的合作者”。因此，尽管德国外交部长可能会夸口说，这个全权代表的任务是他进行的“试验”的一部分，即试用“温和的手腕和妥协的方式”去对待丹麦人，判断其效果如何，可是使贝斯特在1942年获得丹麦这个职位的，并不是由于他的外交经验，而是由于他同党卫队的关系。他在丹麦任职的那两年半期间，除了接受外交部的指示外，一直还接受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指示，同时又与“内政部长、希姆莱和党卫队圈子里的人士”保持着“联系”。

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可以施展重要影响的另外一个外交部代表，就是赫尔曼·诺伊巴赫尔。他在1943年9月7日奉派以“特使”的身分前往巴尔

干各国。然而，象贝斯特一样，他也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而是纳粹党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其他占领区内，即使有外交部的代表，他们在德国占领工作方面也只不过起着次要的作用。在荷兰，所谓外交部驻外机构长官贝内，显然是由赛斯一英夸特而不是由外交部委派的，他成了德国专员的下属，其主要工作根据规定是：“处理还有可能在荷兰发生的那种外事方面的政治问题”。鉴于德国政府的其他机构不断地尽力防止这种问题再度发生，这就意味着贝内对处理各项事务方面的影响实际上是很有限制的。111 可是，对外交部代表的影响加以限制的这种政策，也确实带来了一个好处。那就是：尽管里宾特洛甫和其他部长为占领区内各自的职责时常发生冲突，外交部和德国民政机构之间的关系却一直相当融洽。出现的唯一一次激烈的冲突是为了东方占领区，当时里宾特洛甫反对政府部长罗森贝格的意见，主张外交部应有权参加俄国占领区的内部组织工作。虽然希特勒马上就驳回了他的这一主张，但是外交部长通过在外交部内组织一个“东方委员会”，并通过培养自己的东欧流亡者集团，显然继续干预东方地区的事务。因此，1942年5月，罗森贝格不得不又向希特勒申诉，其结果是，希特勒终于接受了罗森贝格的意见，于1942年7月28日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外交部和东方事务部在东方占领区内各自的职责。这给了外交部处理同外国有关的东方占领区各项事务的权力，不过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外交部长应同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保持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罗森贝格却奉命肩负全部责任来，为“建议置于德国民政机关管辖下或者置于德国主权下”的这些前苏联领土的“政治领导和开发，拟定预备性的措施”，不过遇到罗森贝格采取的行动有可能影响到德国的外交政策或军事政策时，他也应同里宾特洛甫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进行磋商。至于占领区的人民和他们的代表（包括流亡人士），如果占领区仍然是在军事占领之下，那么德国武装112部队就代表德国，如果是在民政机关管理之下，那么罗森贝格的部门就代表德国。

（三）国家社会党

纳粹党组织只有在合并区和民政长官管辖区内才以政党的地位在促进德国占领的目的方面起主要作用。在这些地区，纳粹党的主要工作是，“使这些地区并入德国”，并帮助搞好使当地居民同化的工作。为了这一目的，党成立了一些特别的地方组织——所谓吸收团体。这种组织可以批准大批通常不够入党条件的当地人民加入它们的队伍。这种组织就是：阿尔萨斯的献身团、洛林的日耳曼民众团体、卢森堡的日耳曼人运动、下斯蒂里亚的居民会和上卡尔尼奥拉、西兰和米埃斯塔尔的卡恩特纳民族联盟。其中前面三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公认是专门为了“加速重新德意志化的过程”，参加这些组织通常是取得德国“国籍”的先决条件，而要取得正式的德国公民权并保住担任的公职，积极的工作则是必要的条件。因此，在大多数地区内，居民都受到很大的压力，要他们参加这些组织。结果，洛林的日耳曼民众团体和下斯蒂里亚的居民会终于能够声称，当地成年的居民分别有百分之九十八和百分之九十五全是它们的成员。但是，这样庞大的会员人数显然并没有影响到正规党组织在这些地区建党的步伐。例如，在阿尔萨斯，尽管献身团只吸收了当地居民约百分之十五入团，国家社会党早在1941年3月22日便已经成立，而在洛林，尽管日耳曼民众团体的成员按总人口比例而言，比献身团要多出六倍以上，但是国家社会党直到1942年7月30日才正式成立。113 在其他占领区内，为了实行“领袖原则”并使政治权力同时集中在最高德国代

表的手里，有必要不但使纳粹党从属于德国专员，而且还对地方党组织进行改组，以便使它们在每一地区完全独立。例如，在荷兰和挪威，纳粹党的地方组织原来是隶属于中央国外组织的（海外德国人的党组织），后来都不受该组织的管辖，而完全归赛斯-英夸特和特博文分别管辖了。在总督辖区，1940年5月6日成立起来的地方党组织——总督辖区波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从一开始就置于弗朗克的控制之下，尽管总督委派“副领袖的代表”（1941年5月以后是纳粹党办公厅的代表）在一切有关党的事务上充作他的“代表”。同样地，当希特勒于1942年4月1日在东方占领区成立东方地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时，他任命德国部长罗森贝格为它的“领袖”。罗森贝格立即禁止各级党组织未经他明确批准在东方从事任何活动，从而把党的各项事务的控制权集中到了他一个人手里。在保护国，纳粹分子显然认为，只要设立一个“党的联络处”（Parteiverbindungsstelle），使党组织同德国保护长官和他的下属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也就够了。可是在保护国，党的机构不归牛赖特而归邻近的下多瑙河行政区长官尤里领导。

（四）党卫队

关于党卫队在希特勒的欧洲的规划与形成方面所起的作用，上文已经提到过了。因此，这里只需要讨论一下党卫队同占领区各行政机构的关系，并指出由于希特勒未能使党卫队和警察听从德国代表和军事司令官管辖 114 而造成的某些后果。

党卫队在占领区所行使的权力，有不少都集中在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的手里，而他通常则是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和党卫队头子兼警察总监希姆莱的代表。在德国占领下的所有地区，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的办事处是千篇一律的，当民政机构或者军政机构在占领区一组成，党卫队马上就向那里派遣一名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而且，虽然各占领区的民政或军政机构的形式可能不同，党卫队和警察统治的形式却一成不变，即使在占领区和德国本土之间也并无差别。每当一个高级党卫队军官兼警察头子奉派到一个占领区去时，他总有一套同样的党卫队和警察机构供他指挥，而遇到有必要使用公安组织（奥波）、保安警察和保安处作为一支联合力量时，他也具有同样的权力可以负责指挥这从机构，就象他在德国本土上的同僚们那样。同时，他在对他的顶头上司希姆莱的关系方面，仍然保持同样的地位。这样，通过使各占领区的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成为正规的党卫队和警察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使他们听从希姆莱本人的直接指挥，希姆莱就保证了他对各占领区象对德国本土那样，实行同等程度的独裁控制。此外，他还象卡尔登勃鲁纳作证时所说的那样，建立起了一个纵横交错，伸展到希特勒的欧洲每一角落的庞大的权力工具。

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同德国代表的关系是按种种不同方式予以规定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总给他留下一个空子，使他可以避免完全从属于民政或军政当局。在保护国，其地位是根据 1939 年 9 月 1 日发布的“关于重建行政机关和德国保安警察的命令”规定的，牛赖特以德国保护长官的身分统辖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所有德国官方机构、办事处及机关”，国务秘书卡尔·赫尔曼·弗朗克则成为他的“总助理”。可是，根据该项命令的第二部分，保护国的保安警察在行政方面仍然是德国保安警察的组成 115 部分，因此完全归希姆莱控制。但是，由于弗朗克已经是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因而在党卫队和警察事务方面也是希姆莱的地区代表，所以就出现

了这种多少有点特殊的局面：就一般行政事务而言，他名义上是牛赖特的下属，但是在关系到保安的一切问题上，他却是完全独立的，只向党卫队首长希姆莱一人负责。然而，实际上弗朗克逐步对警察和行政两方面都承担起责任，从而防止了出现混乱的任何可能。1943年8月，当弗里克接替牛赖特的职务时，德国保护长官的权力有了很大的改变，变得不但事实上而且名义上都移交给弗朗克了。

在其他占领区内，趋势也是牺牲德国代表的权力以扩大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的权力。在荷兰，德国警察机关仅仅是置于德国专员和武装部队的管辖之下，而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则须经希姆莱提名，由希特勒任命。结果是，每当赛斯-英夸特向德国警察下达一道命令时，后者无疑总要“调查一番，以搞清楚〔这道〕命令是否同希姆莱直接发给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的指示相符合”。另一方面，荷兰警察则从一开始就归德国专员管辖。但是，当赛斯-英夸特设立行政与司法、保安、财政与经济特别事务等四个“委员会”时，他显然受到希姆莱的压力，被迫把保安“委员会”连同对荷兰警察的监督权交给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劳特尔。这样一来，又出现了那种混乱的局面：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在行使某些行政职权时名义上是德国专员的下属，而在作为德国党卫队和警察部队的首长这一主要身分方面，则完全是独立的。

拉默斯在纽伦堡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1卷，第62页）据拉默斯说，德国保护长官仅仅成为德国驻保护国的形式上的代表，几乎没有什么实权。他有权任命文官和赦免罪犯，弗朗克也须向他汇报他的工作。但是希特勒只接见弗朗克，问他讨论政治事务。他不希望德国保护长官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呆上太多时间。关于这一点，拉默斯曾经“好几次”提醒弗里克。

赛斯-英夸特在纽伦堡的证词（同上书，第15卷，第646页）。

见下文，原著第119页。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6卷，第206页。

在东方占领区，德国人采用了一种稍微不同的方法来规定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在德国代表下的地位——然而最后的结果却完全一样：使希姆莱一手控制了党卫118队和警察的全部事务。在这一事例中，这个党卫队头子从一开始便占了便宜，他在当地民政机构尚未组成时，便干预了那里的事务，因为当该地区还在军管时，希姆莱便接下了与该地区民政机构的筹备工作有关的“特殊任务”。据说，这项“特殊任务”是由于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政治制度”之间的斗争而引起的。因此，希特勒于1941年7月17日颁布关于东方占领区行政事宜的法令时，明确地指出，德国党卫队首长的权力“将不受”本法令各项规定的“影响”。事实上，希姆莱在这方面的权力是由元首另下一道手谕规定的。这道手谕使“新占领的东方地区的警察保安工作”很明确地成为“德国党卫队首长兼警察总监的事务”。他还有权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向文职的德国专员发布命令”，虽然除了“十万火急的问题”外，他一般应通过东方事务部“下达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命令”。这意味着，希姆莱在采取重大的警察措施时，只要宣称情况“十万火急”，事实上就总可以把东方事务部排斥在外。此外，派往该地区的那两名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在警察事务方面也无须同东方事务部进行磋商，因为

根据该法令的规定，他们“本人”不是“直接隶属于”罗森贝格而是隶属于德国专员科赫和洛泽。

然而，德国代表和高级党卫队军官兼警察头子之间为管辖权的冲突，在总督辖区内具有最为广泛的反响。这部分是因为希姆莱的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的许多活动集中在总督辖区，部分是因为总督弗兰克和高级党卫队军官兼警察头子克吕格尔对民政机关和党卫队在德国占领工作中各自应起的作用都喜欢固执己见。117 不象大多数其他的德国代表，弗兰克一开始就坚决强调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的地位应从属于总督和副总督。1940年3月8日，他在向一批官员讲话时声称：“在总督辖区里，没有什么权力在级别、威望和权势方面是超过总督的。甚至德国武装部队也没有行政管辖的职责……没有任何政治权力；警察和党卫队也不例外”。可是，经过两年的斗争后，他显然开始认识到，自己正在同克吕格尔进行一场难以取胜的战斗，因此他在1942年初便力图同希姆莱就这个问题达成一项正式协议，以便澄清他同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的关系。这项协议于1942年3月14日拟定后，终于写进了1942年5月7日元首颁发的一道法令里。这项协议力图使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以负责保安工作的国务秘书身分参加正式的政府机构，从而实现一项折衷办法。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在这个职位上将隶属于总督（很象劳特尔的地位，他以驻荷兰的保安专员的身分在行政方面隶属于赛斯-英夸特）。但是，希姆莱仍旧保持着向克吕格尔发布“直接命令”的权利，虽然在执行这些命令前，克吕格尔应取得弗兰克的批准，就象如果弗兰克向他下达命令时，他应取得希姆莱的批准一样。为了防止克吕格尔擅自取得更多的权力，弗兰克在达成协议后立即颁布了一道法令，详尽无遗地规定了这个国务秘书的职权范围。

虽然这种多少有点累赘的安排公开受到赞扬，认为会促使总督辖区的“行政重建工作”“在组织方面”达到“定局”，但是这项协议才实行了大约“四个到六个星期”，弗兰克和克吕格尔之间的冲突倒又象过去那样激烈地展开了。这时候，由于弗兰克在希特勒试图使德国司法部门纳粹化的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他已经失宠，只是为了“外交政策上的原因”才保住了总督的职位。这意味着，他这时不仅成了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可以轻易攻击的对象，而且也是其他政敌可以轻易攻击的对象。因此，到1943年4月，克吕格尔终于能同拉默斯一起拟定了一份揭露弗兰克在总督辖区种种缺点的很长的备忘录，目的显然是想把他搞下台。此举本来肯定是会成功的，若不是那个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也失去了柏林上级党卫队对他的信任，突然被免职的话。

以上举以说明德国代表同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之间关系的几个实例，完全是取自民政长官管辖的地区。可是，如果篇幅容许的话，我们还可以揭示军事司令官管辖的地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因为，这些权限的冲突所造成的混乱，是整个德国占领区一种共同的现象。这部分也是希姆莱和党卫队冷酷无情、永无休止地同文职代表和军事代表争夺权力的结果。然而，在更大程度上，这却是希特勒本人所造成的，因为他没有把德国代表同党卫队机构的关系明确地加以规定，也没有坚持在他们之间合理地划分权力。

第五节当地行政机关于的用途和当地人民的合作

鉴于德国宣传机关十分强调需要按照纳粹路线在欧 119 洲进行全面的政治革新，因此，可以料想，德国人从一开始就欢迎各占领国内同德国合作运

动的成长。然而，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许多事例中，这种运动就算没有公然遭到敌视，至少起初也遭到猜疑和冷落（大概是因为任何其他政策必然会使当地另一部分人民同德国疏远）。只是在德国人发觉很难说服当地的其他人士来帮助管理这个国家后，他们才对合作运动当真加以鼓励。

1940年5月以后，德国人在荷兰遵循的方针也许最能说明德国政策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那里，赛斯-英夸特最初所关心的是：设想出某种形式的德国监督机关，既可控制住当地的高级文官，又可监视其他级别较低的荷兰政府机关。因此，他设置了四个德国“委员会”（行政与司法、保安、财政与经济 and 特别事务等）以及各个科室，去指导荷兰的那些秘书长的的工作，而后者则应“在各自活动的特殊领域里有条不紊地办理好自己部门的工作”，并对他负责。同时，他委派了一些委员去监督荷兰各省的行政机构以及阿姆斯特丹市和鹿特丹市的荷兰市长。他很细心地指出，这些委员不可以是“行政官员，甚至是有政治经验的人”。因此，他同搏尔曼（当时他在希特勒的副手赫斯手下工作）作好安排，“几乎完全从纳粹党内”挑选人去担任这些委员。

那时候，赛斯-英夸特对于促进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米塞的政治鸿运已经不感兴趣，因为他认为，后者的才干“不符合德国一般行政长官的条件”。相反，他宁愿尽量使用一些“非政治人士”，甚至使用米塞的对头罗斯特·范·托宁根那样的人。赛斯-英夸特认为托宁根完全符合“思想意识方面的各项条件”，所以任命他为荷兰银行总裁和财政部秘书长。可是，在德国对俄国120发动进攻后，荷兰的抵抗加强了，米塞的前途于是光明起来。1941年12月14日，由他领导的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成为荷兰唯一的政党。十二个月后，米塞本人终于获得了“荷兰元首”的称号，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对荷兰的行政机构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尽管如此，赛斯-英夸特对于“在目前情况下，必须考虑到占领国意见的各项事务”，仍然保有最后决定权，而且甚至在这么晚的时候，他似乎还直言不讳地承认，当他把米塞捧上台，只是为了必要时再把他抛弃掉。所以，1943年3月，他建立战时民兵（后称战时后备军）——“一支地区性防卫部队，旨在防止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时他并不把这支军队交给米塞，却把它交给德国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劳特尔指挥，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甚至在挪威，德国人起初似乎也有点勉强，不肯使用那个大内奸吉斯林，特别是经过占领初期同他的倒霉政府合作过以后。因此，早在1940年8月，那个挪威民族统一党的领袖就不得不向希特勒哭诉说，德国专员“在那种政治局面里没有给予他充分的支持”。1940年，在拟订德国行政管理的细则时，特博文显然渴望尽可能多保持一些控制权在自己手里。因此，他在全国范围内增设德国专员办事处，并在诸如基尔克内斯、特罗姆瑟、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利勒哈梅尔、卑尔根、斯塔万格和克里斯蒂安松等分散得很开的地区，设立了区专员和区办事处。尽管他在1940年秋天承认挪威民族统一党为“该国的领导政党”，但是直到1942年2月1日，他才同意支持成立一个以吉斯林为首相的“挪威民族政府”。在这期121间，特博文先是通过1940年4月15日挪威最高法院和德国公使设立的“行政委员会”（Administrasjonsrad）来治理挪威，后来从1940年9月开始，则是通过十三名“临时国务参议员”来治理。1941年9月25日，他授予他们正式部长的头衔。然而，甚至到1942年2月，任命吉斯林的那项决定看来也不是出于

他的本意，而是因为驻挪威的海军司令官雷德尔和鲍姆海军上将背着地向希特勒提出了请求才促成的。有人指控特博文，说他“破坏”

吉斯林的名声，使后者在挪威人民面前“信誉扫地”。

在比利时象在荷兰一样，当地的行政管理大部分仍然操纵在德国控制下进行工作的前政府各部的秘书长手里。德国人发觉他们的处境很为难，因为他们不得不在佛兰芒民族主义者和比利时瓦隆族人的两种对立的愿望之间作出选择，还在这两个民族集团内部主张彻底合并和其他一些合作者所主张的仅仅同德国结成联盟这两种对立的意见之间作出选择。因此，他们在施予恩惠时，在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举棋不定，这就不足为奇了。在佛兰德，他们起初看中了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VNV），在它把荷兰民族主义团结联盟（Verdinaso）和佛兰芒族的雷克斯党徒置于控制之下后，便于1941年5月承认它为佛兰芒省的唯一政党，并将内政部部长和布鲁塞尔市长这样重要的职位派给了它的成员。可是，到1942年底，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开始失宠了，那个主张合并的日耳曼—佛兰芒工人协会（Deutsch—VlämischeArbeitsge-meinschaft）反而受到垂青。在瓦隆地区，德国人也在雷克斯党徒和口头上叫得更响的亲德的大德意志帝国之友（AmisduGrandReichAllemand）两者之间犹豫不定。他们有时候鼓励雷克斯党的领袖德格勒尔，甚至委派他的党徒担任重要的职务，可是有时候又对他的比利时人政策深为不满。其他一些运动，象瓦隆国家社会党等，虽然表面上是亲德的，对于德国当局却没有任何实际的价 122 值，所以即使没有正式遭到镇压，也受到了强大的阻碍。

在丹麦，德国人促使丹麦国家社会党参加处理国务的努力，最后完全失败了。这方面的主要尝试是在1942年10月发生“外交危机”时作出的，当时希特勒决定：德国当局的日的“必须是尽可能迅速地成立一个由丹麦国家社会党领导的政权”。那时候，希特勒显然认为，“丹麦国家社会党的领袖弗里茨·克卢森博士是不是适当的人选，丹麦人民大部分还是小部分支持他”，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前几个月里，德国驻哥本哈根的公使馆曾经给予克卢森相当多的财政援助，并且导致他希望自己有可能在德国人的支持下成为某种类型的丹麦“元首”，尽管从德国人入侵丹麦后，他们始终就没有以任何方式公开承认过他的地位。因此，在贝斯特达抵丹麦后最初提出的要求中，有一个就是：改组丹麦政府，让丹麦国家社会党党员担任一些部长的职位。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丹麦政府的坚决拒绝。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德国人终于决定不强加于人。在1943年3月的选举后，丹麦国家社会党只获得投票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德国人对克卢森的信心无论如何从此大为减退了。在1943年8月的危机发生后，德国当局打定主意尽量通过直接的警察行动，而不是利用当地的内好去控制丹麦的事态（虽然党卫队仍旧利用当地的恐怖分子）。

在东方地区，总的趋势是：把中央政府完全控制在德国人手里，只把一些次要的行政事务留给纯地方性的团体。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德国人决心对这些国家进行最残酷的剥削，虽然部分也是因为当地（至少在苏联被占领区内）缺乏任何合适的行政机构（当地政府官 123 员，有的在德军入侵时牺牲了，有的则在他们到达前逃跑了，不过德国人对俄国的制度无论如何想必是很反感的）。就德国当局鼓励亲德运动来看，这么做往往是试图利用这些运动作为抵制其他民族集团的手段，而不是为了到时候要他们参加行

政工作。例如，1939年9月，里宾特洛甫显然玩弄着用西部乌克兰人对付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这种计划。后来，弗朗克的确也利用过/PGN0190.TXT/PGN>他们去抵制总督辖区的波兰人。在对苏联发动进攻后，罗森贝格的东方事务部积极培养乌克兰的流亡分子，虽然这些人在乌克兰当地总是遭到德国专员科赫的厌恶。然而，就俄国本土而论，主要的内奸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到1944年底才获得一点重视，因为那时候俄国本土已经又回到了苏联人的手里。即使在那个时候，罗森贝格对弗拉索夫受到的重视还深为不满，因为他怕弗拉索夫的大俄国扩张主义的规划只会使东方其他国家的人民同德国疏远。

就东方地区的实际行政管理而论，当地人士参加的范围通常是极其有限的，因此至少从这点来看，德国人认为拥有大批合作者供他们使唤并没有什么好处。例如，在总督辖区，波兰官员只可以掌管城镇和地方小行政区。这些地方行政单位联合组成小规模“地区自治协会”(Gemeindeverbände)，并置于当地“督察”的管辖之下。这些“督察”，象德国人常常费尽心机指出的那样，是以“古老的日耳曼监督官制度”为依据的。然而，这些“地区自治协会”的管理权，与其说是掌握在波兰“督察”的手里，不如说是掌握在德国行政区长官的手里，这些行政区长官弗朗克的日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373—374页，第380页和第503—504页(2233-PS)〕。

见下文，原著第640—641页。

参阅1944年10月12日致拉默斯的信和附件〔《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41卷，第185页以后(罗森贝格-14)〕。

杜·普雷(编)：《总督辖区》，第16页。

则听从地区总督公署内主管内政的部门指挥。在这一级以上的行政机构，完全由德国人管理，尽管弗朗克显然认为：在行政结构的最高一级设立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这两个“主要委员会”(Hauptausschüsse)以代表当地地方团体的领袖，从而使他可以了解当地人民在各项民族事务上的愿望，这还是对他有利的。根据他本人的陈述，124他规定他的德国部属在“所有一般性问题”上必须同这些主要委员会进行磋商，而他本人也同他们经常保持接触。在1944年华沙起义的时候，他甚至玩弄这样一个计划：把波兰人主要委员会改组为“波兰民族委员会”，由“督察”在每一行政区里充作委员会的代表，而他们则将成为“真正的行政官吏”。乌克兰人委员会有两个分会(一个在克拉科夫，一个在利沃夫)和一个驻柏林的“办事处”。它已经取得了单独“协调”加利西亚地区乌克兰民族生活的任务，所以正在走向获得上述那种地位。在德国专员管辖下的乌克兰，当地行政机关的用途也同样受到限制，尽管罗森贝格有着成立一个自治的乌克兰国的宏伟计划。当地人士参加行政管理的范围始终没有超过乌克兰的“区长”一级——大体上相当于总督辖区的波兰“督察”。在德国专员管辖下的奥斯拉，各个地区的情况全都不同。由于白俄罗斯东部的那一半从1917年以后一直在苏联的统治之下，该地区被认为是政治上最落后的。因此，德国人并不试图成立任何由当地人组成的中央行政机构，行政管理的责任主要落在明斯克德国常务专员的工作人员和明斯克及巴拉诺维奇的两个低级专员身上，尽管象在总督辖区那样，也没有一个代表“委员会”，在德国当局认为有必要考虑到当地人民的愿望的事务上向他们提供意见。另一方面，由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地区被苏联统治的时期较短，德国民政机关几乎一开始就利用了当地的自治维

持机构。这种使用当地行政机构的办法，经过适当时期由罗森贝格于 1942 年 3 月 7 日发布了一项命令正式予以批准。该命令并指定国务委员、执政和议长分别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民族的最高当局”。然而，所有这些机构都应由当地的常务专员任命，并经德国专员洛泽批准。正如不久以后罗森贝格向希特勒说明的那样，他曾经把某些“保安条款”写入了他的法令，从而很周密地作出保证，未经这些德国官员同意，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自治机构便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德国之所以决定授予这些地方自治机构这一审慎而具有约束力的职责，事实上主要是由于它“缺乏官员，因此不得不大力节约使用人力”。可是，在罗森贝格看来，这项措施的优点在于为德国人制造了“一种历史性的辩解”（大概暗示他们的方法比实际上要开明点），并使波罗的海国家人民看到，德国人准备采取主动态度去满足他们的愿望。如果当地人民没有按照这种精神来接受这项决议，那么德国人仍然可以——引用罗森贝格的话——“用较为严厉的措施进行恰当的干涉”。

罗森贝格呈给希特勒的关于建立波罗的海自治机构的报告中所强调的这几点理由，使人可以很感兴趣地看到通常影响德国行政政策的一些因素。在德国人比较坦率的时候，他们爽直地承认，这是一种“甜面包与皮鞭”的政策：它的基本原则是交替使用劝诱和高压的办法以取得合作。由于各个占领区在执行这项政策时需要因地制宜有所改动，他们总斟酌这两种办法的比重予以调整。在西方，往往是先给（但决不是始终如此）“姜饼”，及至“姜饼”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时，再拿出那种不大可口的代用品来。另一方面，在东方地区（即波兰和俄国被占领区），倾向于一直使用“皮鞭”，只是到了最后，德国人要想利用全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情绪去同俄国人作垂死挣扎时，他们才试用了劝诱的办法。

126 第五章法律概况

第一节 德国占领政策的合法性

就西欧各占领区的行政管理而论，德国人起先多少还假装遵照海牙公约规定的原则办事。拿他们后来采用的方法来看，这可能显得很奇怪。诚然，他们甚至还说，由于他们同有关国家之间没有签订正式和约，通常也没有签订停战协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只得根据一般性的国际条约”，例如海牙公约，“来予以规定”。他们特别表明，按照海牙公约第四十三条，他们有权管理彼占领国，因为第四十三条规定，当合法政权的权力一旦转入占领国的手内后，占领国有权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恢复并确保公共秩序与安全，同时除遭到绝对的妨碍外，应尊重占领区现行的法律。德国人争辩说，这“对于改组公共生活并没有加添任何障碍”，“只要没有难以克服的阻碍横插进来，行政机构就只要按照陆战的法律办事。”

/PGN0196.TXT/PGN>后来，当他们违反海牙公约的行为变得尽人皆知时，他们就强词夺理地说，自从 1907 年该公约签订以来，战争性质方面发生的变化已经使公约过时了。据某个作者说，虽然海牙公约的起草人认为战争主要是敌对的军队之间的冲突，仅仅偶尔接触到平民，可是，“现代战争影响到全体人民和生活中的各个部门”。因此，占领区民政当局的事务就变得比以前复杂了。他们现在必须处理各项行政问题，还必须干预平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这次战争是总体战争”。然而，甚至德国人也看得出，这种似是而非的推论并不足以说明 1939 年后德国大规模并吞别国的领土是正当的。为了掩饰德国政策的这一方面，他们于是说，“行政工作从一开始就没

有把这些地区看作是海牙公约所指的‘占领区’，尽管其他（包括“非西方的”）地区的占领政权基本上是以海牙公约的军事占领原则为根据的。”

这种议论似乎提出：就连东方地区的行政管理也是 127 遵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如果我们也是这么个提法，那就完全忽视了德国在那个地区为占领政策规定的目的。例如，据官方宣称，在总督辖区，德国人占领的目的是：

一、尽最大可能，增加和掌握农业生产，以便确保德 R·H·科赫：“挪威的德国行政机构”（R.H.Koeh：“DerAufbauderdeutschenVerwaltunginNorwegen”），施图卡尔特编：《德国、人民秩序、生存空间》，第 3 卷，第 40 页。

F·A·西克斯编：《世界政治年鉴，1942 年》，（柏林，容克尔和丁豪普特，1942 年版），第 94 页。

国人民的粮食供应。对从事重要的战事工作的当地人民，能有足够的粮食配给，并把多余部分运交武装部队和德国本土；

二、使当地的劳动力完全从事于重要的战时工作，并把这项工作不需要的劳动力交由德国支配；

三、普遍增加这一地区内的日耳曼成分，特别是重新分配居留地并从其他地区迁入日耳曼人，以加强东方边境地区；

四、确保总督辖区成为运往东线物资的转运地带；

五、从当地居民中招募兵员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战。显而易见，这样一套计划制定出来后，国际法的原则必然被置诸脑后。因此，到了对苏联被占领区进行掠夺时，试图“依法”实行统治的伪装不久便脱下了。在这里，据称“由于苏联已经瓦解，德国为了当地人侵的利益，有义务行使政府的所有权力和其他主权”，所以海牙公约的规定不可能同这有任何关系。因此，“凡是德国行政机构认为在执行这项全面的任务时是必要的和合适的种种措施”，都是可以容许的。

从本编以前各章所述的德国的行政方法和政策可以看出，其中简直没有什么符合海牙公约的文字或精神的。举例而言，海牙公约第四十六条规定：家庭名誉和权利、个人生命以及私有财产都应受到尊重，但是党卫队为希特勒的欧洲制订的全部规划，包括大量枪杀和根据重新定居的计划大规模放逐居民与没收财产，都是公然违反海牙公约这一条规定的。同时，他们将大片地区明目张胆地并进大德国，成立一些在德国纳粹党监督下的纯政治性政权，并且强迫人们宣誓效忠德国和希特勒，这 128 也是违反海牙公约制定的原则的。其他违犯公约原则的有：推行德国法律，设立德国法院，授予德国公民权，变更关税边界，征收集体罚金，以及出现抵抗行为即予扣押和枪杀人质等。

国际法有一条公认的原则：在缔结正式和约之前，占领区应受到托管。可是德国人的政策中根本无视这条原则。相反，他们考虑到的只是用可能的最快的方法把这些国家纳入新秩序。他们似乎始终就很少考虑到最终可能要缔结和约，因为纳粹宣传机构一直强调的是，这些国家在新秩序中最终将要承担起的任务，而不是在最后一项和平解决中它们可以指望获得的条件。1942 年，吉斯林和雷德尔为了替挪威促成和平解决，曾作出种种努力，可是希特勒答复他们时曾表明，他本人无意缔结正

式和约，即使同成立了傀儡政权、完全屈从于德国利益的国家也是如此。因为，在他看来，最后并吞必须是德国不变的目标。这一点甚至也适用于丹麦。尽管丹麦在最初阶段并没有象其他被占领国那样直接受到德国的控制，但是丹麦最终也将成为“德国的一个行省”。

第二节新秩序的法律概念

波兰总督和纳粹运动中的主要法律专家汉斯·弗朗克于1942年7月1日在维也纳大学发表“论法律与欧洲的重建工作”这篇演说时曾经提出，当德国人想到欧洲的新秩序时，他们必然也想到要使“欧洲人对法律的崇拜在这个新秩序中占有适当的地位”。法律必然意味着“保护小国反抗大国，保护小的经济潜力反抗大的经济潜力，保护弱小国反抗强国，而最重要的是，保护小小的欧洲大陆反雷德尔显然向希特勒建议，如果可以同挪威缔结一项正式和约，保卫该国的工作将变得容易得多（参阅他在纽伦堡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4卷，第101页）。在斯大林格勒大战后，同挪威缔结一项和约的问题显然又被提了出来，可是就连那时希特勒似乎也不很热心。据称，他的态度是这样的：“有可能在下一年春天缔结一项和约。但是，条件将强制挪威接受，挪威将享有由一个德国专员监昏……，还是（接待）一个德国全权代表的那种地位，这一问题到那时将获得解决。”（参阅韦尔曼关于1943年2月20日同拉默斯谈话的报道：《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11号》，第660页）

见上文，原著第105页。

抗世界上广大的地区（Raume）”。然而，就任何一条法律条文的实施情况而言，弗朗克本人就可以证实，德国行政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矛盾。他在日记中曾经详细记载下他在波兰残余地区的施政情况，他还以该地区总督的身分颁布过许多镇压的和完全武断专横的法令。这些都代表着他在维也纳所维护的“法律教育”的对立面。关于法律在德国占领政策中应起的作用，纳粹的这个主要法学家所下的定义一点也不是始终如一的，因为就是他在1939年11月说，“对德意志民族有用的和必需的东西就是法律；凡是损害德意志民族利益的东西就是非法的。当前，这就是指导我们的原则。”

根据一时的需要来制定法律——这种意见一开始便是德国司法和行政工作中的指导原则。纳粹常用的著名格言说：法院的设置并不是“完全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而是“首先为了替人民的集体利益服务”，这一原则促使德国人承认，对他们说来，法律只不过是行政政策的附属品——即使的确不仅仅是政策的产品的话。就行政工作而言，施图卡尔特于1941年5月在柏林向国际政治科学及公共管理学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中争辩说，法律只不过标明一个“重大领域”的“既定界限”，“在那个领域里行政工作应当遵照自身的自由判断行事，以便能够充分恰当地处理好国民生活的多方面发展”。行政工作就是“按照领导所制定的指示去维护和发展社会”，这反过来也就是“法律这一词的最崇高的意义”。因此，行政工作并不是“合法意义下的根据法律行事”而是“更高层次意义下的根据权利行事”。

这条原则被应用于占领区时，就意味着：德国的统治，尤其是德国的掠夺，本身就成为了法律，而且践踏了国际协定和有关地区本国制定的及德国制定的法律。这一点早在1939年3月便由希特勒明确地认可了，因为他在1939年成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那道法令中宣称：“根据德国防务上的需

要，元首和德国总理对这些地区的特殊地带可以发布同这些条款不一致的命令。”通过这道法令，希特勒便树立了一个先例。此后，遇到正常司法机关似乎无法应付的紧急情况出现时，占领区的德国代表就援用这一先例。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代表一成不变地总授予他们的下属明确的权力，可以“背离现行的法律办事”。

为了促进纳粹政治和思想方面的目标，被占领国家施行的法律都遭到彻底的修改，这有许多事例。例如，在挪威，所得税和产业税的条例都作了修改，以便使那些在挪威军团、武装党卫队和德国武装部队中服役的人可以享有特殊权利。在佛兰德，开展了一个以“佛兰芒—日耳曼民族法律”取代“法国—罗马法律”的运动，目的是要“割断佛兰德同法国法律的联系”，使“佛兰芒—荷兰族人”可以“在新欧洲的结构内”制订“自己民族的法律”。与此同时，德国人对比利时的法律也作了重大的修改，以便鼓励佛兰芒族的卖国贼。他们还按照人们熟悉的德国方例如，根据赛斯-英夸特 1941 年 3 月 19 日颁布的有关设立军事行政法庭的法令（《荷兰德军占领区公报》，第 11 号，1941 年 3 月 20 日，第 190 页），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可要“背离现行的法律办事”。设有军事行政法庭的地区内所委派的“特别代表”“也不受法律的约束”。根据赛斯-英夸特：1943 年 1 月 5 日的命令（同上书，1943 年 1 月 9 日，第 1—39 页），在警察裁决法实行以后，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可以“背离现行的法律办事”。在保护国，1941 年 9 月 29 日宣布进入地方紧急状态后，类似的“背离现行的法律办事”的情况也成为可能〔《德国保护长官公报》（Verordnungsblatt des Reichsprotectors），1941 年，第 527 页〕。

在挪威军团、武装党卫队和德国武装部队中服役的人也取得了大学和中学优先录取的权利（《德意志法律》1944 年，第 16 页）。

参阅同上书，1941 年，第 34 页。

例如，参阅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驻军司令官的一些命令。它们规定为那些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同德国合作而受到“迫害”的比利时人恢复权利《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驻军司令官公报》（Verordnungsblatt des Militärbefehlshabers in Belgien und Nordfrankreich），第 14 号，1940 年 9 月 10 日；《德国政治文件》，第 8 卷，第 1 编，第 252—256 页〕。

式成立了特别政治法庭——例如，挪威的人民法庭、法国的国家法庭和荷兰的和平法庭——所有这些法庭都是按照德国人民法庭的形式成立的，用以处理他们认为从思想方面看是特别严重的案件。131 纳粹世界观对立法政策的影响，更为突出地反映在所谓“犹太问题”上：德国人力图使占领区的法律在这一问题上同德国的法律完全一致。反犹太人的计划，包括 1933 年后德国反犹太人的运动中所显示出的所有那些狠毒的手段，也都推行到占领区里来了。例如，在东方合并区，刑法全作了修改，凡是对德国国民犯了暴力行为或违抗德国命令的犹太人，都将受到特别严厉的处罚。同时，犹太人（象波兰人一样）个人是不准向法院提出诉讼的。在这些地区，波兰血统的犹太人的财产可以依法随时没收，而其他波兰人的财产原则上只有在“公共福利有所需要”或业主在 1918 年后已经移居德国的情况下，才可以没收。在总督辖区，根据弗朗克 1939 年 10 月 26 日颁布的法令，犹太人必须参加强迫劳动。十岁以上的犹太人必须佩带“大卫王之星”标志，开没有商店或企业的犹太人必须悬挂特殊的招牌，以表明它们是犹太人的产业。按照 1940 年 1 月 26

日的一道法令。总督辖区的犹太人不准搭乘火车。1940年10月以后，他们被迫住进了犹太人区，未经许可不得迁移。在那里，他们获得了一种自治权，成立了“犹太人委员会”（Judenrate）。在奥斯兰，也实行了类似的限制。所有犹太人的产业，根据1941年10月13日德国专员洛泽发布的一道命令，一律予以没收。区专员制定法律，把犹太人限制在犹太人区，同时也采用了由当地“长老委员会”负责管理犹太人的这一原则。西方的情况实质上也没有什么差别，法国被占领区内对犹太人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就是明证。在那里，根据军事司令官1940年9月27日发布的命令，凡是逃往非占领区的犹太人全不准回来。所有其他的犹太人都必须向当地的区长登记，犹太人的企业必须用法文和德文132的标记标明出来。后来，又规定犹太人不准更改居住地点，并从晚上八时至翌晨六时对他们实行宵禁。他们也被迫佩带“大卫王之星”的标志，就象在东方地区那样。

第三节立法权

按照德国人在被占领国家实施的情况而言，法律主要是为了达到占领的目的，尤其是为了维护德国利益在当地人民各种竞争利益中的首要地位。在合并区和民政长官管辖区，使法律制度服从于德国政治目标的工作，已经推行到几乎完全废除了当地原来的法律和司法机构，并代之以德国法律和法院。因此，在合并区，最高立法权与其说是掌握在德国总督的手里，不如说是掌握在柏林的各个政府机关和部门的手里。拿波兰合并区来说，德国政府一开始就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具体表现就是：希特勒颁布了1939年10月8日法令，成立西普鲁士和波森两个新行政区（后来改称但泽—西普鲁士和瓦尔塔兰）。这项法令尽管允许不“与并入……德国的工作相抵触”的现行法律继续生效，却明确地授权德国内政部长，“在同有关的德国部长磋商后”，可在这些地区施行德国法律和普鲁士州的法律，并同德国财政部长合作，调整这些地区同德国其余地区的财政关系。虽然德国内政部长确实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授与当地的行政区长官和德国总督，但关于他们的立法权问题该法令却只字不提。在西方合并区——即欧本、马尔梅迪和莫雷斯纳——希特勒于1940年5月23日亲自发布命令，完全实施德国法律和普鲁士州的法律。根据这道命令的规定，133德国法律将于9月初生效，尽管各部部长“在同内政部长磋商后”，根据需要，有权展缓或修订某一法令的施行。另一方面，在民政长官管辖区，地区当局倾向于保有大得多的创议权。民政长官据称是“代表元首”行事的，而且只听从他的命令。因此，在民政长官管辖的地区内，他“执掌着立法、司法和裁判的大权”。只有在特殊的事务上（邮政、铁道和海关），德国政府才“直接接管”，因此，在所有其他领域里，民政长官的权力是决定性的。但是，象在合并区那样，主要目的是要尽快实施德国的基本法律，所以民政长官的立法政策也得相应地予以配合。此外，这些政策所遵循的方式似乎表明：从柏林方面获得了相当多的指示。例如，瓦格纳于1942年1月在阿尔萨斯施行了德国的刑法以及1934年的“禁止对党和国家进行恶毒攻击”的法律和其他各项保护彼国作战努力的法律后，洛林的比尔克尔和卢森堡的西蒙不久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后来，这三个地区又通过同样的方法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另一方面，对这三个地区内在德国武装部队和武装党卫队里服役的人，或者被承认以其他方式“表明自己是德国人的人，授与公民权——这一类补充立法不是由民政长官，而是由柏林的德国内政部长提出来的。

德国当局在立法方面的最高权力，在其他被占领国 134 家内多少也获得承认。就四年计划总负责人和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主席戈林的立法权来说，这一点是特别正确的。而就劳动力动员全权代表绍克尔（名义上是戈林的下属）、军备与军火生产部长施佩尔和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希姆莱等所行使的权力而言，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正确的。然而，这些德国权威人士所颁布的法律，通常普遍适用于整个德国占领下的欧洲，因此德国代表（即：军事司令官、德国专员等）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是最高的立法人，也是所有新的司法机构的创建人。据官方的一篇评论说，德国代表的立法权是“政府权力中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它“只受元首意志的限制，而在国际领域里则只受海牙公约第四十二条至第五十六条规定的限制”。从法律上说来，德国代表是最高级的“德国国家利益的保护人”（Wahrer der Reichs-interessen），他们以这种身分对负责保护国家利益的法院和其他机构（德国警察不在其内）行使绝对的控制权。

德国代表的立法权力一贯是载明在任命他们的命令里的，尽管实际采用的方式却各不相同。在 1939 年 10 月 12 日任命弗朗克为波兰占领区总督的命令中，有这样一项规定：“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四年计划总负责人和总/PGN0209.TXT/PGN>督都可以以命令的形式制定法律”，同时最高德国当局以及这些官员都可以在总督管辖的地区内颁布有关德国生存空间及经济领域规划的条例。但是，对挪威的特博文或是荷兰的赛斯-英夸特，则没有加上这类条件。对他们两个人只是说，“德国专员可以以命令的形式制定法律”。¹³⁵虽然有明文规定，在总督辖区，“以前有效的法律”只要“同德国当局接管行政的工作不相抵触，就仍然有效”，而在挪威和荷兰，只要“同占领工作不相抵触”，就仍然有效，但是，德国代表和其他德国当局所颁布的法律都是至高无上的，这一点在三项命令中全不言而喻。同样，在对法国被占领区发布的相应的布告中，也明白指出：“德国军事司令官发布的一般命令和规定高于当地法律”，尽管不违反这些命令和规定的地方法令仍继续有效，但“同占领的目的不相容的则不在此例”。

另一方面，就保护国而言，情况则较为复杂，因为根据希特勒 1939 年 3 月 16 日颁布的法令（该法令将发布《法令公报》，1939 年，第 1 部分，第 2077—2078 页；《文件，1939—1946 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 2 卷：《希特勒的欧洲》，第 240—241 页。《挪威德军占领区公报》，第 1 号，1940 年 5 月 6 日，第 1 页。《法令公报》，1940 年，第 1 部分，第 778 页；《文件，1939—1946 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 2 卷：《希特勒的欧洲》，第 201 页。《法国塞纳、塞纳—瓦兹和塞纳—马恩地区德军占领区公报》（Ver-ordnungsblatt für das besetzte Gebiet der französischen Departements Seine, Seine-et-Oise und Seine-et-Marne），第 3 号，1940 年 6 月 21 日，第 13 页。

“具有成文法效力的命令”的权力保留给德国政府），柏林的德国政府各部门经明文规定，都有权为该地区制订法律。在德国当局不行使这项立法权的范围内，“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现行法律和法令”则继续有效，除非它们“同德国政府的保护目的是不相容的”。关于德国保护长官的立法权力，除含糊地提到在紧急情况下他能“采取公共福利需要的一切步骤”外，根本没有规定。可是，根据 1939 年 6 月 7 日颁布的另一项法令，希特勒授给冯·牛

赖特有限的立法权，规定他在德国和保护国的“共同利益”所需要的范围内，有权下令修改当地的法律，并在紧急情况下有权“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命令”。

在东方占领区，希特勒于1941年7月17日颁布的法令，给了罗森贝格类似于波兰总督和挪威及荷兰德国专员所享有的那种立法权。同时，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奉命把这种权力授予驻乌克兰和奥斯兰的德国专员136员。他根据1942年2月21日的一道命令终于这么办了。这些德国专员在次要的事务上可以把他们的权力再授给常务专员。可是，从法律上来看，东方占领区同西方国家，甚至同总督辖区之间却存在着项重大的区别，即希特勒1941年7月17日的法令没有规定东方占领区的现行法律可以继续生效。这是由于德国人认为苏联的法律同德国行政管理的总目的是水火不相容的，结果东方占领区有一大片地方——特别是德国专员管辖下的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地区——一直都被置于德国法律的管辖之下。在其余的地区——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地区——一度也完全使用德国法律，但是后来又作出规定，1940年6月以前有效的当地法律可以重新生效。德国人这样做时，他们明白表示，那个日期以前施行的法律只要“不违反德国政府所推行的新秩序的精神”，就将重新生效，不过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生效的法律关系和取得的法律权利都将继续下去，除非有新的法律和法令明确地宣布它们无效。作为这一措施的必然结果，常务专员和德国专员从罗森贝格那里获得的立法权力，有一部分于1942年4月又授予这些地区的地方当局了。理论上讲，这使这些地区的地方当局在地方立法方面处于同荷兰的荷籍秘书长和挪威的吉斯林政府相等的地位。然而，实际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自治政府”要比西方地区相应的机构受到更为严密的监督。立法权（如同荷兰的那些秘书长的权力那样）只限于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和行政命令”，可是就连这些，事先也要获得德国当局的批准才能发出。

第四节 司法

德国人在总督辖区和东方占领区办理的司法工作，或许可以最为清楚地说明他们用以保护本身的利益、抵制当地人民竞争利益的办法。在那里，三项基本原则指导着德国人的政策。第一，所有刑事案件和几乎所有涉、137及德国公民或“德国国家成员”、日耳曼人，或日耳曼后裔的民事案件，只能由德国法官根据德国法律加以审判。第二，对占领当局、对当局所制定的法律、对国家社会党及其附属机构，以及对个别德国人和日耳曼族人犯下的某些罪行，不问罪犯的国籍，一概归德国法院审判。第三，除德国当局特别交办的比较严重的刑事案件外，当地司法机关的职权只限于审理非德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和次要的刑事案件。然而，即使如此，当地法院的判决还一定要受到德国法院的审查。

不让当地法院审判涉及德国利益的案件的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西方地区，不过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在丹麦，在占领的头三年里，根据1941年1月18日的法令，甚至连对德国武装部队进行破坏活动的案件也可以由丹麦法院审判，而在法国被占领区，军事法庭可以把他们认为不符合军事法庭起诉条件的那些反对德国武装部队的案件重行发回法国法院去审理。同样，在荷兰，如果所犯案件并不重大，而被告又不是德国国民或保护国国民，那么军事当局和德国法院都可以把诉讼移交荷兰法院去办理。

在丹麦，虽然德国武装部队始终没有放弃由军事法庭审判那些对德国武

装部队进行抵抗的案件的权利，但是德国人却一直不肯在那里成立德国法庭和行使德国裁 138 判权。事实上，在占领后的头两年半里，德国军事法庭的审判主要是一种威胁而不是一个事实。直到 1943 年 8 月的“危机”发生后，德国军事法庭才宣判了第一个死刑并予以执行。从那时起，有关破坏的案件，不仅由陆军军事法庭审讯，而且也由党卫队和警察法庭审讯。

在西方合并区——即欧本、马尔梅迪与莫雷斯纳——1940 年 7 月 28 日颁布的一道法令将原来的法院全部撤销，并由德国法院予以接替。这些新设立的德国法院将“以德国人民的名义”作出判决。鉴于其他地区的当地法院通常总是“以法律的名义”作出判决的，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情况。主持这些德国法院的法官和出庭的律师需要具备的资格，基本上同在德国本土一样。在民政长官管辖区，由于缺乏有训练的德国司法官员，当地司法制度的德意志化工作只得推迟了，因此，就以阿尔萨斯为例，瓦格纳直到 1942 年 1 月才能采用德国刑法。经过改组以后，这些地区的司法机构实际上已在柏林德国司法部长的直接控制之下，虽然就下斯蒂里亚而言，据称到 1944 年民政长官（即斯蒂里亚行政长官）仍然不仅是“最高首长和立法者”，而且“在行政上还主管法院工作”。139 使当地司法制度德意志化的措施，包括设立德国式的特别法庭，可以由德国司法部长会同德国内政部长，或者由当地的民政长官着手实行。民政长官还得负责使所有的律师具有正确的“政治态度”。在卢森堡，至少在占领的初期，当地民法有一大部分还保留下来（只不过从法文译成了官方的德文译本），因此有必要继续使用当地律师，结果不得不采取一些特别措施，以保证卢森堡律师界中只有可靠的成员才可以开业。根据 1940 年 12 月 6 日的法令，取得律师的资格今后应由民政长官批准。翌年 2 月，按照德国职业公断处的方式，成立了律师“特别荣誉法庭”。这个法庭有权惩罚“构成违反在卢森堡组织德国行政机构所带来的各项义务的行为”。

除保护国以外，在其他占领区内，凡设立德国法院和颁布有关当地法院司法权问题的命令等，均由最高级的德国代表负责。在保护国，象在合并区那样，法院是在柏林司法部长的直接管理之下，德国保护长官只处理布拉格德国高级法院院长呈报给他的德国法院的上诉案件。根据 1939 年 4 月 14 日关于保护国内德国司法权的那项法令，德国法院和人民法院都有权在德国本土以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行使司法权。此外，德国的司法机构，是由布拉格的德国高级法院、布尔诺和布拉格的两个德国巡回法院以及在各个德国飞地内所设立的十二个德国初级法院组成的。

在其他地区，德国法院的组织形式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都行使德国法律，有时候是单独行使，有时候与当地法律合并行使。在挪威，德国 140 人显然认为只要设立一个普通的德国法院就够了，尽管根据特博文 1940 年 8 月 27 日那项法令的条款，这个法院可以“在挪威被占领区的任何地方”行使它的职权。

另一方面，在荷兰，根据赛斯一英夸特 1940 年 7 月 17 日的法令，设立了一个德国巡回法院和一个高级法院，尽管这些法院也有权在德国专员管辖下的任何地方审理案件。据称，这些德国法院的设立，决不损害德国专员成立即决法庭或特别法庭以应付突然发生的反抗行动的权力。同时，这也决不影响德国武装部队法庭司法权的现行规定。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及法国被占领区，这些军事法庭在保护占领国的利益方面，承担起了挪威和荷兰的德国

法院所承担的同样职责，它们行使德国法律的范围也和那些法院一样。它们的司法权有时还由下级军事司令官的特别司法权予以补充。在民政长官管辖区，似乎就没有任何类似的情况。例如，在法国被占领区，根据 1940 年 9 月 10 日的法令，地区司令官和战地司令官有权“发布即决命令”惩罚那些不属于军事刑法处分范围的人，倘使“查有实据”的话。他们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可以判决罚款三万德国马克，或者长达六星期的拘留。

关于指导总督辖区和东方占领区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上文已经谈过了。在这些地区，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德国法院比在西欧被占领国家内更形重要。这三个因素是：第一，存在有人数大得多的德国官员和其他享有治外法权的人（日耳曼人等）；第二，当地的司法制度，尤其是苏联被占领区内的司法制度，（在德国人看来）很不健全；第三，倾向于把东方占领区不看作临时占领的地区，141 而看作永久进行掠夺和殖民的地区。

在总督辖区，根据弗朗克 1940 年 2 月 19 日颁布的关于“总督辖区德国司法权”的法令，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德国司法制度，在克拉科夫、热舒夫、卢布林、赫尔姆、拉多姆、佩特里考（彼得库夫）、华沙和日伊腊尔杜夫等地设立了德国法院，并在每一区的区总督驻地设立了一个德国高级法院。象在其他占领区那样，这些德国法院都施行德国法律，而且除非另有规定，它们都按照德国规定的诉讼程序法规办事。对这些德国法院的判决不服上诉的案件，则由德国高级法院裁定，后者的裁定是最终的。上文已经提到的那些原则，使德国法院有权自行处理涉及德国公民、德国血统的人和其他被控反对占领国的人的刑事案件，以及涉及德国公民、德国血统的人和德国一般利益的民事诉讼，都很详细地写进了这项法令。这项法令还指定德国法院负责对所有根据德国法律开设的德国企业进行商业登记。同时，又明确指出，这项法令的规定不得影响以前关于总督辖区特别法庭的立法，或“根据法律已经规定的任何军事法庭的司法权”。这些德国法院的设立，也不得影响德国武装部队法庭的权限，因为这种权限经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同意后，已由 N0219.TXT/PGN>由弗朗克在 1940 年 1 月 26 日的一项法令中作出了仔细的规定。

根据弗朗克 1940 年 2 月 19 日发布的另一道命令，波兰司法机关完全从属于德国法院。波兰最高法院和劳工法院全被撤销，其他波兰法院的司法权限于“地方法院、区法院和上诉法院”。“凡遇公共利益有所需要时”，波兰法院的判决可以由德国高级法院“重新审查”，后者 142 可以批准原来的判决，也可以“对该案另行判决”，或决定由德国法院复审。涉及波兰国民的刑事案件，波兰法院（在当地区总督的直接监督下开庭）无权审理，除非“德国检察机关”事先已经将诉讼事宜委托波兰当局的话。此外，居住在“指定居留地”的其他各族人民（例如乌克兰人，C. 第 110 页。关于总督辖区德国法院的一般情况，参阅 G. 胡贝尔纳格尔：“总督辖区德国法院的结构和任务”（G. Hubernagel： “Aufbau und Aufgabender deutschen Gerichte. im Generalgouvernement”），《德意志法律》，1941 年，第 8—11 页。《波兰德军占领区总督公报》（Verordnungsblatt des Generalgouverneurs für die besetzten polnischen Gebiete），第 13 号，1940 年 2 月 24 日，第 64 页。

1942 年 10 月 1 日在行使职权的波兰司法机构是由五个上诉法院（每区

一个)、二十二个低级法院 (Bezirksgerichte)、二百三十九名治安法官 (Bürgergerichte) 和二十二名检察官组成的 (《克拉科夫日报》, 1943 年 1 月 1 日)。东加利西亚在 1941 年 8 月 1 日以前并不属于总督辖区。在那里, 苏联占领前的法律状态在理论上讲已经恢复了 (韦, C. 第 100 页), 但是有相当时期, 只有德国法院有权行使司法权, 直到 1942 年 10 月 30 日才作出规定, 成立了一些非德国的法院 (《克拉科夫日报》, 1942 年 11 月 3 日)。

总督辖区政府的司法部长对波兰司法机关进行全面的监督, 同时区总督办事处的司法部门对波兰地方法院进行监督。

人) 可以要求不受波兰法院审判, 可以要求由自己的法院处理。除总督有命令另行规定外, 波兰法院应施行波兰法律。

弗朗克于 1942 年 10 月在克拉科夫讲话时直言不讳地承认, 这些措施的目的首先就是要使司法工作服从于德国的利益。他说, 设置一套德国的司法制度, 就使德国人可以把总督辖区内对他们重要的问题交由德国法官审理, 并可以把他们的事务委托给德国律师和公证人办理。总督辖区的德国人都要遵守德国的婚姻法和有关个人的法律。商业企业可以根据德国法律开办。可是同时 (弗朗克说), 他的目的 “从一开始就是要按照久经考验的德国法理学原则为德国人和国外出生的人建立一套司法制度, 特别是要确保……当地的司法工作可以根据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通过悠久的传统和惯例发展起来的原则稳健地存在下去”。

鉴于以前苏联统治的地区缺乏令人满意的地方司法机关, 德国司法制度不得不承担起较大的责任。虽然如此, 罗森贝格为东方占领区安排的司法制度却远没有弗朗克在总督辖区推行的制度那么狂妄。可是它的基本原则却几乎是相同的。通过 1941 年 12 月 19 日发布的一项命令, 罗森贝格在每一德国专员的驻地 (即在鲁夫内/PGN0221.TXT/PGN>和里加) 设立了一个德国高级法院, 在每一常务专员的驻地 (即: 在乌克兰的卢茨克、基辅、日托米尔、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尼古拉耶夫和美利托波尔, 以及在奥斯兰的考那斯、里加、雷瓦尔和明斯克) 设立了一个德国法院。在民事方面, 德国法院有权审理其他占领区德国法院承办的 143 类案件。然而, 在刑事方面, 它们可以审理 “所有的案件, 只要这些案件不是明确地划归另一法院管辖的”。正象官方的法律评注中当时指出的那样, 这意味着德国法院在刑事方面的权限并无限制——也就是说, 它们既可以审理在其他地区通常是由当地法院承办的所有非德国人的案件, 甚至可以审理只涉及当地罪犯的次要罪行。尽管如此, 没有多久, 在情况许可的地方, 实际上还是有必要把那些不涉及德国人或德国利益的刑事案件交由当地司法机关审判。拿波罗的海三个区来说, 这是通过 1942 年 2 月和 3 月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付诸实行的。结果, 这些地区的当地司法机关变得同总督辖区的司法机关很相似: 这就是说, 每一地区有其上诉法院、低级法院和治安法官。但是后来, 随着地方 “自治政府” 的恢复, 地方当局取得了一些刑事裁判权——例如, 有权惩罚不合作主义者和抗拒服兵役的人等。这种情况在总督辖区是没有的。另一方面, 在白俄罗斯地区, 地方当局参加司法工作仍然只限于地区法院和治安法院, 它们只能办理一些不大的案件。这些地区法院显然是参阅迈尔编, O. II. A2, 3, 4。

由 “从前沙皇时代的法官” 主持的, 它们在刑事案件上运用德国刑法, 并根据当地情况作必要的修改, 但是在民事案件方面, 显然还可以使用 “布尔什维克时代以前的旧法律”。

在德国专员管辖下的乌克兰，严格他说，当地并没有什么法院，尽管根据德国专员科赫于 1942 年 5 月 8 日发布的一道命令，非日耳曼人所犯的情节较轻的罪行可以由乌克兰籍陪审推事根据德国法律审理。这些陪审推事被说成是区专员的“代表”，由常务专员根据区专员的推荐任命。他们有权判处罪犯长达两年的徒刑和高达一万银卢布的罚金。他们在刑法方面相当于 1942 年 3 月科赫委派的仲裁人。这些仲裁人有权审判涉及前波兰和苏联公民的案情较轻、不属于德国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但是，所有关于结婚、离婚、监护、财产和专利权的案件一概归德国法院审理，因此乌克兰仲裁人的权限实际上仍然是很有限的。

第五节警察与行政军事法庭

和特别法庭占领区德国司法工作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遇到抵抗运动势将广泛发展，以致法院无法应付时，就利用所谓“地方紧急状态”去加速和加强德国刑法的威慑效果。这种地方紧急状态一经宣布，刑事方面的裁判权大部分立即移交给了专门成立起来的军事法庭。德国代表成立的这种军事法庭，在许多方面相当于德国武装部队设立的军事法庭，只不过它们不属于武装部队。它们由党卫队和警察官员，甚至还由德国民政机关的代表主持。它们的司法程序是即决的，旨在立即作出判决。被告不准有辩护人，除判处死刑外，通常的惩罚是把有罪的人直接交给盖世太保。虽然案件可以被撤销，或交给其他法院去审理，但是军事法庭的判决是不能要求上诉的。导致这种法庭活动的紧急状态，一般说来时间极短，尽管处理的案件数目通常总相当多，而死刑判决的比例往往也非常大。在西欧占领区，宣布进入地方紧急状态到 1942 年底已经成为对付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的惯用手段了。在挪威，特博文就采用了这种手段去破坏 1941 年 9 月初奥斯陆发生的罢工。在保护国，海德里希于 1941 年 9 月到达后，立即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后来在 1942 年 5 月他被暗杀后，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卢森堡，为了应付人民对实行征兵制的反抗，德国人于 1942 年 8 月也 145 曾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在荷兰，通过 1941 年实施的所谓“军事行政管制法”，一种类似于“地方紧急状态”的紧急状态条例已经制定出来了。后来，根据同年 3 月 19 日的一项法令，海牙的德国高级法院取得了“根据在德国本土设立的特别法庭的程序”，行使军事法庭职务的权利。1943 年 1 月，“行政军事管制法”又改为“警察军事管制法”，万一发生暴动和混乱时，立即可以施行。同时，对“警察军事法庭”也作出了规定：由一个受过司法训练的党卫队头目和两名协助他的党卫队或警察官员联合组成，行使军事法庭的职权。5 月里，德国当局实施了一种“警察军事管制”

状态（相当于其他地区所实行的地方紧急状态）以应付荷兰的罢工。

在总督辖区和东方占领区，不论是否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都成立了军事法庭。弗朗克在 1939 年 10 月 31 日的法令中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在总督辖区，一切暴力行为和煽动反抗德国人的行为，一概应由这种法庭进行审判。这种法庭由一个保安警察团长或营长，或由一个保安警察特遣队队长同“该单位的两名官员”组成。这项原则也适用于东方合并区和东方占领区。在合并区，对德国当局犯有暴力行为的波兰人和犹太人一概由军事法庭审判，而在占领区，根据罗森贝格 1942 年 1 月 12 日颁布的法令也成立了军事法庭。

在总督辖区和东方占领区，负责军事法庭的官员有权把他们认为“特别法庭”更有能力处理的案件移给该庭处理。在占领区的大部分地方，特别法

庭同占领后设立的普通德国法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法庭一般总“隶属于”德国法院。这种特别法庭的法律程序，完全按照为德国本土相应的法院制定的那一套。交给这种法庭 146 处理的案件便不再属于普通刑事司法权的范围了。这种法庭还是自身的上诉法院。被告辩护人“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才予以指派。除了处理特别法庭在德国通常承办的那类刑事案件（例如，破坏战时经济的罪行）外，占领区的特别法庭还有权审理下列两类案件：一类是占领当局明白宣布特别法庭有权处理的案件，另一类是由于情节特别严重，检察官可能会发交给特别法庭处理的其他刑事案件。就特别法庭对非德国人的刑事裁判权而言，它们是各种德国法庭中最为重要的。象一个评论员于 1939 年提到波兰被占领区的情况时所说的那样，“在波兰被占领区一开始进行司法工作时，就有‘特别法庭’，这种法庭就代表当时的全部德国司法”。

在波兰，德国陆军总司令首先于 1939 年 9 月 5 日设立了特别法庭，但是后来弗兰克在 1939 年 11 月 15 日颁布的一项法令里又详细规定了它们的职能。根据这项法令，弗兰克在每一总督或地区长官的治所设立了一个特别法庭。每个法庭由三名法官组成，但审理“简单案件”则只有一名法官。这些法庭全都根据德国刑法审判案件。后来，罗森贝格在奥斯兰和乌克兰的每一德国法院下也设立了类似的法庭。在保护国，根据 1940 年 2 月 21 日德国颁布的关于“特别法庭的重建工作及其权限”的法令，以德国本国这类法庭为根据，也自动组织了特别法庭。在西方，往往在占领初期就设立了特别法庭，专门处理据认为普通德国法院的程序无法迅速处理的案件。例如，在卢森堡，民政长官西蒙于 1940 年 8 月 20 日设立了特别法庭，审理下列案件：非法集会、私藏武器、散布敌视德国的消息，以及煽动罢工和关闭工厂。在挪威，特博文于 1940 年 10 月设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来应付那些设法使非法的政党继续展开活动的人。在比 147 利时，军事司令官命令司令部设立特别法庭去应付盗窃粮食的案件。但是，据指出，这不一定就意味着比利时的法院将被“取消”，因为德国法院的运用问题“取决于比利时法院如何表现出它们对人民的责任感”。

第六节在当地人民反抗的情况下抛弃了合法的方法

尽管德国人十分重视使被占领国家的法律与司法制度同纳粹的政治与思想目标协调一致的工作，但是他们不久便开始主要依靠恐怖政策，而不是依靠合法手段去对付反对新秩序的人。例如，以丹麦而言，只有一百十三名抵抗运动的成员是经过军事法庭的判决而被处死的，可是至少有七百九十七人是在德国当局干的“清剿”或“报复”的屠杀和其他恐怖行为中被杀害的。不同的因素促使德国人逐步抛弃了“合法”的假面具。一个因素是法院——包括占领后设立的正式德国法院和为了应付特殊的紧急状态而设立的军事法庭——不能应付当地的抵抗运动，尤其是 1941 年对俄国发动进攻后由共产党所鼓动而组织起来的抵抗运动。另一个因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希特勒本人极其反对利用法院去对付占领区内的抵抗运动。希特勒显然欢迎东方地区有游击战，因为这给了他一个机会去“扫荡”所有胆敢反抗他的人，所以他原则上反对把反抗他的人交给法院去审判。1940 年 9 月，在讨论捷克“问题”时，他断然反对德国司法部长居特纳所主张的把四个捷克领袖交给人民法院审讯的建议，并且坚决认为，“对待捷克叛乱分子和反抗者，德国的行刑队就足够了”。他还说，“通过法院的判决去制造一些烈士是错误的，安德烈亚斯·霍费尔和施拉格特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1942 年，他显然

认为，对付暗杀海德里希的凶手的最好办法，不是去审讯所有的可疑分子，而是把 148 三万到四万有“政治活动嫌疑”的捷克人立即处决。至于丹麦，他又想到霍费尔和施拉格特这两个例子，所以同样断然地认为，“绝对不能把破坏分子交给法院去审判”。对付这些破坏分子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杀掉他们——最好在他們犯罪的时刻，否则就在逮捕以后”。结果是，1943 年 12 月，希特勒亲自发给了贝斯特和当地德国警察头子京特·潘克一道严格的命令，要他们发动那种声名狼藉的“报复”或“清剿”大屠杀。在西方，德国人对阴谋损害武装部队的行为采用了集体负责的原则，从而第一次明目张胆地抛弃了“合法性”。这项原则，根据德国军政长官施特雷齐乌斯的一道命令，早在 1940 年 9 月便应用于法国被占领区。这道命令授权当地的德国区长向法国居民索取遵守法纪的保证人，凡遇“可能发生严重的暴力罪行时”，以及遇到没有“其他适当的手段来维持治安”时，还可以扣留人质，德国司令官掌握着这道命令赋予他们的权力后，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屠杀，作为对反抗武装部队“罪行”的报复，甚至还公布了所谓“人质条例”，企图使这种做法合法化。他们并不尽力去查明被处决的人事实上是否参加了抵抗运动，尤其是在 1941 年 9 月 30 日以后，因为那天施蒂尔普纳格尔发布了一道命令：所有被法国当局拘留的法国人，以及所有被德国人拘留的法国人，都将视为潜在的人质。然而，甚至在为时较晚的期间，德国军事当局对于不做一点审讯的表面文章就把人质枪毙，显然也还有点不安。因此，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至 14 日的行政长官汇报中，有这样一项建议：与其把人质立即枪决，不如让军事法庭对那些在正常情况下仅会被判处徒刑或者甚至会获得赦免的犯人判处死刑。¹⁴⁹ 集体负责原则的应用和扣押人质的办法也不限于军管的国家。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保护国的盖世太保就逮捕了大约八千名显要的捷克人，作为担保其余的捷克人遵守法纪的人质，1942 年 5 月 27 日海德里希遇刺以后（他于 6 月 4 日伤重毙命），德国当局立即发布了一道命令，指出不仅那些庇护或帮助凶手的人，就连他们的家属也将被处决，而且即便这些家属毫无责任，也不得豁免。1942 年 6 月 10 日，在海德里希伤重毙命后六天，利迪策大屠杀就是按着这道命令的精神进行的。

在其他占领国内，德国人也表明，他们要当地的全体居民对个别的反抗行为负责。例如，赛斯-英夸特于 1942 年 5 月在荷兰宣布，他提议拘留“大约四百六十名过去知名的社会人士”，如果由于“伦敦的流亡分子的阴谋策划”，再发生扰乱社会秩序的行动的话，“就要这些人偿命”。接着在 7 月里，驻荷兰的德军司令官也宣布，为了“保证完成〔他的〕军事任务”，他也将拘留“几百名”人质。到 1943 年夏季，总督辖区的抵抗运动已经大为发展，德国当局也承认它“不再能完全控制局势”时，弗朗克于是下令，如果波兰地下运动杀死一个德国人，就枪毙一百个知名的波兰地下运动成员。接着，“东方”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在希姆莱的指示和“总督的同意下”，于 1944 年 6 月 28 日发布了一道命令。根据这道命令，凡杀害或企图杀害德国人，或破坏重要设施的罪行，从严惩处：不仅枪毙罪犯本人，而且处决其所有男性亲属，并将其所有十六岁以上的女性亲属关进集中营。¹⁵⁰ 凯特尔 1941 年 9 月 16 日发给军事司令官的训令和希特勒本人 1941 年 12 月 7 日发布的通称“夜雾”命令的那道臭名昭著的命令，都表明了希特勒对采用普通的合法手段去对付抵抗运动感到不耐烦。凯特尔“训令”的目的，表面上是要使军事当局可以更为有效地应付进攻俄国以后占领区内发生的“共产党起

义运动”。据凯特尔说，“以前采取的”应付共产党煽动运动的“措施”已经证明“不够”了。因此，元首下令使用“最严厉的措施”，以达到在“可能的最短时间内”把所有反抗镇压下去的目的。为此，以后一切抵抗行动，都必须看作是共产党所操纵的；“在这类案例中，处死五十名至一百名共产党人以抵偿一个德国士兵遇害，应认为是适当的办法”；而且这种判决必须以一种“预期”可以提高其“威慑效果的方式”来执行。既然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是作为应付共产党人的叛乱和对德国占领当局的其他攻击行动而采用的“特别措施”，那末，只有“最严厉的惩罚才是适宜的”。这些措施显然未能产生希特勒所需要的效果，因此三个月后，它们就为“夜雾”命令所取代。根据凯特尔发布的与这道命令有关的“行政命令”，希特勒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后终于得出结论，一定要改变一下惩罚那些在占领区内进行反抗的人的办法。在这类案件中，他认为终身监禁——甚至终身监禁加苦役——会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因此，只有判处死刑，或者采取步骤“使罪犯的家属及当地居民不知其下落”，这样才能收到“持久的、有力的威慑效果”。将被告送往德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因此，那道命令载明，凡是不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就应送往德国，并对其下落不提供任何消息。根据凯特尔“行政命令”的规定，审判反抗行为案件 151 的地点，必须由军事当局决定。如果军事法庭的法官同德国反谍报机关商议后，决定可以在占领区宣判，他就在战地军事法庭开庭审判这个案件。否则的话，他就必须将案卷转呈上级司令官，由后者决定应就地审判罪犯，还是由战地秘密警察押送德国。其后，如果德国武装部队当局认为有必要的话，仍然可以在德国举行军事审判。基尔、科隆、埃森（或多特蒙德）和柏林都设有特别法庭，奉命分别审理挪威、法国和比利时的“夜雾”命令案件，以及一般案件，这四个特别法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开庭审判。再不然，甚至可以由德国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因为从 1942 年 10 月以后，人民法院也有权处理根据“夜雾”命令被解送来的犯人。

如同后来的事态发展所显示的那样，这道十足野蛮的命令最残酷的特点是：它作出规定把押解到德国的人移交给盖世太保处理。每当军事当局决定不能在占领区内举行审讯时，德国保安总局就指定一个盖世太保指挥所负责看管这个罪犯。这样，盖世太保就成了德国军事司法当局的附属机关，正象过去好几年中它一直是德国国内刑事法庭的附属机关那样。此外，尽管“夜雾”命令的用意显然最初仅仅是作为一种军事措施，可是不久以后，党卫队和保安处便开始用它作为从占领区大规模押送平民出境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终于使德国国内的集中营里关满了好几十万盟国人民。

尽管“夜雾”命令一直施行到战争结束，但是 1944 年夏天盟军登陆后，德国人显然认为这道命令不足以应付西欧的抵抗运动了。因此，希特勒于 1944 年 7 月 30 日发布了一道更为残酷的命令，实际上停止了正规法院对阴谋破坏和其他反抗德国当局的案件的司法权。根据这道命令，德国武装部队和党卫队及警察奉命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把“恐怖分子和破坏分子”在犯罪现场消灭，并把事后逮捕的嫌疑分子直接交给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根据 1944 年 8 月 18 日凯特尔发布的一道补充命令 152 令，已经进行审理的案件应予停止，并将被告移交给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看管。后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同希姆莱、蒂拉克和博尔曼磋商后，于 1944 年 9 月 24 日又发布了一道补充命令。根据这道命令，已经“由德国法院依法判决”并在占领区

或德国国内服刑的人，同样也应移交。不过由于感到这项最新措施甚至和德国的习惯做法也截然不同，德国当局某些人显然不敢予以执行。例如，在荷兰，据称德国专员赛斯-英夸特和高级党卫队军官兼警察头子劳特尔就曾反对这道命令，理由是这只会迫使荷兰人更为积极地加入非法组织，尽管最后希姆莱本人似乎进行了干预，来保证这一措施按照希特勒的意图实行。

放逐政治犯并把他们移交给盖世太保和保安处，这并不是德国人用来对付西欧抵抗运动的唯一的非法手段。拿丹麦来说，尽管明文规定“夜雾”命令在那里并不执行，扣留人质的做法一般也不采用，但是德国人想出了一套周密的、系统的“反恐怖”办法去对付当地的地下组织，包括任意破坏财产和冷酷无情地杀害著名的丹麦爱国人士。这种“反恐怖”办法是由党卫队“丹麦”特遣队的那个声名狼藉的“彼得”大队贯彻执行的。它是1943年“危机”发生后由德国派遣到丹麦去的德国保安总局的一支队伍，奉了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明确指示要组织炸弹爆炸事件，并进行惊人的“报复性”屠杀，以迫使丹麦人屈服。德国人显然一度也考虑在挪威使用类似的办法，但结果并没有采用，因为特博文认为这套办法会由于没有适当的目标而失败，还因为希姆莱和卡尔登勃鲁纳都认为这套办法只会造成“最为不利的后果”。

对纳粹分子来说，他们同抵抗运动的斗争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出于军事占领方面的需要。在他们看来，抵抗运动不是战争行为，而是对新秩序的叛逆行为，所以他们不能根据公认战争法则来处理，而必须以一切可用的严厉手段来进行镇压，正如1933年153后他们在德国国内镇压自己的政治对手那样。因此，同抵抗运动进行的这场斗争，除了经常引起武装部队的注意外，首先还要求占领区内的党卫队尽力应付。希特勒本人要求把“发生的每一桩”阴谋破坏和其他反抗行为的事件都向他汇报，“如果军事司令官在报告中将这些事件隐瞒起来，不让他知道”，他显然就“非常恼火”。结果，他们对采用的措施在有关地区内，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可能引起什么反应，倒似乎毫不在意。他们最在意的就是消灭所谓“不同政见的人”（纳粹最喜欢用这个词来指德国国内和占领区内反抗他们的人），即使——象利迪策和奥拉多尔絮格朗这两件惨案那样——这实际上意味着把发生抵抗行为地区的平民全部消灭干净。

第六章德国人如何对待犹太人

詹姆斯·帕克斯

在 1939 年到 1945 年间造成将近六百万犹太人惨死的这一悲剧，主要应归咎于希特勒本人。他从一开始就是纳粹政策的主要决策人，而且不论他多么忙于更为重要的公务，他总会腾出功夫来斥责犹太人并指挥毁灭他们的种种措施。1939 年 1 月 30 日，他在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曾经说道：今天我敢于再作一次预言：倘使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金融势力能够使各国再一次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末，其结果决不会是世界布尔什维克化和随之而来的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彻底消灭。三年以后，1942 年 1 月 30 日，正当东线方面的冬季危机发展到高峰时，他声称：“我们心里，有桩事情是一清二楚的——那就是这场战争的结局：要么雅利安人被消灭掉，要么犹太人从欧洲完全消失，两者必居其一。”

1938 年 11 月，一个名叫冯·拉特的德国官员被一个波兰犹太人赫舍尔·格林斯潘杀死了。希特勒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把对德国犹太人的迫害推到了如火如荼的新高潮。其实，犹太人这时已经从行政事务、文化与 154 自由职业（除犹太社会本身所需要的医师、律师和文艺工作者外）以及工业领域的职位上完全被排除出去了。他们的公民平等权已经被 1935 年的纽伦堡法令破坏无遗。为了使犹太人彻底毁灭，德国人于 1938 年 11 月 12 日又制订了三项法令。他们向全体犹太居民勒索十亿马克的罚款。根据纳粹的估计，这相当于犹太人全部财产的百分之二十，尽管就他们能够自由动用的财产而言，这个数目代表着一个高得多的比例。其次，德国人还命令犹太人偿付这次谋杀后发生的骚动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可是犹太人应得的保险金（特别是被毁坏的橱窗玻璃的保险金）却扣住不发给给他们。更为严重的是，德国人颁布了一项法令，把犹太人从德国的经济生活中彻底排除出去。该项法令规定，从 1939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犹太人开设零售商店、邮购商店或经纪商行，禁止他们独立地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31 卷，第 66 页（2664—PS）。

见《概览，1938 年》，第 3 卷，第 153 页以后。

一份完整的纳粹立法的表格，以及较为重要的法律的影印本，均载在犹太书刊委员会出版的《黑皮书》（The Black Book），纽约，迪尤尔、斯龙

事任何交易，并禁止他们在市场、交易会或展览会上出售商品、为商品做广告、接受定货或出卖劳务。此外，任何犹太人都不能担任企业的经理，或受聘担任其他行政职位。雇主可以通知他六星期后解雇，但是他无权获得任何解雇金。所有合作组织也把犹太人驱逐出去。剩下来给犹太人谋生的唯一手段，几乎就是犹太社会自身所需要的那种贫乏的经济中的职业了。正当德国犹太人这样面临着忍受饥饿或者移居国外这两种选择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严格地限制了他们离开德国的机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些萧条的岁月促使世界各地都关起门来，特别不让那些这时已身无分文的移民入境。英国的白皮书又阻止移民大批进入巴勒斯坦。世界其他地方犹太人所承担的救济重担，已经接近难以为继的地步。可是没有一国政府感到自身可以代表受害者出面干涉，而纳粹的狂暴显然似乎除了把在他们控制下的犹太人全部消灭外，并无罢休的迹象。自从 1938 年 3 月以后，纳粹的规定在奥地利已经生效，所以在那里，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内，以及在斯洛伐克这个卫星国里，情况全都相同，尽管我们必须说捷克人民是值得赞扬的，因为德国人在他们反犹太的暴行中并没有得到捷克人民真诚的合作。

1938年11月12日的立法并没有结束战前的全部反犹太运动。德国人后来又采取了三项措施。犹太人对产业的控制权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还实施了一种变相的犹太区制度。成立了一个中央组织德国犹太人事务管理局，所有的德国犹太人全被迫归它管辖，这样当局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抓住任何犹太人及其产业了。由于戈林作为四年计划的执行首长发布过一道命令，强迫犹太人从事有益于全国的各项工程的劳动，所以这种安排就成为必要的了。

战争爆发前一年，欧洲其他国家内犹太人的境况几乎也同样恶化了。在波兰，三百万犹太人由于多年的压迫和法律限制，已经落到了经济上困苦和没落的地步。罗马尼亚的接连几任独裁的总理也推行着同样的政策。两国政府都声称，对犹太人移居国外问题很感兴趣，但是没有一国能提出任何会欢迎犹太人的地区来。在匈牙利，犹太人也不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但是同上述两国相比，他们的情况几乎还是可以容忍的。尽管国内有不少反犹太主义的议论，教会和舆论都不会接受当局按照波兰或罗马尼亚那样来对待匈牙利犹太人。在意大利，1938年10月7日也通过了一项全面反犹太人的法律，但是法西斯政府仿效纳粹反犹太主义的措施，并没有获得广大人民的热情支持，因此并没有有效地付诸实行。虽然如此，1939年战争爆发时，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犹太人或多或少都处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们的合法权利遭到损害或践踏，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或冻结，而他们逃走的机会既有限又危险。

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后，波兰犹太人处于十分困苦的境地。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理由爱护波兰，因为自从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自由的那天起，它就一直把犹太人看作二等公民，在十多年中一直不遗余力地迫害他们。但是新来的统治者更糟，所以犹太人以其生活中往往特有的乐观主义精神站到波兰同胞的身旁，忠诚地投身到这场战斗里去，指望波兰政府在最后关头作出的诺言这次会予以履行。在三星期的战斗中，有三万多波兰犹太人牺牲在战场上。随着波兰的全面溃败，犹太人最担心的事迅速出现了。德军打进一个又一个城市，百般怂恿对犹太居民的暴力行为。1939年底以前，有二十五万以上的犹太人被德国军队和党卫队，被当地反犹太的分子，以及被犯罪分子所杀害。同时，德国当局还着手更有系统地来消灭犹太人，一面又考虑把活着的欧洲犹太人最终全部移送到马达加斯加岛去。

在六星期内，有五万七千名犹太人被送到德国去强迫劳动。犹太人区在波兰各城市内设立起来。华沙的犹太人被勒索了二百多万美元作为不设立犹太人区的贿赂后，华沙还是设立了犹太人区。犹太居民被迫到工厂里、大道上，以及在非熟练工人可以为德国的战争机器效劳出力的任何地方从事劳动。施行了纽伦堡法令，犹太人被剥夺了所有的公民权；他们的配给品供应证上全盖了特殊的标记，他们获得配给品的机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没有“经济用途”的犹太人往往干脆被剥夺了全部配给品；在最初的暴行中没有遭到破坏的犹太教堂和文化机关都被没收和予以破坏；犹太人的企业被夺过去，变成“雅利安人所有”。同时，德国人还尽了一切力量去煽动当地的波兰人反对犹太人，一种手段是经常散布流言，说导致这场战争，导致波兰战败的正是犹太人，一种手段是把从犹太人那里盗窃来的财产、粮食和衣服送给波兰人。

10月底，德国人在卢布林地区划出了一片长五十英里宽六十英里的居留

地，同时宣布，所有犹太人都将送往那里，准许他们在指定范围内过一种自治的生活。有三万多犹太人从波兰、维也纳和捷克被撵上装牲口的货车，在没有粮食和茶水供应的情况下运往那里。活着到达的人发觉那地方根本没有准备接待他们，他们也没有谋生的方法。不久，他们就成了流行病的牺牲者。德国人害怕传染，被迫暂时放弃了这一试验。

居留地的办法行不通，德国人就加紧把犹太人驱入犹太人区和强迫劳动营。开始时，他们只是从街头抓上一些犹太人，强迫他们劳动。后来，德国人干脆强迫犹太人当局每天提供一定数量的各种劳动力。没有劳动力的犹太人则听其饥饿。在最初这段时期，纳粹分子采用了这种办法——从战时运输的需要看来，这是异乎寻常的——把犹太人干脆赶上装牲口的货车，让他们在无水、无粮的情况下长途受苦，其目的无非是要这批人死在途中。

住在边境附近的犹太人自然都想逃跑，但是逃跑也不容易。俄国人已经占领了波兰东部地区，除极少几处外，整个边界都封锁起来。向其他方向逃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到头来也是徒劳的。当纳粹分子于1941年打进俄国和波罗的海国家后，逃往东方或北方的人大部分又都被抓住。只有极少数波兰犹太人设法逃到很远的东方，在乌拉尔山以东和西伯利亚苏联新建的军火中心找到了安身之处。

1940年4月至6月，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犹太人，包括好几万从德国和奥地利逃出来而没有能逃得更远一点的难民，全落入了纳粹的魔掌。在丹麦，由于德国人不肯以自己的行政机构直接取代原来的丹麦政府，他们没有能强迫英勇的丹麦国王和丹麦人民接受他们的反犹太政策。当德国人威胁要强迫犹太人佩带犹太标志时，丹麦国王宣称，他和他的宫廷人员将全部佩带这种标志。当德国人想破坏犹太人和丹麦其他公民之间的关系时，国王在宫廷人员的陪同下，隆重地参加了在犹太教堂里举行的节日礼拜。在挪威，德国人扶植起了吉斯林政权，但是他发觉要把纳粹式的立法强加于教会和挪威人民也是困难的。在荷兰和比利时，他们的奴才米塞和德格勒尔都太软弱，无法使他们出来执政，因此德国必须在那里成立自己的政府。鉴于法国过去一直采取宽容的态度，含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人就是在PGN0245.TXT/PGN>贝当元帅和皮埃尔·赖伐尔统治下的法国最为成功地完全按照纳粹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反犹太的政权。

在所有这些国家内，人们很熟悉的那一套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又都重新搬了出来。犹太难民先遭到攻击，接着成千上万的人在惯常的那种野蛮情况下被押送到东欧的强迫劳动营和集中营去。当局还以种种借口向当地的犹太居民勒索巨额的款项；宗教和文化机关都遭到抢劫；企业财产全被没收；犹太居民被迫参加劳动，到处受到折磨，而且还得不到正常的配给品。从中欧到西欧，不得不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组织抢劫犹太人家里的艺术珍品、文物、藏书、名画、家具、挂毯、珠宝以及各种工艺美术品的工作。

1940年夏天，罗马尼亚同德国联合起来。苏联重复了它在波兰的行径，没有放一枪就并吞了罗马尼亚北部的比萨拉比亚省和布科维纳省。因此，大约有三十万犹太人暂时成为苏联的公民，遭到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攻击。波罗的海国家的犹太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是在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宣战后，这两个地区的犹太人的命运变得更糟。

在德国国内，战争的第一年加深了犹太人的苦难。许多小城市把犹太居民全部驱逐出去，扬扬自得地宣称已经肃清了犹太人。这种情况特别出现在

东部边境从波兰并吞进来的那些地区。定量供应时常拒绝发放，或者故意使之无法获得。可是战争促使纳粹政策有了一点改变，至少在最初是如此。由于缺乏受过训练的人员，需要允许一些医师和牙医重新开业，特别是随军服务。除此之外，犹太人的命运仍然是：强迫劳动、无意义的放逐、配给供应的剥夺、从住所被迫迁移，以及经常蒙受侮辱。

1941年6月，希特勒开始进攻俄国。甚至在发动进攻之前，人们就已经料到，这将使德国人乘机干出种种野蛮的暴行来，这种暴行在西欧和中欧，即使在纳粹占领的情况下，也是行不通的。六月中旬，希姆莱奉了希特勒的命令，决定着手完成消灭东欧犹太人的工作。党卫队内组成了一些特别行动队，负责执行这项工作。这些行动队隶属于各个军团。此外，德国人还采取各种办法把特雷布林卡、贝尔泽茨和沃尔茨克等地原有的大规模屠杀设备，扩展到奥斯威辛那个更大的集中营去。

这项政策是按着各不相同的方式贯彻执行的。在波罗的海国家，党卫队起初试图使当地的反犹太分子同他们的工作发生联系。在这一阶段，有好几千名犹太人遭到杀害。可是纳粹分子不久便觉得这种方法不够理想和满意，因为这种毁灭方法过于缓慢，过于没有系统，而且往往会激起当地居民的同情。尽管欧洲的反犹太集团激烈地谴责犹太人，骂他们是寄生虫和杀人犯，尽管他们屠杀了几千名犹太人，然而他们却不肯参预纳粹分子干出的最后阶段的残暴、“科学”的恐怖罪行，这是这场反犹太的暴行中意味深长的因素之一。罗马尼亚是唯一的例外。在罗马尼亚人会同德国人进攻苏联后，他们所干的暴行同德国党卫队所干的简直不相上下。在苏联西部的各共和国内，德国人的反犹太主义在一般居民中只获得极少的附和。

甚至在德国人内部，也需要有所区分。挑选了来干这项可鄙的工作的人必须要经过仔细“审查”。现存的文件上有着这样一些指示：不要公开进行屠杀和处决：不要让兵士们在场；遇有必要，必须向兵士们说明消灭犹太人的必要性，即使这样做会使德国人丧失了熟练工人或奴隶劳动。然而尽管如此，负责屠杀犹太人的德国当局，有时候对自己训练了来执行这项政策的刽子手的行径也感到厌恶。白卢西尼亚的一系列文件反映出了这件惨事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当地居民的厌恶、“正派的”159德国人的愤怒、德国名誉所蒙受的损失，以及占领国政府这样事先毫无准备地失去了它的大部分熟练工匠后所感到的脱节。下面谈到的这件事发生在明斯克附近的斯卢次克。当地的犹太人先象牲口那样被聚集拢来，然后就按照纳粹惯常的那种残暴方式加以屠杀，但是以下是自卢西尼亚的德国常务专员库贝的评论：……从考恩调来的警察第十一大队，是直属于武装部队的一支部队，但是他们没有向我、党卫队准将或是常务专员公署的任何机关呈报，就擅自采取行动，因此极其严重地损害了德国民族的威望。……把身受重伤、从坟坑里挣扎出来死里逃生的人再活埋掉，是一件十分卑鄙、肮脏的行为，类似这样的事件，应当向元首和德国元帅报告。自/PGN0248.TXT/PGN>卢西尼亚的民政当局遵照元首的指示作了很大的努力，想把当地人民争取到德国一方来。这种努力无法与上述做法协调一致。

在当地官员卡尔呈给库贝的长篇报告中，库贝引用的这一件暴行只不过是许多暴行之一。但是，不用说，这件事或是任何其他报告都没有使库贝向之呼吁的希特勒或是戈林稍许改变一下他们的政策。

在整个东欧，特别是在德军侵占的俄国各省里，隶属于德国军队的那些

特别行动队就地屠杀了犹太人和当地居民中的许多人士。他们是在侵略军打进的所有城镇中被机枪击毙，被毒气熏死，被活活饿死，或是用其他方法被消灭掉的。这一过程瞒不了几万名德国士兵或是民政当局，可是说来奇怪，它却并没有引起多少象白卢西尼亚常务专员那样的抗议。在南方，在罗马尼亚人侵占的乌克兰和比萨拉比亚省，屠杀的情况几乎同样残酷，同样不分青红皂白。在这些屠杀中，死亡的人数共达二百多万。好些城市原来有许多富裕的犹太居民，可是后来当苏军向西打回来时，沿着的犹太人却寥寥无几。有些人，尤其是在这片地区东部的人，比较幸运，因为他们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可以逃走。在苏联的这部分地区，苏联当局有计划地撤走了一些犹太人。虽然撤走的总人数无法估计，但是大概要比人们一度所想象的为少。见施瓦茨：《苏联的犹太人》。他估计在 1939 年国境内受影响地区的犹太居民总数为二百五十万人，而在 1939 年和 1940 年新并入的地区内则为一百九十万人。他认为，在这一总数中，大约有一半人仍然活着。

160 虽然纳粹认为，在西欧和中欧这些比较文明的地区，同样公开地实行灭绝犹太人的政策是不明智的，但是他们对这些国家内的几百万犹太人仍然抱着同样的意图。1942 年 1 月，纳粹官员奉戈林之命在万湖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我们掌握了该次会议的全部记录。会上决定，在迎接胜利的同时，要把他们估计能够抓住的一千一百万犹太人全部消灭。甚至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也要他们在死亡和绝育之间进行选择。与此同时，在海德里希的指挥下，消灭犹太人的政策扩大到了已经落入纳粹手里的全部犹太人。纳粹在波兰添建的许多死亡营就是为了这批人。在 1942 年和 1943 年，犹太人由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由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由匈牙利和巴尔干各国，不断地被送往东方和北方。在奥斯威辛，每一次只要花一刻钟的时间就可以杀死二千名犹太人，这种屠杀一天可以干上三四次。应当记住的是，走上这种有时持续几星期之久的可怕旅途的人，只有少数能够活着到达。要知道这些到达的人是多么草率地被杀死的，只要读一下从汉堡撤走的一列车德国人的实况报道：这批人被送往利沃夫去定居。他们被盖世太保逮住，夺去了所有的财物，用毒气杀死，事后才发现他们并不是犹太人。

据纳粹司令官本人报告，光是在奥斯威辛，被毒气杀害的就有二百五十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还有五十万人则是因为饥饿和患病而丧生的。最后一大批被屠杀的人是 1944 年夏天由匈牙利押来的四十万犹太人。大约在 1944 年 16 月初，当德国的溃败已成定局时，希姆莱终于下令停止了这种屠杀，不过有充分事实证明，地方上的党卫队特别行动队直到最后都无视这道命令。

到盟军控制住整个欧洲的时候，大约有六百万犹太人已被消灭。

就全体犹太人来说，同这种骇人听闻的命运作斗争根本是不可能的。由于多年不断的迫害，这些犹太平民已经痛苦不堪、软弱无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加上身来的这种命运不可能组织起协调一致的抵抗，即使组织起来，抵抗也不可能有效。尽管如此，在可以进行抵抗的地方，他们还是进行了抵抗。那些设法从欧洲占领区逃到英国或其他地方的人在那里组织了一些波兰、法国或其他抵抗中心。在这些人组成的所有部队中，都有犹太人参加。甚至在地方性的反犹太主义还比较强烈的地方，树如在流亡的波兰人中，犹太人仍然可以参军。凡是犹太难民可以参加民族武装力量的地方，他们就出现在所有的战线上，并在所有的战线上作战。他们同巴勒斯坦人一起在非

洲和埃塞俄比亚作战。在 1942 年 6 月为保卫比尔一哈凯姆要塞而战斗到最后的那支英勇的法国外籍军团中，他们占五分之一。他们还被空投到欧洲占领区去，因为他们对各国语言的知识使他们特别有用，但是他们也知道，如果他们被捕获的话，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此外，他们还参加了东方和西方由地下抵抗运动在战线后方和被占领国内组织起来的游击战。在所有这些作战行动中，他们同美国、苏联、英国和各自治领的军队中五十万犹太战士并肩作战。但是就盟国和敌国的公众所知道的情况而言，他们象那些战士一样默默无闻地战斗。只是到盟国军队在欧洲向前推进时，这些孤独的战士，以及从劳动营和集中营里生还的人，才亲眼看到他们已成为全世界反纳粹暴行的犹太抵抗力量的一部分。

只有在“犹太人区的战斗”中，他们才能以犹太人的身分在欧洲作战。自从纳粹放弃在卢布林地区建立一片犹太人居留地的计划后，他们在东欧就采取了把犹太人赶进指定的犹太人区的政策。在纳粹看来，这种政策具有这一优点：即为他们提供了一支易于管理的劳动力，同时还使他们可以把他们认为无用的犹太人通过饥饿的办法消灭掉，因为纳粹对准许运进完全是犹太居民区的配给品可以控制其数目。两个最大的犹太人区是在罗兹和華沙。罗兹的犹太人区，尽管由于不断的反抗，伤亡的人很多，而且死亡率也高得惊人，但是由来自其他地方的犹太人补充后，该区却一直保存到战争结束，从而为重要的纺织工厂提供了工人。華沙的犹太人区在 1942 年大约有五十万人，可是到 1943 年只有五万人。由于那里的犹太人已经不再有什么用处，德国人决定把他们消灭掉。但是犹太人组织了一次垂死的抵抗，从 4 月到 5 月激战了四十二天，打死打伤一千多名德国人，最后该区内的四万多名犹太居民才被消灭，只有几百人设法逃脱出去，参加了波兰的地下组织，继续进行战斗。

如果有些犹太人由于参加了抵抗运动而获救，其他 162 的人则靠了非犹太朋友的援助，靠了逃出纳粹占领下的欧洲而保全了性命，尽管欧洲的中立地区后来只剩下瑞典、瑞士和伊比利亚半岛。即使在德国本土，有些犹太人死里逃生，也是靠了非犹太朋友的忠诚，这些朋友把他们藏了起来，供给他们口粮，再不然（特别是对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就帮助他们隐瞒身分。在这类朋友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和教士占有荣誉的地位。虽然同被消灭的人数相比，由于个人干预而获救的人数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各处，都有个别的犹太人靠了非犹太朋友的帮助而得救，后者往往冒着极大的危险。犹太人被藏在僻静的深山野林里，以及城市中拥挤的房屋内。犹太儿童被领进基督教徒的家里和基督教的机关内——往往在他们得救后又出现了寻找父母的问题。犹太人家属也在修道院和宗教机关里避难。从希腊到挪威，从波兰到法国，这种营救的事例稍稍弥补了一下骇人听闻的消灭犹太人的记录。许多营救者富于同情，敢作敢为，因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特别是在巴尔干各国被占领之前，有若干犹太人设法往东逃向土耳其，企图越过博斯普鲁斯那道狭隘的海峡。但是土耳其是一个穷国，对于养活自己的人民都觉得困难，因此它当然只能接纳那些借道过境的人。英国人则担心难民大量涌入巴勒斯坦会使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而阿拉伯世界又把这条逃难的通道封得很紧，他们对进入巴勒斯坦的人不予签证。结果，发生了许多惨事，不适于航海的多瑙河拖轮“斯特鲁马”号的沉没，就是其中最为悲惨的。1942 年 2 月，有近八百名难民搭乘这条船到土耳其去，

但是土耳其人不准他们登陆，因为英国人拒绝保证他们肯定可以越过土耳其边境进入叙利亚。后来，这条船企图从海上驶往巴勒斯坦，但是没有成功，结果在土耳其海岸外爆炸沉没，幸存者只有一个人。虽然如此，英国人在 1942 年下半年还是开放了边界，大约有六千名犹太人经由这条路逃出了欧洲。

瑞士当时是一个完全被纳粹占领区包围起来的国家，本身又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它还是收留了大约两万五千名难民，除了容许他们寻找工作外，还提供了几百万瑞士法郎的救济和援助。到大战结束时，只有两千名多一点的犹太难民留在西班牙，一千名犹太难民留在葡萄牙，大部分都是比较富裕的，因此他们并没有从有关政府方面获得援助。瑞典在这方面的情况最为突出。瑞典政府和人民都曾不屈不挠地去营救遭到迫害的人。1943 年秋天，纳粹把丹麦国工软禁在宫里，并在丹麦成立他们自己的政府，当时瑞典人却设法把六千名丹麦犹太人中的五千名用船运过波罗的海，抵达了安全地带。由于吉斯林在挪威掌权后立即对犹太人实行控制，所以从挪威营救出来的犹太人要少得多。可是即使如此，瑞典人还是成功地帮助半数的挪威犹太人偷越过了国境。同年，他们还向罗马尼亚政府建议，如果后者同意的话，就派瑞典船只绕过大西洋和地中海到黑海去撤走四万名罗马尼亚犹太人，特别是儿童。但是纳粹主子不批准这个建议。结果，在 1944 年夏天，只有少数（一百六十名）儿童获得营救，被运送到了巴勒斯坦。

同年，为了营救匈牙利犹太人，曾作过一次规模更大的尝试。匈牙利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向国际红十字会建议，允许所有的匈牙利犹太人（“外国”犹太人已经被押送到奥斯威辛杀害了）离境，并可以签准他们去巴勒斯坦或其他地方。但是纳粹主子又出来干涉，这一次不是拒绝这项建议，而是坚持要以大量的作战物资作为交换。虽然纳粹这项建议的性质是奸诈的，而且明明是敲诈勒索，但是主要通过瑞士人和美国人，谈判仍然进行了一段时期。最后，除了释放一些关在贝尔森集中营的匈牙利犹太人并准许红十字会将他们送往瑞士外，这次谈判并没有取得什么直接的结果。不过这次谈判至少推迟了匈牙利犹太人的毁灭，结果他们有将近一半人保全了性命，一直活到战后。

倘使根据人类所受的苦难，或是根据精神、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所遭到的破坏，来对纳粹反犹太主义在这次战争年代里所造成的全部后果作出全面的估计，那将是永远不可能的。一般人就连今天还很难理解，科学和技术文明的全部技巧竟然会被残忍地、蓄意地用以屠杀将近六百万的犹太人——而且这六百万还不是死亡营里仅有的牺牲者。这一场灾难的规模之大和为害之烈是罕见的，因为它完全没有意义。被杀害的犹太人不知道他们是为为什么事业而牺牲的，无非就是由于一些疯子和罪犯的疯狂的仇恨而已。下列这张表以冷酷的统计数字说明了这场大灾难意味着什么。1939 年和 1946 年纳粹占领过的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口总数估计如下：

1939 年	1946 年	匈牙利	403,000	200,000	意大利	51,000	30,000
		拉脱维亚	155,000	20,000	卢森堡	3,500	500
		挪威	3,000	1,000	波兰	3,250,000	120,000
		罗马尼亚	850,000	300,000	苏联	3,	

020,000 2,000,000 南斯拉夫 75,000 10,500 流离失所的难民 106,000

第二编希特勒的欧洲的经济结构
帕特里夏·哈维

第一章 1651940 年新秩序的规划

1940 年夏天，不仅德国军队占领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从大西洋沿岸直至苏联边境，而且德国人还公布了在战事结束后改组欧洲经济的计划。直到那时为止，德国的作家和演说人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抗议，起先抗议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后来又抗议不给他们的人民足够的生存空间。但是到西欧战事结束后，一个憧憬已久的德国控制下的欧洲的梦想成为现实，德国的宣传于是开始了一个新局面。德国的征服欧洲，只是为欧洲建立一种“新秩序”的必要的第一步，这种新秩序将引进另一个黄金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已经证明，只有几个法西斯国家成功地找到了走向繁荣的道路。德国准备同其他国家共享这种解决办法，可是，要想得到成功。欧洲必须在德国的领导下联合起来。欧洲幅员有限，不能分成许许多多人为的小国家，而且，尽管小国可能出于感情上的原因希望保持完全独立，它们应该了解，它们的命运是同大德意志帝国的命运连在一起的。

一个小国〔罗森贝格说〕不愿受另一个同样大小的国家的统治，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能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确信，一个小国将自己置于一个大国，一个大帝国的保护之下，这并不有伤体面。……在经受了一千年深重的苦难之后，德意志帝国在众目睽睽之下凭借良己的力量现在又屹立起来了。承认德意志帝国这样一个帝国的伟大，不是意志薄弱或态度可耻的表现，而是承认一条重要的规律，承认欧洲存在的命运所提出的要求。只要欧洲各国准备接受它们的命运，“那就不会有经济危机来破坏繁荣，从而带来失业和可怕的社会弊病与精神弊病”。¹⁶⁶ 建立新秩序的完整的、全面的计划，始终就没有公布过。不同的人士，为了适应不同的场合，曾发表过一系列声明，其结果是留下了许多空白点和许多未获解决的矛盾。最接近于一项阐明德国意图的全面的官方声明的，就是瓦尔特·丰克 1940 年 7 月 25 日发表的谈话。丰克是德国经济部长，也是受戈林委托制订新秩序计划的部长。可是甚至丰克也否认有一个严密的计划。然而，根据现有的各种资料，把纳粹党徒在他们胜利地结束战争后计划创造的欧洲概括地描述一下，这还是可能的。

新的经济秩序的基础，将是在欧洲组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共同体，在德国的指导下进行工作。集中计划将取代无组织的自由主义，而在欧洲各地，通过创设充足的信贷，将保证有高度的就业水平。

国际分工将尽可能予以鼓励。德国和东南欧国家在两次大战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显示出这样一种政策所带来的好处，而在新欧洲扩大了地区内，这些好处甚至将更大。丰克于 1940 年 9 月在维也纳国家博览会上说，如果每个国家为了要生产从钮扣到火车头这一切东西，因而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建立重工业，并且只能靠关税、补助金和限制进口来维持这种重工业，那末这就是在经济上精神错乱。为了代替这种方式，欧洲各国之间应当发展专业分工，以有利于全体。然而，没有一个德国作家或演说人曾明白他说过，实现这种专业分工应采取什么方法。显然，他们曾设想到按照在德国已经确立的方针，由政府管制工业，同时还提出一项建议，认为已经承担起许多重要的准备工作的国际卡特尔可以予以扩充和加强，并置于某一中央权力的监督之下。他们承认整个大陆的分工问题不同于一个国家的分工问题，并且表明，为了整体的利益，可能有必要放弃仅仅有利于一国的工业。还有一点虽未公开表明，言外之意却是，遇到德国和欧洲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可能发生

利害冲突时，德国的愿望应得到优惠的处理。

就我们可以见到的情况来说，对德国以外的欧洲各地所作的设想，其倾向无论如何是朝着部分非工业化发展。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缺乏粮食和饲料，增加农业生产是合乎需要的，但是鉴于欧洲农业总的说来不如工业那样有利可图，因此德国人大概宁可让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去从事农业。在东南欧增加农业生产的政策将继续下去，但是这个地区将放弃其军备及辅助工业（诸如机械和机车），因为对这类产品是没有需要的。有一个作家把南斯拉夫的纺织工业也说成是“从欧洲的观点看来是不合理的”。甚至在西欧，虽然全面的非工业化当然根本办不到，但是他们也设想出某些改变。丹麦将来应减少养牛和乳类生产，增加谷类和饲料的产量；挪威应致力于在农业上自给自足；甚至法国将来也应被看做主要是一个农业经济单位和主要粮食的输出国。

欧洲经济的改组工作，将借助于德国与各成员国之间缔结的长期协定。这些协定保证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向各成员国提供一个可靠的出口市场。在这些协定的基础上，将有可能调整有关国家的出口结构，使之符合于大德意志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需要，这些协定对于农业国家将尤其重要，因为它们在这方面需要制订长期的规划。随着经济关系的范围逐步扩大，参加国所获得的利益也将日见增加。

新欧洲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也将借助于消除兑换率波动的弊病。这些弊病如果听其存在，将会减损上述那些长期协定的价值。欧洲的货币将不再象以往那样同黄金联系起来，它们的价值将由国家管理的经济体系予以规定。“我们决不奉行一种会使我们依赖黄金的通货政策，因为我们不能使自己受到一种我们无法决定其价值的交换媒介的约束。”经过一个预备性的调整时期以后，成员国之间的交易将在固定兑换率的基础上进行。要维持这些兑换率，自然取决于在成员国中按照德国战前采取的方针建立起严格的物价管制和监督来。至于贸易帐目的结算，德国在1933年以来建立的双边协定的制度，到时候将为一种多边贸易制度所取代。按照这种制度，所有的欧洲国家将通过设在柏林的一个中央票据交换所，用德国马克来结算其贸易帐目。兰德弗里德（经济部的国务秘书）在1940年9月科隆交易会开幕时说，德国正致力于恢复旧日的多边票据交换制度，以柏林作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并尽量减少贸易壁垒。“至今仍使欧洲各国彼此分隔开的国际间对出口和外贸所作的种种限制，必须迅速予以废除。”

新欧洲同世界其他各地的关系，是一个经常讨论的问题。国际分工，结合农业和矿业生产的发展，将使欧洲摆脱对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的必需品的依赖。同外界进行的贸易的实际数额将取决于许多因素，尤其是新欧洲的确切的幅员和新欧洲境内所需要的生活水平。德国人始终没有清楚地说明，新欧洲究竟将包括哪些地区，但是在1940年，设想的范围大体上似乎包括全部欧洲大陆，从大西洋沿岸直到苏联边境，可能还包括地中海地区，甚至整个非洲大陆。据一个作家说，人们日益认识到，德国和意大利所要改造的欧洲，包括整个非洲，欧洲有了一个强大的德意志中心和一个复兴的地中海地区以后，必须同非洲在政治上联合成一个大块。有些人还建议，德国同意大利、俄国和日本之间最终应结成一种伙伴关系，以便控制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整个广袤的地区。

在较小的地区内，彻底的自给自足意味着对生活水平将加上某些限制。

欧洲大陆——苏联不算在内——没有其他国家的供应也能生存下去，可是这意味着要失去某些东西：咖啡、茶叶和可可将不得不放弃，而烟草则只能满足正常需要量的百分之五十。短时期内，缺少脂肪将成为严重的问题，但到时候通过增加油料作物的种植，应可弥补不足之数，饲料的缺乏大概会减少能够饲养的牲《纽约时报》（NewYorkTimes），1940年9月16日。见上文，原著第48—49页。《科隆日报》，1940年10月6日。

畜数目，棉花的消费量将不得不减少三分之二，丝绸的消 169 费量则不得不减少一半，而黄麻则是无法获致的。从长远来看，最最严重的问题可能是缺少诸如铜、铝、锡、镍和锌这类金属。

然而，德国并不打算改变成一种绝对自给自足的经济。丰克将其主张概括如下：这不是要么自给自足要么出口的问题，而是自给自足并且出口的问题，对于这个词儿，要求有正确的理解。我们认为，卖掉我们的品质优良的工业产品，去换取世界市场上的原料，这是重要的。可是在这方面，我们有一点保留意见。我们必须留神使所有这些商品在欧洲经济区内部有充分的供应，从而使这个地区在经济上独立于其他地区。因此，我们必须保证它的经济自由。这主要是一个生活水平的问题。例如，如果我们采取定额配给来限制石油产品的消费量，我们将来就无需从海外市场上进口一吨石油。但是如果人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开汽车，如果我们可以生产多少汽车就生产多少，那末也没有什么好阻挡我们从世界市场上进口这份额外的石油，因为万一需要，我们可以把消费量减少到我们自己能够生产的数量。这在诸如咖啡、茶叶、可可等等这类商品的消费上更为确切。我们必须提防，以免万一有需要时，大德意志经济区在自己本来能够生产的物资方面，竟然变得依赖它无法控制的势力和权力。PGN0267.TXT/PGN>

乍看起来，德国改组欧洲经济的计划，即使从一个非德国人的观点来看，似乎也有某些优点。答应给予那些在新秩序下合作的欧洲国家的好处，听起来颇为动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自由主义未能提供一种办法来战胜萧条并取得合理的就业水平，所以采用某种形式的国家管制和计划，乃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之间对于可能进行合作的兴趣增加了。在库登霍韦-卡莱吉伯爵于1923年创立泛欧同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岁月里，曾经有过一系列旨在促进欧洲经济合作的会议和计划，其中包括所谓白里安和范·齐兰德计划，以及设立一个欧洲同盟调查委员会在国际联盟范围内进行工作。乍看起来，新秩序似乎是在欧洲大陆内实现国际合作的又一次尝试，这一次是由德国和意大利发起的。

可是，经过较为仔细的考虑后，情况似乎就颇为不同 170 了。一个联合的欧洲可能会从成员国的合作中得到好处，但是现在主要的好处都保留给德国自己了。丰克说，“未来的和平时期的经济必须保证给予大德意志最大的经济安定，并保证给予德国国民最大的商品消费量，以提高全国的福利水平。欧洲的经济必须适应于实现这一目的。”对于那些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那些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海外贸易的国家，前景是暗淡的，因为德国人直丰克1940年7月25日的演说。

言不讳他说过，这些国家必须对其经济结构进行彻底的改变。那些纯粹依靠农业和矿业的国家，境况则不一样。根据答应缔结的长期协定，在一段时期内稳妥可靠地提供给它们广阔的德国市场，将使它们摆脱掉由于海外更为有力的竞争而感到的忧虑。但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里东南

欧事态的发展来判断，境况不会是全然有利的，尽管德国人自称德国在那个地区的贸易政策是成功的。固然德国为它从东南欧输入的农产品付了很高的价格，但是，有关国家也被迫为它们从德国输入的商品付出高价，而且根据同德国谈妥的清算协定，这些国家不能转到别处去购买。从长远来看，将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东南欧农业区内人口过剩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新秩序却提不出一项解决的办法。

在欧洲境外，款秩序对德国以前的贸易伙伴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据丰克和德国其他作家与演讲人说，新欧洲完全准备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不过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这样做。英国和美国对世界贸易的垄断必须予以打破，新欧洲拒绝再向“欧洲以外的任何团体强加给它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屈服”。欧洲愿意同个别国家进行贸易，但是将拒绝同任何一些联合起来的国家进行磋商。丰克说，“在同南美国家进行贸易时，我们不需要北美做中间人。德国要么在同主权国家自由缔约的基础上同南美各国进行贸易，要么干脆不同南美进行贸易。”另一方面，德国人的欧洲将拒绝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除非后者作为一个单独的单位。倘有需要，新欧洲将能够同外界贸易而存在下去，可是其他国家由于需要工业品，将被迫寻求同欧洲建立贸易关系。

可是，在改组欧洲的计划公布以前，德国在已经落入 171 它控制下的国家里采取的行动，最为清楚地表明了拟议中的新秩序的真正性质。1940 年夏天，海外国家和西欧国家可能还准备谛听德国人的导致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宏伟计划，可是奥地利人、捷克人和波兰人却已经在德国的统治下受苦受难了。

N0270.TXT/PGN>. 第二章 欧洲经济管制的结构

第一节 德国的经济管制

在欧洲的战时经济结构中，德国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德国连同并入它版图的土地，是最最强大的经济单位。不仅如此，至少在 1940 年后，确定轴心国统治下的全部欧洲生产因素的分配问题的，也只有德国所作的决定。执行这些决定所选择的方法，随着实施这些决定的地区以及当时的战争形势而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不论何时，最终目标却总是一样的，那就是，为德国，为德国的作战努力榨取最大的利益。

鉴于德国的地位既是新秩序的柱石，又是在它控制下的整个地区的中央政策的制订者，也鉴于选择了在欧洲其他地方贯彻德国意图的方法大半都是在德国本国使用的那些方法的扩充和修改，因此，在谈到德国企图在受它控制的国内改造生产时采用的手法之前，必须对上述那些方法先作一番叙述。

(一) 经济生活中的社团组织

自从纳粹党执政以后，尤其是 1936 年后，它始终推行着一种旨在使国家的经济为战争作好准备的政策。这样一种政策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所有部门实行全面的管制。为了促成这一点，纳粹党着手把劳动人口按照职业内容成立四大管理组织，每个组织根据“领袖”原则受到政府的严格管理。这四个组织是：全国农业协会、工商业公会、德国劳工阵线和德国文化协会。全国农业协会包括所有的农场主、农场主的家属、农场工人，以及农产品的第一道加工者和经销者；工商业公会吸收了所有的商人 172 和手工业者；劳工阵线则由各行各业的雇员组成，而所有的作家、艺术家等，以及报社、剧院和诸如此类的其他团体，则属于德国文化协会。由于所有这些组织的构成都非常相似，我们只要叙述一个组织——工商业公会的情况，也就够了。纳粹党人在取得政权和随后巩固政权时期，都曾不断寻求商人的合作，并曾强调指出后者从这样一种合作中会获得的好处。然而，好处决不只是单方面的，因为商界领袖愿意同政府合作一事，使经济管制工作大为简化，同时由于这些领袖们的知识、创造性和事业心全供政府使用，所以也提高了生产系统的效率。工业管制的整个基础就是建立在商人同政府合作的这种基石上的。

自发的工业组织在德国起源于十九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变得日益复杂。到 1933 年，德国的经济生活既在区域基础上又在业务基础上组织起来。区域单位是工商业公会和手工业公会，它们的职能是代表一个特定地区内所有工商业的共同利益。然而，更为重要的却是那些业务组织，因为所有从事于经济部门中的任何一项专门活动的人，都参加了这类组织。这个系统以七个全国性团体为首，分别代表工业、商业、银行业、保险业、公用事业、旅游业和手工业。这些全国性团体分成许多经济团体，它们又分成行业团体和行业小组。全国性团体中势力最大的是德国工业全国联合会，它于 1919 年由代表轻工业和代表重工业的两个全国性团体合并组成。矿业和制造业的所有独立的业务公会，都是全国联合会的会员。全国联合会为会员提供了许多服务项目，涉及经济政策、关税和进出口的问题，并对卡特尔的组成和发挥作用提供意见。

因此，在 1933 年德国存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组织系统，而且可以不遇到多少困难就置于有效的国家管制之下。区域和业务组织的原有结构大都保存下来，但是作了某些更改。在这些更改中，首先是实行了“领袖”原则。

商业组织中的高级职员过去一向是按正常的投票方法选举出来的，但是根据新的办法，各个全国性团体和公会的主管人员一概由经济部长任免，而较小团体的主管

人员则由全国性团体或公会的主管人员任命。另外，还实行了一项规定：凡是企业家必须既是业务组织又是区域组织的成员，从而保证了国家经济生活的指导工作是“遵照着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理论上讲，政府只要发布命令，由那些自治的工业组织去执行就是了。但是实际上，经济管制的制度并不是运行得十分顺利的，因为卡特尔自身的利益往往同全国性团体和公会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发生冲突。

（二）政府机构

在临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和以后的几年中，同生产管理有关的主要政府机构是：德国经济部、四年计划组织办公室、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战时经济与军备处，以及德国军备与军火生产部。

经济部是魏玛共和国的遗物，成立于1919年，到1933年权力有所扩大。它的职责包括对商业政策和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外汇管制等进行监督，并在一切经济问题上充当德国政府的顾问。正如上文已经提过的那样，经济部长还负责任命——必要时还罢免——全国性团体和公会的主管人员。1934年8月任命的部长是耶尔马·沙赫特，他在1933年3月已被重行任命为德国银行总裁，1935年5月又被任命为战时经济全权代表，一身兼任三职。

成立一个四年计划组织的意见始于1935年秋季德国发生粮食危机的时期，但是直到1936年10月18日希特勒下令任命戈林为四年计划总负责人时，才告实现。虽然这个组织的目标当时并未公布，但是后来知道，它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德国经济经得起危机的考验，并提供一种类似于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的经济事务最高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应能对国家的经济生活进行统一的领导，并且使它为战争作好准备。鉴于这项工作规模庞大，这个组织势必要同原有的机构，特别是同经济部发生冲突。在戈林就任这个职位后不久，他同沙赫特之间在应当执行的经济政策总方针上就发生了争论。这种争论到1937年11月以沙赫特辞去经济部长和战时经济全权代表的职务而告终。在沙赫特辞职以后，曾经作过一番努力试图消除由于同时存在两个职权大部分重叠的机构而自然产生的争执。戈林本人接管了经济部两个月，目的在于把四年计划组织的大部分职务合并进去，后者随后就只保留了一个小班子。据1938年2月新任命的经济部长和经济事务全权代表丰克说，这次改组的目的是，使“帝国元帅为他自己保得了在最最重要的决定性问题上指导和控制经济政策的大权，并发给我〔丰克〕相应的指示，但是这些指示的执行自然是操在经济部及其各个组织的手中”。尽管戈林在受审时曾经提到丰克对他的“无可非议的态度”，以区别于他同丰克的前任沙赫特的关系，可是对于经济计划责任的分工是否真的十分明确，似乎仍有一些疑问。

大战爆发前的那几年中，管理军备生产主要是军事当局的责任。1939年2月4日的命令把德国国防部改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于是国防部不复存在了。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下面，设了一个战时经济事务处，后来在1939年11月22日又改为战时经济与军备处，由托马斯将军主持。这个处的职权后来变得相当大，到1942年临近行政改组前的一段时期里，实际上负责了经济事务的军事方面。1942年，该处分成战时经济处和军备处，前者仍属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后者则改属军备与军火生产部。托马斯将军继续主持

以前的战时经济与军备处所分成的这两个部门，因此在某些职务方面仍然隶属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而在其他一些职务方面则改属施佩尔领导。战时经济与军备处下面的最重要的机构就是 1942 年改归施佩尔主持的部管辖的军备检查所。这些检查所按地区组织起来，遍及德国全部领土，后来还遍及占领下的全部欧洲。它们主管作战物资的生产、安排计划和订立合同。

在早期，对军备生产拥有一定权力的另一个人物就是战时经济全权代表。他的职责是协调各个民用经济部门，为战争作好准备。在沙赫特的领导下，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并组成过一个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有各个经济部门的代表，以及内政部、行政工作全权代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后来还有——而且是最最重要的一四年计划办公室的代表。可是在沙赫特辞职和丰克上任后，经济事务全权代表的职务便有名无实，真正的控制权掌握在四年计划组织总负责人的手里了。希特勒于 1939 年 12 月颁布了一道命令，正式变更了这种权限。战争的爆发并没有促使行政机构进行多大的改组，因为建立这种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万一发生这类战争时，可以提供一种指导经济事务的工具。在 1941—1942 年的冬季以前，没有进行任何重大的改变。从那时起，德国人才开始对闪电战的最后胜利提出了疑问，并认为需要有某种较为集中和有效的组织，以便为进行一场长期 176 战争提供足够数量的手段。1942 年春天，出现了两个新人物。一个是图林根州行政长官弗里茨·绍克尔，他成了四年计划组织结构内的劳动力分配全权代表；另一个是阿尔伯特·施佩尔，他在弗里茨·托特死后奉命继任军备与军火生产部长，以及托特生前所担任的各个职位。施佩尔所掌握的权力远比他的前任为大，因为当时对于这个职务的整个概念不同了。施佩尔说，“直到那个时候，希特勒都认为托特的主要活动是在建设方面，而这就是他要我接替托特的原因。……我一就职，立刻就看出，我的主要任务不是建设，而是强化军备。”然而，授予施佩尔的权力，仍然不足以使他对经济事务的军事部分进行全面的改组。一则，只有、陆军的军备部门归他管辖，海军和空军的军备部门当时仍分别由不同的机构管辖。再则，经济部长仍然掌管着皮革和纺织品之类对武装部队极为重要的基本物资的生产。

1942 年和 1943 年军事形势提出的日益增长的要求，在 1943 年秋季导致了行政方面的进一步改组，这一次改组较为大刀阔斧。已经不再能严格地区分施佩尔管辖下的经济事务的军事方面和丰克管辖下的民用方面了。必须给予这方面或是那方面以优先权。战争的种种意外情况使我们有必要进一步集中和统一战时经济的管制和组织，以便为了作战目的比以前更有效地使用德国人民的经济实力。将来，全部生产力和人力必须在更大的程度上和更广泛的范围内予以运用，以实现军备的增产。为此目的，德国的战时生产必须由一个机构根据统一的命令进行指挥。为了推行这项政策，1943 年 9 月 2 日公布了一项命令，授与施佩尔新的权力。根据这道命令，德国经济部长应负责制订总的经济政策，负责解决有关对外贸易的问题，负责供应居民消费品，以及负责为经济部门提供资金，但是管理生产的大权都授予了施佩尔，他从那时起就成为 177 德国经济生活中左右一切的人物。德国经济部长在原材料方面和工业生产与贸易方面的职权，将移交给德国军备与军人生产部长。鉴于德国军备与军人生产部长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他将拥有“德国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长”这一官衔。

第二节 负责在被占领国家内协调经济政策的德国机构

关于在被占领国家内应当奉行的经济政策的主要方针，也是由负责在德国本土作出类似决定的那些机构，即由四年计划办公室、军备与战时生产部、经济部、德国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处和粮食与农业部制订的。这些政策的日常执行工作，主要是交给地方当局——军事当局或是民政当局——去办理。德国通过的法令，通常并不总适用于被占领的国家，因此地方当局遇有必要，不得不颁布内容相似的法令，以使各项规定同德国实施的法令相一致。

事实上，德国各个中央机构和商业社团组织的许多部门都参加处理被占领国家的经济问题，低一级的协调工作就是通过这样实现的。此外，德国中央政府还设立了许多特别机构，专门处理被占领国家的事务。协调德国境内和被占领国家各地工业政策的最重要的机构是军备检查指挥所，对它们的管辖权 1942 年由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处移交给了军备与军火生产部。在所有那些拥有重要工业设施的被占领国家中，都成立了军备检查所，其职责是利用被占领国家的工业能力，监督作战物资的储存，控制为德国工作的商行，并在德军万一撤退时，监督重要物资和机器的转移。在成立军备检查所以前，战时经济与军备处所属的一些经济工作队和突击队先采取了一些预备性的措施。这类工作队是由受过各种经济任务专门训练的人员组成的，他们附属于军队的最高司令部，同战斗部队一起开进新征服的地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查明和保护重要物品和机器的供应，推动或恢复那些产品对于德国作战十分重要的工厂的生产。在占领区——以区别于合并区——另一项任务是把德国所需要的任何物品或机器安排停当，以便运往德国。这些任务的规模可以从 1940 年 5 月底发给当时驻扎在安特卫普的“J 经济工作队”的指示中看出，该指示说：它们的任务是，在其负责的地区内迅速而全面地了解缺乏和配给的物品（原料、半成品、石油等等）以及对国防至为重要的机器的情况，并对这些物资提出正确的统计报告。……此外，经济工作队还有责任准备，并根据集团军的命令，动手将缺乏和配给的物品、石油以及最重要的机器运走。这些任务就是经济工作队的专责。

辅助协调被占领国家内经济政策的其他机构，有设立在西方各被占领国家内协调德国采购工作的中央定货局，以及设在国外的各个德国商会。这些商会的设立，是为那些希望将活动范围扩大到被占领国家内的德国商行充当情报中心的。

第三节 德国在被占领国家内的经济管制工作

在德国占领下的所有国家中，并没有采用任何一致的管制机构。使用的特定管制方式主要取决于每一被占领国家在新秩序中最终将占有的政治地位。大致说来，它们可以分为三种主要方式：一种应用于依法已经并入德国或者最终可能预定要并入德国的地区；一种应用于 179 指定为“殖民地的”地区；最后一种则施行于西欧各被占领国家。后面的两种将在下文谈及，至于第一种，我们只要提一下它已经完全并入德国的行政机构，也就行了。

（一）德国直接进行经济管制的被占领国家

德国改组欧洲的长期计划，不仅准备把一些地区并入德国的版图，而且准备永远占领另一些地区，把它们或是作为附属地，或是作为进行殖民扩张的地区。在这些地区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占领下的苏联依法已被并入德国的地区（所谓 eingegliederte Gebiete）有：但泽—西普鲁士，瓦尔塔兰，欧本、马尔梅迪与莫雷斯纳。最终可能预定要并入的地区（即，由民政长官管辖的地区）有：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上卡尔尼奥拉、下

斯蒂里亚和比亚利斯托克。关于上述各地在宪法上地位的讨论，见上文，原著第 92—93 页。见上文，原著第 93—95 页。

领土和所谓波兰总督辖区——德国人对经济生活直接进行管制，以便使各该地区的经济同德国的经济相一致，并从德国的观点看来，保证各种生产因素能够最好地加以利用。在东南欧被占领区，尽管并未设想对它们永远加以占领，但其经济体制却被置于德国的直接管制之下。

虽然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都同样受到德国的直接控制，然而控制的程度却大不相同。例如，在保护国，仍有相当行政权力留给当地政府，而在占领下的苏联地区，整个政府机构实际上都遭到更换，甚至不重要的职位也由德国人担任。

（1）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

德国人在保护国建立了双重形式的行政管理。捷克人可以处理经济管制的大部分琐细工作，并负责——几乎毫无例外——执行各项经济措施，但是这一切都是在德国人的直接监督下，有时还在他们的直接管制下进行的。根据 1939 年 3 月 16 日那道法令的条款，保护国将是自主的和自治的，将“在保护国范围内同德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相一致的情况下，行使其主 180 权”。然而，德国保护长官可以“反对势将损害德国的各项措施，并在万一发生危险的情况下，颁布共同利益所需要的法令”。德国的权力还进一步获得加强，由于它控制/PGN0284.TXT/PGN>了运输和邮电系统，控制了保护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并把保护国纳入了德国的关税区。

德国在保护国内实行经济管制的主要机构，是德国军备与军火生产部（通过各个军备检查所进行工作）和德国国务部。前者管制军备生产，并从 1944 年起兼管消费品的工业生产；后者则是当地最为重要的机构，下面分设若干部门，其中有几个处理经济事务并监督自治的经济管理机构。此外，还有几个特派代表，管理煤、石油、机动车、机器之类的生产，他们直接向国务部长负责。隶属于德国行政机构下面的，是捷克的各个自治机构、经济与劳工部、农林部、财政部和最高物价管理局。所有这些机构不是由德国人主持，就是通过国务部长受到德国的指导和监督。

捷克工业中有许多部门通过军备与战时生产部的活动，通过玻璃业和制鞋业的超级卡特尔的组成，受到了德国的管制。德国人还按照本国的方式组成了强制性的社团组织，并且照例由居住在保护国的德国国民担任领导，从而保证了他们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控制。

（2）总督辖区

总督辖区的经济管制工作几乎全部由德国人负责。波兰人只受雇从事技术工作和纯属地方范围的工作。那里遵循的政策的主要方针，是由戈林以四年计划组织领导人的身分拟定的。为了执行这项政策，戈林任命总督汉斯·弗朗克为他的代表。弗朗克于 1940 年 1 月在总督辖区内成立了一个四年计划办公室，同一般行政机构完全分开。可是，当经济政策的主要方针确定以后，这个办公室就撤销了，它的职权移交给了中央机构内办理经济、粮食与农业、林业、财政的各个部门。181 监督军备生产的大权则通过军备检查所由德国军备与战时生产部执掌，同时还设立了一些办公室来管理所有主要原料和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工作。波兰以前的所有商会和同业公会不是解散，就是置于德国管制之下。1941 年 3 月，设立了一个经济事务总会，作为唯一的媒介，实业界就通过它同德国行政当局合作，来管理和计划生产并分配商品与

劳务。

(3) 东方占领区

行政人员从该地区的撤走和德国人认为当地人不可靠的决定，都被作为理由，用以拒绝给予东方占领区的居民任何形式的自治，并在以前的波罗的海国家内全部以德国人替代当地的官员，只有极少的例外。事实上，东方占领区是尽可能作为德国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治理的，结果出现的组织，其类型同德国本上所建立的非常相似。

东方占领区经济开发政策的主要方针，是由德国中央政府几个主要机构，尤其是四年计划组织、经济部和施佩尔领导的部，连同从一开始就起了重要作用的德国实业界的社团组织，一起制定的。在东方占领区，经济开发工作是由这些中央当局和地方政府共同组织的。至于军管地区，则由军事指挥官主持，他们麾下的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经济部门提出报告，并从该部门接受命令，最高统帅部的经济部门又同四年计划组织和德国的其他非军事机构保持密切联系。1942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在柏林设立了一个东方经济事务处，处理东方占领区内所有军管地区的经济事务。在文职人员管辖的地区，经济政策的实施由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所属的东方经济计划处负责，该处的处长同时又是经济部东方占领区经济事务司的领导人。由于东方经济事务司和东方经济计划处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同一批官员，军事当局和非军事当局之间因而建立起了十分密切的合作。

在东方占领区非军管地区和军管地区内，经济计划的日常执行工作是交给许多官办的垄断公司（东方公司）去办理的，这些公司把德国的中央机构、德国的社团组织和当地的行政机构的权力结合到了一起。由于把一些在垄断公司监督下展开工作的德国商行引入了东方占领区，私营的因素进一步有所增加，因此尽管经济体系在形式上是由德国政府管理的，德国的大商家却在当地左右一切。

(4) 巴尔干各国

德国在巴尔干占领区内采用的经济管制方法，同它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内所用的方法多少有点相似。德军占领后不久，当地就成立了一些傀儡政权，但是每一个傀儡政权都受到德国军事当局的严密监督。在希腊，对傀儡政府的监督，理论上是同意大利共同负责的，但是从一开头，所有主要的决定就都由德国作出。在塞尔维亚，德国一开头就独揽管制的大权。1943年意大利停战以后，原来在意大利控制下的那些巴尔干地区，也由德国军事当局予以接管。

巴尔干各国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对于德国战时经济极为重要，因此德国人选派了一些经济专家到该地区去担任最重要的职务。伊·格·法本公司以前的财政专家赫尔曼·诺伊巴赫尔于1941—1942年奉派担任驻希腊的特使，1943年又担任德国外交部驻巴尔干各国的特使，而塞尔维亚经济事务的管理权则交给了经济事务全权代表弗朗茨·诺伊豪森，他除这个职务外，还担任了许多重要的职务，如塞尔维亚银行联合会董事长和博尔矿区董事长。在塞尔维亚进行的管理，代表了德国在巴尔干各国实行经济管制的手法。在诺伊豪森领导下，他们使用了德国人员去监督当地的管理机构，在所有重要的商行中去代表德国的利益，甚至直接经管某些经济部门，尤其是重要的采矿公司和农产品的收购工作。事实上，凡是对德国战时经济稍具重要性的塞尔维亚经济活动，无不受到德国人的控制。

（二）德国间接进行经济管制的被占领国家

在德国既不打算永远并入版图又不打算当作殖民地的那些地区，趋势是尽可能把经济生活的日常管理工作留在当地行政机构的手里，同时保证德国能左右该地将要实行的经济政策的主要方针，并能控制那些对于德国的作战关系重大的经济部门。

这样一种间接管制的制度对于德国的好处是很大。弗朗茨·诺伊豪森从三十年代初期起就居住在南斯拉夫，先是作为德国旅行社的社长，后来作为纳粹党的正式代表和总领事。他曾积极地从事于德国人战前所推行的对巴尔于各国的经济渗透。他的首席经济顾问卡尔·格蒙德也是曾在南斯拉夫居住多年的德侨，并从1934年起同诺伊豪森一起在旅行社共事[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民政知识指南：德国渗入塞尔维亚的社团股份》（U, S.A., 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 Civil Affairs Information Guide, German Penetration of Corporate Holdings in Serbia），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4年版，第2页]。

这类地区是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法国（1942年11月起全部被占领），以及1943年9月以后的意大利北部。

的。随着德国统治的地区大为增多，精于行政工作和办理经济事务的后备人员严重地匮乏，而由于武装部队征召新兵入伍，枯竭的程度更形剧烈了。使用当地的行政人员和商人，除了节省德国的工作人员外，还有其他的好处。当地的官员熟悉当地的情况和方法，他们的合作有助于提高效率，并减轻那些担任监督职务的德国人的工作。同时，继续由有关各国的公民来行使行政权和企业管理权，也减少了战胜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可能产生的摩擦，假如战胜者明显地管制着日常工作的话。而且，取得合作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有少数人是纳粹党徒或是他们本国类似组织的成员，他们出于种种原因，准备同他们的德国征服者共命运。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多得多的出于迫不得已的经济原因，觉得至少进行某种程度不大的合作是他们可以采取的最好的途径。

设更有效的管制机构的主要方法是：按照德国本国那些自治组织的方针，在被占领国家内组成或扩大商业界的社团组织，但其职能纯然是咨询性质的。这项政策的成功程度大有不同，效果最好的是在荷兰——那里已经存在着这种发展的基础——和维希法国。

高踞在改组后的当地管理机构之上的，是德国的行政官员，他们在经济事务方面所负的责任，不论在军政府还是文官政府管辖下的地区，都相差不多。通常，德国的行政机构总是为了重复当地行政机构的高级部门而组成的。这两种机构之间总保持着十分密切的接触，它们的办公地点往往设在同一座建筑物内。除了行政机构高级部门的这种重叠性外，德国人还直接控制了某些在经济生活中占有战略地位的机构（例如，负责分配原料的机构）和一些半官方的机构（如国家银行等），向各该机构派去了德国顾问或专员。另外，还有一些直接控制商业企业的例子：德国人接管了犹太人、敌侨和列入黑名单的国民的产业，有时还接管了为德国人工作的企业。

在德国间接进行管制的地区，除了德国的中央行政机构之外，还有一些行使经济管理权的德国机构，它们通过战区办事处直接派有代表，其中有些隶属于地方当局，有些则是独立的。在独立的机构中，最重要的就是军备检查指挥所和设在维希法国的德国停战委员会。隶属于地方当局的，包括有四

年计划组织和德国信贷银行的代表。

185 第四节德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

德国对其他国家经济生活的影响，决不仅仅限于它在那里设有正式管制机构的国家。始终存在的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结合上大陆遭到封锁和德国控制住欧洲境内原料主要来源的情况，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能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整个欧洲大陆。有时候，由于在那些名义上至少不隶属于德国的独立国家中参与或拥有一些企业，因而这种影响更有所加强。

战事爆发前好几年，对东南欧国家的经济实行控制，一直是德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到 1939 年，德国通过缔结双边贸易协定、建立票据交换制度和其他种种措施，已经很顺利地不仅在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占了统治的地位，而且还在生产方面促使这些国家转而生产那些一旦打仗，可能对德国最为有用的商品，例如纺织纤维和油料种籽。战争的爆发和 1940 年夏季以后德国的敌人对欧洲大陆的封锁，大大地加强了德国同其邻国——不仅是东南欧各国，而且还有剩下的中立国家——进行通商谈判的地位。在某些主要的原料和制成品方面，德国和在它控制下的国家成了唯一的供应者。这方面最重要的实例大概就是燃煤了。在海外的供应被切断以后，德国，加上已并入它版图的那些国家，成了在燃煤的储存量方面远远超过本身需要的唯一国家。与此相反，象意大利、瑞典、瑞士这些国家，就完全或主要依靠进口。为了获得维持经济生活所必需的燃煤，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被迫提供德国为维持作战所需要的那类产品作为交换。

在卫星国，在纳粹扶植的所谓“独立”国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德国积极参与当地的企业，从而加强了通过操纵贸易关系而进行的控制。例如，在斯洛伐克，许多比较重要的工、商、金融企业都为德国人所拥有，而玻璃工业和水泥工业则由相应的德国卡特尔加以控制。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德国资本的渗入也很可观。的确，在轴心国出于军事上的原因派兵占领东南欧大部分地区前不久，德国对卫星国和“独立”国家控制的程度就已经几乎是全面的了。

第三章工业和原料

第一节 1939—1945 年德国工业发展的概况

(一) 大战爆发时的情况

在战争爆发前的好几年中，准备打仗一直是德国工业政策的目标。但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措施，以及备战所达到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希特勒和他的同伙对于未来战争所持的概念的支配。希特勒认为，他的目标可以通过外交攻势来达到，如果这不行的话，就通过采取各别的“警察”行动来达到。这些对手将无法抵抗德国的武力，而征服了它们，却会使德国的经济地位获得加强。他并不认为德网有任何真正的危险，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有任何危险会同世界上几个联合起来的大国发生冲突，从而被迫参加一场长期的战争。即使德国最后遭到几个大国联合起来的对抗，但靠了先前征服了的地区，德国届时也将处于坚韧不拔的地位。因此，未来的生产应大打折扣，以有利于当前的产量，凡是花费在不能立刻有产品的计划上的任何劳力和物资都应加以劝阻。在希特勒的顾问中，有许多人反对这种意见，其中最突出的是托马斯将军领导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司的成员，他们认为德国应作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尽管如此，上述只顾眼前的意见仍被接纳为德国政策的基础。

由于作出了这一决定，德国重整军备所采取的方式是，把制成的武器和军需品储备到据认为必要的数量，能供应军队进行短期战争即可，因为他们所设想的就是打几场短期战争。对奥地利和对捷克斯洛伐克进攻的胜利，为这种政策提供了似乎很正当的论据。两次进攻所花的代价都微不足道，而结果却使德国的经济潜力大为增加。

这种重整军备的方式是德国的经济能力可以应付裕 187 如的。靠了利用先前未曾使用的资源，纳粹党使总生产量有了增长，而由于新的投资计划中没有巨额开支，这种总产量便足以使民用消费或多或少维持不变，尽管军备生产增加了。工厂面积和机床都很充足，甚至在战争期间，几乎到处都普遍实行一班工作制。

设备方面，甚至物资方面的这种表面富裕现象，是和一套详细的管理制度同时并存的。这套制度虽然复杂，实施起来却并不十分有效。工业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是操在各个团体和公会的手里，后者则由经济部不很严格地加以监督。一般说来，每当出现特殊的问题时，总采取一些措施去应付，但是并没有一个负责使国家经济转入战时基础的协调机构。以钢为例来说，对于短期战争的信念，结合政治上不愿限制民用消费的这一心理，“在 1939 年造成了一种似乎很离奇的局面：钢可以拿去从事同作战努力很少或毫无关系的各种用途，可是却不拨给可以扩大（尽管要在几年以后）德国战争潜力的一些事业”。

从随后发生的长期战争看来，德国工业经济在战争爆发时的弱点是缺乏基本原料。除燃煤外，德国缺少维持高水平军备生产所需要的所有最重要的战略原料。在三十年代中，这些原料的主要供应来源——铁矿“砂和铁矾土除外——都在欧洲大陆之外，这一事实使德国的处境更糟。德国试图储备进口的原料，增加国内的供应来源，发展代用品，以改善这种局面。三十年代后期，德国设法大幅度增加战略物资的进口，但是增加的数量有不少势必被加强军备生产所用去了。而且总的说来，因为缺少外汇，进口额的增加比希望达到的数量还是少得多。

在发展国内供应来源方面，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实例就是，为开发萨尔茨吉特的低级铁矿砂而在该地区建立的赫尔曼·戈林工厂，以及在生产合成原料，主要是石油和橡胶方面。但是，由于希特勒不愿把物资和劳力花费在不能立刻带来成果的计划上，这些工作的进展全受到了阻碍。

上述这些措施预期只能使德国度过短暂的困难时期。他们另外还制订了一些计划，来保证德国重要原料的长期供应。这些计划就是征服那些至少能供应德国大部分需要的地区。德国准备用光它直接控制下的储存，因为它设想这些储存随后可以用它从被占领国家掠夺来的存货或是用它们国内的生产弥补起来。德国可以指望，它的大部分需要都可以从将来大概会落到它手里的那些地方得到补偿。欧洲大陆——除苏联外——据望可以满足它在铅和锌（南斯拉夫）、铁矾土（匈牙利、南斯拉夫和挪威）、铁矿砂（瑞典和洛林）、锑（南斯拉夫）、硫黄和黄铁矿砂（意大利和挪威）、汞（意大利）、亚麻（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大麻（南斯拉夫和意大利）、木材（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东南欧）等方面的需要。此外，罗马尼亚大概还能提供即使不很充足、却非常有用的石油。征服乌克兰和高加索将对德国的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保证德国可以拥有丰富的石油以及大量的镍和锰。这样，剩下的真正缺少的东西就只有铜、锡和橡胶了。在许多情况下，铜可以用别的矿物去代替，而且西欧国家还有着大量的储备。至于锡和橡胶，它们的供应仍然取决于能否保持同远东的贸易路线畅通无阻。

（二）战争的头几年

在战争的头两年中，德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增长。闪电战术不仅对第一个受到攻击的国家波兰，而且更为惊人的，对挪威、法国和低地国家，一律都很成功。征服波兰，使德国控制了上西里西亚整个工业区。挪威战役的成功，除了使德国能从挪威本土得到重要的战略原料来源外，还减少了瑞典同西方盟国的接触，保证了瑞典的铁矿砂可以继续供应德国，这种铁矿砂由于含铁量高而很有价值。占领西欧和征服维希法国，不仅使这些国家的庞大的工业能力可以供德国使用，而且还带来非常重要的原料贮存（尤其是铜），以增加德国的很不充足的储备。在东方，德国控制的地区也在迅速扩大。南斯拉夫的被征服，以及它随后的被肢解，把更多的战略原料资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博尔的铜矿——置于德国的支配之下，同时卫星国家对德国阿谀逢迎的程度也增加了。最重要的是，在俄国初步获得成功，使德国认为，它对原料的担忧可能就要过去了。尼科波尔及其蕴藏丰富的锰矿，已经牢牢地掌握在德国人手里，而高加索也在罗斯托夫德军的攻击范围之内。德国到处都在挺进。虽然在这个阶段扩大经济基础，从而“深入地”重整军备，仍然是可能的，但是在德国人看来，原有的工业能力已经完全足以应付对它可能提出的要求了。的确，在法国沦陷和进攻俄国之间的那段时期，是一种“和平式的战时经济”时期。在这时期，民用生产几乎保持不变。甚至在入侵俄国以后，他们仍旧让军备生产减少，认为已经储存的武器和军火将足以应付武装部队在对苏战争中的需要，因为德国人坚信对苏战争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顺利地结束

（三）闪电战时期的结束

闪电战策略可能并不是到处都能成功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1941—1942年冬天在俄国遭到挫折的时候。德国对于武装部队所需要的装备数量的估计

不得不仓促加以修改，军备生产下降的趋势也不得不扭转过来。但是德国人决没有放弃他们对闪电战最后获得成功的信心。在 1942 年头几个月俄国人展开反攻以后，德国人又发动了夏季攻势，结果德军占领了高加索的大片地区，尤其是迈科普油田。德国终于占有了俄国的许多产油区，只需要花时间把俄国人撤退时造成的破坏予以修复。在国内，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保证作战物资的增产，但 190 是政府认为并不需要对德国的经济结构进行任何影响深远的改变。

促成军备增产的任务交由阿尔伯特·施佩尔负责，他于 1942 年 2 月弗里茨·托特死后被任命为军备与军火生产部长。但是施佩尔的任务仅限于监督军备生产，而且即使在这方面，也并非完全由他负责。这件事情表明：当时并未打算立足于战争对经济进行彻底改组。工业仍旧由经济部领导下的工商业团体进行全面的、效率不那么高的管理，而原料的分配工作主要仍然是经济部长丰克及其属下的各个机构的职责。

在这种背景下，施佩尔设法把军备生产在 1942 年 2 月至 7 月间提高了大约百分之五十五。在缺乏任何经济改组计划的情况下，促成这项增产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高工业本身的效率。施佩尔企图用职责范围规定得比较狭窄的、较小的机构，代替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全面管制，从而提高效率。这些新的机构就是所谓主要委员会(Hauptausschüsse)和工业瑞恩(Industrieringe)。对所有关于德国未能开采高加索油田的经过，见 A·E·冈瑟：“1034—1945 年德国夺取欧洲原油之战”(A. E. Gunther: The German War for crude oil in Europe 1934—1945)，第 7 章：远征高加索〔《石油时报》(Petrol Times)，1948 年 1 月 31 日，第 113—121 页〕。

见上文，原著第 176—177 页。

见上文，原著第 176 页。

《战略轰炸的影响》，第 7 页。

较重要的成批生产的作战物资，如军火、飞机发动机、机动车等，都成立有主要委员会，它们只负责管理制成品。另一方面，工业瑞恩则负责不止一种军备成品的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半成品和附件，并且各别负责管理电工产品、有色金属、工业玻璃、陶瓷制品这类东西。主要委员会和工业瑞恩又进一步分成许多更小的组织，它们的任务甚至更加专门。例如，管理机动车的主要委员会就分成十六个专门委员会，管理摩托车、轻重卡车、牵引车和汽车修理等业务，这些专门委员会本身又分成更小的工作委员会。工业瑞恩则分成专门瑞恩，然后再分成工作瑞恩。所有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全是技术专家、工程师和工程技术人员。由于这些专家中有许多人既是委员会又是瑞恩的成员，因此两者之间取得了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团体的任务是保证在整个军备工业中采用最最有效的生产方法，简化生产设计，提高各个工厂的专业化程度，并且普遍减低材料和劳力的耗费。

1942 年全年中，军备生产继续急剧增长，而在 1940 年和 1941 年一直多少保持稳定的民用消费，这时却减少了很多。

时不算外，它到处都在展开攻势，它有大部分欧洲大陆的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可供使用，同时它还从被占领各国夺取的宝贵的原料储存中继续获得好处。

(四) 德国工业政策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

如果说对闪电战术的绝对可靠性是在 1941—1942 年的那个冬天首次发

生怀疑的，那么在斯大林格勒的溃败就彻底表明了这种战术并不能赢得战争。希特勒所不相信而德国最高统帅部却希望对此有所准备的那场长期的、代价昂贵的消耗战，已经成为现实。德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因为它再也不能指望取得一系列轻易而丰富的收获了。这种收获德国在战争初期曾经赢过，它对于加强德国的作战努力曾经起过许多作用。也许最糟的是，德国已经失掉在不久的将来夺取高加索油井的一切希望了。

德国对其经济政策不得不作出某种根本的改变。对军备的需要比战争中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而且这种需要完全有可能将持续一个很长时期，如果不是有所增加的话。但这时已经错过了扩大经济的工业基础的机会。对军备的需要是迫切而紧急的，无论人力或物力这时都不能花费在不会立即有产品的计划上。德国继续沿着用原有的能力提高作战物资生产的这条道路走下去，这时是迫于形势，而不仅仅出于自己的选择。他们终于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单一的机构来领导整个德国的战时经济了。

1943年9月，施佩尔被任命为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长，他不仅有权管理全国经济的军事部门，还有权管理全国经济的民用部门。

鉴于不可能把已经不足的资源花费在一些最终可能 92 会使经济的生产能力增加的重要计划上，提高军备生产的唯一方法就是减少民用商品的产量和加强利用可用的生产因素。在第一个方面，施佩尔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事实上，民用消费指数只从 1942 年的八十一·五下降到 1943 年的八十·二（以 1939 年为一百）。其中一个原因是，减少民用开支的措施很不得人心，希特勒和各地行政长官由于害怕失去人心，没有能支持这些措施，所以就连在斯大林格勒这场灾难以后，这些措施还是不起作用。可是，施佩尔在这方面失败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盟国对德国境内目标的空袭日益猛烈，结果毁坏了为数浩大的消费品，这些消费品至少有一部分不得不予以更换。因此，军备增产的主要部分就不得不通过合理化措施和利用可用的能力来实现了。施佩尔就是把精力集中在这一点上。靠了把仍然留在德国的、储存的工具和设备全部用于生产上，靠了无情地关闭许多不从事重要军工生产的工厂，靠了增加采用专业分工，靠了终于建立起某种全面规划的制度，施佩尔设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尽管投在德国的炸弹重量与日俱增，1943 年的军备生产平均却比 1942 年高出百分之五十六，比 1941 年高出两倍军备生产的扩大工作一直维持到 1944 年下半年。施佩尔在纽伦堡受审时，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如下的叙述：直到那时（1944 年秋季），尽管空袭轰炸，我都成功地使生产不断上升。如果我可以用来表示的话，这一增产是如此之大，以致到 1944 年我可以全部重新装备一百三十个步兵师和四十个装甲师。这包括二百万人的新装备。如果不是因为空袭轰炸，这个数字还会高出百分之三十。我们在整个战争时期，军火生产达到顶点是在 1944 年 8 月，飞机生产是在 1944 年 9 月，大炮和新式潜水艇则是在 1944 年 12 月。

但是早在德国军备生产达到顶点以前，经济最后崩 193 溃的迹象就已经出现了。从施佩尔就任军备与军人生产部长以后，他的努力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可是这时原料的缺乏正妨碍着进一步有效地调动劳力和设备。德国控制的地方正在不断减少，这不仅意味着丧失了生产能力，而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丧失了原料的重要来源。空袭在阻碍德国作战方面也开始了日益重要的《战略轰炸的影响》，第 26 页。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16 卷，第 484 页。

作用。从 1944 年 5 月起，盟军飞机对德国石油资源进行了猛烈的、持续的袭击，德国可用的燃料量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从而使正在生产出来的新式坦克和喷气飞机无法使用。到 1944 年秋天，对一切有关的人来说，从经济观点看来，这场战事显然已经不能再进行多久了。在 1944 年 11 月 11 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施佩尔写道：根据德国经济的整个结构来看，来因兰—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区的遭到破坏，从长远来说，对于整个德国经济和成功地继续作战，将是不堪忍受的。事实上，鲁尔区——除了在该区制造的产品以外——目前对德国经济完全是一个损失。

到 1945 年春初，局势变得不可收拾了。〔施佩尔在 3 月 15 日写报告给希特勒说〕所以，我们必须确切地估计到，德国的经济将在四到八个星期之内彻底崩溃。到那时军备的产量既不能保证，铁路和海运也无法承担起派给它们的运输任务——营业性运输可能不在此例。在这一崩溃之后，就军事意义而言，战争也不能再进行下去了。

接着，德国在 5 月 7 日向西方盟国和俄国无条件投降了。第二节德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政策关于德国改组欧洲经济的长期计划，上文已经叙述过了。按照这个计划，德国将成为欧洲大陆的工业中心，周围是一批组织起来供应它所缺少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国家。可是战争的需要使这些计划不得不作了某些修改。最重要的短期目标是使战事胜利结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新秩序中包含的许多应加考虑的思想问题¹⁹⁴都被置于次要地位。如果被它占领和统治的国家的工业能力能够被有效地用来促进德国的战争目的，那里的生产就维持原状，有时甚至还有所增加。但是德国统治下的欧洲的工业生产被看作是完全从属于德国的生产，并为其作补充的。鉴于许多被占领国家的工业化性质，鉴于原料的缺乏，鉴于德国对战争需要的有限概念——至少在战争初期是如此——也鉴于德国对维持被占领国家的生活水平漠不关心，生产力过剩必然会出现，而德国则决定，必要的削减应在被它占领和统治的国家的经济领域内，而不是在德国的经济领域内进行。德国在劳力、原料、机器方面所感到的任何不足，都将尽量依靠把这些生产因素从别的国家转移到德国来加以弥补。获准在被占领国家继续存在的生产部门，几乎完全是根据德国的战争需要来决定的。因此，军备的产量以及德国所需要的那些原料的产量，只要可能，都增加了，而纺织品、玻璃器皿和德国够用的原料的产量，则听任其下降。例如，在比利时，从总数为二千一百六十四家的纺织企业中，就有一千三百六十家在德国占领期间关闭了。尽管在战争时期德国不得不把那项将工业集中在德国境内的长期计划暂时搁置起来，但是在制订德国对它控制下的欧洲各个不同地区的工业政策时，应加考虑的思想问题并未完全遭到忽视。在相继受它统治的国家中，最初采取的措施全都十分相似。附属于战斗部队的经济突击队到处负责恢复重要的生产和公用事业，负责保护储存的重要原料、半成品和制成品。但是在许多情况下，雷同之处就到此为止。在随后处理各个被占领国家的工业问题上，可以区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已经并入德国或者预定将并入德国的地方，如阿尔萨斯—洛林、卢森堡、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波兰的上西里西亚和奥地利；第二类是被当作“殖民地”的地方，如波兰总督辖区、波罗的海国家和占领下的苏联领土；第三类是西欧被占领国家，加上维希法国。

已经并入德国或预定将并入德国的地区，主要是重工业区，它们的

工业产品对于德国的作战具有直接的重要性，而为了实现使德国成为欧洲工业中心这一长期计划，把这些重工业区并入德国版图也是必要的。德国对这些地方的政策是，把它们完全并入德国的工业体系，因此其他被占领国家所遭到的大规模掠夺，它们大多得以幸免。戈林于 1946 年 3 月 14 日在纽伦堡受审之际、对德国在合并区推行的政策作了个说明，他当时概述了德军进占捷克斯洛伐克后所采取的步骤：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发生过没收产业的事，也就是说，始终没有把经济货物拿走。相反，捷克斯洛伐克的巨大而充沛的经济能力同德国的经济能力完全配合一致。这就是说，我们特别重视这一事实：既然我们已经宣布成立保护国，从而结束了一场战事，那么，什科达工厂和布尔诺军备厂——这是很重要的兵工厂——自然应该包括在德国的军备潜力之内。这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定货单暂时给送到了那里。此外，我们甚至在那里建立了新工业，并在这方面给予支持。……在保护国成立后，保护国的全部经济能力自然就同德国的全部经济能力合并到一起了。在战争期间成为大力发展工业的对象的另一个地区，是上西里西亚（属于德国的部分和以前属于波兰的部分全，合成石油厂建造了起来，重型工程和军备的生产能力全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因此在俄国人征服该地区时，它已成为整个德国东部和对俄前线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了。

德国对于“殖民”地区工业的政策则大不相同。1939 年 10 月 19 日，戈林发布了一道关于在波兰各个地区所应采取的政策指令，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处理各个行政区域的经济事务的目的，按照该区域在政治上将并入德意志帝国，或者仅成为总督辖区——它大致不会并入德意志帝国——而有所不同。在提到的前一类地区中，经济的重建与扩展，生产与供应的维护，都必须予以促进，目的在于尽快将其完全并入德国的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在总督辖区，凡是能够用于德国战时经济的原料、废铁、机器等等，都必须从该地运走。对于维持居民仅足糊口的低生活水平并非绝对必要的企业，必须迁移到德国去，除非这样迁移要花费上异乎寻常的长时间，因而不如在工厂原来所在地完成德国的定货更为实际。

上西里西亚在战争末期的重要性，可以从 1944 年 12 月 15 日施佩尔呈给希特勒的一份备忘录中看出。该备忘录说，由于上西里西亚军备生产的重要性，那个地方的失陷将使战斗在仅仅几星期之后就无法进行下去（《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16 卷，第 491 页）。

同上书，第 36 卷，第 482 页（410—EC）；英译文载《文件，1939—1946 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 2 卷：《希特勒的欧洲》，第 242 页；参阅《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7 卷，第 467 页。

在整个德国占领期间，德国以东各被占领国家的工业仅限于取得、加工和运输原料，限于生产那些为维持行政机构和供应武装部队所必需的商品，限于生产军备。以及供应当地居民最低的生活需要。关于这一点，有许多文件可以为证，其中有一份是最高统帅部军备采购局的联络参谋处于 1941 年 11 月 25 日提出的关于在东方占领区所应采取的经济政策的一般原则的报告，该报告说：

东方占领区的生产只有在下列这种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应予以考虑：

（1）为了减少运输量（即制成钢块或铝块前的生产工序），（2）为了照管在该地区进行紧急修理的需要，（3）为了在战时利用军工部门的全部设备。

剩下来尚待决定的是：鉴于欧洲工业能力的负担已经过重，卡车和拖拉机的生产在战争期间可以考虑恢复到何种程度。

不准在东方占领区发展相当规模的消费品和制成品的工业。加工处理东方占领区出产的原料和半成品，并且照管这些东方地区——它们将象殖民地那样遭到掠夺——对工业消费品的最为迫切的需要，以及它们的生产资料，凡此都是欧洲工业，尤其是德国工业的任务。德国对西欧被占领国家的工业政策，多少介乎它在合并区和“殖民”地区所采取的两种政策之间。西欧国家工业化的程度比德国以东各国要高出许多，但是另一方面，就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来说，德国并没有计划把它们全部并入版图。德国在西线发动的进攻得手以后，接着就 197 是一个大肆掠夺储存的商品和设备的时期，不过这只延续到 1940 年夏天和初秋。这一时期的目标，从下面这段有关法国的叙述中就显示出来了：“任务主要是收集战利品。在这一阶段，有关陆战的海牙法规的法律概念，还没有严格地获得遵守。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没收或通过以其微小的代价收购，从法国得到对德国军备有用的物资”。

可是，早在 1940 年 9 月，德国人已经看清楚，至少使用一部分西欧的庞大工业资源是有好处的，他们于是以一个利用原有的工业能力来进行剥削的阶段替代了掠夺的阶段。9 月 14 日，陆军军械部门向其下属机构发出了下列指示：我极其重视下述提议，即西方占领区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工厂，应尽可能加以利用，以减轻对德国军备生产的压力并增加战争的潜力。丹麦境内的企业也将日益用以承关于西欧已经并入或打算并入德国的地方，见上文，原著第 91—92 页。

《1940 年 10 月 1 日至 1941 年 12 月 31 日驻法德军战时经济与军备机构史》
(The History of the War Fuconomy and Armainent Staff in France from October 1, 1940 to December 31, 1941), 第 2 卷(引言), 转引自《纳粹的阴谋与侵略》, 第 7 卷, 第 482 页(422—EC)。

做转包工作。然而，工业生产只可以在德国的需要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倘若一门工业的产品对于德国的作战并不重要，或者倘若原料缺乏，那么生产就被大力削减，即便不是全部停止的话。机器，如果发觉有用的话，就披运到德国去，劳工也被送往被占领国家的军事工业中去为“托特协会”工作，或者被送往德国本土。在那些被允许继续生产的工业中，有很高百分比的产品是保留给德国的。下列的法国官方数字，显示出德国在那里征敛的范围：征集的原料对法国产量的百分比为：燃煤，百分之二十九；电力，百分之二十二；石油和汽车燃料，百分之八十；铁矿砂，百分之七十四；钢材（粗钢和半成品），百分之五十一；铜，百分之七十五；铅，百分之四十三，锌，百分之三十八；锡，百分之六十七，镍，百分之六十四；汞，百分之五十；铂，百分之七十六；铁矾土，百分之四十；铝，百分之七十五；镁，百分之一百；碳酸硫，百分之八十；工业用肥皂，百分之六十七；菜油，百分之四十；碳溶胶，百分之一 198 百；橡胶，百分之三十八；纸张和硬纸板，百分之十六；羊毛，百分之五十九；棉花，百分之五十三；亚麻，百分之六千五；皮革，百分之六十七；水泥，百分之五十五；石灰，百赫德勒中校的一份题为《经济方向的转变》(Lieut. Colonel Hedler, Change in Economic Direction) 的报告的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6 卷，第 2 页）。

分之二十；丙酮，百分之二十一。

这一发展，他说：

那时〔1943年夏天〕，我已经制订出下面这项计划。德国有一大部分工业当时都在生产所谓消费品。举例而言，消费品就是供武装部队和民用需要的鞋、衣着、家具和其他必不可少的物品。可是，在西方占领区内，供应这些产品的工业却由于缺少原料而空闲着。然而它们是具有很大潜力的。在实施这项计划时，我就不把德国生产的原料，例如合成羊毛，供给德国工业使用，而把它们送到西方。因此，久而久之，那个地方就又有了一百万名工人可以有工作做，而我这样也搞到一百万名德国工人来从事军备生产。……通过这项计划，我可以为了生产军备而在德国关闭掉整片整片的工厂。这样，我不仅使工人，而且也使厂房面积和管理人员都空了出来。我还节省了电力和运输。

第三节德国控制全欧洲工业的方法德国通过种种不同的方法能够不仅在受它直接控制 199 的国家里，而且在同它结盟的国家里指导工业生产。在较小的程度上，它甚至还能影响中立国家的生产。在每种情况下，采用的方法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重要的是：每一国预计将在新秩序中占有的地位，从当地工业家可能取得的有效合作，以及某些工业部门对于德国战时经济的重要性。大体说来，德国指导工业生产的方法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控制生产因素，第二类是在当地人管理下使用当地的实业为德国工作；第三类是由德国在财政上或管理上对盟国或被占领国家工业进行直接控制。不论采用什么方法，结果总是一样的，即：由德国全面控制了被占领国和盟国的工业。

对被占领同原料和燃料的分配，德国的控制是全面的。在直接没收或限制使用储存的战略物资以后，接下去就采用了一种同德国本上实行的制度类似的严格管理制度。重要原料的买卖和加工都需要有特别许可证，同时还设立了专门机构来指导分配工作。这些机构主要采取了商品管理所的形式，由军事当局设立，每种重要物资设立一所。1940年颁布的一道“关于政府管制工业品的法令（政府管制法令）”说明了这些机构的职责。商品管理所有责任在集团军下达的指示范围内，对生产、经营或使用管制商品的企业，颁发一般条例〔或〕各别法令，用以管理生产，并规定公正的分配和合理的使用，工作场所则应尽可能安全。

集团军和商品管理所得以在颁发给它们的指示的范围内，就采购、分配、贮存、销售、使用和通知等事项作出决定。特别是：

（1）通过管理，对于向某些顾客出售商品或是从某些供应厂商采购商品，予以控制。

（2）禁止或要求把原料或半成品制成某种半成品或制成品。

（3）使商品的销售或采购，在原则上或者在细节上，都取决于它们的同意。在西欧各被占领国内，一旦能制订出一种令人满意的合作形式，这些商品管理所的职权立即就移交给了当地的机构。这些机构在德国人的严密监督和指导下进行工作，并且负责按照计划分配原料。这些计划是在当地展开工作的德国机构为它们拟定的，而各该德国机构则又负责使这些计划同德国本身的计划合成一个整体。就有些商品而言——例如，铁和钢——管理机构本身就并在德国的分配体系中，它们在被占领国家中实行的分配也是根据同德国颁发的钢铁证明书类似的证件进行的。

在被占领国家内建立起严格的管理制度，结合上德国对国际贸易的全面

控制，使德国可以保证将稀少的原料只供给生产那些对德国作战关系重大的商品的工厂。德国对其控制下的欧洲的国际贸易所进行的监督，使德国对于盟国和中立国的原料供应具有几乎同样强大的影响，因为所有这些国家至少在某些必需的原料上要依赖进口。

德国控制原料分配的能力，是迫使西欧许多工厂集 PGN0316.TXT/PGN>中全力为德国生产商品的原因之一，尽管这些工厂仍由战前的业主管理。由德国人看来，这种控制方式有许多优点：它一方面可以节省德国的工作人员，另一方面，对被占领国家的实业家们所能进行的威胁利诱，也使这种控制十分有效。对当地的商人施加压力的可能性确实非常大。从积极方面来说，德国人利用他们以占领费用、未结算的票据交换债务等等形式从被占领国家搜括到的巨额款项，出得起最最诱人的高价来购买提供给他们物品，因为归根到底，这笔费用毕竟不是由德国，而是由有关国家来负担的。同时，他们还能够供应原料，而没有原料，生产就无法维持，企业家和雇员也就无法维持生计。从消极方面来说，德国人可以用拆除工厂，没收不用的机器，以及把工人送往德国，进行威胁。因此有许多实业家，不管他们政治上赞成谁，都觉得自己被迫非遵照德国的要求行事不可。

德国人于是着手把整个转包合同的业务协调起来，使之效率更高。为了防止德国各个不同的机构争向被占领国家的工厂定货，并使德国的私营商行有较多的机会参与其事，便设立了一些中央定货局来协调在西欧的采购活动。凡交易额超过五千马克的合同，必须向这些定 201 货局呈报，如果不去呈报，那就意味着不得将原料分配给有关商行。尽管这些定货局无权管理，但是由于位居中枢，它们却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到了战争后期，这些局的职权大部分由德国军备与战时生产部接过去了，后者：从德国派出专家代表团到被占领国家，甚至盟国去，就组织生产的问题充当顾问，并设立机构来监督德国本国制造的军械所用的零件和附件的生产。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德国人并不满足于仅仅进行间接的控制。的确，德国公然叫嚣的战争目标之一，是德国应当加强它对外国工业的控制。甚至在战前，德国的商行就已经从事于渗入欧洲工业的活动，特别是在东南欧，而战争的爆发和随后德国控制的领土的扩张，更大大方便了这项计划的实现。

德国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加强德国对外国企业的影响。现在还看不出，和约是否会涉及股份过户等问题，以及和约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但是现在应当抓住一切机会，使德国经济甚至在战时也有可能从被占领国家获得重要的物资，并防止有任何会使上述目标比较难以达到的措施。都灵一个工人在报告中说：“我的工厂，象所有别的工厂一样，有德国技术人员，一切重要的事情都由他们来决定。……德国技术人员发布命令。”〔伦敦盟国情报委员会：《德国资本的渗入欧洲》（Inter - Allied Information Committee, London: The Penetration of German Capital into Europe），占领区的情况，5，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2年版，第31页〕1940年8月2日戈林写给驻荷兰和驻挪威的德国专员以及驻比利时的德军司令官的信件〔《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310—311页（137—EC）；订正的译文教《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5—36页〕。

于是德国工业便开始大大扩张其参预程度。在整个欧洲，德国政府机构、

德国银行和私营商行通力合作，对越来越多的外国商行取得了控制，它们所用的方法，从不付代价或赔偿公开没收产业到所谓“正常的”金融措施，各各不同。直接渗入的程度，一国和另一国也大不相同，在东欧合并区和被占领国家内，甚至在东南欧的某些卫星国家内，都比在西方占领区内要全面得多。

控制外国企业的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立即没收，或 202 在战争期间暂行代管。暂行代管虽然在理论上只限制厂主处理其产业的权利，并不取消其所有权，但是实际上却等于没收，因为厂主通常不能参预公司的管理或参预分红，他们收回产业的唯一希望是寄托在占领国的战败上。

没收工作进行得最普遍的地方是在苏联。德国政府在那里宣布自己是苏维埃国家的继承者，从而是所有国家财产的主人。根据最初的几道法令，德国专员在各自的地区内承担起民政管理的职责，这些法令宣称：“德国的民政机构对……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公共团体、协会、附属机构的动产和不动产连同所有的债权、股份、权利、利益按照它们在 1941 年 6 月 20 日的情况，予以接收”。被接收的产业不仅包括苏维埃国家的产业，而且包括共产党和所有其他政治团体的产业。这宗产业被接收以后，就交由德国专员任命（必要时也由德国专员罢免）的托管人员管理。经济方面的总的指导工作，则委托给一系列官办的垄断公司（东方公司）去办理，这些公司是由德国的中央计划当局会同作为德国中央当局代理人的德国企业的社团组织创办的。个别的德国商行也被吸收入这个结构，以执行官方规定的工商业任务。1942 年 9 月，由于采用了“专利商行”的方法，这些商行的地位完全得到了承认。这些商行是德国的工业企业，东方占领区的商行就在托管的基础上交给它们管理。德国商行将委派经理和技术人员，并投入机器、工具和物资。开头，它们是为“适当的报酬”而工作的，但是工作效率较高的商行随后便获准租下它们拥有托管权的那些工厂，并且得到暗示，战后它们可以获准立即把那些工厂收买下来。在这些专利商行中，著名的有这几家重要的德国企业：赫尔曼·戈林工厂、曼纳斯曼和西门子。

在波罗的海国家里，德国人采取了大体相同的步骤，虽然在接收产业上，有两种例外。一种是手工业、小工业 203 企业和零售商店，它们可以仍归本国业主所有，只要这些业主为人诚实，业务上也可靠的活。另一种是农林企业。作出这项决定的原因是，苏联在该地区推行国有化的程度使德国尚不可能采用托管的方法，同时这些经济部门也没有一个有利可图到足以吸引德国私营企业的地步。可是，除了这些次要的例外，德同人尽管大吹大擂，说要把俄国人收归国有的产业发还原主，却没有作过什么努力去把这一计划付诸实行。

在总督辖区、南斯拉夫、波兰的合并区、阿尔萨斯—洛林和卢森堡，他们也进行了广泛的没收和代管。例如，在总督辖区，1939 年 11 月 15 日的一道法令规定没收前波兰国家的产业，而在波兰合并区，一家德国公司——东方信托股份有限总公司——专门成立起来，无偿地夺取波兰人的产业，再把这些产业三文不值二文地“卖”给德国人。

在所有沦入德国控制下的地区，犹太人、敌国国民和那些据认为继续拥有产业将不利于实现德国目标的人的产业，都由德国接管。由于对这些条款所作的解释漫无限制，德国人可以拥有的产业便大大地增加了。例如，一个企业被认为是属于犹太人的，倘使其业主或承租人是：

(1) 犹太人, 或 (2) 同一个犹太股东合伙, (3) 有限合伙关系, 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股东是犹太人, 或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股份为犹太股东所有, 或其中的经理是犹太人或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是犹太人, 或 (4) 法人团体中的董事长或经理是犹太人, 或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是犹太人。对德国敌人的产业采取行动的范围也同样漫无限制。例 204 如, 赛斯-英夸特于 1940 年 7 月 4 日对被占领的荷兰领土颁布的一道法令, 就包含有下面这一段话: “凡是曾经帮助或正在帮助, 或者据认为将要帮助反对德国人和反对德国的活动的个人或团体, 其产业可以全部或部分予以没收。”

在控制了工业企业以后, 德国人着手任命一些在执行他们的指示方面可以绝对信任的经理。不过对不曾没收的企业也指派了一些督察。这些企业是德国人认为管理不善, 管理工作不合格, 或者据认为对德国的作战关系十分重大的。委派的专员 (Betriebsbevollmchtigte) 不是定居在被占领国的德国侨民, 就是加入纳粹组织的当地人, 再不然就是从德国去的德国人。他们通常从事于工业企业的一般监督工作, 而不负责日常的管理工作, 可是他们能够获悉业务情况、工艺秘密、生产计划等等。1940 年 2 月 1 日, 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德军司令官发布的一道命令说明了这类专员的任命和权力, 第一节 1. 为了保护工业生产, 军事司令官或由其授权的机构得向工厂委派专员。这些专员只能是个别的人。他们可以随时被召回。2. 专员向委派他们的机构领取委任状及有关任务的指令, 并有责任认真执行任务和保守秘密。

第二节 1. 专员必须负责使他管理的工厂开工或生产, 以便按照计划执行命令, 以及采取一切措施提高工厂的生产力。2. 专员还必须对外人的参观作出决定。

第三节 1. 专员的活动不得影响业务管理部门负责的管理工作和陈述意见的权利。但是业务管理部门必须听候专员检查工厂和业务活动以及业务记录, 必须提供所需要的一切情况, 并必须遵照专员在其职责范围内所作的指示。专员有权参加一切业务会议和厂经理的会议。

2. 专员无权充作厂方的代表。

205 第四节委派专员所支出的一切费用一律由厂方负担, 但委派当局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付给专员的报酬由委派当局予以规定。德国对欧洲工业的控制, 通过一些可以说是比较“正常的”方法进一步有所扩大。这些方法是: 在外国企业中获得股份以抵偿付款; 巧妙地运用少数股权; 创办混合公司; 以及设置分支工厂和机构。但是, 尽管所用的方法表面上可能同正常的商业惯例很相似, 结果却一点也不正常, 因为德国充分利用了它的统治地位来达到它的野心, 根本没有履行它的义务。这些“正常的”方法主要用于西部占领区和东南欧的盟国, 因为德国人那里大体上宁愿使用其他的方法去取得工业企业的所有权, 而不愿使用没收和接管的方法。

德国资本在外国投资的范围, 不论在购买原有的股份方面, 或是在增资以便获得控制权方面, 一国和另一国都大不相同。例如, 在丹麦, 德国人就没有投入多少资本, 而在荷兰, 可能由于取消了汇兑的障碍, 资本的渗入就很可观。在东南欧, 德国的国外资产有了重大的扩张。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资本有相当数量是投在这个地区的, 德国人认为占领西欧是使他们可以接过其他西方国家原先把持的地位的机会, 并使他们可以巩固他们对一片向来很感兴趣的地区的控制。在所有被占领的国家内都通过法令, 禁止未经许可擅自出售外国证券, 从而使德国人到他们乐意的时候便可

以放手接收这些股份。德国地位的强大；可以从下面这件事体会到：德国所垂涎的那些企业的股东面临着这样的抉择，不是按照买主所定的价格由他收购，便是无偿地被公然没收。南斯拉夫的博 206 尔铜矿公司，就是德国以这种方式接收过去的企业中最突出的例子。这些铜矿原先受到巴黎米拉博银行的控制。后来为普鲁士国家银行接收过去。

为了加强德国对工业的控制而使用的其他方法，采取了下列几种形式：强迫商行增资，这笔额外的资金由德国人认股，从而使他们能够左右公司的经营管理；创办混合公司，例如法兰科洛（法国染料企业），其资本由伊·格·法本公司（百分之五十一）和法国各商行（百分之四十九）认股；在被占领和被统治的国家设置分支工厂和机构，例如，见 1940 年 8 月 16 日在经济部举行的一次讨论会的报告。“德国的经济势力通过私人途径渗入东南地区，这是可取的。把法国和英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排挤掉，这也是可取的。这样一项政策的经济成果是，英国和法国再也不能扰乱德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而另一方面，德国却获得了可以发展巴尔干各国的经济来为德国经济服务的势力。”〔《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7 卷，第 258 页（43—EE）〕“德国想得到该公司的股份，根本不考虑法国人依法提出的异者。事实上，德国所遵从的是经济秩序的迫切需要。它怀疑博尔铜矿还在把铜运交给英国，于是明确地决定要占有这些矿山”〔摘自派往威斯巴登（法国）停战委员会的德国经济代表团团长黑门的声明，1940 年 9 月 27 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6 卷，第 41 页）〕；又见下文，原著第 370 页。

构；以及强迫与德国卡特尔合并，例如波希米亚的玻璃工业就被迫在德国玻璃卡特尔的控制下开工生产。

为这样弄到手的产业支付款项是没有困难的，甚至没有造成德国资源的外流，因为可用的资金多的是。买进的产业，有许多是用德国通过征收占领费而得到的钱支付的，有许多是以德国同欧洲所有国家的清算帐目抵付的。

行经营的事业分布之广，从它们在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卢森堡、荷兰、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地都拥有附属事业和分行，便可以想见。

除了自身进行的活动外，这些银行在渗入欧洲工业的活动中往往还充当赫尔曼·戈林工厂、伊·格·法本公司和曼纳斯曼这些德国大厂商的中间人。事实上，两家“德”字银行同德国大工业康采恩的联合，是征服欧洲工业的主要工具之一。

我们只要概括地察看一下德国大工业康采恩中最重要的赫尔曼·戈林工厂的某些活动，便可以对这些康采恩在剥削欧洲工业上所起的主要作用略知梗概。赫尔曼·戈林矿冶康采恩成立于 1937 年，名义资本为五百万马克，目的在于通过开发萨尔茨吉特地区低质量的铁矿来增加德国的铁矿砂生产。可是，到了第二年，它的资本就增加到四亿马克，业务范围也扩展到远远不止是铁的生产，包括石油和菱镁矿的生产，以及造船和建筑。德国在 1938 年进占奥地利，使该厂第一次有机会将其事业扩张到德国境外。当时，该厂接收了奥地利的许多企业，其中最重要的是阿尔卑斯矿冶公司——奥地利最大的铁矿砂生产者。从那时起，德国在领土方面每一次成功的推进，都意味着赫尔曼·戈林工厂的势力的一次增长。在捷克斯洛伐克，它接收了什科达工厂和布尔诺兵工厂；在波兰，戈林康采恩代管了西里西亚所有的重工业；在罗马尼亚，它控制了雷希察工厂，该厂的钢产量占该国总产量的五分之四；在

西方，洛林和卢森堡被征服后，它便设立了一个洛林事务处，管理该地区的铁厂，而在东方占领区，赫尔曼·戈林工厂则在掌握控制大权的德国康采恩中名列前茅。

第四章 208 粮食和农业

W·克拉特

第一节 引言

战争爆发时，欧洲的农业生产按卡路里计算，大约供应了大陆粮食需要的百分之九十。可是，这个笼统的数字在不同种类的食品之间差异很大。欧洲大陆尽管在做面包用的谷物、土豆、食糖和乳品方面几乎可以自给，但是在一部分肉类和将近一半的食油和油脂方面，以及在大约百分之十的饲料方面，都要依靠外界供应。在农业自给自足的程度，各个地区之间也有着很大的差别，从挪威的欠缺百分之五十以上，到匈牙利的剩余百分之二十以上。北欧和西欧依赖外国供应粮食的程度最高，而东欧和东南欧则有剩余。

战争期间，欧洲大陆可以得到的粮食数量大为减少。由于盟国的封锁日益见效，进口的粮食不断下降，而由于缺乏劳力、农业设备和肥料，大陆上的生产也下降了。肉食品的生产特别受到影响，欧洲的消费肯不得不越来越依赖素食。饥饿的现象出现了，有些地方甚至有人饿死，但是在 1945 年以前，这种情形只限于欧洲的非日耳曼人。德国不顾占领区粮食的匮乏，征收了大量的粮食，不是运到德国去，就是供应占领军。戈林于 1942 年 10 月 4 日在庆祝收获节时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很明白他说出了德国对于欧洲可以得到的粮食供应的分配问题所持的态度：〔他说〕我希望，被我们征服和受我们保护的地区的居民，将不至于忍饥挨饿。可是，如果由于敌人采取的措施，粮食供应竟然发生了困难，那么大家必须知道，倘若有什么地方势将发生饥荒，这个地方决不应在德国。

第二节 德国的粮食和农业（一）战争爆发时的情况德国在农业领域里为战争所作的准备是彻底的。它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的封锁所造成的灾难德国对海外农产品供应的依赖上。为了做到这一点，国内的生产提高了，对外贸易尽可能转向德国指望能与之保持接触的那些国家，储存的数量有所增加，管理农业的机构也加强了。这些措施的效果是，把德国对外界供应的依赖从百分之二十五减少到大约百分之十五。到 1939 年秋天，德国在面包、土豆、食糖、乳品、肉类和一般蔬菜方面事实上已经自给自足，虽然它在某种食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油脂和食油）方面仍旧不足。德国所需要的蛋白质饲料中，也有大约百分之十必须进口。德国进口的全部粮食中，几乎有一半是来自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的。

在 1933 年到 1939 年间，国内的农业生产提高了将近百分之十五。鉴于这是在很短时期内做到由，成就是令人难忘的。这种成就部分是由于采取了真正的合理化措施，例如增加使用农业机械和肥料，但是减少对外界供应的依赖，是花了代价才做到的。必须给予农民各种各样的补助金和刺激，还采用了一些不十分经济的耕作方法，例如增加油料作物的生产，以取代价格便宜的进口的浓缩油。人民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得不由动物脂肪 W·哈恩：《粮食战》（W.Hahn: Der Ernabrungskrieg），汉堡，汉萨同盟出版社，1939 年版。

H·v·d·德肯：《德国农产品自给自足的发展》（H.v.d.Deken: Entwicklung der Selbstversorgung Deutsehandsmit landwirtschaft-lichen Erzeugnissen），柏林，保罗·帕雷，1938 年版。

和动物蛋白质改为植物产品。德国人的总的食品消费量中只有百分之三

十来自荤食品，而在其他工业国家里则有百分之四十。德国人的大部分蛋白质消费量来自素食品，而在其他工业国家里大部分蛋白质则来自荤食品。

在其他方面，增加国内生产和减少对国外供应来源的依赖，是靠了一种早在战争爆发以前便建立起来的有效的、全面的管理制度才做到的。在这个制度的中心是德国农业协会。它是纳粹政府设立的四大机构之一，负责管理一切同农业有关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凡是从事农业、园艺、渔业、林业的人，以及农产品和农业必需品的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必须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

成立了由生产者、制造者和销售者组成的销售协会，210 负责调节国内农产品的产量。对外贸易由管理谷物和饲料、家畜和畜产品、油脂和食油、蛋品、酒类的各个国家机构予以控制。通过德国农业协会，农场主被组织在地方、地区和区域性的协会里。这些协会由农民领袖主持，他们得由德国农业协会领导人予以任免。管理工作通过一种书面记录方式来进行，即通过农场记录和营业执照的制度来进行，这种制度提供了有关农场全部资产的最新记载，并且显示出农业生产的动态。（二）粮食控制和粮食管理战前的那几年所作的准备工作如此全面，以致战争爆发时，剩下来需要使德国的粮食管理进入战时体制的工作已经很少了。必须采取的步骤几乎立刻全部采取，此后行政结构在战争期间几乎一直就没有改变。德国粮食与农业部这个老机构保留了下来，但是它的职权却减少了很多，要做的只是对德国农业协会的预算提些技术性意见和进行形式上的控制。这两个机构难得发生摩擦，因为粮食与农业部长同时又是德国农业协会的领导人。为了避免重复，德国农业协会正式被置于该部的管辖之下，继续作为国家机关的执行机构行使职权。为了保证平民和军队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国家对所有的农产品都实行了管制。原则上，为了支持政府，凡是受到国家管制的产品都可以征用，而这些产品的进一步处置，尤其是分配给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工作，则由部长规定。为了执行官方的政策，在德国和合并区的各地都设立了区域的和地方的粮食办事处，每一个办事处下设有两个组，一组负责生产、征收和供应食品与农业必需品，另一组负责通过零售商来分配粮食。

W·克拉特：《德国的粮食与农场管理。欧洲粮食供应联合工作组》
(w.Klatt : Food and Farm Administration in Germany. Combined Wording Part on European Food Supplies)，伦敦，1944 年版，油印本。又见上文，原著第 171 页。

管制的加强激怒了农民，但是总的说来，这个制度执行得颇令人满意。政府始终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即：如果没有生产者的默认，且不说他们的积极合作，粮食管制是无法实行的。他们于是拟定了一种生产和交货单的制度，结合上现金和实物刺激，来满足双方的需要。在整个战争时期，他们一直坚持这种半真半假的说法，即同苏俄实施的制度相反，德国政府从不干涉农民的首创精神和他们的播种计划，只不过规定其作物的上交和使用。的确，尽管在做面包用的谷物和某些重要的其他粮食作物方面规定了每亩的指标，并且全部收成实际上都得由政府处理，但是对饲料作物的管制始终并不十分严格，只有在做面包用的谷物歉收，必须在国民吃的面包中掺用大麦粉和土豆粉时，才严格地实行管制。效率最低的是对畜产品的管制，但是即使在这方面，逃避管制的现象还是相当少的。

对粮食生产与上交的行政管理，是同对农业必需品的管制密切结合在一

起的。农业劳动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劳动一样，从 1942 年起也归绍克尔管辖。农业机械和肥料的供应，呈现出较大的困难。在进攻俄国之前，农业机械很容易弄到，但是后来就日益稀少，于是采用了购买许可证的办法，只在迫切需要和交售谷物令人满意时，才发给这种许可证。肥料从战争一爆发就受到严格的管制，配给量也在限额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减少，不过在某种情是，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配给制度，粮食生产和交售的管理工作就不会成功。1939 年 8 月 27 日，根据粮食与农业部的一道行政命令，实行了第一个暂行的食品配给办法，四星期后，又代之以一项永久性的安排。几乎所有的食品都是配给的，或在全国范围内配给，或在地方控制下分配。面包、面粉和类似的产品，以及肉类、油脂、乳制品、食糖、果酱和咖啡代用品，按全国性的计划配给，而实行地方配给的食品则包括土豆、蔬菜、水果、鱼、野味和家禽。零售商按照他们交给粮食办事处的上一期配给券的数日，获得分配给他们的份额，只对某些商品要求消费者向零售商登记。在其他情况下，消费者可以随意选择和调换店铺，次数不拘。旅馆和饭店另外获得数量有限的食糖、果酱、蛋和咖啡代用品。在其他情况下，不支配给券就得不到配给的食品。

由于所有主要的食品，包括面包和土豆，都归入了配 212 给计划，因此必须采用一种有差别的配给制度，才能满足各类消费者的需要。重工业工人——包括矿工在内——和士兵都获得增加了的配给量，这主要是采取补助面包、土豆、肉类和脂肪的形式，而全脂牛奶（含脂量减少为百 H·多马施克：“德国战时粮食经济的消费规律”，《农业报告》（H.Dommasek：“DieVerbrauchsregelunginderdeutschenKrieg-ernahrungswjrtsehaft”，BerichteuberLandwirtschaft），第 28 卷，第 4 号，1943 年。

分之二点五）则保留给儿童、吧奶的母亲和从事有害健康的职业的工人。然而，区别不仅是按照需要，同时也根据种族和民族。配给证被用作把外国工人束缚在工作地点的一种手段，而给予某几类外国工人何种配给品，则要取决于他们所做的工作。总的说来，外国工人和战俘全得不到具有高度营养价值的食品，只领得质量低劣的食品，而他们由于工种或健康情况按理应得的补助配给，也往往被扣住不发或只发极少的数量。发给俄国战俘和所谓“东方工人”的配给证，同发给非俄国战俘和来自西欧及东南欧的平民工人的配给证相比，供应的淀粉质食物数量多而保健性食物数量少。战俘和外籍平民工人在从事重劳动时理应享有的补充配给，比从事同类劳动的德国工人所得的份额要少。

最受歧视的是犹太人。1942 年 9 月以后，犹太人不准获得任何肉类、肉制品、蛋品、糕饼、白面包、全脂牛奶、脱脂牛奶或任何不经特别许可而分配的食物。发给犹太人的面包证只准购买黑麦面包。犹太儿童和青少年只获得一般消费者的面包配给量，他们没有人造蜂蜜，没有可可粉，没有额外配给的果酱，他们也没有资格获得全脂牛奶。凡是德国人有权享受的所有其他补充配给，同等身分的犹太人则一概没有。

总的说来，德国的配给制度达到了它的目的，即：以这样一种方法来分配不太充足的粮食供应，使不同类别的消费者的真正的特殊需要全得到满足——只有对某些人是例外，因为对他们歧视乃是有意采取的一项政策。

（三）农业和粮食供应战争爆发时，德国的农业情况很健全，所以 1939 年秋天要使农业适应战时需要，并不费什么事。主要的调整出现在油脂和蔬菜的生产上，大半以牺牲饲料作物为 213 代价而获得了增产。植物油的产量

从 1939 年的四万吨增加到 1944 年的二十四万吨。与此同时，在牛奶的利用方面也厉行节约。由于全脂牛奶的消费限于儿童、母亲和从事有害健康的工种的工人，因而出产的牛奶大部分可以用来制造黄油。尽管这样做并没有改变牛奶中含有的脂肪总量，却增加了可以得到的脂肪的供应，从而在战争时期一直维持了令人相当满意的脂肪配给。

油料作物、土豆、蔬菜这些适于种植的农作物的增产，影响了德国牲畜的总数，尤其因为海外供应的浓缩油被封锁切断了，而国内供应的麸皮也由于出粉率高而有所减少，在战争的五年中出粉率由百分之七十七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以上。奶牛主要靠家庭的饲料喂养，因此牛奶的供应保持在高水平上，但是猪的总数不得不减少。到战争结束时，总数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百分之六十。猪肉和猪油的产量下降得比猪的总数甚至还要多，因为缺少谷物和土豆作饲料、屠宰下来，猪肉重量和猪油含量都减少了。

象在其他交战国里那样，农民对农作物的亩数、收益和产量都没有保持精确的记录。把估计偏低的因素考虑在内，在崩溃前的最后两年中，德国的总产量比战前的数字下降了大约百分之十五。可是，在农作物的利用方面却做到了相当节约，因此国内生产的、供人消费的粮食总额，只比战前的水平下降了百分之十。要不是农业工人和农业必需品的供应都保持在高水平，那么下降率将会更大。应征入伍的农场主和农场工人大部分全由外国工人所替代，后者虽然不如本国工人那样有效，却也帮助维持了国内的生产。牵引力、农业设备、氮肥、钾肥也都供应充沛，至少在进攻俄国以前是如此。磷肥的缺少在 1943—1944 年以前并没有感觉到，直至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后，这才变得严重起来。

尽管粮食供应没有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猛烈下降，需要量却在不断增加。战争爆发时，德国必须养活将近八千万人。在战争过程中，有一千二百多万人被动员入伍。这些人虽然对工业或农业生产没有贡献，却必须配 214 给他们从二千七百五十至三千五百五十卡路里的口粮。应征入伍的人中，有七百万人由外国工人和战俘所代替。他们虽然多半只靠劣质的和单调的饮食来糊口，可是如果要他们到工厂和农场去干重活，那就不得不给他们足够定量的淀粉质食物。因此，在战争期间，平民和军队所需要的粮食总数比战前的水平至少高出了百分之二十。国内供应量和总需要量之间的差额全靠在占领区大肆征粮来弥补。

要十分精确他说出德国军队和政府从欧洲占领区一共弄走了多少粮食，那大概永远是不可能的。官方的贸易统计表所说明的情况完全靠不住，不过四年计划办公室和粮食与农业部的档案倒似乎相当正确。根据这些资料，看来在战争和占领的五年期间，大约从欧洲大陆和俄国弄走了二千五百万吨（折合面粉计算）。其中一部分是根据正常的贸易协定进口，并以农业机械、肥料和其他工业品的出口来支付的，但是——尤其是在俄国和波兰——有大量粮食是由军队无偿地征用和消费，或者装运到德国去的。在入侵俄国的头两年中，外国供应的粮食要占德国粮食总消费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样，在战争期间德国就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消费水平。

在大部分战争时期，农产品的主要供应来源是被占领的苏联领土。这些地方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德国人 GN>在他们的军队发动进攻以前，就已经充分讨论过从那里弄到粮食的可能性了。东方经济事务司农业组于 1941 年 5 月 23 日就德国在可能落入经控制下的俄国地方所应采取的经济政策提出

了建议，并对情况作了如下的概述：在战争的第三年中，德国的粮食情况迫切要求武装部队的一切粮食供应，不得依靠大德意志领土或大德意志领土赖以获得进口的合并区或友好地区来提供。最低的目标，即在第三年中——如果必要，也在往后的年份中——使武装部队的粮食取给于敌国的领土，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争取达到。这意味着武装部队有三分之一的人员必须完全由法国交给占领军的粮食来供应。其余的三分之二（鉴于武装部队目前的规模，所占比例甚至还要稍大一些）必须毫无例外地由东方地区来供应粮食。……除了装 215 运的干草、麦秸、油脂、鲜蛋等等之外，还有大约一百万吨做面包用的谷物、一百二十万吨饲料谷物、二百四十万吨肉类生产所需要的谷物，换句话说，总共四百五十万吨到五百万吨的谷物，将不得不由东方占领区供应军队的需要。

粮食与农业部长巴克博士承认，占领区供应的粮食对德国人的饮食作出了贡献。在 1944 年 5 月 13 日的演讲中，他说：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36 卷，第 148—149 页（126—EC）；《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7 卷，第 301—302 页。

占领的头两年中在东方取得的成就，弥补了我们由于德国收成较差而遭受的损失，从而给了我们必要的行动自由。这些地方现在已经不受我们支配的这一事实，迫使我们放弃了增加某些粮食配给的计划。德国农业协会的机关报《N·S·乡邮报》在 1943 年 12 月底说：“我们为军队和德国弄到了两个月的谷物配给、一个多月的肉类配给和几乎整整一个月的脂肪配给。要说我们目前在东方放弃的那些地区对我们不重要，那是错误的。”

在撤出占领区以前，德国军队和民政占领当局经常转移走了大量粮食。有一个战地记者在 1943 年 12 月 21 日从东线报道说：“撤退之际，光是南线一个战区内，每天就有八十列撤退列车驶出。有十九万八千头牛、二十万头羊和十二万八千匹马被运走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并不是狭义的军事行动。”

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国的消费者都受到庇护，没有象占领区人民那样受苦，但是他们也决不是完全没有受到粮食供应量波动的影响。起初，配给量是相当丰富的，但是在 1940 年和 1941 年作了少量的削减后，1942 年春天面包的配给量猛减了一次。在他们占领了东方盛产粮食的地区以后，粮食配给量有所增加。1944 年和 1945 年，当这些地方被放弃以后，配给量削减了好几次，减去的数量一次比一次多。1944 年以前，粮食供应减少了不到百分之十，但是在德国崩溃前的最后一年中，数量却陡然减少了。尽管配给量有所改变，配给制度却可以说是成功地把不太充裕的粮食供应分配得相当令人满意。除了少数 216 例外，配给量都十足照发，因此在德国发生的违反配给条例的罪行比在欧洲大陆任何其他国家都少。至于总的供应数量，各个不同的作者的估计多少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把不列入配给计划的食品的消费量也包括在内，那么全体平民摄取的卡路里的平均数，就从 1939—1940 年的每天二千七百卡路里，下降到 1944—1945 年的二千四百五十卡路里。在 1945 年的头几个月中，它又下降到二千一百卡路里，非农业人口的消费量第一次下降到二千卡路里和二千卡路里以下，而一般消费者——即社会上海三个人中的一个人——的配给量则下降到大大低于这个水平，到了最后，在德国投降以前，下降到一千六百卡路里。

在战争的头五年里，德国人的饮食一直是单调的和不太可口的。它充斥

着体积大、长气力的食物，而缺乏高质量的蛋白质和矿物质，不过并不严重缺少任何重要的质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脂肪下降到三分之二。对一般消费者的供应量始终就不十分充足，但是对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来说，饮食通常至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最低营养。

德国人民的健康并没有由于缺少食品而受到损害。工厂中生病和缺勤的比例并不过高。在出现这种情形时，主要是由于工作过度和在猛烈的空袭下生活条件普遍恶化，而不是由于营养不良。在 1943—1944 年的冬天，流行性感官席卷了德国，而到战争结束时，还出现了某些轻微的皮肤病。在其他方面，德国人民的健康和营养情况，在战争中自始至终都保持得非常好。甚至在德军最后崩溃而带来的苦难时期，多亏了地方紧急配给，人民还是得到了最低限度的食品供应，从而避免发生骚动。

第三节 欧洲其他地方的粮食和农业（一）战争爆发时的情况 战争爆发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农业情况都很健全。二十年代后期的经济萧条，导致欧洲大陆各国政府普遍对农业进行援助，所以战争爆发前的那十年，是粮食生产稳步增长的时期。增产大部分是由于生产的强化，而不是由于种植面积的扩大。肥料应用得比以前更广泛，农业机械也使用得比以前更频繁，作物轮种的方法改进了，畜产品的数量也有所增加。结果，欧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了它所需要的食品的将近百分之九十（按卡路里计 217 算），仅在饲料方面缺少百分之十，而在脂肪和食油方面则缺少百分之四十五。同德国一样，欧洲大陆在做面包用的谷物、土豆、食糖和牛奶方面几乎可以自给，但是有百分之十五的肉类要依靠海外供应。由于预料将会出现紧急情况，大多数国家都增加了储存，管制粮食的法律也准备就绪，而且基本工作人员都已内定。在 1939 年 9 月，据认为只需要作一些较小的变动，但是结果在欧洲大陆的不止一个国家内，这些准备工作都证明是很不够的。

（二）粮食控制和粮食管理 战争爆发以前，德国以外的各国对于管制食品的生产、征集、定价和分配只做了有限的准备工作，而且大多数国家只是在被德国占领以后，方才实行了或完成了管理粮食的制度。德国政策的总的原则，从一开始就是把管理权授予原来的行政机构和现成的农场主及商人协会。可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组织后来都解散了或改组了，到最后往往连细枝末节都照抄德国的制度。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便于控制食品的征集和分配，但是各处都作了尝试，想把德国典范的思想方式也强加于人。

在欧洲大陆各处，全采用了生产和交售的定额，规定了播种率和饲养率，控制了价格和补助金额。控制生产和分配的主要工具，是农场记录和营业执照，但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如同德国的情形一样，这些记录往往竟然是靠不住的。为了补救这一点，他们曾建议成立一些“农村三角组织”，即由村长、农民代表以及同纳粹合作的政党的领袖所组成的地方管理机构。然而，简直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类机构的工作是很有效的。

在合并区，完全实行了德国的制度，所有负责的职务不是派给了德国人，就是派给了日耳曼人。在德国统治下的其他国家里，这个制度在农业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各各不同，不过，德国的影响到处都很明显。在西欧各地（只有丹麦不在其内，它是唯一获准保持原有的行政机构不变的国家），以德国农业协会为蓝本的社团组织纷纷成立起来，而那些主管农业的政府部门的权力也加强了。政策的最后决定权保留给了德国人，但在其他方面，管理权则留在本国人的手里。

在意大利，1940 年底以前一直没有做过多少工作来 218 采用和实行管制。1940 年底，他们才把分配工作从劳资组合部长的手中移交给了农业部长去主管。由于下级行政机构的情况依然很混乱，不得不进一步采取措施来减少官僚政治的无能。到 1941 年，管制加强了，先前不受管制的商品这时也被强制收购。1942 年初，成立了一个部际供应、分配与价格委员会，负责简化行政管理和扩大管制制度。尽管情况有了某些改进，意大利农民仍然找出种种方法来使大量的产品不受官方的管制。

法国的情形可以说也是一样，那里的行政机构始终没有能十分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在德军占领法国全境后，他们才试图成立一个有效的粮食管理机构。由于没有下级行政机构，于是在三万多个村庄里成立了“村会”，这些村会又组成区域性的农民协会。象在德国一样，农民协会的会长同时又是农业部长。农业部直接负责大城镇和工业地区的粮食供应，而在农村地区，则由地方行政长官来负责供应工作。国内谷物的交流由谷麦局的后身全国谷物局控制，而畜产品则由中央乳品委员会和全国肉品委员会负责管理。在占领下的比利时，两个负责粮食供应工作的部门合并成了农业与粮食补给部，并且仿照德国的榜样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来接管原有的一切农业组织。在荷兰，1939 年成立的战时粮食机构，起先得到德国占领当局的承认，可是后来却由人们熟悉的全国农业协会所取代。不过，由于国家管制的基础早在德国入侵以前就已经奠定，荷兰的制度继续发挥作用而没有受到多少干涉，结果是，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当战事妨碍了交通和管制工作时，粮食的分配工作仍然令人相当满意。

在德国侵入挪威以后，全国农场主协会遭到取缔，另行成立了“农民协会”，但是这个组织并没有行政权，生产与分配的管理权由各部分别行使。丹麦，如同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是德国当局不干涉原有的行政机构的唯一被占领国家。

在东欧和东南欧，由于遭到肢解，管制的制度各个区域不同。在有些情况下，因为有游击战争，甚至各个地方 219 也不同。由于农村地区是可以自给的，因此粮食管理的主要工作是为城镇，为军事和民政占领当局提供粮食。

除了规定生产和交售的定额以及播种率和饲养率以外，各处还试图采用德国的价格管制办法。可是，它们都不象在德国那样行之有效，结果欧洲各地粮价都直线上升。总的说来，在合并区和附属区，涨得最少，在斯堪的纳维亚涨得稍多，在西欧和南欧更多，而在东南欧则最多。

在食品配给方面，象在粮食管制方面那样，大多数欧洲国家在战争爆发前都没有做过什么工作。有的国家作了某种初步的准备，但通常只是在战争即将爆发前才对食糖、咖啡和茶叶实行了配给。所有主要食品的控制性分配，只是在德国占领当局进行干涉后才组织起来，结果在整个大陆上，对食品配给的管制相当一致地都是以德国方式为榜样。这种方式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实际上对所有的食品全实行了配给，其中包括面包、面粉、谷物，到最后还包括土豆。只有水果、蔬菜、鱼类和野味在大多数国家里仍然不用配给。基本食品照例通过一种全国标准的配给办法来加以控制，但是有些食品则按区域标准来分配，或者交给地方当局根据其分配计划处理。区域性和地方性的配给在法国和意大利实行的范围很广泛，而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差别在东南欧许多地方则很普遍。

由于对所有主要食品都实行了配给，因此必须采用不同的等级。所有的

成年人都获得一份基本的“一般消费者”的配给量，而一切优先照顾的消费者，例如体力劳动者、喂奶和怀孕的妇女、住院的病人，则有权得到补充的食品配给。全脂牛奶和标准牛奶（含脂量为百分之二点五）都保留给从事有害健康的工种的工人、母亲和幼儿，其他的消费者则只好饮脱脂牛奶。

配给制度的严格程度，各个国家都不相同。在丹麦，由于并不感到食品严重缺乏，配给始终就不很严格。就其他地方而言，配给制度在西北欧和北欧最为有效，法国和意大利次之，而在东欧和东南欧则最差，因为在那里，只有城市地区实行配给制度，许多粮食通过非法的途径都被弄走了。220 除丹麦外，大多数被占领国家的基本配给和补充配给都低于德国。然而这并不一定就反映出消费水平，因为消费人口的组成情况各个国家大不相同。在管制并不十分有效的地方，同管制严密、所有主要食品都实行配给的国家比较起来，配给量就不十分能说明全国的总消费量。

（三）农业和粮食供应农业和粮食供应的情况，在欧洲其他地方没有在德国国内那样令人满意，不过在有些地方，情况的恶化也不象观察家们所预料的那样剧烈。这一点部分是由于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已经认识到健全的农业和充足的粮食供应的重要性，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就已经采取措施，以便在国内获得高产和食品的平均分配。改进农业科学方法的应用和改进销售计划技术的应用，也起了应起的作用。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里，最显著的就是用于耕地和牧场上的人造肥料不断的增多，结果减少了对进口的高效肥料的依赖程度。

战争爆发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农业都处于健全的状态，土壤里养料很丰富，农场上牲畜也很多。在战争的头几年中，大宗的家畜是一笔最大的资产，因为这时屠宰牲口，就使原先需要作饲料用的蔬菜作物可供别的用途。同时，又可提供大量的动物蛋白质，不过后来就不行了，家畜的数目减少了许多，以致每年的繁殖率已不足以应付消费者对肉食品的需要了。

有些观察家把这样有计划地屠宰家畜解释为粮食供应发生严重困难的证据。事实上，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这个办法使许多人免于挨饿，因为这就使人们可以弄到面包和面粉混合物，有时可以抵补总需要量的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二十以上。由于面粉的出粉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以上，面包就变得不够松软而且滋味较差，可是它还是为大多数消费者提供了相当稳定和充足的碳水化合物和植物蛋白质，从而把营养不良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当土豆、蔬菜和油料作物的产量在牺牲了饲料谷物和饲料根菜植物而有所提高时，食物中素食所占的比重就日渐增加。在有些国家中，还开垦了一定数量的牧场 221 和荒地，但是在大陆上，没有一个地方有可能做到象英国那样的程度。尽管在欧洲各地，家畜饲养业受到了严重的压缩，但耕作业受到的影响却较小，事实上在某些国家里还有所加强。整个说来，在欧洲的大多数地方，农业劳动力的供应是相当令人满意的，虽然在法国和东欧，由于德国强制动员劳动力，农业也受到了损失。在德国进攻俄国以前，农业机械的供应也是相当令人满意的，而肥料的缺乏则直到盟军在北非登陆后才变得严重起来。在德国统治下的某些地区，拖拉机和氮肥的供应有时候比战前还要充足。

然而，战事拖得越久，人们就越感觉到各种物品储备量的枯竭，结果农产品的数量不断下降。天气对农作物年产量的高低是有影响的，但是回顾整

个战争时期，欧洲大陆各国粮食的产量在战争的前一半时期下降了百分之十，而到战争结束时则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农作物，尤其是做面包用的谷物，产量下降得较少，而畜产品，特别是肉类，产量则减少得较多。从 1943 年起，当大陆的中心地区而不是边缘地区开始感到战争的全部冲击力时，有些国家的农业生产反倒稍有改善。只是在战争结束后，到了 1945 年秋天，第一次真正灾难性的歉收才出现了。

战争结束时，粮食产量减少的程度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致相等，但是粮源减少后使用得却比 1914—1918 年间要节约。使用上的精打细算，例如出粉率高和饲养率低，使境内供应的食品的总量保持在战前水平的将近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把失去的进口食品估计在内，那么粮食供应的卡路里值平均达到战前水平的五分之四，不过有时下降的幅度要多达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以卡路里来计算，这表明每人每天从将近二千九百卡路里下降到二千二百卡路里。

这些平均数在好几方面都可能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事实上，食物的成分质量下降了，从而影响到消费者的健康和工作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消费人口中大部分人的命运是，连平均数也得不到。总的说来，农场主和农场工人仍旧吃得和战前一样好，食品的任何减少都不得不由 222 非农业人口来承担。由于军工业的工人有权享受补充配给，因而粮食供应的减少，即便不是全部的活，至少主要是减在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城市居民、雇员和家庭主妇以及青少年和老年人头上。因此，无数消费者在战争期间每天多半只靠不到二千卡路里维持生活。在欧洲大陆，每两个消费者中有一个在战争的年代里大半只能得到战前食品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减少得最多的是脂肪和动物蛋白质，最少的是碳水化合物和植物蛋白质。各个国家之间，情形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除丹麦外，所有国家的配给量和食品供应总数都比德国少。在芬兰、挪威、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在波兰、俄国、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城市中，居民有很长一段时期不得不在大大低于最低需要水平的情况下生活。凡是有钱从黑市购买东西的人，物质方面没有感到什么匮乏，可是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无力经常通过非法的途径来补充配给量的不足。在战争的最后一时间里，波兰城市中收入少的消费者所得到的食品，只不过是德国相应类别的消费者所得到的数景阶一半。在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大多数居民每天的食物摄取量，在 1941 年和 1942 年据估计为六百至八百卡路。1942 年秋天，在红十字会的管理下，推行了一项救济计划，可是在这之前，许多人全饿死了。要不是由于德国军队和民政当局强征粮食的话，情况本不致于那么惨的。

欧洲全体居民的健康，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损害。成年人体重减轻是很普遍的，而儿童中发育迟缓的现象则有案可稽。软骨病和肠胃病增多了，在情况最差的地方，还出现了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婴儿死亡率上升了。在粮食消费量特别低的地方，结核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大幅度地增加。但是，由于医疗防治工作的改进，大多数人在这场战争结束后的健康情况，都比前一代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要好些。在大多数情况下，造成的损害并不象那些不得不经受这场严峻考验的人们当时所预料的那样持久。

223 第五章 劳动力

缺乏劳动力是战争爆发时德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经济动员到 1936 年已使 1933 年德国存在的大批失业者全部就业，而为武装部队征召人员，显然会使人力更加紧张。可是，德国的领导人已经制定了应付这种局面的计划。德国的劳动力可能很缺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外国劳动力来替代。早在 1939 年 6 月 23 日，希特勒在讨论进攻波兰的建议时就说过：“如果命运使我们同西方发生冲突的话，在东方占有较多的空间将是有利的。……德国以外地区的居民将不服兵役，因而可以作为劳动力的来源。”在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后，德国人几乎立刻就推行了一项将劳动力运往德国去的方针。这项方针在战争期间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到 1944 年，有七百万外国人受雇在德国工作，而德国本国的平民劳动力大约为二千八百五十万人。然而，德国雇用的外国人，决不仅限于那些在德国本土工作的。虽然目前没有数字可考，但是不妨这样说，在德国以外的国家里为德国工作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在德国本国工作的人数。这一点对德国作战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节 德国劳动力的发展（一）战争爆发时的情况上一段里已经说过，希特勒上台时面临的大规模失业现象，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已一变而为缺乏劳动力。不再需要制定计划——例如，兴建党的办事处和建筑高速公路——以创造工作机会了。相反地，德国当局不得不加强管制措施：在纳粹政权成立之初，这些措施就是它的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劳动力，如同其他生产因素一样，在建立纳粹的战争机器方面注定要发挥作用。到战争爆发时，劳动力已受到一系列的管制，使它完全唯政府的要求是从。劳资关系的正常结构，由于解散了工会，并由于 224 采取了旨在使雇用工人要凭政府特别许可证的措施，已经遭到了破坏。同时，对工资的限制，也使雇主在企图满足其日益增长的对劳动力的需要时，更难以竞相出价来招募工人。

尽管德国人实行了控制并采取了旨在增加国内劳动力总数的措施，但是劳动力缺少的现象继续存在，而且到 1938 年底开始变得相当严重。那年年底，劳动力的供应据估计大约缺少二百万人。虽然的确有着某些后备的劳动力，尤其是妇女，但是从国内后备人力中抽出来的平民劳动力的任何大幅度增加，势必使雇用工作的结构作出重大的、因而也是痛苦的重新调整。鉴于德国准备发动战争，它就必须在国外找到替代的劳动力来源，以增加总的劳动力供应。

德国政府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从就业不足转为劳动力缺乏的这场变化，早在 1937 年就已经决定向外国工人重新开放边界了。于是劳工开始流入德国，主要是从波兰和意大利流入，而随后的领土扩张更便利了这种迁移。到 1939 年夏天，除奥地利人和苏台德的日耳曼人外，有三十万以上的外国人受雇在原来的德国境内工作，而平民劳动力的总数大约为三千四百二十六万九千人。可是，对于德国的需要来说，添出来的这些工人只不过是补而不缺而已。在进攻波兰后不久，除了工人自愿迁移外，还辅之以强制征募。

（二）波兰战役的影响战争的爆发使德国国内的劳动力立刻紧张起来，而在农业方面尤其感到这样。可是，利用外国劳动力的计划立刻付诸实行。招工人员紧跟在开进波兰的德国军队后面，数以千计的波兰平民，尤其是农业工人，被押送到德国去。此外，还有二十万到三十万战俘被扣留在德 225 国工作。早在 1940 年就已经决定，运送到德国去工作的波兰平民的人数，至

少将增加到一百万人，其中有七十五万人将从事农业劳动。波兰故事结束后，敌对行为的暂时停止就有可能巩固一下德国劳动力的情况了。对农业工人的迫切需要，已经由于运入波兰人而得到了满足。武装部队的动员意味着从平民劳动力中抽走了好些人，但是由于战争爆发而立刻进行了改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对于例假日所作的许多限制和 1939 年 9 月 1 日的一道命令所规定的发放加班费的办法，1939 年底全撤销了。

（三）德国领土的进一步扩张西欧战役使德国控制下的劳动力来源大形增加。军事上的损失是轻微的，而从被占领国家搞到手的劳动力抵消损失还绰绰有余。他们抓了将近二百万战俘，其中有许多都被弄到德国去做工，主要是在田地上。此外，物质上的破坏和随后的经济紊乱，在西欧造成了广泛的失业，这样就提供了更多的后备劳动力以便德国利用。为维持德国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那么多平民新手，不用施加多少压力就可以征募到。的确，在 1940 年秋季的几个月中，德国控制下的劳工总数足以供应德国的需要而有余。德国能够从中挑挑拣拣。在某些地区，招募工作暂时停止了，而在法国，尽管国内失业现象很普遍，并没有作过任何努力去动员平民劳动力。

在 1940—1941 年的冬天和春天，招募外国劳工的工作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受雇在德国工作的外国工人的总数从 1940 年 10 月的二百二十万人左右增加到 1941 年 5 月 31 日的三百零三万三千人。进攻俄国的准备工作和更多的人应征入伍，增加了对外国劳工的需要，但是仍 226 有足够的人可供招募。他们从西欧弄来了更多的劳动力。此外，德国控制的加强（不是通过直接的军事行动，就是通过政治压力），也方便了在东南欧的招募工作。从意大利也弄了更多的工人到德国来。1941 年 2 月初，德国和意大利当局签署了一项新的协定，规定德国工业增加雇用意大利人。到 1941 年 9 月 25 日，德国使用的外国平民和战俘的总数，已经增加到三百七十万人左右。

从战争爆发直到 1942 年春天的这段时期内，德国雇用人员的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到 1941 年 5 月 31 日，已有大约五百八十万零八千人从平民劳动力中应征入伍。一年以后，这个数目增加到七百八十万零五千人。然而对比之下，雇用的外国工人的总数从 1939 年的三十万零一千人增加到 1941 年 5 月的三百零三万三千人，到 1942 年 5 月更增加到四百二十二万四千人。这样，外国人从 1939 年在德国劳动力中仅占无足轻重的数目，到 1941 年 5 月占雇用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八点四左右，到 1942 年 5 月已占百分之十一点七。在截至 1942 年 5 月见下文，原著第 234 页，表 1。

库利舍尔：《欧洲人口的移动》，第 156 页。又见下文，原著第 323 页。

《德国劳工公报》（Reichsarbeitsblatt），1941 年 12 月 5 日，第 34 号，第 5 编，第 610 页。

《战略轰炸的影响》，第 204 页。

见下文：原著第 234 页，表 1。

见下文，原著第 235—236 页，表 2

月 31 日为止的三年时期内，劳动力的总数紧缩了将近四百万人，这是由于从事批发行业和从事手工业的人数减少的缘故（分别减少了一百四十万和一百八十万）。

何希望（如同前几个冬季都有可能出现的那样），而且要求立刻增加武装部队人员的总数。同时，武装部队损失的比重，也第一次变得严重起来。

情况的日趋严重，从行政管理的变动上便反映出来了。第一个变动是任命德国劳工部一个团体的前首脑维尔纳·曼斯费尔德去主管四年计划组织下面的劳动力分配司，以代替弗里德里希·聚鲁普，后者据称患了重病。曼斯费尔德在支配劳动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权力，他着手来收紧控制劳工的机器。但是经过六星期后，他又由弗里茨·绍克尔所接替，后者是图林根省的行政长官，又是最坚定地拥护希特勒的党员之一。这时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施，于是执行这项政策的责任，不是委托给劳工部的官员，而是交给一个具有第一流党内工作经历的人，虽然这个人先前并没有处理劳工问题的经验。

根据任命绍克尔的命令，他在招募、使用和分配劳动力方面取得了几乎无限的权力，他的唯一上司就是四年计划总负责人戈林。关于绍克尔职务的范围概述如下：

为了保证整个战时经济，尤其是军备方面可以获得需要的劳动力，必须建立一定的制度，以指导分配所有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包括被运送来做工的外国人和战俘在内——并动员大德意志帝国——包括保护国在内——以及总督辖区与占领区内所有尚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影响到绍克尔的职务的因素之一是，武装部队需要的人员增加了。德国企图说服它的盟国增加提供开赴东线作战的部队的人数，但是这种增援部队比起德国的 228 需要来，只能是为数很少的。同时，德国也决不能依靠在占领区征集的劳动力来补充它的武装部队。约德尔后来说：征募外国人作为战斗人员的问题，无论如何应该极端慎重并持极端怀疑的态度来进行审查。有一个时期，东线曾出现过一种近似神经病的状态，提出的口号是：“俄国可以由俄国人去征服”。一支庞大的弗拉索夫军队的想法，萦绕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当时，我们招募了一百六十多个营。在我们自己进攻得手时，我们的经验是好的。当局势恶化，我们不得不撤退时，这种经验就变得不妙了。因此，大部分新兵不得不从德国的劳动力中来征募。

鉴于德国的后备劳动力，至少是后备男子，实际上已经消耗光了，要提供更多数目的人给武装部队，就只能以牺牲工业为代价。可是工业生产，至少是兵工部门，总得设法维持下去，甚至还得提高，以满足对军备的日益增长的需要。采取了种种不同的措施，力图补救这种局面。工业生产进一步集中在那些被认为对作战关系重大的工厂里，其他的工厂则部分或全部停工。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提出“以二顶三”的口号，来强调加强工业奋战的必要性，强调国内战线上的工人有责任发挥作用未支援正面临着“德国军队有史以来最艰苦、最巨大的义务”的武装部队。训练计划也予以扩大，以便有助于把技术工人替换下来应征入伍，还作出了努力把德国最后的一些后备劳动力搜罗无遗。然而，不论这些措施取得了何种程度的成功，德国承担的义务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力，终究无法指望都搞到手。于是，剩下来可以大幅度增加劳动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充分利用外国劳工了。这就是绍克尔的主要目标。这项新的、庞大的劳工动员工作的目的，是把我国作战的武装部队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为我们征服和取得的全部丰富、巨大的资源，用于武装部队的装备，也用于增加祖国的营养。被征服地区的原料和富源，以及 229 人们的劳动力，应全部认真地用于对德国及〔其〕盟国有利的工作。然而，征募劳工的机会已经不象战争初期那样多了。在波兰，由于德国一开始占领后就实行了一种残暴的劳工政策，这时要照先前那种规模进一步调拨劳工已经办不到了。在东南欧，由于那个地区在农产品的生产方面对德国很重要，

大多数剩余的劳动力非保留下来不可。在西欧，占领后很普遍的广泛失业现象，这时多半已经不复存在。后面这一改变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所有可以多少用和平方法说服的人，都已经移居到了德国；把德国的定货包给了被占领国家的厂商，以及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行动，把当时现有的工作全派给了所有寻找工作的人。只有在苏联被占领的地区，还有相当未经挖掘的劳动力来源，可是即使在那里，把劳工调往德国去也受到某种顾虑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俄国已经把技术工人同战斗部队一起撤退了，而德国又希望在它控制下的地区维持生产。

绍克尔在他的劳工动员计划中，强调了苏联被占领区作为劳动力来源的重要性。他说：“可是，必须着重指出，已经又为德国找到了数量惊人的外国劳工。东方占领区是可供这种用途的最大来源。因此，必需立即最充分地利用已征服的苏联领土上的人力。”然而，西方的动员工作也不容忽视。他又说：“另一方面，按照现在可能实现的情况，需要的外国劳工总数有四分之一可以从德国以西的欧洲占领区内获得。”不过，“从友好国家，还有从中立国家获得的劳工，只占总需要量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在这方面，只能考虑技术工人和专家。”

绍克尔推行的更加残酷的招工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至少在他初就职后的那段时期内是如此。靠了从花言巧语的哄骗到公然的逼迫这种种不同的手段，言巧语的哄骗到公然的逼迫这种种不同的手段，他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运到了德国。在1943年6月23日的一封信中，绍克尔声称，在他管理下的头十二个月中，有三百六十三万八千零五十六个外国人被送到德国经济部门中工作。虽然这并不说明德国雇用的外国人的总数有了等量的增加（因为有许多人回乡、患病或由于别的缘故而脱离了劳工队伍），但是雇用的外国人的人数的确从1942年5月底的四百二十二万四千人增加到一年以后的六百二十六万人。1942年春天和夏天，德国军队一直不停地开进苏联的领土，便利了招募俄国劳动力的工作，因此虽然在1942年春天只有微不足道的人数受雇在德国工作，但是到1943年初，据估计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在那里工作。绍克尔推行的政策的全面成功，从表2列举的数字上可以看出（见下文，原著第235—236页）。平民劳动力的总数，截至1942年5月31日为止的那一年中，曾减少了五十万人以上，在此后的十二个月中又增加了大约一百万人，尽管为武装部队的进一步动员工作并没有停顿。

（五）德国劳动力情况的恶化

到1943年初，德国劳动力的总数达到了最高峰。诚然，从1941—1942年冬天起，劳动力的趋势是求过于供，然而由于广泛地使用了外国工人，不论在民用还是在军工部门中，劳动力总数都在增加。但是从1943年起，受雇在德国工作的平民的总数却不断减少。德国人于是就面临着要以减少了的人力来应付日益增加的义务这一问题。种种不同的因素使这一问题更形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丧失了军事主动权和被占领国家中为德国工作的厂商数目增加了。1942年的最后几个月，标志着德国军事力量的最大的扩张。到那时为止，不断有新的地方落入德国控制之下，因此就有新的地方可供招募人员之用，可是从那时以后，情况就完全相反了，德国控制的地方面不断在缩小，而最先失去的地区就是那些在1942年曾经证明是如此丰富的劳动力来源的俄国领土。被占领国家内为德国生产的制造业的发展，呈现出一个多少不大相同的问题，因为它尽管并不损害德国的利益，却减少了可以从该国调往

德国去的工人的数目。招募外国劳工到德国去干活的工作继续进行，但是规模比前一年要小得多。在截至 1944 年 5 月 31 日为止的十二个月中，受雇在德国工作的外国人的总数仅增加了八十六万六千人，而一年以前则为二百万人以上。

对劳动力需要量的增加，再加上维持大规模招募外国工人所遇到的困难，这时已使国内劳动力的彻底改组刻不容缓了。自从战争爆发以后，劳工法律实际上始终没有修改过，这时却变本加厉起来，目的在于挖掘出最后的储备力并最恰当地分配已在使用的劳动力。戈林于 1942 年 6 月 13 日颁布了一道法令，规定除非劳工部门有令，否则禁止工作上的任何调动，从而对劳工的流动实行了有效的管制。劳工的征募工作，先前是根据 1939 年 2 月 13 日的法令执行的，这时则根据 1943 年 1 月 27 日的法令大大加强了。根据新的法令，所有年龄在十六岁到六十五岁之间的男人和所有年龄在十七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女人，除了某几类已婚的妇女外，都被要求去登记从事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可是，这项措施的结见下文，原著第 234 页

到那时为止，甚至在军事工业中，工人也可以自由离开他们的工作，只要他们和雇主互相同意就行。可是，除了在农业和采矿业中，雇用新工人却一概需要取得劳工部门的同意（限制调动工作的法令，1939 年 9 月 1 日：《法令公报》，1939 年，第 1 部分，第 1685 页，以及随后的修正条例）。

同上书，第 206 页。

同上书，1943 年，第 1 部分，第 67 页；《文件，1939—1946 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 2 卷：《希特勒的欧洲》，第 49 页。

根据 1939 年 2 月的那道法令，并没有按照年龄分类登记的一般制度。只有在照顾军事工业时，才可以公开征募劳工。申请征募劳工的厂商应使劳工部门确信，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它们通过内部改组和其他方法，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征募劳工最初是在地方和区域的基础上进行的，跨区域的征募工作只有在必要时才进行。

果是使他们失望的，登记的虽又有大约三百五十万人，但是绝大多数是妇女，其中有许多人不是留作别用，就是每周不能做足四十八小时的工作。

任命为总体战全权代表后，接下去公布了一系列命令。进行了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企图为武装部队，为军工生产或为构筑防御工事，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后备力量。征募的年龄在 1942 年夏天已经从十八岁降低到十七岁，这时又进一步降低到十六岁；征募妇女的年龄限制从四十五岁提高到五十岁；一般工作周的时间则从四十八小时增加到六十小时。此外，还采取了许多措施，目的在于停止对于战事并不直接和立即有所贡献的一切活动。各种形式的娱乐，例如戏院，都遭到取缔；出版的报纸的数目大为减少；邮政业务削减了一半；铁道业务也减少了。可是，到 1944 年秋天，轰炸所造成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供应物资和劳动力的调度失灵，竟然比实际缺乏劳动力更严重地妨碍了生产，而 10 月间人民冲锋队的成立，以及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义务在冲锋队服役这一点，进一步造成了困难。在德国各地，总的说来，对劳动力进行见上文，原著第 43 页。

从 1942 年 3 月到 1944 年 3 月这段时期里，各项工业中雇员工作周的平均时数实际上从四十八点七小时减少到了四十八点三小时〔又见上文，原著第 226 页注（即本书第 360 页注。——译者）〕。可是后面这一数字可能又掩盖了巨大的差别。“很可能，至少在制造品和军备工业中，专职的男工每

周平均工作五十小时以上，并且当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主要军备工业中的工作达六十小时。”（《战略轰炸的影响》，第35页）

凡年龄在十六岁至六十岁之间适于携带武器的男子，都有义务在人民冲锋队中服役。它既不进行体格检查，也没有可以免役的工作，虽然在安排训练和值勤时，也考虑到非军事性工作紧要的程度。理论上，服役不是全日制的，队员除奉命值勤外，仍旧担任他们日常的非军事性工作，但实际上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

任何周密的重新分配已变得不可能，小批人失业的现象开始出现了。

第二节 德国在欧洲其他地方雇用劳工的情况

德国利用欧洲的劳动力决不仅限于调到德国本上去工作的那些人。希特勒在1941年11月9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说：“就德国的领土而言，即就我们占领的地区和我们已置于行政管理下的地区而言，我们将能利用所有的人去从事这项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

占领区可用的劳动力，首先必须用来满足德国本身的主要作战需要。这种劳动力在占领区必须按照下列次序使用：（1）用于军队、占领机关和民政机构的必要工作；（2）用于德国军备计划；（3）用于同粮食供应和农业有关的工作；（4）用于军备工业以外的其他对德国国家有利的工业工作；（5）用于对该地区居民有利的工业工作。这样，只是在德国可能提出的一切需要都满足了以后，被237个占领国家本身对工业品的任何要求才能获得满足。

（一）雇用劳工构筑防御工事

除了用在田地上外，还有两种主要方法可以使用被占领国家的居民来为德国的作战效劳出力。第一是构筑防御工事和其他防御工程，第二是生产武装部队和德国战时经济一般所需要的物品。构筑防御工事的大部分工作，由“托特协会”主管。这个组织系弗里茨·托特于1938年5月28日创办的，其主要目的是加速建成西线壁垒。随着战争的爆发和其后德国领土的扩张，“托特协会”的工作大为增加了。它进而负责建造公路、铁路、桥梁和碉堡，负责挖掘战壕，还负责建造象大西洋壁垒和利古里亚壁垒那样大规模的工程。大西洋壁垒从挪威北部一直延伸到西班牙边境，利古里亚壁垒则是1943年9月开始建造的海岸防御工事体系，目的在于掩护土伦到斯培西亚一线。除了严格的军事任务以外，“托特协会”还负责兴建港口和兵工厂，有时甚至负责开发和经营矿山。

“托特协会”的工作人员有德国人也有外国人。同在别处一样，德国人也得到优待，尤其是在特种制服方面，以及在报酬和津贴方面，发放津贴是表示承认构筑工事和建筑工作的危险性，因为这些工作往往是在前线后方很近的距离内进行的。由于外国工人的数目增加了，德国人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工头。招募外国人的工作，是按照招募工人运往德国的工作大致相同的方针进行的。必要时除说服外，还辅之以公开的强迫。“托特协会”究竟雇用了多少德国工人和外国工人，没有什么统计数字可查。根据绍克尔于1943年5月17日呈给希特勒的一份报告，雇员的总数已从1942年3月底的二十七万零九百六十九人增加到十二个月以后的六十九万六千零三人。然而，招募工作却继续进行到1945年，以满足德国在垂死挣扎阶段的需要，因此最后的数字多半大大超过了1943年3月的数字。

（二）为德国进行的生产

德国原来的想法是，把一大部分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备和军火工业的生产，集中在德国境内。但是，随着战事日趋激烈，把定货单包给被占领国家的工厂去生产所获得的好处也就更为明显了。大批工人被招往这些工厂里劳动，被占领国家的生产对德国的作战于是就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了。可是，招募工作开始出现了困难。到 1942 年底，后弗里茨·托特是一员空军少将和冲锋队的高级军官。1933 年 6 月起，他任德国公路系统总监，1938 年 12 月 9 日起，任建筑工业总专员。他是托特协会的会长，还曾担任过的其他职务如水电站和发电厂的总监等。德国在西线发动攻势前夕，他奉命出任德国军备与军火生产部长。1942 年 2 月乘飞机失事殒命后，他的职务由阿尔贝特·施佩尔接替。托特协会仍旧沿用他的姓名。

见 1942 年 9 月 8 日希特勒的命令。“我下令在两方集团军防区内建造的广泛的海岸防御工事，使得有必要把占领区所有可用的工人都派去从事这项工作，并为这项工作竭尽其生产能力。先前分派的、由这些国家调拨去的工人是不够的。为了增加入数，我下令采用强迫劳动，并禁止未经占领区当局许可擅自更改工作地点。而且，对于应予征召去参加劳动的人，今后在发放食品和衣着配给证时，一律应凭就业证。拒绝接受指派的工作，以及未经主管当局同意擅自离开工作地点，就将导致收回其食品和衣着配给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26 卷，第 150 页（556（2）-PS）；英译文载同上书，第 3 卷，第 455 页〕关于德国招募外国劳工的方法，较为全面的叙述，见下文，原著第 242—247 页。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26 卷，第 10 页〔407（VIII）-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394 页。

见上文，原著第 166—167 页，第 193—194 页。

见下文，原著第 230—281 页。

备劳动力已经不足以应付对他们提出的全部需要了；

工将不再从这些国家调到德国来，因为现在工作必须在这些国家的境内完成。几个月来——我有时在一个月内在这些国家去视察两次——人家一直说我是一个毫无理性跑遍了这些国家去榨取劳动力的傻瓜。说实话。甚至法国所有的省份都奉到通令不得满足我的要求，因为就连德国当局也在争论，绍克尔究竟是不是傻瓜。在同一篇讲话里，他后来又说：我要清楚而大胆地声明：我认为，就法国供应的劳动力而言，滥用受保护的工厂这一概念，包含着对德国劳动力供应的重大危险。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决定，要我的助手同军备当局一起，到所有的工厂去进行搜罗，那末劳动力的这一来源将来也仍然会遭到限制，不能为德国所利用。假使这样，元首向我叙述的计划就很可能失败，意大利的情形也是如此。

于是这场争论就呈交希特勒去解决。在 1944 年 3 月 17 日的一份备忘录中，绍克尔重申了他的不满，并且声称，他的 1944 年的整个招募计划由于在被占领国家内广泛储备工人而受到了危害。“为了确保军备任务和调拨分派到的平民名额而指定一些受保护工厂一事，在西方占领区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并采用了这样的方式，以 PGN0379.TXT/PGN>致要顺利而有条不紊地执行招工任务已经不可能了。”作为答复，施佩尔于 4 月 5 日也提出了一份备忘录，阐明了这个问题的相反的一面。他说，被占领各国的生产，240 对德国作战是必不可少的，由此而产生的对后备劳动力的要求，并不过分，而且他认为是可以很好地得到满足的。从 7 月 11 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施佩尔发

表的一项声明来看，很可能这场争执的解决是对他有利的。施佩尔部长说，他对于推动为德国招募更多的劳工的工作和对于维持德国境外的生产这两方面都得加以关注。到目前为止，德国的战时生产有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是由西方占领区和意大利提供的，单是意大利就提供了百分之十二点五。元首新近决定，这项生产必须尽可能长时期地维持下去，尽管已经出现了不少困难，特别是在运输方面。

绍克尔声称，单在法国，大约就有五百十五万工作年龄的人受到保护，可以不被招募到德国去。其中有八十九万人是军备企业的雇员，五十五万人是属于“受保护工业”一类的民用品厂商的雇员。此外，也包括在上述总数中的，有农业方面雇用的二百七十五万人，铁路和运输方面的四十五万人，托特协会的十五万人，以及其他在德国空军和海军的建筑工程中，在林业和在宪兵中工作的人（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3卷，第181页（3819-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760—761页）。

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3卷，第183—186页；《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763—765页。施佩尔声称，西方占领区内限制性的军备和战时生产企业中受保护的工人总数当时仅为二百七十万人（后来增至三百万人），这个数字仅占总人口的一点二一。比较起来，德国的相应数字为一点八。

1944年7月11日在德国总理府召开的各部门首长会议的记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3卷，第190页；《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769—770页）。

此后不久，西方盟国挺进的部队就使这场争论失去了意义，因为从那时起，生产不得不在任何有可能进行生产的地方在一种特定的基础上进行了。

（三）德国在国外雇用劳工的规模

除了在德国本上雇用的人以外，为德国的作战从事工作的总人数，至今还没有人作过全面的估计。在战争的全过程中，人口一直不停地流动，“不论运往德国的人数多么大，不是送往德国，而是送往他们本国的其他地方或者送往其他占领区的人数，也许还要大”。

的在法国工作的人，另外又提供了九十九亿一千七百六十四万个工时。因此，可以说，德国人从那些在法国工作的法国工人那里得到了一百五十亿零五千三百九十八万九千个工时，而从那些在德国工作的法国人那里则只得到了七十七亿四千八百五十六万八千个工时。

第三节 德国给予外国劳工的待遇

（一）基本原则

德国对待外国劳工的态度以德意志民族人种优越的学说为其基本原则。这种“主宰民族”的理论由德国驻乌克兰的专员埃里希·科赫用下面这句话表达了出来：“我们是主宰民族，因此必须记住，从人种和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最卑贱的德国工人也比这里的居民高贵千倍。”这个方针的实际应用，必然使欧洲的非德意志人口的权利和利益完全从属于他们的德国主子的权利和利益。一个俄国人，一个捷克人的遭遇如何，我丝毫也不关心。这些民族所能提供的象我们这样优良的血统，我们将予以接受，必要时把他们的儿童掳来，由我们在这里抚养成人。这些民族繁荣昌盛还是活活饿死（原文用 verrecken，《1939—1945年……法国蒙受的损失》，第9卷，第56页。1943年3月5日在基辅召开的国社党会议上科赫发表的演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

庭》，第 27 卷，第 9-11 页（1130—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3 卷，第 798 页）。是指牲口倒毙），只有在我们需要他们作为我们文化的奴隶这一点上才使我关心，否则，我根本就不关心。一万名俄国妇女在挖反坦克壕时是否累倒，我关心的只是为德国挖的反坦克壕是否完工这一点。在不必要的场合，我们决不应该粗暴无情，这是无疑的。……但是，为他们操心，给他们理想，从而使我们的子子孙孙更难以对付他们，那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同胞犯罪。

占领国家来的人，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区别。不过，在这一类人里，按照技术高低给予的不同待遇不下于按照国籍的区别对待，因此，总的说来，匈牙利人、瑞士人、丹麦人和佛兰芒人作为熟练工人得到了最好的待遇，甚至政治上被认为不可靠的法国人和荷兰人也比技术较差的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和西班牙人过得好些。促使德国严厉对待外国劳工的另一个因素是，雇用大批外国工人在德国工作和明确表示“要划出更清楚的种族界限”的长期目标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产生了两个主要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纳粹领袖们在战争期间一直不断加强这种雇用的临时性质，随后又未能提供必需的设施以解决这些工人的食宿问题。第二个后果是，行政当局经常感到有必要向德国人民证明外国人的卑贱地位。后者的结果是排除了把任何形式的民权给予在德国工作的外国人的可能性，并强调了把外国人同德国人隔开，以符合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学说的必要性。

（1）招募

大战期间，德国对于招募外国的平民劳工并没有遵循一项始终如一或前一贯的政策。某一时候在某一国 243 家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受到各种因素的支配，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和工人的祖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属于何种类型，当时需要劳工的迫切程度，以及对于人种低劣这一概念的应用情形。所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从自愿应征直到强迫押送。由于有时候在一个地方同时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招募方法，所以情况更形复杂。不过，总的趋向大致如下：在德国以东的各国，等占领军取得控制权后，立刻就进行了强迫招募，但是在西方，这种方法一直推迟到劳动力情况恶化以后，也就是说，直到 1942 年方才采用。可是，某些地区在 1942 年前没有发生过直接强迫的事，并不表示大多数工人是完全自愿地选择到德国去的。根据绍克尔在 1944 年 3 月 1 日向中央计划委员会发表的讲话，“来到德国的五百万外国工人中，甚至没有二百万人是自愿来的”。

在任何办得到的地方，如数提供所需招募的工人送往德国去的责任，是留给有关工人的本国行政机构的，这样便减少了对德国劳工组织的压力。可是，这一点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取决于这些机构是否愿意合作。在有些盟国和中立国里，德国对劳工的要求被欣然接受，至少在战争的头几年是如此。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劳工移居到德国乃是一项传统的政策。鉴于战争爆发后，正常的经济活动业已停止，造成了就业人数的减少，这项政策就证明是更加可取的了。德国同这些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新的双边协定，规定把季节工和长工运送到德国。根据大多数这类协定，德国的合伙国家负责对应召的工人先行挑选，最后的抉择则由德国劳动机构派驻当地的代表作出。可是，在大多数国家里，德国并不能指望当地人民对 244 它的招募政策给予多少积极的支持。它于是被迫成立了自己的机构来招荐劳工。这些机构有时同原有的机构并行不悖地工作，有时则完全取代了它们。在合并区，劳工组织全被并入了

德国的劳工体系，招募工作大致按照旧德国的方式进行。

在战争的后期，德国在欧洲占领区各地的招募方法是非常相似的，强制性的征募往往总是通过暴力来进行——这已经成为常例。不过，在西方占领区，在实行强制性招募之前，先采用了种种其他的不那么严厉的措施，只是在劳动力情况变得非常严重以后，先前一直认为只适于用在“劣等的”东方民族身上的野蛮手段，才在西方广泛地予以应用。

最不费力的招募方法，也是在西欧最初使用的方法，就是说服工人自愿移居到德国去。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着重指出到德国去做工不仅对工人本人，而且对他的家属所带来的好处。通过报纸和无线电广播，通过散发引人入胜的小册子和举办群众大会，德国人企图诱骗男男女女自愿到德国去做工。对于那些自愿前去的人，答应给他们高工资，答应提供方便让他们把工资中的很大一部分汇回家给他们的家属，答应给予良好的生活条件，答应定期有探亲假，不扣工资，还答应让他们参加比别处已有的远为先进的德国社会保险计划。

当时普遍存在的情况有助于这项政策的成功。在西欧，军事行动固然很短暂，却使生产资源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经济也全面脱了节，而德国侵略者直接执行的掠夺政策，则使这种情况更形恶化。失业现象十分普遍，德国人提出的高工资和优惠条件全很动听。

可是，几乎立刻就变得很明显，自愿应征不大可能为德国提供需要的工人的人数或工种。对于劳动力的需要日见增加，加上有关德国真实情况的消息的传播，这就有必要在西欧采用别的招募方法。他们使用了各种间接的强制性措施，其中最常用的是对那些被宣布身体合格但拒绝自愿到德国工作的人取消其失业救济，不发粮食配给证，以及把当时选定要调遣到德国去的某几类或某种年龄的工人强行解雇。德国在被占领国家实行的关闭工厂和延长工作时间的政策，也增加了失业的人数，从而使可以采用上述方法强迫前往德国的人数有所增加。

与此同时，在东欧被占领区，强迫应征从一开始就是常事。在总督辖区成立民政机构的第一天，对波兰人就规定了劳动义务，对犹太人则规定了强制劳动，而1940年2月的另一道法令更进一步规定：遵照第一道法令证募的人可以送往德国去从事农业和其他工作。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于1941年12月19日颁布了一道类似的法令，规定在以前的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被占领区内也采用强迫劳动的办法。

德国先对波兰劳工，后对“东方”劳工提出的需要是如此之大，以致强迫招募的方法势在必行。早在1940年5月10日，弗朗克的日记中就记下了下面这一段话：“根据德国的要求，现已颁布法令，鉴于自愿去德国服务的人力不够充足，可以实行强制。这种强制意味着大有可能逮捕波兰男女。”在德国以东的全部占领区内，为了使德国获得越来越多的工人，恐怖、暴力和纵火无所不用。那些拒不应征的人，他们的产业全被烧光，他们的亲属也遭到逮捕并被关进强迫劳动营去；不仅在大街上，而且还到住宅和教堂里进行搜捕。1942年10月25日的一份246备忘录，对于在俄国被占领区所用的招募方法作了如下的笼统叙述：

东方占领区工作义务实施条例，1941年12月19日（迈尔编，IIII，BA5经济）。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376页（2238—PS）；《纳粹的

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884页。又见下文，原著第557页。

“拒绝工作的人，其产业应予烧毁，其家属则应作为人质加以逮捕，并押往强迫劳动营。”（1942年9月21日驻卢茨克总专员的指令，转引自1943年11月12日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给政治部工作组的一封密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329—331页（290—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241页））“近几个月内使用得越来越频繁的那种不适当的寻找劳工的方法，使得全面紧张不安的情绪更为剧烈。在城镇和乡村，在大街、广场、车站，甚至教堂和夜晚在住宅里到处进行的任意而无情的搜捕，大大动摇了居民们的安全感。”〔1943年2月乌克兰主要委员会会长给弗朗克的信件（《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7卷，第300页（1526-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80页）〕关于在乌克兰招工的情况，又见下文，原著第639页。

在目前对斯拉夫人普遍进行的漫无止境的虐待中，所用的“招工”方法也许只有从贩卖奴隶的最黑暗时期才能找到其根源。经常展开搜捕，不同健康状况和年龄大小，把人民运送到德国去，结果立刻发觉有十万多人患有严重的疾病，或有种种缘故不能干活，国而不得不再遣送回去。

接受强制劳动，并可送往德国。在荷兰，全体居民从1942年3月起，也有义务或是在本国，或是到外国去参加劳役。到了1942年秋天，强制劳动服役在大多数被占领国家和被统治的国家里已经成为常事，虽然在被统治的国家里，这种眼役主要是为了提供劳动力来为德国当局进行建筑和其他工作，来保养运输设备和从事农业，而把劳工送往德国去则只是次要的。丹麦的情形是一个例外。在1943年8月的那场起义以前，它一直作为德国的“模范”保护国而受到优待。从那时起，随着在东方丢失了土地以后，在别处，特别是在法国和仍然受到德国控制²⁴⁷的那一部分意大利地区，招募工作强化了，因为据认为这两处还有大量的后备劳动力。西方盟国于1944年夏天在诺曼底的登陆，带来了一个新的、更为不顾一切的招工阶段，终于把能够找到的体格健全的男子全都抓了起（《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驻军司令官公报》，第87号，1942年10月7日。又见下文，原著第485页。

库利舍尔：《欧洲人口的移动》，第141页。又见下文，原著第503页。

见下文，原著第519—528页。

在法国，直到那时情况一直是特殊的，德国人坚持要求提供熟练工人，赖伐尔也同意不时供给工人，一面又强调自愿应征比强制征募好处多。自愿应征的原则在1942年11月以前一直没有放弃。甚至那时招募工作也不是按照1942年8月22日绍克尔的命令，而是根据维希政府于1942年9月4日颁布的法令进行的，关于详情，见下文，原著第409页，以及《国际劳工评论》（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1944年1月号和1945年3月号。在意大利，当墨索里尼于1948年夏天下台后，德国控制下的地区的招工工作同其他占领区所遵循的方式大体相同。关于详情，见下文，原著第322—324页，以及国际劳工局：《德国如何利用外国劳工》，第39—41页。

来。

应住处的，大多数工业工人却住在营房里，不同国籍的人²⁴⁸有各自的营房，至少有各自的营棚。在德国人看来，这种安排具有明显的好处。它不仅花费小，而且减少了监督的问题和把外国工人同德国工人分隔开的问题。虽然理论上，这些营房是旨在供给外国工人良好的设备，但是事实上，它们

在许多方面都有缺陷。大多数营房都是因陋就简地仓促建成的，没有足够的家具供应，甚至连必要的桌椅或盥洗设备也没有。营房里住得过于拥挤；冬天，由于配给的燃料根本不够而非常冷。在战争的后期，情况更进一步恶化：不仅弄到德国去的外国人日益增多，而且各种材料都缺乏，这也意味着必要的修理往往无法进行。

粮食的情况同样不能令人满意。虽然除来自东方占领区的人外，外国人有权领到相当于他们工种的德国人所获得的配给量，但是事实上，由于种种相对的非常不利的条件，他们吃了亏。德国工人可以随意更换配给证，而外国人则不得不把配给证交给营地的长官，然后到公共食堂去就餐。“工人们必须到营地上的食堂去就餐，那里配给的数量，比他们凭配给证应可领到的要少得多。”在购买不配给的食品的条件方面，外国人也受到限制。249“德国当局对于暂时或经常不实行配给的食品采取了其他的管制措施，例如顾客身分证、顾客记录表和家庭购物证等等以限制其出售。禁止店主把不实行配给的商品卖给没有正式列入这些记录表或没有领到这些证件的顾客，违者严惩。”由于实际上没有几个外国人持有配给证，他们显然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补充他们的配给量。

在粮食供应方面，待遇特别差的是从东方占领区来的外国工人，尤其是俄罗斯人，其次是乌克兰人、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和波兰人。其他的外国人至少有权享受和德国平民一样的配给量，但是东方工人却明文规定得不到这些供应。“俄国人是容易满足的。因此应当少给他们“外国工人领到的口粮，是德甲粮食与农业部长所规定的。这基本上就是德国平民通常的口粮。住在营房期间，集体的伙食一直都保证供应。在这方面，必须在战争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照顾到外国工人本国的风俗习惯。”〔劳动力分配全权代表的第四号条例：《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2卷，第211—212页（3352-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763页（3044—PS）〕法国政府（战俘和遣送出国人员管理部）关于将法国工人送往德国的官方报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9卷，第195页（078（3）-UK）〕国际劳工局：《德国如何利用外国劳工》，第98页。

吃些，免得我们的粮食平衡受到严重的破坏。不应把他们养娇或让他们吃惯德国的伙食，而应使他们感到满足，并保持同派给他们的任务相称的生产能力。”

（3）雇用条件

德国当局对于自愿到德国工作的人，曾经答应给予250优厚的工资、合理的工作时间和固定的假期等等。这些许诺全没有兑现，那些获得保证可以同德国工人享受同等待遇的人，发现自己的处境大不相同。就算他们的物质境况同德国工人一样（实际上并非如此），也还有某些不利之处使得在德国工作的所有外国工人都感到苦恼。那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工作，讲一种陌生的语言办事，感到自己正被迫为一场往往是针对着自己本国同胞的战争出力。虽然从西欧自愿来的工人的条件已经令人不满了，从东欧来的工人的条件却更为恶劣得多，因为德国人曾明白表示不给予他们和德国人同等的待遇。

除明文规定不列在内的人外，所有的外国人都有权支取和他们同工种的德国人所支取的相等工资。但是对于同一工种付给相等工资的做法，决不能

保证一个熟练的外国工人就支取到和同样熟练的德国工人相同的报酬。例如，派给外国人做的工作，往往比他们在国内惯做的工作级别要低，而他们的工资也就按照这种熟练程度较差的工作级别支付。从西欧和中欧来的绝大多数工人还得按德国规定纳税并对社会保险计划缴费，虽然从这些计划中他们当然决不能希望得到全部的好处。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另一种不满的原因关系到汇钱回家给 PGN0396.TXT/PGN>家属的问题。在大多数被占领国家内，通货膨胀得很厉害，可是汇款的兑换率并没有大幅度地改变，结果汇出的款项的购买力大大地降低了。东方工人和犹太人则受到另一种不同的待遇。官方曾经声明，德国的劳动法规和劳动保护条例只有在特别指定的范围内才适用于俄国人、波兰人和所有的犹太人。他们不仅工资被定得特别低，而且交税的税率也要高得多。俄国工人最受歧视，他们必须缴纳一种特别的“东方税”，从而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工人倘使每星期所赚的工资在十马克至七十马克之间的话，他只能领到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在发薪时作为缴纳德国的税款都给扣除了。税率定得非常高，因此一个工人不问工资多么大，每星期的收入决不会超过十七马克，其中十个半马克又被雇主作为伙食费和住宿费而扣去了。东方工人的条件是如此恶劣，以致从 1942 年夏天起，曾经作过 251 某种努力想来改善情况。每星期十七马克的最高限额取消了，工资等级稍许提高了一点，东方税相应地降低了。最后，根据 1944 年 3 月 25 日的一道命令，专门用于东方工人的工资制度也废除了。可是，总的说来，东方工人。从这些改变中实际上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大的好处。

除了从苏联被占领区和前波罗的海国家来的工人外，所有外国工人按规定都有固定的探亲假。但是拿波兰人来说，只有工业工人依法有权享受这种假期，而在战争的大部分时期内，甚至这些人的权利也被暂时停止了。有许多来自西欧的工人在战争的初期获得过度假、但是由于发放必要的证件和运输方面的困难，加上德国当局不愿意失去（即便是一个短时期）任何劳动力，这就意味着批准外国人的休假变得越来越罕见了。

在德国的工厂和田地上工作的外国工人，都要工作很长的时间，每周很少有不足六十小时的，尽管随着战事的发展，工作日的氏度和每一工时的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了。为了试图补救这种局面，德国当局采用了许多措施，从公开的高压到答应改善条件和增加工资。到战争末期，高压手段用得越来越频繁，工作时间延长了，因此到 1944 年秋天，要求外国人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时，中间只有一小时的休息。

（三）战俘

战争爆发以前，德国就已经认识到战俘作为劳动力来源的潜在重要性。他们发布过命令，规定万一发生战争时，将俘虏作为工人使用，并强调了同招募民工的当局密切协调的必要性。

根据 1929 年 7 月 27 日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条款，使用俘虏是准许的，但是关于可以使用的战俘的 252 种类和可以要他们去做的工种，都订有严格的规定。交战国可将军官和与之地位相等的人员以外的身体健壮的战俘，按照其身分和能力，作为工人使用。但倘使军官和与之地位相等的人要求适当的工作时，应尽可能为他们安排此项工作。被俘的未授军官衔的军官，除明白要求从事有报酬的工作外，一概可以强迫他们仅仅担任管理的工作。对于可做的工种则作了如下的规定，战俘所做的工作不得同作战有关。具体他说，

禁止使用 1939 年 1 月 28 日经济事务全权代表给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信件〔《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36 卷，第 545—549 页（488-EC）；英译文载《文件，1939—1946 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 2 卷：《希特勒的欧洲》，第 19—21 页〕。

英国外交部：《关于战俘待遇的国际公约》（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敕令第 5941 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31 年版）。

俘虏制造或运输任何种类的武器或军火，或运送指定供作战部队使用的物资。

使用的战俘（5 月 31 日的统计数字）

1940348, 00019411, 316, 00019421, 489, 00019431, 623, 00019441, 831, 000 关于战俘生活条件的规定，也同关于使用条件的规定一样遭到忽视，而最受虐待的仍然是俄国人。他们有几十万人确实是饿死或冻死在我们的营房里，这件事对我们的友人或是敌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据说是手头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他们。特别奇怪的是，唯独苏联战俘缺乏粮食供应，而波兰、塞尔维亚、法国、英国等其他国家的战俘，对于所受待遇发出的抱怨，却并没有变得很强烈。可是，在许多情况下，其他国籍的战俘受到的待遇，也决不符合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最低标准。

（四）集中营的劳工

鉴于大战期间德国出现的严重缺少劳动力的情况，放着大批闲置未用的人（虽然他们受到严密的监禁），显然是违反德国的利益的。因此，希姆莱在 1942 年春天作出决定，要在可能的最大范围内动员集中营里可加利用的劳动力。战事已经引起了集中营结构上的显著变化，并改变了集中营在使用囚犯方面的职责。单纯为了治安、教育或防范的缘故而把犯人拘禁起来，已经不再成为主要的理由了。当前为了这场战争，在不久以后的和平时期为了建设，把所有适合工作的囚犯动员起来，越来越显得重要了。根据这种认识，产生出了某些必要的措施，其目的是把集中营改变成更适合于执行经济任务的机构，而在过例如，见《法国政府关于德国人违犯国际公法和惯例虐待法籍战俘的正式报告》（Official Report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concerning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Custom committed by the Germans against Prisoners of War of French Nationality），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39 卷，第 162—171 页〔078（2）-UK〕。又见 1945 年 10 月 15 日威廉·耶格尔博士（1942 年 10 月 1 日起担任克虏伯工厂工人营的高级营医）的供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35 卷，第 61—62 页（288-D）；《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7 卷，第 5—6 页〕。

见下文，原著第 254 页。

去它们仅仅同政治有关。

队首长让他们工作到死。受到保护性拘留的人、犹太人、吉普赛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刑期在三年以上的波兰人、刑期在八年以上的捷克人和德国人，都将依据德国司法部长作出的决定移交出去。

长得异乎寻常的工作时间所造成的后果，由于犯人被迫在其中生活的骇

人听闻的条件而加剧了。营房里十分拥挤，简直没有或根本没有提供什么家具或被褥，卫生设备多半根本没有。在隶属于埃森的克虏伯工厂的洪堡街集中营内，犹太女人“没有鞋子穿，赤着脚走路。每个人仅有的衣服是一只麻袋，袋上有些窟窿让脖子和脑袋伸了出来。”粮食供应全然不足。在布痕瓦尔德，配给量每天为六百至七百卡路里，通常总是用卷心菜和其他蔬菜烧的极淡的汤，早晨一小块面包，晚上一小块面包。

使用集中营犯人一事原先由希姆莱以党卫队头子的身分负责，但是到了1942年秋天，施佩尔作出了安排，把这个劳动力来源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这个行动的目的，是在施佩尔领导下的工厂中，使用犯人以增加生产，因为在那里工具和设备全可以保证供应。为了补偿这项损失，他们商定希姆莱应当为党卫队分到一部分军备产品。²⁵⁵ 这些协议为全面使用集中营劳动力大开了方便之门。希姆莱保证供应这类牺牲品，他除了采取一般性的措施外。必要时还展开特别行动，把那些本来不会进集中营的人也抓了进去，同时生产也由于在重要的工厂附近建造了小型集中营而有了提高。

第六章 运输

战争期间，一个效率很高的运输网是德国所迫切需要的，而欧洲的运输，象欧洲的其他资源那样，也被用来为德国的需要服务。为了这一目的，所有国家的运输网——不仅被占领国家的，还有德国盟国的运输网——都被置于一个控制系统之下。这个控制系统虽然有时仅仅间接地发挥作用，实际上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完善的。德国的运输任务十分繁重。敌人的封锁和越来越多的海外国家的敌对情绪，使它的海外贸易大为减少，从而也减少了海运，但是另一方面，在欧洲境内，运输的需要却不断地增加。战争初期，落入它控制下的地方日益扩大，它所承担的军事义务也就日益扩大。主要物资的缺乏，妨碍了任何大规模更新装备的措施。后来，投在德国控制地区的炸弹重量一天天增加，这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终于在 1944 年秋天把运输业务几乎完全破坏了。直到那时，德国都能满足它的最重要的运输需要，这一点既表明了德国运输机构的冷酷无情，又表明了它的效率极高。

第一节 战争爆发时德国的运输情况

甚至在战争爆发以前，对德国运输网的要求已经开始大为增加。到 1937 年，德国已经做到全民就业，因而对运输的要求也提高了。在这上面，又加上建造齐格菲防线这类军事工程和增加合成原料的生产等所带来的要求。德奥合并和对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的占领，使德国控制下的车辆的数目和设备的数量有了增加，但是总的说来，得到的收获，实际上并不足以抵消在这些国家所承担的新增加的义务。

德国国内的交通运输大部分由德国国营铁路承担。在 1937 年，它的运输量约占德国国内货运吨数的三分之二，经由内河——天然河流和运河——运输的约占五分之一，其余的则由公路或由私营铁路承运。德国的沿海运输处于次要地位，不过即使在平时，它也被用来补充其他的运输工具。大多数运输工具都受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不景气的有害影响，因为它使运输的需要减少并使竞争有所增加，从而限制了发展。德国国营铁路局拥有的车辆数目在 1929 年到 1937 年间减少了，不过这一减少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新车辆的效率提高而获得了补偿。内河航运多少有所增加和改善，但是由于不景气时期的航运危机而实施的不准造新船的禁令，直到 1937 年才取消，不过那时候已经不可能着手进行任何大规模的造船计划了。德国的公路网大为改善，这是希特勒发动的消灭失业运动的一个结果，但是卡车和货车却并没有增加。因为公路的货运受到一种严格的领取执照制度的限制。以防它同国营铁路展开激烈的竞争。商船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因为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的船队被没收后，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内就一直致力于重建船队，所以到 1939 年，德国已拥有一支效率高的现代化商船队。

第二节 变动的军事形势对德国运输情况的影响

除了向波兰进军而产生的要求以外，大战的爆发使德国的运输情况立刻发生了变化。最显著的变化出现在海外运输网和内陆运输网的相对作用上。1939 年 9 月以后，商船的全部作用起了根本的变化。除少数几艘船只 267 有能力突破敌人布下的封锁线，试图把重要的供应品运进德国外，所有行驶国外的远洋航行都放弃了。在战争的其余时期，商船或多或少仅限于从西班牙和瑞典装运某些重要的作战物资，装运军需品，以及在办得到的地方维持沿海的贸易，以便减少内河运输网的负担。商船队获得了从被占领国家夺取来

的船只，加强了实力后，对于这些任务是应付裕如的。

内陆运输的情况则迥不相同。日益增长的军事活动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对运输网的要求，而先前出入德国北部各港口经由海路运输的货物中，有不少必需另找陆上路线来替代，这就对运输网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例如，出 258 口到意大利的燃煤有很大一部分过去是海运的，但在战争的某几个阶段却不得不通过已经很拥挤的铁路取道瑞士运送。德国从东南欧进口的商品也不得不经由内陆路线来运输，其中有一部分通过河流和运河，大部分则通过铁路。这些新增加的要求，必须在供应有困难的背景下予以满足，因为封锁立即造成了某些原料的缺乏，其中最重要的是燃油和橡胶。这种缺乏使公路运输大受影响，结果对民用机动车辆采取了种种限制。这种缩减进一步加重了国营铁路不得不承担起的负担。

战争初期，德国在运输方面承担的义务不断增加，但是总的说来，资源也同时有相等的或更多的增加。虽然由于波兰和东南欧某些地区普遍遭到破坏，运输设备又比较落后，占领这些地方并没有使德国增加多少资源，但是西欧的战役却带来了丰硕的收获。在这些国家，尤其在法国和比利时，运输网非常发达而且效率很高，它们被迫把大批车辆交给了德国人，到了战争后期，甚至把设备也交了出去。荷兰政府在纽伦堡审讯期间提供的官方数字，就是德国征用范围的一个实例：铁路——八百九十辆机车中，征用了四百九十辆；三万节货车中，征用了二万八千九百五十节；一千七百五十节客车中，征用了一千四百四十六节；三百列电气列车中，征用了二百十五列；三十七列柴油列车中，征用了三十六列。一般说来，德国人留下的那一点物资，不是由于损耗和作战就是由于故意破坏，已经糟塌得十分厉害了。除了车辆以外，德国人还把大量的铁轨、信号器材、起重机、转车台、修理车等等送到德国去。德国征用的外国运输工具，决不限于铁路车辆和设备。驳船、机动车、近海和远洋船舶，甚至电车，无一不被德国人用来弥补其本同资源的不足。

德国对苏联发动的进攻和入侵，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西欧，原来的运输工具有很大一部分原封未动便落到了德国人的手中，使德国得以大大增加各种后使德国的运输立刻变得非常紧张。俄国的焦土政策广泛地实行在运输方面，不仅所有的铁路机车和车辆、机动车和驳船全朝俄国内地深入转移，而且大段大段的铁路路轨也被拆下来，不是运走，就是弄得完全无法使用。更麻烦的是，俄国人用的不是欧洲的标准轨距，而是一种宽得多的轨距，这使德国人不经过多方面的改动就无法使用自己的或是从被占领国家夺取来的机车和货车。鉴于有极大数量的物资必须长途运输，以便进行一场德国进攻俄国那样规模的战事，又鉴于任何大规模的重建或更换车辆或设备的方针这时已不再可能实行，这些困难就格外严重了。

在一定程度上，德国的运输问题从 1943 年起有所缓和，这是因为德国的武装部队逐步向本国边界后撤，从而减少了运输路程的平均长度。但是其他的困难又发生了。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特别意味着地中海上的和通过地中海的海运贸易被切断，而德国的敌人不断加强的海军力量进一步又减少了通过大西洋进行贸易的安全性。中立国也开始变得不听话起来。这种情况的一个结果就是 瑞典在 1943 年 8 月废除了一项允许不带武器的军人和欧洲的国际轨距为四英尺八英寸或将近四英尺八英寸，为的是使机车和其他车辆可以到处通行。另一方面，俄国铁路的轨距为五英尺。在德国人看来，使问题更

形复杂的是，俄国人把他们占领的那部分波兰地区的许多铁路也改成了宽轨。

见上文，原著第 191—192 页。

战争物资通过其领土的协定。

可是，在战争的后期，德国运输网不得不应付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倒是敌人投在德国的炸弹重量与日俱增。对于工业区的密集轰炸，使得有必要把一些工厂和大批人员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而与此同时，运输网本身也因桥梁和铁轨、火车货运集结场以及制造和修理铁路设备的中心遭到轰炸而直接受到影响。在整个战争中，投在德国和德国占领区的运输目标上的炸弹吨数十分可观，不过在盟军进攻欧洲大陆开始以前的几个月中，这种形式的攻击加强了，在 1944 年底以前甚至进行得更加猛烈，结果使各种运输工具几乎完全陷入了混乱。

第三节 德国在欧洲各地 260 控制运输的方法

德国对欧洲运输的控制，不仅在全部占领区内是有效的，而且在它的盟国的领土上，甚至在一定程度内在中立国家里，也是如此。但是实现这种控制的方法，同用来控制欧洲经济其他领域的方法一样，各各不同。在可能的情况下，日常的管理工作也是留给地方当局去办理，德国人员只是用来担任监督的职务。

可是，在某些地区，德国人却认为把运输工具置于德国直接控制之下较为可取。这些地区大致可分为两类：

《铁路新闻》(Railway Gazette)，1943 年 8 月 13 日，第 166 页。

《战略轰炸的影响》，第 5—6 页。

一类是已经并入德国或预定要并入德国的地区，另一类是从战略观点看来重要的地区。属于第一类的有奥地利和卢森堡，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法国、南斯拉夫和立陶宛的部分地区；第二类则包括法国和比利时的大西洋沿岸地带，以及俄国被占领的许多地方等。第一类地区的全部铁路都并入了德国国营铁路系统，而在第二类地区，铁路不是由军队就是由德国国营铁路局管理。前波罗的海国家的铁路有一段短时期也由军队管理，但在 1942 年春天却移交给了本国的行政机构去管理。

由于领土的改变，德国人设立了好几个新的运输管理单位，所有这些单位虽然名义上是独立的，事实上却由德国牢牢地控制着。其中最明显地受到控制的是东方铁路局，它设在波兰总督辖区，以接管该地区内前波兰国营铁路公司的职权。东方铁路局的行政管理和财务，都同德国国营铁路局明确地分开，但是所有的高级职员都是德国人，其中有许多是从德国国营铁路局的职员中抽调去的。在其他地方，除已经并入德国的那些地区外，以前的捷克铁路系统被一分为二，分别由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的行政机构管理。在南斯拉夫，他们遵循着大体相同的政策，分别由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政府管理。在所有这些地区，铁路的行政管理理论上一概掌握在有关国家的手里，但每一地区的铁路管理无不受到德国官员的严密监督。

在西欧和北欧，除上文提到的地区外，德国人宁愿让行政结构多少保持原样。但是德国人到处都取得了监督的权力，以便确保德国在交通运输方面的要求全部得到 261 满足，并且比其他国家的交通运输获得优先的照顾。例如，在法国，尽管全国铁路公司继续营业，对铁路的最终控制权却操在德国武装部队交通管理处（后改称交通总管理处）的手中，其中有一个设在布鲁

塞尔，控制着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及东部某些地方的铁路，另一个设在巴黎，控制着法国其余被占领地方的铁路。它们都有分支机构，负责主要地区内的专门一段。然而，不论这些机构的确切名称叫什么，它们的职务却是一样的，即向有关的经营单位发出指示，以便保证德国对交通运输的要求得到绝对优先的照顾。

甚至德国的盟国也没有逃脱对它们运输网的某种控制。早在 1941 年就有报道说，德国国营铁路局的官员控制了意大利的主要铁路车站，而东南欧的重要性（不但作为必不可少的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地区，而且后来还作为进军苏联的基地），意味着德国在战争初期就确立了自己作为该地区运输纠纷的仲裁人的地位。中立国虽然无需顺从德国在运输方面的详细指示，但是由于它们依赖德国的供应，在战争的大部分时期也不得不迎合德国在运输方面的大多数要求。

第四节 德国组织的欧洲运输

对欧洲大多数国家运输网实行的控制，使德国有力量把它的意愿强加给整个欧洲大陆。由于这种控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间接实行的，因此德国人多半不是从德国制订法令，而是在不同的国家同时发布命令，就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事实上，除了某些货运管理处以外，在德国控制下的欧洲并没有设立任何超国家的运输机构。

德国控制欧洲运输工具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满足德国的全部运输需要，如果必要的话，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为了达到这项目的，必须使最需要车辆和设备的地方有这些东西可用，根本不管这个地方是否在拥有车辆和设备的那个国家里，同时还必须使这些可用的车辆获得最为有效的利用。

262 关于德国征用外国运输工具的规模，上文已经叙述过一些。在战争期间，这些运输工具一直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而在德国进攻俄国以后，这种移动更是有增无已。由于德国的车辆被调往东线，所以别国的车辆就从西欧，特别是从法国和比利时调到德国去填补空缺。

他们采取了种种措施以保证最有效地利用当时可用的运输工具。到处都实行了一种严格的顺序安排的办法。

根据这种办法，非必要的运输，尤其是客运，大为减少，而民用运输的需要则服从于必要的战争物资运输的需要。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把货物从较拥挤的运输工具移交给用得较少的运输工具去装运，也就是说，从铁路移到内河，虽然这种转移的范围由于水运旷日持久而受到了限制。在欧洲各地全颁布了规定，以保证货车的满载和机车能力的最大使用，他们还力图以提高停留费来加速铁路车辆的周转。另外，他们又采用了一些旨在要求厂商只向最近的供应者去采购货物以减少运输里程的措施，试图以此来限制对运输网提出的要求。

第七章 财政

第一节 德国国内战时的财政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财政在任何国家都成了一种次要的考虑事项。生产完全受到可以获得的资源——人力和物力——的限制，而增筹资金供给国家购买国民生产中不断增多的产品的需要，决不可能成为一种限制性的因素。通常的价格结构不再调节国家的经济生活，由一种直接控制生产与消费的制度取而代之。纳粹德国从国内资源筹措作战资金的实际手段，同任何一个主要交战国所采用的方法相去无几，所不同的地方只是，民主国家在战争爆发后方才采用的措施，德国却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了。关于战前的这些准备工作，别的著作中已经全面叙述过了，这里只需要把其中比较重要的简略地叙述一下。

（一）战前的财政准备工作 263

1933年后纳粹政府奉行的财政政策不仅非常适于应付不景气这一直接目的，而且非常适于发动战争所必要的各项准备工作。这个国家的财政制度完全从属于党的政治目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是有某些要求的。必须不折不扣满足政府对贷款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必须仔细审查私人对资金的要求，以保证它们的目的完全符合于政府的全盘计划。必须维持稳定的经济，使公众不必为通货膨胀担忧，因为公众对通货膨胀的灾难前不久所造成的后果记忆犹新，同时还使政府需要的原料和货物的价格不致上涨。最后，必须防止私人的消费额有所增加，以免把政府需要用来生产战争物资的劳动力和原料用在别的方面。

提供充足的贷款并将其导入预期的渠道一事，是通过政府将其控制权扩大到银行和金融市场而实现的。政府从1933年起，通过一系列法令，完全控制了德国国家银行，并采用了“领袖”原则，使该行总裁和董事会成员都由德国总统任命。政府的控制确立以后，国家银行的权力便有所扩大，使它有能力的提供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决定的任何数目的公共贷款。到1939年，对于国家银行经营信贷业务的权力已经没有法律限制：“它甚至可以发行货币来购买商业的和财政部的证券和债券，然后把这些证券和债券作为用以购买它们的货币的保证金。对于这种做法并没有任何限制。”

在政府取得对中央银行控制权的同时，他们也在扩大对商业银行的管理。1934年12月5日的德国信贷法使政府可以监督银行业务活动的各个方面，而1934年2月27日的重建德国经济准备法和同年11月27日的第一项实施条例，则采纳了“领袖”原则。根据信贷法，政府不仅能要求知道银行各项办事手续的全部细节，而且能对银行放给客户的任何大额贷款实行严格的控制。

为了对国家的金融生活取得全面的控制，政府不得264不把金融市场也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使其适合于吸收数目越来越大的政府公债这一目的。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分红，降低股票的利息率以防把资金从政府公债引向他途，以及最重要的，大力限制新股票的发行。为了最后这一目的，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每一种预定要发行的股票，并且授于它全权来决定某一种股票的发行是否可能有利于国家。

同调节投资额有关的一个补充问题是，限制个人手中保目的、准备花费在政府认为不必要项目上的款项的数目，并防止因为不加制止地听任增多了的游资去购买数量不变的消费品而可能造成的物价普遍上涨。鉴于大战爆发

前的那几年政府在军备和其他计划上的开支大大增加，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要处理这些问题，最明显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征税。纳粹党侥幸发现：在他们上台时德国存在着一个效率很高而包罗很广的税收制度。这个制度以1919—1920年的所谓埃茨贝格尔赋税改革法为蓝本，是在德国面临巨额的赔款要求时开始实行的，其目的在于征收国民收入的一大部分来应付这些要求。纳粹党未作什么修改，就采用了这一制度。

作为减少购买消费品和防止通货膨胀的手段，除了高税率和控制发放红利外，还有种种有关物价和工资的规定予以补充。物价管制作为经济政策的一种主要武器，早在经济萧条时期就作为布吕宁政府的通货收缩政策的一部分而在德国实行，但在纳粹党的手中，它的作用既经过修改而又予以扩大了。问题从降低原有的物价水平变成在可能的情况下防止物价上涨，而物价管制当局的作用，也从主要从事监督变成主动规定物价。随着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日益繁荣，再加上——特别在1936年以后——大规模的重整军备，几乎在经济的各个领域内都是求过于供。对于重整军备的计划所感到的忧虑，导致德国政府在1936年秋天收紧了对整个物价管理机构的控制。根据1936年10月29日的一项法令，设立了一个直属四年计划组织的新的物价管制委员会。先前授予任何政府部门的监督、批准或规定物价的全部权力，都移交给了物价265给了他。他不仅负责为到达最后消费者手中的商品规定价格，而且负责对生产过程各个中间阶段中的价格也进行监督。

从1936年起，德国物价政策的基础就是1936年11月26日的冻结物价法令。根据这项法令，除特别许可的外，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禁止任何物价提高到超过1936年10月17日的水平。由于物价冻结不仅冻结了个别商品的价格，而且冻结了各种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例外的情况在随后几年中必然非常多，到1940年中期，总计达到七千起左右。但是总的说来，物价水平却保持得相当稳定，批发价格的指数（以1913年为一百）从1936年的一百零四点一上升到1939年的一百零六点九。

由于经济萧条造成了普遍失业，工资管制的必要性比物价管制的必要性晚得多才显露出来。诚然，必要的权力早在行使以前就已经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了。1934年1月20日的劳工管理法具有把工业关系的组织工作奥托·内森：《纳粹的经济制度；德国的战争动员》（Otto Nathan：The Nazi Economic System；Germany's Mobilization for War），北卡罗米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44年版，第222页。

《法令公报》，1936年，第1部分，第955页。

内森：《纳粹的经济制度》，第236页。

德国，美军占领区州议会：《1928—1944年德国统计手册》（Germany, Landrat des Amerikanischen Besatzungsgebietes : Statistisches Handbuch von Deutschland 1928—1944），慕尼黑，弗朗茨·埃伦维特，1949年版，第460页。

《法令公报》，1934年，第1部分，第45页。

直接置下政府控制下的效果：实行了劳工信托人的办法，授权他们颁布有关工资和雇用条件的“集体规则”，以代替先前雇主和工人之间的集体协议。当1938年初劳动力严重缺乏，提高工资成为普遍的趋势时，劳工信托人根据同年6月25日的一项法令有权在劳工部指定的工业中规定最高的工资额，并且要求雇主在给予工人较好的雇用条件以前应先征得劳工信托人的同

意。尽管由于亟需劳动力，雇主还是设法通过发放住房津贴、增加家属津贴，以及通过种种其他方法来规避这项命令，可是在 1933 年到 1939 年的这段时期内，工资几乎一直是稳定的。

（二）战时的措施

正如上一节中所说的那样，为战争筹集经费的整个机构，早在进攻波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战争的爆发在 266 财政政策方面并未造成任何根本的改变，只不过加紧了限制，并通过对生产和消费的直接控制，进一步代替了财政上的控制。

大战期间，并没有设想出几种额外的收税方法来，国家的开支由税收支付的部分不断地减少。赋税法的头一次改变，是随着 1939 年 9 月 4 日的战时经济法令而发生的。这一法令采取了三项措施，即：对所有超过二千四百马克的收入征收附加税，对销售的烟草和酒类征收百分之二十的战时特别附加费，以及要求各州、各地方当局和其他公共团体及半公共团体缴纳一笔战时捐款。此后并没有作过任何进一步的改变，直到 1941 年夏天，才把对烟酒的附加费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对股息开始征税，并在公司税之外增收百分之二十五的战时附加费。唯一重要的其他改变，就是通过互相让步解决了 1924 年的税款争端。这笔税是强迫房主缴纳的，为的是赔偿他们用房屋抵押的贷款由于通货膨胀而造成的贬值。按照新的规定，房主在最后结账时应付出一笔相当于每年金额十倍的款项。

由于税收的增加跟不上政府开支的增加，不得不另找筹款的方法。部分赤字靠了在被占领国家进行征敛而弥补掉了，但主要的财源却是在国内借债。德国政府主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百分数 84.045.435.830.431.620.916.2 资料来源：理查德·W·林霍尔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财政概况”，《美国经济评论》（Richard W. Lindholm：“German Finances in World War II”，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47 年 3 月，第 128 页。

《法令公报》，1939 年，第 1 部分，第 1609 页以后；英译文教《文件，1939—1946 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 2 卷：《希特勒的欧洲》，第 21—28 页。

见下文，原著第 267—278 页。

要依靠的方法是所谓“静悄悄的筹款”，也就是说，由国家直接向信贷机构和银行借款。并没有向公众发出全面的呼吁，要求他们认购战时公债：事实上，直到战争的第三年，采用了“铁的储蓄”计划后，才试图利用个人的收入。可是，由于是自愿参加的，而且每月的储蓄额起初限制为二十六马克，后来改为三十九马克，因此这项计划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在正常的经济情况下，“静悄悄的筹款”可能会产生灾难性通货膨胀的后果，但是在德国，这种通货膨胀的趋势受到强有力的控制。在外国进行的征敛，由于增加了可以获得的商品数量而又丝毫未增加流通的货币数量，所以大大削弱了通货膨胀的趋势。对物价和工资的管制，总的说来，在战争期间一直是有效的。1936 年的冻结物价法令仍然是物价政策的基础，可是它具有某些新 267 的特点：凡未尽最大可能来降低物价者均应定罪惩处。1939 年 9 月 4 日的战时经济法令禁止用提高物价的办法来转嫁由于战争风险甚或战争损失而增加的成本。

一百零九点九，再升到 1944 年的一百十三。工资总的说来，一直也比较

稳定，名义工资稍有增加，但另一方面，实际工资却有下降之势。

战争期间，对经济领域各个部门的财政控制日益加强，甚至还由直接控制所取代。就个人来说，广泛的管制制度意味着仅仅有钱已不再有权购买商品了。假如不同某种许可证配合使用，那就只好把钱储蓄起来，从而通过信贷机构或银行自动地提供给国家使用。

第二节 德国对外国的剥削

德国同它的大多数敌国不一样，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自己并没有任何丰富的同外资产可以用来补充国内对战争的支援。可是它靠了种种手段，的确成功地大量利用了其他国家的资源。甚至在大战爆发以前，通过实行限制马克流通的安排和票据交换的协定，它已经为一种剥削制度奠定了基础，而战争的爆发和随后德国在欧洲控制的土地的扩张，更大大增加了它的机会。在被占领的国家里，财政手段只是德国可以用来取得它所需要根据《1928—1944年德国统计手册》，第460页。每小时平均总收入的指数（以1936年为100）如下：

名义实际 1939 108.6 107.2 1942 118.2 108.6 包括苏台德区和东方合并区
1944 118.9 104.7（《1928—1944年德国统计手册》，第472页）。

的东西的方法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武力来夺走对德国作战有用的一切东西，完全是办得到的。但是财政方法却有某些非常明确的优点。它给这种行动蒙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使剥削的过程更方便一些，至少在德国的意图还未被人完全识透的初期是如此；它保证了对细节的尽可能严密的控制和监督，并且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欧洲的工业和银行业系统能按照德国的要求进行改造，同时，这些措施又不用德国破费分文，因为管理的费用一律由被征服的国家、卫星国和中立国出钱支付。

德国人所用的财政剥削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从没收和强迫收购被占领国家拥有的黄金和国外资产，直到在它同被占领国、中立国和盟国的结算帐目上一律积欠下大笔的债务。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方法外，最重要的措施是干涉被占领国家国内流通的货币，把这些货币同德国马克的兑换率人为地定得很低，勒索占领费，征收罚金，以及改造并周密地控制被占领国家的银行系统。

（一）德国信贷银行

德国人占领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以后，财政上的第一桩需要就是提供一种支付的手段，以满足占领军和行政单位的要求。在以往的战争中，占领军往往依靠使用自己本国的货币或是当地的货币，可是这两种方法都有人表示反对，于是德国人决定，在能够设想出一种比较持久的制度以前，先发行一种新的、临时的交换媒介，即德国信贷银行纸币，以应付他们的需要。这些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在被占领国家内按固定的兑换率同该国的货币一起流通，兑换率通常大致相当于入侵前的比率，它们不能随便兑换成德国国家银行的钞票。这是一项必要的规定，用来防止因发行大量德国信贷银行纸币而造成的通货膨胀影响及于德国本土。

德国信贷银行起初是根据1939年9月23日的一项法令国货币的准备金，在德国国家银行和各票据交换所的贷方余额，德国国库债券的准备金，以及给予德国的贷款。

除了在德国占领下的俄国领土上外，德国信贷银行纸币的流通大都是临时性的。等到可以同当地政府就供应足够数量的当地货币问题作出安排后，

这些纸币随即逐步收回。至于信贷银行本身是否停业，这要看它们所在的地区而定。在合并区，它们全改成了德国国家银行的分行，它们发行的纸币兑换成了德国马克。在西方占领区、希腊、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这些银行全部停业。在总督辖区、乌克兰和奥斯兰，由于正常的银行结构已经完全打乱，而且成立了一些新的发钞银行，信贷银行就改成了这些银行的分行。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由于同那里的政府达成了协议，使德国军队对货币的需要立刻得到满足，所以没有发行德国信贷银行纸币，信贷银行的活动仅限于充当结算和汇兑的机构，以及充当德国政府和当地政府进行联络的媒介。在匈牙利，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只在 1944 年春天使用过一个短时期。

在任何时期，德国信贷银行的数目都变动很大。1942 年底有五十二家，但是下一年有二十家歇业，十六家被接过去改为奥斯兰中央银行的分行，而在意大利、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和门的内哥罗，则新开了二十三家信贷银行。

（二）黄金和国外资产的没收

德国人占领任何国家以后，立即采取的另一个步骤是，没收该国中央银行拥有的黄金和国外资产，以及褫夺或废除其处理其他银行或私人拥有的黄金和国外资产的权利。然后，德国便使用这些资产作为资金，在那些提出要求、并能坚持要德国用可以流通的货币来偿付的盟国和中立国内购买货物。

从各国中央银行没收的金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银行能否在德国占领军进入该国以前就把一部分存款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在奥地利，没收的黄金和外汇合计大约有四亿五千万先令，在 1938 年夏天支付重要的进口商品时便成了一笔非常有用的资金。后来，德国人又接收了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比利时的一部分黄金储备。德国人没收比利时黄金的经过，多少有点曲折。在比利时遭到入侵以后，有些黄金储备就委托法兰西国家银行保管。当法国的沦陷迫在眉睫时，比利时要求把它存在法国的黄金送到美国去。可是，这宗黄金只送到达喀尔为止。德国人在占领法国后，要求取得它，终于从那里把它先运到马赛，随后又转运到柏林。

对于私人持有的黄金和国外资产，德国人在占领后立即采取的步骤是：禁止一切外汇交易，下令对私人持有的全部黄金和外汇进行登记，并限制使用敌方的帐户，最后，竟命令个人一经要求立即交出全部黄金和外汇，按照官价卖给中央银行或任何指定的机构。1940 年 8 月 2 日在比利时颁布的条例，就是这种做法的一个例子。在本条例生效后，比利时的居民……必须在 1940 年 8 月 31 日或该日以前，向布鲁塞尔发钞银行的各地分行交出并一经要求即行出售和转让下列资产：

- （1）美元钞票；
- 瑞典克朗钞票；
- 瑞士法郎钞票；
- 法国法郎钞票。

（2）金币、足赤纯金及未加工或半加工的成色不足的金子。《驻比利时国家银行专员的年度报告》，1940 年 5 月至 1941 年 5 月〔《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7 卷，第 646—647 页（24—ECR）〕。法、比两国的国家银行于 1944 年 10 月 19 日达成最后解决办法，把相等数量的黄金从法周运到了比利时。1947 年，法国又从德国取得了黄金作为赔偿。埃米莉·w·托曼：《对

比利时某些金融法和制度的初步研究》（Emily W. Thomann：Preliminary Study of Certain Financial Laws and Institutions, Belgium），美国财政部总顾问办公室，1944年7月，油印本，第338页。

在大多数被占领国家里，都通过了类似的法令。271 不仅黄金和外汇，被占领国家原来用作本国部分货币的、其他贵重的金属，有时也被运走了。例如，在南斯拉夫，凡“含有一定百分比的白银和黄铜的”硬币“均被收回，而代之以质量低劣的合金硬币。当然，德国人把大量最贵重的南斯拉夫钱币都运到了德国。”

（三）占领费用和其他捐税

德国人一旦自己办得到时，就开始在被占领国家内定期摊派财政捐税。这些捐税采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缴纳的地区，不过它们的目的却到处一样，那就是，供给德国征服者不仅为维持占领军所需要的款项，而且为其他采购用途所需要的款项。

最重要的捐税来源是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希腊和南斯拉夫征收的所谓占领费，以及在保护国、总督辖区和丹麦征收的性质相似而名称不同的捐税。丹麦由于就技术角度而言未被占领，所以不能缴纳占领费用，于是不得不把需要付的款项交给德国信贷银行管理委员会的首长去处理。在保护国，这种捐献列入“上缴金”项下，而在总督辖区则叫做“防务捐献”。

征收的占领费的高低，理论上取决于德国在有关国家维持一支占领军所需要的费用。但事实上，总额却根据德国要求的标准和各个国家支付的能力来决定。在这方面，德国人的做法远远超出了1907年的海牙公约规定的限度，该公约的有关条款如下：

第四十八条 272 占领者如在占领区征收应向国家缴纳的种种捐税，必须尽可能遵照当时生效的法律根据和估价方法进行，因而还有义务支付占领区的行政费用，支付的限度与本国政府一贯有义务支付的相同。

第四十九条除前一条所说的捐税外，占领者如在占领区征收其他现金捐款，只应限于驻军或该地行政管理的需要。征收这些税款并不单是用来维持占领军这一点，已经清楚地证明了。在比利时，军事司令官于1942年3月2日写给财政部长的一封信中公然说过，“在1942年1月1日—31日这一期间，比利时的占领费用提供了总数为二千五百八十万零三千八百九十九点九九马克的开支。这笔款项从一开始就被用去支付比利时境外武装部队的需要（非占领费用）。”沃尔特·W·奥斯特罗于1945年9月29日根据德国信贷银行的档案和对德国国家银行负责管理柏林德同信贷银行的两个董事之一（安东·维尔茨）的审讯记录所写的报告，对法国的情况提供了翔实的证据。战败的法国为偿付占领费用所缴纳的税款，被用以支付从法国转运往德国的原料、粮食和其他物品的货款。为了诸如此类的目的，设立了一些专门的政府采购机构。

从这个来源得到的款项，还被用来购买证券、绘画和其他艺术品，也为德国购买无线电设备，购买德国人在法国掠夺的黄金，购买罗马尼亚货币供德国武装部队在罗马尼亚使用，以及为在空袭中遭到毁坏的德国会图书馆购买图书。占领费用还被用来支付出口到德国的货物的战灾保险费，支付从法国招募到德国去干活的工人的家属赡养费，为在法国的党卫队和德国海关与国内税收业务的活动提供经费，以及为外交部的宣传活动提供经费。

德国以占领费形式征收到的款项为数极大。德国财政部长施威林·冯·克罗斯克在 1944 年 4 月 15 日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截至 1944 年 2 月底为止，德国收到的占领费用总数达到四百七十六亿六千三百一十马克。下 273 页的表便是从该报告中摘出的，它表明了占领费用的摊派情况。

在这个日期以后，由于德国丧失了土地，占领费用的总数减少了。据估计，在整个战争中德国收到的款项约在六百亿马克以上。可是，这笔数目不包括以“上缴金”名义向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征收的总计在六十亿到八十亿马克之间的捐款，也不包括由于驻扎军队或征集军需品而收的费用。在波兰、巴尔干各国和俄国被占领区的某些地方，并没有建立清算办法或征收占领费用的制度。与此相反，德国军队奉命直接从他们驻扎的地方搜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除了上述的经常缴纳的款项外，德国人还不时在被占领国家内以实际的或莫须有的理由课处罚款来取得更多的资金。例如，单在 1943 年内，驻贝尔格莱德的德国野战司令部就强行课处了价值四千八百八十一万八千零六十八第纳尔的现金罚款。在挪威，他们课处了一系列的罚款，其中包括 1941 年 1 月对特隆赫姆、斯塔万格和佛截至 1944 年 2 月底为止所征收的占领费用（单位：百万马克）1. 法国，甲项 2, 287.0 乙项 23, 561.02. 荷兰：

用弗罗林现缴的费用 5, 666.0 特别捐款 500.0 杭击布尔什维主义的捐款 1, 550.03. 塞尔维亚 560.04. 比利时 4, 517.65. 挪威（只计预算上支付的费用）1, 278.46. 罗马尼亚 12.87. 匈牙利 51.88. 克罗地亚 118.59. 斯洛伐克 0.610. 希腊 3, 758.111. 意大利 1, 432.612. 保加利亚 27.013. 芬兰 126.514. 德国驻乌克兰专员辖区 1, 246.115. 德国驻乌克兰专员辖区（以卢布缴纳的）107.916. 西班牙 78.517. 德国驻奥斯兰专员辖区 753.618. 阿尔巴尼亚 29.1 总计 47, 663.1 斯特—奥普兰等地分别征收的价值六万、五万和十万克朗的罚款。同年 9 月，斯塔万格市政当局又因所谓破坏电话线的罪名被迫再行缴纳二百万克朗。在荷兰，仅仅对六十二个市政当局课处的罚款，合计起来至少就有二千零二十四万三千零二十四盾，而在法国，集体罚款的数目至少有四亿一千二百六十三万六千五百五十法郎。

（四）清算协定

清算协定的谈判，以及随后的巧妙运用，使德国有办法不仅可以向被占领国家，而且可以向它的盟国以至某些中立国家勒索财政捐款。在正常情况下，清算协定缔结国之间的贸易，在一段时期内必须大致平衡，除非债权国愿意不断贷款给债务国。可是在 1940 年 5 月以后，德国凭借占压倒优势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能够强迫贷款国提供远超出它乐于借出的数量的贷款。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被迫不断供给德国它所需要的任何货物，而收回的却是清算帐目上给予德国的贷款，这些贷款要到战争结束后才会偿还。德国在清算帐目上欠下的债务，不仅是为了购买商品，而且是为了运输和过境费用，为了履行德同向国外的定货，以及为了外国工人在德国的储蓄存款的汇划。

德国建立的清算协定体系，范围非常广泛。到 1941 年底，德国已同欧洲大陆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谈判了清算协定，这些国家彼此之间有许多也进行了这种谈判。后一类协定中有些是通过设在柏林的中央票据交换所结算的，于是德国便毫不踌躇地操纵这些协定使其对自己有利，冻结了有利于协定一方的贷款，并利用这种贷款来弥补它自己的交易。

德国通过清算帐目上的债务而得到的款项为数相当可观，到 1944

年9月总计约达三百六十亿马克。各个国家——尤其是东南欧的卫星国家——曾经作过努力，想通过诸如购买黄金和收回在德同手中的证券，以至订购战后交付的货物这类办法，来减少它们的马克债权。但是，除挪威和土耳其外，所有同德国有清算协定的国家，在战争结束时都对德国保有为数可观的债权。

德国在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清算协定体系，是朝着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方向所采取的唯一现实的步骤，因而值得注意。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德国的计划着又见上文，原著第250页。

参阅海因宁：《德国；关于金融法选编的初步报告》（1945年2月），第1卷，第100页。

莱姆金：《轴心国在欧洲占领区的统治》，第61—62页。

国际结算银行：《第十四次年度报告》（巴塞尔，1944年版），第147页。

见上文，原著第168页。

眼于把战前德国与其贸易伙伴的双边清算协定体系扩大成为一种多边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欧洲的对外贸易将通过设在柏林的一个中央票据交换所来进行。可是，有意义的是，在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外，竟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通过柏林来进行金融交易。

（五）操纵外汇兑换率

德国对欧洲其他闲家的财政剥削，由于它能够定出对马克非常有利的兑换率而变得广泛得多，这至少在战争的初期是如此。在已经并入或计划并入德国的某些地区，新的兑换率表示了当地货币的升值。采取这个步骤是为了使这些地区的物价和工资水平同德国的一般水平相一致，但是在所有其他的地区，新的兑换率却意味着当地货币折合马克大为贬值。

的兑换率，但是这种局面是不大会持续很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欧洲的贸易伙伴虽然不愿意给它贷款，但是因为它们自身相当软弱，所以在面临德国的要求时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德国的赤字不是靠征收占领费便是靠增加清算帐目上的债务而弥补掉了。

在战争的后期，由于欧洲普遍出现通货膨胀，使德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大为增高，因此德国通过把马克的币值定得过高而获得的利益大为减少了。

（六）德国对欧洲银行业的控制

德国对欧洲的财政剥削得以顺利进行，是由于德国控制了被占领各国的银行系统，并加以重建或改组，使它们成为各自营业的地区内奉行德国指示的工具。

德国人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在沦入他们统治下的国家里取得对发钞银行的控制，要是这种银行已不存在，那就开办新的。在总督辖区、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奥斯兰与乌克兰，以及比利时，他们都设立了新的银行，但是在别处，德国人觉得原来的机构还可以利用。比利时的情况是特殊的，因为在占领期间有两家中央银行同时营业。这是由于该国沦陷前不久，国家银行的董事全逃走了，直到德国占领后不久才回来，可是这时德国人已经在布鲁塞尔新办了一家比利时发钞银行，名为钞票发行银行。两家银行都获准营业，国家银行负责发行钞票和发放贷款给政府机关，而钞票发行银行则专门办理票据交换和外汇业务。尽管这样划分责任，但是银行业务方针的一致性，却由于银行管理部门以及国家银行和钞票发行银行全体高级职员之

间私人关系融洽而得到了保证。

总的方针是把银行的日常管理工作留给有关国家的国民办理，而派一个或几个德国人或德国所赞助的人担任监督。后一类人大多称做银行专员，虽然在名义上独立的傀儡国家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他们的名称只是顾问。在丹麦这个名义上也是独立的国家里，德国人不是通过银行专员，而是通过德国公使馆办事处的官员和从德国派去视察的顾问进行控制的。在荷兰，由于该国的纳粹党人罗斯特·范·托宁根奉派出任荷兰银行总裁，银 277 行专员的任务就大大地简化了。不论这些银行是否是新办的，也不论这些银行和德国代表名义上的关系是什么，德国的要求同样是咄咄逼人的。在一切情况下，德国代表都有权要求得到他们希望知道的银行工作的任何情形，他们的命令必须予以执行，他们对于自己不赞同的任何行动还有权否决。例如，对比利时国家银行就颁布过下列这样的规定：

(1) 国家银行的一切措施应随时报告驻该行的专员。专员可以获得有关该行一切业务的情况。

(3) 比利时国家银行总裁、常务董事和总管理处的一切重要措施，尤其是批准贷款和规定该行往来业务的利率，均需得到驻该行专员的同意。专员可全面批准各批交易，他也可随时撤销此项同意。

(4) 专员有权发布命令，促使该行完成任务。

因此，在德国的控制下，各个中央银行的权力都进行了调整，以适合德国作战的需要。完全取消了对于发行钞票和批准贷款的限制，于是这些银行就得以筹集资金来支付占领费用和德国在被占领国家的直接军事开支。另一个步骤是降低借款应付的利率，从而奖励生产，其中大多数是为了德国而进行的。

德国对被占领国家银行系统的控制，不是只限于中央银行，而是扩大钉包括商业银行和其他私营银行在内。在许多国家里（最引人注目的例外是法国和荷兰），已经存在着一种对银行进行监督的机构，德国人在大多数情成立了德国的控制银行业务的机构，往往就由银行专员担任领导。在这方面，比利时的情况也是特殊的：保留了享有自主权的比利时银行委员会，同时又 278 设立了一个德国机构。

控制私营银行有许多目的。除了执行中央银行的金融方针外，这种控制还大大地方便了对有关国家的剥削，尤其是在为德国进行的生产方面，同时又为德国参加当地的企业创造了机会。在这方面，单纯的政府行动由于德国私营银行的参加而得到了支持，这些私营银行对于在被占领国家，甚至在盟国取得关键性的地位都很积极。

况下也就满足于通过当地的这些机构来进行工作。在另一些国家里，则成立了德国的控制银行业务的机构，往往就由银行专员担任领导。在这方面，比利时的情况也是特殊的：保留了享有自主权的比利时银行委员会，同时又 278 设立了一个德国机构。

控制私营银行有许多目的。除了执行中央银行的金融方针外，这种控制还大大地方便了对有关国家的剥削，尤其是在为德国进行的生产方面，同时又为德国参加当地的企业创造了机会。在这方面，单纯的政府行动由于德国私营银行的参加而得到了支持，这些私营银行对于在被占领国家，甚至在盟国取得关键性的地位都很积极。

德国的财政政策，对被它占领的国家，以及在小得多的程度上，对它统

治下的国家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一方面，德国在战争中始终从这些有关国家的总产量中把越来越多的部分攫为己有，另一方面，它的行动又大大增加了可利用的支付手段，这就造成了一种通货高度膨胀的局面。

德国的某些措施，特别是发行德国信贷银行纸币，直接起了使通货膨胀的作用，因为它等于立刻增加了流通的货币的数量。甚至后来收回了这种纸币，也没有消除掉这种压力，其原因在于它们只不过由数目相等的本国货币取代而已。柏林的德国票据交换所积欠的借款，也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的作用。一则，它等于单方面把商品取走；二则，虽然德国人对于他们拿到的商品并不付钱，但本国政府为了防止其出口商破产，却不得不以清算债权的形式自己先垫付出来。同样，在银行内部，修改银行章程以便有可能无限制地批准贷款一事，意味着把防止通货膨胀的另一项措施也取消了。

货币发行额的大量增加，结合上商品供应的减少，造成了人们手头不留现钱的情况和全欧洲黑市买卖的普遍滋长。德国人利用了这种局面，他们有着无限的钱，能够而且愿意利用这一点作为进而获得他们需要的商品的手段。德国在黑市上的采购工作是由官方控制和集中管理的，尤其是在西欧。它是一个重要的供应来源，至少在 1943 年 3 月 15 日明令取消以前是如此。

第八章 279 结论

德国想在欧洲建立新的经济秩序的图谋以失败告终。由于德国的干涉，的确促成了重大的变化，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变化与其说是由于旨在创立一种新秩序的一些具体措施，倒不如说是由于战争的迫切需要。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深思熟虑和缺乏时间，使 1940 年夏天提出的这些宏伟的建议没有能实现。新秩序的某些特点，由于德国人的行动而变得很清楚，不过这项政策的全面实现，却被德国人推迟到他们有朝一日成为欧洲无可争辩的主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始终就没有到来。

通过德国人的行动确实变得多少清楚一点的新秩序的特点之一，是这个区域未来的行政管理结构。在一个个国家陆续沦入德国的统治下时，它们每一个都被派定了一种适合于它在新秩序中最终所占地位的行政管理方式。这样，通过把阿尔萨斯—洛林、卢森堡和波兰的上西里西亚之类的地区并入德意志帝国，欧洲的工业核心就被置于统一的控制之下。另一些不那么高度工业化的地区，包括西欧的其余地方在内，只受到间接的控制，但是那些被指定为“殖民地的”地方，尤其是苏联被占领区和波兰的总督辖区，虽然它们仍旧同德国本土分开，却由德国直接控制，不准当地人参加自己的行政管理。

除了决定新秩序的结构以外，德国人为了实现他们的欧洲计划而采取的唯一实际的行动是在财政领域里。在这方面，的确可以说，柏林有一时期成了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马克成了居统治地位的货币，许多国家开始通过柏林以马克来结算它们的全部商业交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全在德国的直接统治之下。凡是自己保留一点选择权的国家，至少部分是处在以柏林为中心的多边清算系统之外的。

德国的宣传机构在 1940 年曾经大肆鼓吹新秩序的优点，但是隔了大约两年，对于这件事却几乎绝口不提，转而大谈欧洲所有国家需要联合起来抗击布尔什维主义，这是一种先兆。德国人对战争的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建立新秩序的可能性，是以战争决不会拖得很久久的信念为基础的。德国通过几场短促的战役就可以取得新秩序的物质基础，并由此巩固其地位，决定其对待仍然留在新秩序以外的地区的态度。对俄国发动的进攻，以及随后认识到这个国家与德国先前的对手不同。不能一举予以摧毁时，局势就完全改变了。德国这时面临着一场它毫无准备的持久战争。它不能仅仅为了实现一种理论而浪费时间或精力去促进新秩序。它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激烈斗争。为了不管怎样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它不得不放弃了长期的计划，竭尽全力来获得进行这场战斗的手段。有一段时期，这一目标似乎是它力所能及的，德国军队继续保持着攻势。但是从 1913 年初起，这种形势便改观了。德国的敌人这时采取了攻势，德国承担了越来越多的义务，而同时它的资源却不断在减少。可是，直到 1944 年中期，军工生产仍在增加，这证明了德国人在本国和在剥削被占领国家方面的效能都很高。然而，这种增加只是垂死的奋力挣扎而已，因为到那时德国国外的供应来源已经几乎荡然无存，无法再进行持久的战争了。

不论德国在欧洲建立新经济秩序的成就多么小，它无疑在战争期间确实从欧洲其他地方取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虽然从长远来看，欧洲——苏联不算在内——不能提供给德国它所需要的全部物资，但在短时期内，被它占领的国家和被它统治的国家的生产，以及这些国家储存的原料，却证明是具有重大价值的，并且除了石油以外，其数量都足以推迟任何严重的缺乏，直到

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时候为止。被占领国家的工业能力，也证明非常重要，至少在战争的中期是如此。因此施佩尔在 1944 年 7 月 11 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到目前为止，德国的军工生产有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是由西方占领区和意大利供给的，单是意大利就供给了百分之十二点五。”可是，对德国最有用处的，也许倒是非德意志国家提供的额外劳动力。大战爆发以前，德国缺乏劳动力的现象就很严重。在大规模动员入伍的工作开始以后，这种情况有可能急剧恶化。但是通过在德本土以及在被占外国劳动力，德国在战争的大部分时期内为自己获得了充足的劳力供应。这些措施的规模如此巨大，以致 1944 年春天单在德 281 国就使用了七百多万外国人，相当于平民劳动力总数的将近百分之二十。

德国在战争时期从被它占领的国家和被它统治的国家总共得到了多少利益，这是无法用金钱准确地加以计算的。有些项目，例如驻在德国境外的德国部队和官员所消费的物品和劳务，以及不付费用直接弄到德国去的物资，都是无法计算的。还有，外国人在德国做工或是在德国武装部队中服役，其价值也是无法比较准确地加以估计的。可是，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还是作了一次尝试，来估计其他国家对德国的作战所提供的财力物力，在计算时只把那些能够合理估计的项目考虑在内。属于这一类的，有向法国、荷兰、挪威、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征收的占领费用，有德国对外贸易收支中的净逆差，有用侵略者的货币购买的货物，也有合并地区的生产在扣除了当地的消费和投资以后的净产值。根据这些计算，在 1940 年到 1944 年这五年中，外国出的力，按 1939 年的物价来估计，共达一千零四十亿马克左右，也就是占这一时期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将近百分之十四。外国出的力，使政府在同一时期内可以用来购买武器和装备的款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全部经济影响调查室：《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1936—1944 年》。

同上书，图 2 和图 3。

项——也就是说，在满足了民用消费、行政费用、军队开支、国债利息以及必要的资本支出等各项需要以后剩余的款子——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事实如此，其重要性也就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了。

这种规模的横征暴敛显然在被占领的同家和被统治的国家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许多国家在饱受兵燹以后，又被盗窃走了大批对德国可能有用的东西。原料、粮食、牲畜、工厂和机器，以及运输设备，在不同程度上都遭到劫掠。生产大幅度地下降，那些获准继续生产的工厂，只能集中制造德国人自己需要的产品。德国人征敛的程度，在欧洲各个国家里大不相同，但是确实可以说，各处的生活水平都明显地降低，各种东西普遍缺乏的现象也出现了。这种情况由于德国推行的财政政策而更形恶化。用占领者的货币进行采购，在清算帐目上积欠下巨额债务，凡此对于德国以外的国家所造成的影响是：通货膨胀急速恶化，商品的供应日益减少，而流通的货币数目却不断增 282 加。尽管通货膨胀只在某些地区造成有关国家财政生活的全面崩溃（尤其是在希腊），但是整个欧洲大陆都感到了它的有害影响。

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对欧洲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为德国榨取最大的好处，而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显然，保护国以及可能获得的其他地方的经济力量，当然必须为了进行战争而全部用尽。可是，同样显然的是，这

些地方对于自己在战争中不得不供给我们的那些产品，是不能从大德意

志的经济中得到任何补偿的，因为它们的力量必须全部用来进行战争和供应国内平民的需要。这项政策声明是作为 1939 年 5 月举行的一次会议的结果而发表的。在此后五年中，它始终是德国行动的指导原则。

PGN0450.TXT/PGN>

第三编意大利
凯瑟琳·达夫

第一章 2831940年6月至1943年7月的意大利

第一节 从法国沦陷到入侵希腊

(一) 1940年夏季意大利在希特勒的欧洲的地位

理论上讲，意大利是轴心国中一个完全平等的伙伴，但是实际上它已经只不过是德国的主要卫星国了。诚然，它作为一个盟国参加战争，并不是完全没有资产的。不论它号称为大国这一点是多么不可靠，它却是唯一接近于可以支援德国的那种地位的国家。除了日本，它的武装部队比所有其他可能同德国结盟的国家都强大，而它的海军则比德国自己的还要强大。它处在地中海中央的位置和它的非洲帝国，使轴心国有机会切断英国同东方最为直接的航线，并且有机会进攻埃及、苏丹和东非。另一方面，虽然意大利的武装部队新近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有过一些作战经验，但是从法西斯主义出现以来。他们还没有经受过全面战争的考验，而且意大利的经济弱点也太明显了。1939—1940年的事态增大并突出了意大利和德国之间实力的悬殊。到了1940年6月，德国在军事威望上已经达到顶峰，并且由于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统治着从比亚里兹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欧洲，从而扩大了它的粮食资源和工业生产力。

意大利的参战并没有使轴心国的行政机构发生任何显著的变化，只不过建立起了许多旨在加强意大利同第三帝国经济联系的组织。政治和军事事务的处理，起初仍然是非正式的、不连贯的，就同先前那种情况差不多。在柏林和罗马设置的联络人员并不参加制订作战计划。尽管后来作了一些错综复杂的安排，使德国和意大利在地中海的部队联系起来，但在较高一级却始终没有任何可以同英美的联合计划组织相比拟的机构。最初，这两 264 个轴心国的独裁者当然都认为战争差不多已经打赢了。再说，即使在他们认识到情况并非如此以后，希特勒仍然煞费苦心强调他忠于在阿尔卑斯山南北分别建立德意两国势力范围的原则。

意大利人一贯对德国人不满的事情之一是，德国人未能理解地中海的重要性。的确，搞一个地中海帝国并不是希特勒当时所渴望的东西之一。事实上，他正在向东方寻求德国的开阔的边疆，一点也没有露出不愿让意大利趁机向南方扩张的迹象。可是，他的其他一些野心必然导致德国侵犯到意大利的“生存空间”。象在战前那样，东南欧是这两个大国之间可能发生争执的地方，而德国希望在摩洛哥获得基地，以及法西斯主义者妒忌德国人对维希法国的宽大，是产生新摩擦的原因。意大利人（墨索里尼也不例外）还不断担心德国人有朝一日会要求南蒂罗尔和的里雅斯特，尽管他们信誓旦旦，保证尊重阿尔卑斯山的边界线。促使墨索里尼决定宣战的，不仅是希望分享战果或是德国威势的魅力和吸引力，而且是害怕德国扩张，害怕德国对意大利又一次“背信弃义”进行报复的心理。总之，墨索里尼担心（象一个根本不是亲德的老资格的法西斯党人所说的那样），假如意大利不宣战，它就会象一只鲜鸡蛋似地被德国一口吞下去。然而，在宣战后几天之内，墨索里尼就认识到，他最后一分钟的介入并没有使自己分享到希特勒的胜利，意大利在轴心国里的地位太软弱了，不能指望它的要求会被接受。虽然他仍旧希望意大利部队的成就也许会使它重新取得同德国较为平等的地位。

德国人那方面则看不起意大利军人，完全认识到意大利人对轴心国缺乏热情，而且一直认为，一旦意大利人觉得抛弃轴心国盟约对自己有利，他们

就会这样做。希特勒对意大利人就只信任墨索里尼，他深信维克托·艾曼努尔国王，意大利军队，当然还有齐亚诺，最终会出卖轴心国的，正如在他看来，他们应该对德波冲突变成一场全面战争负责那样，因为他们在关键时刻曾对英国说，意大利不准备打仗。虽然他乐于看到墨索里尼扮演波勒克斯和卡斯特两弟兄中波勒克斯的角色，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利用他的伙伴害怕盟国轰炸的心理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这个伙伴，也没有使他不在这个伙伴的心里播下猜疑的种籽，使这个伙伴怀疑他也许会同轴心国体系中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搞阴谋。

同德国很大一部分军事装备一样，意大利是一个“代用品”，一个代用同盟国。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明的那样，他宁愿在英国的帮助下打败法国，取得欧洲的霸权。可是，既然意大利是希特勒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盟国，他就必须尽可能利用它。而且意大利一旦参战后，如果由于敌人的打击或者由于它的盟国对它不够体谅，而使它不得不退出战争，那对德国说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挫折。然而，实际上，德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却是自己拆自己的台。由于纳粹贪得无厌以及两国的实力对比如此悬殊，德国的“友谊”往往只是一些花言巧语，至于德国的援助，如果它当真有一点用处的话，也往往采取意大利人不能不认为是极端屈辱性的形式。

在1940年6月至10月意大利参战的第一阶段中，轴心国的外交如果按里程和词令来计算，那是空前活跃的。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在6月18—19日访问了慕尼黑；齐亚诺在7月7日访问了柏林，7月19—20日又去柏林恭听希特勒在国会发表的和平建议讲话；8月28—30日他在维也纳会见了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表示意大利同意瓜分特见希特勒：《我的奋斗》，第698页，第720页，第755页；墨菲译本，第505页，第518页，第541页。

见加里亚佐·齐亚诺：《走向悲剧的欧洲》（Galeazzo Ciano：L'Eurpaverso Jaeatastrofe），米兰，蒙达多里，1948年版；《齐亚诺的外交文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编，斯图尔特·胡德译（Ciano's Diplomatic Papers，ed.Malcolm Muggeridge，trans.Stuart Hood），伦敦，奥达姆斯出版社，1948年版，第372—375页（本书及英译本以后简称齐亚诺：《欧洲》与英译本）。参阅《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信札与文件》，V·津科内编（Hitler e Mussolini：lettere edocurnenti，ed.V.Zincone），米兰，里佐利，1946年版，第28号。

齐亚诺：《欧洲》，第566—572页和第574—576页；英译本，第375—379页和德381页；关于齐亚诺在德国国会中的举动，见威廉·L·夏勒：《柏林日记》（William L. Shirer：Berlin Diary），伦敦，哈木什·汉密尔顿。1941年版，第358页。

兰西瓦尼亚。

动，即完全占领法国）中禁止对意大利人提起这项计划。事实上，希特勒确曾断定，告诉意大利最高司令部或者外交部的任何作战机密，立刻便会传到伦敦，很可能是通过萨伏依王室。因此，意大利人对德国的计划多半只能略加窥测，而且不得不通过察看德国领导人的神色和行动，通过德国外交部里非纳粹分子的暗示，通过窃听罗马和柏林之间的电话会商，以及通过其他秘密的手段，来弥补他们从轴心国会议上和经由正常的外交途径所获得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情报，他们几乎象是在对付一个敌人而不是一个盟友。里宾特洛甫极端猜忌意大利大使馆去同德国外交部以外的任何机关进行接触，这

也使得他们的工作更不容易做。意大利人也可以肯定，德国人经常在暗中侦查他们。里宾特洛甫有一次向意大利驻柏林的大使迪诺·阿尔菲耶里抱怨大使用绝密电码发往罗马的一份电报的内容。

（二）互相冲突的利害关系，1940年6月至10月

（1）意大利的领土要求

287 德国和意大利最早发生利害冲突的问题之一，是意大利对法国和英国的领土要求。如同齐亚诺于1940年6月19日向里宾特洛甫概述的那样，这些要求包括：首先，作为绝对的最低限度，要尼斯、科西嘉、突尼斯和法属索马里兰，而且还要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或者至少是修改一下突尼斯的边界，把铁矿和磷矿让给意大利。齐亚诺还提到摩洛哥，以及意大利需要有一条进出大西洋的通路。至于英国，意大利希望它割让马耳他，让意大利接替它同埃及的条约关系，并接替对苏丹的共管，还把直布罗陀归还西班牙。里宾特洛甫回答说，希特勒同意这些要求中的大部分，可是他对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作了保留，并提醒齐亚诺，德国在历史上对摩洛哥早抱有希望，再则满足西班牙在北非的要求将会鼓励它参加支持战后的解决办法。他只是泛泛地提到德国自己的殖民地要求，却绝口不提在欧洲的战争目的，只说德国希望在巴尔干迪诺·阿尔菲耶里：《前线的两个独裁者》，第233页。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6月19—20日；齐亚诺：《欧洲》，第563—565页；英译本，第373—374页。

地区维持现状。

在意大利人为齐亚诺7月7日访问希特勒所拟的第二份要求清单上，他们既没有提到摩洛哥，也没有提到直布罗陀。

288（2）对法国的政策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6月19日在慕尼黑会谈的主要目的，是决定应该迫使法国接受什么样的停战条件。在这次会谈中，意大利人第一次向德国说明了他们的战争目的。墨索里尼完全赞成采取严厉措施，提出他们应该占领整个法国并取得法国的舰队，可是希特勒却坚决主张切不可把法国人逼得太厉害，否则他们也许会不顾一切中断谈判，把政府迁往北非，把军舰调往英国或美国（他认为这些军舰要是抵抗的话，是无法用武力夺取的）。他也不同意让意大利共同参加对法国进行的谈判，其理由是（据他后来对里宾特洛甫说），法意两国的仇恨会浪费掉很多时间。在慕尼黑，希特勒并没有反对意大利占领法国罗纳河以东的全部东南地区，以及科西嘉、突尼斯和吉布提，倒是墨索里尼本人回到罗马后自动放弃了所有这些要求。据齐亚诺说，希特勒提出的温和的停战条件给了他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不敢提出任何可能会破坏同法国谈判的要求，免得在罗马和柏林之间引起纠纷。

法国的全权代表在6月23日到达罗马时，巴多里奥向他们保证，意大利将设法使条件尽可能宽大。事实上，法西斯政府在法国海外军队复员的问题上的确作出了让步，而且他们（与德国人不同）收回了关于引渡政治289避难者的要求。此外，6月24日晚7时15分在罗马附近英西萨别墅签署的意法停战协定仅仅规定，意大利人有权占领他们的军队在协定生效时实际占有的土地，结果只是占领了芒通附近一带地方。协定还规定，将占领区以西五十公里的地带，阿尔及利亚和法属非洲地区同利比亚接壤的二百公里宽的地带，突尼斯南部整个设防地区，以及索马里兰沿海地区，一律划为非武装

区。协定使意大利有权充分使用吉布提港和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但是，完全没有其他经济条款或是任何财政条款。

意大利国内并没有举行庆祝停战的正式仪式。它给意大利人第一次带来了一点幻灭之感，他们原来都指望能毫不费力就征服大片地方。此外，还有些特别原因使墨索里尼尝到了辛酸的滋味。自从轴心国形成以后，他一直觉得意大利也许有一天会遭到遗弃。而由比它强大的竞争者英国或法国所取代。在他和希特勒新近会晤时，他对于希特勒提到保存英帝国的重要性的一番话，感到不大痛快。这时，他开始深信，维希法国正在竭力讨好反英阵营，希望逃避因过去所犯错误而应受的惩罚。由于他深深感到就强权政治而言，意大利不及法国，所以他预料（部分由于德国人对法国文化怀有那种他所谓的肤浅褊狭的崇拜），法国尽管战败，仍然会成为新秩序中一个危险的竞争者，而且希特勒也许会为了收买法国而撤销对意大利领土要求的支持。

从这时起，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就抓住一切机会向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提出警告，说法国正在玩弄两面手法。德国人通常的回答总是，赞扬墨索里尼在停战条件上态度温和，并且毫不犹豫地承认法国是两个轴心国家的势不两立、背信弃义的敌人，决不能听任其逃脱应受的惩罚，可是同时，又坚决认为控制法国沿海地带和通往西班牙的陆上路线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一点的解释，似乎并不只是欺骗意大利人的一种烟幕。在希特勒作出的 290 一系列决定中，有一项由约德尔于 1940 年 11 月 4 日传达给了海军参谋部作战部长。它明确宣称要使法国永远没有力量对轴心国构成一种威胁，并要强迫它满足德意两国的领土要求。不管德国人的一再保证多么真诚，它们都未能使墨索里尼满意，而德国人在夏季的所作所为却使他一直疑虑不安。例如，7 月 7 日，希特勒拒绝了齐亚诺关于立即同法国单独缔结和约的建议。意大利人发现很难得到进入占领区的许可证，甚至到 9 月，意大利还没有获准在占领区重新设立领事馆。

设在北非、叙利亚、黎巴嫩和法属索马里兰的意大利停战委员会的活动，也促成了意—德的磨擦：德国人一方面抱怨说意大利人太容易上法国人的当了，一方面又说他们那种刺激性小动作和不必要的解除武装的政策会迫使法国人投向戴高乐主义，或者使法国人无法抵抗戴高乐派或盟国的入侵。1941 年春天，德国派出专员到北非去控制意大利停战委员会的团长。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一直无意响应维希方面在 1940 年第三季度作出的种种试探性接触。他们对 10 月 24 日的蒙都瓦会谈极其猜疑。据说希特勒当时曾经说过，他完全是为了顾到墨索里尼才没有就法—德合作采取任何明确的步骤。他显然为了要使墨索里尼相信这一点，才安排了 28 日在佛罗伦萨的会晤。在那里，他再次保证意大利的所有要求都将获得满足，并且接受了墨索里尼的建议，认为法国最后可以从英国割让的领土中得到补偿。他向墨索里尼保证，如果战争以妥协结束，法国仍然应当付出赔偿。可是，他不主张立即解决意大利的要求，认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使法国人相信轴心国的条件最后将会多么温和，并向他们提出就临时关系签订一项三国协定。他邀请墨索里尼在赖伐尔到柏林来缔结这项协定时前来参加。希特勒的这种姿态，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墨索里尼和齐亚诺成功地以进攻希腊的消息使希特勒很感意外的这件事，使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大为宽慰。墨索里尼曾经写信给希特勒，告诉他即将发动进攻，但是没有透露具体日期。这封信送到柏林时，希特勒虽然已经到了法国，可是到 24 日晚上里宾特洛甫打电话给齐亚诺提议在佛罗伦萨举行

会谈时，希特勒已经获悉这封信的内容了。

(3) 轴心国、苏联和东南欧

当意大利还是非交战国的時候，墨索里尼曾计划在东南欧自行发动一场与希特勒的战争“相似”的战争，赶在盟国和德国人前面先下手。这时，他又有一种新动机，要为意大利对法国的要求被搁置取得补偿。那年夏季，他不时惹得德国人来提醒他，轴心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打乱东南地区的现状，以免为苏联制造机会，甚至因而不得不从进攻英国和埃及的战役中抽出部队来。为了同样的原因，德国人一贯阻止意大利采取任何撇开德国迳自改善意苏关系的行动。他们并没有邀请意大利人参加1940年秋季的德苏会议和谈判，虽然除了绝口不提自己的侵略意图外，他们对于正在进行的情况（就他们来说）倒并不是只字不提的，他们甚至还相当含糊地提到由轴心国、日本和苏联缔结一项公约。不过里宾特洛甫在8月17日、9月19日和11月4日一再警告意大利，意苏和解可能会在巴尔于各国造成危险的后果。德国人在1940年6月和12月中两次否决了意大利人想要取得和解的相当不成熟的尝试。

意大利人希望说服苏联恢复对他们输出石油。墨索里尼一度还认为和解可能会很有用，如果他进攻南斯拉夫的话。另一种动机可能是想借此对付德国。对于墨索里尼本人1940年6月间的一次相当含糊的试探，莫洛托夫立刻作出了反应，他力促就巴尔干和土耳其问题举行会谈，并提出承认意大利在地中海的显著地位，以换取意大利对苏联在黑海的利益的相应保证。7月间，事态已经变得很清楚，在缔结任何经济协定以前，必须先达成全面的政治协议。然而，此后法西斯政府似乎并没有感到十分遗憾就屈服于德国人的压力，听任谈判中断下来，直到12月底罗马和莫斯科才又进行了新的接触。莫洛托夫仍然希望立即举行政治讨论。

里宾特洛甫再次进行干预。阿尔菲耶里在12月16日试探里宾特洛甫的意见时，把意大利的目的说成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到了1941年1月6日，他透露出12月会谈的意义时，里宾特洛甫表示强烈反对，指责莫洛托夫想捞到他在柏林未能捞到的让步。1月19日，里宾特洛甫向齐亚诺建议尽量拖延时间，并在同苏联打交道时，要注意同德国步调一致。此后，他便迫使法西斯政府采取上述态度——特别是对莫洛托夫所探询的问题：万一土耳其参战，轴心国大概会对黑海海峡采取什么政策——以致意苏政治会谈于2月24日中断，虽然商务谈判一直继续到6月。

希特勒可能仍然有点担心，唯恐墨索里尼会同匈牙利、罗马尼亚或者保加利亚的政府勾结起来反对他。例如，1940年11月间，他似乎故意告诉齐亚诺说，匈牙利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在1938年5月德国人即将访问意大利时曾试探他对于阜姆的意见。可是虽然墨索里尼，也许在更大程度上还有齐亚诺，在1939年曾经认真考虑在轴心国内部发起一个意大利—多瑙河集团以抵制德国，但是，这时他们似乎已经认识到，除了听任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受那个更为强大的邻国摆布外，别无他法。他们劝告罗马尼亚政府忍痛把比萨拉比亚割让给俄国，并且立即同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妥协。虽然意大利参加导演293了特兰西瓦尼亚的瓜分工作，却没有再出现1938年在维也纳为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议定书而表现出来的那种意德争雄的局面。意大利同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关系，此后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事故。他们曾试图说服博里斯国王支持意大利进攻希腊，但未成功；意大利对匈牙利夺取斯

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普雷克穆尔耶和梅久穆尔那地区曾提出抗议；在瓜分南斯拉夫的马其顿问题上，他们曾同保加利亚发生纠纷。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以记载的大事。

1940年秋初，墨索里尼计划发动侵略的地点是在更远的南方。他在进入全面战争以前就策划的对克罗地亚的军事行动，直到10月1日才取消。同时，他一直在准备进攻希腊。希特勒在7月7日会见齐亚诺时，并不反对意大利人占领爱奥尼亚群岛，不过建议他们在英国问题接近解决以前不要对南斯拉夫采取任何行动，除非巴尔干其他地方发生了动乱，那自然又当别论。里宾特洛甫在8月17日否决意大利进攻希腊的计划时，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也同样坚决。9月19日，他在罗马的时候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不过这一次，由于他提出保证说，南斯拉夫同希腊一样，完全属于意大利的利益范围，德国仅对克罗地亚的马里博尔地区保留权利，这便冲淡了他的那项警告。

（三）意大利军队对英国和法国作战，1940年6月至10月

多年来墨索里尼一直想使全世界相信意大利人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是，等他取得长期渴望的最高统帅的佛朗塞斯科·罗西将军：《我们是怎样达成停战协定的》（General Francesco Rossi：Come arrivammo all'armistizio），米兰，加赞蒂，1946年版，第3—4页。

齐亚诺：《欧洲》，第569页；英译本，第377—378页。

西莫尼：《柏林》，1940年8月17日；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8月17日。关于意大利对希腊的进攻和进攻前事态的叙述，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

齐亚诺：《欧洲》，第588—589页和第590页；英译本，第391页和第392页。

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8年2月2日和3月20日。

地位以后，他又象通常那样在寻衅与慎重之间摇摆不定。据巴多里奥说，墨索里尼在5月26日宣称，意大利需要牺牲几千人才能在和会上取得一席地位。

他。

自从墨索里尼答应说意大利也将宣战的那个时刻起，他就开始同希特勒纠缠，建议意大利部队应参加德国的各次战役。意大利的空军奉命参加“不列颠战役”，他们在那里一筹莫展，远不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对手。意大利的潜艇在德国指挥下由波尔多基地出发，在大西洋作战。但是，一般说来，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仍然深信，意大利人还是应该集中力量在地中海打他们自己的仗。希特勒提议派遣远程轰炸机去轰炸苏伊士运河，在7月31日的元首会议上，勃劳希契还建议派遣两个装甲师到利比亚去。可是当希特勒于10月4日在勃伦纳山口向墨索里尼提出调给他一个装甲师时，后者对于最后进攻埃及除接受俯冲轰炸机、载重汽车和少数重型坦克外，谢绝了其他一切援助。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最高司令部请求德国给予工具，让他们独自承担这项任务，但是他们似乎越来越不能胜任了。这时候，希特勒那些将领的注意力都转向对俄国发动进攻的准备工作。哈尔德认为地中海是枝节问题，德国军队牺牲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益处，这种看法在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相当盛行。海军参谋部尽了最大努力去说服希特勒，使他相信这一地区十分重要，可是，就连他们主要也是对直布罗陀和摩洛哥感到兴趣。

第二节希特勒为补救墨索里尼在希腊和利比亚犯下的大错误最初所作的

努力

从意大利入侵希腊的初期起，而且肯定是从英国人占领克里特岛和利姆诺斯岛的时候起，希特勒就预料到墨索里尼的卤莽行事会给轴心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带来严重的后果，其中他最担心的打击之一，便是轰炸罗马尼亚的油田。到11月4日，他已经决定亲自入侵希腊，以补救这种局面了。凯特勒于11月11日在因斯布鲁克会见巴多里奥时，暗示了这一点。后来在齐亚诺于18—20日访问萨尔茨堡时，德国人作了更为详尽的说明。这时候，希腊人正在击退入侵者，英国舰队的航空部队也在11日夜间在塔兰托港刚刚击沉了一艘意大利战舰并重创了另外两艘。希特勒在同齐亚诺的谈话中，以及在11月20日给墨索里尼的一封信里，热情洋溢地扮演了忠实的同志的角色。当他讲到墨索里尼在德奥合并时所给予的支持时，他的眼睛里还闪耀着泪水，不过他也毫不留情地详述了意大利所犯的种种错误，并且煞费苦心地提醒墨索里尼，轰炸机从希腊可以多么容易地到达意大利南部。最后，当他再次获得保证，将不会同时进攻南斯拉夫以后，他便专心致志地积极筹划这场角逐中的下一步行动了。

除了巴尔干战役和夺取直布罗陀的方案以外，他的新计划还要求重新努力把英国人赶出地中海东部。意大利人必须尽快到达梅尔萨-马特鲁，以便获得一个空军基地可以由那里起飞，把英国舰队赶出亚力山大港，并在苏伊士运河布下水雷。同时——既然这时（他认为）战争已经证明轰炸非军事目标毫无用处——轴心国的空军西莫尼：《柏林》，1940年11月16日。

见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1月18日和19日以后；齐亚诺：《欧洲》，第612—616页；英译本，第408—411页。参阅《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第33号。

关于“费利克斯战役”，又见上文，原著第59页。

见希特勒致墨索里尼的信件，1940年11月20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第33号，第76页）。

除了支援在阿尔巴尼亚的部队外，应该共同集中力量攻击296艘英国的军舰和商船。他可以为此立即调派空军。墨索里尼在11月22日接受了这一建议，显然很缺乏热情。

很快又使法西斯政府以恳求者的身分出现在希特勒的面前，恳求他提供作战物资以弥补格拉齐亚尼的损失。此外，意大利政局的稳定性一时间似乎也岌岌可危了。参谋总长巴多里元帅并没有坚决反对墨索里尼的军事冒险，而是说了很多足以使自己失宠的话，当时的形势又需要有一个替罪羊。在法里纳契那份极端法西斯主义的刊物《法西斯政权》上的一系列攻击，使巴多里奥不得不于11月26日辞职。有几天，看来这可能会使意大利全国的不满情绪和失败主义发展到危急关头。结果，巴多里奥决定不反抗，而新任参谋总长乌戈·卡瓦莱罗将军（12月6日任命的）又对德国人卑躬屈节、唯命是听，丘吉尔12月23日发表的那篇谈到“一个独夫”已经给意大利带来了种种灾难的广播讲话也没有立即产生效果。

希特勒和他周围的那些人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意大利势将崩溃的迹象。他们继续反复议论着墨索里尼进攻希腊的愚蠢行为，毫不隐讳他们对意大利军队的看法。有几个星期，他们仅仅给予意大利不涉及派遣德国297军队的那种援助，免得由于意大利的另一次失败而使他们可能陷入重围。另一方面，尽管意大利人和陆军总司令部的态度都令人沮丧，德国人毕竟还是作好了派

遣一个装甲师到北非去的准备，这时约德尔却对一个意大利采购代表团说，这项计划之所以搁置起来是因为发生了“信任危机”的缘故。在柏林的意大利外交官自然开始以为，德国人简直是在听任他们的国家毁灭了。

到了新年，希特勒已经决定：多做一点工作使意大利人继续作战是值得的，不过他必须避免过分强烈地主张德国应起领导作用，以免得罪墨索里尼。他为了轴心国的威望，为了使英国人没有机会通过北非把他们的军队连接起来，决定要保住利比亚。他暂时还打算派一支远征军到阿尔巴尼亚去，使意大利人能够守住他们的阵地并同希腊和“英一希”部队的主力交战，可是到了1月的第三周他和墨索里尼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议上见面时，他又在这一点上改变了主意。希特勒坚持要墨索里尼到德国来举行会议。虽然墨索里尼在抵达时对齐亚诺说，他那时多么怕见希特勒，可是等他离开贝希特斯加登时，又同前几次一样，似乎对于这次经历感到兴高采烈。

希特勒提出不派兵到阿尔巴尼亚去的理由是，这样一来会引起人们过分注意他自己进攻希腊的计划。墨索里尼不断催促他那些按兵不动的司令官于3月9—21日进攻希腊人，可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他不得不等待德国298的入侵——同时相当惊慌不定，唯恐南斯拉夫会袭击阜姆、萨拉或者斯库台。关于轴心国占领希腊和南斯拉夫的经过，将在《概览》的另一卷中加以叙述。这里要说的只是：意大利军队在争先侵入希腊时极力想胜过他们的盟友，结果却没有成功；希腊人是向德国人投降的；停战条件仅仅对意大利人说了一声“请原谅”就决定下来了；德国草草拟订的瓜分南斯拉夫和成立希腊占领政权的办法，使意大利受了一肚子气，而德国自己却得到了大部分好处。

与此同时，德国的增援部队已经到达北非。那年年初，鉴于利比亚缺乏港口设备。一支较大的部队又有被截断的危险，希特勒原来打算只派一个反坦克团去，可是2月3日他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宣布，他终于决定派一支装甲部队到那里去，理由是：如果英国人征服了利比亚全境，他们就可以用手枪对准意大利的头部，逼使它讲和，而且他们还可以抽出十二个师来用在叙利亚，以支持土耳其。2月14日，非洲军团在埃尔温·隆美尔中将（后升为陆军元帅）的指挥下，开始在黎波里登陆。隆美尔于3月24日发动反攻，4月4日重新占领了班加西，10日越过了埃及边境，虽然英国人继续据守着托卜鲁克。这完全是隆美尔自动采取的行动，他的大胆进攻使他同北非意军司令加里波迪将军发生了一场忿怒的争吵，幸亏这时最高统帅部发来了一份电报，使他在对待意大利人方面完全可以自由行动，所以结果隆美尔取得了胜利。

隆美尔在作战方面原来应该受意大利最高司令部和北非意军司令部指挥，但是他越过意军司令部直接接受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这并不是仅有的一次（1942年8月，他改归意军最高司令部直接节制）。他深得在他麾下作战的意大利军人的爱戴，可是他同意军司令部人员的关系却始终不好。对非洲军团说来，比同意大利人的磨擦更为严重的一个障碍是，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对北299非战线可能出现的情况显得毫无兴趣。勃劳希契于2月8日曾提出意见，反对从对希腊和俄国的作战部署中抽走装甲部队。哈尔德对隆美尔说，他的部队是可以牺牲的，其作用只在于尽可能延迟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崩溃。再则，因为给养困难，德军在非洲最多只能维持两三个师。隆美尔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常常发牢骚说，非洲军团的兵员和物资都非常缺乏。

降美尔部队的开到利比亚，使意大利进一步卷进了纳粹机器。德国人在意大利和非洲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补给站和通讯组织。他们还集体地和个别地使这个国家已经破产的经济承担了新的负担。另一方面，意大利人自然还担心德国人带来了大批暗藏的间谍、盖世太保特务和第五纵队。例如，人们开始认为，只要意大利一旦出现背弃轴心国的迹象，就会有数以千计的纳粹恐怖分子在罗马和其他城市里行动起来。虽然在1943年7—8月间希特勒的陆海军会议记录中并没有出现这样一项计划的痕迹，害怕这项计划的心理对巴多里奥政府却具有一种使军心民心涣散的作用。倘使德国人自己制造了这种流言，那倒是很值得的。

第三节从德军入侵俄国到突尼斯陷落

（一）意大利在侵俄战役中的作用，1941—1943年

法西斯政府当然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巴巴罗沙战役”的计划。希特勒或者里宾特洛甫不时会很不满地评论德苏关系的情况，但是，甚至在1941年6月2日勃伦纳山口的会议上，里宾特洛甫还叫齐亚诺放心，说马上就要对苏开战的谣言实在为时过早。然而，意大利人已经从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中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结论，所以当里宾特洛甫6月15日在威尼斯宣布德国即将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时，他们并不感到意外，并且在里宾特洛甫说德国准备单独对付苏联时也不感到沮丧，墨索里尼立即向希特勒表示他可以派一个意大利军团到东线去。6月22日凌晨3时，德国驻罗马公使奥托·冯·俾斯麦亲王递交给齐亚诺一封致墨索里尼的长信，希特勒在信里解释何以这样匆促通知他的原因说，进攻的最后决定是直到21日晚上7时才作出的。他唠唠叨叨地300叙说必须在解决英国以前先消灭苏联，他还谈到同意大利分享乌克兰的财富。他接受了墨索里尼出兵的提议，但声明并不急于要这些军队，意大利对德国的最好的帮助就是加强北非的兵力，在海上和空中显示出更加旺盛的斗志，并作好随时入侵法国或突尼斯的准备，如果法国一旦违反条约义务的话。尽管墨索里尼出兵的提议受到了这样冷淡的对待，他还是尽早于6月22日便对苏联宣战，并于次日答复了希特勒的来信，向他保证法西斯党老卫士对战争具有无比的热情，意大利人民也具有高昂的斗志。他决心要在希特勒预期会打赢这场战争的战线上一显身手，并对轴心国的作战提供较多的兵士和较少的非战斗工作人员，从而提高意大利的威望，因此他急忙派出由三个师组成的一个军团到东线去，并计划尽快再派出一个军团。希特勒虽然一度不愿意接受更多的意大利军队，但是到了1941年秋天却同意接受了，并且提出意军应该参加征服高加索，因为外高加索被指定为意大利“生存空间”的一部分。1941年12月底，他甚至要求墨索里尼查明意大利的增援部队能否在春天进入阵地。

然而，“意大利征俄军团”直到1942年7月才扩充为意大利第八军，共有十个师二十二万人。对意大利来说，装备这样大一支部队并不是容易的。而且，等到这支部队开抵前线以后，德意两国又在给养问题上发生了惯常的磨擦。意大利部队总算没有遭到什么不幸便度过了1941—1942年的冬季，可是，1942年12月到1943年1月的苏军攻势却使他们承担了一项力所不逮的任务。这两个轴心国的伙伴关系由于斯大林格勒惨败后的相互指责而并没有改善。当苏军在1943年1月全线突破，301德国人拒不供给意大利人以任何机动运输工具时，第八军只得尽可能自行设法从顿河退到基辅。幸存的残余部队只好撤离前线。

（二）墨索里尼面对着战争的第二年

德国进攻苏联后不久，墨索里尼曾表示希望德国会“大遭挫折”，因为如果德国获得全胜，意大利就会沦于附庸地位。然而甚至当里宾特洛甫在1941年5月13—14日匆匆访问罗马，为赫斯飞往英国一事进行解释时，墨索里尼似乎还没有认识到德国人对赫斯这次出走可能对意大利产生的影响感到多么惊慌，也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利用一下这种局势。他仍象往常那样，从空话中寻求安慰。尽管这场战争已经毁坏了法西斯政权的军事声誉和它在东非的帝国，墨索里尼在庆祝战争一周年时，还在法西斯议会中发表了一篇纪念讲话，勉强地恭维了德国人一番，而私下则忿怒地倾吐出对德国人的种种不满。但是，他还是欣然接受了希特勒的邀请，前去访问东线。这次会晤后来推迟到1941年8月25—28日，其唯一原因似乎是，军事行动进展得比原来预期的要慢。就意大利来说，这次会晤毫无收获，墨索里尼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既然德国人未能在预期的八个星期内打败俄国人，希望他们会认识到他们不能指望单独打赢这场战争，因而他们会保证尊重其他国家的民族和社会理想，以便寻求它们的支持。墨索里尼回国后不久，就觉得有必要消除人们的猜疑，以为这次访问使他产生了敌对情绪，因此他正在加速完成“阿尔卑斯壁垒”，可是事实上，根据齐亚诺10月13日日记中的记载，他认为意大利所能指望的最多也不过是成为德意志欧洲的一个行省，而且，如果它抗拒德国的任何要求的话（不管这些要求多么蛮横无理），它就可能会落到同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同一命运，成为仅仅是德国的一个殖民地。

1941年10月中旬，德国人突然改变了态度，邀请齐亚诺于10月25—29日访问德国和东线。他受到异常殷勤的接待，并且听到对意军的战绩和意大利在建立新欧洲作为抵御美帝国主义的壁垒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等一番恭维话。11月24—27日，齐亚诺为续订反共公约而访问柏林时，对意大利热诚友好仍然是当时的气氛。他向墨索里尼报告说，纳粹领导人这回的态度很清楚地表明，意大利虽然不能完全同德国平起平坐，却比任何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在内，更接近于这种地位。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人是欧洲的主人，应该让人们知道这一点。人们也的确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可是真正重要的是，要象意大利现在这样，坐在主人的右首。

这种热诚友好的表示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墨索里尼正在被迫“吞下一只癞蛤蟆”（借用意大利的一句俗语），随便加上多少甜言蜜语也无法使它可口。就在这时，拥有广泛权力的德军南方总司令凯塞林到达了意大利，而且德国人又否决了意大利同法国谈判关于通过比塞大的问题。这两件事都突出了意大利从属于德国的地位。因此，墨索里尼竟然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观看1941—1942年冬季德国人在俄国所遭到的挫败，这就不足为奇了。他一方面不希望德国太“遭挫折”，一方面又觉得俄国幅员辽阔，不是一个容易战胜的敌人，因此，轴心国同苏联单独媾和将是明智的。

这时候，（虽然墨索里尼本人似乎还不承认）由于美国参战，力量对比已经变得对轴心国不利了。尽管盟国在远东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可是在意大利，却掩盖不了303这样一种怪现象，即：意大利穷乡僻壤的农民都把罗斯福的照片同在当地创造奇迹的圣母画像并排挂在一起。12月11日，墨索里尼发表对美国宣战的演说，讲的人和听的人全缺乏热情。他一度装得十分钦佩日本，可是两国的实际合作却依然是微不足道的。他对战争结果的怀疑，加上他对德国一贯的猜疑，使他在1942年春天谈到要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一支

军队，以便随时应付 1943 年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事件，可是，他对此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反而把阿尔卑斯军团派往乌克兰草原。

（三）法意关系

轴心国同法国的关系这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在 1941 年有了新的变化，因为轴心国越来越需要劝诱维希政府让它们在突尼斯港口起卸作战物资，以缩短横渡地中海的路程。德国人在流产的 1941 年 5 月 28 日巴黎议定书的第二号中实际上已经取得了这种特权，可是当墨索里尼要求在经由比塞大转运的问题上让意大利享受同德国相等的待遇时，德国人却对他说，法国的许可只适用于德国和非军用物资，尽管事实上该议定书明确地提到了作战物资。里宾特洛甫在 6 月 2 日向齐亚诺提议说，这种重要的谈判最好还是交给德国人办理，因为法国人在同意大利人打交道时往往更容易动怒，至于他所说的维希政府拒绝让意大利人使用突尼斯一事，罗马也不必因此感到忧虑，因为轴心国在突尼斯问题上所达成的谅解仍然有效，而且战后还是会实行的。

不久以后（7 月 25 日），希特勒对最主张安抚法国的人士之一雷德尔说，同意大利的关系，决不能有所恶化，可是在纳粹发言人对意大利人讲话时，着重点往往正相反。6 月 2 日，凯特尔在勃伦纳山口会议上对卡瓦莱罗说，希特勒不许他讨论意大利的要求，6 月 15 日凯 304 特尔和里宾特洛甫两人又在威尼斯详细谈了对法国施加压力的危险。8 月间，墨索里尼想试探一下法国人的意见，希望立即在西欧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而把殖民地的命运留待战后再解决，并提出将比利时的瓦隆族居住区划归法国，以换取尼斯和科西嘉。另一方面，8 月下旬他在腊斯登堡对希特勒说，由于停战协定已成一纸空文，同法国的关系应当建立在一种新的基础上，可是希特勒却宁愿展缓谈判，等到打败俄国，使法国人失去了最后的幻想之后再说。

齐亚诺 11 月间访问柏林时，提出他本人要同达尔朗举行一次会谈。里宾特洛甫同意了，不过严格地规定应该避免讨论政治问题。意大利最高司令部这时特别急于要使用比塞大，因为英国人又在入侵昔兰尼加了，可是希特勒明确地禁止就这个问题举行任何谈判。12 月 10 日，达尔朗—齐亚诺会谈在都灵举行了，唯一的结果是任命了一个意大利驻维希的大使（后来，根据德国的建议，意大利还向巴黎派了一个大使）。卡瓦莱罗非常执拗，甚至代墨索里尼起草了一封致希特勒的信，坚决主张应通过协议（甚至不惜向法国作出军事上的让步）或者使用武力以取得突尼斯的港口。似乎的确还向法国作了某种新的试探，因为齐亚诺在 1 月 20 日报告说，法国的条件很苛刻，希特勒不愿加以考虑。与此同时，两个轴心国家为了暗中取得便利，都在同法国人磋商，而在这样做时，德国人照例总取得较大的成功。

（四）轴心国在地中海

到了 1941 年底，德国陆海军对意大利地中海区域施加的压力日益明显了。德国的压力使意大利人不得不 305 承担起在地中海东部截击英国护航队的搜索任务，结果在 1941 年 3 月 28 日发生了马塔潘战役。在这一战役中，德国和意大利的空军都对缺乏空中支援负有一部分责任。

希腊沦陷后，爱琴海的意大利海军在作战方面归新任命的德国“东南欧海军上将”指挥，德国还把潜艇派往地中海，虽然德国海军在那里的总兵力始终是不大的。

意大利海军没有航空母舰，在马塔潘损失惨重，而且燃料方面也经常发生困难。除了护航，它很少作其他的活动。可是即使执行这一任务，意大利

人也未能满足德国人的要求，德国人疑心他们的盟友想要保全自己的军舰和商船作为将来的王牌，因此故意放慢了补给品的运输工作。

据报道，在 1941 年第四季度中，驶往利比亚的轴心国船只有三分之二在途中被击沉了。为了突破这种空中和海上的封锁，希特勒把第二航空队从东线调到了地中海，并任命它的司令阿尔伯特·凯塞林陆军元帅为南方总司令，统领在意大利、希腊和北非的全部德国空军，后来还指挥地中海的德国海军。1943 年初，地中海的德国地面部队也归他管辖。凯塞林名义上虽隶属于意大利最高司令部，可是戈林却在有关空军的一切问题上有权直接同他联系。意大利人阻挠了希特勒想使凯塞林控制意大利空军和一部分意大利海军的计划，可是，尽管如 306 此，这种新的安排还是使他们受到德国人更为严密的控制。

轴心国领导人之间的不和，以及意大利人不能影响决策或采取任何独立自主的行动，这种情况在 1942 年中甚至比在 1941 年还要显著。隆美尔 1942 年 1 月 21 日发动的反攻，使非洲军团越过昔兰尼加凸出地区而到达了加萨拉。更重要的是，轴心国获得了自 1940 年夏季以来最有利的机会把马耳他打哑，并开始利用一下这种局面。从 1 月起，他们就不断对该岛和驶近该岛的一切护航队发动空中攻势。2 月间，意大利最高司令部在德日两国参谋人员的协助下，开始为在那里登陆的意—德远征军制订计划。然而，即使到了这时，希特勒还认识不到强行攻占马耳他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一军事行动极其危险，又不信任意大利军队，并且不愿意在作战季节从东线抽调他自己的军队来。意大利最高司令部方面则充分意识到来自马耳他的危险，但拿不定主意是由他们自己承担进攻任务，还是干脆向德国人说明自己的意见。墨索里尼不断向希特勒呼吁的事项也并不是这一件。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并不是十分明显的，因为雷德尔、凯塞林，一度还有隆美尔，都赞成进攻。

在 1942 年 4 月 29—30 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举行的会议上，他们决定，等计划在 5 月底发动的隆美尔的沙漠攻势有充分时间取得进展后，在 7 月间入侵马耳他。然而，6 月中旬，希特勒没有同墨索里尼商量就决定把登陆推迟到他在俄国发动的夏季攻势以后，或者最早也要到 8 月底。轴心国继续封锁马耳他，可是一支大护航队在 8 月间突破了封锁，于是马耳他变得不仅能够防止入侵，而且能够再次袭击轴心国方面驶往利比亚的船队，从而 307 使形势变得不利于围攻它的人了。

与此同时，隆美尔 5 月 26 日发动的新攻势使托卜鲁克在 6 月 21 日陷落。这激起了德国人的希望，认为轴心国军队将能把第八集团军赶入尼罗河流域，并在那里歼灭它。墨索里尼也为隆美尔的胜利所陶醉；罗马的外交部为埃及草拟了一份独立宣言；墨索里尼还于 6 月 29 日亲自飞到利比亚，指望在两星期内胜利地进入埃及，以便及时就地防止德国人在埃及问题上也欺骗意大利，象他们在希腊问题上曾欺骗过它那样。

然而，这两个独裁者的希望由于英国人在阿拉曼的反击而落空了。墨索里尼于 7 月 20 日回到意大利，声称他相信德军在两三个星期内就将重新前进。可是，截至 8 月 30 日为止，隆美尔力图突破英军防线的一次次尝试均未得手。这场沙漠战争陷于停顿状态，直至 10 月 23—24 日夜间为止，那时蒙哥马利发动了攻势，结果，他的部队在 1943 年 1 月底以前一直推进到了黎波里。在轴心国军队开始撤退以前，意大利各师损失惨重，于是又有人指责

德国人在危难中抛弃了他们，甚至还把他们的机动运输工具拿给了非洲军团。就在这一时期，意大利人在国内也受到了惩罚，因为盟国空军在 1942 年 10 月底对热那亚、都灵和米兰展开了一系列猛烈的空袭。

蒙哥马利在横越沙漠追击隆美尔时，盟军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登陆了。从 1940 年 6 月起，轴心国每次开会无不提到盟军在法属西北非或西非登陆的危险。在 1942 年 4 月 29—30 日的会议上，双方商定，如果盟军在法国或者北非登陆，意大利应随时准备进军法国。然而，两国并没有就作战行动共同拟订详细计划，也没有就德国和意大利如何分配新的占领区达成任何协议。再 308 则，有好几个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直在考虑怎样预防敌人在地中海其他地方登陆。到 1942 年 10 月，他们预料这样一次登陆随时都会发生，地点很可能在地中海东部。可是，11 月初当轴心国的情报机构报告说有一支大护航队集结在直布罗陀时，他们对于它的目的地又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猜测，并且认真作了准备，以对付一支驶往突尼斯或者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入侵舰队。11 月 7—8 日夜间发生的事件的消息，使轴心国领导人大为吃惊。11 月 8 日晚上，希特勒在慕尼黑召开会议，解决轴心国对法国的政策，以便把决定向赖代尔宣布。墨索里尼派齐亚诺去出席会议，并指示他在会上说，意大利将给予法国人一切援助，如果他们同轴心国合作的话，可是，如果他们拒绝合作，意大利就要占领法国尚未被占领的地区和科西嘉。希特勒本来一直在一张从铁路指南上扯下的地图上划出罗马和突尼斯之间的距离，接着就显得有点心神恍惚。午夜前后，他突然宣布，他决定立即占领法国和科西嘉。当时或者稍晚一点，他又决定要在突尼斯保持一个桥头堡。意大利军队于 11 月 10 日开始在法国朝前推进，并于 11 月 10—11 日夜间在科西嘉登陆，竭力想同德国人并驾齐驱。10 日，赖伐尔在慕尼黑曾试图提出一项建议，让轴心国使用突尼斯的港口，以换取意大利放弃对法国的领土要求，希特勒装模作样地打断了他的这一建议，可是轴心国的军队一旦开始行动后，德国人的举动又和通常一样，不顾别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了。例如，在两国共同占领的土伦，德国人把军火库掌握在自己手里，只从接收过来的五十万吨法国船只中拨给了意大利十万吨。他们让意大利人去打捞凿沉的军舰，可是虏获的船只凡是比驱逐舰大的，没有一艘是可以使用的，而且，他们应希特勒的要求，最后还把五艘法国 309 鱼雷艇和一艘炮艇交给了德国海军，以便德国在地中海组成自己的护航队。意大利人原来希望在突尼斯取得政治上的控制权，可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在 11 月 13 日抵达突尼斯时，已经比德国人迟了两天。他们不久就发现自己又同往常一样处于劣势。希特勒同意意大利人在突尼斯分享权力的方法似乎是，避免缔结明确的协定，同时不顾意大利人而径行加强德国的实力，因为他认为意大利人对于他仍然希望进行的反攻毫无用处。结果，德国人只能遏制盟军 11 月间对突尼斯发动的攻势，而不能展开反攻。

1942—1943 年冬季，德国人对意大利人施加了比以前甚至更大的压力，要他们改善北非轴心国部队给养的供应办法。希特勒在 11 月 28 日对隆美尔说，给养问题是能够解决，也必须予以解决的。11 月底，戈林到意大利来讨论这个问题。他的一举一动（据齐亚诺说）很象是他已经自封为“德国驻意大利的保护长官”了。他斥责

意大利的军事领导人犯了种种错误，并且增派了一些运输管理员，从而增加了德国空军、德国海军在意大利的司令部同意大利最高司令部和其

大利机构之间已经严重的摩擦和职权重叠——一种不仅是国与国的，而且是各部门之间的纠纷。

戈林访问后的一两星期，齐亚诺和卡瓦莱罗应召前 310 往希特勒的总部（墨索里尼称病没有去）。会议于 12 月 18—19 日举行，正好让这两个意大利人及时领略到纳粹头子因意军在东线溃退而发的雷霆，俄国人那时刚在东线发动了一次新攻势。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是海上运输，德国人再次要意大利人牢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希特勒向他们保证，如果这个海上运输问题可以获得解决，轴心国就将派遣最好的军队到北非去，向阿尔及尔和梅利利亚推进，从而迫使西班牙人改变态度。3 月中旬，希特勒仍然声称必须守住突尼斯，实际上直到 4 月中旬还派去了大批增援部队。结果是，在盟军 5 月初攻下突尼斯和比塞大以后，大约有十二万五千名德国人和十一万五千名意大利人被俘了。

第四节意大利的崩溃

（一）意大利的和平希望或脱离轴心国的希望

早在失败成为定局以前，法西斯领导人就曾想到除轴心国的全盘胜利外，这场战争可能带来的其他种种结果。1941 年夏季，墨索里尼本来会接受一种妥协的和平，借此大好机会以保持意大利已经获得的战利品，并保全它的独立，免受德国支配。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三国联盟开始考虑是否有可能分化它们的敌人，劝诱俄国或者西方国家单独缔结和约，可是对于所应采取的方针，三国意见又不一致。日本首相提出的同俄国接触的建议，于 12 月 28 日送到罗马，得到了墨索里尼的赞同，可是不久以后，许多德国发言人都向意大利人暗示（而且拿齐亚诺来说，他也倾向于同意他们的说法），日本的胜利对所有的白种人并不是好兆头。1942 年 2 月 24 日和 4 月 9 日，在卡纳里斯访问意大利后不久，驻罗马的德国公使俾斯麦甚至说，法西斯政府应该带头发动一次和平运动，既同西方国家接触，又在轴心国内部发挥影响。俾斯麦预期英国到 10 月间就会愿意开始谈判，特别是如果德国人提 811 议帮助白种人重新征服亚洲的话。墨索里尼对这些建议都没有作出反应，希特勒 4 月 26 日的讲话也暂时把官方采取任何和平行动的希望全打消了。5 月间，教皇驻伯尔尼的使节就那年秋季是否有达成一种妥协和平的希望同齐亚诺商谈，齐亚诺说德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不会妥协，他还看不出有什么和解的基础，因此教廷最好不必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意大利人对德国在同英国人进行秘密接触的疑惧心理并不是很容易消除的。齐亚诺一听说英德在卢加诺举行会谈，一面自认为这种报道是无稽之谈，一面又立刻警觉起来。

墨索里尼派齐亚诺去参加 12 月 18—19 日的轴心国会议，指示他向希特勒建议同俄国媾和，或者至少在东线停战，以便尽量把军队抽调到其他战线，特别是调往地中海战线。齐亚诺还奉命建议，可以请日本诱使苏联政府把他们的野心转向中亚细亚。然而，希特勒对这些建议哪一条也拒不接受。

这时，除了墨索里尼，差不多所有的意大利人都盼望意大利脱离轴心国，向盟国靠拢，为自己保全一点还可以保全的东西。类似的想法也在德国的其他卫星国中蔓延开来。1943 年 1 月 19 日，从布加勒斯特传到罗马的消息说，安东尼斯库认为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有必要同盟国接触，希望借此把欧洲从布尔什维主义下拯救出来。墨索里尼拒绝了安东尼斯库的提议，不过在 3 月 8 日和 26 日的信件中他却敦促希特勒同苏联媾和，或者至少使东线稳定下来。

4月7日到10日，墨索里尼和其他一些意大利人在萨尔斯堡出席一次轴心国会议。这一次，墨索里尼2月间从齐亚诺手里接过外交部后，新任命的外交部副部长朱泽培·巴斯蒂亚尼尼建议同俄国媾和，正如安东尼斯库后来在12日建议同西方接触一样。里宾特洛甫这时已在设法不让意大利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一起去赶那个与盟国媾和的浪潮。他仍然坚决反对任何和平行动，但是其他一些德国人则开始向柏林的意大利大使馆打听关于向盟国，甚至向苏联进行接触的情况。

甚至在罗斯福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以前，意大利的外交官和政客们为了说服希特勒拯救或解脱他的盟友或者开始举行和平谈判，提出了各种具有不现实的悲哀可怜意味的计划。1943年春天，巴斯蒂亚尼尼试图劝说德国政府宣布一项“欧洲宪章”，以保障小国和被占领国家，但是没有得到纳粹分子的赞同。当阿尔菲耶里在6月11日同里宾特洛甫讨论欧洲合作时，里宾特洛甫断言轴心国必须首先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然后大笔一挥就能把欧洲组织起来，并说发表一项类似大西洋宪章的宣言只会被人理解为软弱的表现。里宾特洛甫又说，除了使用武力，无法保住欧洲，甚至在墨索里尼垮台以前，据说至少已在准备与盟国方面接触。据报道，巴斯蒂亚尼尼在1943年7月分别派出两个代表到里斯本去，一个是银行家富米，巴斯蒂亚尼尼希望他在美国或英国也许会受到接待，另一个是不久前刚卸任的驻葡萄牙公使佛朗切斯科·佛朗索尼。

据说墨索里尼批准派遣富米，条件是他本人决不同这件事沾边。大约就在这时候，墨索里尼甚至也开始对安东尼斯库的和平方案有了半心半意的兴趣，竟然邀请后者到罗马来，并且在7月1日两人见面时对安东尼斯库说，在某种情况下，他自己也会为和平采取行动而不受希特勒的牵制。他的建议自然也决不是切实可行的。墨索里尼与平时一样，灰心绝望地在这些危险的抉择之间举棋不定。

（二）轴心国的崩溃

希特勒丢失了突尼斯以后，等待着盟军的下一次登陆，一面充分意识到意大利部队不能抵抗入侵者，意大利全国已经极端厌战了。邓尼茨汇报他在5月12—15日访问意大利的情况时，希特勒问他墨索里尼会不会坚持到底，邓尼茨甚至也不免支吾其词。希特勒本人对于墨索里尼的抵抗意志倒比较有信心，可是他知道墨索里尼是个有病的人，并且担心国王随时会推翻他，那么一来，西西里的德国军队就会被切断退路。为了保护这些军队并加强他的“欧洲要塞”的外围防御，他这时开始调动更多的军队进入意大利。墨索里尼和他的新参谋总长安布罗西奥将军（1月30日接替了卡瓦莱罗）都宁愿把意大利部队从法国和巴尔干各国调回来，可是，德国人不许他们这样做。

4月7—10日轴心国开过会议以后，希特勒自夸他已经成功地使墨索里尼恢复了“昔日的精神状态”，因为他初到萨尔斯堡时就象“一个萎靡不振的老人”。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后，德国人立即重新设法激励墨索里尼，要他对懦怯和失职行为采取无情的行动。7月17日希特勒对他那些顾问说，只有以同斯大林在1941年的无情手段相比拟的“野蛮措施”才能煞住意大利军队中士气的低落，挽救那个国家。他心里所想到的办法是成立一种执政委员会或军事法庭，以“清除不良分子”。他认为，除非采取一些严峻措施，否则增派德国军队到意大利去也无济于事，而且如果德军不得不单独作

故的话，它就不能保卫整个半岛，而必须缩短防线。

希特勒立即提出于7月19日在费尔特雷举行一次轴心国会议。整整两小时，墨索里尼不得不恭听希特勒的长篇训话，其间只因传来了罗马遭到第一次猛烈空袭的消息而中断了一下。希特勒详细地告诉墨索里尼应该在前线和国内战线上做些什么，并且提出希望说，如果意大利人认真抗战，西西里岛就能守住，等德国的新式潜艇赶来参战，那时候就会轮到英国人来迎接他们的“斯大林格勒”了。墨索里尼对这一切简直开不出口来回答，虽然安布罗西奥曾预先对他说过，他的军队最多只能再支持一个月，甚至阿尔菲那里也曾拐弯抹角他说意大利结束掉轴心国的时候已经到了。他只有回到罗马面对着自己的亲信发动的一场叛乱，以及当时还保持秘密的一个规模更大的、终于导致他垮台的密谋。

（三）墨索里尼的垮台

法西斯政权由于对战争处理失当、贪污腐败，以及卑鄙的个人阴谋，这时已经完全声名狼藉了。法西斯“头子们”自己也感到已经同全国失去了一切联系，整个政治机器已日趋失灵。普通的公众由于一直确信墨索里尼总是正确的，现在更容易认为他总是错误的，因此他们最盼望和平。与此同时，那些比较活跃的反政府人士，自从1942年上半年以来，早在阿拉曼战役或者北非登陆以前，就一直在准备同这个政权展开斗争。同年下半年，共产党、社会党、天主教民主党、自由党、人数不多的左派中心团体（后称劳工民主党），以及即将组成行动党的马志尼左翼分子，结成了一个联盟，谋求推翻墨索里尼，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理想主义的反法西斯人士渴望掀起一场同时反对法西斯主义、君主政体、教会和轴心国的人民起义，但当时占优势的意见却是计划在权力中心发动一次军事政变，在政变中国王以及他对武装部队的权力将起主要作用。反法西斯人士、宫廷，以及法西斯“领导阶层”中的不满分子都同军队有所接触。虽然参谋总长安布罗西奥将军在费尔特雷会议以前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希望，认为墨索里尼自己也许会同德国决裂，可是他的助手卡斯泰拉诺将军早在4月间就拟订了一个政变计划。

在此期间，齐亚诺于2月5日被免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后，已就任驻教廷大使，他希望利用一下他新取得的行动自由。他和格朗迪去同英国驻教廷公使达西。奥斯本先生（后称弗朗西斯爵士）接触，没有遭到拒绝。他们并不是仅有的探询者，戈内拉教授（反法西斯领袖之一）大约也在这时同奥斯本有了联系，并认为英国比较愿意通过君主政体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如果意大利迅速采取行动，它可以指望得到盟国的优待。各反法西斯党派觉得事不宜迟，而且它们还认为齐亚诺、格朗迪以及其他一些人可能会效法达尔朗，向盟国献策，建立一种没有墨索里尼的自由主义化的法西斯政权，于是它们明确地同维克托·艾曼努尔国王进行接触，可是，国王犹豫不决，直到7月19日或20日才终于决定对墨索里尼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自从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登陆以来，一些心怀不满的法西斯“头子”曾迫使墨索里尼于7月24日召开了一次最高会议。格朗迪、博塔伊和有点犹豫不决的齐亚诺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恢复国王、最高会议、内阁、议会以及市政机关等固有的职能，并提出应该由国王全权指挥武装部队。这项动议于25日凌晨以十九票对八票通过（一票弃权）。在法西斯叛变者中，似乎没有一个人参与过另一项秘密计划，可是格朗迪立即拜访了王室事务部长，要求国王进行干预。下一天，墨索里尼若无其事地照常办公，接

着他应召前往萨伏依别墅，被国王免职，并山一辆救护车送走，拘留在一所警察营房里，当时他似乎吓得目瞪口呆。他从那里被移送到蓬察岛，后来又转移到距撒丁岛不远的马达莱纳岛，最后则转移到了内地萨索山上的一所旅馆里。国王任命巴多里奥元帅（他没有参加推翻墨索里尼的计划）为新政府的首脑，政权的变更甚至没有遭到法西斯党和国民军的反对就实现了。然而，公众对墨索里尼垮台的欢庆却由于政府宣布战争将继续进行下去，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将受到严厉惩罚，而不免有点扫兴。巴多里奥的内阁由一些将领和文官组成，因为国王不让他任用反法西斯党派的任何代表。虽然新政府革除了法西斯主义的一些弊端，例如取缔法西斯党和释放许多政治犯，可是他们还是不肯完全恢复出版自由，或者使组织政党合法化。

（四）希特勒准备接管意大利

墨索里尼的垮台，在德国的一般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和不安，因为这时恰巧是盟军对汉堡和其他城 316 市进行一系列破坏性空袭中的第一次，而俄军则又在发动一次进攻。关于意大利的局势，希特勒最初想到的是，要拯救西西里岛上的德国军队，控制住阿尔卑斯山口（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都非常同意这一点），以及派遣伞兵去救出墨索里尼。他提出派一个德国装甲师开进罗马，逮捕国王、皮埃蒙特王子和巴多里奥政府成员，用飞机把他们送到德国来。他很想派兵开进梵蒂冈，可是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两人都不主张这样做。他那些军事顾问都反对立即夺取罗马的整个计划，结果决定在巴多里奥政府还自称是盟友的时候尽量多调动一些德军进入意大利，以便一接到命令就立即占领意大利并夺取其舰队。德军的增援部队于 7 月 30 日开始越过勃伦纳山口，他们一共集结了十六七个师的兵力。希特勒拒绝了维克托·艾曼努尔国王约他在意大利北部会商的一项邀请，因为他疑心自己也许会遭到绑架。在德意两国的外交部长和参谋总长于 8 月 6 日在塔尔维齐奥开会时，双方尔虞我诈，均未得逞。

巴多里奥政府又苟延残喘了一个月。政府发言人一再向德国人庄严保证，意大利决无背弃盟约的意图，可是从 8 月初起，他们就在同敌方进行接触了。他们恬不知耻地干脆提出愿意投奔盟国一方，给了盟国在里斯本的代表以不愉快的印象。他们不敢就抗击德国的进攻作好准备，唯恐这样做会惹起德国人来进攻，可是他们却满怀希望地认为盟军会派出大批飞机或者在罗马以北登陆，来把他们救出困境。他们还相信（至少当时有一些负责意大利防务的人和盟国军事情报机构全都相信）德军如果遭到大规模的进攻，可能会在罗马以南站不住脚，只好撤退到“比萨—里米尼防线”去。

但是，巴多里奥和他那些同僚完全不准备采取行动，哪怕德军真的有意立即向北撤退的话。他们等待盟军来为他们创造奇迹。因此，等到 1943 年 9 月 8 日宣布停战，并没有同时带来什么英—美奇迹时，罗马就陷入了 317 一片混乱。国王和巴多里奥当夜逃到了佩斯卡拉，再从那里由海路逃往布林的西。德国人几天之内就从那不勒斯到勃伦纳山口控制了意大利全境，并于 9 月 12 日用飞机把墨索里尼象另一个安德洛墨达那样从萨索山上救了出来，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第二章德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关系，1940—1943年

第一节德意的经济关系，1940—1941年

没有德国提供的煤、钢、化学制品和机器，意大利的工业和运输很快就会停顿下来。它所需要的大部分石油只能或是由德国的合成产品供应或是由德国的卫星国家罗马尼亚供应。罗马尼亚的石油如果由陆路运来，必须经过德国。意大利可能找到其他供应来源的所有那些国家，都受着德国的统治，或者被封锁隔断。大德意志这时候几乎是意大利出口商品的唯一市场。虽然丹麦—意大利贸易协定仍然有效，但同挪威、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的贸易都是通过德—意票据交换所来结算的。一个附属于意—法停战委员会的经济代表团，处理同法国非占领区的商务，它发现同德国人相比，自己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些德国人也在利用他们对西欧一些企业的控制，在东南欧扩大他们自身的利益，意大利人在那里本来就已经感到很难同他们进行竞争了。

纳粹的颂词总把轴心国吹成“新秩序”的共同保护人，或者高呼意大利拥有横跨地中海、连接三大洲的一个经济帝国的权利，但是这些好听的话却掩盖不住这一事实：第三帝国旨在垄断军事的和工业的力量，而意大利从经济方面来说对第三帝国是无足轻重的。德国人准备从意大利取得战略物资和大量农产品，可是他们在必要时可以不要这些东西，或是从别地方去取得。当然，这并没有使他们不象通常那样无情地从意大利榨取一切可以榨取的东西，并使它不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竞争。如果他们是卖方，他们就索取高价，并且往往不按约定交货。他们往往确实是交不出货来，但是，意大利人总是疑心他们不怀好意。可以料想得到的是，德国人不愿意接济这个他们认为无能的政权，这个政权在实行战时管制上疲疲塌塌，在使用替代品和其他技术经济上则远远落后于德国。德国人还疑心意大利人故意保留一些资源，希望在战后捞到不正当的好处。这种批评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有些官员肯定是故意留难，以没有力量满足德国的要求为托词，而且假如不是出于故意，也往往是由于办事无能。例如，在战争进行了一年以后，据说意大利的空军和海军还在分别向德国要求供应汽油。如果这两个军种的要求全部得到满足，那就没有什么汽油可以供应陆军或者民用了。

1940年12月5日公布的一项商务协定规定，意大利在若干年内按固定的价格出口农产品，可是这时候，意大利人对于购买武器和制造武器的手段已经远比对于出售柠檬和番茄更有兴趣了。在法国掳获的武器，简直没有分给他们什么。与此同时，1940年12月间格拉齐亚尼军队的溃败使意大利不得不从德国取得新的供应，意大利驻柏林的武官埃菲西奥·马拉斯将军匆促地接到指示，要他不顾代价买进他所能买到的全部坦克和大炮。由于没有签订任何战争物资的主要协定，这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务。12月17日，墨索里尼亲自向希特勒发出呼吁，要求接济原料和燃料，并且也许不够策略地重新提到他在1939年8月26日提出的那份故意夸大的需要清单。希特勒同意提供给养，但是说明他宁愿供应根据德国专家的意见选定的制成品，而不愿供应原料，同时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意大利再派更多的工人到德国去。

2月26日缔结的1941年度德意两国贸易协定。实际上确曾规定意大利将进口较多的制成品。不久以后，德国供应的原料有很大一部分全保留给特许为德国生产的工厂使用。2月的这些协定，是作为走向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步骤而公布的。贸易不再取决于一国所能匀出的商品和另一国可能需要

的商品，而是取决于原料可以最有利地用在什么地方。欧洲的作战需要必须比私人利益和奢侈品的消费享有绝对的优先权。为了确保主要供应品源源不断，在清算账目中暂时出现的差额，将来可以展延到某一较晚的时候结算。实际上，从 1941 年 6 月起，同武装部队有关的任何一笔交易的付款都不得汇划，而是记入应该在其境内收款的那个国家的账户贷方。

根据一种互惠的安排，意大利军需司令部维持驻在意大利的德国部队。同时，意大利政府还根据参谋总部的提议，为这些部队的其他需要逐月提供经费，并经一个由各有关部门组成的委员会加以审核。除此以外，德同军事当局不经任何正式批准就同意意大利的一些企业直接打交道，而且往往同它们缔结一些非常可疑的协定，其目的就在于欺骗意大利政府。德国在瑞士用低价买进了英国人在埃塞俄比亚掳获的意大利纸币，从而积聚了大量里拉；穿军服和不穿军服的德国“旅游者”象蚂蚁一般川流不息地到意大利进行掠夺；1941 年秋天实施的限制出售或输出贵重金属以及限制外币交易的办法，丝毫未能制止德国人的挥霍。

第二节轴心国经济的崩溃从 1941 年

秋天起，意大利人开始感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捉襟见肘了。燃料的限量减少了三分之一，面包和衣着开始实行定量配给。实际上，从 1942 年 3 月 15 日起，面包的配给量已从每天二百克减少到一百五十克（大约五盎司），比德国配给量的一半略多一点。墨索里尼最不愿意让德国人知道意大利粮食不足，但最后还是作了安 320 排：德国应在 1942 年供应小麦（其中一部分来自乌克兰）和土豆，并在 1943 年供应更多的小麦，可是这并没有弥补连续三年歉收所造成的缺额。官方采取了一些制止生活费用上涨和黑市买卖的措施，照例没有什么实效。他们不断地逮捕了一些投机者，可是投机倒把仍然十分猖獗。虽然意大利的食品供应并不比一个被占领国家的好多少，人们却仍然可以看到法西斯“头子们”在豪华的餐馆里大吃大喝。这种越来越严重的物资匮乏，不是完全由于盟国的封锁所致。德国政府在入侵俄国以前不久，就宣布减少对意大利的燃煤和石油供应，此后情况愈来愈糟。1941 年 11 月 6 日，墨索里尼写信给希特勒诉说，工业生产只达原来生产力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再举一个例子，1942 年 2 月，在每月一百万吨以上的定额中只有五十四万吨煤可望运抵意大利，这对军事工业就具有灾难性的影响了。从德国输入的商品始终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意大利 1940 年的人超，到 1941 年和 1942 年便变为出超了。1943 年的年度贸易协定并没有规定减少意大利输出的农产品。到 1943 年春初，意大利收支顺差达到八十多亿德国马克，其中二十八亿五千万属于正常商务，六十亿是根据作战物资担保计划欠意大利政府的。为了减少这种差额，意大利政府提议从德国撤回工人。经过好几个星期争辩剧烈的谈判后，德国人同意从 4 月份起每月遣回一万二千人，并作出一些其他的让步。另一方面，他们却不肯让意大利使用这项清算余额来偿付它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些第三者国家采购物资的货款（意大利的对外贸易这时有五分之四是同德国进行的）。

早在盟国认真地开始从空中袭击意大利的工业以前，意大利的工业就已经由于原料和燃料不足而减产了。此外，干旱的天气在 1942 年和 1943 年两个冬季减少了 321 水力发电的供应量。有些军工厂的产量差不多减少了一半。于是政府在 1942 年仲夏前后决定实行严厉的政策，把工业集中起来，多余的工人全调到军火工业或农业中去。这意味着把许多小企业同蒙特卡提尼

之类的大康采恩合并起来，以及把许多工厂完全关闭。若干纺织厂从 1942 年 12 月到 1943 年 2 月底一直停工，另一些厂则缩短工作时间。服装、纸张、玻璃、陶器和皮革业也被“集中起来”。为武装部队或者为出口商品（这几乎总意味着为德国）开工的企业可以要求豁免。据说集中政策实际上是在德国人的压力下施行的，因为德国人这时刚刚紧缩了他们本国的经济。

第三节 德国占领的经济影响

就某些方面来说，在外国占领下，意大利北部的情况要比南部好些。北部是全国比较富饶的地区，公路和铁路也比较多，所以吃的东西也较多。物价没有涨得象南部那么高，兑换率虽然从七点六里拉改为十里拉兑换一马克，比起南部盟国的军用里拉兑换率来还是对意大利较为有利。起初，德国人发行了占领区货币，可是后来根据 1943 年 10 月 25 日签订的一项协议又停止发行，改由新法西斯政府每月支付六十亿里拉（1944 年夏天增加到一百亿）以偿付一切用途，包括意大利工业的战时合同在内。德国主要是通过施佩尔的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驻在当地的机构来实施经济控制的，这个机构把大量粮食、牲畜、工业品、甚至机器和铁路车辆送往德国。整个工厂被迁往德国或意大利的其他地方，四十万吨船舶很快就被攫走，还有意大利银行的黄金储备也是如此。这批黄金有一部分战后在南蒂罗尔被追回了，其余的损失则由盟国于 1948 年从德国的黄金中补偿了一部分。

最严重的掠夺行为发生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德军从那里退却时，故意破坏公用事业以及公路和工厂，这 322 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当时人们非常担心，德军被赶出高度工业化的北部时，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可是结果，德军到了行将投降的时刻，并没有普遍下令破坏，而且游击队的快速行动，也防止了当地德军司令企图进行的大部分破坏活动。

第四节 在德国的意大利劳工

意大利参战时，早已为德国招募意大利劳工拟妥了一个官方计划，结果在 1940—1941 年的冬天大约有四万七千名意大利人受雇于德国农业，大约有七万名受雇于工业。1941 年 2 月，意大利政府同意再招募二十万人，其中约有四分之一为金属工人。德国官方的一项资料指出，1941 年 9 月总数达二十七万一千人（包括二万一千七百名妇女）。意大利人在矿山、冶金工厂、军火工厂、造船厂、营造业、托特协会，甚至在各色各样商业岗位上工作。数以千计的意大利人离开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煤田到德国去，德国企业完全不管官方的计划径自招募他们。

意大利人起初都愿意到德国去，因为那里的工资和各种条件都比他们在国内可以得到的要优厚一些。可是，尽管十分需要某种行业的熟练工人，意大利工人就等级而言却被当作劣等民族看待，地位大约同罗马尼亚人相等，远不及匈牙利人、瑞士人、佛兰芒人，甚至法国人和荷兰人。他们不能结交德国妇女。当他们触犯了纳粹纪律时（这种事往往会发生），他们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许多人被送进了集中营，结果意大利不得不为他们的遭遇而正式提出抗议。德国人则抱怨意大利人是多么拙劣的工人以进行反驳，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继续要求提供更多的熟练工人，特别是提供更多的煤矿工人，作为对意大利供应燃煤的一项条件。然而，墨索里尼不久就想把工人从德国召回而不是把他们再派去，即使这仅仅 323 因为他担心那个“主宰民族”对于意大利工人那种手无寸铁的“奴隶阶级”的可怜相会变得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再则，意大利尽管人口过剩，还是缺少熟练的农业工人和工业工

人。在签订 1941 年 2 月的意德协定以后，意大利工厂和作坊中的工作时间都延长了，不久又添雇了许多女工。

希特勒在 1941 年 10 月 25 日向齐亚诺保证，所有不能在德国定居的工人都将遣送回国。虽然在德国的意大利工人总数于 1942 年 6 月初增加到三十万，到 1943 年 5 月却下降到二十三万。上文已经提到，1943 年 3 月签订了一项协议，每月遣返一万二千名工人，但是在墨索里尼垮台后、遣返工作暂停以前，有不少工人似乎已经离开了德国。

意大利全面崩溃之际，正是德国比以前更需要外国工人之时。德国人立刻取得了对意大利的控制，他们的征工队出现了，到战争结束时，大约有十三万名男女被“搜集”起来掳到德国去。绍克尔指望意大利在 1944 年供给一百五十万名工人，而法国则只供给一百万，东方供给六十万；他还说，如果到 2 月底只招募到七千人，那就是“欧洲的耻辱”。5 月间，他亲自访问了意大利，迫使墨索里尼终于同意动员男子去服劳役。这种方法招募到的人并不比以前根据军事体制所弄到的多。甚至在凯塞林已经禁止“搜集”后，党卫队还根据希姆莱的命令继续这样做。除了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搜捕奴隶外，工厂还奉令拨出它们的一部分工人，否则就会把它们的全部人员一起迁走，可是在这一点上绍克尔同军备与军火生产部发生了冲突，因为这个部不愿意那些受它保护的工厂失去人手。此外，托特协会还在意大利国内雇用意大利人从事各种建筑工程（据说在 1943 年 11 月为二十万人）；党卫队把人送去强迫劳动；而容克公司和克虏伯兵工厂则在意大利报上刊登出诱人的广告。拘留在德国和别处的六七十万意大利士兵也被迫干活；他们在 1944 年 7 月以后才逐渐重新被算作“自由”工人。

第三章德国占领意大利和新法西斯政权

1943年9月10日，希特勒在墨索里尼垮台后第一次发表广播讲话时，竭力颂扬他同“这位伟大而忠实的人物”的友谊，可是等到他的朋友在9月13—14日到腊斯登堡来访问他时，他又大失所望了。墨索里尼不是渴望打回国去重新执政，而是精神恍惚、萎靡不振，只想引退，去过隐居生活。据说希特勒曾胁迫他继续斗争，扬言否则就要对他个人和意大利人民采取报复手段。9月底对科孚岛和克法利尼亚岛守军的大屠杀，显示出德国人在镇压意大利人抵抗方面准备采取多么激烈的措施。然而，只要意大利人不犯自卫这项大罪，希特勒就没对他们显出任何激烈的敌意。他当时对戈培尔说，他在维持交通线方面需要他们的合作，而且他也抽不出足够的德国警察来用武力统治他们。因此有必要搞一个傀儡政权。早在9月9日，德国电台就已经宣布成立了一个“国家法西斯政府”。它最初由7月25日后逃往德国的几个极端分子组成，现在就把墨索里尼捧出来担任它的名义首脑。他们在意大利同适当的合作者进行接触后，在9月27日宣布了内阁全部名单，包括格拉齐亚尼元帅担任国防部长，并把墨索里尼及时用飞机送回意大利去执掌一个由别人为他任命的内阁。

战后，这些通敌分子往往请求减轻罪名，说他们当时无法抗拒德国的压力，因为德国人曾威胁说，倘使他们不出面合作，意大利就会成为第二个波兰。但是，他们尽管顺从了，实际上却并没有使意大利不被看成占领国，或325者使意大利领土不遭到实际的吞并。停战协定签词订以后，希特勒曾避免马上就暴露出德国的领土野心，可是10月5日，德国对阿尔卑斯山山前地带和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带的“防区”在军事上和行政上实行了全面的控制。一个防区包括南蒂罗尔，其中有贝卢诺省；另一个防区包括的里雅斯特、利文萨河以东的威尼西亚全部地方、伊斯的利亚，以及新吞并的那部分斯洛文尼亚，同时任命了蒂罗尔和卡林西亚的德国行政长官管理这两个防区。戈培尔久想德国把过去属于奥地利的所有意大利领土都吞并进来。据他说，希特勒曾经说过，威尼西亚本身应当同德国联合在一起。

/PGN0530.TXT/PGN>停战以后，原来驻在意大利北部、巴尔干国家和法国的六十万至八十万意大利部队大部分被“拘留”在德国，也有一部分被拘留在巴尔干国家。墨索里尼曾希望用这些人建立一支新军，可是德国人不允许这些人入伍。在意大利征募到的四个师，被德国人用去保护他们的补给线，防御游击队。新法西斯军队仅仅在加法格纳那盆地同盟军接触过一个短时期。此外，以前的意军有些残余部队继续在同德国人一起作战，许多意大利人直接参加了德国武装部队和党卫队，同时他们还拼凑了若干非正规的反游击部队。

新法西斯政府并不比新法西斯军队具有更大的价值。在1943年12月后所谓“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中任职的人是一个七拼八凑的班子，其中有过激分子、政党头头，以及抱着为过渡到民主党派“搭桥”这种希望的温和派人士。这个政府甚至还有它的左翼，并且使德国军事和经济当局颇为不满的是，还制订了一些确实是社会主义的立法。即使墨索里尼恢复他青年时代的革命思想，或者采取任何其他做法，都不能使这个“小小的萨洛共和国”获得生气（这一绰号是反法西斯人士根据它的内阁暂时藏身在加尔达湖畔这一小城市而给它取的）。这个共和国对它领土上的省市当局的控制，是完全靠不住的，官员往往是德国指定的。一些对抗的部长建立起了对抗的军队和民团，

并且，从一开始，“别动队”便因袭了为法西斯主义开路的“行动小队”的恶劣传统，随意滥用私刑，有的只是326一些带枪的浪人，有的则担任了公职。德国人坚决主张对这些法西斯暴徒中的某些人采取行动，例如1943年秋季一直在罗马进行恐怖活动的波拉斯特里尼一帮人，可是德国人自己也怂恿一些最最恶劣的罪犯，包括科赫和卡里塔匪帮，他们专门折磨战俘，并受到党卫队的庇护。

战后，有关方面试图宽恕新法西斯分子对“抵抗运动”所犯的罪行，认为那是对共产党恐怖行为的自卫。因此，值得指出的是：象“共和法西斯党”书记帕沃利尼那样的过激分子，全用真正的“别动队”的残暴手段打击反法西斯主义，逮捕反法西斯分子在停战以后又立即开始，而墨索里尼政府还应对判处帮助战俘逃跑的人死刑这件事集体负责。他们也恢复了歧视犹太人的法律，犹太人被宣布为外国敌人。1943年7月以前，法西斯政府始终没有把反犹太主义做到纳粹那样极端的地步，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甚至还责备他们在占领国家中做得太松懈，因为在那些国家里个别的意大利人曾经尽可能地帮助犹太人反对德国人。这时，既然意大利也成了被占领国家，就轮到德国人对居住在那里的四万五千名犹太人犯下最为恶劣的罪行了。在这些犹太人中，被放逐的有一万名，活着回来的只有六百零五人。

希特勒为了发泄他对意大利人背叛轴心国的愤怒，坚决主张应该审讯齐亚诺和最高会议的其他叛徒。设在维罗纳的特别法庭宣判了十八人死刑和一人无期徒刑。在六名拘押的被告中，齐亚诺、德·波诺元帅，以及三名地位较低的法西斯党徒，马里内利、戈塔迪和帕雷斯契都在1944年1月11日被枪决了。墨索里尼无力保护他的女婿，因为他自己实际上也是德国人的俘虏，德国人把他安顿在加尔达湖畔的加尔那诺，派了一队党卫队卫兵保护他。他在这里完全过着退隐的生活，以致公众简直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又访问过希特勒两次，一次是1944年4月间在克莱斯海姆，另一次是7月20日在腊斯登堡，刚好在炸弹爆炸事件之后。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秘密武器也许会挽救德国的命运，或者不管怎样，到战争结束时将会组成一个对付苏联的新联盟，而且盟国将会发现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中间人。327 墨索里尼不象希特勒那样，始终不想使全世界和他同归于尽。在新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几个月中，他枉费心机地试图同非法西斯人士和反法西斯人士和解。当盟军进攻“哥特防线”的时间日益逼近时，他在两条出路之间犹豫不决，既想率领部下作加里博迪式的撤退，退到接近希特勒的阿尔卑斯山方形堡的瓦尔特利纳，又想和盟国做成一笔反共的交易，或者甚至想同非共产主义的抵抗团体做成一笔反共的交易。在此期间，德国人在求和方面已经比他先走了一着。党卫队的卡尔·沃尔夫将军从2月起就一直在瑞士和盟国联系。但4月中旬盟军的突破，促成了第三帝国的全面崩溃，终于结束了德军总司令的踌躇不决（冯·菲廷霍夫将军于3月23日接替了凯塞林）。指挥或节制全体部队的德军西南方面总司令于4月29日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这也把新法西斯军队包括在内。战争在5月2日结束了。

墨索里尼在米兰度过了解放前的最后几天。4月25日，通过光兰大主教舒斯泰尔红衣主教的斡旋，他会见了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可是当他获悉德国人正在和盟国以及游击队进行谈判时，他突然中止了会谈。当天夜里，他由情妇克拉丽姐·佩坦绮陪伴着，朝科摩湖方向逃去。游击队几天以后捉住了他们两人，4月29日把他们枪毙后，把尸体和若干法西斯领导人的尸体

一起运回了米兰，倒悬在洛霄托广场上。

/PGN0535.TXT/PGN>

第四章意大利的抵抗运动

伊丽莎白·威斯克曼

第一节意大利人的心理状态，1940年6月至1943年9月

我们有各种理由可以假定，意大利人在1940年6月是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参与墨索里尼的军事冒险的。在法西斯领导人中，有两三个人，象法里纳契和阿尔菲耶里，是真正亲德的。其余的人则因为从背后暗算法国而328感到有点局促不安，而一些技术专家却知道意大利无法取胜，除非这场战争在一星期左右就结束。墨索里尼一旦宣战，就失去了他在慕尼黑外表上挽救和平所获得的声誉。实际上，自从德奥合并以后，他对希特勒的卑躬屈节，包括他企图迫害犹太人的尝试，不仅在反法西斯圈子里受到谴责，而且在很多法西斯分子（包括齐亚诺在情绪不佳时）中也受到了谴责。这时，尽管墨索里尼发出好战的叫嚣，可是，他本人和他的运动都已日益臃肿和乏力了。意大利国内仅有的一点热烈的情绪都在希望他们垮台，而不是希望为他们的胜利作战。接着是在巴尔干国家、北非和俄国的战役。意大利士兵一般不得不在装备不足的情况下作战。有时候他们打得相当好，可是除了黑衫党的部队，他们都没有任何真正的热情。其中有很多人觉得他们没有呆在乌克兰、希腊或者南斯拉夫的权利。在克罗地亚——特别是在达尔马提亚——和门的内哥罗，1942年的意大利第二军团听任南斯拉夫游击队在山区内活动，而不同他们对抗。相反地，意大利人以武器供给米哈伊洛维奇的切尼克人，以便让他们代替意大利人去同铁托的游击队作战，这不久就几乎成了正常的事情。

在国内，定量配给和空袭都不是愉快的事情，而且这两者还暴露出了这个政权的无能和腐败。从1942年初开始，也就是早在1942—1943年那个决定性的冬季以前，在一般公众对战争消极地感到遗憾的同时，一些活跃的反对团体已在开始组织起来。通常总有这两类人，工人阶级和其他人士。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一直在都灵和米兰存在下来。意大利的一再失败和俄国人的抵抗使它们得以发展成长，从前的社会党的关系又被接上了，特别是在米兰和热那亚。共产主义抵抗中心如同它在意大利共产党创建人葛兰西的时代一样，仍然是在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公司里。有重大意义的是，都灵法西斯工会的书记在1942年9月间召开了一次工厂职，如果一个人是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话，他就没有权利软弱或感情用事，他就没有权利不把国家的敌人当成敌人看待。”非工人阶级的反对派是强烈地亲英的，并受到英国广播公司有效的扶植。在若干大主教教士中，不少人怀有和平主义的情绪，但是对真正的反政府活动最具有热329情的，也许是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这种热情虽然模糊，却“左倾”得厉害，并且往往被人误称为“共产党”也心甘情愿。这种热情由于1941—1942年冬季苏联对德国日益成功的抵抗而得到了鼓舞，也由于意大利社会上的落后和不公正的情况而受到了鞭策。最典型的表现也许可以在佛罗伦萨看到，在那里卡洛·罗塞利的思想又复活了，人们传播他原来那句口号“正义与自由”。但是，在所有大城市里都有类似的团体，特别是在都灵，因为法西斯政权下的另一个受害者戈贝蒂在那里留下了同样的遗教。1942年中，这类团体中有许多都建立了联系，合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它重新使用了马志尼的“行动党”的名称，并于1943年1月出版了地下报纸《自由意大利》的第一期。这时，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秘密报刊，开始发挥一些影响，而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则联合起来反对法见威斯克曼：《罗马—柏林轴心》，第288页。当时社会党的朋友们从意大利偷

偷地送给住在瑞士的西洛内大量情报，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行动党早期通过意大利商业银行的一个董事拉法尔·马蒂奥利获得了宝贵的则政援助。

西斯主义。

从 1940 年 6 月到墨索里尼垮台这一段时期，反法西斯史中应该记载的最重大的事件是，1943 年春天发生了许多罢工运动。共产党于 2 月 20 日发出指示，3 月 5 日都灵市菲亚特公司的米拉菲奥里大工厂便开始举行示威游行。工人要求当局遵守以前作出的对于因轰炸而无家可归的工人给予赔偿的保证。地方当局显然不敢显得很严厉。一星期后，米拉菲奥里厂的工人在某些理事的鼓励下开始罢工，并散发传单要求面包、和平与自由。3 月 13 日，当局对所有“遵守纪律”的工人一律发给三百里拉。此后都灵的罢工运动暂趋平息，于是一些为首的人就遭到逮捕和绞死。3 月 19 日，罢工开始从米兰的卡普罗尼工厂蔓延到布雷达和皮雷利各厂，当局又作了一些让步。4 月间墨索里尼和巴斯蒂亚尼尼去萨尔斯堡时，巴斯蒂亚尼尼对里宾特洛甫说到都灵和米兰的工潮，作为意大利不能继续作战的理由之一。这是轴心国的欧洲第一次出现一场矛头直指它的统治者的强大的工人示威运动。

从 1943 年 5 月 7 日突尼斯陷落到 7 月 25 日墨索里尼垮台，意大利人心理状态的历史是同意大利的政治历史分不开的。下述事例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特征：6 月 2 日国王在罗马接见了当时被公认为反对派领袖的前社会 330 党人博诺米，而不久以后，帕多瓦大学的拉丁文教授共产党人马凯西又访问了斐拉拉的驻军司令卡多纳将军。接下来就是意大利宣布停战之前的不寻常的四十五天，凡是促使一个已是士气沮丧的国家益发沮丧的种种事情都在这四十五天中发生了。意大利人以为墨索里尼被免职，是为了便于与盟国讲和，但是他们却遭到从未经历过的盟军最猛烈的空袭，同时德国军队不断地涌进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国家显然将成为一个主要战场了。他们以为墨索里尼是为一个民主政权让路的，却发现民主主义者都被国王和巴多里奥撇在一旁，报纸还是同以前一样受到严密的检查。最后，停战协定已经签订这一事实于 9 月 8 日下午 8 时宣布了（但协定的条件并未宣布）。第二天早晨，王室便向南逃往已被盟军占领的地区内的布林的西，王室自从 1940 年以来也日益不得人心，只不过不象墨索里尼那样一落千丈而已。

起初，混乱的情况十分可怕，在罗马尤其如此。各种各样反法西斯人士全部希望，德国人在罗马会遭到抵抗，一些政治团体的确向负责将领卡博尼提供了相当多的志愿兵。卡博尼本人后来说他是极想合作的，可是人们一般部指责他妨碍了合作。有些意大利兵士，特别是卡多纳将军指挥的阿里埃特师，同 9 月 9 日向首都进攻的德军发生了激战。次日，该师的残余战士和几个平民团体在圣保罗门和卡斯蒂诺金字塔附近拦住了入侵者，可是军队的领导人和军官们大多是失败主义者。他们通过老迈的卡维利亚元帅商定了条件比较有利的投降，但是后来德国人却对这些条件置之不理。有九个月，罗马成了意大利德国占领区的一部分。这时几乎肯定代表大多数公民的反法西斯委员会，同在别处一样，成为一个地下的民族解放委员会。那年秋季，透过德国占领区的警戒线泄漏出来的唯一真正的好消息，乃是《四日刊》（9 月 27—30 日）所发表的消息，说那不勒斯人在盟军迫近时奋起抗敌，把德国人赶了出去。这一次，如同后来类似的各次 331 一样，意大利人总是声称是他们的起义把希特勒的军队赶走的，而盟军则反驳说，完全是由于盟军的进攻才使德军削弱到溃败的地步。

第二节意大利的抵抗运动，1943年

9月至1945年4月战后，人们才发现，意大利对希特勒的抵抗就某些方面说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运动中最为出色的。德国人因为先前盟友的背弃而十分愤怒，盟国则对他们先前的敌人又有所怀疑，两方都指责意大利人慌乱和懦弱。事实上，意大利人这时正处在最佳的时期，他们那种无政府主义的独创精神是搞地下政治抵抗运动和游击战的极好的武器。在1943年9月中旬的失望以后，一股向往正义与自由的热情高涨了起来，并带来一种使人想起加里博迪时代的、高昂的精神。这种高昂的精神激发出惊人的勇气，这在许多饱经盖世太保各种折磨的受害者当中尤其是如此。历史上的复兴运动几乎没有影响到工人阶级，可是那个有时被称为第二次复兴运动的抵抗运动，却是以北方的产业工人为基础的，它越来越多地获得了农民，特别是威尼西亚农民的支持。人们还注意到，妇女第一次变得热心于政治。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全国真是团结一致了。要叙述一个各地如此不同的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的区域性传统对抵抗运动大有帮助，德国人和他们的新法西斯盟友都被这种遍地皆是的起义活动弄得多成员参加了新的志愿军，因而游击队能够夺取到大量贮存的武器。早在1943年9月12日，有十几个人聚集在库内奥，建立起库内奥游击队的第一个阿尔卑斯师。他们的领袖是加利姆贝尔蒂，一个年轻的律师和行动党党员。7月26日他在都灵和库内奥对群众讲话时，表示了强烈的决心，说全体人民必须同希特勒作战，以荡涤自己身上的法西斯污点。游击队集结在瑞士的边缘地带。莱科附近的阿尔卑斯山区居民拒绝交出武器，他们是332十二个小伙子结成的一个团体，在奥塔湖上参加了菲利波·贝尔特拉米的队伍，后来变得远近驰名。共产党领导人莫斯卡泰利不久成了塞西亚地区的统治者，他在那里的权力地位直到战争结束几乎都没有中断过。游击队集结在利古里亚的亚平宁山中某些阵地上，逃出来的英国军官特别在这里（不过也在其他地方）成了很好的指挥九头蛇：希腊神话，斩去一头立即生出二头的怪蛇。——译者见卡多纳：《起义》，第99页。伊丽莎白·威斯克曼：《意大利》（Elizabeth Wiskemann：Ital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110页。又艾戈·马尔凯维奇：《意大利产物》（Igor Markevitch：Made in Italy），伦敦，哈维尔出版社，1949年版，第171页：“我经常听到这句话：‘就我们来说，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报仇雪耻’。”

卡多纳：《起义》，第99页和第160页。

官。威尼西亚的局势一直很紧张：这里是对德国交通十分重要的交叉路口，但也是铁托和意大利游击队之间的通道（在南斯拉夫的意大利兵士，有些人在意大利停战后参加了铁托的部队，他们之间当时的确有一种真正的兄弟情谊）。总之，威尼西亚在传统上是激烈反德的。

米兰成了上意大利的政治大本营，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通常总在那里开会。象在罗马以及后来在成立有民族解放委员会基层组织的所有较小的地方那样，意大利北部民族解放委员会至少包括五个政党的代表，其中共产党和行动党几乎总是最强有力的。米兰委员会尤其是这样，这两个党在那里的领导人分别为路易吉·隆哥和费鲁乔·帕里。其他三个党是自由党、社会党，以及那个起初行动消极、态度不明的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一直有分裂和犹豫不决的迹象，而天民党则在布里西亚力量最大。附带提一下，各支游击队伍往往是相当含糊地凭政治色彩来区别他们自己，最普通的总是共产党

的加里博迪支队或是行动党的“正义与自由”支队，甚至没有真正群众基础的自由党，也提供了佛朗奇支队和后来的复兴运动支队。

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要政治任务是为游击队筹措金钱和给养，破坏工业生产，以及发行秘密报刊。起初，皮埃蒙特第四军的遗产，就是金钱和武器两者的主要来源，瑞士的朋友也提供了一些金钱。有些工业家也以食品和鞋袜来帮助游击队。米兰和其他地方的法尔克大钢铁厂是由德国人供给原料并严加控制的，该厂的恩里科·法尔克同工人一起密谋，把生产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他一些厂主也有这样做的。米兰和都灵所有较大的工厂的工人，都善于利用某种好象有理的经济借口展开短期的 333 静坐罢工。鉴于德国最高统帅部越来越依靠意大利北部的工业生产，这种破坏活动就很重要了。1943 年 12 月和 1944 年 3 月在米兰以及 1944 年 6 月在都灵，也发生历时较长的罢工，当时菲亚特厂的工人就这样成功地使当局未能把菲亚特工厂迁往德国。罢工当然是严格禁止的，罢工者总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可是意大利北部这些工人如此团结一致，以致德国军事当局不敢采取行动，唯恐达不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总把尽可能多的劳工送往德国，因为在那里比较容易施行高压手段。

为了表达抵抗运动的愿望，意大利人很快就办起了丰富多采的地下刊物，某些杰出的作家和记者全向这些刊物投稿。印刷机和工作人员常常真的被发现了，或者差点被发现，可是迅速便安排好转移。在这方面，象抵抗运动的所有其他工作那样，一个人遭到逮捕，立刻就有另一个人顶替。所有的政党这时都尽可能按期发行它们的报纸，某些游击中心也出版自己的报纸。地下刊物还传播德国人和新法西斯分子想要查禁的消息。在北部，恩佐·博埃里就是收集和散发消息的人士之一。1943 年 11 月初，在那不勒斯成立了一个团体叫做“意大利抵抗组织”，后来发展成一个重要的情报机构，在意大利南部的盟国军队和北部的抵抗运动之间逐步设法建立越来越多的联络线，这方面的中心人物就是雷蒙多·克拉韦里。

1944 年 5 月间，墨索里尼的新法西斯政权向游击队提出“最后建议”，要他们投降以求得宽恕。它还威胁说，此后凡发现携带武器者将立即予以枪毙。这项“建议”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这时候大势已定，不过在盟军于 1944 年 6 月 4 日进入罗马时，中部和北部的战斗几乎还没有连接起来。在外面世界上，这件事因盟军攻入法国而立即无声无息了，可是在意大利，把德军赶出罗马的心理影响却是深远的。凯塞林在 6 月 17 日的一项命令中强调 334 指出，“意大利战区，特别是意大利中部，”情况日益恶化，德占区和意大利解放区之间的鸿沟已不再是象深渊那样张着大口了。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觉得，新成立的博诺米政府比巴多里奥政府更可以信任。米兰的领袖们要求应该派卡多纳将军来协调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军事工作。这位将军在 1943 年 12 月和 1944 年 1 月间已经秘密访问过米兰的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8 月间，他又被空投到他们那里去，接过了协调战斗的游击队这项极其复杂的任务，这些游击队从这时起已改称“自由义勇军”。盟军已经大规模地向他们提供武器——帕里后来写道：“武器象下雨般地从天而降”——而从新法西斯队伍中开小差过来的人以及各处的一些成功的小规模战斗，亦复不少，足以促成显著的变化。有趣的是，帕多瓦大学已经成为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威尼斯的活动中心，该校提供了它的化学研究所所制造的炸药。

随着盟军从罗马向北推进，佛罗伦萨的气氛也变得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抵抗运动的各团体都是很坚强的，其中主要的又是行动党和共产党。德

国党卫队和他们的法西斯政权走狗，再加上从罗马被赶出来的同伙，越来越残酷地追捕爱国人士。7月30日，德国人下令居民从安诺河沿河一带的房屋撤出。8月3—4日夜里，他们炸毁了河上的桥梁。可是，游击队已经从郊外开始渗入市区，在盟军逼近时，激烈的巷战开始了。一星期后，8月11日，佛罗伦萨解放了。然而，此后不久，盟国军队却在斯培西亚—里米尼或称哥特防线前面人困马乏地被挡住了好几个月。

那年秋初，在皮埃蒙特西北部瑞士边境上的奥索拉地区，游击队演出了一出英雄诗剧。这个地区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部分因为米兰的全部水力都是从这里发源的，所以这里是控制米兰工业生产的要地。游击队在周围的山区里实力强大。1944年9月初，有几支队伍，包括335莫斯卡泰利率领的“加里博迪”支队和迪·迪奥率领的天主教民主党的托斯地区支队，冲下山来一举攻进了多莫多索拉，赶走了德国人和新法两斯政权分子，在奥索拉盆地建立了一个小型共和国达六周之久。虽然盟军一度曾考虑采取这种军事行动，但是这时他们和卡多纳却不赞成这样子了。这是浪漫色彩的意大利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采取这种做法的那些人是要效法1849年马志尼的榜样，建立一个哪怕是暂时的象征性政权，以表现他们自己的民族愿望而不受盟国政策的约束。奥索拉那些爱国者非常缺乏武器，如果他们得不到增援，敌人肯定又会回来把他们赶走。事实上，敌人在10月的下半个月就是这样做了。

实际的情况是，尽管盟军对武器的供应在夏初很慷慨，但从8月初起，英国空军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对华沙的爱国者供应武器上，于是奥索拉的战斗就为此付出了代价。11月13日，亚历山大将军的一项命令，使意大利游击队更为沉痛地感到失望，他提出游击队应该分散回家，等到明年春天再活动，因为这时无法有效地使用游击队。卡多纳的态度一直非常客观，他后来指出，虽然冬季自然而然地促使那些可以回家的人都遵照亚历山大的指示行事，但是一些左派政党的愤慨却是很强烈的，也是有理由的。不仅共产党人，全体游击队也都觉得盟军司令部不信任他们，这一点倒不是完全不真实的。卡多纳同意隆哥的看法，认为军事领导人的态度必须始终是积极的，NO549.TXT/PGN>绝对不能这样消极。

由于来自瑞士的财政接济中断，游击队的经费问题在1944年夏初变得严重起来。一开始，阿尔弗雷多·皮佐尼就被推选为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因为他没有任何党派关系。6月间，他终于安排好由两家大银行——意大利商业银行和意大利信托银行——贷款给米兰的一些爱国企业，例如法尔克、爱迪生和皮雷利，再由这些企业把钱转给皮佐尼。可是需要的东西一直在增加。8月间，法国解放以后，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比较容易展开活动了。11月14日，帕里、皮佐尼和其他两个代表到达巴里郊外的莫诺波利与盟军当局进行磋商后，继续前往罗马，拜会意大利临时政府的成员。这样，在人心非常沮丧的时刻，仍然能够作出几项重要的决定。盟军336当局答应向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提供经费，这显然是宁愿借此进行控制，而不愿把控制权交给博诺米和他的同僚。同时，在1944年12月7日，梅特兰·威尔逊将军承认了财政援助的必然结果，即承认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意大利北部负责对敌斗争事宜的权力机构，也是在盟军部队到达前负责一切行政工作的权力机构。

博诺米内阁批准了承认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意大利能够“自由决定其自身命运”（1944年12月20日）以前为临时政府。

在 1944—1945 年那个漫长的冬季中，意大利军事行动一直停滞不前，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4 月 10 日，盟国军队终于开始行动了。后来，在 4 月 19 日，波伦亚的人民奋起反抗德军，发生了残酷的巷战。4 月 21 日，盟军占领了这个要害据点。在此期间，著名的游击队英雄博尔德里尼和他的部下已经解放了弗利和腊万纳。从这时起，纳粹—法西斯方面就不过是个总崩溃的问题了，因为德国人和新法西斯政权分干都竭尽所能地在互相拆台。至于墨索里尼 4 月 25 日逃跑未遂及其后果，上文已经叙述过了。

与此同时，意大利北部正处于骚动中。游击队已经制定计划，准备接管各大城市并防止德国人破坏交通（象在佛罗伦萨发生过的那样）和工厂。1945 年 3 月间，米兰的罢工增多了。4 月初，游击队控制了米兰—都灵公路（主要的汽车路）。4 月 10 日，共产党发出最后的指示——第十六号——号召准备“群众起义”。4 月 23 日，热那亚的民族解放委员会部队起来攻击德国人，后者被迫于 4 月 25 日投降。也在 4 月 23 日，米兰的铁路工人实行罢工。4 月 24 日凌晨，共产党、行动党和社会党（在米兰，社会党是很强大的）的一个“起义委员会”发出命令，在大街一些厂里全发生了战斗。4 月 25—26 日夜，游击队占领了无线电台。隆哥向卡多纳汇报了情况。4 月 27 日清晨，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接管了权力。在都灵，工人于 4 月 25 日开始占领工厂，他们同德国人展开了激烈战斗，德国人大 337 都夺路逃出市区。民族解放委员会于 4 月 28 日接管了该市。这样，在盟国军队到达以前，意大利北部的重要城市基本上已经全部落入爱国者手里——有时候，例如在都灵，伤亡惨重。接着，盟国当局就着手匆匆接管一切权力，其急促情况往往暴露出来，很不策略。事实上，他们对游击队的不信任，给意大利解放的气氛投下了阴影。除了全面不信任的气氛外，意大利人还同法国人为了向来讲法语的奥斯塔地区发生了一场冲突。从 1943 年底开始，那里对纳粹和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一直是由埃米尔·夏努领导的，他在 1944 年 5 月间被新法西斯分子折磨死了。那年冬季，主张脱离意大利并入法国的宣传，开始从奥斯塔地区的一些教士中散布出来。1945 年 4 月 28 日，当地的游击队赶走了敌军，可是次日晚间，法国的巡逻队越过了边境。这时，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奥斯塔卡多纳：《起义》，第 254 页和第 257 页。墨索里尼当天在科摩湖上被游击队捉住了。

盟军当局要求皮埃蒙特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再等十天，可是该会的一名代表却成功地摆脱了这项要求。

当然，早在大军开进去以前，就有一些孤立的特种部队的军官已在现场。

人全部情绪激昂，其中奥斯塔人最希望的也许是自治。5 月 5 日，盟国军政府和美国军队接管了奥斯塔地区。

最后，必须记载一下的是，除了在与盟军正式作战中阵亡的意大利士兵外，抵抗运动付出的代价至少是：有两万人被击毙（或者被折磨死），有四万人受伤和失踪。往往还出现整个村庄被毁灭的情况，这是从 1943 年 9 月 18 日皮埃蒙特的博维斯村开始的。同时，还有被押送出境和受党卫队严刑拷打的事件。有许多资料记载了德军当局把死尸吊在沿街的所有树上，以宣扬他们的恐怖统治。也许，最声名狼藉的大规模屠杀，是 1944 年 3 月发生在罗马的阿德亚廷河畔的——当时从被捕的人中随便挑出了三百三十个人加以杀害，因为有人在拉塞拉路扔了一枚炸弹，炸死了三十二名德国士兵。在全国的牺牲中，也许代价最大的是丧失了一些能干的——确实是才气横溢的——

年轻领袖，象加利姆贝尔蒂、贝尔特拉米、莱奥波多·加斯帕罗托、库列尔以及无数其他人士，在以后的岁月中，人们将为这些人才的损失而深感惋惜。

第四编 法国

第一章 338 维希法国

艾尔弗雷德·科班

第一节 1940—1941 年的维希政权

(一) 维希政权的成立

1940年5月和6月间法军溃败以后，法国于6月22日同德国缔结了停战协定，又于24日同意大利缔结了停战协定。法国处于混乱状态中，法国人民，用莱翁·勃鲁姆的话来说，“在这个打击下惊慌失措，呆若木鸡……丧魂落魄，寸步难行：事实上，他们在麻木和绝望中在地上躺倒了”。法国国内显然已不可能进一步抵抗下去了。全国各地都承认了6月16日贝当元帅组成的政府的权力；作为一个沉痛的但又无可避免的事实，停战协定也被接受了。N0557.TXT/PGN>另一方面，在法国的海外领土中，最初的反应是拒不承认战败。摩洛哥的诺盖将军、近东驻至总司令米特尔奥塞将军、叙利亚高级专员皮奥、吉布提的勒让蒂约姆、印度支那的贾德鲁将军和德古海军上将等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要继续战斗的决心。“法国出了什么事情”，《印度支那电讯报》问道，“使得贝当元帅主持的政府，在我们已经庄严地保证决不缔结这种性质的和约的时候，竟要求单独媾和？”“我们乐于接受这项和约吗？根本谈不上。今天，帝国可以拯救法国。”不过，这是一种非官方的反应；而各级官员却具有等级从属观念和服从事实上的政府的传统，他们经过短时期的犹豫不决后，所有主要的殖民地都同贝当站在一起了。同样，对于法国部队的军官来说，拒不接受停战协定似乎是违背了效忠祖国的誓言。因此，虽有些微不足道的反对，波尔多政府还是能够使整个法兰西帝国随同法国本上一起退出了战争。少 339 数个顽抗的人，如贾德鲁和勒让蒂约姆，都被撤了职，他们后来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法国政府作了必要的人事更动，在一批明确表示接受政府权力的总督统治下，可以深信殖民地的忠诚是可靠的。这些总督是：摩洛哥的诺盖将军、近乐的米特尔奥塞将军、叙利亚的富热尔将军、吉布提的热尔曼将军、突尼斯的埃斯特瓦海军上将、阿尔及利亚的阿布里亚尔海军上将、西非和赤道非洲的/PGN0558.TXT/PGN>布瓦松、马达加斯加的凯拉、印度支那的德古海军上将，以及法属西印度的罗贝尔海军上将。

戴高乐在英国举起了继续抵抗的大旗，他本来可以依靠英国的军事援助在某些法国殖民地取得立足点。但是，英国政府亟盼不使他们同维希的关系恶化到开战的地步，并且在一项政策声明中明确地表示，英国只愿意用海军部队支持法国殖民地内持不同政见的运动。9月底，英国和自由法国联合对达喀尔发动的进攻被击退了。自由法国运动仅仅在非洲、大洋洲和印度争取到一些较小的殖民地，这些收获，同接受贝当权力的广大的法国本上和海外领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法国非占领区，新政府没有遇到抵抗就接过了控制权。6月28日，新政府迁到克勒蒙菲朗，然而，这个城市缺乏供政府各部使用的适当房屋，它们只得分散在附近的一些矿泉疗养地上。二十四小时的经验就足以说明这种局面是无法容忍的。另一个可能的去处是里昂，但是，政府不愿设在一个容易受到大量城市人口压力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的人又都是忠于赫里欧的。维希拥有大量的旅馆房屋，可以安置政府的各个部门，所以是解决这个最大的实际困难的地方。7月1日，贝当和他的部长们迁到了这个城市。维希作为他们首都的时间，比他们原先预料的要长久得多，而维希的象征意义，也

远远超出他们原先希望的或是担心的。自从6月16日成立以后，这个政府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变动。赖伐尔最初拒绝就职，因为没有让他担任他想担任的外交部长一职，可是他不久就后悔自己不该一时赌气，于是参加政府当了内阁会议副主席和国务部长。波尔多市长，赖伐尔的党羽马尔凯，同时成为内政部长。³⁴⁰ 谁都知道贝当厌恶议会政治的支持者，所以新政府中虽然还容纳了几个这种人士，但也包括许多第三共和国的敌人。对当时政权的敌视往往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有人竟然对法国的沦陷表示欢迎，因为它意味着民主共和国的结束，尽管并没有很多人象《瓦砾》一书的作者走得那么远。这位作者公然高兴他说，战败比胜利更为有利，因为战败就摧毁了一个“不光彩的议会制度”。一个法国军官的日记中表达了一种较为温和的反应：

当然，至少就目前而言，官兵们心里全都想到在法国建立独裁政治。我简直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不曾对议会政治表示厌恶的士兵，他们都坚持认为众议员和他们的政策是唯一应对这场大灾难负责的。

这种心情无疑是普遍存在的；它也说明了何以不搞政变，却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尊重宪法，就可能使第三共和国结束。议会1940年的常会于7月6日正式闭幕，第二天，两院在维希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提出了一项修改宪法的建议。7月9日，参议院的二百三十名议员中有二百二十九票（拉斐特的后裔七十五岁的德尚布伦侯爵是唯一的反对者），众议院的三百九十八名议员中有三百九十五票表决赞成修改宪法。为了试图避免立即取消第三共和国，一群参议员，其中包括保罗·邦库尔，提出了那项托林修改法案，这项法案提出：在缔结和约以前，暂时中止实行1875年的宪法，授与贝当全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国家的秩序和生活，委托他在一个委员会的协助下起草一部新宪法，以便提交国民表决。这里还应该提一提一个奇怪的插曲：弗朗丹企图说服国民议会议长勒伯伦在议会召开前辞职。据弗朗丹说，他这样做是企图保全第三共和国。人们自然很想知道：个人野心和想要抢在赖伐尔前面的念头会不会同这种花招多少有点关系。无论如何，这一企图毫无结果，因为贝当正要依靠赖伐尔来争取众议院同意废除现行的宪法，赖伐尔的政治活动力，当时简直是无穷无尽的。勒伯伦评论赖伐尔说：“他真会笼络人！”莱翁·勃鲁姆则说：“这件事是他一手搞起来的。”赖伐尔的影响，从他在波尔多所采取的、阻止政府迁往北非的强有力的步骤中已经显露出来了。贝当尽管个人对赖伐尔相当反感，却始终不曾完全忘记是赖伐尔出了最大的力为他取得他的地位的。他说：“赖伐尔可是个不平凡的人物。”

参众两院，或者至少是当时在维希的两院议员，于7月10日上午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听取政府的意见。赖伐尔作为一项建议的发言人，提出授予贝当全权起草一部新宪法。他以贝当的名义提出保证说，两院将继续存在，因此议员们将继续支取薪金，直到新的议会建立起来为止，这样他就在反对托林修改法案，为他的建议赢得支持的努力中取得了相当成功。他还坚持主张新宪法应交由国民批准，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对这种批准规定一个期限，也没有规定国民批准的形式，这部宪法一经颁布将立即生效。在接着进行的辩论中，贝热里提出一份由一百名左右的议员签署的声明，宣称法国所能走的唯一道路是同其他拉丁国家，甚至同德国合作，建立起一种在性质上既是民族的又是社会的大陆新秩序。弗朗丹这时用一篇生动有力的演说，支持赖伐尔的制宪建议。当天下午，根据1875年的修改宪法条款，两院作为国民议会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在可能有的八百五十票中（1939年被排

除出去的七十二名共产党人不算在内），有五百六十九票赞成贝当的建议，八十票反对。

（二）维希的政治体制

贝当立即行使他新获得的制宪权力。他的首席顾问是阿利贝尔，一个观点流于极端、性格容易激动的法兰西 342 行动党的律师。7 月 11 日颁布的第一项制宪法令明显地避而不用共和国这个词，只宣布贝当就任了法国国家元首的职位。他以这一身分下令废除 1875 年 2 月 25 日那项制宪法令的第二条，即著名的瓦隆修正案，这一条为总统的选举作出了规定，因此实际上奠定了共和政体。也许这项法令的最意味深长的特征就在于它开头的一句话上——“我们，菲利普·贝当”——通过这句话，贝当权力的个人性质一清二楚地表明了出来。根据 7 月 11 日同时颁布的第二项制宪法令，贝当使自己在新议会组成之前拥有立法权力、拥有任命其他未作规定的一切军政职位的大权，以及国家元首的全部恰如其分的权力：实际上，他是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两个职位的。这样，行政权便取得了全面的自主，它颁发的命令就是法律。根据第三项制宪法令，原来的参众两院一律休会，听候进一步的通知。法国在两天之内已经从议会制变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总统制的政体，这是多少不免令人回想起 1850 年和 1852 年间路易·拿破仑所实现的一种变化，当时，担心社会秩序崩溃的恐惧心理使法国投入了一个较早的社会救星的怀抱里。

新政府的新起点就是赋予贝当以个人权力；它的全部力量在于对这位元帅普遍怀有忠诚感。按照这个政权的逻辑，可望出现的唯一有效的立宪方面的发展，就是通过实行效忠宣誓这类措施来加强个人因素。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政府，便自然而然产生了由谁继承贝当的问题。根据 1940 年 7 月 12 日颁布的第 4 号制宪法令，赖伐尔是应被提名的第一个继承人；这是一项极其不得人心的决定。赖伐尔在 12 月 13 日倒台，自然使他被排除于继承人名单之外了。1941 年 2 月 10 日达尔朗被指定为新的“皇太子”，这标志着他的地位上升。赖伐尔的姓 343 名直到 1942 年 11 月才再度出现。

从 1940 年 9 月到 1941 年 7 月，在国家元首贝当下面有两个会议，一个是部长会议，由他本人主持，一个是内阁会议，由内阁会议副主席主持，负责处理一大部分实际工作。1940 年 9 月 6 日和 1941 年 2 月 23 日颁布的两项命令，设置了十五个国务秘书，1941 年 6 月 9 日又增加了两个，直属于内阁会议副主席本人。某些国务秘书担任部长的职务，地位高于其他一些秘书。参众两院仍继续存在，但是，它们只能由国家元首召集，而元首却无意召集它们。1941 年 1 月弗朗丹当权时，曾负责设法产生一个国民会议以代替参众两院，国民会议成员由国家元首提名，而且只能在他的动议下发挥咨询作用。

《时报》当时很恰当地用了一个十八世纪的木语，称这个会议为“名士会议”。在它最初的一百八十五名成员中，大约有九十名是议会政治的支持者，这个事实使贝当大为恼火，因此，他拒不发给这些人任何薪金，甚至不给他们以举行开幕会议的权利。这个国民会议始终没有开过一次全体大会，只是通过国家元首任命和召集的几个委员会发挥作用。1941 年 6 月，成立了一个宪法委员会，由约瑟夫·巴泰勒米担任主席。在第一次会议上，贝当宣读了一遍讲话，宣称将以一个独裁主义的等级制的国家来代替早已信誉扫地的、经过选举的、代议制的、多数主义的政体，但是，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始终没有产生任何具体的成果。

立宪计划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在维希这段插曲中，实际政治自始至终就是官僚政治。主要部长之一布蒂耶说：“我们把全部信心都放在行政工作上。”在部长会议之下，最重要的机构是国务会议，它的立法部门在 1934 年曾被撤销，这时又恢复了。贝当所挑选的部长，大多数不是政治家，而是行政人员，其中许多是来自“财务督察”这个有势力的紧密团结的团体。他们不得不应付巨大的困难，两个区的存在，以及维希和巴黎之间行政 344 工作的区分就很不简单，虽然 1941 年间大多数部门都已经逐渐迁回了巴黎。贝当的第一个办公厅主任迪穆兰·德拉巴尔代特曾经著文高度赞扬在维希政府中当权的高级官员们的勇气和专业能力，他说，“人们永远说不清他们在何种程度上拯救了法国。”这个评语很可能说出了不少实情，虽然现在还不大能够获得材料来作出公平的判断。然而，他也曾指出，这些人的行政才干，由于他们特别缺乏政治头脑而被抵消了，这一点的确也说得很有道理。为了给日益扩大的官僚政治提供它所需要的新人员，在较低一级上起用了迪穆兰所描绘的“临时拼凑的、高谈阔论、飞扬跋扈的骨干：打手、法国人民党或蒙面党的失意分子、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以及‘从城堡里逃出来的人’拼凑起来的一个奇怪的混合体”。而这群人的中心人物，/PGN0567.TXT/PGN>用美国大使的话来说，是“一个被一群谋求私利的阴谋家团团围住的虚弱无力、惊慌失措的老人”。

维希始终没有达到政治上的团结一致。魏刚认为它根本不配称为一个实体。他说：“维希政府并不存在”；维希政府一直都是由一些分裂的和对抗的集团组成的。它的历史不是由贝当或是由其他什么人执政的历史，而是相互冲突的派别之间的阴谋与斗争的历史。这些人在法国残存的土地上争夺权力，却四面八方受到正在打仗的世界局势和德国人的命令的约束和限制。维希政府的历史给人的印象，是十八世纪法国宫廷的一个东歪西倒的复制品，而贝当就是年迈的、清教徒般的路易十五，他以一种超乎个人好恶的独特作风任免他的朝臣，听任一个集团抵消另一个集团，对任何人都不完全信任，或者，如果说他信任任何人的话，那就只有他的私人侍从医师梅内特勒博士了。甚至在外交事务上，情况也是如此，1940 年秋，当外交部企图同英国进行谈判，而赖伐尔却企图同德国达成一项交易时，贝当就有他自己那可怜而又无益的“国王的”小秘密。这一切构成了这个临时凑合的政治实际，而所谓民族革命的那种理想主义则为它提供了一个堂皇而孤立的外表。

（三）法国的经济困难 345

如同已经提到的那样，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维希政府不得不面对惊人的经济困难，只是靠了政府的出色努力才在一个陷于混乱的国家中恢复了秩序。到了 1940 年 7 月底，把难民遣返到他们在占领区内的家乡的工作开始了。解除武装（在这个过程中，法国军事当局尽力把德国人不知道的秘密军备仓库保存下来）和复员工作也必须着手进行。到 11 月，失业数字达到了一百万人。他们采取了各种办法来对付这个问题——解雇妇女劳动力和外国人，禁止任何接受政府合同开工的商业或工业部门雇用农业工人，尤其重要的是，还制定了强制性的缩短工时的规定。然而，失业不过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更为持久的困难则是劳动力的缺乏，因为开始时在德国的战俘将近有二百万人，而迟至 1941 年 12 月仍有一百二三十万人在囚禁中。

除了战争和战败所带来的无法避免的困难之外，还有法国的征服者的系统的经济剥削所引起的困难。为了战略上的缘故，占领区内的公路和铁路运

输迅速修复了。

由法国当局负责付款。兑换率固定为一德国马克兑换二十法郎，而不是按战前的一对十一，或是按物价水平所表明的约为一对十四的比率，这就鼓励了占领军大规模购买东西送回德国去。法国同意支付占领军的费用。尽管法国对此一再提出抗议，这笔费用据估计每天为四亿法郎，这个巨大数目实际上等于战前法国预算的一倍。事实是，德国人向法国索取的不仅是一支正常占领军的费用，而是为作战目的集结在法国的全部庞大部队的费用。

除了德国的勒索，停战以后在法国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事实是，国家被划分为占领区和非占领区。分 346 界线从瑞士边界靠近日内瓦的地方开始，向西北延展到多尔，再往西到图尔东面的一个地点，然后在圣一让一皮厄一德一波特附近朝南转向比利牛斯山。在占领区内，北部和东部的工业区被置于一种特别统治之下，9 月初，海峡沿岸三十公里内的平民都被撤离。被占领的法国划分为五个区，各区之间的往来受到严格的管理。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之间的往来也有严密的限制办法。甚至邮递都受 P·迪特尔伦和 C·里斯特：《法国的货币问题》（P.DieterlenandC.Rist：TheMonetaryProblemofFrance），纽约，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48 年版，第 4 页。

法国人和德国人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详情，见皮埃尔·阿尔努：《1940—1944 年法国的财政和德国的占领》（PierreArnoult：lesFinancesde laFranceetL'occupationallemande1940—1944），巴黎，大学出版社，1951 年版，第 11—28 页。

到严厉的限制。1940 年 10 月以前，两区之间是禁止通信的，在这以后才准许通信，但仅限于使用上面印好字句的明信片。法国当局虽然继续在占领区内行使职能，但只是在德国军事司令官及其下级军官的管制下行使的。

非占领区同法国其余地方的不相往来，意味着它同法国比较富庶的一半地区隔绝了，失去了百分之六十六的耕地，百分之六十五的产业工人，百分之七十四的小麦产量，百分之七十的牛奶，等等。此外，1939—1940 年冬季的严寒对农作物十分不利，而 1940 年夏季的战事又妨碍了收割。

英国于 1940 年 6 月 25 日已把封锁扩大到法国，这就切断了法国大西洋沿岸和海峡沿岸各港口的交通往来。在地中海，倒不是战舰使封锁生效。英国人对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船只本来是可以控制的。但为了不使他们同维希的关系更加恶化，在 1940 年就没有试图加以限制。然而，通过地中海港口进入法国的供应物资中，有一大部分落入德国人的手中了。博杜安在 8 月 22 日的一次广播中抗议说，英国的封锁正在使法国人活活饿死，同时宣布了德国的一项提议，从海外获准运入的粮食都将留供平民之用。事有凑巧，第二天，德国人竟要求非占领区立即交出五十万头牛，一百五十万只猪，以及其他供应物资，而被要求交出这些东西的地区，甚至在平时粮食也不能自给，何况现在又是难民充斥的时候。1940—1941 年冬季，巴黎情况异常严重，整列车整列车的粮食和燃煤从非占领区送往巴黎，因此非占领区的情况就更形恶化了。³⁴⁷ 粮食供应是维希最紧迫的问题。由于大批战俘被拘留在国外，农业劳动力非常缺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41 年春颁布命令，准许强制征召劳动力去种地，同时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励适合农业生产的家庭返回田间，还在农场里为城市失业者安排了工作。在德国人的鼓励下，“回到田间去”成了维希宣传的题目之一，因为当时德国人还没有感到需要法国的工业产

品，他们抱有一种想法，要把法国变成一个卫星般的农民社会。法国各个方面对这种想法很不欢迎。增加农业生产的计划显然并不成功。组织一种总体制度的企图在农业方面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里推行得都更远。它遭到农民的冷待和敌视，只得让农民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农业总体协会。根据 1941 年 8 月 18 日的一项命令，协会的一切活动都由国家进行控制，这个团体于是变成了不过是中央政府用来执行农业部长 /PGN0572.TXT/PGN>作出的一切决定的一个机构。维希政府不断发出怨言，说农民自私自利，说这种情况使城市注定要闹饥荒，同时又呼吁农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工业也发生了严重的困难。由于封锁，法国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进口纺织原料，百分之六十的纸浆供应，以及全部进口的燃煤，进口煤在 1938 年消费的六千八百万吨中占两千三百万吨。这种损失以及随后使用浪费的、效率很差的代用品，其结果之一是，整个工业生产下降，以 1938 年的生产率为一百，1941 年下降到七十一，1942 年下降到五十七。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采用从公安委员会时期以后未曾使用过的经济控制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不采取严厉的措施，法国工业能否避免彻底崩溃是很值得怀疑的。尽管遭到相当大的反对，还是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委员会制度，负责采购、分派和配给原料。这种制度发挥作用时所表 348 现出来的弱点，从贝当 1941 年 8 月 12 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全暴露出来了。他解释把供应部长阿夏尔解职的原因，同时谴责国家各分配中心，他说这些中心损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让一些大商业代理人对供应品进行了垄断性的控制。

尽管法国的经济情况日趋严重，却没有发生灾难佐的大崩溃，这应归功于组成法国真正政府的那些官僚政治的技术专家。财政部的工作尤为出色，它创建了一种近乎封闭的货币流通顺序。据估计，其有效系数 1940 年为百分之七十六，1941 年为百分之八十，1942 年为百分之六十七。当时占领费用和其他由于停战协定而出现的开支占去了法国预算的一半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什么健全的财政。1940 年，支出超过三千六百五十亿法郎，而收入则为八百二十亿，下一年的相应数字为三千零二十亿和九百一十亿。因此，1940 年的收入只占支出的四分之一，而 1941 年则占三分之一还不到。

接着便实行了冻结工资的政策，不过，采取了加班费、对低工资工人的补助和增加家庭津贴这种种形式的例外办法，减轻了这项政策的影响。德国人禁止全面增加工资，因为工资低他们就可以用较高的工资把工人吸引到托特协会和德国去。早在 1940 年 10 月便制定的控制物价条例，有助于稳定生活费用，它只是缓慢地上升。以 1938 年的数字为一百，1940 年 12 月的零售价格指数为一百三十六，1941 年 12 月的指数为一百六十。同时工资指数从 1939 年 10 月的一百零三上升到 1941 年 10 月的一百二十一。不过，这些数字并没有非常公正地表示实际情况，因为农产品价格比较难于控制，它比工业品价格上升得快，因此，城市人口的生活比农业人口的生活要差得多。在一个严重匮乏的时期，实行这种控制工资和物价的政策，势必要实行一种全面的配给制度，1940 年 9 月开始配给粮食，随后便扩大到石油、肥皂和其他许多商品。在这种艰难形势下，人们甚至还能对法国的未来满怀雄心壮志，这一点从当时制定的灌溉、排干沼泽和电气化的计划上便显示出来了，有些计划甚至已 349 经付诸实施。然而，在 1941 年中，经济情况却渐趋恶化，维希政府只能采取一些治标的办法，不过，在他们到了山穷水尽之前，还得经历很长的一段路程。

（四）贝当和民族革命

经济政策大多是维希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的。它的政治，就它所有的那点政治而言，则是它自己的，因为维希与其说是一种政体，倒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状态，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聚集在一起的许多常常互不相容的思想状态。第三共和国的各党各派都被淹没在维希的洪流中，它们的组织被取缔了，这样，新政权的政治便无可避免地是以贝当和他的亲信的那个寒酸的小朝廷为中心，采取了派系斗争和钩心斗角的形式，这些人混乱地挤在一个十九世纪温泉疗养地的那些旅馆的经过半改装的沙龙、卧室和赌场里。起初，许许多多时髦的追随者和善于钻营的政客也聚集在那里。维希仿佛是一个极盛时期的多维尔，吵吵嚷嚷，十分热闹，[《瓦砾》的作者写道]从火车站到阿利埃河，一路上尽是艳丽的女人衣服，巧妙地做得象游泳衣的女便服和式样非常考究的男上衣，这里有好莱坞，有朱安莱潘，有香榭丽舍大街，有整个奥特伊尔，整个帕西区，还有伯痕斯坦和让·科克多所有出色的“新剧本上演”，有高等服装店，有银行，有法兰西喜剧院，有电影院，也还有马德兰大街上最漂亮的妓女，她们背后紧紧跟着路易十五那样的人物。

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时髦社会对维希感到厌倦，尤其是到了冬天，他们都回到有钱的地方去，回到巴黎德国人的身边去了，《瓦砾》的作者就是头一批走掉的人士之一。

这些人的离去，使维希更同现实政治隔绝了，但是，在追求自身的理想方面却更加自由。维希的人们怀着一种几乎是受虐狂的快感在思量法国犯下的罪恶和随后所带来的惩罚。就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职业军官和高级官员们而言，失败虽然是丢丑的和有害的，却也带来了新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这件珍宝。在苦难中复兴，这是贝当1940年6月25日在广播演说中所弹的基调，而且成为维希心理状态中一种主要的因素。夏尔-鲁写道：“我们的一小撮同胞陷于们心自问和忏悔罪恶的狂热之中。”如果我们低估了维希的理想主义和贝当身边那一小群人想要进行一场伟大的道德改革的愿望，那将是错误的。当然，他们的理想是参照法兰西行动党和法西斯与半法西斯集团多年来进行的反对第三共和国的运动而设想的。1940年6月28日，魏刚提出了一份备忘录，曾为贝当、博杜安等人阅读过，他号召结束共济会式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主义350的折衷妥协的旧秩序，结束阶级战争、蛊惑人心的拍卖选票，以及贪图安逸享乐，他号召人们回到敬重上帝、祖国署名的文章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富强的国家，家庭，青年，等级制度，总体主义——并攻击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贝当和他的支持者们反对过去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阶级冲突，呼吁发扬服从守法的精神，发扬社会等级制度、管制的经济和总体专业组织的精神；反对议会政治，呼吁发扬领袖原则。法兰西行动党学说的一个颇为含混的翻版，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鼓吹之后，似乎终于在它的追随者称之为“民族革命”的运动中盛行起来了。法兰西行动党是仇英的，主张迫害犹太人的，反对民主制度的，然而，不幸的是，在德国人看来，它也是反对德国和敌视极权主义的。法兰西行动党的同情分子在维希上台执政的这种环境下，迟早将使他们面临这一抉择：或是采取亲德的和极权主义的政策，或是下台让位；然而他们开头并未意识到这种两难的局面。于是，那些极右党人在战败后趾高气扬，着手搞起他们梦想已久的民族革命来。他们手头最大的资产就是贝当的名声。这位元帅的人格对于战败的法国人民所具有的那种异常的吸引力，是无法简单，合理地加以解释的。事

实也不容否认。他于 1940—1941 年秋冬两季巡视法国非占领区时，在大城镇和小居民点，乃至最小的村庄，都受到热烈而亲切的博杜安：《在政府任职九个月》，第 224—225 页。魏刚：《回忆录》，第 3 卷，第 298—299 页；塞尔：《事变》，第 6 卷，第 1923 页，均转载这份备忘录。

欢迎，就一再证明了上述事实。当然，所有惯用的手段也都被采用来助长对元帅的崇拜。他的大大小的照片随处都可以看到：人们组织义卖他的照片来筹集救国基金。全国各地，一队队青年男女高唱着民族革命的《马赛曲》——“元帅，我们来啦！”人们以这种种方法来利用贝当的声望，然而，他的声望却不是他们树立起来的。《时报》（1940 年 12 月 3 日）写道：这个国家是把他作为救星来欢迎的，它接着说明了其中的一个原因。“今天谁都不会否认，6 月间发生的灾难本来很可能会带来另一场更大的灾难：我们逃脱了社会动乱……我们避免了残酷的革命和亵渎神明的骚动这种疯狂行为。”正是多少由于这个原因，虽然贝当不是一个正式的天主教徒，教会却为他渲染上了一种宗教气氛。里昂的大主教、红衣主教热利埃宣称：“贝当就是法国，法国就是贝当”，他称贝当为蒙难 351 的法国的化身。红衣主教絮阿尔和红衣主教博德里拉在巴黎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法国新教教会的会长伯格纳牧师代表法国新教徒宣称，当前只有一个义务，就是跟着元帅走。

贝当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使得一个垮掉和战败的民族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呢？颂扬他和攻击他的文章都很多，但却无助于固答这一问题。如果我们试图按照他的实际为人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无 N0579.TXT/PGN>法找到令人满意的解答。贝当，这位凡尔登的英雄，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他具有仁慈及无私的爱国者的名声。法西斯和半法西斯的政党在三十年代的动乱时期曾经希望利用他，右翼的宣传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相当成功地为他树立了一个潜在领袖的名声，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做什么工作来助长这种名声。在一个对老人政治具有传统癖好的国家里，他是一个老人。他立身处世正直谦逊，庄严冷静，是一个宿命论者，有着一一种几乎是帝王般的不动感情的本领，可以保持淡薄疏远而又不显得冷漠无情。然而，确实没有什么个人的品质可以说明 1940 年围绕着他的那种崇拜。事情的真相是，一般法国人在彻底失败的时刻需要有一个可以相信、可以依靠的人物，而希望把战败作为资本，促进自己的主张或个人野心的人物与集团也需要有一个傀儡。贝当满足了这两种需要。如果他不是法国人民所认为的那种救星，他也不完全是那些政客所希望的已经找到的一个仅仅是傀儡的人物。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谁又能讲得出来呢？“我不了解元帅”，勃鲁姆在他受审时说。“他具有一种我看不透的神秘性。”他生来是守口如瓶的——夏尔—鲁说：“他一贯显得很神秘，生性又讳莫如深。”魏刚在议会战争委员会中作证时，说他“极为神秘”。GN0580.TXT/PGN>

这种守口如瓶的脾气使他不断地把他同一个部长推行的政策对另一个部长隐瞒起来，这在他的敌人看来可能象是两面派手法，而他的仰慕者则称之为机敏的左右逢源。这是对看来主要不过是守口如瓶的脾气的过大的曲解。经常和贝当见面的美国大使海军上将李海认为，他所真正关心的是法国人民的福利和怎样保护他们。不过这种关注却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形式。在他的思想中，受难和牺牲这种精神美德的概念是非常强烈的。贝当在他的第一次广播中说：“为了减轻法国的灾难，362 我把我的生命献给祖国。”这话

是够诚恳的，不过它已经显示出在他性格中占了相当成分的、由民众的逢迎养成的那种虚荣心：这种虚荣心之所以显得更为强烈，也许是因为它并不是以任何普通的外露的形式显示出来的。贝当的另一个弱点，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更为危险的一个弱点，就是他的思想不过是任何一个具有他那种教养和地位的普通人的思想，他的智力有限，不能牢牢地把握住基本原则，虽然他也墨守一小套固定的想法。此外，他的政策和讲话则是他适逢其会地受到其影响的那个集团或个人的政策和讲话。我们尤其不应该忘记贝当的年纪。尽管他异常健康，但是即便他心力有余，他也没有体力来有效地控制他的内阁。他所主持的那些会议都大得使他无法掌握，因而他的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一个出席议会战争委员会作证的人说，只要过了二十分钟，你就总能“骗过”贝当。他的办公厅主任写道，他把时间浪费在细节上，而主要的条款则是在极端混乱中“强加”给他的。

贝当可以为迷失方向的法国人民提供一种团结的错觉。但是，他不能使维希的政策统一起来。的确，维希那帮人部分就因为无法商定一项政策，才通过一个大家都同意的人来谋求一种代替办法。在他的名义下，至少拆除第三共和国残骸的工作可以继续下去。第一步就是废除议会制政府。接着便是对地方政府开刀。根据一系列法律。有两千居民以上的行政区内的选举全部取消。主要由佩鲁通和布蒂那负责的这些措施，固然满足了大官们的官僚主义气概，但是，却使维希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更其孤立。工会很早也遭到大刀阔斧的砍削。法国总工会试图以放弃阶级斗争的原则来保全自己。它的书记莱昂·儒奥宣布辞职，副书记勒内·贝兰参加了维希政府。尽管如此，法国总工会还是同天主教工会联合会、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以及各雇主公会一起被解散了。接着企图在工业和各行业中创立总体制度的尝试应该被判定为一场失败，就同1940年12月想在总体的基础上把农业组织起来的卡齐奥法令一样。总体自治同需要由政府日益严格地控制工业，两者之间无法调和，于是各个总体如果说也然而，当时倒是有要进行社会改革的一种真诚愿望，即使它是在一种家长式专制主义精神的鼓舞之下的话。它表现在1941年10月的劳动宪章和一系列社会立法中。实行了许诺已久的养老金。青年问题和家庭问题是这场民族革命主要关注的问题。政府为培养青年履行公民义务，发展体育事业，取缔酒精中毒，限制离婚，以及鼓励多子女的家庭，通过各种法律。

1940年底，著名的天主教徒谢瓦利埃当上教育部长后，重新把宗教引进学校的企图达到了高潮。他在1940年12月7日宣称：“不要上帝的学校今后不会再有了。”反对世俗教育的最重要的步骤是，1940年9月废除了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1940年9月3日废除了1904年的禁止教士教学的法律，并在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法令后，于1942年4月8日立法规定恢复主教会议的法人地位与合法权利。但是，反教权主义的情绪在法国仍然一触即发，在维希的支持者中也有些重要的反教权主义分子。1941年初，谢瓦利埃被比较温和的卡科皮诺所取代，后者不顾教会的抗议，撤销了谢瓦利埃政策中受到较为强烈的批评的突出部分。

由于维希在政策方面并不是清一色地支持教权主义的，所以天主教教会也并不是一致支持维希，更不是一致支持维希的这类立法大多只适用于非占领区，但即使在那里，也不是全都适用的。

主张同它合作的。巴黎天主教学院的八十一岁的院长红衣主教博德里拉

是公开提倡合作的唯一的教会知名领袖。圣母升天会主编的那份销路最广的天主教报纸《十字架报》，只谈论宗教问题，尽量避免涉及政治。占领区的各主教在 1941 年 2 月致教皇的信件中宣称：“我们的意图是坚决保持宗教的立场，避免采取任何政治的或党派行动”，但是，面对着一套极权主义的纲领，证明这种政治上中立的政策是很难维持的。德国人不相信教会，这从占领初期他们搜查和没收主教办事处和宗教团体的文件便表明出来了。在东部，几乎不可能期望地方教士们不同情从洛林被赶出来的居民。坎佩尔的主教对纳粹策划的布 354 列塔尼分离运动发出了抗议。德国人企图镇压“天主教行动党”，各组织活动的尝试，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不论法兰西行动党作为一个政治运动从天主教徒那里得到什么样的支持，教会本身对于种族憎恨的教导却不能鼓掌叫好，尽管在 1942 年夏季以前，除了一些个人提出的抗议之外，教会在反犹太问题上始终没有表明立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上，多明我会神甫在《青年评论》上，都发表了具有相当独立见解的文章，天主教民主党人在对德国权力的让步中没有受到损害，又没有同维希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势力不断地增长。1941 年 7 月，《今日报》把他们描绘为民族革命的最机警、最狡猾的敌人。到了 1942 年 4 月，合作分子的出版物竟然宣称，法国的青年已被拱手让给了“法德之间的任何协定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天主教民主党人。然而，这种发展只是缓慢而来的，在 1940 年，教会还是贝当政权的支住之一，大多数天主教徒都盼望新法国会体现他们的社会与政治理想。

在研究“民族革命”的历史时，它的建设性成就同表达它的理想的那种夸张的、但不一定不诚恳的语言比较起来，再同维希政府一心从事的破坏工作比较起来，就一定会显得是微乎其微的。除了变更机构之外，它同样急于要改变主持这些机构的人。所有的革命都要搞清洗，民族革命首先是清洗官员，特别是针对三种人——非法国血统的人，共济会员和犹太人。反共济会的运动由历史学家贝尔纳·费伊接过去作为一种个人拿手的本领去办理。他在《公报》中以整栏整栏的篇幅刊载出被指控为共济会要员的名单，他的活动在下级行政人员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法兰西行动党的宣传长期培植的反犹太主义是第三共和国时期右翼政党手中的陈腐的课题之一。在巴黎，法兰西人民党组织的反犹太示威几乎在停战协定刚签订后立即就搞起来了。合作分子的报刊从一开始就大喊大叫反对犹太人，同时德国人也采取了日益严厉的措施。在法国非占领区，推动反犹太的力量，实际上同“民族革命”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都是自上而下的，人民只是被动地接受而已。第一个不祥之兆是，190 年 8 月 27 日废除了 1939 年 4 月颁布的那项禁止种族诽谤的法令。10 月间，制定了一项说明种族概念的法律，不许犹太人担任一切官职、教学工作、由政府津贴的工业部门的工作，以及出版物、电台和电影院的管理工作，并定出从事自由职业的犹太人的百分比。这是一长串反犹太法律的第一项。同时，废除了授予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法国公民权的克雷米厄法令。然而，这时主管大员还不是真正刻毒的反犹分子，这项立法还准许有许多可以豁免的情况，被解除公职的犹太人仍旧有权领取年金，暂时还发给他们补助。除《法兰西行动报》外，维希报刊对这个问题一般都是避而不谈的。1941 年 3 月 29 日，维希的主要反犹分子之一，格扎维埃·瓦拉，受命掌管一个新成立的犹太人事务委员会。6 月间，更加严格的限制条例取代了 10 月的那些法律，

把犹太人从许多职业中排除出去，其中包括银行、证券经纪、广告、新闻，以及已经列举过的各种管理职位。在诸如法律、建筑、医药等行业中，犹太人的限额规定为百分之二，在高等学校中规定为百分之三。最为不祥的是，6月间，地方当局还颁布了勒令所有犹太人进行登记的法令。虽然有了这些措施，非占领区的反犹活动仍然远远 941 年春曾大肆逮捕所谓共产党人。尽管这样镇压，秘密出版的《人道报》仍有很大的销路。1940—1941 年的冬季，经济情况、低工资、粮食匮乏、失业，都有利于地下共产党宣传的传播。到了 1941 年 5 月，据报道大约有三万名共产党员遭到监禁，占领区一万八千名，非占领区一万二千名。不过，这个数字并不全然可靠，这从下述事实便可获得证明：这些被捕的人中，有些被控“传播了戴高乐派的宣传”，这是当时任何一个遵照党的路线办事的共产党员决不会想到去干的事情。维希最恨的还是戴高乐将军及其支持者，也许部分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继续对纳粹作战就是对维希的一种含蓄的谴责。戴高乐派不仅被视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且被视为叛国分子。凡是离开法国或法国属地以“逃避民族责任”者——换句话说，就是逃避接受停战协定者——或者凡是从事反对民族复兴的宣传工作者——换句话说，就是反对维希的政策者，都被宣告褫夺法国国籍，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接下去的一长串定罪的宣判包括戴高乐，德拉米纳、勒让蒂约姆和贾德鲁这些军事领导人。凡是在外国军队中服役的人都被宣布为应受死刑的处罚。实际上，这种宣判只是对那些不在国内、无法将判决予以执行的人。虽然如此，毫无疑问，贝当和他的许多关于后来的反犹措施，见下文，原著第 420—421 页。

支持者的确对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感到深恶痛绝。在贝当看来，戴高乐这个一度是他本人幕僚的人——“我怀里悟活的这条毒蛇”——竟敢出来表示异议，这不仅有伤他的尊严，而且是忘恩负义。另一方面，在一般公众中往往认为，政府反戴高乐派的行动只是欺骗德国人和掩饰维希和自由法国领袖之间的秘密谅解的一种诡计。

最后，维希的愤怒特别集中在一个小集团身上。在停战协定刚签订后，最最强烈的一种情绪就是，要为战败找出几只替罪羊来。约瑟夫·巴泰勒米写道，团结并不意味着忘却和宽赦。迪穆兰·德拉巴尔代特说，对停战协定的最初反应是：“我们被出卖了……必须惩办卖国贼！”于是，1940 年 7 月 30 日的第 5 号制宪法令规定在里翁设立一个最高法庭，对一些前部长和高级官员在 1939 年 9 月从和平走向战争时期的行为，以及后来使局势恶化的行为进行审讯。这样，维希实际上是在倡议以发动战争的罪名审判它自己的公民了。作为一种预备性措施，许多被告，其中包括达拉第、勃鲁姆、樊尚·奥里奥尔、朱尔·莫克、格伦巴赫、波马雷、马克斯·多尔穆瓦、居伊·拉尚布尔、雷诺、芒代尔和甘未林将军，都受到行政拘留。然而，对他们进行审讯所出现的困难比维希起先所认识到的要大得多。贝当任命的一个特别法庭以七票对四票宣布雷诺和芒代尔有罪，贝当判决将他们拘留在一处严加防范的地方。对其他被告的审讯经过一再推迟之后，才干 1942 年 2 月在里翁开庭。

维希甚至不能对那些被它认为是敌人的人进行有效 351 的报复。不过，我们的确只有把问题简化，才能说维希是一个政治实体，或者说它不是一个利害关系互相发生冲突的集合体。它以它的弱点、浮夸的辞藻和平庸的政绩、经常见风转舵的做法、为官职而进行疯狂的争夺，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的人事更换，延续并扩大了第三共和国的一切错误。直到 1941 年底，民族革命的成

就是微不足道的，要有的话，也许就在纸上。与此同时，贝当朝廷里的陆海军将领和高级官员们懂得很少的外交和内政问题则正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逼来，要求给予愈来愈多的注意。

第二节处于德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维希，1940—1941年

（一）同英国和美国的关系

在维希盛行的种种幻想中，最大的一种是，认为法国将会安安静静、不受干扰地独自推行它在国内的各项新政策，而让世界其余国家继续去打仗。他们希望变成和平绿洲的这块地方，结果只是战场上的一片无人地带。逃避到中立状态中去，结果也证明是不可能的。一个象赖伐尔那样的现实主义者看出了这一点，因此，他公开表示希望德国战胜英国。对于合作分子来说，反对法国战败的政权和反对英国人本来就是一回事。英国胜利〔菲利普·昂里奥写道〕将使共济会各分会得救，犹太人重新掌权，“民主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人士”恢复原来的地位，而“马西利阿”号这艘被人误解了的“十字军”的旗舰就会提升到“胜利”号的级别。

有着一种反英倾向的上层社会是准备对这类宣传作出赞同的反应的。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向来就不大敌视英国，甚至1940年夏季的事态发展也没有完全改变他们的情绪。维希电台在赖伐尔的控制下发出的猛烈反英宣传完全做过了头，反而助长了亲英情绪，尤其是在德占区。莫拉斯这个年纪虽老却激烈如故的法兰西行动党学说的提倡人，曾经愤怒地抗议过英国的无线电广播，这就显示出这种广播所造成的影响。他说：“我们中了英国电台的毒”，“英国电台经由我们的南部，拚命地在广播。”同时昂里奥早在1940年8月就已经指责说，“现在在城乡各地开始悄悄流传着的宣传，追根究底都是从伦敦来的。”在维希，象赖伐尔那样的人一心盼望英国迅速战败，想使法国立即加入德国阵营，并且设想法国的未来将成为德国珍爱的一个行政区。另一些人，包括法兰西行动博社安：《在政府任职九个月》，第288页，第301页，第322页（1940年8月11日、19日和29日）。

《法兰西行动报》，1940年11月4日。

《格兰瓜尔》，1940年8月29日。

见《科德尔·赫尔回忆录》（The Melnoirsof Cordell Hull），纽约，麦克米伦，1948年版，第1卷，第799页。它提到1940年7月1日美国驻法大使呈结赫尔的一份报告。

党的大多数拥护者，则相信有可能保持真正的中立。这两派人的冲突是很激烈的。到了8月底，当赖伐尔在部长会议上重新提出他的对英宣战的主意时，反英情绪达到了高潮。9月1日，递送给海军参谋长奥方海军上将的一份证询意见书，暂时结束了这场骚动。他的回答表明，法国根本没有海军、陆军和空军力量可以进攻英国。此外，人民群众的情绪也开始变得更加明朗了。当亨茨格在1940年9月12日离开他在停战委员会中的职务时，他警告他的德国同事说，德军和法国居民的关系正日趋恶化，即使人民这时还不亲英，总之，他们正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敌视德国占领的迹象。

与此同时，在维希政权成立的头几个月里，赖伐尔显然正福星高照。在赖伐尔和他的副手蒙蒂尼的主持下，维希的宣传，尤其是通过无线电广播，是猛烈地反英同时又极力亲德的。在9月6日的政府改组中，赖伐尔除了保留他的副总理职位外，又得到了情报部长这个关键性职位。另一方面，赖伐尔的亲密盟友，机会主义分子新社会党人马尔凯却被贝当免了职。他是首先

号召同德国人合作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人士之一，但是，贝当不相信他是一个政治家，因此委派佩鲁通接替他为内政部长。魏刚和赖代尔之间的对立政府在政府中引起了猛烈的争吵，终于使前者被免去了国防部长一职，虽然还是另委他为驻 359 北非总代表这一重要职务，因为他势力太大，不能贸然把他闲置一旁。

英国政府对维希的各个派系几乎是不加区别的。他们同情戴高乐为争取把法兰西帝国团结到自由法国事业中来所作的种种努力，但是，他们不希望把维希的任何统治者激怒到要打仗的地步。1940 年 9 月 18 日递交给贾德鲁的一份备忘录就证明了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那份备忘录指出，英国政府不愿同维希完全破裂，因为这可能会促使维希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因此，英国的政策是对继续效忠贝当的法国殖民地施加经济压力，凡是站到自由法国一边的法国殖民地，英国就答应协助进行防卫，但也只限于对付海军的进攻。1940 年 7 月 3 日在米尔斯克比尔（奥兰的军港）对法国舰队的攻击，以及随后的断绝外交关系，加强了停战协定签订后法国爆发的反英情绪。尽管如此，伦敦和维希之间并没有完全切断一切联系。在英国同意下，派了一个驻在法国政府的加拿大代表，还通过法英两国驻马德里大使德拉博默先生和塞缪尔·霍尔爵士（后为但普尔伍德勋爵）建立了接触。夏尔-鲁说，到 10 月底，伦敦和维希的外交部之间已就一项协定的基础达成了协议。

与此同时，贝当通过一位法国教授路易·鲁吉埃的协助，开始了另一项谈判。贝当以特有的保密能力把这件事完全瞒住了他的外交部。鲁吉埃于 9 月 29 日会见了贝当，获得他的同意，打算到伦敦去力求达成一项放松封锁的协议。他在伦敦见到了英国首相和政府其他成员。有人建议他应努力同魏刚展开谈判。他后来 360 声称他同英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丘吉尔当然不反对进行谈判这个主意，他在 11 月 10 日预先通知戴高乐，英国政府想努力同维希达成一项暂时解决办法。1940 年 11 月 21 日，英国政府把答复鲁吉埃的建议的内容电告他们驻日内瓦的领事。这份答复承认英国政府已接到维希政府提出的不会毫无理由进攻英国的保证，并意识到维希有继续控制法国殖民地和舰队的决心。英国政府只要求维希应避免对自由法国的殖民地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并顶住德国人攻击或利用维希控制下的殖民地的企图。英国断然声明它希望看到法国及法兰西帝国在胜利以后恢复其崇高和独立的地位。英国准备在这个基础上通过马德里的渠道开始讨论经济问题。鲁吉埃显然以为英国政府打算走得比这更远。但是，鉴于英国人对戴高乐所承担的义务和他们对维希这帮人的深刻怀疑，他们只打算采取非常缓慢而谨慎的行动。鲁吉埃的谈判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秘密，没有让赖伐尔知道。等到赖代尔在 10 月底代替博杜安当了外交部长后，这件事就被搁下来了。为了同样的原因，在马德里进行的较为正式的谈判也毫无结果。夏尔-鲁本人于 10 月间贝当和希特勒在蒙都瓦会晤之后，也辞去了外交部秘书长的职务。

12 月间赖伐尔倒台之后，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这一次是在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朋友教育部秘书长雅克·谢瓦利埃和加拿大驻维希的公使皮埃尔·迪皮伊之间进行的。谢瓦利埃和协助他进行谈判的格扎维埃·德·波旁亲王象鲁吉埃一样，也宣称伦敦和维希之间已经达成一项协议，但是，除了交换意见之外，仍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有过什么协议。

英国政府也曾设法想同魏刚打交道，但是，他没肯作出答复。他认为英国人无力对法属北非提供有效的军事援助，因此把劝他脱离维希一事看作是

引诱他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赌博。他尤其反对这些提议，因为英国人支持戴高乐，而他认为戴高乐比一个投机政客好不了多少，³⁶¹ 他认为戴高乐是利用了那些感到需要继续抵抗德军的法国人的爱国心和勇敢精神，而把自己树立成为法国合法政府的竞争对手。

在新的一年里，这一系列试探性的接触仍在继续进行下去。弗朗丹在受审时声称，他在 1941 年 1 月便经由马德里同英国人开始了谈判。早在 1941 年格鲁萨尔上校便由维希派往英国。美国也在维希和英国之间起了联络渠道的作用，英同人通过美国向维希政府表示，如果它愿意迁往北非重新参战，英国将给予军事援助。那种认为有此可能的想法无疑是一种幻想，不过，这并不是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的幻想。尽管上述种种谈判最终全部失败，它们至少使伦敦和维希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

美国在同法国人的关系中怀有比较适中的目标，因而达到目标的机会也较多。科德尔·赫尔把他的政策限于某些特定的目标——注意不使法国舰队和法国在非洲与西半球的基地落入德国人的手中，阻止法国政府超出停战协定条款的规定去进一步同德国合作，并防止英法关系发生任何进一步的恶化。美国政府在停战协定签订时已经对法国舰队前途表明了它的看法。1940 年 10 月 25 日，关于在蒙都瓦会谈已作了种种决定的传闻使罗斯福向贝当提出了措词强硬的抗议，并警告说，同德国达成报道中所说的那样一项协议“将构成对美国公然和蓄意的背信弃义”。

美国要实现它的目标，就必须同维希政府保持友好的关系，而这是同承认自由法国运动不能相容的。再者，美国的自由法国同情者和宣传家们使美国政府受到极大的压力，他们还猛烈攻击美国的政策，这种情况增强了罗斯福和赫尔对戴高乐存在的偏见以及他们尽量不同他的运动打交道的决心。从法国发回的较有影响的美国报告，把戴高乐在国内的追随者估计得很低。这些报告的产生，无疑是由于美国外交官同法国官场和上流社会的接触本来就比他们同广大人民的接触更为密切。不过，即使它所根据的是一种错误的前提，它所作出的结论认为维希是代表法国本上和北非唯一有效的法国权力，却是正确的。

1940 年 12 月，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参赞罗伯特·墨菲奉命去法属北非。1941 年 1 月，罗斯福总统特别挑选的新大使李海海军上将到达维希。李海的使命是，同贝当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努力使贝当不要积极支持德国人，特别是要强调指出，同意让德国人使用法国舰队或海军基地将会失去美国的友谊。与此同时，墨菲则在北非试探是否能同魏刚达成协议。李海和墨菲两人主要是以经济上的论证为依据的。李海不顾英国的强烈反对，力促对法国非占领区运送粮食和衣着，这样德国人就不能利用人民的困苦作为压迫贝当与之合作的一种手段了。在红十字会的主持下，好多批装运药品和儿童食品的船只驶往法国。至于规模足以扣“破封锁的、对欧洲运送供应物品的更为广泛的胡佛计划，则未能实现，这部分是因为 N0598.TXT/PGN>在关键的时刻，德国人于 1941 年 3 月 26 日很笨拙地宣布，他们已作好安排，要用大量谷物交换非占领区的牲畜和油类。美国同维希接触的副产品之一是：1941 年法国第二局通过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提供的情报。这件事是瞒着法国大使亨利一埃那干的，因为美国人不信任他，赫尔也不喜欢这个人。

美国在北非的谈判代表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成果。1941 年 2 月 7 日，英国原则上同意了一项计划，允许数量有限的供应品通过封锁线运往北非。在这

项谅解的基础上，墨菲于2月26日同魏刚商定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将向北非运送供应品，条件是贮存品不能积聚过多，不许把它们运出境外。为了防止发生违反这些条件的情况，将由美国任命领事人员监督协议的执行。这些人员中，有穿便衣伪装成“技术助理”的军官，他们将在适当时机为盟军1942年11月的登陆准备好场地。

1941年11月，魏刚被免职后，李海开始对维希感到363绝望，但是，墨菲却力主美国不应改变政策。所付的代价的确是便宜的：到1941年11月魏刚被免职时，美国派往北非的只有三艘油船和四艘货船。要不是因为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事件，对维希的失望本来可能会使美国政府同戴高乐建立友好关系。1941年12月24日，一小队自由法国海军在海军上将米塞利埃的统率下没有预先警告便突然占领了那两个小岛。美国国务卿在这个消息传来后，立即就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这一行动是任意破坏一项谅解。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通知美国政府，说占领这两个岛屿的消息对英国政府全属意外，并且违背了戴高乐作过的一项保证，但是，丘吉尔却不可能在美国国务卿的盛怒之下就抛弃自由法国，何况国务卿本人因为讲了句“所谓自由法国”正在美国受到猛烈的攻击。12月30日英国首相在渥太华发表的一篇演说中，为戴高乐进行辩解，并大肆攻击维希。这使赫尔大为恼火，他向总统递呈了一份备忘录，声称他相信英国人是圣皮埃尔岛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并为他的法国政策进行辩护，说法国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反对戴高乐，最后他要求美国坚决保持自己的观点。他甚至为这个问题打算辞职不干。盟国之间的关系一时大为紧张，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为美英双方政府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虽然戴高乐始终没有同意这个办法。他们使这两个岛中立化和非军事化，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控制其无线电台，并同英国一起对两岛实行共管。由一个协商委员会取代维希政府派驻的总督，自由法国的军队也撤出。整个事件是一场无碍大局的小波澜，但是，它却在英美之间引起了一次公开的冲突，并且由于证实了美国官场对戴高乐抱着敌对态度，随后的情势发展将产生一种与其本身的重要性并不相称的影响。

与此同时，1941年12月11日，达尔朗和贝当提出364保证说，法属北非的政策决不会改变。如果说是美国的政策促使维希没有站在德国一边参战，那也无疑是说得太过分了。不过美国的友谊使得维希没有感到它全然孤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抵销了德国压力的影响，这倒确是实情。

（二）1941年2月以前同德国人的关系

贝当政府同英美的关系主要是遥遥地施展策略，并对一些试探性的接触和间接施加的压力作出反应。另一方面，它同德国人的关系则有一系列必须当机立断的问题，内部的压力也较大。在维希的支持者中，没有一部分人考虑到有否可能同英国重新结盟。另一方面，以赖代尔为首的势力强大的一派则希望同德国人保持更密切的关系。赖伐尔是个没有原则的人，偏见和个人利益的盘算两者结合起来决定了他的行动。他憎恨英国，并坚信德国人的胜利过去和现在都是无可避免的，他本人的立场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在审讯贝当的法庭上问道：“你们认为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除了期望德国胜利之外，还会想到别的什么吗？”他的结论是，法国的利益就是要寻找某种能同德国人达成协议的基础，使法国可以逃脱，至少可以减轻战败所带来的种种后果。

在威斯巴登的停战委员会上已经出现了同德国人进行有限合作的想法。

关于法国的首席代表亨茨格将军，他的一位同僚圣-阿杜安说，他在委员会的工作“并不出色”，莱昂·诺埃尔则说得更肯定，他说亨茨格的工作显示出“令人无法相信的弱点”。亨茨格对德国人保证说，法国准备进行同它的尊严相称的合作。法国财政部长布蒂那也作出明确的保证，说法国人具有“合作的愿望”。有人提出，法国代表因为自己软弱无力而感到非常苦恼，以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仿佛原则上不可能拒绝德国人提出的要求似的，特别是维希政府，他们使德国人感到意外，竟然会不经讨论便接受了德国人原先提出来供讨价还价的那份庞大的占领费用的预算。这件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不真实的。就德国人而论，他们的确并不象法国人所想象的那样信心十足。他们最担心的一点是，生怕法属北非投到英国人那边去。因此，他们亟想不把法国人惹到反抗的地步。驻法国的德军司令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在7月15日的一封信中要求法国人在北非给予广泛的军事特权。这是法国人无法做出的一个牺牲。他们拒绝了这一要求，使他们惊讶的是，德国人就此没有再提起这事了。希特勒于1940年11月12日给他的总司令的一份指示中宣称，要求法国所尽的责任是，保卫其非洲属地，不落入英国和戴高乐的手中。因此，德国政府准备鼓励法国保卫它的殖民地，并且准许它保留这样做的手段，而不顾意大利人提出解除法属北非武装的要求。

然而，同德国人合作的实际进展只是由于赖伐尔一再努力才出现的。他从一开始就领到一张个人通行证，可以自由往来于维希和巴黎之间。早在7月20日，他通过德·布里农的协助，就已经同德国宣传家阿贝茨建立了联系，他们三人于是形成了一种三方联盟来促进他们的观点，同时也促进他们的发迹。阿贝茨同赖伐尔的关系大概帮助他谋得驻法大使的任命，虽然他同德国军事当局的关系很差。莱昂·诺埃尔被任命为法国政府派驻巴黎德国军事当局的总代表以后，断然说德·布里农和阿贝茨两人在赖伐尔的默许之下破坏了他想要取得德方让步的种种努力。而且，由于一切重要问题都是由停战委员会处理的，诺埃尔便辞职不干了。8月15日，德拉洛朗西将军接替了他。

赖伐尔那套可以称之为完全改变联盟的计划在10月24日那次著名的会晤中达到了顶点，当时希特勒和贝当在里宾特洛甫和赖伐尔的陪同下，在卢瓦尔河畔蒙都366瓦的一节火车车厢里举行了会谈。他们起草了一份议定书，表达了希特勒要法国在欧洲占有它应有的地位的愿望。双方承认迅速击败英国人是符合法国和轴心国的共同利益的。倘使法国为此目标而积极合作，它就可以在北非维持超出停战协定条款所规定的军队，而且在击败英国后重新瓜分非洲时，将保证法国拥有大战开始时它所拥有的同等面积的领土。这项协议将保持秘密，实施这项协议的具体措施将由随后的一项协定予以解决。本来打算由里宾特洛甫就此前往巴黎，同赖伐尔一起审查接下去的步骤，但是，这时，墨索里尼打来一份电报，宣布他决定入侵希腊，里宾特洛甫于是直接前往佛罗伦萨同意大利政府商讨这种新局势了。

因此，在紧要关头，谈判的机会就中止了。但是，贝当并没有在赖伐尔为他安排的道路上后退。

10月26日，在维希举行的一次部长会议上，赖伐尔力主应与德国人进行积极合作。

必须注意这一不可轻视的情况（根据费尔内海军中中将的记录，他当时这么说）：胜利者建议同战败者合作。由于气候条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开始

登陆。但是，对英国的胜利已经取得了。德国人正在作出巨大努力。显然，速度的竞赛是对他们有利的……“我们不要报复性的和平”，总理〔希特勒〕曾经说过。摧毁英国有可能带来其他的情况。“我已经在寻求同法国的和平”，他又补充道。因此，法德关系将取决于战争的结束。一切都取决于法国的态度：积极的态度，而不是观望的态度。关于非洲的组织问题，有一个更欧洲化的观念。法国将在非洲受到很好的对待：即声明非洲是欧洲的延伸部分。这是应该作出的抉择。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全盘被接受，赖伐尔于10月28日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一事标志着他的政策的明显胜利。博杜安卸职下来成为部长会议主席的国务秘书。10月30日，元帅在一次广播中宣称，同希特勒的会晤是他本人的意愿，他已经接受了同德国人真诚合作的原则，并且指望采取一项可以改善成俘的命运，降低占领费用的负担，使两367区的分界线不那么严格，并促进向法国供应粮食的政策。他结束讲话时说：“以前，我一直以父亲的身分对你们讲话——今天，我是以领袖的身分在对你们讲话。”

很难讲贝当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有一种突出的本领，能够同时执行互相矛盾的政策。在蒙都瓦会谈的第二天，他写信给魏刚说，他决心要保卫非洲，决不会同外国人结盟，并且决心不向英国宣战。有人曾经试图把蒙都瓦政策解释为一种促使德国战败的巧妙的马基雅维里式策略。他们争辩说，只是通过这种虚伪的合作，才使希特勒没有用法属摩洛哥去收买佛朗哥的支持，或是用武力去压服西班牙的反对来夺取法属北非。他们最后说，如果在1940年有一支德国军队在法属北非的话。那么军事形势就会完全改观，英国人就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如此说来，事实上倒是维希为英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亏得不需要讨论这些假设的论点。当时没有一件证据可以证明那时有哪一个法国政治家的头脑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盘算。他们竭尽全力把法属北非保在自己手中，理由很恰当：它是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他们不愿意失掉它，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块地方对于打赢一场他们深信已经彻底失败的战争会有什么价值。甚至在德国对英国的空袭已经减弱以后，维希仍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德国人最终将取得胜利。同德国人合作决不是为了使法国站在英国一边重新参战的深谋远虑的计谋：它是一种承认事实的现实主义态度，它就是它自称的所谓合作。

赖伐尔在受审时为蒙都瓦政策进行辩护，理由是，合作是停战协定的条款所规定的，这项新协议只不过是停战协定的合乎逻辑的继续而已。的确，博杜安在7月17日的声明中，曾经期望以一种合作的观念代替欧洲均势的老观念，但是，在博杜安所说的“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合作同赖伐尔所设想的合作之间却大有差别。认为有可能同纳粹进行博杜安所描绘的那种合作，这无疑是一种幻想，但是，蒙都瓦又朝前跨了一大步。无论如何，这一步已经走了，甚至连一向谨慎的《时报》也欢呼胜利者368与战败者之间的合作是一项新协定的基础。实际上却并不是如此。希特勒并不信任法国人，甚至对执政的赖伐尔也是如此。希特勒在1940年12月5日写信给墨索里尼说：“我们对维希政府的态度并不是绝对的有把握……。稍微走错一步，就会引起北非与西非同维希破裂，这将给英国提供一个对我们极其危险的作战基地。”甚至在赖伐尔倒台之前，希特勒于1940年12月10日就已颁发了关于部署“阿蒂拉战役”的秘密指示：“一旦在魏刚将军目前统治下的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某些地区发生一场叛乱运动，就必须作好准备迅速占领法国本上迄今尚未加以占领的地方。”希特勒对魏刚的深刻怀疑，以及对他认为是支持

这个北非司令官的维希那一伙人的深刻怀疑，甚至使他认为赖伐尔后来的倒台也是魏刚的势力所造成的。德国人对法国合作的诚意所感到的怀疑必定使他们更加不愿意付出任何物质的代价，或是作出任何重大的政策变动，来换取一种价值如此可疑的商品。蒙都瓦政策所遭到的致命打击实际上是德国人自己在处理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时发出的。早在 1940 年 8 月，就有一项法令把这两个省置于德国民政当局而不是军事当局的管辖之下。巴登的行政长官罗帕特·瓦格纳成为阿尔萨斯行政首长，而萨尔的行政长官比尔克尔则把管辖权扩大到了洛林。有一股主张消灭阿尔萨斯一切法国影响的痕迹的日益增长的压力。9 月间，规定德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并下令将所有个人的姓名一律德国化。法国舆论可能已经勉强地接受了阿尔萨斯的丧失，然而，不久就变得很明白，德国人准备不仅要并吞阿尔萨斯，而且还要使洛林也德国化。8 月 15 日在梅斯发生了一场爱国大示威后，便开始驱逐洛林人，这使法国人痛切地认清了德国的居心。纳粹分子根本不顾法国人的反应，驱逐行动大约就在蒙都瓦会谈时期达到了高潮。德·布里农后来把这一行动 369 称为“对蒙都瓦的真正的破坏”，赖伐尔和阿贝茨两人也证实了这种意见，认为这是对他们政策的致命打击。虽然纵希对德国人“变相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曾经私下向停战委员会提出过抗议，维希政府却尽可能拖延下去，避免正式提到驱逐洛林人一事。有关这件事的消息，同关于德国在阿尔萨斯的政策的消息一样，都没有见报。但是，关于洛林难民到达的报道却屡见不鲜，发表这些消息时都不作解释，也不加评论，只呼吁大家在住房、衣着和提供粮食方面给予援助，并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最后，维希为了替自己辩护，不得不承认事实。11 月 14 日，司法部长阿利贝尔向新闻界宣读了一份公报，否认这次驱逐是德国人和维希商定后进行的。12 月 1 日，贝当宣布非占领区接纳了七万名被逐出的洛林人。

德国人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处理办法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1940 年夏，法德和解看来并非没有可能。思想上的密切关系超越了民族的仇恨。这场战斗为时太短，不可能引起强烈的怨恨，而德国人势如破竹的胜利，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唯一合情合理的事实。胜利的德国军队军容严整，并且开头也颇有纪律。当时法国人正处于幻想完全破灭的状态中，如果德国人能够克制一下，不在胜利的果实尚未成熟的时候就去摘取，不把秘密警察派进法/PGN0610.TXT/PGN>国，不从经济上把法国挤干榨尽，不把纳粹思想灌输给占领区的法国政府，尤其是不使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成为事实的话，德国人为在两国间建立友谊而大力开展的宣传运动本来是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成效的。

赖伐尔一手策划了希特勒和贝当的会谈，他却无法从这次会谈中找出什么重大的好处，足以压倒这次放逐所产生的后果。而且，美国又从旁施加维希对之极为敏感的影响来反对同德国合作的政策。因此，在蒙都瓦会谈后不久，维希的风向便转到相反的方向去了。贝当的那些部长大都敌视赖伐尔，怀疑他野心勃勃，但是，他们只能通过元帅采取行动，而这位元帅对赖伐尔的态度却自相矛盾得有点出奇。有很多情况可以证明贝当本人十分厌恶赖伐尔。可是，他始终不能忘记这个阴沉的奥弗涅人是他个人权力的真正创造者，他显然觉得很难面对面地反对他。德国大使阿贝茨认为，最终激起赖伐尔的敌人采取行动的是担心他正在把法国推向同英国交战的境地。但是，也许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动机，那就是，认为赖伐尔在同德国人进行谈判的

掩护下。正在危险地扩张他自己的权力。的确，他似乎一直想不惜任何代价地向德国人证明，他这个人是不可缺少的，他可以在法国比任何别人为他们做出更好的成绩来。他自作主张地把博尔铜矿的所有权让给了戈林，并且答应把当时存放在西非的比利时国家银行委托法国照管的黄金交给德国人。

结果，赖伐尔做得太过分了。他搞了一套计划（据说是一贯亲德的历史学家伯努瓦—梅香向他建议的），要把拿破仑的儿子德·雷什斯塔特公爵的遗骸迁回法国，埋葬在残废军人宫里，并且建议贝当应该去巴黎参加这一典礼。元帅本人的反应是答应去：从一开始，他最热中的希望之一就是回到巴黎或凡尔赛去。其他一些部长都不这么天真。他们看出这个建议包藏着一个阴谋：想使贝当脱离他们的影响，把他置于巴黎德国人的控制下，并在那里成立一个法国政府，由赖伐尔和德·布里农、戴阿、多里奥、吕歇尔这一伙亲德分子执掌大权。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巴黎的报刊和广播一直对维希政府进行猛烈的攻击，唯独赖伐尔的党羽和贝当本人得以幸免，这种情况更增加了他们的怀疑。德国人居心何在，这是无可置疑的。他们正在凡尔赛腾出屋宇来，给贝当准备官 371 邸，并在那里划定了一小片地区专供安置法国政府之用。

面对着这种危险，整个内阁实际上都一起向贝当献策。他们挑选了另一个奸诈的政客，赖伐尔本人的政敌弗朗丹，来代替赖伐尔。弗朗丹为促成法德谅解曾经出过力，他们希望凭他这一经历将能使德国人接受这一变动。他们使贝当相信赖伐尔一直瞒着他在同德国人谈判，但是，即使到了这时，他还是不愿意同赖伐尔单独对阵：12 月 13 日，他把内阁召集拢来，要他们全都辞职，但是，只接受了赖伐尔和另一个部长的辞呈。赖伐尔似乎遭到了全然是冷不防的打击。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当场同德·布里农、戴阿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阿利贝尔（据迪穆兰·德拉巴尔代特和佩鲁通说）或是佩鲁通（据阿贝茨说）派来的政治警察逮捕了。蒙都瓦政策就此完蛋。这是同德国合作的第一次粗率尝试的失败，也是维希同德国人第一次较量的开始。12 月 16 日，阿贝茨由十名全副武装的党卫队头目陪同，来到了维希。法国人坚持说，让赖伐尔官复原职就需要让贝当辞职，但是，阿贝茨至少能够使这个倒台的部长不受维希警察的控制，而由党卫队来保护他。阿贝茨也坚持要贝当同赖伐尔单独会见一次，这是元帅一直切望避免的事。阿贝茨还坚持要德·布里农接替德拉洛朗西将军为维希驻巴黎的代表。进一步的措施必须等里宾特洛甫就所应遵循的方针作出决定以后再说。

与此同时，在维希把赖伐尔搞下台的人们并没有接替他原来的职位。由达尔朗、弗朗丹和亨茨格组成的三头政治出乎意外地出现了。接下来争取掌权的并不是弗朗丹，而是达尔朗。达尔朗认识到德国人仍然是当时形势的真正主宰，便极力想取得他们的信任。12 月 25 日，他在博韦近郊的一列火车上见到了希特勒，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法德合作派，但是，德国人这时并不急于作出承 372 诺，而宁愿让维希悬虑不安。当时控制着巴黎的报刊和电台的是一批五花八门的极端亲德分子，这些报刊和电台的观点当然完全是亲纳粹的，因此，德国人手头还有另一张牌好打。

维希和巴黎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泾渭分明。维希的主要舆论趋向是属于战前的保守的和天主教右翼的。代表左派的只有《奋斗报》，这是停战协定签订后在—批社会党众议员的支持下，由《人民报》以前的编辑斯皮纳斯主编发行的一份报纸。这份新社会党的报纸宣扬同德国合作来创造一种欧洲新经

济秩序，它在维希没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在维希如此强大的战前的右翼，在巴黎那些主张同德国合作的分子中人数很少，只有蒙面党的一小批狂热分子。从前的蒙面党人已分裂成两派，右翼的“自卫委员会联盟”支持维希政府中的反动分子，而由德隆克尔领导的较有革命性的“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则参加了巴黎合作分子的队伍。正如勒巴特根据他的观点所说的那样，有“一个健康的巴黎蒙面党，另外还有一个令人伤心地和疯狂地维希化的：英国蒙面党’”。除去少数这些右翼狂人之外，巴黎合作分子的领袖大都是和平主义者、新社会党人和战前左翼的前共产党人。他们主办的刊物中有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乔治·絮阿勒主编的《今天报》。德国人办的、旨在迎合工人阶级的一份假社会主义报纸《劳动中的法国》，毫无成就，1941年11月由《社会主义的法国》取代。它坚持纯粹由法国人来管理，并宣扬一种独裁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和以法德合作为基础的欧洲革命。一群属于法国总工会中前工团主义和和平主义派别的工联主义者，在北方工会联盟总书记乔治·迪373穆兰领导下，创办了《工地报》。一度是共产党人属望的新进人物、1934年同共产党决裂并于1936年组成法兰西人民党的雅克·多里奥，则是《人民呼声报》的社长。

如果说左翼的合作分子还有一个领袖的话，那就是马塞尔·戴阿，他的机关报就是从前激进社会党的《事业报》。在1940年7月的国民大会上，他曾提出成立一个统一党的计划，但是，贝当及其右翼顾问们全对戴阿十分猜疑，设法避开了这个建议。9月间，他把《事业报》搬回到巴黎这个较为适合的环境中，在那里同维希的报刊，尤其是同《法兰西行动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他参与了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对犹太人的高明理财手腕，对华尔街、共济会和君主主义的全面抨击，并主张建立一个以极权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统一的欧洲，法德两国就在这个新欧洲中进行合作。他对民族革命的支持并没有使维希动心。在《法兰西行动报》看来，他是一个“假改宗者”，他的阴险手段比共产党搞的地下密谋还要危险。

维希怀疑戴阿并没有错。赖伐尔倒台后，在德国人用以作为对付维希的武器的巴黎几个合作分子头目中，有一个便是戴阿。阿贝茨提出的口号是，维希在12月13日背叛了法国的利益，贝当的政府已被一些教会和反动势力所统治。作为反击，包括戴阿、多里奥、吕歇尔、德隆克尔、絮阿勒、马尔凯、卡塔拉、让·丰特努瓦等在内的一群人于1941年1月24日在巴黎成立了全国人民联盟。这个新运动的纲领包括下列几项：法国同德国自由合作参与欧洲事务，保卫法兰西帝国，创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加强权力，恢复道德和家庭生活，精神复兴，保护种族，实行计划经济，提高生活水平，消灭失业，在国家的保护下组织工会，以及消除世界主义的文化影响等。现在，巴黎的合作分子有了一个可以直接对付维希的武器了，德国人还鼓励他们使用这个武器。因为他们不过是一个反对党，可以把全副精力用于抨击对手，他们内部的冲突没有多大值得重视的实际意义。这种冲突于1941年10月导致了戴阿和德隆克尔的分裂，戴阿成了联盟的独一无二的领导人。在占领区，只有《奋斗报》在宣扬类似的主张，继续抨击“英国人的两面派手法和背叛”，主张欧洲在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秩序下团结起来，并对蒙都瓦会谈的失败表示惋惜。374 维希起初无法保卫自己，对付这个联盟所带来的危机。民族革命就其现有情况而言，也是自上而下强加给被动的人民的。正如阿贝茨于1940年10月中正确地报告的那样，维希的弱点在于同群众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

他们在 1941 年 1 月组成了一个民族革命联盟委员会，试图弥补这个缺陷，并作为对巴黎联盟的一个回答。这个委员会的寿命很短，而且一无成就。“战斗人员军团”的发展证明是比较成功的一着。8 月 24 日的一道命令把当时所有的退伍军人协会（少数无足轻重的协会除外）合并为一个单一的法国退伍军人军团。它的组织是等级制的，全部军官都由上级任命。在贝当之下，到 1941 年 3 月为止，它的首长一直是格札维埃·瓦拉，他后来负责反犹运动。在较早时期，军团做了一些有益的社会工作，诸如照料获释的战俘和难民，帮助战俘家庭等。1941 年春，贝当任命洛尔将军为他驻军团的私人代表，于是军团的使命便扩大了。它奉命同政府代表在省和地方行政单位内进行合作，并负责把反对国家的学说和制度的任何迹象通知政府官员，这项任务对军团不可能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本来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其中法兰西行动党和德拉罗克的法兰西社会进步党的人数很多。1941 年 8 月 31 日，军团变成了一个单一的政党，宣称接纳所有和它信念相同的人。它定下的新名称是法国民族革命志愿军与退伍军人军团。在帝国各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并建立了军团之友和青年军团这两个附属组织。军团成员享有重大的特权，例如额外的食品和衣服配给，餐馆中特别廉价的膳食，以及医药补助等。所有的日报上都为军团辟了一个义务性专栏，它还有自己的刊物《军团人》，到 1941 年 6 月，已有一百多万份的销路。1941 年 8 月底，军团团员的总数据称有一百二十万人，军团之友有四十万人。他们希望这一组织将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一种必要的联系，它将“对统治者说明民众的意见，并向民众说明统治者的意图”。后来，这个组织被控试图建立白色恐怖，然而，直到 1941 年底，它的各个组织并没有干过什么臭名昭著的暴行，除了也许表现在言词上。军团在为贝当提供某种政党式的支持上并不是不成功的，它在占领区遭到查禁，又遭到马塞尔·戴阿的大肆攻击，就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 1941 年 1 月，军团所能提供的这种力量还是未来的事。来自巴黎的威胁近在眼前。维希看出联盟是一个可以取代它的法国政府的核心，于是开始变得动摇起来了。为了增加压力，德国人禁止法国官员越过两区的边界，后来还禁止所有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男子来往于两区之间。人们劝使贝当于 1 月 19 日会见赖伐尔，其目的和事后发表的那份公报一样，是企图恢复这个倒台的部长的名誉。但是，当阿贝茨在为赖伐尔的东山再起进行活动时，里宾特洛甫却另有打算。这个德国外交部长以特有的过人聪明得出结论，认为保持一种用赖伐尔威胁维希政府的局面可以收益更大，使巴黎和维希相争以收渔翁之利。因此，里宾特洛甫指示阿贝茨，不准赖伐尔离开占领区，应把这件事处理得可以防止赖伐尔和维希之间有可能达成任何谅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准许三头政治存在下去。阿利贝尔和佩鲁通必须离开政府，因为他们应对 12 月间反赖伐尔的那些比较激烈的措施负责。的确，阿利贝尔易于激动的个性使他一向就不大可能与人共事。德国人接下去便要求撤换弗朗丹，弗朗丹则认为达尔朗和亨茨格也在密谋搞掉他。贝当本人对于弗朗丹安插进新成立的国民会议的大批议员感到忿怒，因此看到他下台并不惋惜。弗朗丹被赶走以后，亨茨格缺乏政治势力，内阁迅速成了达尔朗政府。2 月 9 日，这个海军上将继弗朗丹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下一天，贝当又指定他为继承人。几天以后，他又接替了佩鲁通的内政部长职务。充斥着维希政府那么许多部门的官僚都一心想把他们的行政部门（即使不是整个政府的话）迁回巴黎，所以准备支持似乎能够同德国人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

任何人。

同德国人的关系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当阿贝茨于4月间向柏林汇报工作时，他可以相当满意地为12月13日事件所引起的较量作一个总结了。那些表示要最强烈地顶住德国的压力的人都被清除出政府；保376证忠诚合作的达尔朗已经控制了全局，赖伐尔则被留作后备以保证这个海军上将循规蹈矩；亲德分子伯努瓦—梅香和保罗·马里翁被安插在外交部副部长和情报部副部长这两个关键的职位上；亲英的教育部长谢瓦利埃以及一些亲英的县长和警察官员都被解了职；委派了一个犹太人事务主任委员；办理经济事务的几个部都交给了愿意同德国人合作的人士。

（三）达尔朗和殖民地，1941年

很少有人会想到，赖伐尔尤其不会想到，达尔朗竟然会在维希的一场权力争夺中获胜，而且几乎在1941年—1942年里，他竟会一直是那里的主要实力人物，尽管他个人是不孚众望的，这种不孚众望的情况由于他对“奢侈设备”

日益增长的爱好的而并没有有所减轻。一个观察家认为，他的突然得势使他变得飘飘然了，但是，却还没有使他失去他一贯的机灵。达尔朗是一个能干的海军行政官员。一个具有相当强烈的个性和野心的人，他在政治上采用一套露骨的，但并非无效的权术。李海把他描绘为“一个地道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决定采取某种行动方针后，不管这种方针同他先前的政策如何不一致，他总是决心不顾一切地把它贯彻下去。自从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他就认为同德国人达成协议就法国而言可能是上策，而就实现他个人的野心而言则当然是上策。据报道他在1940年12月曾说过，对法国来讲，德国人打胜要比英国人打胜更为有利。他知道自己手中握有维希剩下的少数几张王牌之一，即法国的海军。法国海军没有吃败仗，没有象陆军那样遭到剧烈的缩减或改编，它在停战以前和以后的功绩反而提高了它的声威——在敦刻尔克对“西罗科”号的炮轰；“让·巴尔”号的逃往卡萨布兰卡和“斯特拉斯堡”号的逃往奥兰，以及“黎塞留”号的保卫达喀尔；后来又加上有一批驱逐舰逃离叙利亚，“敦刻尔克”号以377及一些较小的舰艇从达喀尔、马达加斯加和吉布提修复回国。海军的态度是强烈反英的，它的士气也很旺盛，这部分是由于提高了军响和一帆风顺的境遇的缘故。许多殖民地都由海军将领掌管着——阿布里亚尔和费纳尔在阿尔及尔，埃斯特瓦在突尼斯，德古在印度支那，罗贝尔在马提尼克。在国内，普拉通主管殖民部，博尔是巴黎警察厅长；新设立的警官学校校长是一个海军将领，大约有七个省的省长也是海军将领。

作为贝当之下的政府首脑，达尔朗主要关心的自然是维希政策中的这一重大问题，即对德关系问题。希特勒觉得达尔朗是个可靠的人，虽然他出于对法属北非的忧虑，在1941年4月20日发出指示，命令对“阿蒂拉”战役作好准备。达尔朗表面上非常希望恢复同德国合作的精神，但是，维希的总气氛——在他们最初预期德军迅速即将获胜的看法证明是错误的以后——这时却是观望主义的情绪占了上风。达尔朗及其下属的缺乏政治经验，在维希历史的这一阶段中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因为维希政府这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实际上都是政治危机。这些危机的出现都与殖民地有关。在1941年的最初几个月里，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从各个殖民地接连涌来。为了把情况说清楚，必须把这些问题分别讨论一下，虽然这些问题是同时发生的，并且在维希看来多少不过是形成一个单一的问题。

法属西印度群岛是在法国驻安的列斯群岛高级专员罗贝尔海军上将的统治之下，他还掌管着航空母舰“贝阿恩”号，一艘巡洋舰，几艘较小的舰艇，美国在法国沦陷前提供的数目相当可观的飞机，以及法兰西银行的一部分黄金储备。美国自然对这些岛屿以及它们拥有的宝贵东西的命运感到关切。经过一番磋商以后，罗贝尔海军上将和美国于1940年秋达成了一项维持现状的协议。罗贝尔在情绪上是反英的，他在这些岛屿上全面实施维希的法律。当地的居民总的说来是反对他的政策的，然而却畏缩不前，部分是因为他们害怕万一美国接管这些岛屿，就会实行种族歧视，所以罗贝尔在1941年里一直顺顺当当地保持了地位。另一个小殖民地吉布提，在阿比西尼亚的意大利人被击败后，也处于孤立的地位，那里的法国军事当局拒绝接受英国或自由法国的控制，结果英 378 国实行了封锁，给法国驻军和当地居民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遭到了维希宣传的激烈谴责。

印度支那正在出现较为重大的事态发展。在停战协定签订时，日本就已经向该地的法国当局一再提出要求。贾德鲁将军开始就此进行谈判，但是在他发回法国的电报中，他明确表示，他认为必须把印度支那保持在远东英法联盟的体制以内。因此，他被召回，另派远东海军司令德古海军上将接替了他。德古面对着日本8月2日的最后通牒，只得同意了这项条件，即为日本人提供有限的使用印度支那的空军基地和运输的便利。8月30日，法国政府和日本在东京签署了一项军事协定。

邻国暹罗趁法国战败的机会于1940年秋对这个殖民地发动进攻。日本插手干涉，提议从中进行调解，法国于1941年2月23日被迫接受。日本鉴于法国在东京的和平会议上采用拖延战术，便扬言要用武力强制实现和平，并派了一支海军分遣队到暹罗湾。法国政府让步了，于3月20日签署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大约有七万平方公里的边界地区割给了暹罗。日本由于保证了这项解决办法而得到一项保证作为报酬，即印度支那和暹罗都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针对日本的政治、军事或经济合作协定。因为维希政府无法抵抗日本的压力，日本便继续施加压力。5月6日，在东京签署了一项印度支那和日本进行密切经济合作的协定。7月26日，法国接受了由日本暂时占领印度支那的一些战略据点，美其名曰保护印度支那免受自由法国、英国或中国的侵略，一支日本舰队载运一支四万人的陆军部队于两日后到达。日本的控制逐步扩大到贸易、运输和新闻报刊。9月间，维希被迫向日本正式提出了抗议，但是，没有美国的支援（这种支援也不是即将到来的），根本不可能进行抵抗，除非是开展游击战，而这是维希政府没有考虑过的。从实际用途看，这个殖民地已成了日本的一个基地，虽然日本人在那里经常驻有大约两万五千人的一支部队，还谈不上是一支占领军。在更靠近本土的叙利亚，达尔朗政府则有较多的选择³⁷⁹，但是，它的政策却导致了另一个殖民地在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丧失了。维希断定高级专员加布里埃尔·皮奥的忠诚深为可疑，于是，在1940年12月把他解职，另派以前巴黎的警察头子、与右翼的关系无懈可击的希亚佩去接替他。希亚佩因为座机被击落而丧命，于是任命当茨将军为高级专员兼法国驻近东部队总司令。虽然法国的战败曾使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得到鼓励，当茨在日益不安的状态中仍然保持了法国的权力。

1941年4月，伊拉克发生了拉希德·阿里的政变，使战火扩大到了近东，

这时危机来了。德国人为了空援伊拉克，需要使用叙利亚的机场，便对达尔朗施加压力以达到上述目的。在同德国人缔结通称“五月议定书”那项明确的协定前三周，达尔朗就开始在叙利亚作出让步。5月4日，维希指示当茨说，假如德国飞机抵达叙利亚，他必须牢记法国在对德关系上是一个中立国，但是，如果英国人进行任何干涉，则必须用武力加以反抗。5月6日，达尔朗电告当茨，他正在同德国人进行重要谈判，希望在叙利亚向德国人提供种种便利以换取德国人作出重大让步。这时李海海军上将提出警告说，法国在叙利亚援助德国已超出了停战协定的条件，并与贝当以前保证的各点不符，但是，达尔朗并没有就此罢手。德方人员于5月9日到达叙利亚，通知当茨说，涂有伊拉克国徽的德国飞机在飞往摩苏尔和巴格达途中需要取得过境的便利。德国飞机及时到达叙利亚，5月15日，在巴尔米拉、大马士革和拉亚克遭到英国飞机的轰炸。贾德鲁率领的自由法国军队极力主张立即攻入叙利亚，但是，英国司令韦维尔由于兵力有限，不得不首先对付伊拉克的局势。当伊拉克的叛乱被击败以后，德国人没有理由再使用叙利亚了，5月30日，最后一批德国飞机离开了那里。6月6日，当茨邀请美国驻贝鲁特的总领事来查明叙利亚是否已没有德国军事人员或飞机。但是这时要制止达尔朗对德国380人的让步所引起的事态发展已经太晚了。6月8日，英国和自由法国军队攻入了叙利亚，在进军以前，他们发表了一项宣言，保证叙利亚的独立，并由贾德鲁将军代表自由法国表示赞同。

这是法国重新爆发一阵反英情绪的时机。当然，叙利亚这场斗争的根源始终没有对法国公众说明过。鉴于法国没有力量派遣援军去叙利亚，这场战斗的胜负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对英国和自由法国的入侵可能进行抵抗的情况下，抵抗还是被视为荣誉的问题。6月20日，当茨要求英军司令提出停战的条件，但是，他又不能就停战问题获得达尔朗的同意。这场战斗打了一个月，当茨对英军的推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同时除了达喀尔的那次小冲突外，这还是法国人第一次同法国人作战。一个月以后，维希才授权当茨同英国人进行谈判。7月12日，宣布停火，7月14日，在阿克签署了近东的停战条款。

达尔朗的政策促使法国失去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但是，维希对它所造成的错误后果尽可能装得若无其事。当茨和从叙利亚遣回的部队在马赛受到热烈的欢迎，这个将军被授与高级军官的荣誉勋位。“我们是把您作为一位凯旋的将军来欢迎的，”洛尔将军如此说，“因为您保全荣誉。”反对自由法国和反对英国的宣传充分利用了这一情况。哈瓦斯通讯社向法国所有的报纸发出这样一条大字标题：“戴高乐分子正图谋从法国盗走叙利亚，把它送给英国。”贾德鲁被斥责为英国雇用兵和卖国贼。当茨在对他的军官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宣称：“至于英国人，你们再次看出他们是我们传统的敌人，他们一心只想使法国在取得和平后没有海军，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军事传统。”

叙对亚的事态比印度支那那样遥远的殖民地的事态对法国舆论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就法国政府的政策以及战略意义来说，最重要的法国海外领土无疑还是法属北非。那里，虽然魏刚的权力由于合作分子阿布里亚尔海军上将的对抗和诺盖的竞争而受到限制，但是，他从1940年10月以后似乎还是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小小的王国。德国人对他这个王国极为疑忌，而达尔朗则颇为嫉妒。魏刚在可能的那种狭小的范围内致力于加强他381所指挥的

法国军队。他鼓励建立秘密的石油和武器库，粗止将钴和铜之类战略物资输往德国。他这种缺乏合作的态度使他同停战委员会经常发生冲突，但是，他并不打算冒险同德国公开决裂。对于贾德鲁的接触，他作了不承担义务的答复；他表明了他个人对戴高乐的敌意，并且对英国人的殷勤不予理睬，虽然美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容易使他动心的。

维希在政策上支持魏刚，成功地使北非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卷入战争。从军事观点上揣测这种政策的利弊，或者揣测另一种政策可能获得的成果，就象上文所谈的那样，都必然反映出事后聪明的想法，而不是反映当时发生作用的种种考虑和动机。不应忘记的是，贝当和魏刚最初的目的是要使法国逃脱这场风暴。他们接下来所操心的是，如何从这次沉船之难中救出可能救出的一切，而又不冒重新被吸引到险些使他们遭受灭顶之灾的波涛中去的风险。德国人可能把法属摩洛哥送给西班牙以换取它的协助来入侵北非，这一危险沉重地压在维希政府的心头。维希在北非可以使用的手段太有限了，使他们不可能考虑对这样一次军事行动进行任何长期的抵抗。不如抵抗，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还作些让步使德国人深信用和平办法比使用武力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政策。后来，到了也许有可能采取行动的时候，无所作为却已成为习惯了。

德国和意大利当然急于想从法国殖民地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要使轴心国不为它们在利比亚的军队从法属北非榨取一些粮食和其他补给品是不可能的。英国人也同样不可能有效地切断北非与法国本土之间的贸易。据估计，从北非输入的商品中，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全落进了德国人的手里。

随着意大利人在北非战事的逐渐失利，轴心国更加急于想从法国领土上获得补给品和运输的便利了。达尔朗看到在它们的这种愿望中有利可图，可以借此同德国人达成一项更为积极的谅解。1941年5月11—12日，他和伯努瓦-梅香一同在贝希特斯加登受到希特勒接见，³⁸²他宣称他本人准备立即站在德国一边，尤其因为他已坚信德国人将获得最后胜利。这次会见之后，他便在巴黎同德国人进行了进一步的商谈，结果产生了著名的“五月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的条款，达尔朗象上文指出的那样同意把叙利亚贮存的军需物资让给伊拉克，准许德国和意大利飞机在叙利亚着陆和加油，并答应德国人可以经由叙利亚的公路和铁路向伊拉克运送物资。关于北非，双方商定，德国人可以利用比塞大港和比塞大—加贝斯铁路为部队运送给养，法国将从法属北非向德国人提供运输及其他补给品，法国政府还将宣布原则上准备允许德国海军舰只和商船使用达喀尔港。作为对这些重要让步的酬劳，法国人可以在叙利亚和北非与西非进行某种程度的重整军备，使他们可以更为有效地保卫他们的殖民地，防止英国人可能发动的进攻。这完全是一项单方面的交易，只有假定达尔朗是觉得必须让德国人知道他能够为他们带来好处，从而增强他个人的地位，这样才解释得通。他还必须设法让法国人知道，他的合作政策将会改善他们的命运，因此他要求释放更多的战俘，削减占领费用，并取消法国东北部的特殊体制。作为报酬，德国人同意把占领费用削减到每天三亿法郎（这一让步并不要德国人花费分文，因为他们已经在法兰西银行中积聚起许多存款单），稍许放宽一点法国两区之间的来往³⁸³限制，并给予法国重新装备几只鱼雷艇的权利，总的说来，同达尔朗提供的十分重要的利益相比，这些报酬实在少得可怜。

他在5月23日的一次广播中为他同希特勒的谈判辩解，一开头便保证

说，德国人并没有要他交出法国的舰队。“谁都知道，”他说（这一点至少是真的），“我不会把它交给任何人。”也不存在把殖民地送给德国或是对英国宣战的问题，但是，法国必须为它的错误，为过去的懒惰与合法化的混乱，为不负责任的宣战，为从前盟国的过失，为一个“在我们已经无力作战时还要继续作战，后来又只想到逃跑的”政府的过失付出代价。这些话以前已经说过那么多次，以致这时可能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达尔朗在结束时说，法国的前途取决于同希特勒进行的谈判。“法国不得不在生死存亡之间作出选择。元帅和政府选择了生存。”实际上，不问是什么选择，当时都还不曾作出：达尔朗的话说得稍微早了一点。

美国政府听到达尔朗同德国人谈判的消息大吃一惊，连忙象在 1940 年 10 月的危机中那样对维希施加了影响。1941 年 5 月 15 日，警卫人员奉派登上停泊在美国港口的法国船只。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项声明，重新提起法国政府所作的关于他们决不会同意同德国进行任何超出停战协定条件范围的合作的保证。总统宣称：“美国人民几乎不能相信，法国现政府竟会参与一项含蓄的或公开的自愿联盟的计划，这一计划显然将把法国及其殖民帝国，包括法属非洲各殖民地和它们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在内，拱手让人，从而对西半球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威胁。”在维希，李海也在警告贝当，指出他对德国人作出的让步所含的危险。亲德派发表了激烈的评论便证明了他的警告所产生的影响。7 月间，《画刊》谴责美国大使是“一种新型的外国独裁者”；12 月 30 日，《新时代》把作为 1941 年特征的观望主义说成是“战争煽动者李海”的“可悲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

维希政府的其他成员看到达尔朗显然是心甘情愿地要使法国投到德国一边去，几乎也同样感到吃惊。他们 384 把魏刚和布瓦松从非洲召回维希。在 6 月 3 日举行的部长会议上，魏刚强有力地施展出他的影响来“粉碎”五月议定书，并且得到布瓦松的支持。在这种压力下，贝当被说服拒绝批准这些议定书，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把德国人想要得到的让步同法国两区之间的界线问题联系起来。德国人当时正准备进攻俄国，并没有打算在这个问题上使用更大的压力，因此，五月议定书便成为一纸空文。

使这场谈判未获成功的法国观望主义，也在德国人方面莫名其妙地反映出来；他们也不愿意对维希作出任何重大的让步。甚至在他们需要什么法国的东西，又不准备用武力夺取时，他们也不愿意用钱来购买。也许困难是部分在于他们尚不能决定要用什么政策来同维希打交道最为得当，因为我们发现里宾特洛甫在 1941 年 8 月指示阿贝茨，在谈判时应采取缓慢的拖延政策。但是，在有一点上，他们却是绝对的、一贯不变的。他们继续逼迫维希把魏刚从北非撤换掉，阿贝茨早在 1940 年 12 月就提出过这项要求。在德国人看来，魏刚是一个潜在的危险，而达尔朗则认为魏刚是他的竞争对手，是他推行政策时的绊脚石。维希的阻力被克服了，魏刚于 1941 年 11 月被免职，虽然接替他掌管兵权的朱安将军继续推行他的政策。尽管五月议定书没有搞成功，德国人还是能够从法属北非为他们的部队取得食物供应、卡车和军火，不必为这种种便利而对法国作出任何让步。

总的说来，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达尔朗的殖民地政策到处都证明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它给维希带来的只是损失；它损害了他个人的威信；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甚至对德国人也没有带来多大的好处。在 1941—1942 年秋

冬两季，入侵俄国占去了德国政府的大部分精力，但是到了德国高级领导有时间就法国问题作出新决定时，已不大会对达尔朗有利了。

（四）俄德战争爆发后的法国

1941年上半年，法国政局的总的均衡状态出人意外地变动很少。巴黎和维希的政客和报刊，同联盟和军团这两个组织一起，都在遥相厮打，但是，因为双方都被限制在自己的区域里，所以不能短兵相接。达尔朗从维希通过他的殖民地政策企图得到德国人的垂青，戴阿和巴黎的合作分子通过他们亲纳粹的热烈宣传力图胜过达尔朗，德国人自己则把赖伐尔搁在冷藏库里备用。贝当和他在维希的亲信小集团置身于这场在四周肆虐的狂风的寂静的中心，他们甚至在这样一个狂风暴雨的季节，还一心想建立民族革命计划所拟定的那种新社会秩序。至于法国人民对战争的态度，齐亚诺说的一句很有特征的话也许并不太错。他说，维希和巴黎的唯一差别是，在巴黎的人说：“希望英国人打赢”，而在维希，他们却说：“希望那些英国猪打赢。”李海于1941年3月向罗斯福汇报说，法国非占领区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占领区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居民，都希望英国获胜。这种情绪在当时自然并不能有效地影响事态的进程。改变法国的形势，使之重新动荡不定，并对维希、巴黎的合作分子和占领当局提出许多新问题的，是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俄国。

6月30日，维希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召回法国大使加斯东·贝热里，不过却小心地使自己的动机同德国人的动机有所区别，说所以要断交的理由是，因为所谓苏联外交人员和领事在法国进行活动。总之，维希的报刊和舆论继续坚守观望主义的政策。弗罗萨尔的《口号报》（1941年6月20日）承认形势中有难以估计的因素，并宣称：“我们正处在一场严酷、猛烈的斗争的开端。”《加罗纳报》（1941年6月24日）认为，法国必须置身于这场戏剧之外，一定要采取沉默的态度。德拉洛克也说，法国“应居于局外”。甚至莫拉斯也宣称，法国必须把为祖国的这场战斗或是交给革命的十字军，或是交给反革命的十字军。这种态度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共产主义有任何同情，而且人们在表达这种态度时往往总要连带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猛烈谴责一番。维希的总倾向是认为，应该同情对俄国作战的德国人，而贝当所要干的却远远超过这种倾向。在1941年8月12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他把纳粹说成是“在东方捍卫文明”。³⁸⁶巴黎的合作分子自然最卖力地要求法国应毫无保留地站在德国一边。有一群人开始组织一个反布尔什维克军团（法国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志愿军团）。他们代表了戴阿的全国人民联盟、多里奥的法兰西人民党、波拿巴主义分子康斯坦丁的法兰西同盟、比卡尔的法兰西主义，还包括革命社会运动的德隆克尔、《上枷示众》的皮埃雷、丰特努瓦、让·古瓦、萨比阿尼，以及其他一些人。颇有意思的是，在法国所有报纸发表以前，7月6日的德文《巴黎日报》上首先刊登了这个新军团的消息。戴阿和多里奥自动要求参加反布尔什维克军团。在巴黎和其他地方成立了招募站，并且对据说是蜂拥而来的大批志愿参加者大吹大擂。可靠的数字很难查出，但是，招募工作似乎比原先希望的要慢得多。然而，到8月底，总算有一群人准备出发到东方去接受进一步的训练了。在出发前举行的检阅上，一个叫科莱特的志愿兵开枪打伤了赖伐尔和戴阿，这个人就是为此而参加军团的。这件事使人对军团是否可靠不免有所怀疑，可能就是为此而推迟了军团的出发时间。法国掀起了一阵同情科莱特的浪潮，赖伐尔和戴阿也请求赦免他，于是

将对他判处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9月4日，军团的第一个分遣队在拉博纳上校的率领下，由凡尔赛悄悄地出发了。合作分子圈子以外的公众舆论仍然是不太热心。在维希的许多支持者看来，在叙利亚进行的斗争似乎同法国的利害关系较为密切。莫拉斯写道，法国人为法国在叙利亚战死总比（他暗示说）为德国在俄国战死要好些。人们对于东方战事的进程自然是满怀兴趣地、有时还不免流露出一些希望地注视着。在德国报道大捷的公报的鼓舞下，人们最初的料想是德国人会迅速而彻底地取得胜利。随着战事继续下去，各种各样的舆论都出现了。甚至《法兰西行动报》的军事评论员也表示相信俄国有能力继续抵抗下去。俄国的广阔幅员和俄军兵力的雄厚给法国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阻为法国人忘不了拿破仑在俄国冒险的下场。德拉罗克著文谈到一个“令盟国失望和给入侵者设下许多陷阱的”俄国。1942年1月，《费加罗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俄国的秘密”的文章：在亲德派中激起了很大的愤怒。该文分析了俄国军队的实力，强调指出沙皇传统——“独裁者严厉统治下的奴役，对祖先土地神秘的信仰”——的恢复。到了1941年底，情况已经很清楚，俄国战事的延续，意大利在非洲的失利，以及人们开始十分怀疑德国最后能否取胜，正使维希的团结变得很紧张。还有种种迹象显示，一旦出现分裂，贝当将站在哪一边：例如，在11月6日的一份电报中（答复拉博纳上校的一份报告），这位元帅对志愿兵参加德国征伐布尔什维主义祸害的十字军表示祝贺。

德军进攻俄国在法国内部所产生的最为重大的后果就是，使共产党参加了战争。为了领会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必须回顾一下法国共产党在停战协定签订时的立场。在1940年5月和6月那些危急的日子里，当时已成为地下刊物的《人道报》也加入了从政治地平线的各方面发出的那片和平叫喊中，但是，只有极左和极右两翼的喊声是一致的。5月26日的《人道报》宣称：“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建立一个和平的政府。”法国共产党人认为法国的故败等于是共产主义战胜法国帝国主义，并且根据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去设想和平。他们认为，在权力全面瓦解以后，他们就有可能领导一场反对“应为这场战争负责的人”的民众运动来夺取政权。他们遵循着同纳粹友好的党的路线向德国当局交涉。要求取消官方对《人道报》的查禁。他们鼓励法国工人同德国士兵友爱提携，号召工厂恢复正常生产，谴责“某些雇主”进行经济破坏，并宣称他们愿意在德苏联盟的基础上同德国人合作。德国人并没有十分令人鼓舞地接受这些殷勤，因此共产党的报刊和组织不得不仍旧在地下。1940年7月10日（尽管大概是8月间才写成的）多列士和杜克洛署388名的一份告法国人民书避免直接提到纳粹，但是，却斥责英国人在搞阴谋诡计，并主张欧洲和平，缔结一项法苏友好条约。《人道报》宣称：“我们通过一项同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友好的政策以谋求法国的安全”，词时还说，苏联的“绝对中立”是防止卷入任何新的战争冒险的保证。它宣称，苏联是没有定量配给证、没有种种限制、没有排队、没有失业的唯一国家；苏联的粮食供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任何封锁都阻止不了苏联将粮食运到法国来。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共产党用面包与和平这个纲领在俄国夺取了政权，现在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他们也要依靠这两个口号来取得法国。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攻击，当然仍在继续，戴高乐被斥责为英国金融的代理人。1941年，共产党加强了反贝当政府的宣传，尽管英国依然是主要的敌人。1941年6月20日，德国入侵俄国的前两天，《人道报》还从

地下对维希发出的反英大合唱帮了一下腔。它宣称：“戴高乐和贾德鲁驱使法国人替英国人送死。”

德苏战争的爆发，一夜之间就使整个形势完全改观。共产党人尽管如此突然而意外地进入了同占领国家敌对的状态，开始时却具有很大的便利，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地下党，积极进行抵抗的全部组织都可以立即行动起来。所以他们能够组成第一支有效的游击队，后来便发展成为通称法兰西袭击队与游击队的那个团体的核心。

但是，游击战还是将来的事情。抵抗是从一些孤立的破坏行动开始的，第一次对德国军队一个成员的袭击于1941年8月21日发生在巴黎地下铁道。德国人大肆逮捕嫌疑犯，尤其是犹太人。8月23日，他们宣布，如果破坏行动和袭击占领军人员的事件继续发生，将对扣押的人质进行报复。8月31日，巴黎各报第一次奉命以头版显著的地位刊登枪毙八名在押犯的报道。9月间，贝当在广播中向占领区的法国人发出呼吁，要他们为了人质停止袭击德国人。10月5日，德国人宣布了第七389十五次处决，处决的人数逐步上升。10月20日，第一个德国高级军官，南特的驻军司令霍尔茨中校被杀死了。德国人于是对该市征收了一笔沉重的罚金并实行宵禁，同时处决了五十个人质。几天后，一个德军少校在波尔多被杀死了。贝当和达尔朗在电台发出呼吁，戴高乐也从伦敦无线电广播中呼吁停止暗杀德国人，但又有五十个人质被枪决了。本来打算接下去再杀一百个人，然而维希一再提出强有力的抗议后，总算有了一些效果。红衣主教热利埃宣称，枪决人质使全世界的良心都为之颤栗。皮舍告诉德国人说，这种规模的报复正使共产党人和其余的居民之间产生一种团结一致的感情。

尽管每次袭击德国人之后，就实行宵禁，征收罚款和枪毙人质，但是，袭击德国军人的事件并没有停止下来。维希提出一种看法，认为这类袭击是外国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干的。莫拉斯在《法兰西行动报》上写道：“这些炸弹和子弹都是从别人那儿来的。我们的同胞不可能犯下这种性质的罪行。”看来很可能在这一阶段这些事情多数是共产党干的，不过它们却被利用来作为采取进一步反犹措施的借口。1941年12月16日，德军司令官冯·施蒂尔普纳格宣布向占领区的犹太人征收一百万法郎的罚金，把“犹太—布尔什维克犯罪分子”放逐到东方去强迫劳动，并且处决一百名犹太人、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维希一反常例，发表了它提出的一份抗议书，其中讲到“全体法国人民感到深切不安”。在其他情况下，舆论本来可能会不赞同对孤立的占领军成员进行袭击的，可是现在它无疑已被德国人的人质政策激动起来，舆论的同情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而且，由于宣布一切分散的抵抗运动都是共产党人干的，德国人便为共产党恢复了它在德苏联盟时期丢失了的爱国名誉。

除了上述这些活动之外，很难对1941年的抵抗行动作出估计。肯定有许多小的抵抗组织正在兴起。《法兰西行动报》抱怨说，戴高乐主义在乡村里也有所发展。但是，在这个阶段，对自由法国的同情如何普遍，这种同情又引起了多少行动，还很难说。一个英国谍报组织在法国建立起来了，伦敦自由法国组织的第二局在德瓦弗390兰（帕西上校）的领导下，正派遣代表到法国来同自发地兴起的各个分散的小抵抗组织建立联系。到了1941年底，非占领区的三个主要运动，战斗、解放和法兰西袭击队，都同伦敦的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取得了联系。还有许多往往是昙花一现的地方性团体。在占领区，

情况则要困难得多，而且在 1942 年以前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尽管有一些个别的英勇献身行动，抵抗运动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人们还不清楚它在一般民众中得到了多大的支持。戴高乐在 1941 年 11 月 11 日发出的静默五分钟的号召，据说也没有获得多大的响应。不过，有些迹象表明，法国的舆论在 1941 年正在发生变化。李海海军上将 7 月间汇报说，贝当的声望正在下降。这个元帅于 8 月 12 日发表的讲话反映出一种希望幻灭的伤感情绪：“几周以来，我感到有一阵不祥的微风正从法国好几个地区吹了起来。不安的情绪正悄悄地出现在人们的心头……有人对我的政府的权力产生怀疑。……复兴的力量正在丧失信心。……只有在舆论的赞同下，才能对法国进行统治。……今天这种舆论已经出现了分歧。”9 月间，当元帅访问非占领区的主要城市里昂时，他受到的接待是冷淡的。至于占领区的法国人，莱昂·贝比于 1941 年 12 月在尼斯的《警觉报》上写道，他对来到里维埃拉的巴黎朋友的无知感到震惊：“他们不信任自己的报刊和无线电台，但是，他们却收听外国广播。他们对贝当的伟大工作一无所知，对政府的每一项行动都作出错误的解释。”

维希面临着对它自身的权力以及对德国人的日益增强的反抗，于是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新的法庭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成立起来，进行合并，加以改组。冈内的军事法庭（根据 1941 年 9 月 24 日的一道法令设立的）和承办黑市犯罪行为的特别法庭（1941 年 3 月 21 日设立，分别在巴黎和冈内两地开庭）于 11 月间把权力都移交给了国家法庭（根据 1941 年 8 月 14 日和 1941 年 9 月 6 日的法令设立的，分别在巴黎和里昂两地开庭）。另外，设立了几个特别法庭来办理夜间所犯的罪行（1941 年 8 月 21 日）和共产党或无政府主义者煽动的犯罪行为（1941 年 8 月 14 日和 25 日）。军事法庭继续执行任务。8 月 31 日的一道命令禁止举行一切公众集会，9 月间又勒令《今日报》、《直言》周刊和《新时报》等较为独立的报刊停刊，这些都显示出当局对舆论的动向所感到的惊慌。在皮舍于 7 月间做了内政部长以后，政府对反对派所采取的行政行动变得更加残酷，虽然并不是不加区别的。

在 1941 年，当国外的事态左右看法国的历史时，维希的势力对比在国内也一直在发生变化。政令无法推行，莫拉斯和法兰西行动派的民族主义和非合作主义倾向的影响也降低了。达尔朗在 1941 年 2 月的权力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不过，同时，一个潜在的竞争派别也进入了政府。在法国银行界和重工业界里有一些势力强大的亲德分子，沃尔姆银行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的中心。这家很有势力的银行的合伙人之一巴诺在加布里埃尔·勒鲁瓦-拉迪里的鼓励下，于 1937 年创办了《新期刊》，目的是提倡一种大工业家的法西斯主义。财政部长布蒂耶同这一集团有联系，他们在 1941 年实际上控制了同经济事务有关的所有国务秘书的职位。巴诺本人成为法德经济关系的总代表，负责管理以前由亨茨格率领的停战代表团处理的全部经济问题。这个集团的另一些主要成员是同工业家雷诺有裙带关系的勒伊德，他是全国装备的总代表；部长会议副主席的秘书长伯努瓦-梅香，他同达尔朗一起主持了五月间同德国人的谈判；另一位秘书长保罗·马里翁，他从前是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多里奥的追随者；几家冶金公司的董事布舍，他主管工业生产，后来成为内政部长；劳工部长、工联主义者贝兰，他在战前同大工业家有接触，他的秘书长是沃尔姆银行的董事；还有交通部长贝特洛。随着法德两国工商界之间的经济合作范围有所扩大，沃尔姆集团的势力也增长起来了。德国人供应原料给法国工业，又拿走一大部分他们的工业产品，这项安排提供了一个获得厚利

的机会，从北非把供应品运往德国的运输业也获得了厚利。

这个组织松散的团体——如果它能称得上是个团体的话——有时被人叫做共荣社。这个蒙上一层秘密团体的戏剧性外表的名称，首先是巴黎的左翼合作分子替它 392 取的。例如，《呼声》宣称，蒙都瓦协定遭到了“共荣社”的破坏。戴阿也在《事业报》上发动了一场反对它的战斗。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犹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个秘密工具。对“共荣社”的另一种看法出现在 1942 年 1 月的一份警察报告书中，它把“共荣社”同法西斯的秘密革命行动委员会和革命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似乎没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接受这种把它作为秘密团体的说法，但是，也没有理由就此否认维希政权内部有强大而关系密切的金融势力存在。

贝当对这个团体的一些主张不大同情，支持他的有巴泰勒米（司法部长）、卡齐奥（农业部长）和两个国务部长吕西安·罗米埃与亨利·穆瓦塞。亨茨格（国防部长）和贝尔热雷（航空部长）的关系不很明确。达尔朗多少成了一个孤立的人物。除了仍在他个人控制下的海军外，他继续占有着部长会议副主席、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这种最有势力的地位。但是，7 月间，他不得不把内政部让给了布舍，事实证明布舍是一个精干的行政人员，在镇压国内的反抗和清洗政府的工作人员方面冷酷无情。布舍有沃尔姆集团的势力为他撑腰，稳步地削弱达尔朗的权力来壮大自己的权力。11 月间，当贝当屈服于德国人的一再要求，免去魏刚在北非的职务时，两派都可以认为这是他们的一种收获，不过到了 1941 年秋，达尔朗的运气显然在开始下降了。他在 8 月间从亨茨格手中接管了国防部，但是，这并不能补偿他把内政部让给布舍的损失。在追随他的海军人员以外，他是一个不得人心的人：贝当在 1941 年 8 月 12 日发表的演说中，公开提到达尔朗是一个“舆论对他并不是经常赞同，也不是经常公平”的部长。他的殖民地政策只是带来一场灾难；他想在 5 月份同德国人达成一项协议的计划也证明是一场失败。李海于 1941 年 11 月报告说，达尔朗本人也开始怀疑德国人最终能否取胜，并且打算静观俄国战事的发展后再进一步承担义务。虽然达尔朗心中很可能存在着这些疑虑，但是这些疑虑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努力以保持德国人对他的好感，例如，向德国人提供英国舰队活动情况的情报。12 月 10 日在同齐亚诺于都灵举行的一次会议 393 上，他大大显示了一番他的激烈的反英情绪。德国人企图不花本钱而有所收获，维希则只愿意按一定代价出卖自己的援助，他们之间所耍弄的这套惯用的策略在 12 月 1 日贝当和戈林于圣佛洛朗坦会晤时仍在继续耍弄。戈林提出法国人应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来保卫他们的殖民地以防英国人占领。贝当回敬说，法国需要更多的军队和军用物资。结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会谈结束时，戈林拒不接受贝当的一份备忘录，而贝当则有失体统地把那份备忘录硬塞进了这个纳粹分子的口袋里。《新时代》能够有几分合乎事实地抱怨说，法德关系在它所谓的“1940 年 12 月 13 日的犯罪行为”以前，比在 1941 年底要好些。维希的最大的幻想就是认为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政府，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政策。其实它越来越受着环境的摆布，对德国人的压力它至多也只能进行一场阻滞的战斗。在法国维持秩序并且通过法国人来统治这个国家，这对德国人当然关系重大，但是，归根结蒂，问题还在于维希政府是否肯把德国人触犯到由赖伐尔来取而代之的地步。正如阿贝茨坚持的那样，赖伐尔的存在是维希对德国俯首听命——他说的是忠诚——的真正

保证。当德国人发现贝当手中的唯一王牌——辞职，拒绝再当政府的名义首脑——是一张他并不打算打出来的牌时，他们就已经打赢这一局牌了。在这以后他们所要解决的仅有的问题就是防止有任何别人在维希变得势力强大，可以代替贝当来打这场牌，并且决定让谁来当贝当下面法国政府实际的首脑，成为他们最有用的工具。半心半意的合作、法国国内日益增长的反抗和动荡不安，以及镇压的一无成效，凡此种种，都不免令人感到，达尔朗和沃尔姆集团都不是槽国政策的最合理的工具。看来还要再拖三个月，可是，到了1941年底，导致赖伐尔于1942年4月卷土重来的那场谈判的舞台已经布置停当了。

第三节 1942—1944年的维希政权

（一）赖伐尔重新执政

1941年间在法国一直可以感觉得到的观望主义精神有所增长，这个情况反映在1942年1月1日贝当的讲话394中。这篇讲话似乎是想用法德合作去抵制戴高乐派的政策，所以敢于把法国称为一个欧洲大国，并且暗示当时的局势应使德国想到，需要修改一下停战协定了。巴黎的报刊和电台都攻击这篇讲话，德国大使阿贝茨的政策是想从维希取得更多愿意合作的物证，这时他显然担心柏林方面对他这项政策的失败会有所反应，于是拿出一份据说是达尔朗的提议来反击贝当的讲话。这项提议被认为是在贝当及其政府的主要成员的同意下提出的，说法国将站在德国一边参加对英美作战。提议的内容本来是要保持秘密的，等到宣战的形式可以获得舆论支持的时候再公开出来。伯努瓦-梅香和达尔朗的朋友海军上将多特尔战后都明确地否认有过任何类似的提议，并且就算达尔朗采取了这一步骤，也不可能相信贝当和其他的部长会同意这样一项建议，因为这是同他们政策的整个趋向背道而驰的，他们的政策可以说是不惜任何代价要使法国不卷入战争。

事实上，这时候德国人在他们同法国的关系中，目标是比较有限的。鉴于轴心国军队在北非遇到的困难，他们已在1941年12月把朱安将军召到柏林去，由戈林向他提出一项要求，要法国提供物资支援他们。他未置可否，等他回到北非后，便下令采取措施以防德国人万一发动进攻。另一方面。达尔朗却在原则上接受了德国人的要求，只在一些细节上稍作变动。他在1942年1月2日写给埃斯特瓦的一封信中所表示的态度是，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法属北非沦为战场，因此用供应品支援轴心国部队，使他们能够阻止英国人，不让他们打到突尼斯边界，这是符合法国的利益的。

尽管达尔朗采用了这种策略，维希政府总的说来却并不打算对德国人的事业承担义务。它在1942年初采取的一项积极行动是，终于开始在里翁审讯依争罪犯了。395 其中有四个人——边拉第、勃鲁姆、甘未林和居伊·拉尚布尔（他是为了答辩对他的控告而从美国归来的）——从1940年9月以后便受到行政拘留。1941年4月又把1936年以后担任国防和军政部秘书长的雅科梅列进了这份名单。雷诺和芒代尔已经由一个特别法庭定了罪，所以不在这次新的审判之列，不过，其余的人都于1942年2月19日在里翁出庭受审。审讯进行得并不完全象预期的那样。一些被告，尤其是莱翁·勃鲁姆，充分利用了法庭给予的机会为他们自身进行辩护。他们提出证据证明，法国当时的毫无准备应由参谋总部负责。为了避免提到贝当本人一直对法国防御计划具有占优势的影响的那个时期，法庭曾规定了时间限制，但是，他们拒不接

受这一点。不久就很明白，这次审讯对于贝当和参谋总部的名誉所带来的损害远比对于第三共和国这些被控有罪的部长的名誉所带来的损害要大。从德国人的观点来看，这次审讯同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并没有把战争罪责加在这些法国部长头上，反而变成了一场追究法国战败原因的公开辩论。这样搞了大约两个月后，维希和德国人对它都深感厌恶。1942年4月11日，审讯草草地暂告结束。被告们带着增高的名声返回监狱，继希则小心谨慎地再也不对他们进行审讯了。

尽管阿贝茨极力掩饰当时局势，德国当局对他们的法国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却很有理由感到不满。3月底，戈林会见了赖伐尔，开始商谈改组维希政府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里，达尔朗的地位显眼地日趋削弱。许多部长，尤其是所谓“共荣社”的成员，都敌视他。据费尔南·德·布里农的看法，“沃尔姆的班子”愈来愈接近“赖伐尔集团”了。这似乎误解了他们的立场。法国的大工业家们直到1941年底一直把钱押在德国的胜利上，而现在，当美国参战以后，他们开始改变了看法，因为他们对美国的经济力量比法国任何其他集团都更为了解。但是，虽然不是为了投靠赖伐尔，他们却肯定同达尔朗疏远了。贝当的医师梅内特勒利用他的影响来反对达尔朗，而贝当本人也对这个海军上将的声望有点猜忌。这样，法国和德国两方面都为达尔朗的罢官准备好了基础，同时赖伐尔同德国人所进行的谈判又为他本人官复原职打开了大门。1942年4月18日，达尔朗被降到总司令的职位上，赖伐尔代替他当了政府首脑。与此同时，根据第十一号制宪法令，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职责分开，对内对外政策一概由政府首脑实际负责。赖伐尔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回来的，这些条件排除了重演1940年12月事件的一切可能性。在新政府中，《费加罗报》原先的主笔吕西安·罗米埃，尽管身体不好，却成为贝当最信任的同僚，并且在他的支持下一直任职到1943年11月德国人最后坚持要他辞职时为止。赖伐尔的内阁包括许多直到维希政权不再存在时还留在他身旁的人，其中有卡塔拉（负责财政）、阿贝尔·博纳尔（教育）、格拉塞博士（卫生）和保罗·马里翁（情报）。在其他人中，勒鲁瓦一拉迪里（农业和粮食）、巴诺（法德经济关系）和约瑟夫·巴泰勒米（司法）离去得较早。伯努瓦一梅香由于同多里奥和巴黎的狂人们勾结，于1942年9月被免职，他的同僚，国务秘书普拉通海军上将，也于1943年3月被免职。

赖伐尔在野的十五个月丝毫不曾改变他对局势的判断。我的政策〔他对李海说〕是基于同德国和解，我认为，没有这种和解，就不可能有欧洲的和平、法国的和平，或是世界的和平。我确信德国人将会获胜。但是，即使德国战败，我的对德政策也还是如此，因为这是为决定性和平打算的唯一可行的政策。他具有往往同阴谋策划的能力分不开的某些固定的想法，超出这些想法的东西，由于智力的限制和无能，他就看不到了。早在停战协定以前，赖伐尔便下了决心，认为法国的命运是同德国的命运难解难分地结合在一起的，法德两国的合作，即使是按照纳粹提出的条件，对于挽救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也是必要的。他醉心于德国的军事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他还以自己的现实主义而自豪，因此断定万一国际事务发展到必须通过战事来一决胜负时，他那个赖伐尔决不会站在失败的一边。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为了使德国人相信他们少不了他，他的打算是，使他们明白没有别的人能比他更为有用。他竭尽全力，尽可能慷慨、尽可能公开地出卖祖国的利益，目的在于表明他是全心投靠，他除了同德国人全面合作之外，是别无其他退路的。

在 1940 年 12 月，就维希说来，他走得未免太远了，但是，既然他又官复原职了，他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相信自己的机敏，他便重新捡起他在 1940 年底中断的政策。在 1942 年 6 月 22 日的一篇广播讲话中，他甚至说出了这句臭名昭著的话：“我祝愿德国胜利。”在战后审讯贝当时，他解释说，他讲这句话是因为需要在德国人中创造一种相信法国的气氛。也许，说得更正确点，他讲这句话是因为他需要在德国人中创造一种相信他本人的气氛，不过人们也不应该忘记这句话的后半句——“因为，如果没有德国。共产主义将在欧洲所有的地方安顿下来了。”他认为世界的前途不是由纳粹—法西斯主义决定，就是由共产主义来决定，而在这两者中他宁愿挑选前者。赖伐尔重新当权，重新同德国进行密切的合作，自然使法国同美国的关系冷淡下去。1942 年 1 月，美国政府同魏刚作了最后一次接触，他的回答是，除非得到见当的指示，否则拒绝采取任何行动。美国政府于是放弃了对他的希望。李海报告说，如果德国人向北非方面挺进的话，不能期望维希会在任何把德国人逐出推非的努力中进行合作。早在 2 月间，美国在收到情报，说法国船只在为轴心国军队从乌赛运送物资往北非时，美国便警告维希，这种做法将使美国改变政策，但是，这种威胁并不见效。3 月间，美国停止向北非运送粮食供应。4 月 17 日，李海海军上将奉召回国，只留下一名临时代办来代表美国。

（二）1942 年法兰西帝国的事态发展

在 1942 年内，法兰西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脱离了维希的控制。法属北非站在盟国一边重新参战。印度支那实际上由日本控制着，由德古海军上将继续维持的法国权力，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在余下的属地中，有的仍旧坚持忠于贝当，有的接受了北非新政权的领导，有的依附戴高乐，再加上美国人和英国人从旁插上一手，所以它们之间进行着一场错综复杂的冲突。s98 自由法国想使法兰西帝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重新参战，这种希望注定要落空。对于这一点，美国政府的敌视态度要负一部分责任。上文已经提到过，纽芬兰海岸外的两个小岛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在 1941 年底曾在自由法国运动和美国之间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冲突，但是，美国对戴高乐极不信任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戴高乐如果不是英帝国主义的工具体，就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冒险家而已。国务院在法国的情报人员向国务院保证说，戴高乐在法国并没有获得有效的支持，盟国如果承担义务去支持他，将会失去最终使法国重新对德作战的希望。来自北非的情报似乎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能把贝当当局争取过来，他们就能提供远比戴高乐所能收集的为大的军事支援。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还认为，他的政策就是负责使维希不站在德国一边参加战争，尽管事实上，这样一种事态发展的危险同希望维希重新参加对德作战一样都是被夸大的了。然而，以这类假设为基础的美国政策力求避免不必要地激怒维希，并且一般地使法国的海外领土保持中立，而戴高乐则在力图使这些殖民地在他自己的领导下重新参战。

英国政府和自由法国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同美国一样，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待法国殖民地的态度。英国的政策主要是关心这些法国殖民地成为实际的或潜在的陆、海、空军基地的问题，而并不过分担心如果攻击这些殖民地时维希或戴高乐会有什么反应。另一方面，法国这两派都以极端怀疑的眼光看待英国的海外政策。奥方海军上将将在战后所写的一本书中，把当时法国的总态度表达得很明白。他说，英国人并不十分明了战事将成什么样子。鉴于有可能互相妥协，他们便想抓住一些抵押品，或是万一法国彻底垮掉时，

收集法兰西帝国以前的掠夺物。同时，维希的支持者则不知道戴高乐和英国政府之间一直在进行的斗争，把戴高乐看成是英国的帮凶，在穷凶极恶地图谋消灭法兰西帝国。我们正是根据这些总的情况，才能对 1942 年间法国海外帝国的事态发展勾画出一个轮廓来。399 往后我们将谈到 1942 年 5 月英国对马达加斯加发动的进攻。那次进攻结果使英国在那一年的深秋占领了全岛，并于 1942 年 12 月把它移交给自由法国管理，该岛附近的留尼汪岛也早已由自由法国和平地占领了。

1942 年 5 月，美国政府和贝当的坚定支持者罗贝尔海军上将之间的谈判使法国在马提尼克的舰艇解除了武装。一年以后，美国宣布废除该协议，马提尼克于 1943 年 6 月投入了自由法国方面。在法属圭亚那，自由法国和阿尔及尔委员会之间的对抗导致双方争取获得对这个殖民地的控制。1943 年 3 月，两派都派了总督去接管它的行政，但是，该地所需要的粮食全靠美国供应，在美国的压力下，它接受了阿尔及尔任命的总督。

争夺法国海外属地领导权的那场决定性的斗争发生在北非。它是盟军 1942 年 11 月 8 日登陆的继续。在魏刚的统治下，北非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亲维希情绪，并对自由法国运动和英国人抱敌对态度。1941 年 11 月接替魏刚掌管兵权的朱安将军继续执行魏刚的政策，即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设法建立北非的防御，但完全是为了在维希政策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北非的陆海军军官全部表现出他们一贯对贝当的忠诚，军团有着充足的给养，影响很大，而穆斯林居民也热烈欢迎维希废除《克雷米厄法令》。因为根据这项法令，阿尔及尔的犹太人取得了法国公民权，而穆斯林群众则没有取得这项权利。在诺盖和埃斯特瓦分别管辖下的摩洛哥和突尼斯，几乎没有反对运动，而在阿尔及尔则只有一小批潜在的抵抗者。甚至君主主义分子——自称有权继承法国王位的巴黎伯爵本人就住在拉巴特——也是一股比自由法国的同情者强大的政治势力。

1942 年间，美国人在同英国人协商下制订进攻北非的计划时，当地的背景就是这样。1942 年 11 月 8 日，盟军在北非登陆的情况，以及登陆前后美国人与法国当局进行谈判的情况都记载在《概览》的另一卷里。这里，我们只打算讨论一下北非的法国当局用来解决他们的良心问题以及重新参战的那些复杂的政治花招。

鉴于北非的法国行政当局具有强烈的亲维希性质，美国人于是同亨利·吉罗将军进行接触，希望他能成为 400 一个领袖，以他的名声团结起力量来对抗维希，因为他从德国监狱中冒险脱逃的故事已经使他成为一个公众瞩目的人物。不幸在一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便出现了一种带根本性的误会。美国政府正计划在北非登陆，而吉罗则想进攻和解放法国。吉罗提出的条件之一是，只要盟国部队中包括有法国军队，他本人就必须担任总司令，他认为他所提出的同美国人进行合作的各项条件已经为罗斯福接受了，但是，当地的美国军事当局对此却一无所知。等到吉罗逃离法国，于 11 月 7 日在直布罗陀会见艾森豪威尔时，这一误会引起了争执，结果直到盟军登陆业已开始以后双方才达成协议，吉罗直到 11 月 9 日才到达非洲。

与此同时，美国人和以马斯特将军为首的一个抵抗小团体制订了法国人在北非起义的计划，但是，虽然这个团体在 11 月 7 日顺利地控制了阿尔及尔几个小时，贝当分子却在盟军 8 日登陆以前恢复了他们的地位。当时，达尔朗因为儿子患了重病，碰巧来到阿尔及尔，鉴于他是当地法国的最高级军官，

他的权力比朱安大，而美国人一直是同朱安进行接触的，朱安对法国军队重新参战的想法至少是同情的，这一切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达尔朗对盟军舰队的庞大有着深刻的印象，在 11 月 8 日授权朱安仅就阿尔及尔市区同盟军缔结一项停战协定，但是，诺盖却在摩洛哥抵抗盟军的进攻，并逮捕了该地的少数反对者。当吉罗到达现场时，他的名声并没有发挥出原先预期的影响。显然，北非的法国当局和部队仍然忠于贝当，只有奉到他的命令，或是奉到作为他代表的达尔朗的命令，才会停止抵抗。

达尔朗本人显然在等待贝当作出决定。维希发来的官方电报指示他用全部可用的兵力抵抗入侵。11 月 10 日 2 时 30 分，他接到贝当的命令：“我早已下令保卫非洲，现在仍维持原令。”然而，在法国当时的情势下，任何官 401 员，甚至最高级的官员，都决不会有把握地认为任何命令就是字面上的那种意思。在德国人开进法国非占领区以前，贝当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是：“我完全信任你，好好地干吧。”这件事还有下文：在关键的时刻，“国王的秘密”应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原来法国人在停战以后，曾将电报密码交给德国人，达尔朗也保留了一份只有一两个人知道的密码。这份密码为维希的海军部长奥方海军上将知道以后（他以前不知道有这份密码），便提供了一种手段，于同一天（11 月 10 日）4 时 35 分从维希发出了另一份不同的电报：“不要理会在强迫下发出的公文。你可以全权处理一切。”达尔朗回电说：“我完全了解。我很幸运。”

必须承认，原电都已经销毁了，这个电文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甚至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贝当本人应对这份电报负责，不过，有一件事似乎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确有这样一份电报从维希发给达尔朗，从而打消了他的疑虑。同一天，他同意全面停火，并以贝当的名义在北非肩负起管理权来而由朱安担任他手下的军事指挥官。这来自不名誉中的名誉和来自不忠诚中的忠诚的悲剧至此还没有演完。诺盖在卡萨布兰卡对进攻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美国的一次炮轰使法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11 月 11 日，诺盖奉朱安的命令宣告停火。但是，同一天贝当又发来一份正式电报，任命诺盖为他在北非的唯一代表。幸亏维希不能撇下坏事不管。达尔朗文收到了一份密电，这是贝当最后发来的一个完整的电报。据说电文是这样的：“你必须理解，正因为大家认为你已经成了俘虏，诺盖将军才被任命为元帅的代表的。”诺盖于 11 月 12 日日到达阿尔及尔，显然对这些密电感到怀疑，他建议北非的法国军队应保持中立。法国人和美因人在阿尔及尔陷入的这场几乎无法解决的纠纷，现在被一位本来就是将军的将军解决了。11 月 12 日傍晚，朱安命令突尼斯的巴雷将军掉转枪口打德国人。阿尔及尔和摩洛哥重新参战了。

这时，突尼斯是一个危险的地点，因为这里发生了反侵入的战斗。总督埃斯特瓦、地面部队司令巴雷和比塞大的舰队司令德里安三人所面对的不是盟军的舰艇和登陆部队，而是德国的飞机。在一周的混乱期间，巴雷设法 402 把大量军用物资转移到可以进行军事防卫的山区去。另一方面，埃斯特瓦和德里安这两个身为海军的人，都认为只有比塞大这一海军基地才值得一战，但是，正当他们迟疑不决时，德国人却行动起来了。11 月 17 日，狂热的合作分子普拉通海军上将从维希到来，随身带有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侵略军的命令，突尼斯的命运便决定了。在这一周里，一直摇摆不定的德里安，这时已决心这样干了。埃斯特瓦则扮演了突尼斯的贝当这一角色。另一方面，巴雷在一支薄弱的部队的掩护下，在山区进入了阵地。11 月 19 日，北非的陆军

同德国人交战了。

达尔朗的在场和他对密电的解释使进攻部队与法国军队之间避免了一场大冲突，但是，接下来出现的情况同盟军设想的一切全然不同。美国代表罗伯特·D·墨非及其工作人员所搜集的关于法属北非的情报，使美国政府获得了十分错误的印象，以致艾森豪威尔在11月14日致罗斯福的信件中竟会写道：当地的情绪同原先的估计相去不远。根据海军上将坎宁安的判断，达尔朗是唯一可以使这场战斗停止下来的人，同时艾森豪威尔也致函丘吉尔说，达尔朗是“我们所受到的一点一滴实际援助的源泉”。因此，不管盟国多么不信任和不喜欢，他们却不得不把这个海军上将当作政治上必需的人物而接受下来，法属北非的政府主要就是以他的权力为基础的。他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在11月15日发表了一项宣言，使武装部队、行政人员，以及军团不再受效忠贝当的誓言的约束。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也是一个只有达尔朗才能有效地采取的步骤。经过一场混乱的谈判后，他们商定由吉罗任总司令，达尔朗任法属北非高级专员，朱安任法军地面部队司令，诺盖和夏泰尔分别任摩洛哥和阿尔及尔总督。使法属西非依附新政权的布瓦松则保持原职；成立了一个帝国委员会，由达尔朗、吉罗、诺盖、布瓦松和贝尔热雷五人组成，后者原来是维希的航空部长。他得到情报，说11月15日盟军将发动进攻，便于11月6日动身来到非洲。

这些几乎全都是参与停战协定的人。因此，同北非的贝当行政官员做成的这笔交易，以及对达尔朗的承认，就在自由法国的人士中激起了怨恨的情绪。这种作法在英国和美国也受到强烈的批评。为它辩解的人说，这403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的确，要是没有达尔朗，又得对付当地法军的抵抗，这次进攻一定会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战斗。

（三）北非登陆以后的维希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1942年11月以后法国国内的事态发展上去。盟军对北非发动的进攻似乎使维希全然出乎意外。罗斯福曾写信邀请过贝当，劝他参加解放北非的工作。贝当回信说：“我们遭到攻击，我们将进行自卫。这就是我下的命令。”他给北非的正式电报也指示该地当局镇压一切反叛的企图。贝当另一方面似乎（如同上文所述的）已经用11月10日的密电暗中批准了达尔朗可以不服从这些命令，但是，他又在11月11日把北非的权力移交给了诺盖，而且在12日还签署了军政部一个将领呈给他的一份电报，使突尼斯的部队不再听从达尔朗和诺盖的指挥，并命令他们保卫突尼斯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侵略，对于贝当当时采取这些自相矛盾的行动，唯一讲得通的解释是，他那时受到了各种不同的影响。他始终毫不犹豫的一点——这一点已经成为他的固定思想——是，他拿定主意不离开法国。对于乔治将军和魏刚等人劝他离开法国到北非去的意见，贝当的回答几乎同他在1940年所说的话一样：“我的责任是同法国人民呆在一起。”因此，不论他暗中能够作些什么，或者能够允许他手下作些什么，他是不能公开同德国人决裂的。法国本上当然无法支持地中海彼岸发生的事件。只有两件公开反抗的行动：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想发动兵变的企图，他遭到逮捕，被判了十年监禁；法国航空公司总经理把该公司的飞机派往北非。赖伐尔大为惊慌，生怕他的政府赖以维持的同德国人达成的不稳定404的妥协办法会彻底崩溃，于是一再重申先前的政策，把他不得不献给德国人的东西全献给了他们，力图挽救这种局势。不幸这还不够。11月7日夜间，德国人得到报告说盟军的护航队

进入地中海时，曾建议以他们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为基地的空军支援法属北非。次日上午，赖伐尔劝使维希政府向德国请求这种援助。接着又接受了德国人提出的使用突尼斯机场的要求。但是，11月8日，希特勒要求法国对英美宣战。这是会使德国人息怒的唯一一着，也是贝当始终最不愿意采取的一着。当赖伐尔奉召前往慕尼黑谒见希特勒时，他所能转达的只是对这项要求的拒绝。他可能仍然希望通过谈判而有所收获，但是，德国人却无意谈判了。11月11日，德军侵入了非占领区，同时意大利军队也开进了东南各省。盟军攻入北非的总的影晌是，加强了法国那些主张同德国进行更加全面合作的人的力量。吕歇尔代表巴黎的合作分子宣称：“法国现在同欧洲团结起来了。”他号召法国在反对犹太人、布尔什维克、资本家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同盟的欧洲阵线中占有它的地位。赖伐尔倒没有走得这么远，不过当他从德国回来时，他对部长会议说，如果他们不竭尽全力抵抗对北非的入侵，德国人就会对法国本土实行报复。他补充说：“你可以重新建立一个帝国，但无法重新建立法兰西。”不论有没有法国的援助，德国人在几周之内反正总会重新征服非洲的。诚然，德国的威胁使维希只能在军事联盟或波兰式的命运二者之间作出抉择。但是，德国政府并不认真期待，或者甚至认真希望，法国会“全副武装”地站到他们身旁，这从11月27日的那道命令上便显示出来了。这道命令把法国本土仅405存的一支法国兵力，停战协定规定的部队，加以遣散。

这场危机使维希政府重新分裂。在盟军攻入北非以后的人事变动中，最重要的就是阿布里亚尔海军上将代替奥方出任海军部长。德国人仍旧颇为多余地把魏刚看作抵抗运动的潜在领袖，所以把他送到德国去监禁起来。赖伐尔极力使纳粹分子相信他的忠诚，设法安然度过了这场风暴。的确，这场危机的结果是，使他的地位进一步获得加强。11月17日颁布的第十二号制宪法令就体现了这一点。根据这项法令，贝当把宪法条例以外的一切法律和法令的颁布权都授给了他。

现在同1940年夏天一样，决定性的问题是集合在土伦的法国舰队的命运。在奥方担任海军部长时，他曾力促贝当下令让舰队驶往北非，以防落入德国人手中，但是，这个元帅害怕德国人在法国实行报复，又考虑到战俘的问题。达尔朗在美国人的坚持下，曾亲自要求土伦的舰队驶往北非，但是，看来他不大可能会认真看待这项要求，也不大可能指望会有什么结果。从技术上说，也许迟至11月18日这个时候，土伦的舰队仍有可能逃走，但是，它在土伦的司令官拉博德海军上将受着强烈的反英情绪的支配，他的确很想出海，不过如果他非出海不可的话，那就是去进攻英国舰队，而不是加入盟军去同轴心国作战。

如同在1940年一样，希特勒主要担忧的问题之一是，不能让法国舰队落入英国人的控制之下。因此，他企图安抚维希政府，答应不占领土伦，如果法国人保证不对轴心国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保卫土伦不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国反叛分子侵占的话。其实这只不过是哄骗法国的海军将领们，让他们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已。11月27日，德国军队向土伦直扑过来。根据德·布里农发表的他从阿贝茨那里获得的情报，这一行动的理由是希特勒收到齐亚诺的紧急报告，说法国舰队即将驶往北非。这是一条典型的玩弄权术的奸计，目的是要使土伦的舰队脱离法国人，从而夺去维希所能打出的最后一张王牌，使它再也不能企图在德国人面前同意大利争宠了。如果406原来的打算

是这样，那么它倒是成功的。据阿贝茨说，是凯特尔向希特勒陈述了这一情况后，他才下令进攻土伦的。

这次行动是希特勒多年所抱希望的必然结果，也是在付诸行动的几周前早已精心筹备好了的，所以尽管这篇故事很详尽，其实却不需要用如此复杂的解释来说明。德国人最初的让步是在土伦四周划出一小片自由区。接着便坚持这一地区只应由海军驻防，这就是说只应由大约四千到五千人驻防，这支部队根本不可能确保它的安全。11月27日清晨4时30分，赖伐尔收到希特勒的一封信，宣布要占领土伦。赖伐尔把当时在维希的海军将领们召来开会，过了一会，便向上伦发出了这道命令：“应避免发生任何事件，所有以前盼命令都完全失效。”这道命令发得如此迅速，以致赖伐尔和海军将领们不可能设想以前发出的破坏命令竟会已经执行了。这道命令是暗示他们知道有过破坏舰队的命令，并且暗示愿意取消这些命令，使舰队落入德国人手中。但是，已经太迟了。德国人向该港的突击是迅疾的，但还是不够迅疾。两年多来，达尔朗下达的破坏舰队的命令一直被严守机密地保持下来。就在最近的11月8日，奥方还重申过旧令。现在，它们生效了。当法国海军的最后一支大舰队——甚至比德国机械化部队横穿土伦飞驶而来还要快——沉向海底时，一声接一声的爆炸为它引以自豪的舰艇敲着丧钟。

第四节 抵抗和镇压，1942—1944年

（一）法国的经济情况

1942年11月是维希——“这个貌似忠厚而心怀奸诈，自由放任又吹毛求疵，外表谦恭但满怀自信的维希……民族革命的维希”——真正的结局。当维希政府把它的海外领土一处接一处地丢失掉时，它在法国国内的势力也一天比一天削弱下去，因为它愈来愈多地、最后几乎是完全依靠占领国过日子了。这并不是说德国人想要直接统治法国。如果维希把传统的法国官员行政体系的残存当作法国人民和占领军之间一种缓冲手段（它无疑正是这样），那么，把继续运转的行政机器保留在法国人手里对德国人来说来也是很有好处的。整个大战期间，407除阿尔萨斯和洛林外，法国官员一直掌管着全法国的行政工作——不仅在非占领区，也包括占领区，甚至还包括诺尔与加来海峡。这两省为了军事上的目的是划归冯·法尔肯豪森的比利时军区管辖的。德国占领当局并没有取代法国的行政部门，而是与之并存。首脑是军事司令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1942年2月，冯·施蒂尔普纳格尔由他的更为凶残的亲戚海因里希接任，以便加强日益显得不足的镇压措施。在每一省和每一专区以及较为重要的城镇上部设有德国司令部。维希颁布的所有法律和命令都必须呈请德国人批准。从这一点看来，直到1942年11月为止，两区之间的不同在于，在占领区内，德国军事当局自己直接向法国行政部门发出命令。法国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制造障碍，如果要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只有全部都用德国人来替换他们，这显然是办不到的。最后，德国人的命令只在可能的限度内生效。

在占领期间，德国人主要关心的始终是，对这个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勒索占领费，这笔费用在盟军攻入北非后每天从三亿法郎提高到五亿法郎。在较早时期，德国账户上积有大量的余款，到了1941年6月，德国在法兰西银行中的存款到了六百亿法郎。这对法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但是1942年11月以后，德国占领军的开支和在法国设置防御工事的开支大大增加，于是以提高勒索的数目来偿付。1943年9月

意大利的投降，使德国人可以要求维希把从前付给意大利的钱都付给他们。1944年7月31日，作为油干灯尽前的最后一次勒索，这笔贡金从每天五亿法郎增加到每天七亿法郎。根据德国军事经济研究室的计算，法国缴纳的占领费用如下：1940年为三百五十一亿八千万法郎；1941年为一千零十六亿四千万法郎，1942年为一千五百七十四亿四千万法郎；1943年为一千九百五十九亿六千万法郎；1944年第一季度为四百五十五亿法郎，总数为五千三百五十八亿二千万法郎。

这笔巨额存款被用于各种不同的用途，其中有许多都远远超出了实际占领开支的范围。例如，德国人用它去偿付从法国运往德国的原料、粮食，以及其他产品，偿付所取得的法国证券、所购买的名画和其他艺术品，支付招募去德国工作的工人家属的生活费，提供党卫队和德国海关及税务机关的经费，并且偿付德国人在法国的宣传费用。同样地，从事修筑大西洋壁垒的庞大的托特协会也由法国提供经费。

为了防止法国人援用早先德国人的先例，把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经济防御的武器，占领当局借助于法国当局提供的大量补助金，坚持使工资和物价固定下来。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必然是广泛的黑市，德国人自己设有一些专门负责在黑市采购物品的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反间谍部门负责人卡纳里斯的代表奥托·布兰德尔掌管的奥托局。由于德国武装部队极端腐败，这个局在1943年4月被撤销。黑市在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庇护下继续旺盛，黑市物价的继续上涨使抑低的官价显得毫无效用。不论这些数字是否可信，官方公布的物价上涨率在1939—1940年为百分之三十二，1940—1941年为百分之二十三，1941—1942年为百分之十八，1942—1943年为百分之十六，1943—1944年为百分之十三。工资的增长比官方规定的物价的增长要慢得多，以1939年10月的工资指数为一百零三，9月的零售物价指数为一百零九，到1944年9月，工资指数为三百四十八零售物价指数为二百九十。困苦的情况各地很不平衡，409 在生产的食物不够自身消费的地区和城镇，情况是严重的。由于个人到农村采办食物已是一种普遍通行的方式，又由于有食物黑市存在（当局对黑市是佯作不见的），困难在不同程度上有所缓和。法院始终不把破坏配给条例当作重大罪行处理，对于犯有这项罪行的人只处以些微的罚金。由于有着许多分布在全国的小生产者，国家对食物分配的控制只能获得非常局部的成就。农民随时都可以逃避法律。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甚至会认为逃避法律是他们的本分。至于占领当局，只要自己的利益获得保障，并不真正关心法国人如何处理经济问题。

大战期间法国受剥削的程度可从下列法德贸易的统计数字显示出来。

自法国输出额自德国输入额（单位：百万法郎）

19416, 2333, 907194217, 7957, 519194329, 1888, 370194420, 3884, 630 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德国军队征用的牲畜或私人的采购品。由于法国法郎对德国马克的兑换率定得很低，因而更促进了私人的采购。

德国人除了大量征用法国的原料和工业产品外，还要法国为德国的农业和工业提供工人。到1942年6月为止，官方公布的送往德国的法国工人人数为十五万，实际的人数大概为七万上下，但这只是开头。1942年夏季，他们作了更大的努力，包括贝当和赖代尔在广播中呼吁为德国招募劳工。绍克尔颁布的在占领区实行强迫劳动的命令，在实行中遇到了困难，于9月间作了修改，以换取赖伐尔的一项保证，答应为德国提供十五万名志愿工人。10月

2 日，根据赖伐尔和德国当局进一步达成的协议，德国人答应释放五万名战俘，以换取这些志愿工人。这就是那项著名的“替换”办法。这个办法的实行引起了广泛的骚乱，包括里昂及其他地方的工潮在内。根据 1943 年 2 月 16 日的一项法令，对某一年龄范围内的人 410 实行强迫劳动，包括到德国去服劳役。这部分是因为法国人力短缺，部分则是因为“替换”办法对工人造成了公认的“严重不平等待遇”。这些努力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以满足德国人的无厌的要求。绍克尔还答应希特勒要从西方地区再搜罗四十五万名工人。他没有搜罗到这个数目，但是，据估计，到 1943 年秋，法国工人在德国的全部外国男工中占了四分之一，其中有六十万零五千人 是男性平民，大约有四万四千人 是妇女。

德国人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大，毫不放松，直到没有德国人留在法国来提出这种要求为止。1944 年 1 月，绍克尔要求法国再提供一百万名工人，以每月九万人的比例派往德国。这是异想天开的做法。这种做法对法国经济将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连主管军备和农业的德国官员自身也表示反对，因为它给德国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收获。赖伐尔可以趁机使德国各部门互相子吵以收渔翁之利了，结果在 1944 年，在德国的法国工人总数只增加了几千人。这项庞大的征集劳动力的工作所需要的机构，自然遭到了许多人的逃避和反抗。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为了避免被强迫送往德国而逃跑的工人，是“马基”的主要补充来源。到 1944 年 3 月，绍克尔已在宣称，要想进一步动员劳动力到德国去，只有在强有力的军事措施配合下才有可能。

大战期间，德国在法国征用人力的前后经过用数字来做总结比用文字更好一些。1944 年 4 月的一份德国报告书对法国男劳动力的分配情况作了如下的估计：

(1) 为德国工作的：

(甲) 在德国和在法国共有：

直接工作的 2, 578, 000 (37%)

间接工作的 1, 387, 000 (20%)

共计 3, 965, 000 (57%)

(2) 为法国工作的：411 (甲) 在德国和在法国共有：

3, 008, 000 (43%)

(乙) 只在法国：

3, 008, 000 (52%)

战后法国估计，到德国去的法国工人人数如下：

官方数字 实际数字 1940 年 10 月—1942 年 6 月 150, 000 70, 000 1942 年 6 月—1942 年 12 月 240, 000 240, 000 1943 年 1 月—1943 年 10 月 420, 000 290, 000 1944 年 1 月—1944 年 3 月 25, 000.....此外，1940 年夏，德国还拘留着大约一百八十三万五千名战俘。这个数字减少得很慢。同年年底为一百五十万，1941 年 12 月为一百二十二万五千，1942 年 12 月为一百一十三万五千，1943 年 12 月为一百零一万，1944 年为九十六万。除了已并入德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外，还有因为政治原因被放逐的大约九万五千名法国人，以及十万名犹太人，其中有四分之一是法国人，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妇女和儿童。在阿尔萨斯和洛林，据估计大约有二十万人被强迫参加了德军或准军事组织，再不然就是被迫迁入德国或其他被占领国家。在所有这几类人中，许多人都是

一去不复返了。从 1939 年到 1945 年，法国最终的人口损失据估计为一百五十万人。

（二）吉罗和戴高乐在北非的斗争

当维希在德国经济和军事机器的钳制下越来越无力自拔的时候，北非的法国人正在为团结和独立进行痛苦的斗争。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后，戴高乐和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断绝了同达尔朗的谈判。尽管丘吉尔要求他们不要把他们的分歧公布出来，他们还是在伦敦广播了一份说明这种意见不一的宣言。英国人于是不让戴高乐发表广播讲话作为报复。自由法国一度撤销了他们的广播节日以示抗议。戴高乐派对于盟国承认达尔朗所感到的愤慨必然是强烈的，达尔朗本人大概是想把各派人士都争取到自己周围，他除了任用维希从前的支持者外，还任命 412 阿尔及尔反对运动的领袖为他的政府成员。上文已经讲过，自由法国运动在北非的力量并不很强大，后来达尔朗出乎意外地被他人除掉是另一方面的人干的。

我们已经提到过，法属北非有一股保皇派的舆论，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又激起了自称有权继承法国王位的巴黎伯爵的希望。他于 1942 年 4 月秘密会见了贝当，但是这个元帅不是个君主主义者，也无意牺牲自己的地位让君主政体趁机复辟。盟军攻入北非后，巴黎伯爵向美军司令艾森豪威尔进行试探，也未获得鼓励。他的支持者却没有放弃希望，虽然他们同后来发生的事情究竟牵连到什么程度今天仍不清楚。不过，这里没有必要详细探讨那项至今仍然暧昧不明的阴谋计划，我们只知道这项阴谋导致一个年轻的学法律的法国大学生博尼埃。德拉夏佩尔于 1942 年 12 月 24 日开枪打死了达尔朗。德拉夏佩尔一直同保皇分子亨利·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保持接触。他被仓促地处决了，这使人无法有效地查明是谁唆使他进行暗杀的。但是，看来很可能在亨利·达斯蒂埃的心里至少有这样一套计划，想以吉罗和戴高乐二人的联合为基础，用巴黎伯爵的名义来建立一个政权。当然，把两个将军都包括进去，便很好地表明，如果确实有这样一个计划的话，他们两人都没有暗中参与过。

不管这次暗杀的动机如何，除掉达尔朗就撒掉了法国各种力量将来走向团结的一块绊脚石。自由法国同达尔朗领导的一个政府进行合作是不能想象的，然而，尽管英国和美国有许多人从道义上表示反对，盟国政府已经对达尔朗承担了义务，几乎不能否认它们对他的责任了。同时，达尔朗的强有力的个性和威望也必然使他成为阿尔及尔局势的中心人物。他的消失使北非政府不得不进行彻底的改组。

12 月 26 日，巴黎伯爵曾去要求吉罗宽大处理那个年轻的凶手，但是，后者已在当天上午被处决了。就在那一天，巴黎伯爵劝吉罗支持君主主义事业，并表示自己愿意听候阿尔及尔的帝国委员会调遣，可是他的倡议未被接受。诺盖在北非的法国总督中资历较深，本应接替达尔朗的官衔和职务，但是，他以前效忠维希，名声太臭，盟军攻入北非后，又迟疑多时才转而效忠新政权，所以盟国无 413 法接受他。1942 年 12 月 25 日，戴高乐从伦敦致电吉罗，要求举行一次会议，以建立一个单一的临时政权来统辖法国国内外为解放而战斗的部队。吉罗回答说，现在还不是时候。12 月 27 日，他任命自己为军事和民政总司令以接替达尔朗。伦敦和阿尔及尔之间的分裂显然同先前一样一成未变。

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却决定要作一次努力以撮合吉罗和戴高乐。这是 1943 年 1 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开会的目的之一。他们电邀戴高乐

到卡萨布兰卡去同吉罗会晤，遭到他直率的拒绝。在下一份电报中，英国首相说，他已竭尽所能解决戴高乐同美国之间的分歧，如果戴高乐不来卡萨布兰卡，那么英国政府将以撤销他在自由法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作为继续支持该运动的条件。这一威胁使他来到了卡萨布兰卡。1943年1月24日，拍了一张戴高乐与吉罗当着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的面握手的照片。戴高乐在美英两国强大压力下作了一个姿态，但是，他不想走得更远。自由法国的这位领袖返回伦敦，和他的大多数主要助手一起逗留在那里，而在达尔朗死后，北非过去的贝当分子全都接受吉罗作为他们的领袖。

1943年1月，维希政府前部长和当时驻阿根廷大使马塞尔·佩鲁通，在罗帕特·D·墨菲和美国国务院的建议下，被搞到北非出任阿尔及尔总督，自由法国对阿尔及尔政府的敌对态度就更强烈了。1月间还有一件事也扩大了吉罗与戴高乐之间的裂罅，那就是吉罗拘捕了几个戴高乐的拥护者，其中包括亨利·达斯蒂埃。法属北非当局对曾经参与盟军登陆准备工作的集团表示厌恶，这给自由法国的宣传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点，他们于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1943年2月27日，伦敦的法国民族委员会提出了414一份备忘录，阐明同吉罗和解的基础。他们提出的条件是恢复公民的各项自由权，重新采用共和体制和法律，以及成立一个由戴高乐与吉罗双方代表组成的新的民族委员会。

与此同时，吉罗已在逐渐离开他原来的立场了。他的政治信仰是属于右翼的，但是，他的经济顾问让·莫内极力主张必须作出一种民主姿态以使美国的舆论放心。莫内是从美国来到阿尔及尔的，他在美国一直设法同戴高乐派人士保持友好关系而又不投身于他们的事业。他说服吉罗于3月14日发表演说，宣布1940年6月22日以后维希颁布的法律不再生效，并将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吉罗后来说，这是他有生以来发表的第一篇谈民主政体的演说。种族法律都被废除了，虽然吉罗并不打算做到恢复《克雷米厄法令》的地步。与此同时，贾德鲁将军一直试图在戴高乐和吉罗之间进行调解。这时，吉罗发出函件，邀请戴高乐到阿尔及尔来，虽然显而易见，想让这两个将军并坐在驾驶员座位上的任何企图都可能是一种冒险的试验。对那些在1940年到1942年间效忠贝当的人说来，戴高乐无异于一个叛徒，而戴高乐派人士也对阿尔及尔的人极为怨恨，这从派到突尼斯去的科厄尼和勒克莱尔部下的自由法国分遣队拒绝同法属北非军队的代表一起参加胜利检阅式就表现出来了。自由法国的几支小部队从人数比它们大得多的北非部队中招募兵员一事，也引起了强烈的怨恨。艾森豪威尔以军事安全为理由，曾反对3月底提出的戴高乐应访问北非的建议，但是，5月中旬盟军在突尼斯获胜以后，这项反对就被撤销了，戴高乐终于在1943年5月30日到达阿尔及尔。他此行的目的与其说是来同吉罗合作，不如说是来把斗争推向顶点。危机在他到达后不久便出现了。除了那些想方设法立功赎罪的人外，戴高乐派禁止维希政府的一切人士参加工作，佩鲁通也在禁止之列，他于6月初辞职了。他把辞呈交给戴高乐，戴高乐没有同吉罗商量便自己接受下来。这件事使吉罗忍无可忍了。海军上将米塞利埃自从同戴高乐决裂以后一直是最猛烈地批评戴高乐的人士之一。吉罗这时就任命米塞利埃为自己的参谋，并且不适当地采取了一些预备性步骤，准备宣布戒严。阿尔及尔一些较有理智的人415都没有料到这两位将军会爆发一场个人的战斗，经过了很大的努力后，成立了一个七人委员

会，使戴高乐的战斗法国不再是一个单独的组织了。组成了一个民族解放委员会，由吉罗和戴高乐共同担任主席，国务委员中包括乔治将军和贾德鲁将军。

两主席中每一个都仍然把自己视为法国解放运动的唯一合法的领袖。虽然戴高乐在委员会中获得多数，但是，吉罗有三四十万大军作为后盾，可以认为自记轻易地便能顶住自由法国科厄尼和动克莱尔部下的大约一万五千人的竞争。同时，北非的政府主要仍然掌握在憎恨戴高乐的人们手中。突尼斯战役结束后，长期解除武装、停泊在亚力山大港的舰队终于投到吉罗这边来了。在该港懒散无事似乎已经成了这支舰队司令戈德弗鲁瓦的第二天性。海军以及陆军中的高级军官全把吉罗当作他们合法的领袖。因此，如果吉罗善于加以运用的话，他手中是拥有许多张大牌的，但是，在北非事变中，他一直表现得异乎寻常地缺乏政治才干，结果在两个主席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戴高乐便轻而易举地获得胜利。戴高乐把他的拥护者都安插在一切关键性的职位上。贾德鲁代替佩鲁通出任阿尔及尔总督；皮奥代替诺盖为摩洛哥总督，马斯特将军被确认为突尼斯总督，布瓦松则不得不辞去法属西非总督的职位。

戴高乐的支持者用来取得这些关键性职位的方法激起了美国人和某些英国人的强烈不满。吉罗暂时还能牢牢地控制住军队。他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胜利就是收复科西嘉岛。1943年9月，当意大利投降的消息传到该岛时，阿雅克修立即起义。一支迅速集结起来的部队从北非开来，以该城为桥头堡在科西嘉登陆。岛上八万名意大利军队毫不抵抗。事实上，那个意大利将领还把自己的物资交给法军使用，让他们去攻打单独进行抵抗的一万二千名德国人。这次收复战役进行得很顺利，而且完全是由吉罗和他的支持者一手包办的。阿尔及尔委员会两个主席的关系坏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戴高乐、委员会和戴高乐派的情报机关（中央军事情报局）对这次准备工作都毫不知情。吉罗非常高兴，认为自己这次总算比戴高乐棋高一着，但是，这是一场代价极大的胜利。他的地位本来已经日见削弱，这时戴高乐终于能够迫使民族委员会进行一次改组。乔治将军辞职，吉罗不再是两主席之一了。他仍然是总司令，尽管他对戴高乐的政策愈来愈不满意，尤其不满意戴高乐所认为的在解放事业上必须同共产党人亲密地合作，也不满意委员会对于法兰西帝国前途的意见，这些意见都是他极其厌恶的。

吉罗仍旧保有的声望在1944年3月又因皮舍事件而遭到严重打击。贝当的这个前内政部长1943年5月是凭着吉罗的一封信来到北非的，唯一的条件是他不得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而应该参加一支作战部队。皮舍和吉罗两人似乎都不曾认识到，在皮舍是维希政府的成员时，他的种种作为已在人们心里激起了憎恨情绪，这真是异常缺乏政治头脑的表现。共产党人特别仇恨皮舍，而在阿尔及尔，共产党的势力很强大。战争初期，大约有二十七个共产党领袖被拘禁在这里，现在全都获释了。他们认为皮舍本人应对德国人挑选共产党人作为要处决的人质一事负责，因为德国人自己对于法国共产党工作人员的情况不会如此了解，知道该挑选谁去处决。皮舍在受审时提出说，那些投靠纳粹的前共产党人可以很容易地提供这种情报。两种见解似乎都有一些道理，但是，没有一种能够加以证实。然而，业已查明的是，当皮舍任部长时，他确曾采取强硬手段对付共产党人。对他们说来，他当然是一个危险人物。后来落到战斗法国手里的一份他在1942年10月写给贝当的报告，就充分证

明了这一点。这份报告宣称，法国决不能希望德国在东方战败，因为这将使它失去抵挡俄国威胁的唯一屏障。他又说，法国同样不希望盎格鲁撒克逊人打败德国人，因为这只是意味着重犯 1918 年的错误。因此，法国的目标应该是使德国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达成一种妥协的和平。皮舍倒霉 417 的是，他的死亡却成为戴高乐巩固他同共产党人联盟的一种有用的手段。而且，这还可以表示他决不同维希的人士妥协。经过共产党在阿尔及尔大肆鼓动了几个月后，皮舍于 1944 年 3 月被提交审讯。他被判死刑，就地枪决，吉罗始终不曾作过任何有效的反对。

戴高乐和吉罗的最后破裂发生在对特务机关的控制问题上。两个互相竞争的组织，苏斯戴尔领导的从伦敦迁来阿尔及尔的中央军事情报局和罗南将军领导的北非部队的特种工作处发生了冲突。他们正是通过这两个组织而同法国国内抵抗运动保持联系的。1942 年 11 月停战协定规定的部队解散后组成的武装部队抵抗组织是支持吉罗的，虽然其他一些组织大都同戴高乐有联系。法国国内抵抗运动对谁效忠这一点在解放的时刻显然一定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戴高乐最不能容忍在这方面有人同他竞争。为了遏制吉罗想维护他对国内秘密运动的影响的努力，这时由戴高乐派支配的阿尔及尔委员会要求他放弃总司令的职位，另派给他监察总长这一有名无实的位置。吉罗没有接受这个职位，并且看到自己的势力已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他在 1944 年 4 月退休了。当吉罗的势力日见衰退时，共产党的势力却在不断增长。共产党人在法国国内和国外的抵抗运动队伍内部进行了隐蔽的斗争，以夺取对整个运动的控制，同时又保存他们自己部队的独立性。圣但尼的共产党众议员格勒尼埃于 1943 年初从法国来到阿尔及尔，他带来了法国国内共产党正式支持战斗法国的保证。戴高乐看到有可能打出俄国这张牌来对付美国人了。事实上，俄国于 1943 年 8 月（在所有其他盟国之前）便承认阿尔及尔委员会代表法兰西共和国了。

华盛顿对戴高乐的野心仍旧深感怀疑。1943 年 6 月罗斯福致电艾森豪威尔说，美国政府“不能容忍由任何不受盟国最高统帅指挥的机构控制法国军队”。这种坚持 418 持统一指挥的意见可以用军事上的种种考虑作为理由来加以辩解。总统进一步说，“并且，对于组成任何政府或委员会，擅自以任何方式表示，直到法国人民自行选择一个政府以前，它将统治法国，我们都不感兴趣。”这种议论不仅反映出戴高乐在华盛顿所激起的那种对他个人的敌对情绪继续存在，而且也反映出美国政府对法国形势的看法，这种看法其实在李海和墨菲时期倒要比在 1943 年夏天更为正确些。丘吉尔也对他所谓的戴高乐的“荒谬行为”感到气恼，不过，他希望把戴高乐这个人和他的权力同民族解放委员会及其权力融合在一起后，也许就能扫除美国承认该委员会的障碍。他一方面准备比罗斯福走得更远，把该委员会看作是一个事实上的政权，一方面又决心不走到同华盛顿疏远的地步。丘吉尔那些必须同法国委员会打交道的同僚和下属都不断劝告他，认为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承认来使局面正常化，而他则把这种压力转嫁到罗斯福身上。最后，在 1943 年 8 月的魁北克会议上，他们达成了一项妥协办法。罗斯福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据科德尔·赫尔说，罗斯福曾经讲过，“他不想给戴高乐一匹白马，让他骑回法国，使自己成为法国政府的主人。”不过，他同意英美两国应该各自发表一项声明，用适当的措词给予民族委员会以某种程度的承认。经过长时期的斗争和谋划后，法国的海外属地终于明确地重新参战，并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团结起

来。戴高乐还成了法国国内日益增长的抵抗运动在法国国外公认的领袖。如果说，在不断发展的反对维希和德国人的人士中，各种不同的、对立的倾向已逐渐汇合成一个单一的伟大运动的话，那末归于戴高乐将军的决心和他的强劲有力、不屈不挠的个性的比归于其他任何因素的都更大。在那些同他站在一边的人中，许多方面的人物无疑都有所保留。但是随着进攻法国的日期日益追近，团结一致的需要使最终目标上的种种分歧都处于隐蔽地位了。戴高乐的姓名为各个派别提供了一个集合点，它们之间大相径庭的目标只是在解放以后才重新显露出来。

419 (三) 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

抗德运动的壮大是大战最后两年中支配着法国局势的要点。关于抵抗运动初起时的情况，目前没有什么历史资料。三个较大的运动逐渐从非占领区内日益增多的小型分散的抵抗组织中形成了：战斗，在这个组织内亨利·弗雷内和其他一些陆军军官同包括乔治·皮杜尔在内的天主教民主党人联合在一起；解放，这个组织的中心人物是埃马纽埃尔·德·阿斯蒂埃—德拉维特里，它主要是一个同工会有联系的反法西斯运动；法兰西袭击队，它的成员中有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在占领区内，许多小运动发展成为大运动的机会较少。那里有两个准军事性组织，抵抗者和解放者，但是，占领区内最为普遍的运动是社会主义的解放北方和军民组织，军民组织是从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并且通过戴高乐派的代表雷米同伦敦保持接触。共产主义民族阵线只是在1941年底前不久才出现在占领区里，它在南方的发展甚至还要晚些。在所有这些运动中，最早活动之一是办起秘密报刊。据报道，早在1942年2月，至少有三种秘密刊物的销路都达到一万份。

1942年1月，自由法国派遣从前的县长让·穆兰空降到法国去协调各个抵抗运动。让·穆兰的才能和勇气使他后来成为抵抗运动中的一个英雄。1942年10月，德莱斯特兰（维达尔）将军受命指挥秘密军队。11月27日，由穆兰、德莱斯特兰、弗雷内（战斗）、德·阿斯蒂埃（解放）和勒努瓦（袭击者）五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第一次在里昂开会。成立了一个空军和海军军事行动部，并任命了一些地区领导人和委员会。1943年3月，成立了联合抵抗运动，中心设在里昂，后来改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在1942年底和1943年初，自由法国才能同占领区的抵抗团体建立有效的联系，但是，在1942年11月德国人进入非占领区后。抵抗组织没有理由再留在南420方，而巴黎的便于隐藏的有利条件使抵抗组织愈来愈集中到了那里。1943年5月，全国抵抗委员会在巴黎开会。第一任主席是穆兰，6月间他被逮捕后便由皮杜尔继任。这个委员会在解放以前没有再开过一次全体会议，但是，它的执行局制订了一个统一行动的纲领，并开始协调抵抗活动。随着抵抗运动的发展，德国大的镇压措施也日益加强，不过，他们的措施始终没有完全击中要害，因为纳粹分子疯狂地把心思全用在反犹太主义上。犹太人不管是否与抵抗活动有牵连，一律被挑出来作为人质处决。德国人的支持也给了法国的反犹分子一个机会，在1941年和1942年间，马赛、维希、尼斯、巴黎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会堂都遭到炸弹袭击。然而，除了在专门职业和行政人员方面采取限制犹太人的措施以外，法国当局始终不肯实行德国人所希望的那种极端的反犹措施，尽管在1941年3月成立了一个由捣扎维埃·瓦拉领导的犹太人事务委员会，而皮舍则设置了一个犹太人问题警察局。法国政府对反犹运动的

支持是很松弛的。1942年1月，达尔朗致函德国军事司令官说，倘使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就可能会使舆论界深受震动。图卢兹大主教萨利埃热阁下和其他宗教界领袖都为反犹运动的更加凶恶的发展而提出抗议。但是，到了1942年10月，在德国人所要求的五万人中，还是由非占领区交出了大约一万名外籍犹太人，他们被德国人押送到东方去。赖伐尔在德国人的压力下，于1943年6月同意通过一项法律，剥夺1927年以后所有犹太人取得的法国国籍，但是，贝当始终没有签署这项法律，所以它也没有在《公报》上发表过。在占领区，德国当局可以比较任意地实行他们的迫害措施。从1942年5月起，他们强迫犹太人佩带黄星标志。1942年7月，巴黎发生了对犹太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捕，大约有九千人在骇人听闻的情况下被集中到冬季赛车场里。1942年8月，在维希教育部长柯贝尔·博纳尔的赞助下，在巴黎大学设立了犹太教历史讲座。1943年底以后，德国人开始实行反犹措施，根本不顾法国的法律。当然，许多犹太人都受到法国一些人家的庇护，而在意大利占领区，他们则受到保护，没有遭到德国人迫害，并且遇有必要时，还受到保护，没有遭到法国警421察的迫害。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意大利退出战争时为止。接下来德国人占领了西南几省，把在那里避难的犹太人都围捕起来。在占领后期，法国民团和极端主义的党派也狂热地参加迫害犹太人。1944年2月，法国当局不得不提出一份所有剩下的犹太人的名单，包括外籍的和法籍的。最后，巴黎的警察奉命逮捕仍然隐藏在巴黎的犹太人，但是，他们拖延了很久，没有执行这项命令，因此这项命令始终没有生效。

从任何合理的观点看来，在法国迫害犹太人的全部惨史是一种荒谬的不对题的行动。它只达到消耗德国人精力的目的，而这些精力本来是可以用于更为有效地镇压法国抵抗运动的。的确，费尔南·德·布里农声称，使德国人在挑选人质时不选法国人而选外籍犹太人是他的功劳。德国人在进行镇压时受到维希当局一定程度的协助。维希建立的警察和法庭等机构最初是为了自卫，后来日益转而为占领国服务了。据一个非常活跃的法国特工人员说，德国特务机关的工作效率是被大肆夸张了，要是没有法国人的合作，他们不可能在抵抗运动的队伍中造成那样大的破坏。而且，严格他说来，力求进行镇压的也不仅是那些合作分子。莫拉斯还在《法兰西行动报》上同戴高乐派，即武装的游击队，进行他自己私人的战斗，他说，对这种人，法国军队有权一抓住就枪毙。他极力主张，如果死刑还不足以便这些人就范，就应该在他们的家属中逮捕人质，予以处决。为了搜捕抵抗运动，成立了“别动队”，其中警察署长达维德的别动队尤其臭名昭著。在德国最高统帅部方面，它拥有谍报局、战地秘密警察和战地宪兵队。尤为可怖的是在卡尔登勃鲁纳指挥下的纳粹党的保安处。随着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监禁、放逐、严刑拷打以及枪毙人质等也日见增多。

在镇压工作中，法国方面提供的最有效的协助来自约瑟夫·达尔南。他于1942年在阿尔卑斯海滨省建立了战斗人员军团的一个准军事性组织——军团服务处。1943年2月1日，这个组织从军团中分离出来，成为法兰西民团，由达尔南任秘书长。这一改变的结果是，把这个组织从隶属于贝当变为隶属于政府首脑赖伐尔。1943年夏天，达尔南奉命率领一小队法国武装党卫队去东线作战，不过，他还是在法国对德国人更为有用，因为民团的头目都参加了武装党卫队，民团已经成为德国镇压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了。1944年1月，达尔南被任命为负责维持治安的秘书长，他以这个身分参加了部长会议的例

会。尽管他智力有限，他的权力却迅速增大，虽然他对于最终获得的职位几乎不能胜任。1944年1月颁布的一道命令还授权建立由警察控制的军事法庭，执行即决裁判。在审讯达尔南时，他对民团所犯的日益增多的暴行供认不讳。他解释说，他的新职务工作过重，无法有效地控制民团的活动。然而，民团只不过是继续遵循他定下的方针办事而已。他把民团搞成了一个比党卫队本身更为可怕、更遭人憎恨的镇压工具。尽管遭受损失，抵抗运动却增强了实力，加剧了破坏措施，这部分地是为了使盟国相信，在法国国内开展活动比战略轰炸更力有效，而法国人的生命损失也比较少。因此对法国火车的空袭有所缓和，抵抗运动对铁路进行了广泛的破坏活动。抵抗组织还为逃避去德国强迫劳动的人提供伪造的身分证和定量配给证，并且安排盟国士兵和空军人员逃出法国。全国逐渐建立起一个情报网，这些情报组织往往各自独立地工作，为自由法国中央军事情报局，即原来设在伦敦的戴高乐运动的第二局搜集情报，也为英国情报机关搜集情报。在占领的最后两年中，秘密出版物有了惊人的发展。随着抵抗运动的日益强大，在报刊上讨论问题的可能性也更大了，于是党派政治也重新恢复了。共产党一方面致力于组成一个把各种不同意见都包括进去的民族运动，并且通过斗争取得对这一运动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决定把自己的组织民族阵线单独保存下来。共产党人成功地在全国抵抗委员会中取得了强有力的地位。除了在战斗的抵抗运动中具有影响以外，他们在1943年5月还控制了赛扬领导下的法国总工会，一个统一的、经过秘密改组的工会组织。为了从智力和精神方面巩固他们地位的基础，他们着手改写1939—1940年的历史。1943年11月，共产党出了一本小册子，阐述他们对于法国沦陷的新见解，其中宣称：1940年，法国在孤立和被出卖中沉沦了。……共产党人在这四十天悲惨的日子里做了些什么呢？这场战争的技术条件决定了保卫大城市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共产党人作为一个政党，采取了一项或许可以改变战争进程的行动，他们提议团结群众，保卫巴黎。……在法兰西这一战役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是军队中抵抗力量的核心。这一颇富想象力的文件在盟军登陆以后又以《1940年6月6日到1940年6月18日》为题重新出版，还附有一份改订过的年表，其目的显然是要证明共产党号召大家抵抗德国人比戴高乐大约早十二天，而不是在大约十二个月后才跟在戴高乐后面号召抵抗的。但是，尽管他们在根本上互相竞争，戴高乐派和共产党的组织却逐渐承认彼此都是法国国内外抵抗运动的各个派系中最强大的。为了打败德国人，他们暗中结成了联盟，不过，每一方都不打算被对方完全束缚住手脚。

抵抗运动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是1943年9月解放科西嘉岛的战斗。用小队的武装人员进行抵抗的这种新形式，名为“马基”，就是从科西嘉岛传来的。德国强征劳工的机构是“马基”最大的招募中心。在法国一些荒僻无人、正好藏身的地区，尤其是在中央高地、法属阿尔卑斯山区和汝拉，人们成群结队地逃避劳役的征召，钻进了森林和山区。这样便产生了“马基”。它的成分当然是鱼龙混杂的。当它不能在居民的同情下得到它所需要的东西时，它往往强行夺取。它的第一次战斗（不是在地方上进行抢劫）于1943年7月发生在上萨沃伊同意大利部424队作战。1943—1944年的冬季，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战斗，特别是1944年2月到3月间在格利埃雷高原上，当时一支大约有五百人的“马基”战士几乎全被一支一万二千人以上的德国部队消灭了。1944年盟军登陆以后，中部和南部爆发过多次不成熟的起义，其中最重要的一次

是在维尔科，德军在一场激战中全歼了“马基”。“马基”在空投武器的支援、并在蒙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使大量占领军不能开赴前线，使他们的士气进一步低落。这是一场毫不留情的斗争，德国人常常枪毙人质，有时还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规模屠杀。例如，1944年6月10日，党卫队的帝国师就在奥拉多尔絮格朗的教堂里烧死了大约六百名妇女和儿童。到盟军登陆时，抵抗运动已成为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1944年2月1日，抵抗运动原有的各种军事组织联合组成了法兰西国内军，科厄尼将军被任命为军事代表，负责协调国内军与盟军的行动。制订了在盟军进攻的海滩后一大片弧形地带内进行破坏和切断交通的计划。成队的法国、英国和美国军官带着军需品，空降到达法兰西国内军中。

尽管有了这些合作的措施，在登陆前夕，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法国抵抗运动的军事价值仍然没有什么信心，对自由法国为法国提供一个临时政府的能力也没有什么信心。美国人认为，每解放法国一个地区后，就应交由盟国官员管理，他们将负责维持治安，管理地方，直到法国全面解放，全法国人民可以自由进行协商时为止。美国军官奉令将来在法国解放区担任行政官员，进攻部队在法国使用的纸币没有同法国民族委员会磋商就印好了。甚至任命科厄尼将军为法兰西国内军司令一事也未得到盟军的承认。但是，要想阻止戴高乐去前线视察是困难的。6月14日，他到了贝叶。当他返回时，他留下了两个代表负责解放区的行政工作。这还只是个开头。盟军最高统帅部大吃一惊地发现，一个新的法国行政机构竟然从它的脚下冒出来了。既然美国人在法国同法国人有了直接的接触，他们终于发现了戴高乐派感情的力量。这个国家早已把戴高乐的姓名同解放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任425何不是以他的名义建立的其他政权，都是不能想象的。盟军最高统帅部在事实面前屈服了，它承认了科厄尼将军的地位，并且接受了由民族解放委员会任命去接管这个国家的行政工作的代表。

凡是在德军撤退后，盟军立即向前推进而法国民族委员会也立即派出代表的地方，权力的移交就比较平稳。但是，在法国有些地方，特别是西南部，从德军撤退到戴高乐的代表到来，总要相隔很长一段时间，于是在这段时间里，法兰西国内军，尤其是共产党的法兰西袭击队与游击队，便能在地方上夺取政权，并建立一种暂时性的恐怖统治。

与此同时，法兰西国内军由于吸收了不断涌来的志愿参加者而扩大为一支正规军，它正在开始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当美军在阿旺瑟突破以后，大约有八万人在布列塔尼从事肃清该省残敌的工作。在战斗迫近巴黎时，文森豪威尔的作战计划就考虑绕过市区前进而不作正面攻击。巴黎的德军司令冯·肖尔蒂茨将军也同样急想避免一场巷战和因此而造成的不必要的破坏。赖伐尔在离开巴黎时，把权力交给了一个合作分子，市政委员会主席。据此人说，冯·肖尔蒂茨暗中商定逐步撤走他的部队，不枪杀人质，并且不进行不必要的破坏。与此同时，铁路工人于8月10日开始罢工，其后一周内，驱逐德国人的热潮遍及巴黎全市。市内市外的抵抗运动领袖们都急想抢在盟军成立一个行政机构之前，自己解放这座城市，以恢复法国的威望。8月18日，共产党人四处张贴告示，号召巴黎拿起武器来，这是一个决非没有政治考虑的举动。共产党1940年的夺取政权的计划是立足于法国战败而制订出来的，结果未能成功，可是在1944年，它的目标是要抢在胜利前面，这就可能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了。在巴黎挺身而出那几千人遭受了重大的伤亡。唯一

真正有组织的力量是巴黎警察，他们在这场斗争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德国人在剩下的那一点时间里仍然有可能粉碎这场起义，摧毁这座城市。巴黎逃脱了这种命运，是因为冯·肖尔蒂茨在阿贝茨的默许下没有听从下达给他的命令（希特勒命令他毁掉一切）。通过瑞典领事诺德林的调停，缔结了一项停火协定。法国和德国的广播车周游 426 全市，宣布在巴黎境内停火，本来只是零星的和局部的战斗便停止了。但是，冯·肖尔蒂茨（他在德国的家属将因为他公然违抗命令而遭殃）只准备把巴黎交给正规部队。幸好盟军最高统帅部这时已授权勒克莱尔师进军巴黎，于是冯·肖尔蒂茨于 8 月 25 日代表德国驻军签署了投降条款。第二天，戴高乐进入巴黎，他在无法描述的热情场面中步行走过香榭丽舍大街，终于同在法国国内战斗了那么久的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会合了。奥方海军上将取出贝当很早以前签署的一份文件来，希望成立一个和解政府，但是，戴高乐一向就不是一个肯和解的人，他对这一提议置之不理。他对法国有约在先，绝对不同维希达成任何谅解。国内外的抵抗运动现已汇合在一起了，于是法国从解放的时刻起便有了一个政府。

（四）维希的最后一年

这时候，处于占领国的压力和法国国内抵抗运动与国外盟军的打击的两面夹攻中的维希政权已经渐渐土崩瓦解了。在贝当这个姓名提供的延续不断的外表下，这个政权从 1940 年到 1944 年一直就处于几乎是不断在变动的过程中。一个集团接着一个集团退出了力量悬殊的斗争，或是由于德国人的反对而被撵走。贝当自己的态度却是在 1940 年就已确定了，直到最后基本上仍是没有什么改变。在审讯他时，有一个证人说，他的一成不变的主张是，认为他的任务在于“尽可能使占领的严酷状况减轻一些，使自己成为占领者和法国人之间的一种盾牌”。在这整个时期中，德国人一直威胁说要迫害法国战俘，以此来对他进行讹诈。当他的合作者在德国人的压力下，或是由于他们自己变节或失望，一个接一个离开他时，他的地位变得日益孤立了。唯一的自始至终追随他的顾问就是他的侍从医生梅内特勒博士。这个人虽然没有担任官职，但是，人们公认他对贝当具有颇大的影响，在德军占领的后期尤其如此。

同这位元帅并起并坐、彼此都身不由主地被一种勉强的同盟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就是皮埃尔·赖伐尔。也许，贝当并非不愿意有他这个眼中钉来当政府首脑吧，因为这样一来，那种由于必然是不得人心的局面所召来的冲击便会落到赖伐尔头上，而不会落到他这个国家元首的头上，是不是这样呢？他自己每天在维希可以不带警卫，安静地散步，而赖伐尔却不得不在严密的保护下才敢外出，贝当是否因此而感到难受呢？赖伐尔虽然在舆论界信誉扫地，他仍能保住官职，那不过是因为德国人找不到一个比他更为有用的人来代替他，或许也因为在四面八方树敌过多，丢掉官职，他就毫无希望了。他死心塌地投靠德国人，同他们合作，他已经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了。而且，凭他的阴谋家的名声，人们定会以为他圆通善变而不太固执，其实他倒是比较固执而不太善变的。直到极晚的时候，他似乎还几乎令人可怜地坚信德国人在欧洲是不可战胜的。他也有勇气，并且对自己凭着聪明机警在最后一刻能够摆脱任何困境的本领具有几乎不可压倒的信心。等到不可能再相信德国人必定胜利以后，赖伐尔有一度曾经浮泛着一种幻想，以为他可以在敌对势力当中起一个中间人的作用。阿贝茨说，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新的塔莱朗。1944 年春，他还向德国人建议，由他出面充当德国人和盟国之间的“诚实的

掳客”。6月间，他曾经计划通过马德里建立联系。他甚至企图在德国和苏联之间发起外交谈判。交战国中没有一国要他来调停，他的这些花招都毫无所获。

1944年的事态就这样打贝当和赖伐尔身旁掠过，撇下他们走投无路地在维希的死胡同里挣扎，设在那里的所谓政府显然逐渐变得愈来愈没有价值了。维希政府仰承占领国的鼻息已经太久了，这时已不能对它作出任何反抗。德国人从头到尾（虽然最后更露骨些）始终能从维希得到他们实际上有可能得到的一切，如果他们充分粗暴和坚持不让的话。当德国人在狼吞虎咽猎获物时，巴黎那群走狗就更加迫不及待地在一旁逗留不散，准备扑向那具在迅速减少的残骸。这群走狗对维希的挑战由于他们之间的争斗，又由于德国人知道下列两种情况而削弱了。德国人知道，大多数法国人民对巴黎的合作分子比对赖伐尔更为憎恶，知道如果硬把他们塞进政府，那很可能就此会使贝当垮台。如果他们不是那么腐朽败坏，他们本来是可以在法国形成一个亲德政府的合适的支柱的，因为他们已彻底接受了纳粹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这428些走狗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强了赖伐尔的地位，因为赖伐尔至少还可以起着一种放在法国和这些人的统治之间的障碍物的作用。然而，即使这种辩解也不是一直适用的。巴黎的合作分子为了要捞得一官半职，冒险押了那么大的赌注，结果却一直没能到手，他们那种怨恨情绪在1943年5月德·布里农送给戈培尔的一份报告中便流露出来了。德·布里农抗议说，第三共和国的那帮人和他们手下的喽罗依然盘踞在县政府、市政府和大行政组织的职位上，这就是何以德国胜利的现实简直不大被人认识到的原因。他极力主张必须信任那些甚至早在战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忠于德国理想的领袖们。1943年9月，戴阿、达尔南、吕歇尔和其他一些合作分子提出了一份国家复兴计划，主张按国家社会党的榜样建立一个以一党为基础政府，并同德国结盟。他们的煽动使贝当那些顾问惊慌起来。他们说服贝当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结果使贝当同德国人的关系又发生了一场危机。1943年11月，根据吕西安·罗米埃（贝当对他的信任并不超过对其他任何人）的建议，他起草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万一他在新宪法生效以前死了，就把他的权力移交给国民大会。同时，他准备了一篇对法国人民的广播讲话，其中他准备宣称：“今天，我就是法国合法政府的化身。我打算把它作为一种神圣的委托保持下去，在我死后把它归还给我从它那里接受这项委托的国民大会。”他把这些秘密策划的措施通知了赖伐尔，因为赖伐尔并不认为自己是可以被他人如此轻易地撇在一旁的。赖伐尔向德国人报告，德国人就立即采取行动，占领了维希电台和官方的印刷厂，并查禁了该项宪法法令和那篇讲话。贝当所能做的只是暗地里印发了好几千份。

稍事拖延之后，德国人作出了更为强烈的反应。12月4日，阿贝茨给维希带来一封里宾特洛甫的信（日期是11月29日），信中严厉指责贝当缺乏同德国合作的诚意，并且要求今后一切立法建议应先提交德国政府批准；429委托赖伐尔负责“在确保合作的基础上”改组法国政府；信尾含糊地威胁说，如果法国政府无力在法国维持秩序和正义，德国政府将不得不自行采取措施以保护其利益。贝当再次作了让步。罗米埃辞职，阿贝茨还要求允许戴阿、昂里奥和达尔南参加内阁。在这些人中，昂里奥是巴黎电台的大明星和反布尔什维克十字军中最有才华的演说家。达尔南这个得过很多英勇勋章的有胆量的军人，是专门从事反马克思主义战斗的人，元帅对他并非全无好感。赖

伐尔对多里奥和戴阿又害怕又憎恶，对达尔南倒不十分猜疑，他觉得达尔南可能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他倒的确是如此，不过，是德国人的工具而不是赖伐尔的工具。马塞尔·戴阿过去是议员和新闻记者，曾在《事业报》上为组成一个法兰西国家社会党进行过一场激烈而有手腕的宣传运动。在那场运动中，他曾不断攻击维希，因此很使贝当反感。在这一点上，赖伐尔至少是赞同贝当的，因为戴阿是个可能代替他当政府首脑的人选。因此，赖伐尔协助元帅把戴阿排斥在外，但是，德国人强行指定的其他人事变动都被接受下来了。为了确保元帅不会再次企图把占领国所不同意的任何意见付诸实施，新指派了一个名叫冯·伦特-芬克的人来当“看门狗”，经常监督他的言行。

1944年1月组成的新内阁说明维希已被巴黎的合作分子确切无疑地征服了。赖伐尔仍然是政府首脑——同贝当一样，而且可能动机也并非完全不同，他始终没有想到要自动辞职。这届政府中包括卡特拉（负责财政）、德·布里农（驻巴黎大使和政府代表）、昂里奥（情报）、达尔南（保安）、阿贝尔·博纳尔（教育）、比歇隆（工业与运输）、马里翁（政府首脑的国务秘书）、格拉塞（卫生）、海军上将布勒奥（海军）、比杜将军（陆军）和勒穆瓦纳（内政），看来是可以保证毫无保留地推行全面合作的政策了。从这时起，贝当便不再出席部长会议。

甚至戴阿也没有被一直排斥在外。2月间，冯·伦特-芬克再次提出要他参加内阁，于是3月16日，他被任命为劳工与民族团结部长。昂里奥和达尔南部以不同的430方式对德国政府大为卖力，戴阿却很令人失望。他的热病似的活动在从政中见效不大，虽然他一直不停地鼓吹要增加权力，也一直不停地进行倒赖伐尔的工作。他把极端合作分子都纠集到自己后面，还能利用海军上将普拉通，这时他已经完全陷入合作分子的政治活动中了。但是。普拉通曾被描绘为“简直是天生缺乏政治头脑”的人，赖伐尔轻而易举地使用计谋击败了他和戴阿。

1944年4月，德国人准许贝当去访问巴黎，出席为盟军轰炸死难者举行的一次追悼仪式，这表明德国人确信贝当这时已经完全在他们控制之下了。这次访问虽然没有公布，但是，元帅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却使德国人惊恐。他们坚持要他在4月28日广播一篇拖延已久的讲话，使法国和德国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联系在一起。那段经过多次讨论才商定的实质性措词宣称：“多亏德国和欧洲共同的努力，保卫了我们的大陆，我们的文明肯定已获得保障，不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等到当前这场悲剧结束了，法国恢复元气，进一步确定它的地位的时刻就将到来。”这篇讲话在法国起了灾难性的影响。德国人显然不能认识到，他们越是迫使贝当和法国内阁公开出面支持他们，他们就越使这些人在法国丧失影响，这些人可能具有的用处也就越小。不过德国人在法国推行的政策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始终不是绝对的）迫于形势，已开始完全消失了。德国人拿不定主意，内心十分惊慌，唯恐贝当呆在维希会落入“马基”的手中，因此把他迁移到朗布依埃附近的瓦松城堡去。然后，他又获准作另一次旅行，这次是到鲁昂去庆祝圣女贞德节。这次旅行，象上次访问巴黎那样，在德国主子看来是一次出色的反英宣传。鲁昂给予他的热烈欢迎，象巴黎那样再次使德国人感到惊恐，于是决定把他送回维希。一路上，他仍然受到盛大的接待，并在南锡、厄比纳尔和第戎都临时讲了几句话，大受人们赞扬。在期待已久的盟军进攻发生前几个月内，维希的历史似乎经历了一段假死的时期，虽然抵抗和镇压之间的431斗争并未

稍松。1944年5月，一个同抵抗运动有联系的高级官员的组织“超级胜算”被破获了，逮捕了十四个县长，四个区行政长官，以及内政部国务秘书勒穆瓦纳。尽管有了这次震动，德国人还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仍旧可以指望维希。当盟军于6月6日开始登陆时，维希广播了一篇贝当的讲话，这是3月17日在冯·伦特-芬克的压力下录音的。它要求全体官员坚守岗位，要求法国居民服从政府，维护秩序与纪律，并接受德国人在作战地区发布的任何指示。赖伐尔也广播了一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宣称：“法国并没有参战”，同时力主法国人保持中立，不要再用内战的恐怖来加重这场外来的战斗。抵抗运动对这项请求的答复上文已经提到了。

盟军发动进攻时，法国确实已处于内战状态中。自从1943年以后，在法国袭击个人的事件据说每天合计大约要发生一百起。这些袭击事件的责任何在，并且实在说，它们的动机何在，都并不总是容易搞清楚的。德国人、民团、共产党人、非共产党的“马基”，各有各的敌人，况且私人抢劫的机会也并不缺少。民团杀害了两个比较知名的政治犯——从1940年以后一直被拘禁着的社会党政治家让·泽和芒代尔——对方也暗杀了菲利普·昂里奥，这种日益加剧的紧张气氛从这些事件中有了比较非同一般的表现。德国人在民团的帮助下，加强了恐怖活动，虽然这时候用这种方法来进行统治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正象阿贝茨指出的那样：“采用枪毙法国官吏等这类严厉措施并无用处，这只会把居民更快地赶到‘马基’那方面去。”

民团对于昂里奥的遭到暗杀，干出许多新的暴行来进行报复。这次暗杀刺激了极端合作分子，使他们在1944年7月3日发表了一份宣言，极力主张必须使舆论振作起来，因为盟军登陆的威力和俄国攻势的进展已使人心动摇。宣言声称，在德国人以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击溃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前，必须经过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法国大有遭到政府彻底崩溃的危险，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即贝当和赖伐尔）两人都没有表现出应付这种局势所需要的坚定。面对着无政府状态的威胁，法国必须在这场全世界的斗争中立场鲜明。为了使法国的行动有效，432极端合作分子要求把政府迁回巴黎，把“没有问题的分子”引入政府——除他们自己外，还会指谁，就搞不清楚了——并对挑起内战或损害法国在欧洲的地位的任何人严加惩办，包括处以死刑。宣言由阿贝尔·博纳尔、比歇隆、德·布里农和戴阿等部长签名，接下去是普拉通、伯努瓦-梅香、吕歇尔、多里奥、迪歇纳将军和比诺将军，以及一群知名的合作分子新闻记者的妙名。这些人都知道他们的赌注已经全部押在德国的胜利上了。

赖伐尔甚至在盟军发动进攻的初期仍然执迷不悟地相信德国的军事实力，还认为自己资本雄厚，甚至在最后一分钟也无意听凭巴黎的合作分子把他赶下台来。他召集内阁成员于7月12日在维希开会。戴阿不来，但是，其他的叛逆分子全都在场。临开会前几分钟，德·布里农递给赖伐尔一张铅笔写的纸条，由博纳尔、戴阿、伯努瓦-梅香和吕歇尔署名，要求改组政府。赖伐尔于是动手把他们搞掉，把他们的纸条撕碎。船舱里的这群侍者竟然要叛变了，妄图控制这艘沉船，赖伐尔在处理这场荒谬的叛乱时手腕也许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个人要比他的这些同僚们棋高一着。达尔南并没有参与这场反赖伐尔的阴谋，他也是德国人所找到的唯一真正得力的同盟者。6月24日，他被提升为内政部长。

事实不断证明德国人的败局已定，面对着这些事实，连赖伐尔也不能一

直顽固不化下去了。极端合作分子们猜对了，赖伐尔心里正在盘算，是否有可能在最后关头投靠另一边，把法国带过去，将功折罪。当然，法国并不是他想带就能带走的，不过，他是从来就毫不尊重舆论的。他选来作为他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次计谋的工具的就是被拘禁在南锡附近的爱德华·赫里欧。在阿贝茨的同意下，赖伐尔于8月12日去找赫里欧，通知他已获得自由，并把他带到巴黎去。在巴黎，赖伐尔请赫里欧召集国民大会来接过对法国前途的责任，声称他所采取的步骤是根据华盛顿的建议并得到柏林同意的。赫里欧则回答说，召集国民大会是参议院议长的职权。战前的政治家德蒙齐出来干预，声称他代表大约二百五十五名议员发言，他433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们只出席以元帅名义召开的国民大会会议，而不出席赖伐尔所召集的会议。我们很难相信这项复杂的阴谋竟会有成功的机会。总而言之，决心不让它成功的极端合作分子把正在进行的事情向德国秘密警察告发了。秘密警察于是重新逮捕了赫里欧，把他押送到德国去，从而结束了这场阴谋。

德国人这时知道，他们对巴黎或维希都不能再控制多久了，但是，他们决心要把那些在法国为他们效劳得很好的人紧紧抓住不放。8月17日，赖伐尔奉命把法国政府迁到贝耳福去。想溜掉是不行的，也不可能找到一个折衷办法：他生平第一次对德国人送给他的一份最后通牒表示拒绝接受。他用书面宣布他不再行使政府职权，把权力全部移交给巴黎市政会议主席泰坦热。赖伐尔办的最后一件公务是，命令各部的秘书长，或者在没有秘书长时由在任的级别最高的官员，负责主持部务。然后，他带领他的政府中剩余的人员启程到贝耳福去向元帅提出辞呈。据德国人说，贝当已经在那里了。事实上，这是捏造。8月17日这天，德国人也向贝当递交了一份照会，要他和跟随他在维希的全体政府人员迁居到法国北部一个未经指明的小镇去。8月20日，只是在德国人的武力逼迫下，贝当才屈服下来，也动身到贝耳福去。瑞士大使是这个场面的目击者，他写道：“元帅当时的镇静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相信他对当时发生的事情不大了解。”他留下一份给希特勒的抗议书，宣称这一暴力行为使他无法继续行使他作为法国国家元首的特权，还留下一份告法国人民书。

合作分子的队伍现在全部崩溃了。有些人躲藏起来，有些人则慌忙钻进抵抗运动的队伍，在那儿的另一面旗帜下，他们并不是没有继续从事他们的熟练活动的机会。达尔南在法国东部顺利地收集了一支大约六千人的民团，随带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从法兰西银行抢走了一笔钱，在盟军向前推进时，带领他的支持者撤退到德国去。他在那里获准组成一支大约有两千人的“法兰西警备队”。他的另外三分之一的队伍被编成查理大帝旅后，被434派往俄国前线，而剩下的人则被吸收进了德国各种队伍。

对维希那帮人说来，贝耳福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息地。当德国军队被迫后退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了，那些法国部长都被仓皇地送到德国境内济克马林根的城堡去。这出悲剧的最后一幕便在那里上演了。由于贝当和赖伐尔以及一些其他的部长拒绝再履行任何政府职责，里宾特洛甫便邀请德·布里农同多里奥和其他的极端合作分子一起组织一个“全国革命”政府。据德·布里农自己说，他拒绝了。然而，在戴阿的鼓动和德·布里农的主持下，一个维护法国在德国的利益的政府委员会以贝当的名义成立起来（不顾贝当拒不承认）。这样，这些合作分子就在一片外国土地上，在一个自身正在作垂死挣扎的政权的卵翼下，实现了他们经过四年野心勃勃的阴谋和倾轧

想要取得的那个目标的幻影。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阴谋和倾轧也并没有结束。多里奥在距离济克乌林根大约两百英里的地方自行建立了一支法兰西人民党党员组成的队伍，他和其他合作分子的斗争仍在继续着。吕歇尔出版了一种名叫《法丝西》的刊物，还主管着一个叫作“这里是法兰西”的电台，多里奥则从他自己的电台“祖国电台”发出广播，同它对抗。阿贝茨支持吕歇尔，但大多数德国人却比较偏袒多里奥。这场冲突到多里奥被击毙后才告结束。据说他是在去会见戴阿、企图使两个阵营达成一项妥协办法的途中，汽车遭到飞机扫射而丧命的。他的对手们则留在那里占有这片被他们征服的战场。他们在济克马林根等待战争结束，等待他们各自的命运。

第二章自由法国运动，1940—1942年

德斯蒙德·莫顿爵士

第一节运动的起源和发展

（一）戴高乐将军的经历

1934年，有一个只有他的同辈军官那个小圈子里的人才知道的法国陆军上校写了一本书，总结了他自己对于机械化战争的前途的理论。这套理论他几年前在高等435学校以及其他有机会的场合都已经鼓吹过了。这个军官曾经当过贝当元帅的幕僚，元帅读过他的手稿后，答应给他以支持，但是后来看到其他一些军政领袖可能会反对这套理论，他又收回他的支持，并且拒不同作者谈论他改变态度的原因。从这时起，夏尔·戴高乐上校和元帅之间的关系（以前是友好的）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番挫折并没有使戴高乐灰心，他自己负责把《走向军队专业化》这本书出版了。大多数法国专家对这本书不是冷淡地保持沉默就是傲慢地不加重视。如果职业军人们知道德国参谋总部非常重视这本书，在他们的论机械化战争的机密手册中原原本本地引用了这本书，并且把书中的原理具体运用到将来进攻法国的秘密计划里去，那么，他们对这本书的看法可能就会不同了。

在法国的政治家中，几乎只有保罗·雷诺一个人仔细研究了这本书，大体上同意他所提出的理论，并且向戴高乐保证，只要他力所能及，就一定予以赞助。虽然如此，一年后等到戴高乐在巴黎大学发表一系列演说想推行他的见解时，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却掀起了那么强烈的反对，以致上级不得不命令戴高乐停止演讲。雷诺在议会里并通过写文章试图使法国陆军装甲化。他失败了。戴高乐感到很沮丧，他同时代的人大多认为他的军事生涯已经结束了。

1939年战争爆发后不久，戴高乐被提升为准将，后来又提升为一个装甲师的指挥官。1940年德国人在纓斯河突破的初期，他率领该师作战，非常英勇，而且颇具军事眼光。在雷诺的政府倒台前仅仅两个星期时，雷诺派人把戴高乐从战地上召回，邀他担任陆军部副部长，部长则由他本人兼任。戴高乐接受了这项任命，便第一次踏进了法国政界，他立即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反对投降，赞成法国以某种方式在某处地方继续进行抵抗。甚至在法国进行武装抵抗已到了最后绝望的时刻，他还要求给他机会收集残余的装甲部队，由他以他自己的方法亲自指挥，以便作一次最后努力去瓦解敌人的进攻。这也许已经是太晚了；总之，当局没有批准他这一要求。

要了解戴高乐此后所采取的态度，要了解他作为“自由法国”的首脑同其他一些盟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记住他曾在这短暂的法定任期内担任过陆军部副部长这一政治职位。从此以后，他便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军人了。法德停战协定签订后，在抵抗运动的初期，戴高乐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那些英国政治家436和军人，对他心理上的这一点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个疑问。他们的主要目的无疑是利用戴高乐作为一个军事上的集合点，使法国陆军和空军中所有决定继续作战的人可以汇合起来，从而增加盟军手头战斗人员的数量。这种看法上的分歧，在当时也许无关宏旨，但是很可能就是后来许多误解的来由。

1940年6月15日，魏刚向法国内阁报告说，对敌军的有组织的抵抗已经停止了。同一天，戴高乐以法国陆军部副部长的身分飞往英国同英国政府

商讨局势。他宣称，主张法国应在大陆上布列塔尼半岛守住一个桥头堡的建议，在军事上是行不通的，他坚决认为法国应在英国的协助下把尽可能多的战斗人员和武器撤到北非去，从那里继续作战。他建议，英国政府必须作出某种引人注目的行动，或是发表一项引人注目的声明，以激励法国进行抵抗，因此他热烈支持当时正在讨论的那种意见，即建议英法两国人民和两个帝国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

6月16日晚，戴高乐从电话中把英国政府准备向法国提出的建立联邦的建议全文读给雷诺听后，便飞返波尔多，结果却发现雷诺的内阁已经倒台，正由贝当领导的一个内阁接替了。在戴高乐看来，这样一个政府当然一定会反对继续作战的一切意见，而且这个政府除贝当本人外，还包括几个对戴高乐个人公开表示敌意的成员。于是，6月17日，戴高乐对任何人都绝口不谈自己的打算，把先前丘吉尔派来同雷诺联系的私人联络官斯皮尔斯将军送往机场。在公开向斯皮尔斯告别以后，戴高乐趁飞机启动之际突然登上机舱，被带到了伦敦，这一次是既未获准，又未受权。随着雷诺政府的垮台，戴高乐已不再是陆军部副部长了，因此，他不过是个不带兵的现役法国陆军少将而已。法国名义上仍然处于对德作战状态。因此，戴高乐的行动根据各种正规标准来衡量，都是容易遭到那些不同意他的动机的人的攻击的。贝当政府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个根有价值的宣传要点，当然会加以充分利用。

（二）自由法国运动的起源

6月17日下午和晚间，戴高乐同在英国的某些法国427知名人士，如法国驻伦敦供应代表团团长让·莫内和大使科尔贝等商讨在国外建立一个法国抵抗中心的方法。除莫内的副手勒内·普利文外，戴高乐从他的同胞那里没有获得多少支持。然而，6月18日晚，他取得英国政府的许可，对法国人民作了一次广播。虽然自由法国运动就以此时作为正式诞生的日期，但是，戴高乐所作这第一次广播，其内容仅限于表示他本人对法国的前途和德国最终必败的信心。这篇演说尽管敦促所有愿意继续战斗的人到英国来同他取得联系，却并没有宣布成立任何以他为首的协调的运动，也没有（虽然作为一种反对失败主义的呼吁，这篇演说确是洋洋洒洒，振奋人心的）说出几天以后出现在英国各地的招募人员招贴上的这句名言：“法国输掉了一个战役，但是，法国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

直到6月23日，英国政府在接到戴高乐的一封信后，才同意他提出的在英国成立一个法国“抵抗中心”的要求，不过，在承认这一中心以前将保留仔细审查的权利，以避免出现任何看来象是法国流亡政府、法国“民族委员会”，甚至是“解放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虽然如此，在后来的一次广播中，戴高乐便让人知道他已经成立了一个获得英国政府承认的临时性的“法国民族委员会”。这次广播引起了波尔多方面提出激烈的抗议，但是，英国当局并没有公开否认这项声明。相反，戴高乐得到了同法国各殖民地和附属地的驻军司令官进行联系的一切便利，在这些将领中叙利亚的米特尔奥塞和北非的诺盖都已拒绝接受停战协定，前者还发表了公开的宣言。尽管这样，戴高乐从陆军的高级同僚中既没有得到支持，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些人后来都改变了口气，效忠维希了。

6月28日，戴高乐再次接到通知说，英国政府暂时尚不能承认任何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法国民族委员会”或者甚至是一个“抵抗委员会”。这意味着，如果有足够数目的代表法国政治生活的知名人物往后决定同戴高乐

一起，或者反过来，邀请他去同他们一起，那么形势可能是会改变的。英国政府在拒绝承认一个并不存在的法国民族委员会的同时，的确也同意把戴高乐看作是“不论438在何处集结到他周围来支持盟国事业的全体自由法国人民的领袖”，并于6月28日晚间广播了一项表达这种意思的正式声明。

与此同时，戴高乐受权设法争取法国海陆空三军人员和商船船员，以及——这是后来想到的——可能对军事工业有用的民间技术人员。有十万以上的法国人从敦刻尔克撤退到英国来，不过，其中许多人都已经回法国去了。另一方面，从挪威撤出的贝杜阿尔将军率领的法国远征军当时正在英国，人数大约有一万，还有九千名左右的法国海军人员驻扎在阿因特里——主要是在英国港口避难，并于停战以后被英国人扣留的军舰上的人员。这些法国人大多愿意返回法国。作为个人或军事单位愿意集结到戴高乐周围来的，起初只有马格兰·韦内雷上校指挥的外籍军团的一个营（上校本人象许多军阶较高、情愿继续作战的军官那样，改名换姓，从此便被叫做蒙特克拉了），阿尔卑斯猎兵师的一个完整的营和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连。这些部队，加上几百名其他人员，就是戴高乐可以支配的全部兵力。实际上，到1940年6月底，在英国的自由法国部队总数只有三千人多一点，包括四百五十名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和三百五十名空军人员。他们实际上都是手无寸铁的。

6月30日，海军中将埃米尔·亨利·米塞利埃从直布罗陀飞抵英国。他一向在地中海负责法国禁运品的管制工作，总部设在马赛。这个海军将领一知道停战协定已经达成、不可更改时，便立即把他在码头上所能找到的最有价值的货物装上几条商船，由两三艘法国小军舰保护着，起碇驶往直布罗陀，以便把他的小舰队、货物以及他本人交给英国海军调遣。在他到达英国之前，他并不认识戴高乐，也不知道戴高乐所采取的立场。作为一个三星海军中将，他在法国的等级制度中严格他说来要比戴高乐的地位高得多，但是，他在了解了情况后，同戴高乐作出了一项安排，虽然他本人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答应效忠戴高乐，因为他觉得他有权在必要时代表法国海军，而戴高乐则代表陆军。尽管如此，直到他们之间后来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时为止，米塞利埃一直表现得仿佛他把戴高乐当作自己的上级似的，虽然同时也要求把对自由法国海军部队的指挥和管辖权保持在自己手里。

7月3日，英国对米尔斯克比尔法国舰队的攻击439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戴高乐只是在这件事发生前才得到通知。他对这个消息采取了恰当的态度，因此显著地提高了他本人在英国当局眼中的地位。他并不隐瞒自己心头的深切悲痛。这个行动从最好方面讲也会妨碍他自己的行动，而从最坏方面讲，如果波尔多当局利用这个机会对英国宣战，戴高乐和他的所有追随者的处境就会是不堪设想的。他宁愿不去判断这件事的是非曲直，而需要讲明英国事先并没有同他磋商过，因此他同这次行动丝毫无夫。实际上，没有迹象表明这件事对于自由法国运动的发展好歹有什么直接影响。英国人在朴次茅斯扣留的法国军舰上大约有一千名水兵参加了米塞利埃将军的队伍。到7月底，自由法国的舰队已有二十八艘军舰，除了一艘补给成舰外，其余的都是小船，不过完全由自由法国船员操纵着。空军人员慢慢地也集合起来，组成一个轰炸机小队和一个战斗机小队，陆军部队则足以组成一个完整的旅，拥有全部武器及辅助部队。连同总部、行政管理部门和在英国接受训练的新兵在内，自由法国兵力的总数到1940年8月1日大约已有六千人。

（三）1940年8月7日英国政府同戴高乐将军达成的协议

到7月底，对戴高乐来说，短期内的形势已经变得相当明朗，他必须重申一下自由法国运动同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了。于是丘吉尔以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身分向戴高乐致送了一份备忘录，另附一封日期为1940年8月7日的信件，说明倘使戴高乐接受这份备忘录，它即具有一项协议的效力，此项协议将被认为自7月1日起业已生效。戴高乐在同一天用书面作出答复，以不论在何处集结到他周围来捍卫盟国事业的全体自由法国人民的领袖资格接受了这份备忘录。

这份此后被称为1940年8月7日协议的文件非常重要，它是1941年9月法国民族委员会成立以前指导双方关系的基本文件。甚至在1941年9月以后，它的各项条款也并未作废，而是继续生效，直到新的形势使其自440然而地作废为止。这项协议适用于协调同英国政府和当时在英国避难并统辖武装部队的其他盟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英国政府根据这项协议注意到，戴高乐正在招募陆海空军和科技工作的志愿人员，以便把他们组织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些部队将尽可能完全具有法国特性，尤其在语言、纪律、人员升迁和一般行政管理问题上。

他们将有权优先处理一切从法国方面缴获的或以其他方式得到的法国型号的武器装备，不足之数由英国予以补充。这些部队将不用于对法国作战。它们将置于戴高乐的指挥下，而戴高乐则同意接受英国最高统帅部的全面指挥，并在英国最高统帅部的同意下，遇有必要，把其中某些部队交由英国的战地指挥官调遣，只要不要求他们去打法国人。

8月7日的协议还规定了自由法国志愿人员的工资和恤金问题。自由法国运动的全部经费一律由英国负担，英国有权审查和稽核支出。英国政府还答应乐于考虑自由法国志愿人员申请取得英国国籍的问题。这项规定的目的在某些事件上表现得很明显。除了在几件遇到特殊困难的例子外，一般没有援引这项规定。

最后，协议还为自由法国的海军和商船规定了某些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海军部同意同戴高乐而不是同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商定这项安排。米塞利埃接受这项规定，似乎表明他认为戴高乐既是自由法国陆军也是自由法国海军的最高统帅。如果象后来果真发生的那样，他还想维护他最初所要求的独立，那么这种作法是会削弱他的地位的。

海军提议的要点是，法国船只无论是军舰或是商船，441凡是可以由自由法国配备船员的，就是自由法国船舶的一部分，多余的法国船只可以由英国人直接配备船员并加以使用。由于自由法国运动还没有被承认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在公海上从中立国家船只方面或者在中立国家港口内享受相应的特权，所以后来遇到了一些国际性的困难。不过，通过使用各种巧妙的办法，以及特别小心地制定悬挂自由法国旗帜的船只的航线，还是克服了这种困难。

在戴高乐接受这项协议的同时，他还获悉英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在适当时机成立一个法国海外领地保卫委员会的计划，英国政府将同该委员会商讨有关同英帝国合作的经济和防御问题。这件事当时是保密的，后来才透露出来。然而，当时双方都明白，在具有适当的委员人选以前，并且大概只有在同英国人进一步商讨以前，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不会成立的。

双方还商定了若干附属的局部性协议来使8月7日的主要协议生效，这里就不必一一提到它们，不过值得记载下来的是，如果说这项主要协议有任

何缺点的话，那就是它使英国政府负有明确的义务，却并没有同样明确地规定戴高乐所应承担的相应义务，同时它不可避免地会使戴高乐在他自己的组织内部和在全世界的心目中获得了比以前更大的权力。他可以根据法德停战时有效的法国军法和民法惩办他手下的人员，可以在任何时候从运动中开除任何人而无须提出理由。只要他仍然是自由法国的领袖，这项协议就是同他个人达成的。

（四）将某些法国殖民地争取到自由法国运动方面来的经过

一开头，戴高乐和英国政府便一致承认，倘有可能，取得一些自由法国运动可以树起它的解放旗帜的法国殖民领土是很重要的。针对北非的宏伟战略，如果没有一场从内部发动的政变，即使英国当时能够提供有限的支援，这还是戴高乐那支小部队所解决不了的一个难题。从阿尔及尔到比塞大沿海一线部署有相当于十个师左右的法国兵力，还有估计为一百架飞机的空军驻守在第一线。几艘法国战舰在米尔斯克比尔不是被击沉，就是被 442 击坏，或者被隔绝在遥远的海域里，不过，法国舰队的主力当时都集中在土伦。情况已经摆明，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尔是不会参加自由法国运动的了。其中阿尔及尔最为重要，因为根据法国宪法，它是法国本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将近 1940 年 6 月底时，英国政府派出了达夫·库珀和戈特勋爵到拉巴特去，希望通过一些显然有资格代表英国政府讲话的人同地方当局直接接触，可以使他们相信英国将继续进行战斗，还远没有战败。如果摩洛哥或北非愿意脱离波尔多政府的话，他们还受权可以代表英国政府作出某种保证。诺盖将军拒绝接见他们。米特尔奥塞将军显然已经决心为贝当守住叙利亚了。他的参谋长德拉米纳上校逃往巴勒斯坦，加入了自由法国，但是驻叙利亚的法军大部分宁愿支持那位将军走相反的道路。索马里的颇得民心的前任总督勒让蒂约姆与德拉米纳上校意见一致，认为自己至少可以把吉布提团结起来继续抵抗，可是，新任总督热尔曼太顽强，他对付不了。于是，勒让蒂约姆便单独投到戴高乐方面来。在马达加斯加、法属圭亚那、安的列斯群岛以及圣皮埃尔岛，都没有参加这一新运动的任何明显要求，并且无论如何，这些法国殖民地，以及法国在印度的属地和在太平洋的岛屿，都离开战场太远，在作战努力中还会首先考虑到它们。剩下的就是法国在西非和赤道非洲的其他两处大属地了。这两处成为策划和宣传的第一个目标。采取行动的地点选定了达喀尔，虽然宣布支持自由法国的第一处法国殖民地实际上是新赫布里底群岛。这是一个英法共管地，它的法国总督索托于 1940 年 8 月 9 日作出了抉择，实际上得到了整个殖民地的支持。

1940 年 8 月 29—30 日夜间英国和自由法国远征达喀尔的部队从英格兰出发。然而，在这以前，法国在赤道非洲乍得省的驻军司令勒克莱尔上校和该省的总督法籍非洲人埃布埃已决定参加到戴高乐这边来。法属赤道非洲的总督布瓦松不很得人心，他起先采取了骑墙的态度，但是，维希当局及时提出的任命他为驻达喀尔的法属西非总督这个较高职位的提议，使他决心倒向一边。他在 7 月 15 日乘飞机离开了布拉柴维尔，把他在赤道非洲的职权移交给了于松将军。这项任命很糟糕，因为于松显然比布瓦松更加不得人心。这个机会没有被错过，德拉 443 米纳来到布拉柴维尔，开始奔走游说，争取支持，他没有遇到什么重大的障碍。结果是，埃布埃根据同自由法国和英国当局达成的协议，于 8 月 26 日公开宣布乍得省接受戴高乐的命令。两天后，德

拉米纳被拥戴为中刚果的临时总督，与此同时，乌班吉沙里也宣布依附自由法国。几乎在此同时，喀麦隆通过一场大胆而又不流血的政变也被争取过来了。该地的总督布律诺直接对法国负责，他很早便表现出具有同埃布埃一样的精神，受到了维希的警告，说将派安内来接替他。勒克莱尔获悉，只要在杜阿拉显示一下武力，就能解决问题。这时普利文也从伦敦赶来同他会合，以便代表戴高乐在西非进行一场政治运动。勒克莱尔和普利文另外带领大约三十个法国人乘独木舟悄悄地离开了尼日利亚，在黎明前到达杜阿拉。等到该地居民一觉醒来，他们发现四面八方都贴满告示，宣布归附自由法国。有人叫喊了几声，但是并没有严重的反抗。这队人从杜阿拉又向首府雅温得进发，这一次由欣然倒戈的当地武装部队陪着。布律诺在雅温得还一无所闻。雅温得不久便完全顺从形势，而英国发表的一项声明，承认对喀麦隆的委任统治权仍旧保留在法国的名义下，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9月3日，在塔希提岛和马克萨斯群岛举行了公民投票，“戴高乐以五千五百六十四票对贝当政府十八票的多数获得了这两处属地对他的运动的支持。9月9日，印度法国属地的总督路易·邦万加入了自由法国。最后，9月19日，在当地很重要的新喀里多尼亚岛被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法国总督索托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争取过来了。除了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是1941年12月在特殊情况下争取过来的以外，新喀里多尼亚岛是参加自由法国的最后一处殖民地。为了完成争取法属赤道非洲的工作，自由法国军队在勒让蒂约姆的率领下于1940年11月从喀麦隆攻入了加蓬。11月5日，他们取得了利伯维尔，11月12日又取得了让蒂尔港，两处都没有发生重大的战斗。

争取到法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对盟国的战争努力是一项很有价值的贡献。这两处地方不仅拥有极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盛产木材、植物油、棉花、咖啡、可可和其他殖民地产品，而且还提供了一条通过盟国领土直接横越非洲由空中和陆路经由苏丹同开罗和中东交通的途径。它们的依附自由法国运动可以使盟国一方面对尼日利亚的安全，另一方面对比属刚果的安全都大为放心，比属刚果当时已经决定不顾比利时本土的溃败，仍继续进行战斗。戴高乐最初知道法兰西帝国有一部分已露出可能即将加入他的事业的迹象，是在他刚要率领部队前往达喀尔，或者是在他航行在公海上的时候。这必然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在他于9月23—25日进攻达喀尔被击退并且遭到了损失以后，他正需要这样的鼓舞。在远征达喀尔失败以后，参与这一战役的部队都撤退到弗里敦。戴高乐没有立即返回英国，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巡视了法兰西非洲帝国中投到他的事业这边来的那些省。他在非洲逗留了两个月左右。的确，据信他当时曾考虑要把他的总部永远搬到布拉柴维尔去，只在伦敦留下一个权力有限的联络使团。英国方面出于政治和行政理由不赞成这个意见。由于达喀尔事件，戴高乐的威望预料可能会蒙受一些损失，然而，尽管如此，他在非洲巡视期间，却仍然受到极为尊敬和热情的欢迎。

（五）自由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的成立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宣布成立一个“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由他本人、贾德鲁将军、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德拉米纳将军、费利克斯·埃布埃总督、勒内·卡森总督、医疗大队的西塞将军以及从1941年1月起参加在内的达让利厄稗父组成。其中贾德鲁将军在法国沦陷时是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可是，因为他不赞成停战协定，维希政府便撤换了他，他和他的妻子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了出来，乘船到英国去。他到达伦敦时，戴

高乐已经出发远征达喀尔去了。自由法国运动内部当时有一种为难的感觉，因为他在法国陆军中官阶很高，远在戴高乐之上，而且他以前对戴高乐也一无所知，在从印度支那赴英国所必经的长途海程中所能听到的也极为有限。但是，当贾德鲁在乍得省第一次会见戴高乐 445 时，这种疑虑顿时便消失了，因为他当时从态度和行动上都表示，他已把戴高乐看作是这项事业中自己的上级。

卡森教授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便参加到戴高乐这边来。他是法国退伍军人联合会的主席，又是个法学博士，他曾作为一个专家参加日内瓦国际劳工局的工作，1940 年 6 月，从法国逃出来参加了自由法国。西塞将军当时是法属赤道非洲医疗大队的长官。达让利厄神父早年是一个法国海军军官，曾建立过出色的功勋，后来在 1920 年成为加尔默罗会的一个白衣修士，1939 年当选为大主教。战争爆发后，他在上级主教的同意下，应召返回海军，后来在瑟堡被俘，但是，他逃出来后就去英国。他最初以随军神父身分参加戴高乐的部队，后来又重返海军，并在达喀尔负了伤。

戴高乐在下令成立该委员会的同时，还发表了一项宣言，其中并没有放过维希政府，也不曾放过它的元首贝当，不过对后者只是含蓄地提到。宣言开始时声称，千百万法国人目前正期待着一些不曾患过“不可饶恕的恐惧症”的“名副其实的领导人”，那种恐惧症已使他们目前的所谓政府同德国缔结了停战协定。宣言断言，“真正的法国政府已不再存在了”：在维希成立的妄自尊称为政府的机构是违反宪法的，并受侵略者控制的。在受人奴役的情况下，这一机构只不过是，事实上也正是法国的敌人用来损害法国的荣誉和利益的一个工具，因此，必须有一个新政权来承担指挥法国继续战斗的任务。

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那项法令的文本是用法国政府法令的惯常措辞写就的，比较无懈可击。它宣布：“从敌人控制下获得自由的帝国各地”将“根据 1940 年 6 月 23 日以前”（即同德国的停战协定签订以前）“制订的法国法律”加以治理，“直至有可能成立一个不受敌人支配并具有正常性质的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的代议机构时为止”。也许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法令还规定，“由自由法国的领导人，必要时同防务委员会磋商后，作出决定”。

当戴高乐和英国政府之间于 8 月 7 日签订那项正式 446 协议时，他们曾讨论过是否可能成立一个帝国防务委员会的问题。英国政府暂时同意了这一建议，条件是需要有适当的人选来组成，并且应当在其他方面都有利时成立。然而，戴高乐 10 月 27 日在布拉柴维尔发表那项声明，事先并没有通知英国政府，因此引起了相当惊讶，而同时发表的宣言则引起了一些令人为难的政治反应。在一段时期以来，日益明显的是，戴高乐想使他的运动获得较大程度的承认与权力的这种并非不合情理的愿望，超过了英国政府愿意给予的那种程度。当宪法专家们就一些细致的要点展开辩论时，维希政府的合法性可能仍然是含糊不明的，但是，大多数法国人不管愿意不愿意，无疑都在行动上仿佛接受了它的管辖权。人们无论怎样想入非非，也不会把戴高乐当作是法国政府。此外，土伦的法国舰队也是一个经常存在的危险。万一维希政府向英国宣战，那支舰队一定会不顾海军上将达尔朗在签订停战协定时所作的含糊的保证，而会服从该政府的命令的。最后，尽管维希和联合工国已经断绝了外交关系，但维希和美国之间，甚至维希和加拿大之间的外交关系却毫无改变。美国 and 加拿大的代表留在维希，这对英国政府来说显然具有很大的军事价值，同时华盛顿的国务院感到有必要对自由法国运动采取的总的态

度，又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了。

尽管出现了这些困难，戴高乐在 1940 年 12 月 24 日还是正式接到通知说，英国政府准备就一切有关同接受戴高乐权力的法国海外领土合作的问题，同他在 10 月间宣布成立的防务委员会进行会商。这既包括自由法国部队与英国部队在反对共同敌人作战中相互联系的事宜，也包括同这些法国领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有关的事宜。同时，英国政府还向戴高乐表明，不能把这看作是他们对戴高乐的任何宣言或讲话所引起的各种宪法与法律问题表示了任何意见。

英国政府曾一再公开作出保证说，任何集合到全体 447 自由法国人的领袖戴高乐麾下来支持盟国事业的法国领土，根据英国作战努力的需要，都将获得经济援助，其规模将与类似情况下英国政府对英帝国的殖民地所提供的相同。英国完全履行了这项保证。他们立即同所有有关的法国殖民地和省区进行了具体细节的谈判，并于达成协议后马上签字。早在具体文件签字之前，对自由法兰西帝国的实际援助便已全面展开了。英国方面通过委派领事和其他官员，以及通过扩大派驻自由法国运动的总代表团去办理必要的工作。总代表团由爱德华·斯皮尔斯将军（后为爵士）率领，于 1940 年 6 月成立，总部设在伦敦，1940 年底，在布拉柴维尔、杜阿拉和拉密堡都设立了分部，还在开罗设一个很大的中心。法国方面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官员和专家，遇到了一些可以理解的困难。

（六）自由法国运动在北非战役中所起的作用，1940—1941 年

戴高乐巡视自由法国非洲领土后（在这期间他抽空飞往开罗去同韦维尔举行会谈，并派贾德鲁在那里作为他的代表，负责处理全部中东事务），于 1940 年 11 月底返回伦敦。这时，他觉得必须花些时间改组他的总部。同时，他催促英国政府作出安排，把其他一些法国属地争取到他的事业方面来，尤其是吉布提、圣皮埃尔、安的列斯群岛和法属圭亚那。他声称，所有这些地方的大多数人民都是拥护他的。但是，英国政府迫于政治和军事上的种种考虑，暂时不得不把对这些领土的行动只限于海军力量所能实现的有效的经济封锁。与此同时，韦维尔在利比亚对意大利人顺利发动的攻势，也使英国和自由法国的事务暂时显得不重要了。尽管如此，一支自由法国部队却在非洲战役中以寡敌众，建立了显赫的功勋。因此，英王在给韦维尔的一封祝贺信中也特别提到“我们的自由法国盟友”的英勇行动。为了配合韦维尔在非洲进一步作战的战略计划，一支自由法国人的分遣队，包括

骆驼队和机械化部队，在科洛纳·德奥纳诺中校率领下，攻打了费赞绿洲中的一个沙漠前哨基地木祖克。这次战役以及随后于 1941 年 3 月攻占南部沙漠中库弗腊的战 448 役，完全是由自由法国部队进行的。两次行动给计划和实现它们的自由法国官兵带来了极大的荣誉。第一次出征从乍得境内的拉密堡出发直捣木祖克，当时必须在走过九百多英里的杂树丛和沙漠地带后，立即突击一支全副武装、深沟高垒、粮草弹药十分充沛经得起长期包围的守军。自由法国这支特遣部队取得了全面的成功，虽然它的指挥官身先士卒，在英勇绝伦的作战中阵亡了。由于摧毁了木祖克的意大利飞机和机场，夺取了意军防地，从而清除了韦维尔左翼的潜在威胁。

接下去向库弗腊推进中，自由法国这支纵队必须在极难通行的地区行军六百多英里。由于意大利人严阵以待，拂晓时的一次突袭不能取胜。自由法国部队把库弗腊围困了一个多月。尽管以极大的管理技巧节省给养，这次军

事行动还是几乎失败，只得考虑撤退了。在最后一刹那，他们取得了一个战术上的有利条件，突破了敌军的防卫，于是，在一场正面攻击中占领了库弗腊。意大利人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交通线被切断了。在埃塞俄比亚，也有一小股自由法国部队在英国普拉特将军的指挥下作战。外籍军团中的分队、殖民地部队、阿尔及利亚骑兵、炮兵，以及一队法国轰炸机在厄立特里亚同英国人一起攻打克仑，后来又在马萨瓦作战，戴高乐还亲临马萨瓦前线。在取得胜利以后，戴高乐致电英国首相，再次宣布“自由法国部队将参加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战斗，直到取得全面胜利为止”。丘吉尔在复电中对自由法国的支援，代表英国政府表示感谢，电文说：你们在为共同事业尽力中，从不畏缩，从不示弱，获得了国玉陛下政府的最大信任，你们体现了千百万对法国和法兰西帝国的前途毫不灰心的法国男女同胞的希望。

自由法国部队的这些军事胜利，对于稳定自由法国运动和英国政府之间节拍多少有点不大正常的关系起了不小的作用。不幸的是韦维尔从班加西的撤退和希腊的沦陷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心理反应。自由法国的军官失望之余，不谨慎地批评了英国将领的指挥才能，甚至还批评了英国人的勇气。

附录：英国和自由法国远征达喀尔，1940年9月

英国和自由法国联合远征达喀尔的失败，其全部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仍是一个看法不同和引起争论的问题。维希政府是否知道这项计划，如果他们知道了，那么，他们之所以会事先知道是不是因为戴高乐的军官在公开场合上说话不慎所致，总之，失败的主要根源之一显然是情报不够准确。自由法国总部声称，他们知道达喀尔有很大一部分陆军和空军人员以及许多高级军官，都是赞成戴高乐的，不过，他们也承认新任总督布瓦松是坚决支持维希的。达喀尔的防卫力量拥有的大炮比英国和法国情报部门所估计的数量要多、口径要大，驻军的人数也比估计的要多将近一倍。事后才知道，驻军士兵部情愿服从原有的指挥官的命令，而这些指挥官即使不是全心全意一致支持贝当的，也大多对夏尔·戴高乐将军这个他们一无所知的人物抱将信将疑的态度。在商人和居民当中确实有一些支持戴高乐的人，但是，这些人既不热情，又无组织。

虽然如此，这次不幸的远征由于一连串的错误而更为不利，结果，一支由三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组成的维希护航队，载着援军和补给品，在英法远征军到达之前抵达了达喀尔。除了这些舰只和卡萨布兰卡驶来的一两艘潜艇为当地的防务增添的力量以外，对米尔斯克比尔事件记忆犹新、满怀怨恨的法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人员也被送到这里来操纵陆上永久性防御设施的大炮，以代替有色人部队的常规人员。弹药和鱼雷的储存量增多了。驻军的士气也相应有所提高。这一不幸的责任不能归咎于自由法国方面。维希的增援部队9月9日离开土伦，当时盟国的远征军已在公海上。这支舰队出发的消息都用电报报告了伦敦，然而，出于行政上的疏忽，这个极为重要的情报竟拖延了几天后才让最高当局知道。此后，他们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了。那些巡洋舰和驱逐舰早已驶过直布罗陀海峡，邻近海域里的英国军舰却不够强大，无法拦截它们。它们于9月14—15日夜间抵达达喀尔，比远征军早到了一星期。

同时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不幸事件。象原来设想的那样，袭击达喀尔定于8月份的最后几天里进行。那末其附带的结果将是，盟军应在维希增援部队之前到达。可是，不断的耽延（其中有些是很难原谅的）使日期推迟到了

9月22日。刚要出发以前，发现随同远征的某些英国商船装载的只是例行的护航用品，而不是供登陆作战使用的物资，于是只得卸下重装。某些自由法国商船的船员起初拒绝启航，因为他们已经有几星期没有领到工资了。对其中几艘商船的航速也估计错误，因此护航队不得不减低速度。到了准备工作的后期，他们才知道军舰在这次作战前得再添加燃料，于是它们又不得不先开往弗里敦，再回到达喀尔来，而不是直接驶往该地。

商定的办法是，英国海军应护送戴高乐及其部队到达喀尔，戴高乐及其部队则在登陆后获得立足地以前应服从英国司令官的命令。结果，他们根本就没能获得立足地。戴高乐严格遵守他所同意的协议，事后也没有进行什么反责，从而提高了他的声望。

用最简单的词语来说，作战计划是，先让戴高乐通过和平手段使这个城市投到他这边来。预定将从空中散发传单，戴高乐还将在船上特地装置的电台上对民众发表广播讲话。然后，法国军官将乘飞机在机场降落，手持白旗的使者也将进入港口，设法与总督会谈。结果，传单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便被扫除了。戴高乐的广播讲话起先是在居民们一贯不收听广播的时刻播出的，所以听到的人似乎寥寥无几。在机场降落的自由法国军官寡不敌众，被逮捕了。进入达喀尔港的使者最初也险些遭到逮捕，后来遭到对方开枪射击。首席使者达让利厄负伤。防御设施中的大炮也打响了。假定这第一阶段失败了，这次战役的下一阶段便要由英国舰队来一显身手了。不巧，当时的能见度已经很差，舰队被迫驶到离海岸两英里以内的地方，因此遭到了半小时的炮轰，有些舰艇被击中了。根据原先安排的计划，舰队未予还击，虽然它曾同两艘摆开阵势准备发动攻击的潜艇交火。这时已经很清楚，计划的第二阶段也没有成功。英国海军的出现也不足以吓倒法国守军。当天下午，他们开始实行计划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山戴高乐的小部队在达喀尔以东大约十五英里的小港口鲁菲斯克登陆，从那里可以从背后夺取达喀尔。先前成为障碍的雾蒙蒙的天气现在倒对这场战斗很有利了。但是，自由法国部队没有在指定的时间下午5时30分登陆，于是戴高乐便遵照这时英军司令官发来的命令退回到船上。随同远征的有些英国人认为，如果戴高乐这时登陆的话，这一战役本来是会成功的。这必然仍旧是一个看法不同的问题。9月24日上午，英国舰队炮轰达喀尔约两个半小时之久，下午又轰了一阵。回击的炮火丝毫没有减弱，使军451舰遭受一些损坏。25日，又继续炮轰，但是，当英国战舰“决心”号被鱼雷击中腹部以后，伦敦的英国最高统帅部就建议放弃这一军事行动。当地的司令官们也表示同意，于是部队撤退了。它们于9月27—28日抵达弗里敦，没有遭到进一步的损失。

第二节 自由法国与英语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自由法国与叙利亚，1941年6月至10月

关于盟军进入叙利亚以前伊拉克发生叛变和中东的其他事件，我们已另有记载。英国当局在部署叙利亚战役时，曾与戴高乐商定，以前在利比亚作战的自由法国一个旅应参加这次军事行动。据报道，法国高级专员当茨将军对德国人彻底屈从的做法已在他自己的部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部队不管怎样下定决心追随贝当并确保自己的切身安全，却越来越不以为然地看着德国人对法国当局日益加强控制。将近1941年5月底时，科莱上校率领他所指挥的大约五百名招募来的彻尔克斯族士兵越过国境，投到贾德鲁的麾下。上文已经讲过，贾德鲁当时是戴高乐在中东的公认的副手和代表。自由

法国的那师人从埃及开入巴勒斯坦。6月8日，盟国部队进入了叙利亚。

从3月起，戴高乐本人呆在西非的时间居多。他完全知道在叙利亚使用自由法国部队的意图，但是，因为他的行踪不定，英国人无法同他天天商讨战场上相互配合的详细计划，因此，详细计划便由盟军在叙利亚的总司令威尔逊将军就地同贾德鲁将军和德拉米纳将军共同制订。

贾德鲁于1941年6月8日盟军开进叙利亚时，以自由法国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是由贾德鲁和地位相当的英国官员详细拟订，并经英国政府批准的。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其中声称，自由法国正在进入叙利亚和黎巴嫩以解放这些领土，结束委任统治制度，并给予它们以要求已久的独立。声明答应将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签订一项新的条约来规定它们同法国的关系。这项声明由当时英国驻开罗的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在同一天代表英国政府另外发表的一项声明予以保证。后来，这项声明以及英国政府所作的保证引起了严重的纠纷。

当时的直接意图是鼓励当地居民以及从他们中招募来的部队摆脱当茨的束缚以支持盟国。同自由法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和期望相反，它并没有收到这样的效果。所有当地招募的士兵在抗击自由法国军队时至少和他们同英国人作战时一样斗志旺盛。平民们的态度也大致相似。虽然很少有人愿意支持自由法国，一般居民们对英国人又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热情，可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治家们则想要自治。有些黎巴嫩政治家热烈欢迎英国对贾德鲁声明的保证，这一来倒勾起了法国人从前的全部猜疑和嫉妒。他们以为英国正在耍阴谋，想在近东挤掉法国的地位。甚至在1941年8月7日利特尔顿致函戴高乐以后，这种猜疑还是没有消散，利特尔顿大臣在信中说：我很荣幸向您再次保证，英国在叙利亚或黎巴嫩，除了打赢战争以外别无其他利害关系。我们决不想侵犯法国的地位。自由法国和英国双方都保证使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当这一必要步骤不受损害地实现以后，我们欣然承认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应享有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更优越的地位。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和1941年春英国从班加西首次撤退以后的日子里，近东的政治领袖们曾转向德国人，因为他们最希望使自己摆脱法国的保护。根据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他们认为德国人是他们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可能的救星。后来，伊拉克叛变的失败，英国人的进入叙利亚，再加上英国对自由法国答应给予叙利亚独立所作的保证，近东有许多人的希望又转而向着英国了。另有几个政治领袖则认为英国和法国，不管是什么商标和货色，都是中东人民的顽固不化的剥削者。这些人宁愿先观望一番。再决定何去何从。

自由法国的外籍军团明白表示不愿向法国的白人军队开火，尤其不愿向军团中支持维希的那些部队开火，这引起了进一步的困难。他们的反对是有其实质的。要法国人对法国人开火，这是件很难堪的事。这个可怕的念头从运动成立之初当然就曾使戴高乐烦扰不安。虽然面临他所受到的挑衅，他却准备命令他的部队，如果遭到法国人攻击便开枪，并且对1940年8月7日协议中的有关条款作出了任意的解释，但是他也表明他热切希望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军团的成员曾宣誓效忠法兰西共和国元首，他们获准参加这个著名的部队时曾经保证要遵守一些条件，因此他们的处境更其微妙。有一度，自由法国这一旅人不得不从前线撤回。如果冷眼旁观，就比较容易看清问题的正反两面，但是，在一场相当重大的战役中间，一支重要的部队突然不知去向，这对负责指挥的将领来说，的确是很窘的。

象这种麻烦事件，以及因为语言不通和习惯作法不同而引起的其他麻烦事件，很可能助长了在场的自由法国人员和英国人之间的恶感，而同7月14日叙利亚停战有关的一些在其他情况下无法解释的事情，多半也是由于这些事件而引起的。然而，说句公道话，不论人们对自由法国这一旅人在这次短暂的战役的早期行动中的价值有多大的怀疑，勒让蒂约姆部下的自由法国部队到故斗的后期在大马士革前线的表现却是非常出色的。不幸的是，在这一战役的这个最后阶段中，他们发觉必须对人口稠密的居民区进行炮轰，这丝毫无法使当地居民对法国人，不论是对自由法国人还是对其他的法国人感到满意。

近东停战协定的条款是有关的将领们拟订出来的。从它的措辞和后来的解释看来，如果从头到尾都同英国政府商量的话，伦敦方面是否就会同意全部条款也是颇为可疑的。维希军队享受到给予战败者的恩典，凡是不愿参加戴高乐部队者都保证可以遣返法国。这一点也许不会引起非议，但是，在一项附加的议定书中却有这样一条规定，不许盟军的使者与维希军队进行任何个人的接触。既然大部分维希军官明显地都宁愿遣送回国，而不愿参加自由法国运动继续作战，既然他们的部队都奉命不得离开营房，他们的士兵实际上怎么能够投到戴高乐这边来，这就很难理解了。而且，选出来负责解释停战协定的英国—维希委员会在解释方面是极端偏袒维希法国的，他们显得故意要对那些不久前同盟军作战的官兵表示敬意，而对自由法国那一旅人却比较冷淡。例如，后者被迫在偏僻的地方住帐篷和借住民房，没有任何日常生活必需的设备，而维希部队则住在设备良好的舒适的旅馆和营房里。餐厅都保国供维希人员使用，并禁止自由法国人员入内。这些防止两类法国人接触的措施最使自由法国人员感到恼怒，而且也不大符合解释7月24日签订的近东停战协定协议的精神。这份协议中关于准许维希法国的官兵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到戴高乐一边来，订有明文规定，其中第二条有如下一段：自由选择伪意义只能是，自由法国当局得向有关人员完整地 and 自由地说明其观点，其完整和自由的程度与维希当局通过其在场的军官和军士同他们的士兵所作说明一样。不管这一条原来的用意如何，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用。根据维希方面对7月14日的停战协定所作的解释，规定的条件继续生效，结果这一战役开始时在叙利亚的三万八千名维希官兵中，有三万五千多人在1941年秋被遣返法国。这些数字即使仅仅是近似的，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另一方面必须提到的是在大战的这一时期，选择跟维希走的法国人和戴高乐的追随者之间的对抗显然是非常激烈的。每一方都把对方称作卖国贼和背信弃义分子。这样一种态度，要想改变也很难。双方出自对战败的深恶痛绝的那种特殊心理影响而引起的情绪如此强烈，以致甚至法国本土的地下抵抗运动（它已在不断发展，并且表现得极其英勇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往往把自己的运动看作是土生土长和独立自主的运动，而不看作是自由法国运动的一部分，虽然它同英国人合作得很热诚。

近东停战协定的条款在自由法国人员中引起很大的不满，这并不是不合情理的。戴高乐在知道这个附加议定书以前，已于7月16日从布拉柴维尔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正式表示对“我们的英国盟友同维希缔结的停战协定”保留批评意见。等到全部条款公布出来以后，自由法国运动的伦敦总部提出了抗议，戴高乐也从布拉柴维尔火速赶到开罗去会见英国驻中东的国务

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

戴高乐当然有话可说，英国政府也准备加以考虑。不幸的是，叙利亚的事态以及他自己在叙利亚的官员发回的报告，说英国人显然正在尽力侮辱他们的自由法国盟友，使戴高乐过分激动，竟然公开发表了一些失去同情的声明。戴高乐在声明中还宣称，从7月24日中午起，他打算重新按照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完全自由地部署法国在中东的全部武装部队，不再同英国人协商。这将明显地违背1940年8月7日他同英国政府所达成的基本协议。

有很短一段时期，就当时自由法国运动的外表看来，仿佛也许就要分崩离析了，但是，裂隙还是弥补起来了。戴高乐收回了他先前发表的声明，再次承认近东的自由法国部队必须受英国指挥。同时，英国政府也同意，一俟叙利亚和黎巴嫩获得独立，法国就应在这些地方享有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优越的地位。

这些决议载入了7月25日戴高乐和利特尔顿拟定的两项协议里。戴高乐承认中东构成一个单一的战场，在进攻和防御方面都必须有一个协调的政策，还承认近东的英国最高司令部应该不受约束地采取一切必要的防御措施，以应付共同的敌人。凡是需要使用法国人与英军配合作战的军事计划，都应由英法双方司令部共同制定，但是，鉴于当时英国部队的数量在中东占有优势，英国的战地司令部受戴高乐的委托将决定法国部队所应起的作用。但是如果戴高乐的军官认为有任何防御措施或进攻计划是与法国利益有冲突的话，那末应将问题提交英国政府和戴高乐，由他们共同解决。公用事业、一般保安机构以及地方资源全应归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法国政权掌握，但是，戴高乐同意在近东国家的一般保安机构下附设一个英国军事保安局的分部。其他诸如招募和使用当地部队等的某些细节问题，也都达成了协议。

鉴于戴高乐这时所持的态度，人们不免怀疑他究竟是否真想履行贾德鲁以他的名义向近东国家公开作出的给予它们独立的那项诺言。然而，8月9日贾德鲁果真同威尔逊将军根据利特尔顿—戴高乐协议解决了近东所有军事问题的细节。这样，贾德鲁便取得了民政方面的权力。先前，他已由戴高乐任命为总代表，因此也是该地区的最高军事权威，名义上说，除了有关军事安全的问题以外，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治理是自由法国的职责所在，但是，假如英国的军事管制力量撤走，贾德鲁的行政机构即使一个星期也维持不下去。实际的情况是，由于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盼望贾德鲁本人答应的独立很快将会以实际的方式予以实现，公开的骚乱才没有发生。英国人也在期待着这件事。贾德鲁的一些副手，尤其是科莱和其他几个对当地政治情况特别有经验的人，也表示赞同，但是，为了同戴高乐的态度可能不无关系的某种原因，事情进展得很慢。经过多次谈判以后，贾德鲁才于9月27日发表了一项关于叙利亚独立的宣言，但是他本人却保留着全体武装部队（包括叙利亚国民军在内）总司令的权力，他还保留着可以随意宣布法国的军法的权利，因此实际上也就取消了他在名义上所承认的独立。他并且还继续保持着法国对新闻检查的控制权。人们对他的这项宣言反应冷淡，就并非不合情理了。土耳其和伊拉克都不肯承认这个新政体，土耳其人坚持说，他们同维希的关系使他们不能承认在自由法国保护下成立的一个政府，伊拉克人则声称，他们虽然一向愿意承认叙利亚真正独立，却不能认为贾德鲁所成立的政府是合乎宪法的。甚至美国也持保留的态度。在这种怀疑和失败的气氛中，贾德鲁同黎巴嫩的知名人士开始了谈判，目的是想在黎巴嫩成立一个与叙利亚类似的

政府。近东国家于是保持了一年的不稳的和平。

（二）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的组成，1941年9月24日

这样，自由法国运动由于戴高乐和英国政府之间的摩擦而发生分裂的危险似乎暂时消除了，不过，大家认为戴高乐最好是尽快返回伦敦，全面讨论一下所有突出的分歧问题。他对于因此而向他发出的邀请并没有欣然作出反应，反而回到赤道非洲去，因为那里又发生了一次危机。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接见了一个美国新闻界的代表，这个人立即把他同将军的谈话作为一篇正式“访问记”在几家美国报纸上发表了。在这篇访问记中，有几处提到英国人，据说都是戴高乐原话的正确的译文。这些都决不是对他的盟友的恭维话。此外，访问记中还包含有一项似乎是向美国提出的公开倡议。美国当时还是一个中立国家，可是戴高乐却提议说，美国可以使用已经依附自由法国的各属地内的军事设施和基地。美国政府对这项主动提出的援助倡议所感到的为难不亚于英国政府对这篇所谓访问记通篇的口气和性质所感到的。戴高乐总算不错，在人家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他作出解释以前，便发表了一项声明，公开否认他曾说过那样的话。但是，尽管他声称发表的这篇报道是未经认可的和不正确的，伦敦方面却认为这几乎不能把整个事件一笔勾销，因为大家都听说过这位将军以前有好几次都喜欢相当随意地发表反英言论。

结果，等到戴高乐终于在9月间回伦敦时，英国政府对他的接待很明显地是冷淡的。所有这些不愉快的情况把自由法国运动和英国政府之间——且不说同世界其余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政治缺陷都公开暴露出来了。戴高乐的政策简直无法获得任何一种自由的人民投票的赞成。他的整个法律地位根本不同于当时在英国的各流亡政府的地位。那些政府都是在过去某一时由他们自称所代表的人民选举出来的，因此根据国际法，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行使宪法权利。甚至贝奈斯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虽然同自由法国运动较为相似，却也有两点同这个运动不同的地方，第一，它并不声称统治着任何领土，第二，它的主席是捷克事务方面的杰出人物，谁也不能否认他拥有他本国大多数同胞的爱戴。戴高乐这时声称他统治着几百万法国殖民地居民和大片的458法兰西帝国领土，而且还统帅着海军、陆军和空军，但是法国人民始终不曾在任何时候选举他出来担任过任何政治职位，也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倘使法国本土的选民有选择自由的话，他们会挑选他作为宪法规定的首脑。

英国政府因此把他们的忧虑通知了戴高乐，并且向他建议说，现在应该成立一个由在自由法国运动中表现得杰出的法国人组成一个委员会了。戴高乐无疑将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并将有权在同他的同僚会商后提出委员的名单并分派他们的工作，但是英国以前通过戴高乐个人给予这个运动的那种程度的物质与心理上的承认和支持，只有在移交给一个作为整体那样的委员会后，才能继续下去。

戴高乐欣然同意了 this 建议。他于1941年9月24日在伦敦公布了一系列命令，成立一个“民族委员会”，“委员”由他本人提名。这些委员将“行使在正常情况下应由法国内阁部长行使的全部个人的和集体的职权”。第一次提名任命的名单如下：主席：戴高乐将军经济、财政与殖民地民族委员：勒内·普利文外交事务民族委员：莫里斯·德让陆军民族委员：勒让蒂约姆将军海军与商船民族委员：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司法与教育民族委员：勒内·卡森教授内政、劳工与情报民族委员：安德烈·迪特尔姆空军民族委员：瓦兰

将军民族委员（无任所）：蒂埃里·达让利厄海军上校普利文还负有一项特殊任务，即协调各民政部门之间的工作，在他不在伦敦时，这项工作以及经济、财政与殖民地民族委员的工作将由迪特尔姆担任。勒让蒂约姆不在伦敦时，陆军民族委员的工作则将由参谋长琅蒂将军担任。

9月24日当天，戴高乐趁机重新公布了1940年10月27日组成的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卡森的名字被删去了。其他的成员在这个日期所担任的职务459位如下：贾德鲁将军：驻近东总代表和全权大使，总司令米塞利埃海军中将：海军与商船民族委员医疗大队的西塞将军：自由法国非洲高级专员埃布埃总督：法属赤道非洲总督德拉米纳将军：近东总司令助理索托总督：新喀里多尼亚总督与新赫布里底群岛法国高级专员蒂埃里·达让利厄海军上校：无任所民族委员勒克莱尔·德奥特克洛克将军：乍得部队司令1941年9月26日，英国政府正式以书面通知戴高乐，“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准备将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视为代表不论他们在何处集结到自由法国运动周围来支持盟国事业的全体自由法国人民”。同时，英国人还告诉他，英国政府准备同民族委员会商谈一切有关战斗法国以及在该委员会管辖下的法国海外领土与英国合作的问题。

这一步骤暂时大大改善了彼此之间的关系。谁都知道，新的民族委员会中的大多数成员由于是戴高乐提名的，除了一定程度以外不大可能会反对他的要求，但是，大家也感觉到，民族委员（不管他是谁）的威望和权力这样增大了后，加上英国政府准备按照各个民族委员的职务同他们分别进行磋商一事，往往便有可能使独裁政治的任何实际或外表有所改善，而这种情况过去曾使自由法国运动遭到批评，尤其是在美国。

这种新的安排似乎也很合戴高乐的心意。他本人无疑并非完全没有觉察到他个人当时所处地位的危险和困难，这种地位同他自称是共和法兰西的代表是不相符的。

他在公开场合谈到英法关系时，是愉快的，甚至是豁达的，双方的紧张关系暂时也缓和下来了。这时他还忙于组织和改组这一新机构。在后来的几个月中，由于有好460几个过去有过政治或行政经验的法国人来到英国，大大地加强了这一新机构。

（三）自由法国与美国，1940—1941年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舰队一事并没有马上影响到自由法国的命运。民族委员会连忙提出，美国可以使用自由法国远东属地上它所需要使用的任何设施，自由法国运动的伦敦总部还满怀希望地认为，美国今后也许会对该运动表现较为友善的态度。

戴高乐在1940年大胆地违抗命令，实际上并没有激起并吸住美国人民的想象力。如同在美洲大陆的许多其他国家中那样，戴高乐的违抗命令得到了当地法国人的支持。自由法国委员会已在北美、中美和南美的二十四个国家中（包括美国在内）成立起来，不过，这些委员会的领导人通常总不及维希政府的正式外交代表那么有名望，甚至也不及居住在这些国家里的其他一些知名的法国人士那么有名望。很多反对停战协定但还不愿意投身自由法国运动的法国人都在美洲各国避难。当地法国人之间由此而发生的争执和冲突，使美国人感到为难和厌烦。美国人也许太轻易地认为，自由法国运动在英国的那些实际领导人并不比他们这些自封的追随者坚定多少。除了所有这些情况以外，英美两国政府之间还有一项谅解，即美国应该暂时同维希保持外交

关系，支持和引导这个公认为可悲的政权，用威逼利诱的办法说服它，要它尽可能暗中抗拒德国进一步提出的要求，同时，英国则在可能范围内尽力支持戴高乐，而又不至于促使自己同贝当政府进入战争状态。

美国政府特别急于想使西半球的法国属地不至于出现混乱情况。根据1940年7月30日的哈瓦那决议，美国曾保证不承认西半球外国属地由于这场战争而出现的任何地位的变化。这项决议的用意原在于防止德国将来企图侵犯这些领土或它们的权利，但是，只要美国继续做得仿佛它把贝当政府看作是法国和法兰西帝国的合法政府，那么这项决议也就使美国很难赞同，更难帮助戴高乐派代替维希控制法国在西大西洋或与西大西洋毗邻的殖民领土。

有许多团体在美国互相展开斗争，要求承认它们是戴高乐在美国的唯一正式代表。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务院对这些团体的活动日益感到愤懑。美国新闻界某些报刊虽然对戴高乐或其支持者公开发表的言论作了解释，但是，这并没有平息国务院的愤懑。政策要求同维希保持关系，但是没有几个美国公民（当时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肯定不在其内）喜欢或者赞赏贝当政权。而且，戴高乐说，在法属圭亚那、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绝大多数人只要受到适当的鼓励，就都愿意抛弃贝当，国务院对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却也极为怀疑。

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政府既不支持贝当，也不支持戴高乐，这种说法在1941年初可以认为大体上是正确的。同时也很难否认，美国承认维希这一事实本身就给戴高乐造成了障碍，而这种承认的结果是给予维希以实际的支持，自由法国却得不到这种支持。例如，1940年8月，法属圭亚那明确地显示出想投到戴高乐一边来。维希宣布即将从法国派遣卡尔德去担任这个殖民地的总督，以恢复秩序并加紧它同贝当的关系。戴高乐希望赶在卡尔德到达之前任命一个由他自己提名的人。这个人马上就能派出，而且当然立刻就能把法属圭亚那争取到自由法国一边来。美国政府不容许他这样做，相反地却准许法国海军上将罗贝尔（他当时率领一支小舰队，包括航空母舰“贝阿恩”号，驻在马提尼克，而他本人则是拥护维希的）派遣增援部队到达法属圭亚那，救平了当地自发的起义。1940年秋，把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团结过来的一个类似的机会，也因为国务院拒不同意而失去了。而且，美国准许同法属西印度群岛维持正常的贸易，以防止这些岛上发生叛乱，使那里的生活保持正常。这种做法实际上就462意味着把戴高乐拒诸门外，因为人们有理由认为，英国那种对法国殖民地施加经济压力的政策可能最终会使形势转而有利于戴高乐。

英国的政策就象公开宣布的那样，是采取一切实际的步骤封闭住所有忠于维希的法国属地的进出口贸易，以配合对法国本土施加的经济压力，同时宣布，任何投到戴高乐这边来的法国殖民地在经济上都将受到联合王国对自己的属地所能给予的同样待遇。法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的实例就可以证明这项诺言是算数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压力并未能把吉布提争取过来。美国政府倒赞成试行一种不同的政策。1941年4月，他们决定派遣一些具有领事身分的特别观察员到法属北非去，授权他们提供经济援助，从而放松了当时的封锁。国务院一向希望会有一个比贝当或戴高乐更有权自称代表法国的第三者出现。他们把希望都集中到了魏刚将军身上，他们认为他也许会在北非树立起起义的典范来，因为他当时是以贝当代表的身分前往那里的。这

种对魏刚的不当的信任在 1941 年 11 月 19 日魏刚丝毫未加反抗地被贝当免职以前，一直没有消失。

1941 年 9 月间，在这件事发生前几个星期，普利文在华盛顿受到国务卿的接见。国务卿指出，他不准备给予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任何比美国已经给予戴高乐的更大程度的承认。同时，赫尔显得对自由法国的情况比以前多少更注意些，并且对于普利文所能向他提供的有关维希人事和政策的第一手详细情况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直到这时，美国一直断然拒绝根据租借法给予自由法国任何利益。甚至连美国同自由法国殖民地的贸易也受到阻碍，虽然它同法属西印度群岛以及在魏刚下台以前同法属北非的贸易却一直继续着。但是，1941 年秋，美国派坎宁安上校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到法属赤道非洲去察看形势。大概这个代表团所做的汇报不是全然不利的。有一个结果至少是，美国和自由法国非洲之间的商务关系改善了。1941 年 11 月 11 日，美国总统突然采取了一个步骤，他通知租借法督办说，“法国志愿部队”控制下的领土的防御对于美国的防御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民族 463 委员会便获得资格，可以把交给英国的租借法装备转交给它，不过这只是“作为一个军事单位”，而决不是作为一个主权国的政府来接受这些物资。

自由法国运动和加拿大的关系也采取了多少类似的方式。如果作为交战国的一方的加拿大在同维希的关系方面不象美国那样小心谨慎，那么加拿大法裔公民的存在就会使局势复杂化，因为法裔公民最初都把戴高乐看作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暴发户。1941 年 3 月，达让利厄奉派出使加拿大，并采取一些坚决的措施改组那里的自由法国运动。他成功地会见了维尔纳夫红衣主教和其他法裔加拿大人的领袖，做了不少工作去影响加拿大的政治思想，以支持自由法国，然后于 1941 年 5 月返回英国。

（四）圣皮埃尔与密克隆岛事件，1941 年 12 月

如上所述，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和北美大陆国家之间未来关系的前景比以前光明了一些。就在这时，在 1941 年圣诞前夕，海军中将米塞利埃没有顶先通知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政府，也没有得到它们的同意，就率领一支自由法国小舰队在圣皮埃尔岛上登陆，在这个小岛和密克隆岛上升起了自由法国的旗帜。这两个小岛在战争的大舞台上顿时变得十分重要，并不是因为它们的面积，而是因为它们在圣皮埃尔岛有一个强大的横越大西洋的无线电台。根据现行情况，这个电台是由维希控制的。这个电台不仅是维希和亲轴心国宣传的一个转插中心，也是维希政府和德国政府可以用密码迅速向他们在西半球的特务和支持者发出指示，并接受秘密情报的主要手段之一。英国人也赞成拔掉他们这个眼中钉，就他们来说，他们是愿意由这两个小岛投到法国一边以达到这一目标的。然而，英国认识到美国虽然这时已经参战，还是有可能对这一做法感到为难的，于是便去征询美国政府的意见。戴高乐有一度不断催促英国同意他进行这场必要的军事行动，但是，所得到的通知则是，在得到华盛顿的答复以前，未便同意。

12 月 16 日，国务院把这个问题呈交总统解决。他立即说他强烈反对自由法国对圣皮埃尔岛采取任何行动。加拿大政府方面则认识到，从军事上说，最好是使这座无线电台摆脱轴心国的控制。他们因此提议由加拿大部队在该岛登陆，接管这座电台，而让维希掌管岛上的行政工作。法国民族委员

会立即正式获悉了这个情况，并且知道英国政府因此不能同意由自由法国对圣皮埃尔岛采取行动。外交事务民族委员德让随即对这一决定深表遗憾，同时以民族委员会的名义作出保证说，自由法国将不采取任何行动。

这时候，米塞利埃在取得各有关方面的同意，于11月25日离开英国到冰岛和纽芬兰去巡视他的舰艇后，正来到了加拿大。他还利用这个机会访问了渥太华，希望能巩固一下下达让利厄那年春天在这个自治领内所建立起来的友谊。据说戴高乐的计划是，如果这次军事行动获得英国政府的同意，米塞利埃离开加拿大后就应该驶往圣皮埃尔岛，为自由法国取得这个岛屿。德让所作的保证，即民族委员会将不采取任何行动，则特别提到米塞利埃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会采取的行动。米塞利埃在12月17日曾会见加拿大外交部官员和美国驻渥太华的公使。据国务院说，他曾向美国公使保证，没有上级的指示或批准，他是不会自动到圣皮埃尔岛去的。因此，等到圣诞节这天，伦敦收到米塞利埃亲自发来的消息，说他已于前一日根据戴高乐最近下达的命令和当地居民的要求，在圣皮埃尔岛登陆，并在岛上居民中进行了一次没有流血的公民投票，居民几乎全体一致赞成参加自由法国。这时，英国当局更感到惊讶和为难。米塞利埃于是以民族委员会的名义接管了行政机构和无线电台。

我们很难断定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事后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这种见解，即民族委员会也和英国政府一样感到意外。米塞利埃回到英国后，同戴高乐发生了一场不幸的争吵，从争执中所说的一些话来看，有一种说法更象是确有其事的。据说在12月20日或20日前后，戴高乐本人没有同民族委员会商议，就决定不顾德让对英国政府所作的保证，用电报向米塞利埃发出了一道正式命令，要他占领这两个岛屿。即使英国政府没有暗中参与这样一个阴谋，也很不容易使美国或加拿大相信，英国政府不应对这件事负某种责任。然而既成事实还是被接受了，465 尽管是很勉强的。幸好在这件事发生时有一个美国新闻界的代表正在圣皮埃尔岛，并且接受了米塞利埃的热诚邀请，在场观察了公民投票的经过情况。他以赞赏的口气公开评论了所采用的程序是公正无私的。这次投票表明，岛上绝大多数居民都自愿地投票赞成参加自由法国。尽管如此，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的威信暂时还是蒙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如果我们说，罗斯福和科德尔·赫尔始终没有完全原谅戴高乐，而且此后还总是认为他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那大概也是正确的。

（五）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纷争，1942年

1942年1月到3月间，自由法国总部里泄漏出一些谣言，说在民族委员会的内部事务中出现了一场危机。早在1941年9月，在民族委员会成立和得到承认时，人们就知道米塞利埃同戴高乐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大体上讲，米塞利埃抱怨说，戴高乐对海军是个外行，却又插手管理自由法国的舰队，戴高乐则抱怨说，米塞利埃在搞阴谋，反对他作为运动的首脑的权力。米塞利埃当时公开说，他真希望看到民族委员会中，除他本人之外，至少还有一位委员对运动的忠诚（在这位海军将领看来）超过对戴高乐个人的钦佩：事实上，他是在指责戴高乐专门任命一些“应声虫”，因而也是指责戴高乐想要维持早先为形势所迫而由他享有的那种多少是专制的地位。这些内部纷争在米塞利埃不在时暂时平息下去，可是在圣皮埃尔岛事件以后米塞利埃于1月返回英国时，这些纷争就再次变得更加有力地暴露出来了。米塞利埃在民族委员会里并非全然孤立，不过毫无疑问，在大多数委员看来，戴高乐是

不大会犯错误的。这场争执在自由法国，甚至在英国的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更加使得某些方面早已流传的一些怀疑有所增加，认为戴高乐的专制见解和做法具有一种明显的法西斯色彩。最后，米塞利埃于

1942年3月4日辞去了他的海军与商船民族委员的职位，由戴高乐提名的奥布瓦诺海军上将接替。

然而，某种混乱仍旧持续未已，因为米塞利埃声称，466 他只辞去民族委员的职务，并没有辞去自由法国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当时，自由法国海军拥有四十九艘军舰，配备有总计大约四千三百名自由法国人员。此外，米塞利埃还坚持说，海军总司令这个职位似乎理所当然地是属于他的，戴高乐不能从他手中夺走，因为1940年他加入的不是戴高乐或是自由法国运动这一方——他那时并没有听说过这个运动——而是加入了英国人所代表的盟国这一方。米塞利埃在水兵中很得人心，这个僵局最终由米塞利埃不再参预自由法国的事务而获得解决，没有在水兵中引起骚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民族委员会在北非同吉罗将军的部队联合起来时为止。

（六）马达加斯加问题

1942年初，马达加斯加局势中的某些方面引起了人们的关切。盟国当局怀疑日本潜艇正利用迪耶果-苏瓦雷斯这一主要港口加添燃料，并作为攻击盟国在印度洋上的船只的海外基地，因此决定要占领该港。一支英国远征军为此而于3月间从英国启航。整个事件完全保密，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也不知道，不过据悉戴高乐受到南非报刊提出的警告的煽动，也在搞一项他自己的争取马达加斯加的计划，必要时还要动用武力（南非报刊当时一再发出警告说，日本军队有占领该岛的危险）。不把英国的意图通知自由法国的这项决定，部分是为了安全的原因，部分则是因为根据1941年在叙利亚的经验，英国人认为如果自由法国不参与这场冒险事业的话，英国在占领该岛时所遇到的抵抗就会小些。马达加斯加当时的总督是安内。1940年，他没有能代表贝当政府的利益去就任喀麦隆的总督，因为勒克莱尔上校抢先赶到那里，使那个属地投到了戴高乐这一边来。他本来就是维希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这样一来，出于个人的原因，他对自由法国的态度更为激烈。而且，据悉他的观点同吉布提的总督热尔曼和秘书安托万很相似。这两个人都坚决反对和盟军作成任何结果会使法属索马里落入自由法国控制下的交易。

迪耶果-苏瓦雷斯于1942年5月7日被攻占，但是在这一日期以前，英国远征军到达的消息已不可避免地成了人尽皆知的事。这次军事行动竟对自由法国保密，这一点使整个自由法国运动为之愕然。民族委员会对事先没有同他们磋商，又没有邀请他们参加，正式提出了抗议。他们极力要求，第一，自由法国部队应尽快参加占领和保卫马达加斯加，事实上这些部队应该马上派出，以便参加占领首时塔那那利佛和岛上其余地方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第二，民族委员会要求应把该岛的行政管理移交给他们，以使法国的主权不致受到妨害。第三，民族委员会要求审议法国在印度洋和红海的属地这一整个问题，这无疑是想到了吉布提。除了有关个人自尊心的一些问题外，戴高乐可以指出两点：英国人的单方面行动使维希宣传所谓英国政府有意把脱离贝当的所有法国殖民地并入英帝国的说法更为可信；而且英国人在马达加斯加所采取的行动已使自由法国统治下的其他法国属地的人民也相信了这种说法。他要求，为了清除这些谣言，至少应该准许自由法国运动派遣一名代表立即出发到迪耶果-苏瓦雷斯去。

英国政府不能立即同意这些要求，甚至对戴高乐提出的马上派一个自由法国联络官去迪耶果-苏瓦雷斯的最低要求也不能立即同意，因为同安内总督谈判全岛投降的问题正在进行中。这些谈判虽然毫无结果，但是仍然决定暂时不向迪耶果-苏瓦雷斯区域以外进军，因为占领该港就等于达到了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使敌人不能使用这一港口。结果，1942年5月13日在戴高乐的同意下，发表了一份公报，大意说英国政府在迪耶果-苏瓦雷斯采取了军事行动，以免这片土地为轴心国所利用。公报还说：国王陛下政府的意图是，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应在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的行政工作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468为民族委员会作为战斗法国的代表正在同联合国家进行合作。这份公报连同5月14日戴高乐发表的一次广播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自由法兰西帝国内产生的含糊的忧虑。他们担心英国人打算最终夺取法国的领土，或是自由法国运动将要解体，或者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不久之后，戴高乐也同意不急于要求分担马达加斯加的行政工作，只要占领的地区仅仅是迪耶果-苏瓦雷斯要塞一带的话。7月中旬，英国同意由民族委员会驻南非的代表佩科夫上校以自由法国联络官的身分对迪耶果-苏瓦雷斯进行短期的正式访问，主要是希望戴高乐根据他自己的代表亲眼目睹后所作的汇报会了解到，当地的维希军官和行政人员全不愿意投奔到他的运动中来。塞内加尔军队中有一部分人表示愿意参加自由法国部队，但是，实际上，他们那些白人军官都宁愿被拘留在南非。

同安内的谈判在夏天继续进行，但是，到9月初，情况已经摆明，如果不进一步使用武力，这个岛是不会投降的，于是，9月9日，英军开始从迪耶果-苏瓦雷斯地区推进。他们在9月13日占领了塔马塔夫，9月23日占领了首府塔那那利佛，可是直到11月5日才同维希的部队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与此同时，在10月底，英国和自由法国当局之间已经开始就马达加斯加行政管理问题进行谈判。12月14日，艾登和戴高乐签署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将于法国民族委员会任命的高级专员到达的那天起生效，内容涉及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岛。协议宣称其目的在于双方都希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法国对马达加斯加及其附属岛屿重新行使主权，并确保这些领土的防卫，使不遭受轴心国的攻击。协议在战争结束前将一直生效。高级专员将拥有根据法国法律授予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岛总督的全部权力，并将行使这些岛屿上法国部队司令官的职权，而另一方面为了军事目的，这些土地将构成中东英国陆海空军总司令的战略防区的一部分。而且，在高级专员拥有保证这些岛屿的防卫手段以前，这一责任仍由马达加斯加英军司令官承担。协议详细规定了由于英军驻扎在马达加斯加而出现的司法权问题，对迪耶果-苏瓦雷斯军区的行政和司法权问题作了特殊的安排，该地区的法国民政和军事当局必须满足英军司令官提出的一切要求。协议签字后，戴高乐任命勒让蒂约姆将军为高级专员。在他到达马达加斯加以后，这项安排实行得很令人满意。

（七）1942年“战斗法国”获得拥护的程度

1942年5月底，隆美尔在北非成功地把英国第八集团军向埃及边境赶了回去。初夏时，自由法国运动在北非立下了一项辉煌而英勇的武功，在全世界的心目中大大恢复了它由于最近的事态而颇受损害的威信。一小支自由法国部队在科厄尼将军率领下不仅在英军左翼的沙漠前哨基地比尔-哈凯姆守

了好几天，顶住了实力强大得多的机械化部队，而且终于成功地突破敌军的包围，重新与后方的盟军会合，途中遭受了重大的伤亡。

这项功绩对法国本土上的舆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自由法国运动这时接受了一些为了到英国来加入戴高乐一方而逃离法国的支持者，这一事实便说明了这种情况。在这些人中有法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公认的领袖、众议员和法国本土一个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安德烈·菲利普。

在他到达后不久，戴高乐便任命他为内政与劳工民族委员。同时，他又任命雅克·苏斯戴尔为情报民族委员，他是新近由美国来到伦敦的一个法国作家和政论家。470 戴高乐这时作出了进一步的决定，把运动的名称从“自由法国”改为“战斗法国”，部分是因为当时，特别是在美国，存在着五花八门的“自由”运动，把这个名词搞得声名狼藉了，部分则是因为有许多法国人把维希直接统治下的那部分法国看作“自由法国”，以区别于德国人所占领的那一部分。戴高乐还想通过这次名称的更改来表明一个事实，即法国仍在作战。他相信这个新的名称对那些在国内抵抗德国人的法国同胞会具有吸引力，这些人或者是“马基”中各个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或者是消极地遇有机会便进行抵抗的人。7月14日，英国政府同意注意到称号的这一更改，不过借此机会再次指出，虽然英国政府承认“战斗法国”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总的象征，这种程度的承认是给予整个运动的，至于民族委员会则被看作是代表这一运动的官方机构——言外之意是，英国之所以同戴高乐发生正式关系，只是因为他是民族委员会的主席的缘故。

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初，民族委员会竭尽全力，不仅想从英国方面，而且还从其他国家政府方面获得更大程度的承认。1941年9月26日，戴高乐和苏联驻联合国大使迈斯基交换了信件，信中苏联政府同意根据1940年英国政府采用的同样条件承认戴高乐。接着当时设在英国的其他盟国政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希腊、南斯拉夫、荷兰、挪威）、以及蒋介石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1942年，古巴、墨西哥、海地、加拿大、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南非联邦也承认了民族委员会。美国政府则满足于指示他们派驻伦敦各流亡政府的大使安东尼·比德尔同戴高乐和民族委员会保持接触。

这项对运动的外交承认再次引起了戴高乐和战斗法国在祖国的同胞中获得多大程度拥护的问题。维希的报刊和电台当然不会提供任何迹象。尽管戴高乐有他自己471的情报机构中央军事情报局，可是某些方面却认为这个组织的情报并不可信，因为这些人对于他们所认为的戴高乐的法西斯倾向深为不满，并且十分疑惑地看待中央军事情报局的各种活动。然而，到了1942年，不仅有许多份法国抵抗运动各个组织秘密印刷和发行的地下报纸流传到国外去，而且有一些具有不同政治见解和背景的法国人也成功地逃到中立国、美国和英国来，畅谈法国本土的种种情况。从这些来源所得到的消息大体上都很一致，这一点颇引人注意。看来很清楚，对戴高乐及其运动的拥护已经增强了，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民族委员会的愿望并不十分有帮助。实际上，全体法国人民都想看到德国人从法国被赶出去。战斗法国有助于完成这一目的，在这方面它是很得人心的。戴高乐的照片受到所有人的秘密珍藏，不过人们把他和他的运动看作一种有朝一日将会实现的希望的象征，而不是看作法国人统一行动的一个实际的或指导的中心，同时根本没有人考虑到战后可能成立的政府或政治组合问题。战前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已经知

名、又不曾破釜沉舟地公开跟维希走的人士，大多不愿意投奔戴高乐。他们担心戴高乐和他的大多数同僚在政治事务上缺乏经验，并且怀疑在法国获得解放，和平恢复以后，法国人民是否会愿意把命运托付给这个人。1942年1月，法国工会工作者的一个小代表团被偷偷送出本国来到伦敦，会见了戴高乐。他们的目的似乎是要试探一下他的政治见解。不知是由于这次访问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法国国内通称“解放”的那个抵抗运动公开宣布它愿意接受戴高乐的指挥，这个组织在政治上据认为是左派的。但是，这只是国内各地独立发展起来的好几个单独的抵抗运动之一。这些抵抗组织虽然大多并不攻击“戴高乐主义”，却从其他方面获得鼓舞，它们自豪地认为它们是国内土生土长的组织，集中全力用一切方便的手段随时随地给德国敌人造成损害。它们发展成为法国国内政治中的一股力量，那还是以后的事。

（八）戴高乐访问中东，1942年4月27日至9月

1942年7月底，戴高乐离开伦敦前往中东。8月7日，他在开罗会见了史末资，并于3月8日同接替利特尔顿出任驻中东国务大臣的凯西举行了会谈。叙利亚事务进行得并不顺利。叙利亚人认为贾德鲁允许他们享有的限制性宪法并没有履行1941年6月8日盟军进入他们国土时贾德鲁本人所发表的声明中包含的那项自由的诺言。结果，他们有一段时期一直在要求举行自由选举。有人断言，自由选举的结果将会证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广大选民既不赞成这个制度，也不赞成那些他们认为是强加于他们的领导人。为了亲自了解一下情况，戴高乐便从开罗到了叙利亚。在那里，他马上同英国公使斯皮尔斯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戴高乐要求召回斯皮尔斯，硬说他在推行自己的一套政策，对法国采取敌视的态度，并且打算在近东由英国代替法国取得首要地位。然而，斯皮尔斯受到英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于是戴高乐使用一系列演说和行动来反对英国的政策与目的。这种困难局面于8月28日戴高乐在贝鲁特发表了一次演说后发展到了顶点。他在这次演说中使用的词句似乎修改了早先以他的名义作出的给予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诺言。他说，法国取得它在这个国家里的地位，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从国联接受下来的一项委任统治权而得到的。叙利亚的最终独立一向是法国的目标，的确也是委任统治的目标，但是只有法国才能宣布叙利亚独立。不论他多么希望促进叙利亚人争取独立的愿望，他却不能就这样一个问题用法国人民的权力讲话，而法国人民也只有他们的祖国肃清了敌人并由他们选举出一个民主的政府后，才能宣布他们的意志。这至少是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对戴高乐的话所作的解释。

因此，近东的不安增强了。这种形势同中东的军事需要完全背道而驰。这使英国政府向民族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要求。戴高乐外出时，民族委员会继续留在伦敦，由普利文临时担任主席。英国政府要求戴高乐立即回来就叙利亚问题，并就马达加斯加问题举行会谈。戴高乐稍事拖延后，表示同意，并于9月25日再次到达了伦敦。

如果说戴高乐同英国政府的关系再次发生困难的473话，那么，他同美国政府的关系也比以前更为紧张。戴高乐在叙利亚时，认为时机适当，曾向美国驻贝鲁特的领事提出两份备忘录，拿他自己的中东政策同英国的中东政策作了不利于后者的对比。国务院并不赞同他的看法，这种局面丝毫没有因为戴高乐同温德尔·威尔基在叙利亚的一次会晤而有所缓和。美国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关于戴高乐意见的断章取义的报道，它们甚至报道说，他曾向英国

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所有英军撤出近东国家，否则，他将使用武力以达到目的。不论这类报道多么不真实，甚至多么荒谬可笑，它们对于维希和轴心国的宣传却是天赐的资料，同样也使各盟国感到十分为难。正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中，英国外交部同外交事务民族委员德让之间在伦敦举行了会谈，目的在于就叙利亚问题拟定一项新的解决办法。他们建议应该确立一种在包括埃及在内的一切中东事务上进行相互磋商的程序，并建议民族委员会应保证于 1943 年春在近东举行自由选举。这个计划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当民族委员会征求贾德鲁的意见时，他对这项计划横加批驳，于是戴高乐拒不接受。外交事务民族委员德让为此辞职。普利文接替了他，一直担任到几星期后马西格利加入到戴高乐这方面来时为止。

（九）“战斗法国”运动并入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

有关叙利亚问题的一无结果的谈判刚刚破裂以后，就发生了一些事件，使整个战局完全改观，并对“战斗法国”运动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关于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及美国当局为了取得法国人的合作而采取措施的情况，均在本丛书的另一卷中予以叙述，而在本卷的前面一节里，我们也曾述及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为争夺希望见到盟国事业获胜的全体法国人的领袖的斗争，以及 1943 年 6 月最终组成设在阿尔及尔、并由两位将军共同担任主席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谈判经过。这里需要谈的只是，建立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协议也规定了结束战斗法国作为一个独立团体的步骤。英国首相于 1943 年 6 月 8 日在下院宣布，集体负责的新委员会的成立已经代替了他个人和戴高乐于 1940 年 8 月 7 日交换照会后所产生的那种局面。换句话说，后来称作战斗法国的自由法国运动已告结束。

戴高乐本人以及他的主要合作者在把他们的总部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以后，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戴高乐先在北非，后在法国本土上的进一步活动，不属于本草所要讲述的范围。

第五编 西欧被占领国家
奇尔斯顿子爵

第一章 475 比利时

1940年5月，在那些陷于失败和被占领的一片混乱的国家中，比利时的苦境具有某些使人对它感到分外同情的特点。第一，国王对待这场灾难的态度同他的政府的态度并不一致，因此比利时人民极其困惑、满怀怨恨，起初得不到明确的领导，以决定自己的态度。第二，德国人对比利时的政策不同于他们对大多数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政策，一开始就明目张胆地不尊重比利时的领土完整及其各种机构制度。比利时东部某些长期发生争执的地区立即被并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而把比利时的大部分领土同法国北部一部分地区合并在一起，完全置于军事管制之下。第三，在德国发动进攻的初期，比利时政府曾命令一批青年逃往法国，希望他们可以为建立一支光复比利时的军队奠定基础，由于法国沦陷，他们未能实现这种愿望，反被屈辱地弄回比利时来，听任德国人摆布。这批年轻人以及比利时其他阶层的人士所感到的沉痛的屈辱，在占领初期被德国的宣传机关巧妙地加以利用。大多数比利时人尽管内心绝望，憎恨侵略者，却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德国胜利了，因而必须同敌人合作。只有少数人对继续抗战，对当时只有英国所单独代表的那种力量的最终胜利，仍具有信心。

当利奥波德国王以总司令的身分于1940年5月27—28日夜提出比利时军队向德国人无条件投降时，他决定按照自己较早时候发表的声明，本人也跟着投476降。另一方面，比利时政府已经决定转移到法国，在那里用奉到特殊命令撤退的青年组成的比利时新军继续作战。人们当时希望国王也会从国外继续行使国家元首的职责，并指挥这支新军，但是，他顽固地不肯这样做。然而，他的确就宪法地位的问题征询了三个法学权威的意见。他们正式宣布，投降是国王以总司令的身分作出的一项军事行为，不是一项政治行为，并且鉴于国王已经成为战俘，比利时政府根据宪法有权决定国家今后的政策。尽管这个声明主要是为国王的行为剖白，它的措词以及措词的含意最初仍为大多数比利时人所不知道和不理解，他们倾向于毫无保留地赞同国王的行爲，而不赞同政府的做法。甚至当政府成员于5月31日在法国里摩日集会，谴责国王的行爲时，这种态度仍占上风。法国的崩溃和比利时政府一时陷入的困境（这种处境使他们考虑返回比利时，谴责先前自作主张逃到英国的一个内阁成员雅斯帕尔），的确使人民的情绪变得激烈地反对所有那些指责过国王的行爲而自己又没能抵挡住德军的人，那就是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政府。他们认为国王坚守了自己的岗位，而所有逃往国外的比利时政府官员都是逃兵。公众思想的这种混乱状态，肯定使德国人在初期更易于推行他们的分裂计划，但是，在一系列意义重大的事件的帮助下，比利时人民具有的那种突出的独立和批判的精神逐渐重新显露出来了。由于不列颠之战和戴高乐477将军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出现，英法两国又恢复了不少信心，正如比利时流亡政府通过在伦敦同英法当局的联合，以及通过利用英国广播公司提供的专题广播节目能够同国内的比利时人取得联系，又恢复了他们的信心一样。而且，同德国人合作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大批战俘仍然遭到囚禁。粮食供应情况更形恶化。镇压爱国人士的初步措施已经付诸实施，德国士兵起初装得遵守纪律，彬彬有礼，这时又故态复萌了。接着，早在1940年9月，德国人犯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要求正式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活动分子的名誉。这一要求，以及他们任命一些公开的卖国贼担任政府中的要职并控制一切宣传机构，都使比利时人醒悟过来，认识到祖国正处于危急

存亡之秋。至于国王的情况，那种赞同他的行径并贬低政府的行径的趋势，前文已经谈论过了。甚至他在 1940 年秋到贝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之行，以及他的妹妹皮埃蒙特公主对他的几次探望，都被人们作了可能的最好的解释。尽管他身边的一些重要成员似乎都是通敌分子，而且还在鼓励别人也同德国人合作，但是，人们并不认为他们就必定是表示了国王本人的观点。国王在大多数人民中的声望有一度非常高，所以，那些通敌分子和爱国人士都利用了他的名义。的确，正是这些通敌分子无耻地滥用国王的名义，才使他的声望一落千丈。而且随着盟国获得胜利的希望日增，比利时人民对国王的极端谨慎也愈来愈感到不满，并且开始觉得国王毕竟作了错误的判断，如果他出国了，在国外领导抵抗运动，那将会更好些。然而，使形势转而不利于国王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国王同 478 平民莉莲·贝尔丝结婚的消息。莉莲·贝尔丝是一个佛兰芒天主教政治家的女儿，舆论怀疑他同敌人合作，是否属实，不得而知。这种婚姻性质，再加上把婚事隐瞒了三个月（他们在 1941 年 9 月 9 日结婚，到 1941 年 12 月 7 日才由大主教予以宣布），以及人民念念不忘国王的第一个妻子阿斯特里王后，所有这些事情凑在一起便产生一种幻灭的气氛，使那种笼罩在已成为阶下囚的国王身上的迷人的灵气迅速地消失了。

国王逐渐不再成为全国的希望与自尊的中心（或是最后的庇护所），这无疑有助于流亡政府巩固其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国王而成为比利时重整旗鼓的中心。一旦他们清除了头脑中的一切姑息思想，真诚地致力于同其他盟国一起无情地反对德国人，他们就可以具备更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一任务。另一方面。那个可敬的但年老而平凡的人物于贝尔·皮埃洛不是一个象法国的戴高乐那样鼓舞人心和精力充沛的领导人，而且由于人们记得皮埃洛政府就他们对待国王和德国占领的态度最初发表的一些谬论，这个政府在比利时始终不得人心，甚至始终没有拥有绝对的权威。结果，流亡政府对国内抵抗运动的控制（它在荷兰和挪威，是一个异常令人满意的特色）在被占领期间至多不过是一件颇有问题的事，而在解放以后，又遭到如此公开的挑战，以致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

这个合法政府的自动流亡国外，至少使德国人失去了强迫它成为贯彻他们意志的工具，从而给他们的行为披上一件合法外衣的机会（例如，他们在丹麦就利用了这种机会，因为丹麦的合法政府留在国内）。不管怎样，情况可能是合乎德国人的心意的，因为它使德国人可以不必费多大力气就能在全国建立一个纯军事性的政府。因 479 为比利时是继续对英作战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又是为了德国的战争机器的利益几乎可以进行无穷剥削的经济资源的丰富贮藏所，所以建立一个军政权显然对德国人是最合算的事情。毫无疑问，为了同样的原因，德国人也不想按照他们在其他一些被占领国家的一贯做法，扶植一个“吉斯林”团体来作为傀儡政府。比利时关系重大，德国人是不敢冒这种风险的，他们宁可让那些对立的“卖国团体”经常捉摸不定，使他们互相火并以坐收渔翁之利。把法国北部的两省置于同比利时一样的政府管辖下的决议，同样地主要也是出于军事意图，虽然经济与政治意图也有一定的影响。把距离英国海岸最近的比利时和法国沿海地区置于一个司令部之下，这是适宜的。同时，从经济观点来看，把比利时的埃诺和佛兰德工业区同法国里尔和瓦朗西安周围的工业区形成一个整体也可以认为是得当的。从政治方面说，这项安排使德国人有了一种手段，一方面可以利用维希政府

担心失去这些重要领土的心理来操纵维希政府，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佛兰芒的极端主义分子永远保有这些地区成为一个佛兰芒国的一部分的希望来操纵这些极端主义分子。

因此，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行政机构是纯军事性的，当地的最高权力就是该地区的最高军事司令官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但是，他所控制的行政机构却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一为军事司令部，负责处理与德国军队直接有关的一切事宜；另一个为军政府，负责监督比利时全国的行政机构，保证为了德国的战争努力全面剥削比利时的经济。军事司令部下面分设四个战区司令部、五个战地司令部以及若干分区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战区司令部和战地司令部都设有德国军事法庭，各级司令官都有权惩办反对德国武装部队的罪行和破坏治安的一般罪行。军政府的首脑是埃格特·雷德尔将军。他以这一身分在处理民政、政治和经济问题方面充当法尔肯豪森的主要助手。因此，雷德尔的机构又分为若干部门，诸如“经济 480 总部”、“生产”、“司法”、“交通”等等。此外，它还在比利时各个大小企业单位里派驻了专员，并对它特别希望控制其活动的所有机构指派了代表或联络官。同时，德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如外交部、宣传部以及盖世太保——都在比利时设有它们自己的代表所主持的办事处。盖世太保在希姆莱的代表容克劳斯的领导下，在比利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机构，奉命对德国人和比利时人都同样进行侦察。

尽管德国人的控制在最高一级是全面的、无所不包的，但是，比利时的实际行政工作是由比利时国家的旧机器在继续执行，也就是说，由全体文官在政府各部门的秘书长领导下执行。另一方面，秘书长们这时已取得了按照合法的宪法根本不应行使的权力。他们本来只是对国王的一个大臣负责的政府各部门的常务首长，自身并无任何执行权力，这时却都具有大臣的地位与性质，拥有为了占领国独有的利益而行使的广泛权力。的确，德国入侵的当天（1940年5月10日）通过了一项法律使他们的地位变得有点含糊。该项法律批准了早先通过的一项法律（1935年10月5日），而该项法律则规定万一比利时遭到敌人占领，某些官员应坚守岗位，并授予他们某些通常属于他们上级的权力。不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在有关官员“同他们〔平时〕对之负责的上级领导失去一切联系”时才能行使这种权力。而且，根据海牙公约，这些官员 481 只有在占领国尊重该国现行法律的情况下，才有义务协助占领国工作。皮埃洛在答复一个秘书长的询问时写道（1940年5月15日）：“违背国家的法律和特别法令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遵守法律条文而有利于敌人推行其计划，那么这也是同样不能允许的。”他又补充说，象 1940年5月10日的那类法令，“不论比利时政府在颁布时是如何可以为之辩护，甚至是如何值得称赞的，然而及至它为敌人贯彻执行时，那又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了。”

尽管有了这些告诫，原先的秘书长们大多在最初都乐于继续留任，只有一两个人立即拒绝工作，再不然是被德国人强迫离职。但是，一年之内，在这些秘书长中就发生了若干变动，这或是由于他们有所觉悟而自动辞职，或是由于德国人精心策划了一项法令（1941年3月7日），规定了六十岁为某些等级的官员的退休年龄，从而可以将某些不可靠的或难以驾驭的官员悄悄地免职。在这以后，某些关键部门的秘书长是些什么样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都是一些乐于推行德国政策的工具。其中最主要的是内政部部长罗姆塞，他的职权大为扩大，使他能控制宪兵队、卫生部门、物价管制机构等，并把同伙的通敌分子都安插在宪兵队、省和地方的行政机构，甚至地方学校（这种学校的教师一般是由地方指派的）中。同样，司法部秘书长舒安也在地方司法官员中安插满了新秩序的拥护者。经济部部长利曼把观点相同的人安插到重要的经济岗位上。农业部秘书长德温特把原来的粮食部并进了他的部，并通过全国农业与营养协会（强迫农民参加的一个协会），通过设置特别法庭来审判违反粮食条例的案件，使比利时的全部农业生产都可以为德国人的利益服务。

这样，德国军事司令官和比利时的秘书长们就共同颁布了如此繁多的、涉及国家与个人生活各个方面的新法律与新条例，因此最终必然使比利时以前的法律归于无效，并破坏了国家的宪法。德军司令官有权颁布法令，这些法令倘有需要，可以使比利时的一切法律失效。因此，最明目张胆的破坏宪法行为一般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而需要使这种破坏生效的纯行政措施则交给秘书长们去办，由他们颁布命令以付诸实施。虽然如此，毫无疑问，由于冯·法尔肯豪森个人的品质以及德国推行的想以温和的待遇赢得比利时合作的这一总的政策，这个政权最初并不象在其他被占领国家实行的、德国民政与军政机构并存的那种双重体制那么令人难以忍受。但是，等到比利时人民逐渐认识到这个政权的根本目标时（即完全分裂了原来的比利时国家，并残酷无情地掠夺其物质资源以供德国进行战争），他们的敌对情绪和抵抗意志便被激发起来了。到了这种反抗以种种破坏行为和违抗新秩序的行为表现出来后，镇压的措施必然变得更加残酷，采取了种种报复行动，任何假装友好合作（对那些吉斯林集团是一个例外）的外衣全都不得不扯下来了。

投敌的秘书长和其他行政官员都是从吉斯林集团的成员中吸收进来的。诚然，这些集团对于德国人所提供的更多的、更坦率的支持是会感激不尽的。首先，他们本来就希望德国人会允许秘书长们公然代表政府露面。其次，每一个运动都强烈希望在改造他们的国家并为国家重新制定方针时起主导作用。但是，德国人觉得更为有利的是，通过先后使一个个集团相信自身受到德国人的特别眷顾，利用各个集团之间的竞争，使之互相倾轧而从中渔利，并使他们担负掠夺和奴役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工作。这样一种政策特别容易在比利时推行，因为比利时 483 的吉斯林集团数量最多、最为复杂，这又是比利时民族分裂的一种反映。他们各自的目的和宗旨从完全接受德国的统治，并渴望把比利时并入德国的版图，到赞成建立独立自主的佛兰芒国和瓦隆国，应有尽有。由于佛兰芒人在种族和语言方面同德国人有着明显的较为密切的关系，纳粹运动在佛兰芒人中比在瓦隆人中基础更为深厚，而德国人往往比对其他集团更为偏袒佛兰芒吉斯林集团——其主要代表为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也就并不违背常情了。此外，应该记住的是，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比利时时，曾成功地收买了一批佛兰芒人，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利用了当时佛兰芒人对他们在比利时国内所处的稍微低下的地位而抱有的相当强烈的不满情绪。

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在佛兰芒纳粹党团中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政党。它到了 1941 年年中，似乎有可能在占领下的佛兰芒垄断政治行动。的确，1941 年 5 月，在德国入侵前就已存在的其他两个佛兰芒法西斯运动，荷兰民族主义团结联盟和佛兰芒雷克斯党（雷克斯运动的佛兰芒分部，雷克斯运动内主

要都是瓦隆人)合并起来,加入了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但是,几乎紧接下去德国人就进攻俄国了,而且或许为了欢迎增加精神支持与人力,他们表明准备赞助另外一些佛兰芒法西斯团体,尽管它们的方针不一定同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的一致,而且确实往往还发生抵触。他们还准许这些团体进行宣传,并组成它们自己的准军事队伍和分遣队,开赴俄国前线。

到了1942年底,德国人开始斥责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恶意地把它比作荷兰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纳粹党)和比利时的日耳曼—佛兰芒工人协会。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的目标,尤其是它的“大荷兰”的理想,开始受到批判,而兼并主义的日耳曼—佛兰芒工人协会的领袖范·德·维勒在德国人看来则已死心塌地地相信希特勒,从而摒弃了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的“帝国主义与一党主义”的倾向。在瓦隆,德国人对莱昂·德格勒尔领导的法西斯运动(雷克斯党)也给予少量的支持,但是,往往显得更喜欢一个对立的组织,大德意志帝国之友。尽管德格勒尔满腔热情地宣称效忠希特勒,他所获得的报偿并不是他所希望的高官厚禄,而是获准以他自己在瓦隆招募起来的瓦隆军团一名士兵的身分到俄国作战。雷克斯运动从战前在议会中有三十名代表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政党,竟然沦为只不过是替德国军队和警察部队招募新兵的机构,因为德格勒尔公开投到德国人那一边后,他先前的支持者们就大多立即抛弃了他。的确,当德格勒尔从俄国回来以后,穿着德军中尉的制服,当着德国当局的面,于1943年1月发表讲话,声称瓦隆人是日耳曼人,应为日耳曼社会而战时,他的主要合作者中就有好几个退出了雷克斯运动,不再同德国人合作了。同年3月,雷克斯党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瓦隆军团的招兵工作。不久之后瓦隆军团取得了(党卫队)的地位,更名为党卫队瓦隆旅。

佛兰芒和瓦隆的法西斯分子之所以都未能真正控制住比利时,从而在德国人的统治下取得掌握实权的地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未能赢得教会的支持。原来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和雷克斯运动都大肆宣传一种极端的天主教教义,并同教会有最密切的关系。他们就靠了这一485点才能够吸引大批教士参加他们的运动——虽然他们始终没有得到上层教士的赞同。但是,等教士看清楚这两个集团主要是想为德国纳粹的目的出力效劳时,他们除了少数几个微不足道的人以外,都坚决脱离并反对这两个集团,因为纳粹分子反对天主教的行为已经臭名昭著了。这样,教会当局就拒不接纳那些穿政治制服的天主教徒参加圣餐式,也不允许在教堂里展开政治性的旗帜,而他们拒不给那些在俄国被打死的或者在国内被爱国人士“处决”的吉斯林分子做安魂弥撒,则激起了德国人和吉斯林分子一起进行种种威胁。

至于教会对德国人的态度,它虽然不反对他们行使根据国际法属于他们的那种权力,却始终准备领导人民对他们违反国际法的许多暴行进行抵抗,并准备大胆地站出来捍卫受到威胁的基督教原则。站在这种抵抗最前列的是比利时大主教范·罗埃红衣主教。主教们不断地提醒信徒,爱国主义和忠于本国的制度是他们应尽的天职。尽管德国人作了长时期的努力,对教会推行一种怀柔政策,但是,教会的爱国主义态度终于使他们生气了,从而带来了种种后果。红衣主教和主教们特别提出抗议的事项是,强迫劳动(德国人于1942年3月推行),把比利时工人放逐到德国去,强迫矿工在礼拜日工作,以及没收教堂的大钟。尽管这些抗议得不到德国人的回答,但是,由于教会在比利时具有强大的势力与影响,它们在维持比利时的民心士气和抵抗意志方面却起了巨大的作用。另一个培养抵抗精神并使之见诸有效行动的非常有

影响的地方是大学。在列日和根特的国立大学里，德国人通过吉斯林式的教育部秘书长比在布鲁塞尔的自由大学或洛文的天主教大学里更易于贯彻他们的意志。布鲁塞尔大学因为反对任命吉斯林分子担任教授，同德国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后，被关闭了（1941年12月），学生则由其他大学吸收去了一——主要是洛文大学，它很慷慨地免除了这些学生签署通常是强制性的皈依天主教的宣言。1943年3月，德国人颁布了一项新法令，强迫大学一年级的全体男女学生报到，参加六个月的体力劳动。而且，今后凡是没有先参加过至少一年劳动的人，一概不准注册进入大学。根特和列日的大学举行了罢课；校长拒不合作，甚至经过几个月后，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学生报到。洛文大学的校长范·瓦埃昂贝格断然拒绝答应德国人提出的交出学生名单的要求，因此被判监禁十八个月。他的英勇的反抗在比利时人民中唤起了最为崇高的敬仰和热情。

在占领初期的抵抗活动中树立优良榜样的另一个很有影响的团体是比利时的司法部门。但是，他们后来同德国人的妥协尽管是迫不得已的，却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失望，并使他们早期抵抗活动的荣光暗淡了。的确，在占领的头两年中，德国人和比利时的通敌分子都感到司法部门是实现他们计划的主要障碍。首先，上文已经提过，国王在投降那天所咨询的那三个法学家作出的决定，使得在伦敦的皮埃洛政府成为比利时唯一合法的政府，从而无法成立任何一种稍具合法外表的吉斯林政府。其次，早在1940年秋，另一个法学家团体立法委员会正式宣布，秘书长的立法权是有明确限制的。其结果是很487多诉讼当事人都在法庭抨击秘书长所作出的决定。最后由最高法院通过一项判决（1941年4月7日），宣布秘书长所作的决定大都是不合法的。这时，冯·法尔肯豪森进行了干预，他下令（1942年5月14日）禁止法院有权质问秘书长颁布的法令是否合法，参加这类案件的一些律师也遭到逮捕。1942年7月4日最高法院同秘书长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秘书长们可以作为一个“团体”集会与立法，但是当罗姆塞于12月自动地颁布一项重要命令时，又发生了冲突。布鲁塞尔上诉法院的法官在裁定由于这项命令所引起的一桩案件时，宣布这项命令是非法的。德国人于是逮捕了这些法官。最高法院的法官接着举行罢工以示抗议。德国行政长官雷德尔回避问题，颁布了一道命令，使阻挠司法部门重要机构的活动成为一项罪行，最终可以判处死刑。于是罢工停止了，德国人释放了被逮捕的法官，双方就秘书长的权力问题暂时达成了一项妥协办法。

也许因为是最常使用，所以最为有效的抵抗武器，就是那些秘密报刊。这些秘密报刊仅就其数目之多（约二百种）和内容的多式多样来看，确实是令人可畏的。德国人已经控制了公开发行的报刊，使之掌握在吉斯林分子手中，从而完全改变了它们的方针，为德国人的宣传目的服务。因此，迫切需要出版一些新的秘密报刊来抵销德国人主办的那些报刊，重新恢复全国的民心士气，并把少量488的、可以依靠伦敦广播电台插送的一般新闻以及大量国内消息提供全国，同时还指示可以在何处和怎样进行最为有效的抵抗。秘密报刊最大的力量来源在于它们不是集中在一处的——全国所有的城市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报纸——但是，由于大量发行显然有困难，这样做既是出于需要，也是非如此做不可的。另一种力量的来源是秘密报刊内容的多式多样，这是比利时国民性格的较为直接的反映。它们几乎迎合了各方面的兴趣，几

乎可以看到各种政治色彩的东西。各报之间经常展开纯政治性的论战，但是大家都认清了共同的敌人并与之战斗，而且在秘密工作的实际问题上都共同合作。

至于比利时一般公众的抵抗运动，它的发展并不象它的组织起来那样缓慢。甚至在早期个人抵抗的形式——如故意使行政工作与警察工作发挥不出效力，在工业生产中采取“怠工”的策略，对德国人普遍采取敌视态度等——故意使德国人的控制机器疲于奔命，使德国人在掠夺中不能得到全部利益，并促使他们对自己最后的胜利感到不安和怀疑，这些方面倒也颇有成效。而且，很多个人的明显反抗行动，如杀死可恨的吉斯林分子，破坏工业或交通等，都是早在组织进行这类抵抗的团体成立以前就自发地干起来了。根据当时报刊上的大量报道和关于这一问题的可以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很难对比利时反抗行动的实际发展、性质、规模和次数，以及占领国对这些行为所进行的报复，得出一个简明的概念来。早在1940年7月8日，德国人在经由布鲁塞尔电台发出的一次广播中就第一次承认，有人破坏电话和电报通讯，并扬言要全面进行报复。从那个日期起，经常出现一系列有关破坏交通、谷物、汽油库、工厂等等的类似的报道和公告。德国人最初采取的报复办法是，把若干遣返的战俘再次囚禁起来，强迫比利时人守护工厂或军事设施，以及征收集体罚款，但是，报复办法逐渐更加严酷起来，直到开始枪毙人质。大约在1941年2月以前，处决爱国人士、破坏者或人质总是尽可能保守秘密，但在1941年9月19日，德国人发布一道命令，宣称比利时境内被拘留的全部政治犯（据信这时约有四百人）均应作为人质。遇到德国军人489和警察人员受到袭击而又抓不到肇事者时，就枪决一批这些人质。如果这样一次袭击造成了死亡，那至少要处决五名人质。

将近1942年底时，破坏行动与报复行为的比率急剧上升，而且直到占领结束时一直都在上升。同时代的德国人方面的某些简略的资料，有助于对这类情况作出一个公正的估计。1943年4月24日，德国占领当局宣布，从那年年初起他们已逮捕了“三百一十名恐怖分子”和“五百二十二名共产党工作人员”，其中凡未“立即枪决”而已“移交军事法庭者，也应处以死刑”。同时，他们列举了对“通敌的党派成员的生命财产进行过一百八十八次袭击”。1943年7月20日，英国广播公司在纪念比利时独立日的一次广播中指出，自从德国人开始占领以来，他们已“处决或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了”三千多名比利时人。

1942年和1943年德国人对比利时和西欧其他一些被占领国家无情地推行了一套征集男女到德国工厂劳动的制度，在比利时工人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在1943年2月和5月间，要把大批比利时人押送到德国去的威胁，激起了列日、沙勒罗瓦、拉卢维埃、蒙斯和维尔维埃这些大工业中心及其附近的地区爆发了罢工。2月间，列日的六万名工人罢工，迫使德国人暂时推迟了他们原已计划好的押送工作。3月间，沙勒罗瓦电厂为抗议德国人把一千二百名工人转移到德国去而发动的罢工，迫使德国人把押送出境的人数减少到四百名。德国人对这类抵抗采取了报复措施，他们发布了一道命令，规定凡破坏劳动合同，拒不服从强迫劳动条例，或在其他方面表明怀有恶意者，均将没收其配给证。

下一年即1944年的头三个季度中，比利时人继续经490受纳粹压迫的苦难——强迫劳动、押送出国、枪杀人质、大批逮捕和处决。证实这种情况的

资料又是来自比利时人和德国人方面的。2月底，比利时通讯社“安贝尔”报道，列日大约有两万名居民“躲进森林，逃避强迫劳动或押送出国。3月初，德国人下令要居民撤出比利时沿海的大片地区，包括奥斯坦德在内，以便把这些地区以及毗邻的荷兰一些地区放水淹没。同时，他们实行了一项新的“快速审判程序”，以对付日益高涨的反抗运动。根据这项计划，将派特别军事法庭前往出事地点进行即决裁判；任何人携带武器、弹药或爆炸物，一经查获，当天当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接着立即处决了大约七十名或七十名以上的人质，德国人自己公开承认在3月6日至11日间，处决了六十二名人质。他们还透露出来，在1943年3月1日至1944年2月15日间，他们逮捕了“大约四千七百名共产党人、恐怖分子和匪徒”，其中“有九百六十二件杀人、爆破和其他破坏活动的案件已经毫无疑问地结案了”。由于大家都知道这类活动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至少大概有那么多人被处决了。根据比利时司法部1945年递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证据，在占领期间被处决的比利时人中，大约有两百名肯定属于人质一类，还有大约五十个人是在他们犯了处死刑的罪行以前就已经被捕了。比利时司法部还估计，至少有六百五十个比利时人被押送到德国集中营去，其中有很多人就死在那里，人们也知道这些人都是德国报复行动的无辜者。

尽管德国人实行了这种恐怖政策，抵抗和破坏活动仍有增无已，尤其是在6月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这时，比利时的一些抵抗团体同法国的抵抗团体联合起来，有计划地破坏交通工具，从而大大妨碍了德军的撤退。“盟军登陆日”也在德国方面发生了强烈的影响。第二天（6月7日），利奥波德国王从比利时被转移到德国。6月6日，国王发表了一份告人民书，告诉人民他对于即将491把他转移到德国去一事曾提出严重抗议，并号召人民保持英勇团结。7月间，在暗杀希特勒未遂事件发生的前夕，德国控制的形式和人员进行了彻底的更动。根据1944年7月13日的一项命令，格拉塞将军奉命接替冯·瓦尔肯豪森将军出任比利时与法国北部德军总司令，比利时的德国军政府改为一个文官政府，由科隆—亚琛行政长官约瑟夫·格罗厄以德国专员身份出面领导（他继续担任行政长官）。这样做的目的是，把比较温和的军事政权改为对比利时人的生活、活动与资源实行更为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控制。但是，德国人那种急剧恶化的处境使他们甚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不得不用其他一些更为严峻、更为激烈的措施来代替这一步了。希姆莱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已经有一个党卫队将军叫做里夏德·容克劳斯作为他个人的代表了。8月初，据宣布，这位将军已被派为上述地区的党卫队和警察长官。几天以后，他又奉命指挥该地区的军队。可是尽管最后干了几件报复与恐怖事情，容克劳斯已没有时间来巩固他的统治了，因为在他的任命发表后两星期，盟军已经攻入了比利时，并于1944年9月3日光复了布鲁塞尔。

最后需要谈一谈比利时抵抗运动的性质、目的和组织情况。注意一下比利时的抵抗运动甚至在组织起来以后仍然很明显地分为两种形式，即积极的与消极的，这是很重要的。消极抵抗运动的团体主要是由战前一些政党的领袖按照党的方针组织起来的，目的在于鼓起国民的斗志，以抵制德国人推行纳粹化的企图，维护并促进他们492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纲领，准备迎接解放。另一方面，积极抵抗运动的团体则不遵循明确的党的方针，它们组织破坏活动和准军事队伍，目的在于阻挠德国的行政工作和暗中破坏德国的作战努力。这两种抵抗运动虽然各树一帜，互不相关，但是一种运动的成员

同时也可以参加另一种运动；而只有共产党人则提供了唯一的实例，把抵抗运动的这两方面在一个党的绝对领导下真正地联合和协调起来。诚然，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共产党的人数有了惊人的增加，威望也有了惊人的提高，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组织严密、积极开展“地下活动”，因而吸引了一些比利时人，这些比利时人并不一定是倾向于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看到共产党人比其他团体更全面地展开积极的抵抗活动。由于德国人一贯总把所有的破坏活动都归咎于共产党人，力图把仇恨统统集中在俄国和“布尔什维主义”上面，这就进一步提高了，甚至夸大了共产党人的威望。

最后，共产党人终于支配了最大的积极抵抗者的团体，即独立阵线，该组织创立的目的是要把各种专门从事破坏活动的小地下组织都团结在统一的指挥之下。大战结束时，独立阵线显然成功地把这些形形色色的小团体合并起来，因此共产党人获得了最大的人力遗产。然而，几个重要团体仍然留在独立阵线之外，原因在于它具有极左的面貌。这类团体是：比利时军团、白卫军、步枪队，以及民族解放阵线。比利时军团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准军事团体，它在全国各地组织严密，指挥官大都是以前的军官，武器弹药充足。军团的目的是要在盟军发动进攻的那天提供重要的合作，但是下述任务也是他们的目的，即提供一个强大的警察组织，以便在德国的统治崩溃以后，比利时的合法政府重新建立起来以前这段危险时期里维持公共秩序，防止左翼的地下激进分子发动政变。然而，后一目的必然引起了左派人士的怀疑，认为比利时军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企图搞政变。对于留在独立阵线以外的其他一些运动也抱有同样的怀疑，认为它们有独裁主义的倾向——部分可能是由于这些组织的名称带有 493 反动的味道，如“白卫军”、“步枪队”等，部分可能是由于其成员的成分主要是天主教徒和以前的军人。白卫军组织严密，主要在佛兰芒地区活动，步枪队则在瓦隆地区十分活跃。民族解放阵线也是由一些老战士所组成，这些人都是来自三个传统的主要政党——天主教党、社会党和自由党——因而排除了共产党。

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抵抗团体后来被通称为秘密军。尽管它们在人员、纪律、武器和其他资源方面具有潜力，但是在解放时期和解放以后却不能指望同独立阵线一样得到民众的支持与爱护。舆论的趋势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整个欧洲，都极其强烈地倾向于左派。虽然如此，比利时的右派却享有左派所不曾具有的一个极大的有利条件，它的强有力的政治工具天主教党，由大主教亲自领导，可以通过大胆的教士的活动公开表示反对，而其他的政党在努力使公众知道他们和他们的纲领时，则必须完全通过地下的渠道。同时，天主教的消极抵抗运动，如“为了上帝运动”和“精神之剑”的影响，从德国人力图扑灭它们所用的那种残酷手段上已获得证明。另一方面，比利时的第二个最大的政党社会党，在被占领期间却遭受了几次沉重的打击。首先，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在 1940 年 5 月离开了比利时；其次，它被德国人正式解散了；第三，当它的战前的主席亨利·德芒于 1940 年 6 月加入吉斯林分子的行列时，它的威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后来年轻一代社会党人个人所作出的杰出的抵抗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早期这些挫折。确实，社会党和自由党的个别成员对抵抗运动作出的贡献要比他们自己的有组织的运动所作出的为大。因此，他们便腾出 494 出战场来让极右的天主教党和极左的共产党两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去进行角逐。这一发展的结果在解放后的政治舞台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第二章 荷兰

虽然德国人始终没有明确说明他们在荷兰的最终目的，但是，却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把这个国家恢复到独立的地位并不是他们的目的之一。然而，有一件事从一开始就很清楚，那就是：这个国家对德国具有直接的、巨大的军事重要意义，起初是作为德国入侵英国的出发地，后来则成为盟军进攻大陆的一个可能登陆的地点。这种情况使德国人想牢牢地控制住这个国家，同时又想尽可能同居民搞好关系。因此，里宾特洛甫在入侵那天（1940年5月10日）作了保证说：“德国不论现在或将来……都无意……侵犯荷兰王国……的领土完整……接着，赛斯-英夸特在他以德国驻荷兰专员的身分发表的第一份宣言（5月25日）中也作了保证，说他打算继续实施荷兰现行的法律，任用荷兰行政官员，并保持司法机关的独立。宣言一方面强调指出，鉴于荷兰的地理位置，它必须把领土完全置于德国人的控制之下，一方面又着重说明一项缓和的特征，即在所有被占领国家中，只有它获准设一个文职人员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军政府——因为荷兰人民和德国人民之间有“血缘关系”。⁴⁹⁵ 赛斯-英夸特在草草作了这些和解的姿态以后，立刻着手“革新”荷兰的政治，使之同纳粹德国协调起来。希特勒任命他为帝国专员的那道授权令（1940年5月18日）使他有权颁布法律，并下令荷兰的法律“在同德国占领目的相一致的范围内继续生效”。赛斯-英夸特根据这道命令的委托，在他的第一次宣言中就行使了“民政领域中的最高政府权力”，接下去在掌握了这种权力后便彻底破坏了荷兰的法律和宪法。第一步，他于1940年6月21日下令解散了议会和国务会议，把秘书长们（政府各部的行政首脑）组成一种低级内阁，绝对从属于他自己的权力。8月中，他取得了亲自任命和罢免荷兰的所有高级官员（行政方面，司法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权力。11月，教育部被分为两部，以便更进一步控制荷兰人的思想：一是教育、科学与文化部，主管一切公私学校、大学和青年运动等；另一是民众教育与艺术部，主管新闻出版、电影、戏院和非科学性出版物等。第二年则更进一步，各政党（荷兰纳粹党除外）于1941年7月4日均被解散，市议会和省议会在下一个月也被解散。1941年8月，他⁴⁹⁶对司法机关作了第一个严重的打击，设立了所谓治安法院和治安法官。每一个区的法官都由荷兰纳粹分子司法部秘书长任命，他们审理据认为威胁到社会治安或社会的“最高政治利益”的任何过失和罪行。可以逮捕嫌疑犯，被告不经审讯便可拘留八天。上诉案件只能向海牙的中央治安法院提出，但此后就不得再行上诉。别处已经宣判的案件倘使治安法院对其政治动机有所怀疑，可以重审改判，这样就违反了荷兰法律禁止对任何人根据同一罪行进行两次审判的基本原则。这也许就是这种制度的最邪恶的特点。

从理论上说，被占领下的荷兰的行政体系似乎复杂得有点荒谬，因为它有三重机构：德国民政机构，德国军事机构和荷兰机构。不过据说由于优待荷兰人，民政专员赛斯-英夸特拥有统驭一切的权力，而且除了直接的军事干涉是不可避免的以外，还通过他自己的机构来贯彻德军总司令的各项要求。另一方面，授予他在他认为合适的范围内使用荷兰行政机构的权力，无疑又增加了复杂性，尽管他可以任意改变那个行政机构——象他所做的那样——使之合乎他自己中意的那种从属的格局。因为以他为首的德国专员公署是至高无上的。在他手下有四个常务委员会：“行政与司法”由维默尔博士负责；“公安”由警察长官汉斯·劳特尔负责，指挥党卫队、德国警察和荷兰警察；

“财政与经济事务”由菲施伯克博士负责；“特殊任务”，先由弗里茨·施密特，后由里特尔布施负责，处理同荷兰劳工部门有关的事务以及德国纳粹党和荷兰纳粹党之间的关系。军政方面由德国空军上将克里斯蒂扬森负责，他掌握着“最高的军事权”，可以为了军事安全下令采取任何措施，但是，涉及民政方面的任何要求，则必须通过德国专员和专员公署来完成。目的是使被占领国的政府显得比较近乎是文职人员的而不是 497 军人的，并且企图使德国武装部队同荷兰人民的夫系比较融洽点。

赛斯-英夸特解散了荷兰议会和国务会议以后，就扩大了各个秘书长的权力范围，使他们成为他们各部的傀儡“部长”。起初，这些官员以为在所谓国家战时条例的规定范围内（该项条例指示他们坚持工作，帮助维持秩序，甚至执行占领国的命令），只要他们不同占领国合作改变法律和宪法，他们就能继续任职。但是，他们不久就认识到，指望他们担当的恰恰就是改变法律和宪法的任务。赛斯-英夸特取得了过去授予国王、大臣和议会的全部权力，因此他认为秘书长们是实现他的意志的工具。当秘书长们表示异议时——他们大多表示异议——他就用荷兰的纳粹分子接替了他们。接替他们的荷兰纳粹分子中有几个获得了大得危险的权力，例如，新的司法部秘书长斯赫里克教授有权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同样的，财政部秘书长兼荷兰银行行长、古怪的冒险家罗斯特·范·托宁根（他的履历从国际联盟的一名官员直到成为陶尔斐斯的心腹），有权任意出售国家财产，发行金库券和国家公债。以及为国家募集债款。他还负责起草国家预算。至于内政部部长，他可以不受古老的地方法的约束，有权变更历史悠久的市行政区的界线。

到 1941 年 2 月，德国人一定已经明白，他们不能期望荷兰人民俯首听命，因为在那个月里阿姆斯特丹开始发生了罢工和骚动，随后蔓延到了其他城市。而且，这些骚动都是由荷兰纳粹分子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挑衅性 498 示威所引起的，这不免使得德国人怀疑这些本地卖国贼是否有用了。但是，在这一点上，德国人进退维谷，因为他们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承担了繁重的义务，自己可以使用的官僚已经到了极限，所以很难看出荷兰中央和地方有什么别人来接替罢了的人的职务。另一方面，荷兰的纳粹分子即使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却也往往是无能的，而且总是不得人心的。最得宠的纳粹团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安通·米塞，推行了一种圆滑的欺骗政策，以博取德国人的好评和自己今后的提升。他为了达到这些最终的目的，不得不增多他的追随者。他于是想了一条妙计，假装反对德国完全吞并荷兰，以区别于他的对手——别的纳粹团体。但是，把戏被人发觉了，人们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反感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

前文已经指出，荷兰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并不仅仅限于一个政党；而是按照荷兰人倾向于分裂的特点，包括了许多单独的团体。不过，全因社会主义运动一直是这些团体中最强大的。到 1941 年 12 月，它已经吸收了所有其他的团体，成为德国人准许在荷兰公开存在的唯一政党。从理论上说，他们可以夸耀说自己是一个有各部门和各地区分支机构，有中央和地方当局的一个完整的 499 党机构。相当于“政府”各部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各领导小组：它们至少有十七个，涉及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米塞之所以要把这一切组织都掌握在手，是因为他满怀希望地认为，德国人对此获得深刻的印象后，即使不要他完全接管这个国家的行政工作，多半也会要他进行合作。

1942年12月，德国人承认米塞是荷兰人民的“元首”，1943年2月1日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一个“谘询内阁”，这是他的野心最接近于实现的时刻。其实这只是德国人试图扶植他的权力的最后一次尝试，使他可以成为推行他们政策的一个比较有用的工具，而所有真正的主动权依然绝对保留在德国人手里，正如赛斯-英夸特在1942年12月14日的宣言中所说明的那样。这篇宣言表达了希特勒公开吐露出来的愿望，说他想让荷兰人民参与他们自己的行政工作；但是这一点无论如何是决不会象赛斯-英夸特建议的那样，通过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来真正贯彻。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肯定已把它的触角伸到荷兰行政机关的每一角落，可是，决不能认为它哪怕有一点点代表500性，因为按照所作的最高估计，它的成员大约是九百万人口中的十一万人，其中大多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只想享受同德国人合作的短暂的特权，回避劳役和其他不合适的事情。总之，不论设立“谘询内阁”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行政上的或是为了心理上的原因，它结果却是毫无效用，因此到了1944年7月当希特勒的帝国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德国人觉得不能再容许有这样一些“奢侈品”时，就把它撤销了。

况且，这时荷兰人民群众反抗德国人以及他们雇佣的荷兰纳粹分子的侵略和压迫，已成为当时形势中一个真正严重的因素。荷兰人过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生活，突然受到来自他们一向对之怀有最友好的感情的地区的这种打击，如果说他们在德军占领初期吓得同瞪口呆的话，那简直是不足为奇的。不过，他们女王的坚定加上她不得已寄居在其中的英国人民的坚定，以及她和英国人民的直接目的和政策的完全一致，不久便对荷兰人民产生了一种重新振奋的影响。这种发展的明显的迹象之一就是，组织了一个新政党——团结运动。它企图取代旧的党派分裂状态，把荷兰人民“按照荷兰自己的特点凝成新的团结’。虽然从外表看来，团结运动具有明显的法西斯特征，但是它显然是要把它的主要宗旨投合荷兰人那种纯粹的爱国的本能，这从它的昙花一现的兴起（据估计，它的党员人数在高峰时期达到了约有一百万人），以及最后通过德国人和荷兰纳粹分子合力加以镇压，便可以证501明。诚然，它的法西斯外衣已被解释为一种策略性的伪装，以便能够更好地抗击米塞和荷兰纳粹分子为了攫取权力而进行的阴险企图。上文已经提到过，1941年2月，荷兰纳粹分子的挑衅激起了群众愤怒的第一次自然的大爆发。对德国人的愤怒也开始高涨了，首先是由于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迫害日益升级，后来则是由于战事的迫切需要使德国人对荷兰人力和资源的剥削不断加剧。从1941年初起，强迫男人和女人去服劳役的范围不断扩大。熟练工人被骗到德国去做工。1941年7月东方战线开辟以后，荷兰人被招募去打德国的敌人，或者把他们迁移，利用他们的务农本领去开发新征服的乌克兰草原。

将近1941年底时，团结运动消失了，在纳粹团体中，米塞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对手荷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消失了。虽然团结运动在德国人占领的第一阶段可能起过巩固和团结荷兰人民的作用，但是，它的性质和目的显然人模糊，使它无法对以后的荷兰抵抗运动提供必要的核心和鼓舞。这种需要将由比较能同当代的思想倾向相一致的一个新运动，即荷兰人民运动来满足。它是舍默尔霍恩教授按照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传统建立起来的，这时已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地下组织。荷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消失，虽然为米塞追求他的野心扫除了障碍，却也使米塞成为众矢之的，人民把他看作是

主要的卖国贼和发泄愤怒的主要对象，这种愤怒本来是分散在好几个方面的。因此，这两种发展情况，其结果是从不同的方面集中了荷兰人的抵抗力量，使之更加难以对付，更加发挥作用。而且，1942年德国人决定放弃其哄骗或威吓荷兰人的希望，采用了强硬的反措施，这便使人看出荷兰人已在开始进行抵抗了。这年春天，希姆莱和他的主要助手海德里希访问了荷兰，亲自对他们在荷兰的代表警察长官劳特尔作了简要的指示。5月，荷兰武装部队中的军官重新被拘留起来，并在荷兰的重要人物中逮捕了四百六十人作为人质。他们的数目后来增加到一千人左右，第一次枪毙人质发生于1942年8月15日，当时德国人为了对鹿特丹的一次破坏行动进行报复，把五个人质处死了。秋天，由于日益害怕盟军进攻，他们开始强制疏散荷兰沿海的居民，包括海牙的一部分居民。荷兰居民由于燃料和粮食短少的情况迅速恶化，已经深受苦难，这一迁移更增加了他们的困苦。与此同时，新颁布的法令增强了德国人对荷兰劳工和人力的控制，因此他们可以把成千上万的荷兰工人押送到德国去干活——仅仅在1942年5月和6月就有不下四万六千人。

随着1943年这新的一年的来临，所有这种压迫所引起的激烈情绪开始爆发。1月间，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有几个领导人被暗杀了，这表示出民众对这个组织（这时已经一跃而象是具有政府的权力了）的憎恨。对占领国的积极反抗也开始采取破坏为德国人生产的工厂以及销毁有关即将押送出国的工人的名册的形式。铁路也受到攻击，这有两个目的：既阻碍德国人的作战努力，又阻止或放慢押送工人出国的的工作。德国人为了报复，处决了许多人质后，又在3月底对各大学发动了一次袭击，逮捕了几千名大学生，把他们拘留起来作为人质。1943年3月16日颁布了一项法令，限制各大学招收学生的人数，入学的条件是要他们宣誓效忠，否则就要被押送到德国去做工。据说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学生拒绝签字。4月里，荷兰的紧张状态加剧了。4月29日公布了德军总司令克里斯蒂扬森将军发布的一道命令，勒令荷兰武装部队以503前的全体军士报到，以便送往德国的战俘营中拘留（应当记住的是，军官们一年以前已被重新拘留起来了）。这就引起了一场新的危机。第二天，在伦敦的荷兰政府广播了一个呼吁，要求有关人员抵制这道命令：“不去登记……不理睬他们的传唤。设法让他们找不到你们！”鉴于荷兰人民有了这种危险情绪，4月30日在全荷兰公布了戒严令，实行宵禁，并订出了其他种种限制行动自由的规定，违者可以处以死刑。然而，在以后的几天里，发生了激烈的示威运动，群众遭到枪击，全国各地都爆发了罢工，农民拒不交出牛和牛奶，铁路和码头遭到破坏，工厂和农庄发生火灾。从5月2日到6日，至少有二十一名荷兰人由于参加罢工或其他的罪行而被判处死刑。德国人重新控制住局势以后，就乘机实行赛斯-英夸特2月间暗示过的全面动员荷兰劳工的工作。根据1943年5月6日的一项法令，所有年龄在十八岁到三十五岁的男子都应登记强制服劳役，所有没有在表示效忠的宣言上签过字的学生也应登记服劳役。5月13日，德国警察长官劳特尔发出一个通知，没收所有无线电设备及其附件和零件，不管是私人家里的，还是商店里的存货。5月15日，戒严令撤销了，但是关于强迫劳动和没收无线电设备的规定依然不动。同一天，赛斯-英夸特又发布了一道旨在对付政府工作中消极抵抗的命令，对制造严重行政破坏事故的人可以处以终身苦役或死刑。这个措施证明本年2月间荷兰首相盖布兰迪教授从伦敦发出的呼吁已经取得了成功。他呼吁全体忠诚的荷兰官员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用一切办法拒不执行显然为了帮助德国

人作战而颁布的种种法令。

大约就在这时，从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掀起了一股正在增涨的反抗浪潮。首先是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向赛斯-英夸特递交了一份联合抗议书，并于1943年2月21日在荷兰所有教堂的讲坛上宣读。抗议书用最强烈的愤怒词句提到破坏正义，破坏基督教原则，迫害犹太504人，把荷兰工人押送到德国去，在荷兰强迫服劳役，以及杀害人质等。第二份抗议书是荷兰医务界在1943年6月发出的。它用同样强烈的词句使人注意到压迫对身心的影响，荷兰居民的营养不良情况和由此而造成的肺结核的蔓延，以及把荷兰粮食输往定量较高的德国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它还提到强迫荷兰人制造武器去打与盟军并肩对德作战的同胞的这种心理上的折磨。但是，德国人那种迅速恶化的战局使他们简直不可能倾听人道主义的呼吁了；相反，这种形势却促使他们采取甚至更加残忍的行动。在他们强迫沿海地区的居民疏散以后，看来甚至还有采取更为强烈的防卫措施的迹象。1944年元旦，米塞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演说中对盟军入侵可能带来的恐怖事情渲染得极其可怕，他特别指出，鉴于荷兰大部分土地都低于海平面，入侵可能导致淹没新开辟的低地（抽干了水的沼泽地）。于是这个题目便被德国控制下的荷兰报纸大肆发挥，企图威胁荷兰人民变得俯首帖耳，使他们吓得不敢反抗，不敢与盟军合作。后来，这种情况又有所缓和，着重在荷兰作为抵抗欧洲“布尔什维克化”的堡垒这一“足以自豪”的任务和淹没低地作为防卫武器的价值605了。的确，当这种宣传在1944年春出现时，德国人实际上正在某些地区放水——尽管德国人试图缩小这件事，并且对它作出最好的解释，但是，不久便被地下报纸传开了，使人们直接预先知道了情况。

但是，总的说来，德国人在涉及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的地方就不愿意直言不讳了。1944年5月13日，赛斯-英夸特发布了一道新的命令，规定如形势需要（即盟军登陆），立即实行戒严，并规定对荷兰人进行最严格的管制，以免他们在任何方面妨碍德国人。实际上，所有的荷兰人都得执行德国人的命令，违者处死。7月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不久，同荷兰人共同负责的伪装，由于撤销了米塞的“谘询内阁”而告结束。荷兰人在德军占领的余下时间里都遭到了赤裸裸的德国军事专制的统治。然而，当荷兰人看到盟军在1944年夏未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欧洲时，他们自然想到解放的时刻就在眼前了。正是在这样的期待中，并在希望加速这一结局的到来时，荷兰流亡政府与盟军最高统帅部和国内抵抗运动取得了一致意见，于1944年9月17日命令铁路举行总罢工。这个命令立刻得到普遍的执行。在四十八小时内，荷兰各地的火车，除了几列由德国人自己驾驶的以外，全部停开。德国人用恐怖手段或答应给双薪和双份配给品的办法都没有能破坏罢工。但是，这时盟军的攻势在阿纳姆遭到严重的挫折。德国人对自己在荷兰仍控制着的地区加紧压制，罢工开始受到报复，不仅对罢工的工人；而且对全体居民。德国人认为荷兰人这时已经丧失了一切应得照顾的权利，于是开始有计划的、无情的破坏和洗劫荷兰国家506财产。在荷兰，被严寒加剧了的一个可怕的冬天开始了。盟军频频轰炸，粮食、燃料和电力都极端缺乏。荷兰最大的一些城市所在的西海岸地区的粮食储存根据德国民政当局的命令，于1944年夏季已经减少到只够两三星期之用。为了报复铁路罢工，禁止从较远的东部农业区运送粮食到大城市，禁运直到11月8日才解除，可是到了那时，严寒季节业已开始，再也无法储存粮食了。除了德国人的报复措施外，罢工也使得供应品

无法运往城市，因此煤和粮食的储备不久便告枯竭。此外，三万名铁路工人在罢工——连家属在内，总共有十万人——全都得隐蔽起来，都得吃饭。到11月，德国人开始在街上和屋子里围捕荷兰人，把他们押送到德国去。由于遭受这些苦难的结果，1945年1月和2月在总人口超过二百万的六个城市中，死亡率几乎比1944年同期加倍。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仅鹿特丹一地，饿死的平均每天就有四百人。

德国人沿着荷兰南半部宽阔的河口构筑了他们的防线。在1945这新的一年年初，他们仍然占据着荷兰的大部分地区，人口约有六百万。盟军占领的地区濒临饥饿的状态，而在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则是彻底的闹饥荒。但是，荷兰人的精神还是没有垮下来，反抗德国人的活动并没有停止。3月初，有人企图谋杀德国警察头子和公安委员会常务专员劳特尔，又引起了特别野蛮的报复。为了这一罪责，3月7日，约有四百人被处死，其中许多人是在斯开文宁根的海滨沙丘上被枪决的。直到4月初盟军才开始从德国进入荷兰，1945年5月6日，才解放了507荷兰全境。到了这时，荷兰人民肉体的痛苦才算结束了。在大战的最后阶段，德国人对这个国家进一步给以沉重的打击。在鹿特丹港和阿姆斯特丹港，他们进行了毫无战略意义的破坏，似乎纯粹是出于报复的心情。他们还破坏了海堤，使海水进一步淹没了大片肥沃土地。威廉明娜女王自从到了英国以后，在整个大战期间面临敌人篡夺政权的情况下，始终不失时机地强调她作为国家统一的合法象征的地位。的确，女王在解释她逃往英国的理由时，强调了她必须继续“自由地行使国家权力”，她“要回国的坚定意志”，以及王国继续是“一个主权国家”。荷兰人民和他们的盟友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种合法连续性的说法，而对德国人来说却是如芒在背，他们千方百计要破坏女王的权威，禁止陈列王室的照片，控制报纸，清洗教科书，惩罚所有提到奥伦治王室的人。但是，这些做法同德国人自称对荷兰的意图显然太不相符了，因此只会引起荷兰人重申他们的忠诚。有一种打击的方式较为阴险，因为它戴上了“宪法问题”的假面具，那就是援用宪法第二十一条来“证明”女王和她的家族离开荷兰后，实际上已经退位，而流亡政府由于同一原因，也无权对荷兰发号施令。米塞和他的宣传部长布洛克泽伊尔都利用了这项条款，企图劝说荷兰的文武官员不受效忠宣誓的约束。但是，如此来源的这类建议，即使不是完全遭到拒绝，也必然受到相当保留的看待。508的确，这场战争的结果，使君主政体在荷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威信和影响。这一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对未来事态的影响就在于，抵抗运动和地下报刊在德军占领时期一直忠诚不懈。整个抵抗运动忠实地接受了伦敦流亡政府通过“奥伦治广播电台”传达给他们的指示，并且始终相信女士最后一定会回国。各政党在最初试图同德国人订立某种暂时性的条约时，也曾坚持王朝具有无可争辩的连续性。德国人拒不接受这一条件，首先导致了大多数政党的自动解散，后来又导致了德国人的正式镇压。1944年8月，保守党和社会党报纸发表了一篇联合宣言。它虽然强调必须进行彻底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却甚至竟然主张在战后扩大王权。但是，荷兰人对于女王的忠诚，以及他们承认女王政府的合法地位的最为确凿的证据，从下面一件事便可以看出：1944年9月女王政府命令铁路举行总罢工，立即得到了铁路工人和抵抗运动的普遍响应。甚至这道命令的悲惨结果也没有影响到这种感情。

女王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种象征，她通过经常同她的顾问和大臣商议，

通过断断续续地向她的臣民发出无线电呼吁，来进行积极的、坚强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是，她任命被迫逃离荷兰的抵抗运动领袖在政府中和政府周围担任要职来支持抵抗运动。同时，在流亡时期，她对宪法形式表现出审慎的尊重。1942年3月，成立了一个十四人的“特别咨询委员会”来协助政府，并代替议会。然而，在盟军即将进攻大陆时，女王广播了组织一个新的合法议会的计划，并解散了咨询委员会。抵抗运动组织了一个“理事会”，代表他们的全部利益，并在过渡时期向回国的政府提供意见。这个由天主教徒、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教徒（不过，应该注意，没有共产党人）组成的理事会，在1945年5月担负起了它的任务，特别是同政府的民政509部门共同工作。1945年2月初，从部分解放了的本国增选了五个抵抗运动的领袖，使抵抗运动在伦敦政府中的代表权很明智地有所加强。当德国人最后投降时，女王履行了早些时候的诺言，接受了盖布兰迪内阁的辞职，并委托抵抗运动的两个最主要的领袖——荷兰人民运动的领袖威廉·舍默尔霍恩和前下院社会党议员威廉·德勒斯——组织临时政府。

第三章卢森堡

德国入侵卢森堡大公国是在 1940 年 5 月 9—10 日夜与入侵比利时和荷兰同时进行的。鉴于对法国有计划的进攻，这显然是一种战略行动。然而，除了卢森堡的价值极大的钢铁的诱惑力外，这次入侵也是纳粹领土扩张总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德国公使照例保证说，他的国家“现在或将来均无意采取措施破坏大公国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他又重弹老调，说因为盟国对卢森堡的入侵迫在眉睫，所以德国必须采取行动以先发制人，这些现在都已同样是熟悉的陈词滥调。在两个月内，德国人不仅开始把德国的行政制度强加于卢森堡，而且已经表明卢森堡实际上将并入德国。采取的方针是，卢森堡人实际上是德国人，他们经过适当的开导后，就会欢迎这样的合并。这种观点是对事实的歪曲，因为卢森堡人从一开始就对德国人表现出很大的敌意，而他们对于女大公和自身独立的忠诚始终不曾减退。德军入侵的当天，政府向英国和法国要求援助。虽然英法答应给予援助，但是，这并不能使这个国家不受全面的蹂躏，于是女大公和政府逃到了英国，手中掌握着一切必要的合法权力，使他们可以把大公国同英国和其他对德作战的国家联合起来。

第二天，即 1940 年 5 月 11 日，卢森堡议会开会，通过了一项对德国侵略他们的国家的抗议，并且声明他们效忠女大公。

最初几个星期，大公国被置于德国军事管理之下——起先是由居尔曼将军领导的战地司令部，后来是由舒马赫将军领导的战区司令部。与此同时，卢森堡的一些行政官员，在外交部秘书长（韦雷尔）的主持下，组成了一个“行政委员会”，作为执行日常行政工作的一个机构。但是，由于这个委员会试图为卢森堡人的利益而不是为德国人的利益行事，它无法同军管当局取得任何有效的合作，因此它逐渐被后者排挤得不能存在。实际上，德国人到 7 月底已经决定把卢森堡从军管改为民政管理了。据宣布，科布伦茨-特里尔的行政长官古斯塔夫·西蒙被任命为卢森堡的民政首脑，他就以这种身分直接对希特勒负责。1940 年 8 月 2 日，西蒙奉希特勒之命接过他的职务。希特勒命令他“为德意志帝国收复原先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卢森堡”。西蒙立即执行希特勒这个指示，当月 5 日便宣布，女大公及其政府因逃亡国外，已丧失其权力；除日耳曼群众运动外，一切政党均已解散；卢森堡宪法已不再生效，“女大公”及卢森堡“国家”等同不应再行使用。10 月 23 日，众议院和国务委员会被解散，甚至上文提及的行政委员会也被取消，它的主席被拘捕起来，因为他竟敢送给希特勒一份声明，维护卢森堡保持其独立和王朝的意愿。

此后，卢森堡同德国的合并工作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中进展迅速，纳粹的各项种族法律、德国马克、德国的物价与工资水平、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都被采用了，最后，在 1941 年初，德国的强迫劳动制度也被采用了。到 1941 年 2 月，一切都已部署停当，可以采取走向全面并入德国这个重大步骤了，因为在 2 月 9 日，大公国同科布伦茨-特里尔合并为一个单一的行政区，改名为摩泽尔区，此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纳粹党）在卢森堡开展活动，仿佛它是德国的一部分似的。但是，卢森堡仍旧保留其独立的民政机构，因此，西蒙这时拥有双重的任务和权力，既是民政机构的首脑，同时又是摩泽尔区的行政长官。事实上，德国强制实行的新制度，在一个局外的观察家看来，是极其混乱的，因为同时并存两套官员——正式的德国国家官员和一套用以保证民政机构充分注意到党的利益的纳粹党组织体系。另一

方面，这两套权力往往是合而为一的——例如，西蒙本人就是如此。

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有系统地引进德国的——或者不如说是纳粹的——行政法规、方法和官员，并且（当德国人实际上没有取代卢森堡官员时）通过为卢森堡官员举办训练班，教授德国法规和方法，不遗余力地来使卢森堡德国化。地方政府也按照德国的格局彻底进行了改组；为了行政目的，全国被划分为许多地区，每一地区没有一个地区长官——一个由上级任命或罢免的政治官员，并由一些指定的议员来协助他。市长这时成了一个小小的地方独裁者，而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地方机关的首脑；选举产生的各种议会都被解散，最终为具有纯谘询作用的指定的议员所取代。在司法领域中，德国化的工作也进行得同样彻底。根据 1941 年 3 月至 1942 年 4 月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德国的刑法在卢森堡已全部生效，德国的民法根据 1942 年 3 月 15 日的一项法令也已（部分）生效。还采用了德国的“特别法庭”，这个法庭应用德国法律来审判所谓“政治罪行”，而不得上诉。卢森堡的司法制度被废除了，许多本国法官和地方推事都被解职或放逐，他们的职位大都由德国人占去。1941 年 2 月，为全体律师成立了一个所谓“荣誉法庭”，应用纳粹制定的律师条例，结果，大多数卢森堡律师都拒绝合作，而被押送到德国去服苦役。大公国的警察控制由威斯巴登地区的党卫队队长和警察局长（贝克尔曼）执行。当地警察则大都被押送出境，而由德国警察和党卫队队员所代替。513 在他们企图使这个小小的国家德国化时，他们在外表方面狠下功夫，这是德国人的，尤其是纳粹的特点。虽然卢森堡的普通人讲的是低地德语，但是受过教育的阶级都讲法语，并且在德军占领以前，法语还是官方行政、立法和司法所用的语言。宪法规定法语和德语同样通用，所有学校里也都教授两种语言。然而，两蒙于 1940 年 8 月取得控制权以后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项便规定，今后应以德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也是学校中教授的唯一语言。法语报纸禁止发行，接着又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法语。

与此同时，地方当局和商行店铺都必须遵守一项命令，把所有招牌文字、街道名称等等德国化。接着在 3 月间又命令把所有的姓氏也德国化。

在着手实行这一套包罗万象的合并计划时，德国人并非没有得到来自这个国家内部的一些援助。卢森堡早就有相当多的德国侨民，在这些居民中，有一个可靠的纳粹核心，人数之多，足以构成一支有用的第五纵队，并且

通过提供行政人员、地方推事、教师等等，成了推行德国政策的工具。还有一个达米安·克拉岑贝格教授，他原籍德国，在占领以前好几年就以亲德和亲纳粹而闻名。他赞成大公国并入德国。德军一开始占领，他就建立了一个日耳曼族人团体，在 1940 年 6 月 20 日，更名为日耳曼群众运动。日耳曼群众运动立即开始同德国人全面合作，并为把卢森堡并入德国而展开工作。因为它还宣布信奉全部纳粹信条，它受到了行政长官充分的赞赏和支持。行政长官在把其他政党全都解散以后，授权日耳曼群众运动承担起对卢森堡人进行“政治教育”的责任来。

日耳曼群众运动和德国人不时发表一些给人深刻印象的数字，说明所谓卢森堡居民广泛归依这个运动和归依其他真正的德国纳粹团体的情况，如希特勒青年团、德意志女青年运动、德国劳动阵线、冲锋队、党卫队、纳粹机械化部队等等。的确，1941 年 9 月，据宣布，有五百名日耳曼群众运动的成员已经获准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纳粹党），作为对他们献身日耳曼主义事业的酬报。这些人大概都是很听话的自愿者；否则，日耳曼群

众运动本身招募成员的工作，其性质就更象是在成批地招编军队了，如同西蒙所“宣布”的，卢森堡的全部警察部队都已经加入了这个运动。而且，一系列措施也使卢森堡人如果不加入日耳曼群众运动，就几乎无法在工业部门或某一行业中谋生。自从1941年1月卢森堡的工会和福利团体被解散以后，所有的产业工人都加入了德国劳动阵线，同时还作了严格的规定，必须是日耳曼群众运动的成员才能取得这项必不可少的“特权”（即成为德国劳动阵线的会员）。

虽然这样一来，仅仅由于人们的需要就会使日耳曼群众运动的队伍大为扩大，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久就证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人们加入这个组织的唯一动机，普通的卢森堡人仍旧忠于他以前所效忠的一切，并且准备一有必要便把这种感情表现出来。1941年10月，西蒙下令进行人口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禁止任何人说“卢森堡”是他的国籍，卢森堡语是他的语言，理由是这样一种国籍或语言根本就不存在，他就是想借此来完成德国化工作。然而，尽管是这样，却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城市居民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村居民说他们的国籍是卢森堡，他们的语言是卢森堡语。作为报复，好几千卢森堡人被关进了监狱或被送入集中营，人口调查宣布无效。后来（1942年5月），西蒙干脆宣布说“决不再在卢森堡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它的人民是否愿意加入德国。这项决定是在1940年5月10日就作出的”。

进一步的反抗是由于上文已经记载过的取消了工会和没收工会基金，以及实行德国的强迫劳动制度和通称冬令救济的德国强迫认捐的救济计划而引起的。由此而激起的怨恨情绪使得工人在被德国人接收的或被迫为德国人生产的工厂中进行破坏和实行“怠工”战术。这反过来又引起了严厉的报复，从押送出境直到处决。到1942年底，这类押送出境已变成大规模的行动了。同时，德国人用言词和行动作了种种尝试，想使卢森堡人和全世界都相信，卢森堡人在一切意义上都已被争取到德国一边了。他们对次要的政治犯举行了所谓大赦，对德国的各种劳务又有所谓“志愿人员”，据说还有争取获得德国国籍的荣誉，或者甚至是在一次种族登记中争取被定为日耳曼族人的荣誉，他们就这样大肆利用这些事情。事实是，西蒙在1942年8月30日颁布了一项法令，给予所有“可靠的旧耳曼人”、日耳曼群众运动的成员，以及德国民间和军事组织的成员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德国国籍。鉴于已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宣布”为日耳曼族人或是德国人发起的团体（如德国劳动阵线）的成员，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全体居民都涉及到了，也意味着已经采取了吞并程序的最后一个步骤了。德国人为德国国籍树立了这样了不起的含意以后，便以难以说明的巧妙手法，通过“位高则任重”的论据，转到征兵这个微妙的问题上：卢森堡人必须既接受德国人的特权，也尽德国人的义务。于是，同时颁布了另一项法令，征召所有从1920年至1924年出生的卢森堡人到德国武装部队中服兵役。

卢森堡人对于这个行政长官所颁布的法令的反应是516迅速而有力的。就在第二天，即1942年8月31日，全国各地爆发了罢工。西蒙命令罢工者当天夜晚以前复工，并且宣称罢工的领袖将由即决军事法庭审判和枪决。尽管如此，到第二天，即9月1日，罢工已变成全面的了——这是到这时为止在一个被占领国家中所发生的第一次总罢工。翌日，9月2日，德方宣布整个大公国处于紧急状态，几个所谓罢工领袖被草草判决后在全国不同的地方枪决。后来几天中，根据军事法庭的程序，又处决了好些人，直到克拉岑贝

格于9月6日率领一个据称是代表社会各阶级的代表团向西蒙说项，恳求宽大，重申大多数卢森堡人的“效忠”，并对造反者的行为表示遗憾，才停止了处决。

既然西蒙的报复暴行已达到破坏罢工的目的，他便同意分阶段结束紧急状态。但是，他同时宣布（1942年9月17日），将采取激烈的措施肃清卢森堡的“不可靠分子和叛逆分子”，部分通过撤掉某些官员和实业家的重要职位，部分通过把政治上可疑的人及其家属大规模押送到德国去。他坚持说，德国不能冒着在一个重要的边界地区潜伏有这类分子的风险，但是把这些人安全地放在后方，就可以把他们重新教育成为德国良民。另一方面，凡是有直接同罢工牵连和有其他颠覆活动嫌疑的人，如果他们逃脱了死刑，也将在集中营的不大舒服的气氛中接受他们的“重新教育”。同时，为了驳斥征兵已因罢工而中止的谣言，迅速编列了适龄的人的名单，立即进行征召。大多数这样被迫加入德国武装部队的卢森堡人，一有机会便马上被派往俄国前线，虽然也有一些人被派往北非。

因此，1942年的这场危机一方面增强和巩固了卢森堡517人的抵抗意志，另一方面也使征服者先前实行的德国化和纳粹化政策变得更为激烈。在每一个领域中，愈来愈大的控制权都掌握在占领以后进入该国的德国人手里，但同时当地的吉斯林组织日耳曼群众运动的威望和权力也获得愈来愈大的支持，企图维持住一种幻觉，使人以为同德国合并的过程既是来自国外的，也是来自国内的。同样地，关于押送出境，也在不断地强调这样一种理论，即在这种情况下，这并不是押送外国人到德国去为德国工作，而是“移民”计划的一部分，是把不十分可靠的德国人从德国的一个特别易受攻击的地区移往另一个比较不容易受攻击的地区去。从这一观点来看，这项计划已取得满意的成果，1943年5月12日，西蒙在由他主持的民政长官和盖世太保代表的一次会议上就曾这样断言过，但是，这次会议仍然一致认为，必须继续进行押送工作。被押送出境的人都由德国人和来自南蒂罗尔、特兰西瓦尼亚和布科维纳的日耳曼族人所接替。1943年夏天，还把一些意大利人移入卢森堡煤矿地区工作，顶替德国经济中这一重要部门里被押送出境的卢森堡人。最后，由于盟国的轰炸攻势日益猛烈，许多被炸得无家可归的德国人都到大公国来避难——那些有势力的党员是经过批准的，没有势力的则是偷偷地进来的。

尽管德国人这样集中了全力来消除卢森堡的独立性并迫使它接受纳粹的模式，尽管在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内组织抵抗运动并使其继续存在下去有许多困难，抵抗运动的旗帜却还是一直在飘扬。在占领期间的任何时候，总有一些地下报纸，虽然数量要视它们能否不被发现而定。还有一个全国性的地下抵抗组织叫作卢森堡爱国同盟，德国人一直在设法想摧毁它。而且，尽管德国人反复地大肆吹嘘大公国已经全面德国化，他们却不能，而且往往也并不掩饰他们的努力未获成功的事实。经常有一些怨言，说卢森堡人不服从与不合作，西蒙终于在1943年3月初出来讲话了，他那篇讲话是威胁与哀求、奉承与咒骂的一种奇特的混合物，联系到德军新近的一再失利，几乎不可能把他所希望的那种对征服者的敬畏之情注入卢森堡人的心头。1943年7月，德国人又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凡担任公职或半公职的人，如犯贪污或破坏安全条例的罪行，均应从严处罚，这进一步表明，德国人所依靠的那许多替他们效劳的人，在德国人看来都并不是可靠的了。

而且，尽管德国人一再向工农业工人发出呼吁，要求增加产量，尽管他们一再声称这些呼吁十分见效，事实却证明还必须日益加紧控制。因此，1943年9月21日的一项法令，规定在大多数工业部门中，即使双方同意，未经劳工介绍所批准，劳动合同也不得取消。次年2月，另一项法令加强了人事管理人员的惩戒权力。农民则于1943年10月被并入了德国农业协会，这使他们必须把一定数量的产品交给占领国。有大量农民因黑市罪行被罚款或逮捕，还有一个农民被处决，这就证明对这种控制的反抗还是相当强烈的。

1943年10月又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发现人口自1938年以后减少了大约一万四千。被征入德国军队的卢森堡人阵亡人数相当惨重，这可以算是人口减少的许多不同的原因中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而彼征召服役和被押送出去作劳工的人中也有许多人逃亡，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征兵和招工仍在继续实行，并遭到人们的痛恨，逃亡事件屡见不鲜，尽管不仅对逃亡者本人（如果被抓到的话）和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而且对逃亡者的亲属也进行严厉的惩罚，这些亲属大概也可能被押送出境。西蒙在他后来发表的大多数讲话中经常罗罗唆唆地提到这个问题，这就可以说明逃亡已到了怎样的程度。的确，这些讲话在各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暴露出德国化政策的彻底失败——例如，在盟军登陆开始以后，他扬言要对亲盟军的活动分子和从德国武装部队中开小差的人立即处死，哀叹亲英情绪的流行，以及大家都听伦敦流亡政府的广播，同时他又表示对卢森堡人最终的忠诚怀有信心。

解放时据估计，大约有五千名卢森堡青年被德国人征去后开小差，有一千一百到一千二百个家庭——或者说大约有五千人——被押送到波兰的边界地区，因为他们的儿子不在德军中服役而“投奔了马基”。的确，在这最后几个月中，德国人对阿登山区和森林中有巨大的游击队理所当然地感到日益惊恐。这些游击队是由逃脱征召的人、“开小差的士兵”和敌人悬赏要加以逮捕的爱国志士组成的，他们有效地袭击了德国人的交通线，加速了德国人在1944年9月从大公国的全面撤退。但是，甚至在这最后一刻，德国人仍然表现出一种心理上惊人的无能，他们无法理解在他们如此卑劣地压制下的人民的心情，竟然还向马基发出呼吁，要他们“痛改前非，重新加入真正爱国者的队伍，为新秩序而战”。他们还宽宏大量地补充说：“我们会了解你们，不责备你们。你们将获得赦免，虽然我们不赞成你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决不会盘问你们。”

第四章 丹麦

1940年4月9日凌晨，当德国人事先毫无警告便侵犯丹麦时，他们只遇到零星的抵抗，因为没有时间把抵抗有效地组织起来。于是，国王根据大臣们的意见命令武装部队的司令官停止抵抗。同一天，德国公使递交了520一份备忘录给丹麦政府；宣称：“……德国现在和将来都无意干涉丹麦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接着散发的传单和对居民的广播，仍然是那套司空见惯的故事，说什么德国人占领这个国家只是为了保护它不受别国的侵略。丹麦国主和首相鉴于德国人保证不加干涉，也在4月9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在抗议之下承认占领这一事实，命令人民不要进行任何反抗，并呼吁他们遵守秩序和保持克制。后来有人说，这个承认德国人占领的措施，由于德国人随后的行动而变得无效，但是，可以设想，德国人也会争辩说，如果丹麦人想否认对他们的任何责任，那就同后来丹麦人所作出的许多让步不一致了。

开始时，德国人和丹麦人在理论上都享有平等的主权。这使国王的態度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他不仅深得人心，而且作为丹麦国家的首脑行使职务时，可以（如果他愿意的话）采取暗中抵抗和拖延战术等机警的政策，使自己成为全国各地较为明显的抵抗的象征和中心。国王在推行这种政策时，总的说来，在被占领初期要比后来在中期——那就是说，在德国人采取完全不顾当地人民并接过了全面控制的行动，从而使形势简化以前——表现出较大的决心，因而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因此，在这方面必须了解的是：在法国沦陷以后，德国的力量上升到顶点时，国王要抵抗德人此后所能加在他身上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就变得日益困难了。国王对德国人的某些要求让步了，这即使是错误的，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希望避免德国人打出一张王牌来——直接的军事统治，或者更糟的是，让丹麦的纳粹分子掌权。就这样，1940年7月，在改组联合政府使其更能代表各方面意见的幌子下，那个臭名昭著的亲德分子斯卡韦尼乌斯接替蒙克成了外交大臣。斯卡韦尼乌斯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立刻（1940年7月8日）发表了一项“宣言”，赞成丹麦和德国合作，这显然是得到首相和其他同僚的同意的。这一姿态使以后想否认德国人要求的合法性的多次尝试更为困难了。

这件事竟成为后来一连串让步的前奏曲，就不足为奇了。这些让步不管大小，同样损害了丹麦人的自尊心。让步的内容是：交出十艘鱼雷艇给德国（1941年1月），采取反犹太措施（1942年3月），从日德兰半岛撤退丹麦驻军（1942年11月），直到签订无耻的“票据交换协定”（1940年12月）。根据这项协定，德国人抢去了丹麦亿万克朗。德国人提出的建议只有一件遭到拒绝：即发行一种德国—丹麦货币和成立一个海关联盟。然而，引起最多抗议的让步却是斯卡韦尼乌斯接受德国的邀请，参加反共公约一事（1941年11月25日）。虽然内阁中有三分之二的成员反对这一步骤，它却得到斯陶宁首相（斯陶宁在晚年越来越屈从于他的外交大臣的意愿了）、斯卡韦尼乌斯本人和他的同伙贡纳尔·拉森以及司法大臣约科布·森的支持。此外，巨大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上文提到的这些大臣扬言要辞职，从而推翻了政府，而德国公使冯·伦特二芬克却公然宣称，如果不服从的话，德国就要废除1940年4月9日的诺言，这样，屈服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它在丹麦人民心中引起了一种耻辱的感觉，并使哥本哈根发生了好几天的示威。另一个重要的结果是，驻伦敦的丹麦公使勒文特罗伯爵宣称（1941年12月2日），他无法再认为自己是哥本哈根政府的代表，他仅仅是自由丹麦运动的

代表了。同时，他私人打了一份电报给国王，表示他相信丹麦参加这个公约“极易损害丹麦在英国的好名声，并且危及丹麦和英帝国之间的历史悠久的关系”。

勒文特罗的话指的是这一事实，即早在 1940 年 9 月，英国的丹麦侨民组成了一个抗战的“丹麦委员会”代表丹麦的利益同英国政府进行联系。哥本哈根政府以前任命的驻伦敦公使参加这一团体，这自然给这一团体的威信增加了很大的份量。此外，在勒文特罗作出这一姿态以前，他的同僚丹麦驻美公使亨里克·考夫曼已经作了一个甚至更为出色和重要的姿态。考夫曼在 1941 年 4 月不仅脱离了哥本哈根政府，并声明自己是自由丹麦驻美国的代表，而且甚至主动同美国缔结了一项条约，使美国能够使用丹属格陵兰岛上的基地。丹麦政府觉得不得不把他撤职，不承认那个协定（虽然他们后来默认了它），但是，美国政府继续把他看作丹麦的合法代表。不久，大多数驻自由国家的其他丹麦代表，包括勒文特罗在内，都仿效他的榜样。丹麦和自由世界的另一种联系就是逃出侵略者魔爪的五六千名丹麦商船的船员，这时为盟国的事业驾驶着大约八十万吨丹麦船舶。但是，自由丹麦运动的最大收获在于有克里斯马 523 斯·默勒这个人。他是保守党领袖，于 1942 年 5 月从丹麦逃到了伦敦。德军入侵后不久，丹麦的社会党政府便扩大为联合政府，这时默勒在内阁中得到了一个席位，但是由于他毫不妥协地反对占领当局，而且公开鼓动别人仿效他的榜样，所以不久便表明他是一个令人为难的根源。于是不到六个月，他就不得不离开议会和政府，并被排斥于一切政治活动以外。因此，默勒一旦到了英国，丹麦委员会自然应由他来领导。他当了丹麦委员会的主席，并且立刻通过无线电展开了生气勃勃的宣传运动，劝告国内的同胞进行抵抗并破坏德国人的战争机器。但是，尽管有如此坚强的领导，丹麦在国外的抵抗运动要发挥影响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合法的政府留在国内——不是象挪威和荷兰那样流亡国外——因此，他们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性的领导，都容易受到以国王的名义的正式斥责。在进行破坏活动这个问题上，这种困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占领的头两年中，破坏事件零零星星小规模地发生，主要是割断电话线和偷窃轻武器等，但是，到了 1942 年夏，随着德国军事胜利处于低潮和默勒从伦敦进行有力的指挥，破坏工作显得较为严重了。这时，主要的目标是为德国人工作的工厂，德国武装部队的财产，德国人所依靠的铁路和发电站。再者，这些破坏活动这时显然是为了这项目的而空投到丹麦来的专门人员和领袖们作的，虽然产业工人自己也欣然给予帮助和支持。直到这时，德国人的政策一直是封锁新闻，不让破坏事故公开。但 624 是 1942 年 9 月布尔首相正式呼吁停止破坏活动，几天以后，工会领袖劳里茨·汉森也作了一次呼吁。后来又有过好几次呼吁，最后在 1943 年 5 月 15 日当国王重新执掌王权以后，他立刻作了一次特别广播。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他的抵抗力量由于前一年冬天他身患重病而有所衰退的迹象，但是，不管正确与否，说他依然认为不使他的人民触怒占领当局，免得占领国对他的人民强加上更厉害的束缚，是他的义务，这也许是比较公正的判断。不过，这时候，这些姑息的尝试已经是无益而错误的了，因为德国人已经表明他们决心要把处理丹麦事务和镇压抵抗运动的工作更加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委派维尔纳·贝斯特博士为德国全权代表，以保卫他们的利益，镇压反对者，同时又迫使国王任命他们可靠的工具斯卡韦尼乌斯为首相以代替布尔（1942 年 11 月）。

到这时为止，丹麦宪法并没有由于德国的占领而被正式废除，但是，对于宪法所保障的个人自由施加逐步的不知不觉之间加剧的限制，其结果是日积月累地损害了宪法。为了限制公众集会和批评占领当局，为了防止丹麦人帮助占领国的敌人，甚至为了防止他们对盟国表示同情，对刑法条文作了种种增加和修改。丹麦人接下来面临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怎样对付德国人想获得并行使对丹麦人的审判权的企图。关于这一问题的轰动一时的案件就是丹麦历史学家维赫尔姆·拉库尔一案。他的罪状是“危害丹麦同一个外国（就是德国）的关系”。这次事件最后达成的妥协办法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德国人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丹麦当局为了抢在盖世太保之前，自行逮捕了拉库尔，但是，却被迫把他交给了德国人（1942年2月24日）。德国人对他的案件进行了初步的审讯后，又把他交还给丹麦法院。丹麦法院再次为了防止盖世太保先下手，判决他七个月的监禁。1942年11月，斯卡韦尼乌斯政府就任以后，为防止在未来任何这类偶然事件中发生任何模棱两可的情况，立刻采取了一些步骤。提出并通过了一项“委托代理权法案”（1942年11月11日），根据这个法案，丹麦议会劝说放弃了最为重要的宪法权力，政府获得了几乎无限的权力，可以剥夺任何公民的各种自由。事实上，新法律始终没有使用过，只是当作最有效的“大棒”保存在柜子里，以此劝说议会听话一些，并以议会的名义批准为占领当局的利益而必须采取的不合宪法的措施。

宪法方面的一切让步和歪曲，不管诚实与否，都是以攸丹麦不遭受更大的耻辱，或不完全屈服于德国为借口。从表面上看来，丹麦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到这时为止一直都还可以照常进行工作，德国人的控制大都是间接的，主要是在幕后操纵。德国人最喜欢行使的控制方法是，由公使馆向丹麦外交部提出意见。德国公使馆的人员大为增多，公使的地位是特殊而有权力的。然而，德国新闻专员迈斯纳尽管表面上的职务是监督丹麦报刊，同丹麦纳粹党进行联系，但在纳粹党内的级别却比公使高，里宾特洛甫对他也比对公使更为信任，因为他经常同里宾特洛甫直接接触。公使馆的另一个成员坎施泰因是警察专家和希姆莱的朋友，他控制着盖世太保的秘密工作。盖世太保在丹麦是没有公开权力的，但是，它收集情报并监督丹麦警察的活动。

在占领初期，新闻检查是德国人控制丹麦的主要手段之一。不过他们却极端小心地把这一事实隐瞒起来。直接干涉新闻界的事是极少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处理国际政治新闻，偶尔也涉及国内新闻的指示来进行的。禁止526提到下列这一些问题：不许就签订反共公约发表评论；不许就丹麦工人在德国的处境发表反面的评论；不许议论占领当局。

所有有关挪威的新闻都被严格地删节了。至于盖世太保的活动，同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情况比较起来，水平是很低的。逮捕丹麦人一般总由丹麦警察执行，不过常常有德国警察陪同，以保证他们执行任务。最初，德国人（虽然颇为勉强地）准许丹麦警察、法院和监狱处理有关丹麦工厂、交通、物资等等的破坏案件，哪怕这些事件损害到了德国的利益。后来，德国人任命党卫军冯·汉内肯将军为总司令，而通敌分子斯卡韦尼乌斯的政府也于1942年10—11月成立，于是破坏德国武装部队产业（以及企图从事间谍活动），都要由德国军事法庭惩办了。冯·汉内肯作为一个真正的党卫队队员，很乐于立即实行德国的全部恐怖手段（象他在1943年2月通过丹麦报刊扬言要做的那样）——判处死刑、扣押人质和集体罚款——以便扑灭对他的军队的安

全的威胁。然而，德国新的全权代表维尔纳·贝斯特博士差不多和这个将军同时（1942年1月5日）到达丹麦，他虽然也是党卫队队员，但是，他那个尽可能继续采取温和与和解的政策却得到柏林的支持。这两个人都是在一次时间较长的危机中上任的，这一危机似乎主要是德国人策划的，目的是要威胁丹麦人，考验一下丹麦人对于使丹麦在更大程度上从属于德国和德国战争努力的计划有何反应。危机的开始是因为召回了德国公使冯·伦特-芬克和“过于温和的”德军总司令吕特克将军，持续的时期几乎正是组成—527支“丹麦自由军”并到东线为德国人作战的丹麦纳粹分子获得一个月休假的时期。“丹麦自由军”的成员在休假期间通过他们的行为使国家受到最大的挑衅。在这期间，德国人还“制造”了一个谣言，说已向丹麦政府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为了德国的利益武装丹麦的商船（即还不曾投到盟国方面的那一部分），要求让盖世太保和丹麦纳粹党取得更大的控制范围。还包括其他一些条款，意思都是要丹麦更积极地站在德国一方参战。然而，这场“神经战”似乎没有削弱，反倒加强了丹麦人的抵抗意志。虽然国王最后被迫于1942年11月8日任命亲德的斯卡韦尼乌斯为首相，丹麦纳粹党人为了想表明他们对全国的控制，并为一次暴动铺平道路而于1942年11月1日组织的一次极大的集会却彻底失败了。

因此，贝斯特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用让步的办法把丹麦人争取过来——同时也怀有让当地的纳粹分子取得合法委托的目的。他于是说了许多废话以后，忽然准许在1943年3月23日举行议会选举。但是，德国人对一个被占领国家的这个独一无二、空前未有的让步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结果丹麦纳粹党只获得了略多于百分之二的选票，而组成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的联盟却获得了压倒多数的信任票。这次选举有一个意味极其深长的特征，那就是一般认为最强烈地反对向德国让步的保守党却获得了十二万张选票，也就是获得了百分之四十的选票。虽然整个结果并不影响斯卡韦尼乌斯政府的组成和政策，但是，丹麦人却很重视这一结果，认为它是坚持民主原则和国家完整的一种表现。虽然德国人花了大量金钱津贴丹麦纳粹党，他们却始终不能抱很大希望，把丹麦纳粹党的领袖弗里茨·克卢森变为一个挪威的维德库恩·吉斯林那样的工具。克卢森这个人如此平庸，以致甚至在丹麦纳粹党这样一个小政党内都不能保持团结。到了1943年选举时，他的同胞K·B·马廷森已经多少使他黯然失色了。马廷森是东线“丹麦自由军”的司令，当时回到丹麦来开始招募一支通称沙尔堡军团的新“保安528军”，他同克卢森和丹麦纳粹党都毫不相关，而且更为意味深长的是，他的独立行动是得到德国人的默许的。选举以后，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德国人即使没有完全终止，至少也已大幅度地减少了对丹麦纳粹党的财政支持，而且肯定已经撤销了对弗里茨·克卢森的精神上的支持，而去鼓励和支援那些纯军事性团体，诸如“丹麦武装党卫队”和沙尔堡军团。这给了克卢森对他那个已经四分五裂的党的朝不保夕的控制以致命的打击，此后各方面传说纷纭，说他已经被开除出丹麦纳粹党了，说他因为盗用公款而被德国人逮捕了，又说他已被送到东线去了。

以选举作为让步的另一目的也失败了，因为抵抗和破坏远远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空前未有的强烈程度。一般公众对于德国剥削丹麦的劳动力和资源越来越感到不安。此外，盟军对欧洲大陆日益增强的空中攻势使哪怕是最

爱好和平的人也深信，与其白白遭受空袭，不如去破坏德国人的财产而为自己取得荣誉。1943年8月4日到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因为这成为丹麦抵抗运动发展的转折点——当时德国人递给丹麦政府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实行戒严令，对进行破坏活动和携带武器者处以死刑，甚至要求在德国法庭根据德国法律审判破坏分子。政府在得到国王的完全同意下，拒绝采取违反国家法律和宪法的措施，而且他们声称，这些措施将使维持秩序比以前更为困难。尽管政府对居民发出最后呼吁，要求他们克制挑衅行为，普遍的罢工和大大加强的破坏活动依然爆发了。斯卡韦尼乌斯于1943年8月10日向贝斯特提出辞职，但是，贝斯特要靠斯卡韦尼乌斯作为工具，所以不得不拒绝他辞职。在进一步威吓政府的企图失败以后，只剩下一个解决办法了。德国人宣布戒严，解散了政府和议会，国王实际上成为一名战俘，陆海军军官都被拘留起来。丹麦的常任官员办理日常的行政工作，而德国529人则在他们上面承担起了对丹麦的直接控制（1943年8月29日）。这些事件似乎标志着贝斯特的调和政策暂时失败了，同他争夺权力的对手冯·汉内肯得到胜利了。既然戒严令已经宣布，汉内肯便取代贝斯特成为德国在丹麦的最高领导，既有立法权，又有行政权。这些事件也使先前分裂为两个阵营的抵抗运动——一些是行动分子，另一些则宁愿等到“时机到来”再作出积极的贡献——在一场公开起义中团结起来。这时，德国军事法庭也是第一次对一个犯有破坏罪行的丹麦工程师判处死刑并予以执行。

1943年8月29日，在宣布戒严的同时，一个“自由委员会”组成了。它包括一名海外的自由丹麦运动的代表。委员会成员撇开党派成见，担负起抵抗德国和丹麦纳粹分子的责任。委员会包括所有行动团体的代表，这些团体过去彼此很少联系，这时却有了一个统一的政策和系统性的纲领。大力劝阻对个别德国人或丹麦纳粹分子进行无组织的破坏和袭击，一切力量这时都集中在破坏为德国利益服务的重要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方面。

当戒严令还未取消时，柏林作出了一项决定——显然是根据贝斯特的建议——必须把丹麦的犹太人全拘捕起来，押送到波希米亚去。他们很愚蠢地作了多次努力，想把一切破坏行动都归罪于犹太人的恶意，以便作为他们迫害犹太人的借口，但是，德国人的行动所引起的新的破坏浪潮却显示出反抗决不仅限于一部分人民。对犹太人采取行动发生在10月1—2日的夜间。结果被530押送出境的不到五百人，绝大多数犹太人都已听到了风声，知道他们究竟会遇到什么情况，因此都逃到瑞典去了。

几天以后，在1943年10月6日，贝斯特获准宣布紧急状态已告结束，并恢复了他作为德国全权代表的“正常职责”。不过事实上，除了宵禁以外，紧急状态的大部分规定依然生效。但是，由于在整个冬天破坏的强度逐步增加（据估计11月份每天有二十起破坏事件），贝斯特即使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抵制冯·汉内肯，也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办法去同破坏行为作斗争，因为汉内肯经常叫嚷要重新恢复戒严令。在11月的一个星期内，有十五人被判处死刑，一百三十人被捕，三十一人被送到德国集中营去。这一恐怖政策在1944年4月达到了顶点，当时宣布如果再发生破坏行为，已被逮捕的破坏分子都将被处决，还有就是由丹麦的纳粹分子和沙尔堡军团的成员实行“反破坏”（就是破坏纯粹是丹麦人的财产作为报复），以及进行政治谋杀。在政治谋杀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44年1月5日杀害了那位不屈不挠的爱国者和诗人卡伊·蒙克牧师。

贝斯特对于破坏的损失不断增大十分激怒，终于采取了另一步骤。这一步骤虽然不是十分血腥的，却在这个 531 被占领国家内造成了另一场重大的危机。1944 年 6 月，在夏季白昼最长的日子里，他实行了宵禁，这就使哥本哈根的丹麦人忍无可忍了。丹麦人公开不遵守宵禁（有若干人在街上被德国部队枪杀），并在 1944 年 6 月 30 日号召总罢工。贝斯特以切断首都自来水、煤气和电力的全部供应，并宣布进入戒严状态作为报复。自由委员会公布了一项宣言，敦促人民继续罢工，直到德国人答应以下四项要求：撤走沙尔堡军团，解除宵禁，恢复各项供应和交通，以及保证对罢工者不采取报复。经过仅仅几天的讨价还价（在这期间罢工一直没有缓和），贝斯特于 7 月 4 日接受了丹麦人的全部要求。因为他的报复手段似乎受到他的军事同僚和经济顾问的反对：前者怕会增加困难，使得德国武装部从更加不得人心；后者则担心在大战的这一紧要关头，一场长时期的罢工会给德国的战争潜力带来损失。这样，虽然在丹麦的德国人又一次表现出了不团结，值得注意的是，自从 1943 年 8 月的上一次大危机以后，情况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当时德国军事当局想不顾一切击溃抵抗运动，而贝斯特却力求避免发生公开冲突。这一次，军方和经济顾问联合起来阻止贝斯特进行较量了。

然而，7 月间发生了企图谋杀希特勒的事件，这使盖世太保在德国不可一世，而在丹麦也有了相应的反响，使以前两个竞争的实力人物都黯然失色。贝斯特确实被希特勒召了去，当面骂了一顿，说他对总罢工处理不当，并且告诉他说，他和冯·汉内肯都没有遵照要他们如何应付丹麦的命令行事。因此，8 月初盖世太保在丹麦从德国军事法庭方面接管了司法权，他们的头子京特·潘克发动了一阵新的恐怖浪潮。潘克这时成为丹麦的统治 532 者。但是尽管潘克施展了种种诡计，实行了恐怖政策，破坏活动仍是有增无已，抵抗运动基本上原封不动，未受影响。9 月中，自由委员会为了反击某些押送出境和恐怖行动，号召举行四十八小时的总罢工。潘克以此为借口，消灭了丹麦的警察力量，因为他指控警察——也许是对的——袒护爱国人士和罢工者。1944 年 9 月 19 日的一次假的空袭警报，使德国人得以占领所有的警察岗哨，抓住便衣警察，根据他们的重要性或者押送到德国拘留起来，或者夺去了他们的职权。从这对起直到 1945 年 5 月解放时为止，德国当局与丹麦人民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公开的战争状态。丹麦人的团结并没有因警察的命运而有所动摇，反而加强了，尽管警察被消灭以后丹麦居民只好听任一般罪犯和黑市商人的摆布，而且空袭警报和交通管制这类工作也都垮掉了。贝斯特在 11 月初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企图安抚丹麦人，他强调占领丹麦是出于军事需要，而且完全是临时性的，占领国没有任何报复的意思，所以他恳求居民遵守秩序和予以合作，但是这时丹麦人决不会改变他们的有系统的破坏计划，即使暂时的改变也不容许。总之，潘克 11 月 18 日发出的警告把任何好印象都一下子抹掉了，他说罢工者今后将受到抵抗运动成员那样的对待，因为他们同抵抗运动是一致的，而 1945 年 2 月林德曼将军接替冯·汉内肯将军一事也抹掉了任何好印象。林德曼 533 为了自身的利益，发动了一场新的恐怖运动。在被占领的最后那几个月内，除了德国人的暴行以外，现在又加上了严重的物质困难。食品供应很不稳定，部分是由于德国人征用的数量有所增加，部分是由于运输困难，而运输困难则部分是由于破坏活动，部分是由于燃料供应的减少。随着俄国占领了西里西亚，从德国运到丹麦的少量燃煤也完全停止了。德国人几乎没收了丹麦所有的存煤。尽管这样，德国人还

要求丹麦收容德国难民和来自德国东部的伤员。到了4月底，有三十多万这种人到了丹麦，有许多人的情况糟得令人震惊。

随着解放的日子的临近，抵抗运动的成员对他们自身的前途和丹麦的未来事态日益感觉兴趣。3月里，一份主要的秘密报纸《丹麦新闻》进行了一次地下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出被征询的人中有百分之八十希望自由委员会在首届自由政府中有代表，而共产党则在议会中有代表（共产党在1943年的普选中曾遭到取缔）。除了某些例外，普遍有着一种感觉，认为抵抗运动不是一个“政党”，不应在战后同各政党竞争。自由委员会本身强烈主张，与其把地下组织作为一个团体保存下去，不如把抵抗运动的理想灌输到现有的各党派里去。这是比较自然的看法，因为各党派的成员都曾在抵抗运动中起过主要作用——不管共产党人后来多么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

因为，共产党人虽然象在别的国家中那样，在丹麦抵抗运动中居于十分显著的地位，其他人士在这一运动中从一开始也获得了稳固的立足点，从而有助于抵销共产党的影响。在抵抗运动中，最早的抵抗者大概要算保守党的领袖克里斯马斯默勒，他在丹麦被占领的最初六个月内被驱逐出政府和议会这件事就可以作为证明。另外一些主要的保守党人也在抵抗运动中起了积极而卓越的作用，如青年运动领袖阿克塞尔·默勒和下院的保守党主席比昂·克拉夫特，他和社会民主党人黑德托夫特合作创办了地下报纸《丹麦消息》，1943年12月德国人曾打算谋杀克拉夫特。另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弗罗特·约科布森在1941年建立了通称“挣扎”的那个抵抗组织，1943年又建立了自由委员会。他在自由委员会中是“国防部长”，那就是负责掌管地下部队的军事组织。此外，希特勒进攻俄国，使共产党人可以以狂热的爱国者和抵抗者的身分站出来时，他们那个先前毫不妥协的领袖阿克塞尔·拉森甚至立即就同意同克里斯马斯·默勒合作出版主要的地下报纸《自由丹麦》。诚然，丹麦国内抵抗运动中最伟大的人物（在默勒逃到英国，拉森被捕并被押送出境以后）是共产党以前的一名党员，而且无疑依然是一个热情的同路人——就是莫根斯·福格博士，但是，共产党人无法隐瞒其他党派对抵抗运动所作的贡献这一事实。同时，因为另一个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也同共产党一样具有良好的抵抗成绩，他们在解放以后就可以列共产党人垄断左翼意见的任何权利提出挑战，也可以拒绝共产党人所提的任何合作或联合的形式的建议。

第五章挪威

1940年4月8—9日夜间，德国人对挪威发动了突然袭击。几小时后，他们才送给挪威政府一个通知，说明要占领挪威，并且要求挪威不要进行抵抗。挪威外交大臣也收到了一份照会，列举出德国政府希望挪威政府采取的步骤，这些步骤将使挪威立刻沦于傀儡国的地位。⁵³⁵ 这些要求遭到了迅速而断然的拒绝。挪威军队对侵略者进行了抵抗，在挪威国上上与盟军并肩作战了六十二天，直到欧洲大陆西线的崩溃使盟军不得不撤退。于是国王和以约翰·尼加德斯沃尔德为首相的政府逃避过德国人，于1940年6月7日离开挪威，流亡英国，他们在较早的时候（4月9日在哈马尔和埃尔佛鲁姆）便已经得到议会的指示，要他们继续对德作战，必要时得在挪威国外作战。

与此同时，就在德军发动进攻的第一天晚上，挪威“纳粹”党（民族统一党）的领袖维德库恩·吉斯林得到德国人的支持，在奥斯陆宣告成立一个新的挪威政府，由他自己担任首脑。然而，挪威公众对这个已经被唾弃和不信任的吉斯林突然获得这种声望感到非常愤怒，因此这个政府只持续了几天。而且，根据宪法，政府应由国王任命。尽管德国的一个调停人费了很大力气，想使吉斯林自行树立起来的政权得到事后的批准，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取得一致意见，拒绝批准这项任命。再者，宪法的惯例要求政府应该代表最主要的政党，因此，这是一个在议会中连一个议员席位也没有的政党对宪法的明目张胆的破坏行为。的确，开始时，人们对于吉斯林和他的那些心腹的怨恨更甚于对德国人，因为一个外国征服者行使非法权力，对于民族自尊心所造成的伤害程度并不象一个政党的成员行使同样权力那样巨大，因为这个政党在六年的竞选运动中始终没有获得百分之二以上的选民的支持。

回顾起来，德国人顽固地试图利用吉斯林作为德国政策的工具，可以认为是希特勒在判断上的一大错误，因为这大大地使得对德国人的反对具体化了，还因为如果不利用吉斯林，在某一时刻显然有可能组成一个准备同⁵³⁶ 德国人合作的，最后甚至也许会废掉国王的政府。最高法院（该院的人员留在奥斯陆）于1940年4月15日任命了一个所谓“行政委员会”，以接替吉斯林的第一届政府，这就是上述情况即将出现的迹象。“行政委员会”主要是由忠义的挪威人组成的，他们希望提出某种德国人能接受的国民政府，以保持国家团结，并使国家不至于始终受到德国人直接统治的威胁。德国人自然也渴望有可能取得挪威人的合作，以撤销埃尔佛鲁姆和哈马尔的法令，因为这些法令使他们面临到难以应付的宪法障碍。1940年夏秋两季按照这些方针一直在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最后毫无结果，但是，意味深长的是，议会主席团（虽然很明显地是在德国人的沉重压力下）竟然在1940年6月27日实际上要求国王退位作为签订和平条约的一项必要条件。幸而国王为了国家的前途，并在合法的流亡政府的支持下，于1940年7月3日断然予以拒绝。虽然主席团是一个没有制宪权力的团体，而且未必代表整个议会，但是这段插曲仍旧给挪威议会留下了一个极大的污点，到挪威解放时，人们还记在心里。

德国人于1940年9月11日设立了一个国务委员会，并赋予它拥有流亡在国外的国王和政府的全部权力，试图以此来赢得挪威人民支持的这种破坏挪威宪法的做法，但遭到了失败，他们在粉碎了五个主要政党以反吉⁵³⁷ 斯林的统一战线为基础而组织的联合政府的企图后，突然原形毕露，从讨好奉承转而采取大棒政策。1940年9月25日，德国专员约瑟夫·特博文——他

在较早的时候（4月24日）被任命为德国官方驻挪威的最高代表——宣布，国王和他的家族已被废黜，政府、议会和各政党（吉斯林的党除外）都已取消，行政委员会也已解散；他作为最高行政长官任命了一个“临时国务委员会”在各个行政部门中协助他。这些“部长”大多是吉斯林的党的成员，虽然吉斯林本人由于极端不得人心，在被留作后备人员的同时，依然是挪奸们的实际领袖。这些“国务委员”完全是从占领国那里得到权力的，因此他们所颁布的法令，其合法性是经不起挪威法院的考验的，德国人也不想隐瞒这一事实。总而言之，德国专员执掌着最高的行政权力，有权颁布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并有权利用德国的警察去执行这些法令。但是，1940年12月21日，挪威最高法院原有人员全体辞职，以抗议德国人破坏挪威法律和宪法——特别因为这使他们自己的考验新法律是否有效的特殊职责变得无效。这就使得吉斯林控制的“司法部”可以用一些唯唯诺诺的人去填补他们的职位，这些人最后用法律上的某种诡辩通过了成立一个由吉斯林领导的“挪威国民政府”。因此，1942年2月1日，吉斯林很隆重地被提升为“首席部长”，他的内阁包括十三名“特任部长”（其中十一名仍是以前的人员）。但是，这不过是一个傀儡政府，吉斯林和那个政府仍得听候特博文的命令，尽管吉斯林于1942年2月7日颁布的一项法令已经把宪法上属于国王和议会的权力授予他本人了。

1940年1月间最高法院法官的辞职，不仅是对于德国人统治的第一个真正抵抗的姿态，它还是来自一个极有意义、极有影响的方面。总的说来，这必将对整个挪威抵抗运动的未来发展和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为最高法院院长，这位七十岁的前自由党部长保罗·伯格和伯格拉夫主教一起建立了第一个抵抗团体，后来还成为挪威“祖国阵线”的领导人。祖国阵线包括军事和民政两部。虽然伯格以前没有军事经验，他却逐渐把它建成为欧洲卓有成效的抵抗组织之一。但是开始时，地下运动都是在挪威各地自发地成立起来的。最初孤立地展开活动的各个组织只是逐渐地在一个领导之下集合到了一起，直到祖国阵线组织遍及全国，从林德斯内斯角到北角。如果盖世太保能够破获并摧毁一个地方分部的话，一个新的分部便又立刻组织起来了。地下印刷所印发了约二三百种非法的报纸，有的甚至是在集中营内出版的。

一个“移民服务处”用种种方法把大约五万人送到了瑞典和英国。最初，这些都是小规模的活动，常常做得很笨拙，因此受到德国人的迅速而沉重的报复，但是，后来，它们采取了大规模的熟练的破坏方式，专门破坏那些对德国战争努力最重要的工业。

同最高司法官员、首席法官伯格的领导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是大主教和挪威国教最伟大的人物奥斯陆的伯格拉夫主教的领导。他和伯格一起建立了第一个抵抗团体，凭他个人的声望劝说工会和社会党人进行合作。他和挪威其他六个主教在1942年2月24日的辞职，以及国内几乎所有牧师的辞职，终于在4月9日导致了他的被捕。这位主教即使是被拘禁在集中营里，以及后来被“软禁在家”，他还是设法同抵抗力量保持联系并进行指挥。自1941年2月起，他无视吉斯林的“教会和教育部长”斯坎凯的禁令和威胁，领导了其他主教在接连不断的勇敢的公开信中强烈抗议处死抵抗者，迫害犹太人，以及赫德（吉斯林的冲锋队）的恐怖统治，抗议强迫劳动和押送出境，抗议计划中对青年进行的非基督教教育⁵⁴⁰和对正直教师的惩罚等。此外，1941年4月，德国人，特别是吉斯林的亲信的不法行为，引起了四十四四个挪

威组织，包括律师、教师、教授、牧师、工会工作者、国家官员、医生、法官、工程师、建筑师、化学师、铁路工人、林业工人等，向德国专员直接提出了抗议。但是，到了同年9月，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英国人对奥斯陆的一次空袭激起了热烈的示威，加上把牛奶输出到德国去所引起的罢工，促使德国人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并于1941年9月10日处决了两个工人领袖——汉斯滕和维克斯特勒姆，还把人押送出境，进行大规模逮捕，没收无线电设备等等。在秋季和冬季，又判处了好些人死刑。第二年，德国人对挪威的掠夺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储藏的粮食不是被德国人用完了，就是被输往国外去，可以输入的谷物、燃料和纺织品却数量不足。这时，“求爱”已经明确地终止了，“恐怖政策”开始了。在1942年1月到10月间（10月里出现了一场危机，特隆赫姆宣布戒严，并进行了野蛮的报复），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似乎有一百五十一人被处死，将近四千人被逮捕和押送出境。现在，挪威人彻底敌视德国人了，抵抗已经成了一项应当比较认真地、坚决地和“职业化”地承担起来的责任了。此外，因为德 541 国人已接收了工会，并把控制工业和劳工作为他们在挪威推行的政策的第一个目的，抵抗运动这时得到了工联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全心全意的支持，如果它过去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的话。的确，在特博文于1940年9月25日宣布建立新秩序以后，各工会立刻就决定通过自动解散、销毁会员名册和其他档案，作为哄骗特博文的诱饵，让继任的吉斯林分子按照德国方式去拼凑某种“劳工阵线”。

在挪威开始被占领后不久，德国人便在所谓“自愿的”基础上实行了劳动服务。1941年4月17日颁布了一项条例（于5月1日开始生效），规定劳动服务是强制性的。此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的所有挪威青年男子都被征召去强迫劳动服务三个月。这一措施原来打算每年提供二万五千名青年人，可是，实际上，1941年只有大约一万八千人，1942年增加到二万人。但是在1942年，又颁布了一些法令，使这些安排都相形见绌，那些法令规定所有的商店企业应先拨出三分之一的人员去从事季节性的农业劳动（1942年4月），然后又得再拨出类似比例的人员为托特协会到挪威西海岸的飞机场和防御工事上去从事强迫劳动（1942年5月）：据估计，约有七万名工人

立即被调去替德国人构筑防御工事。然而，在1943年1月至3月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中，他们几乎毫不掩饰地企图把挪威的全部男女人力集结起来，迫使他们为德国服务。吉斯林获准设法给这些措施披上一种是为了本国而不是为了德国利益的外衣，他在宣布这些措施的一篇讲话中解释说，这是出于双重需要：既是为了加强国防以对付俄国入侵的威胁（他把这种入侵说成是迫在眉睫的）又是为了保证国家的供应。实际上，这种征召的主要目的是：第一，控制住所有服军役年龄的青年男子，使他们构筑防御工事和铁路；第二，控制住所有身体强壮的青年妇女，以便万一男子被送到前线去或送到德国去工作后，可以代替他们干这些工作。开始时，他们煞费苦心想消除工人们对于目的地的顾虑，直到工人们“掉进了圈套”为止，但是消息不久便泄漏出来，说人们正被装船送往德国，或者，同样非法地，正奉命去参加准军事性的单 542 位，如托特协会等。

受害者越来越觉察到德国人的计谋，也觉察到德国人由于面临盟军在1943年日益趋向胜利而越来越感到绝望的心情（在挪威的德军中开小差的情况十分严重，以致德军司令官也提到了这种情况），这使占领国在执行劳役

法令方面的进度极其缓慢而困难。逃往瑞典和其他地方的比率急剧地上升，挪威人使用了一切可用的方法去阻挠和拖延工人的登记。他们甚至声称，破坏征工计划的行动已取得了成功，使征召的工人人数从德国人预期的三万五千名减少到三千五百名。8 月间，奥斯陆警察局长贡纳尔·埃利弗森由于拒不逮捕顽抗的妇女以执行征集劳工的工作而被枪毙，挪威警察和准军事组织全被置于德国军纪之下。另一方面，挪威陆军军官也遭到逮捕，被送往集中营。通敌的政党的士气也相应地下降了。在吉斯林就任首相后不久，他那个党的秘密名册和文件就落到了爱国者的手中，文件的摘录于 1942 年 7 月发表在秘密报刊上，许多党员惊惶失措而都退党了。接着，在 1942 年 9 月，吉斯林珍惜的关于成立一个“总体议会”的计划由于工会（早些时候他已经接管了工会并使工会“吉斯林化”了）中的集体辞职而完全失败了。工会工作人员是为了抗议他在 1942 年 9 月 10 日颁布的使工会会籍成为强制性的法令而辞职的。1943 年 12 月，奥斯陆大学被查封，大约有一千五百名学生和六十五名教授被捕，学生中后来有将近四百人被驱逐出境，大约有五百人被送进集中营，原因是这些人反对吉斯林企图以政治测验作为入学条件的办法。此外，在整个 1943 年中，关于吉斯林党内发生分裂并有许多党员退党的新闻，川流不息地传到外界。的确，吉斯林于 1943 年 6 月 7 日在特隆赫姆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已不得不说出他的虔诚的愿望，即希望总人口中每十个人里有一个能成为民族统一党党员，他 543 说，管理人民和国家不需要比这些党员更多的人了。这是承认民族统一党到这时为止在国民中只代表极小的比例，而且还表明吉斯林已经放弃获得普遍依附的希望，只急想达到德国人所规定的、作为准许他继续充当挪威名义上的统治者的条件的那项百分比了。他的权力在 1943 年 4 月初已经被德国人的命令以羞辱的方式削减下来。德国人下令把所有吉斯林分子的市长都置于德国专员的代表或当地德军司令官的代表的监督之下。同时通知报界，将来决不可以提到法令是吉斯林“颁布”的，只说是由“首席部长签署的”。但是他的唯一真正的希望——至少暂时是这样——在于利用其同胞的躯体来安抚德国莫洛克神。然而，正是由于人们发现了他要这么做的意图，才使挪威人的抵抗坚强到无法缓和的程度，也加速了他自己和他的主子的灭亡。1944 年这一年里，抵抗运动从消极完全变为积极，因为早在那年年初，抵抗运动的部队缴获了吉斯林的计划，发现他答应希特勒要动员七万五千名挪威青年替德国武装部队服役。这一计划的提前暴露，迫使德国人和吉斯林分子推迟了几个月才执行这项计划。这样一耽搁，爱国人士就有机会来组织对付他们的反措施，因此当德国人和他们的挪威傀儡在 1944 年 5 月终于企图征召三种年龄的人去从事强迫劳动时（表面上是根据前一年的劳动法令），受到威胁的挪威青年早已逃进深山密林去隐藏起来，这一网几乎没有捕到他们中的任何人。同这一行动同时发生的，是有系统地破坏德国人的档案，以及规模越来越大地破坏为德国人生产的工业。因此，德国人的报复也日益频繁和严厉，到了那年年底，据说大约有一万六千名挪威人被关进监狱和集中 544 营——有许多集中营是设在德国的。

吉斯林的党在这些事件以及德国人的前景全面恶化的压力下，更加迅速地开始瓦解了。在民族统一党内，温和派和极端派之间早就有了裂痕，这时尽管吉斯林拼命试图控制这个缺口，这条裂痕却变得更深更宽了。在这一年中（1944 年），吉斯林的“部长”有三个人脱离了他的政府。吉斯林本人虽然名义上仍旧是领袖和“首席部长”，却已被他的对手“警察部长”约纳斯·利

埃越来越推到幕后去了。约纳斯·利埃冷酷而残暴地同德国盖世太保头子雷迪斯合作迫害挪威爱国志士，从而得到了德国人的特别宠爱。极端派的狂热自然得到了德国人更大的支持，所以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他们撵走了温和派，温和派不仅对德国人无用，而且也拼命想从德国人的网里脱身出来，逃避他们同胞的报复。大批温和派这时开始逃往瑞典，或是为时已晚地试图挽救自己，“加入划船俱乐部”（人们这时都这样称它）。的确，这时，促使这些人逃避他们自己领袖的动机就同促使他们逃避抵抗运动或盟军的报复的动机一样。因为那些顽固不化、不可救药的领导人为了努力保全自己的性命，这时都不得不千方百计地拼命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并把这支力量交给他们的德国主子去支配。因此，这些领导人在力竭声嘶地号召人们志愿投军以后，这时又转而采取强迫的手段了。1944年9月初，据宣布，年龄在十八岁至四十五岁之间的民族统一党党员现在可能会披征召去接受军训并服役，虽然依545旧保证说，不会要他们到挪威国外去服役。结果，数以百计的“吉斯林分子”都逃到森林里去躲避征兵，正如先前那些忠诚的居民逃避劳工动员时所做的那样。

1944年10月25日，红军在追击从芬兰溃退的德军时，越过挪威国境，迅速解放了挪威最北方的芬马克省全境。德国北方军参谋部立刻接到命令，要他们强迫疏散芬马克省的全体居民，并烧毁他们的房子。德国人以冷酷无情的效力贯彻了这项“焦土政策”——在当地的北极严寒和长夜漫漫这些季节性条件下，这一政策更显得极其可怕——焚烧城镇和村庄，屠杀牲口和家畜，并且能抓住多少人就疏散了多少人。当时北方的挪威人十分怨恨，因为祖国阵线的领导和流亡政府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恐怖行径全不鼓励进行任何反抗。但是，事实上，他们极不愿意鼓励人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取得相当小的结果，那是很有道理的，例如单独搞一些破坏行动等等，结果只会招致可怕的报复，使每个人的情况更形恶化。虽然在英国的挪威军队派了些队伍去支持俄国人，也很令人失望，流亡政府的首相甚至终于吐露说，盟国并没有从西方派出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去切断德军南撤的后路。此外，这些十分自然的情绪又被共产党人加以利用，尽管利用得并不很顺利。共产党人一直径自采取一种独立的、更为波澜壮阔的抵抗政策。546然而，德军从芬马克的撤退决不是丝毫不受干扰的。11月，伦杜利克将军接替冯·法尔肯霍斯特将军指挥挪威境内的全部德军。他的任务是把从芬兰撤退下来的七个师调回德国去，以便把他们再从德国派遣到更加危急的战线上。由于挪威祖国阵线的部队、从英国来的挪威空降部队，以及共同作战的英国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的不断袭击和破坏，伦杜利克直到12月底才只能顺利地运走了其中的两个师。而且，过了年以后，盟军的优势几乎日益增长，他们可以给予抵抗运动以较大的自由和较多的援助了。英国训练的挪威人以特工人员的身份回到本国来，在这些专门人员的帮助下，对油库、船只、铁路和工厂进行了一系列有系统的重要破坏活动。地下部队也得到了相当的加强。他们这时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和其他装备，大多数是空投的。另一方面，这一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是：报复变得更为严厉了。集体处决习以为常。受害者部分是从监狱和集中营里提出来的，部分则是临时从受人尊敬的知名人士中挑出来的无辜的人质，以便给舆论尽量造成最深刻的印象。这些迫害者，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德国人，都知道他们对待挪威人民那种残暴和压迫的程度，这从解放的时刻他们中至少有四个人自杀便可以看出来。这四个人是：德国专员特博

文，盖世太保头子雷迪斯，“警察部长”约纳斯·利埃和保安警察头子罗格斯塔特。另一方面，吉斯林和他的几个“部长”及其全部六十名警卫队都向祖国阵线的部队投降了。

祖国阵线的部队在胜利时刻的行为是有纪律的，高尚的。因为他们早在几个月前就已同流亡政府密切合作制订了德国人投降以后接管全国的准备工作。的确，1940年下半年，祖国阵线组织成立后，就同伦敦的流亡政府有了密切的联系，虽然总的说来，流亡政府认识到祖国阵线在估计挪威国内的形势方面具有最方便的条件，因而愿 547 意把内部事务尽量交给国内的人去处理。然而，直到 1944 年 3 月 15 日，从伦敦广播的一项声明才宣布有祖国阵线的领导存在着（没有提任何姓名）作为一个协调和指挥挪威国内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的团体，同时还宣布了这个团体经常同流亡政府保持联系和合作的这一事实。但是当解放的日子显然日益接近时，流亡政府认为应该审慎地使国内舆论安心，让人们知道等到解放的时刻到来，它既无意撇开抵抗运动，也无意忽视政治惯例。1944 年 12 月 26 日，尼加德斯沃尔德首相从伦敦对挪威人民广播时肯定地说，他的政府准备在回到奥斯陆以后立即辞职，以便可以成立一个包括祖国阵线代表在内的新政府，同时还说，准备迅速审判卖国贼，并尽快地举行议会和市政选举。这些表态看起来仿佛只是一种形式，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整个抵抗运动对尼加德斯沃尔德政府的态度（以区别于祖国阵线领导的态度），至少始终是有所保留的。在政府离开挪威的最初几个月里，人们普遍感到的那种强烈的怨恨情绪逐渐消失了，他们开始认识到政府的行动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明智的。幸而这种敌意始终没有波及哈康国王，人们仍然爱戴他，把他当作民族独立的一个超政治的和统一的象征。另一方面，在非社会党人看来，尼加德斯沃尔德政府的工党来历使它始终摆脱不掉这种嫌疑：即它的态度受到了党派政治成见的影响。此外，上文已经说到，挪威社会党人在被占领初期的态度，很有理由会使人们对该党产生更多的怀疑。可是即使到了后来，当挪威的社会党人已经全力同抵抗运动合作时，他们发觉由于造化弄人，自己再一次被排除于领导之外了。正因为有组织的劳工是秘密活动最好的渠道之一，德国人和“吉斯林分子”总是把他们的分裂行动集中在抵抗运动上。因此，由于各地的工人领袖遭到逮捕和驱逐，祖国阵线在有组织的劳工还存在的地方，要同他们保持联络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祖国阵线也不象较早时那样，渐渐不大代表挪威的劳工，而且迫于形势，往往还带有一种相当保守的色彩。可是在挪威，占优势的政治风向——不 548 久选举就将清楚地显示出来——还是来自左方的。因此，解放以后，战时首相尼加德斯沃尔德和祖国阵线的领导人保罗·伯格竟然都不能被接受为战后首届政府首脑的候选人，而这种荣誉竟落在埃纳尔·盖哈德森的身上，这也许是很自然的，因为埃纳尔·盖哈德森这个人既象征着劳工，又象征着抵抗运动。

第六编东欧的被占领国家和卫星国

第一章 549 波兰

西德尼·洛厄里

第一节 德国占领区的行政机构

根据 1939 年 8 月 23 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附加的秘密议定书的条款，德国分到了一部分波兰领土。通过 1939 年 9 月 25 日的一道法令，希特勒命令在划归德国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建立一个临时的军事管理机构。德占区和俄占区之间的分界线由 9 月 28 日签订的一项德苏协议确定下来。德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随即着手组织了四个军区，其司令部分别设在罗兹、克拉科夫、波兹南和但泽。每一军区由一名军区司令官统辖，他拥有全面的行政权力，并由一名文职的行政长官协助他办理行政机关的组织工作。罗兹的军区司令冯·伦斯德对所有这四个军区行使总指挥权，而他的文职助理汉斯·弗朗克则全面负责使占领区的行政机关都按一致的方针建立起来。这个军事政权持续到 10 月 26 日，因为这一天希特勒签署的两项法令开始生效了：10 月 8 日的一项法令把两次大战间波兰最西面的四省并入了德国版图，而 10 月 12 日的另一项法令则在德苏分界线以两两次大战间波兰其余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个行政机构。

根据 1939 年 10 月 8 日的法令并入德国的波兰那几省，不仅包括 1918 年前属于普鲁士的全部领土，还包括过去从不属于德意志帝国的一条宽阔地带（其面积几乎相当于全部并入地区的一半），虽然在 1795 年第三次瓜分波兰和 1807 年提尔西特和约之间的这段时期内，这一地带曾被并入普鲁士版图。

1939 年以前的东普鲁士省有所扩大，朝东把苏瓦乌基那个突角包括进去，朝南把 1919 年波兰割让给德国的齐亚乌多沃（佐尔道）那块小地方包括进去。此外，它还把南起维斯杜拉河、东起那累夫河构成切哈努夫（泽希瑙）专区的华沙省的那一部分也包括进去。东普鲁士的这次扩大使这个省的人口增加了大约一百万，其中绝大多数是波兰人。可是，在东普鲁士的西部边境，马林韦德尔专区连同埃尔平和马林堡两个城市则被划入但泽—西普鲁士这个新的德国行政区，其幅员包括但泽自由市和波兰的波莫瑞省。马林韦德尔划归但泽—西普鲁士的作用是要恢复 1919 年前德意志帝国西普鲁士省的东面和南面疆界，并加强前“但泽走廊”人口中的德意志成分。在但泽—西普鲁士以南，瓦尔塔兰行政区包括德意志帝国的波森省即波兰的波兹南省），并向东扩展，把两次大战间波兰罗兹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华沙省的一部分地区并了进去。在这两个新的行政区中，除但泽的人口以外，有将近一千万居民（其中德国人大约只占百分之六），被迁移到德国去。最后，在西里西亚，1919 年以前的德国边界也有所扩大，把该省的疆界延伸到喀尔巴阡山山麓，于是波兰西南部的整个煤铁盆地、切欣的煤矿区，以及波兰克拉科夫省和基埃尔策省的部分地区全都归并了进去。这样，并入西里西亚省的地区不但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 1914 年以前普鲁士西里西亚的那些地区，而且还包括波兰会议王国时期的一小片土地，以及从前奥地利加里西亚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区过去从来不曾为德国统治过。上西里西亚的首府从沃波累迁到卡托维兹。迁移的人口约为一百六十万，其中只有十二万是德国人。

在波兰合并区纳粹分子开始把当地的行政机构尽快地改得同德国的一模一样。那两个新的德国行政区被 551 置于两个行政长官兼省长（德国总督）

的控制之下。在但泽—西普鲁士，这个职位由以前的但泽行政长官福斯特担任，而但泽议会的前议长阿图尔·格兰泽尔则成为瓦尔塔行政区的长官兼总督。行政长官兼总督遵照德国政府的命令办事，但是在自己的行政范围内，他作为希特勒的私人代表却拥有最高权力。每一个新行政区都划分为三个专区，而在瓦尔塔行政区，由于面积辽阔，还任命了一些区长官担任行政区中央机构和各市区与郊区之间的联络工作。在合并地区，波兰法律有一时期仍然部分生效，但是根据规定，德国和普鲁士的法律可以通过法令加以采用。对于预定将成为德国领土的那些地区，在实现军事占领以后，立即便以无情的速度推行德意志化政策。例如，在格丁尼亚，10月8日的法令开始生效以前，所有波兰文的名称和招贴都被消除掉，所有街道都重新命名。11月26日，福斯特在比得哥煦（布罗姆堡）宣布，所有波兰人和犹太人必须撤离但泽—西普鲁士。几星期后，德国宣传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在《柏林金融消息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明白表示，这项驱逐政策将在并入德国的各个地区予以执行。强迫波兰人和犹太人迁移到大德国的新边界和德苏分界线之间的那片土地上去的工作发生在1939—1940年的冬季：根据报道，城镇居民一条街一条街地被撤走，头一天得到通知，第二天就得离开。

在经济领域里，纳粹的政策是充分发展他们在合并区内获得的经济资源——其中包括波兰一些最富饶的产粮区，还有上西里西亚、切欣、多姆布罗瓦和索斯诺维次的煤矿、金属工厂和机械工厂，以及以罗兹为中心的纺织工业。在军事管理时期，他们就由勃劳希契以总司令的身分署名颁布了一些条例，开始把征服区的经济同德国的经济合而为一。9月11日和10月7日之间公布的种552种法令，使德国马克同波兰兹罗提同时成为法定货币；成立了德国信贷银行；把波兰企业和产业的管理权授予德国托管人，并规定只有得到勃劳希契的许可，才能获得这类企业和产业，冻结各种证券和其他贵重物品，并管制外汇交易。

对于“政治上并入德国的那些地区”的经济政策，戈林在1939年10月19日的一项指示中作了如下的概括：“其经济的重建和发展，及其生产和供应的维护，必须推动向前，目的在于尽快完成并入德国经济体系的工作。”

可是，戈林在合并区和德苏分界线以西其余的波兰地区之间作出了鲜明的区分。“德国经济中可以使用的全部原料、废料、机器等等”都得从后一地区搬走。凡是“对于维持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不是“绝对必要的”企业，“必须迁往德国”，或者“在目前的所在地”为德国的利益加以利用“下一天，即10月20日，赫斯发布了一道命令，宣布华沙将不予重建，而且在这一地区内将不再兴建工业企业。

波兰合并区和布格河—那累夫河体系两者的疆界之间的那片地区通称“总督辖区”。它由波兰的卢布林省以及华沙、基埃尔策和克拉科夫各省的部分地区所组成，包括克拉科夫、琴希托霍瓦、卢布林和华沙这些城市在年。根据总督汉斯·弗朗克的一项声明，在1939—1940年冬季把波兰人和犹太人从西部迁移进去后，总督辖区的人口在1940年2月大约为一千四百五十万，其中一千二百万是波兰人，二百万是犹太人，四十或五十万是乌克兰人，还有六万是日耳曼族人。总督辖区的面积原来大约占前波兰共和国版图的四分之一（即约为九万七千平方公里），但在1941年德军进攻俄国以后，由于把加里西亚东部也归并进去，所以扩大到了十五万平方公里。

在 1939 年 9 月底以后为俄国占领的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的那部分地区，从 1941 年 6 月 30 日以后所进行的其他行政变革如下：比亚威斯托克地区划归东普鲁士行政区，目的是把它最终并入德国。不象其他预定要吞并的占领区那样，比亚威斯托克当地几乎不能说是拥有大量日耳曼人或部分为日耳曼血统的人，因为以前的为数约八千人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早在 1939 年俄国人占领该地区时，已被“遣返”德国去了。不过，不难想象，有一点可以便这个地区被称为德国以前的领土，因为除格罗德诺这一城市外，由于第三次瓜分波兰，它从 1795 年到 1806 年曾经是普鲁士的领土。两次大战间的波兰东北部的其余地区（除维尔纳外），则作为白俄罗斯占领区常务专员公署管辖区的一部分而被归入奥斯拉。再朝南去，沃林的大部分地区和波列西那南部则被归入德国驻乌克兰专员公署的管辖范围。

第二节 德国对总督辖区的政策

1939 年 9 月德苏谈判期间，曾讨论了以残余的领土成立一个波兰国的可能性，但是俄国人最后决定反对这个方案。然而，德国人并没有放弃这项计划，他们认为这项计划可能有助于说服西方国家，继续对德作战是毫无意义的。

1939 年 10 月 6 日，希特勒在对德国国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详细他说明，既然德国和苏联已经共同承担责任，要使前波兰国的领土变为“一个和平发展的区域”，他赞成立即举行和平会议。希特勒在这篇演说中概括地说明的德国对征服区所抱的目的是，“建立二个波兰国，554 其组织形式将防止它再一次成为反德活动的温床或反对德国和俄国的阴谋的中心。”

10 月 1 日希特勒和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的一次会谈，多少说明了他本人在此阶段对于成为总督辖区的那片土地的未来所抱的想法。齐亚诺得到的印象是，希特勒对于这片土地的地位还不曾作出明确的决定，但原则上，他是愿意允许它有一种将会“保证波兰国民生活和平发展”的“国家形式”的，只是要满足几个条件：边境必须如此划分，以保证所有的日耳曼人都能回到德国境内，即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波兰居民混合在一起的话；这个国家决不能成为一个反德的宣传和阴谋的中心；它永远不得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它必须承认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占有支配的地位；它还不得成为德苏合作的障碍。对于齐亚诺所询问的，未来的波兰是否应是一个主权国家，希特勒并没有回答，但是他解释说，他无意“直接接管波兰生活”，因为“这个国家的苦难”是“骇人听闻”的。希特勒还补充说，“在同西方国家和平解决以前”，在德国的“人种局面”“由于大规模人口移动而有所改善”以前，他将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国家组织”。10 月 6 日，希特勒向国会发表演说的那天，齐亚诺会见了莱埃，莱埃肯定地告诉他说，将在“德国的真正边界”和布格河之间那片纯粹是波兰人的地方建立一个波兰国。莱埃说，这个国家将是“一种保护国，由于它包括诸如克拉科夫、琴希托霍瓦、华沙和卢布林等一些大的波兰中心，它可以……

被称为‘新波兰’”。

因此，纳粹概念中的“新波兰”是一个傀儡国，而操纵其活动的线则牢牢地掌握在德国人手里。他们原来的意图似乎是要建立一个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相类似的当地政府，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能找到一个波兰领袖愿意扮演哈哈那样的角色——更谈不上扮演吉斯林那样 555 的角色——这一目的失败了。这样，尽管希特勒对齐亚诺作了上述声明，他们还是不得不直接

接管波兰领土。此外，鉴于西方国家对希特勒的和平提议没有反应，他们于是认为不值得再煞费苦心去虚构一个独立的波兰国了，而戈林 10 月 19 日发布的指示也表明，到这天为止，不管原来的意图曾经是什么，总督辖区已被当作一个应当尽可能快速而全面地加以掠夺的区域了。

希特勒在 10 月 12 日颁布的“关于波兰占领区的行政管理”的法令任命汉斯·弗朗克为总督，赛斯-英夸特为他的副手。行政机构的总部设在克拉科夫，弗朗克从罗兹迁到那里，在 11 月初正式就职。他通过 10 月 26 日的一道法令，已经把总督辖区分为四个行政区，分别以克拉科夫、卢布林、腊多姆和华沙为中心，这些行政区进一步又分成市区和郊区。在大战的第一个冬季和 1940 年春季与初夏这段时期里，纳粹分子似乎仍然不能确定，是把总督辖区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维持下去为德国的利益充分使用其资源和人力呢，还是把它完全纳入大德国体系，对他们最为有利。强迫波兰人和犹太人从合并区移入总督辖区一事，似乎表明有保留总督辖区波兰特征的意图。克拉科夫大学的教授们在接近 1939 年底时，全体被驱逐出境并拘留在德国，可是到 1940 年 2 月又获准重返家园，这也是有其意义的。几星期后，据说波兰医师也获准在华沙和其他城市里负责医疗工作。另一方面，从文官政体成立之 556 初，就有迹象表明有一种德意志化的意图——例如，据报道波兰一些纪念碑的拆毁，以及德国学校的开办，其规模似乎远远超过总督辖区日耳曼族人和德国官员们的需要。

总督辖区的确切的地位始终没有十分清楚地规定过，但是到 1940 年年中，关于在该区实施德意志化政策的任何怀疑全都消除了，虽然朝着既定方向的进展并不如预期的那么迅速。残酷镇压和恐怖政策的种种措施，甚至还有标志着德国对总督辖区统治的后期的大屠杀，都是由弗朗克执行的。他后来交给逮捕他的美国人员大约四十二册日记，其中仔细地记下了他在波兰的所作所为，而这些日记在纽伦堡审讯时恰恰成了控告他的最有力的证据。弗朗克在波兰犯下的“灭绝种族”的罪行，希姆莱也有份，因为根据 1939 年 10 月 7 日的一项秘密法令，希姆莱奉派全面负责德意志化政策，包括清除“外国人口中对德国以及对日耳曼族人社会可能构成威胁的那些集团的有害影响”。

说明对总督辖区的政策的那些指示是由弗朗克和希姆莱予以解释和执行的，其中有政治、社会、文化与宗教、经济、生物、物质和精神等方面。在政治方面，总督辖区被当作德国的一个殖民地，并应由各“劣等”民族予以承认。在社会方面，第一个目标是清除犹太人和波兰知识分子。在文化方面，波兰的所有高等学府都将予以撤销，只容许波兰人接受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而且这种教育还得在德国人的监督下用德语来进行。他们还采用了各种措施去破坏教会的影响。在经济方面，遵循的政策就是戈林的指示中所规定的代表德国在损害当地居民的情况下进行掠夺。在生物方面，“悄悄”采取的措施在于消灭犹太人和降低波兰人的出生率。在物质方面，从属的居民忍饥挨饿，还受到残暴的迫害。在精神方面，非日耳曼族人的种种最卑劣的本能都受到了鼓励。德国人曾充分利用 1939 年入侵后的脱节和混乱现象，采取措施迫害波兰的知识分子。希姆莱后来吹嘘说，当时德国警察“就得有那股蛮劲……去枪毙几千名波兰的头面人物”。除此以外，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在 1939 年下半年，有大批波兰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克拉科夫地区，被押送到各拘留营去。可是，尽管德国的政策很严厉，它们并没有防止地下组

织很早便在两次大战间的整个波兰领土上广泛地建立起来。这在 1940 年初使德国领袖们大为烦恼。他们感到如此忧虑，以致 1940 年 5 月在德军进犯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时候，他们遵照希特勒想在东方保持和平的愿望，下令对波兰地下运动采取“特别绥靖行动”，或称“A.B.行动”。因此，6 月 15 日，地下组织有几千名成员遭到逮捕，并且根据弗朗克的命令于 10 月间被提交战地军事法庭审判，其后差不多有一半人被处决了。

德国当局在占领波兰后，立即开始招募身强力壮的波兰人，特别是农业工人，到德国去工作。到 1940 年年中，各合并区身强力壮的工人的供应很快就变得枯竭了，而志愿办法在总督辖区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弗朗克于是在 1940 年夏季下令，采用强制手段进行招工。1941 年和 1942 年间，他不断表示自己对于为此目的所采用的拦街 558 兜捕这类办法的有效性所感到的得意。象他在 1942 年 8 月向绍克尔保证的那样，他在 1942 年 12 月能够汇报说，总督辖区已经为德国提供了九十四万余名工人。

早在 1941 年 9 月，弗朗克就已经知道，总督辖区居民的生活已经下降到接近饥饿的水平。可是，过了将近一年，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以后，由于戈林在会上把德国粮食情况的严重性告诉了他，他使总督辖区在原来已经过分的需要量之外，又承担了为德国提供五十万吨做面包用的谷物。1942 年 8 月，他指示下属说，这笔贡献必须全部“在牺牲外族〔非日耳曼族〕居民的情况下”作出，还进一步指示他们说，“这项工作必须冷酷无情、毫无同情心地完成。”

正象后来显示出来的那样，为了德国的经济利益，从波兰人的生产劳动中榨取最大的好处这一迫切需要，是德意志化的全部计划之所以在总督辖区暂缓进行的主要原因。可是，后来的记录说明，最终打算强加于波兰的灾难却始终没有为那些德国领导人所遗忘。弗朗克于 1941 年 4 月在克拉科夫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宣称，“那一天将会到来，那时维斯杜拉河从发源地到出海处的整个流域将同莱茵河流域一样是德意志的。”可是，在总督辖区推行德意志化政策的方式却要由希姆莱去决定。实际上，这就成了希姆莱和弗朗克之间在管辖权方面发生 559 许多剧烈争论的根源。1941 年 3 月间，总督辖区建立了民族登记制度，目的是为了德意志化，或者如有必要，也使那些日耳曼后裔“重新德意志化”。然而，希姆莱和弗朗克两人在 1942 年初显然都对德意志化进展缓慢感到关切，于是朝要求达到的方向采用了更为有效的措施。希姆莱于 3 月间访问了克拉科夫，在那里向弗朗克说明了他的计划。他说，目前的打算是，“日耳曼族定居的岛屿”应该从欧洲国家迁移过来，而且“无论如何，首先要做到的是沿着桑河和布格河建立一个强大的移民区，把波兰那些外族地区包围起来”。他还告诉弗朗克关于他要把东欧移来的日耳曼族家庭安顿在卢布林省和扎莫什奇省的计划。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对这些计划作了进一步的修订。8 月 4 日，重行定居计划在弗朗克面前进行了仔细的讨论，目的是要在 11 月份予以执行。计划朝前开展了，第一批移民在圣诞节前迁入了扎莫什奇地区。可是，很明显的是，赶走当地居民所用的野蛮手段在波兰人中引起了震惊和对抗，因为他们自然害怕这就是把全体波兰人从总督辖区大规模驱逐出去的开端。这年冬季，当移民工作在卢布林区继续进行时，波兰人对他们遭到驱逐所感到的惊恐使他们大批逃往森林去参加游击队。实际上，这对波兰人的影响是如此严重，以致弗朗克后来在 1943 年 6 月 19 日呈给希特勒的一份长报告里对希姆莱所采用的方法大发牢骚。

在斯大林格勒的局势转变以后，弗朗克似乎已开始 560 意识到俄国的胜利对德国的含义了，因为他在 1943 年作出种种为时已晚的姿态，想博得波兰人的好感。那年上半年他不断同希姆莱争斗着，想阻止党卫队的暴行进一步引起总督辖区公众的反抗。这两个纳粹领导人在 1942 年显然曾达成过一项协议，允许盖世人保对活跃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全境的波兰地下运动采取协调的措施，不过希姆莱同时也曾答应过，在采取行动之前，把所有准备对总督辖区实行的措施提交弗朗克批准。可是，弗朗克认为希姆莱没有遵守他的诺言，因此感到十分不快。在总督辖区里，形势很快就变得无法控制，这是很清楚的。地下运动的组织已达到那么高度的发展，而且正以那么广大的规模展开活动，以致德国人毫不怀疑，要恢复任何一点秩序，就必须采取广泛的措施。弗朗克通过上文提到的 6 月 19 日呈给希特勒的那份长报告，曾希望说服希特勒利用其对希姆莱的影响去减少党卫队部队在波兰的暴行，并允许弗朗克采取某些办法，旨在面临俄国人挺进的情况下取得波兰居民的某种合作。在这份报告中，弗朗克把细节罗列出来，借以说明全体波兰人民对德国人态度的极度恶化正是弗朗克本人推行的政策的直接结果，而希姆莱所推行的政策更加深了这种恶化，同时他建议改变一下，施行一种较为明智的政策。

弗朗克由于斥责纳粹发动的反对司法独立的运 561 动，早在一年以前便已失去了希特勒的宠信，因此他的请求未见得会比希姆莱的请求更受到重视。但是，即使他的呼吁获得成功，当然为时也太晚了。从 1939 年最初入侵波兰以后，弗朗克、希姆莱和戈林所推行的政策在这几年中已经产生了一种累积的影响。实际上，到这时候，任何可以设想出来的政策还会对波兰人起一点点作用，那是很可怀疑的。波兰人通过在德国人手下的经验，对德国人理所当然怀有的仇恨已在受压迫的民众中间扎了相，并且加强了大家共同抵抗的决心。从这时起，德国占领的历史就是一部德国当局和波兰地下组织的报复性暴行和反报复性暴行的历史，而暴行的残酷程度随着红军向东欧的挺进也日益增长。

第三节 波兰地下国和国家军

如果德国和苏联的领导人在 1939 年 9 月瓜分波兰以后 指望波兰人对占领当局会俯首帖耳地服从，那么他们真是过分低估了他们那些受害者的气概和决心了。因为波兰人有着搞秘密活动的传统，这至少在三次瓜分波兰时就有了，同时地下斗争的技巧也经历了好几代的发展。他们习惯于采取种种无声无息的反对办法去应付德国和俄国的统治。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波兰的大多数英雄，包括约瑟夫·毕苏茨基在内，全是因为在地下战斗中的功绩而受到波兰人的爱戴。所以，在战争的初期，波兰人竟能在那次大战间的波兰全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地下活动组织，并加以巩固，使之成为一个完全拥有政府各部、议会及军队的秘密国家，而这些政府部门、议会及军队全隶属于波兰流亡政府，并同它保持着联络。这并不出人意外，虽然当时在盟国看来，似乎是难以置信的。

在 1939 年遭到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入侵以后 波兰人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全境组织了许多独立的地下部队，继续同占领国家进行斗争。主要的部队是由前波兰国的四个主要政党组织的。农民党党组织及其军队（即农民大队）在农村地区实力最强，他们代表德苏占领下的波兰的农民进行他们的大部分活动。社会党党组织及其军队则在市区和工业区比较活跃，因为有组织的工会和合作社战前在那些地方就是有影响的。除了这两个主要的团体外，国民

民主党和大主教民主党也都有它们各自的政 562 治组织和军事组织。

在大战开始后不久，几个仍然留在波兰的军官，包括“格罗特”（罗韦茨基）上校和“博尔”（科莫罗夫斯基）上校在内，从西科尔斯基将军那里接到命令，要他们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独立的部队整编为一支统一的力量。这就是刃不可当的波兰“国家军”的由来。到 1944 年华沙起义的时候，它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三十八万人的兵力，而在组织方面则和独立的波兰的行政区相符合。这个军事组织最后同一个民政机构和“政治代表组织”配合起来，置于流亡政府派来的一个代表的权力之下；整个结构通过无线电和信使同伦敦保持着持续不断的联络。如同信使之卡尔斯基后来说明的那样，波兰秘密国家的目的是要使战前存在的波兰（即以 1935 年宪法为基础的波兰）延续下去，并且要维持政府的行政结构，为最后的解放作好准备。如果这意味着波兰人坚决不承认德国或俄国的占领，那么同样正确的是，以西科尔斯基将军为首的波兰流亡政府的领袖们坚决认为，战后的波兰政府应该具有同 1939 年 9 月以前执政的政府迥然不同的政治性质。

这个秘密国家是通过那个“政府代表”和派驻波兰各个地区的代表来行使其行政权的。每个地区设有十二个处，相当于波兰流亡政府的那些部。国家军司令“格罗特”（罗韦茨基）上校（后升为将军）本人就归伦敦的波兰军队总司令指挥。地下国家的统一则是通过四大政党——社会党、农民党、天主教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而实现的。这些政党都有代表参加那个地下“政治 563 代表组织”或波兰的议会，另有代表参加伦敦的流亡政府。据卡尔斯基说，另外还有一个部门帮助维持民众对占领国家的那种决不屈服的态度，并消灭所有通敌分子。虽然各种政治力量的合作是相当牢固的，足以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始终并不是平静无事的。在几个主要政党中，有些派系甚至在早期就不赞同地下组织领导人们的政策。尽管这些政党在为国家军提供人员方面进行合作，他们仍然对各自的独立的军事组织保持自行控制的权力。

这个秘密国家的规模和实力通过它的种种活动便显示出来，其中有些活动上文已经提到过了。例如，有组织的教育竟能在地下进行，尤其鉴于一旦被发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惩罚，所以这看来几乎是不能相信的。然而，在小学德意志化，中学和大学又被德国人关闭以后，波兰人继续按照波兰的传统教育他们的子女——就当着盖世太保的面，秘密地开班上课和举行考试。这个波兰地下组织和国家军中的其他各种活动是设有秘密印刷厂，它在整个大战期间继续印行了许多种出版物，还有国家军生产武器的秘密工厂。军事法庭为审讯战犯和纳粹头子而行使其职权，许多死刑判决都执行了。从一致抵抗德军的态度中发展起来的那种坚强不屈的程度，后来使波兰人可以夸耀说，他们是自始至终没有产生过一个吉斯林的唯一国家。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着重地指出了国家军和大战前的波兰陆军之间的区别。他说，以前，军队的骨干是由职业军人的一个核心组成的，他们不参与政治，也不加入政党。可是，国家军的政策是，允许每个士兵只要在共同斗争中始终服从总司令的命令，就有尽情从事他挑选的政治活动的全部自由。然而，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提出的这个政策，大概主要是出于 564 需要而不是由于自由原则，因为“博尔”是一个属于波兰贵族传统的军官，类似于支持毕苏茨基在政变后独裁时期执行的萨纳恰政策而后来又自行接过控制权的“那些将军们”。他对于各政党给予的支持的依赖迫使他把自己的立场改变得比较符合于他们

的政治观点。然而，举例而言，存在于“博尔”那样的军官和组成农民党军队的那些人之间的社会大鸿沟，使他们的合作在大战期间一直都很困难，最后终于导致农民党军队和国家军领导之间的严重分裂。可是，暂时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却同各政党进行合作，并且执行着流亡政府中各党领导人的命令。因此，单就其军事行为而言，他同秘密国家政治领袖们的政策，或者同西科尔斯基将军，都并无矛盾，西科尔斯基将军希望波兰在这次战后具有牢固的西方意义的政治自由基础。

起初，地下斗争的力量是同时针对德军和俄军的，因为他们都占领着过去曾经是独立的波兰的领土。地下组织的目标是要准备一次武装起义，并且通过主要是计对着和盟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军的破坏行为、牵制活动和情报工作，去支持盟国的作战努力，但也反对苏联政府运送给养并以其他方式帮助纳粹进行战争的种种努力。法国的垮台打消了波兰人所抱有的盟军在不久的将来获胜的希望，因而迫使这个秘密国家的领袖们采取一种长期的政策，主要集中在情报、新闻报道和宣传行动上，并且把庞大的地下组织缩小到最低限度，以便减少盖世太保所采用的那些严厉措施的效果。

1941年6月，德军入侵俄国，这在波兰地下活动中，就象在波兰其他方面的活动中那样，导致了重大的改变。在波兰东部同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的斗争突然停止了。国家军开始向红军提供很有价值的帮助，一面针对德军后方的交通通讯进行种种牵制活动，一面通过波兰驻古比雪夫的大使馆和伦敦的流亡政府直接向苏联政府提供情报（苏联政府也乐于接受）。这时期，重点是放在为未565来的起义制造武器和弹药上，以及针对通过波兰境内的德军交通线上那些战略据点所采取的仔细筹划好的种种措施上。新闻报道和宣传活动同先前一样继续进行。波兰人被押送到德国去从事强迫劳动，这使波兰的地下博尔，第30页，第40页。

同上书，第49—50页。1939年9月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署了一项秘密议定书，为盖世太保扣人民内务委员部（后改内务部，俄国警察的各部门隶属于这个部）在打击波兰地下活动的措施方面进行合作奠定了基础（《纳粹—苏联关系》，第107页）。

博尔，第67—70页。先前，波兰人曾就德国准备入侵俄国向莱国政府提供过情报。

同上书，第68—74页。

组织得以扩展到德国的核心中去，并同法国境内的抵抗力量建立了联系。波兰人的广泛而精细的组织使他们能够在大战期间对德国国内的形势向各盟国的政府提供宝贵的情报。此外，他们同欧洲被占领地区的其他地下组织的联系，使他们可以参与一个组织严密而有效的地下活动网，被俘的盟军士兵和降落在敌境的飞行员通过这个活动网可以有计划地混过德军防线，进入安全地带。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德国人早在1940年就对这个组织的规模之大和实力之强感到惊恐，因而采取了通称“A.B.行动”的那项严厉步骤。

组织得以扩展到德国的核心中去，并同法国境内的抵抗力量建立了联系。波兰人的广泛而精细的组织使他们能够在大战期间对德国国内的形势向各盟国的政府提供宝贵的情报。此外，他们同欧洲被占领地区的其他地下组织的联系，使他们可以参与一个组织严密而有效的地下活动网，被俘的盟军士兵和降落在敌境的飞行员通过这个活动网可以有计划地混过德军防线，进

入安全地带。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德国人早在 1940 年就对这个组织的规模之大和实力之强感到惊恐，因而采取了通称“ A.B. 行动 ”的那项严厉步骤。当德国人在晚期采用集体负责和屠杀人质的办法时，他们的政策恰恰得到了同他们的意图相反的效果，因为波兰人不但吓不倒，还进行了一系列反报复活动来对付德国人。措施和反措施变得日益剧烈，被占领的波兰不久就成为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恐怖事件和残酷行为的发生地点。

第四节 华沙犹太人区的起义

1943 年 4 月，德国人向全世界透露出一项离奇而悲惨的事件：有几千名波兰军官被屠杀后埋葬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与此同时，另一幕同样悲惨的戏

几世纪以前，华沙的犹太居民就一起居住在这个城市里他们自己的地区内，后来这个地区便被称为犹太人区，但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他们中有许多人经商致富，于是犹太家庭就迁到了这个城市里的所有地方，只有比较穷苦的同胞还住在犹太人区的贫民窟里。德国人实行占领以后不久，在有计划地反对欧洲犹太人的运动中，就开始把犹太人集中到中心地区。他们在华沙所选中的地区就是从前的犹太人区，于是弗朗克总督在 1940 年 10 月间下令把犹太人重新安置在那个地方。接下去，华沙的三十三万犹太人就被集合拢来，赶进犹太人区。一个月内，来自外省的许多难民又加进去后，那里便塞满了四十万犹太人。德国人于是着手筑起一道高高的砖墙把犹太人区包围起来，同时还采取措施来保证从这时起把犹太人封锁在里面，同华沙的其他居民隔绝。在 1940 年 11 月和 1942 年 6 月之间，他们的经历就是不堪设想的拥挤，难以容忍的肮脏、饥饿，以及企图使人精神堕落的种种尝试。可是，直到 1942 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计划才达到十足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1942 年 7 月 22 日，从华沙犹太人区向各灭绝营进行的第一次有计划的 567 遣送开始了。在 1942 年 6 月和 10 月之间，有三十一万零三百二十二名犹太人——几乎是战前华沙的全部犹太居民——就是用这种方式遣走的。他们中有少数人挑出来充当劳动力，但其余的人都被断送了性命。到这次灭绝运动结束时，这个犹太人区里似乎杳无人迹，但是还有许多人躲藏起来，主要是躲在地下的隐蔽处。留在犹太人区的人于 1942 年 10 月组成了犹太战斗组织，其成员都拿定主意，与其听凭德国人屠杀，不如进行自卫。他们在波兰国家军的帮助下开始收集武器，并且制订保卫该区的计划。1943 年 1 月 18 日，德国人发现自己面临有组织的抵抗，于是千方百计引诱犹太人走出犹太人区。有几千人上了钩，可是当这些人已被屠杀的消息传回来时，犹太人就决定，不能让德军不经过一场战斗再抓到一个人。

4 月 19 日，当德军遭到猛烈的武装抵抗时，消灭犹太人区的最后战役打响了。德军采用了围攻战术。旨在使伤亡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据“博尔”将军说，波兰国家军部队在德军后方进行了零星的攻击，有组织的抵抗持续到 4 月 26 日。可是，犹太人直到 5 月 16 日才停止战斗，纳粹分子还为这个战役设想出一个象征性的结局，把犹太大会堂炸毁了。根据德国人的报道，共捕获了五万六千零六十五名犹太人，其中包括阵亡的七千名和押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六千九百二十九名。有些估 568 计则认为，还有五六千人死在废墟和火焰中。德军有计划地摧毁了该犹太人区，把它夷为一大堆瓦砾。德国人正式承认的损失不过十五人；他们实际伤亡的人数要多得多。但是在华

沙犹太人区起义中战死的那些犹太人所维护的，远远超出了以人类生命所能衡量的。

第二章 奥斯拉 西德尼·洛厄里

在“巴巴罗萨行动”（德军入侵俄国的代号）发动前几个月，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就在考虑对于预料将在东方被征服和占领的那片土地所应实行的计划。1941年5月他发布的总的政策指示里说，“战争的唯一可能存在的政治目标就是，要使德意志帝国在未来的几世纪里摆脱俄罗斯扩张主义者的压力”，因此他制定了在东方地区应当遵循的一项总政策。奥斯拉的命运将与乌克兰、高加索及“其北方毗邻的地区”的命运大不相同，因为奥斯拉将发展成为一个德意志化的保护国，作为走向同德国逐渐紧密的联合的第一步。奥斯拉将包括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和白俄罗斯，为它制订的更为详尽的政治计划列举在罗森贝格拟就的发给（未来的）奥斯拉德国专员的指示中；他在指示中强调了这个地区的欧洲特征，因为七百年的历史已把这个地区加进了“大德国的生存空间”。在这些指示中，罗森贝格详述了使这个地区变成大德意志帝国一部分的种种办法，并讨论了波罗的海三国居民种族同化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白俄罗斯则将569被用作收容不同种族的垃圾场，它们将形成一道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的屏障。奥斯拉作为一个整体，“将建成一片强大的德国边疆”。

1941年7月17日，对俄国发动的攻势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希特勒任命罗森贝格为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同一天，由海因里希·洛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省长兼行政长官）掌管的奥斯拉德国专员辖区和由埃里希·科赫掌管的乌克兰德国专员辖区成立了。洛泽的权限涉及前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领土以及白俄罗斯那片相当不明确的地区（包括两次大战间波兰境内主要为白俄罗斯的地区）和军事当局将移交给他的被占领的那部分苏联地区的民政管理。奥斯拉德国专员辖区分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常务专员辖区，每一区进一步又分为几个分区，而白俄罗斯常务专员辖区则分为几个大区。同科赫在乌克兰的统一的权力相比，奥斯拉的管辖权是比较分散的，主要是因为奥斯拉各地区的性质各不相同，但是虽然如此，政治权力却是通过洛泽在里加的总部从罗森贝格在柏林的总部直接授予的。尽管权力，尤其是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权力，始终是牢牢掌握在德国人手里，波罗的海三国的内政却交给了由德国当局指定并严加监督的本国自治机构的手里。即使严格他讲，这些机构算不了政府，它们却也至少为德国人减轻了许多使人厌烦的事务工作。

按照原来的打算，白俄罗斯常务专员辖区应该包括科赫的乌克兰边界以北、构成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的一部分的诺沃格鲁多克和波列西耶“公国”的那部分地区，以及斯摩棱斯克省和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全境。可570是，到1942年秋季，德国民政权力向东只伸展到波里索夫那么远，而白俄罗斯常务专员辖区除了前波兰地区以外，只包括明斯克、斯卢次克和波里索夫周围的地区。结果，白俄罗斯占领区的其余地方始终都由军事当局掌管着。不过，俄国的普斯科夫省则被归入爱沙尼亚常务专员辖区，而维尔纽斯城及其周围的部分地区则仍然是立陶宛常务专员辖区的一部分，如同过去在苏联占领下那样。俄国人在1940年6月以后占领波罗的海三国的那一年中所遵循的政策，使这些国家的民众深恶痛绝。这三个国家经过含糊可疑的普选后被并入苏联一事，以及后来把大批领导人物押送往苏联本土一事，结果加深了他们的怨恨，所以当入侵的德军于1941年6月进入波罗的海地区时，他们在进攻

俄国的战斗中找到了许多志愿的盟友，这是十分自然的。立陶宛人甚至在红军撤退时起来造反，并且在阿姆拉热维齐乌斯博士的领导下怀有希望地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可是到 8 月它便为德国人所解散，它的领导人也都被逮捕了。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同样有许多志愿人员在俄军撤退时参加了对俄国人的战斗。

因此，洛泽在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建立他的民政机构时，发觉形势十分有利，他在初期还充分利用了那种仇恨俄国人的情绪。把苏联经济和政治政策颠倒过来的心理气氛已经成熟。俄国人在波罗的海各国只有一年的时间来进行国有化和集体化工作，而在两次大成间的波兰的以前那些地区，情况则并不一样，因为那里从 1939 年 9 月起就处于俄国的权力之下，至于这时被德国占领的苏联领土，情况则更为显著地不同，因为那里从 1918 年以后只知道苏联的行政管理。这种互相悬殊的情况使德国人不可能在奥斯拉制定一项统一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并且确定了对白俄罗斯和对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实行不同的政策是必要的。

可是，当 1941 年 8 月 19 日洛泽发布一道命令把奥斯拉的全部苏联产业没收时，这使波罗的海人民由于俄国的政策，而渴望恢复某种形式的个人所有制和个人经营的愿望受到了令人不快的挫折。德国人为了给战争努力保持一种平稳的经济，觉得立即接收俄国人所建立的那些国有的和集体的经济机构是有利的。可是，洛泽的命令却说，“私有财产准备全部发还”。然而尽管有这些对波罗的海民众的保证，俄国国有的全部财产只不过由德国国有所皆代。德国人的意思是，这种情况应维持到形势允许德国当局在东方实施其战后的殖民政策时为止。目前，私有经济只准在小规模的农业和企业中予以恢复，但也只有在那些私有主答应充当德国人的代办人的条件下才能获准。这是必要的，就算只是为了使经济运转下去的话。可是，对于大规模的企业，处理办法就不同了，它们归柏林的托拉斯管理局控制。德国信托所有制的建立有双重好处，既保证了大规模农业、工业和商业企业的正常运转，又为德国移民保留一个地位，让他们在战后可以发展。在 1939 年以前就是苏联领土的地区，由于从第一次大战结束以后便一直在巩固苏维埃制度，所以那里的情况就很不相同，需要有一种不同的政策。对于德国民政机构已经接管或预定要接管的苏联被占领区（1939 年以前已是苏联领土的地区），罗森贝格的办公室制定了一项“新土地法”，经同戈林商定后于 1942 年 2 月 16 日颁布。根据这项法令，苏联的“集体农庄法规”被废除了，同时要建立一种“新秩序”来引导农民逐渐回到个体耕作上去。这要分几个阶段来完成，第一个阶段是把集体农庄改为公田。这项农业政策的前景使德国领导人，包括 572 罗森贝格以外的最高集团的其他人员，都激动起来，因为大家都觉得这可能是赢得俄国民众支持的关键。

虽然罗森贝格在 1 月间向新闻界说，首要的任务是要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去保护奥斯拉和供给德军的需要，他同时却全神贯注在取得当地民众帮助的种种措施上。1941 年秋季在德方监督下建立起来的波罗的海国家的行政机构显得很有效能，这使它在 1942 年 3 月 7 日的一项法令中得到了正式承认。波罗的海人民在一定范围内预定是可以受到优惠待遇的，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有着血缘关系的民族。同时，根据德方促使他们同西方而不是同东方保持密切关系的意图，他们同那些所谓“劣等种族”（诸如犹太人以及略胜一筹的斯拉夫人）相比，受到的待遇要宽大得多。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因为德国人在内政上从地方当局方面，特别是从地方警察和民兵方面，能够获得很有价值的帮助，而且许多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还自愿到东线去参加作战。在奥斯兰，也建立了某种程度的合法自治，但是德国人后来发觉他们被法典方面的一片混乱搅得十分烦恼。然而，当人们知道正在制订计划，准备让 1941 年根据 1939 年纳粹—苏联条约回到德国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卷 573 土重来时，取得当地人民支持的种种尝试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遭到了失败。波罗的海人民普遍同情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理，也对德国人起了不利的影 响，但是德国人在宣传工作中作了很大的努力去抵销它。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和仇恨则被很有效地加以利用，特别是在 1942 年英苏条约签订的时候，因为德国人当时可以有充分理由声称，英国人已经秘密同意让苏联政府在波罗的海地区自由行动了。同波兰和俄国的大量犹太人比较起来，这里的犹太人相当稀少，这就为德国人简化了波罗的海各国的犹太人问题，不过已有的犹太人却也足以使民政当局要为他们 在塔林、里加和考那斯建立起犹太人区来了。

在白俄罗斯，象在乌克兰和苏联其他被攻占的地区那样，罗森贝格从一开始就打算挑动反对莫斯科的民族意识。他也曾把这个地区看成是比较落后的，并考虑在那里安置各个不同的种族作为抵挡俄国人的堡垒。由于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苏联的一部分，罗森贝格在实施一种获得当地民众支持的政策方面遇到了困难。

1942 年间，因为实行了他的“新土地法”，他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普斯科夫地区，但是任何有可能成功的建设性政策都受到若干因素的妨碍。例如，希姆莱办公室和罗森贝格办公室正在试行对这个地区殖民的种种不同的计划，而荷兰和罗马尼亚的日耳曼人迁移到奥斯兰去的计划已相当提前。可是，从一开始，德国民政当局就被迫得去应付游击队的活动，这种活动早在 1941 年 11 月便已经十分严重，使洛泽不得不宣布了集体负责办法以对付当地的民众。此外，除了森林中迅速发展的抵抗 574 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外，罗森贝格的权力在平行管辖权这种混乱状态中正变得越来越不生效。

将近 1942 年底时，由于军事形势开始变得对德国不利，在奥斯兰推行的种种政策也就不那么宽大了。他们为了德国的利益加紧努力去利用该地区的经济潜力，同时也作出了一些新的尝试，想为战争努力去征募人力。8 月里，他们在波罗的海各国发动了一个协调一致的运动，要征募壮丁或者参加武装党卫队的波罗的海军团，或者参加强迫劳动。这个运动在爱沙尼亚是成功的，但在拉脱维亚收到的实效较少，而在立陶宛则一无成绩。实际上，随着这个计划在立陶宛的完全失败，接下来就是大逮捕，其中也逮捕了“自治机构”的好几个成员。此外，前不久才同波罗的海其他大学一起获准恢复活动的维尔纳大学和考那斯大学又被关闭了，作为对大学生的一种报复措施。征募人员的方法日益严厉，这也使游击队的活动相应地有所增加，因为许多人为了逃避征募，全都溜到森林里去。立陶宛的形势由于征募运动的结果已经大为恶化，这时又因为在苏联占领时期撤离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的重返而更加恶化了。德国当局在成立一个党卫队军团的计划失败以后，就同立陶宛人订立了一个为时已晚的协议，由立陶宛人组成几个工兵营在立陶宛领土上建筑防御工事。在苏联被占领区，罗森贝格几乎不顾一切地挣扎着想挽救他的农业政策，他命令农庄的“重新私有化”应加速进行。可是，在 1943 年初期，游击队活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多。苏联对游击队的援助正变得日益有效，而

游击队也已达到了一种比以前先进得多的组织状态。575 在俄国被占领区，政治运动于 3 月间有了一个不寻常的变化，因为德国人当时把一个被俘的苏联将领（A·A·弗拉索夫中将）捧出来作为针对苏联公民和战俘的一场宣传攻势的中心。弗拉索夫将军并不同帝俄时代的逃亡者或其他可疑分子联合起来，而是在德国人的支持下，自行宣布为一个“俄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和一支“俄国解放军”的领导人。他在柏林电台的广播中，鼓吹对于从苏维埃政权下解放出来的俄罗斯实行一项新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根据这项政策，他将废除强迫劳动并把集体农庄重新改为个体所有的土地。在 3 月和 4 月间，弗拉索夫被送往东欧去对那里的俄国战俘和俄国被占领区的民众集会讲话。他的呼吁显然在德国战俘营里的俄国人中间引起了某种议论，他甚至还拼凑成了一支杂牌军，不过主要由于他所激起的俄国民族主义同罗森贝格鼓励他们反对莫斯科的权力的政策有抵触，德国人不久就撤销了给予他的支持，弗拉索夫也就逐渐从公众的眼前消失“了。

将近 1943 年底时，奥斯兰的情况迅速趋于混乱。除爱沙尼亚外，德国民政当局这时在绝大部分地区已失去了当地民众的支持。由俄国伞兵和俄国给养有效地支持着的游击队活动所取得的成功，使德国人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也发动了一场恐怖运动。从东方占领区逃来的大批德国难民和日耳曼族难民，以及德国城市里被炸得无家可归而逃来的难民，使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动荡不安更加复杂。因此，罗森贝格所期望的奥斯兰成为“强大的德国边疆”一事，仍旧只不过是一个梦想。德军发动进攻后在不过两年的时间里，令人畏惧的那种“俄罗斯扩张主义者的压力”重新又在施加到德国来了，而被占领的波罗的海各国和俄国的领土则成了行政混乱、难民杂沓和游击战争活跃的场所。

1940年夏季，德军占领了挪威，这使苏联不致立即卷入战争，从而使苏联领导人舒了一口气，让他们有时间占领1939年俄—德边界和互不侵犯协定中规定为苏联势力范围的大部分地方，以发展其西部战略地位。这样，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和两次大战间的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就同先前得到的波兰领土一起，被并入了苏联版图。只有芬兰留了下来。那年夏末，俄国人开始朝这个方向施加其全部压力，其意图显然是遵循一种同前不久用于苏联占优势的其他地区的步骤相类似的做法。大约就在这时，德国由于关心它新近在挪威取得的几个港口的安全，同芬兰军事当局达成了协议，把人员和物资经由芬兰铁路运送到芬兰北部的基尔克内斯去。从6月份起，俄国人就在催促芬兰人，要同他们就阿兰群岛问题签署一项协定，同时还一直在向佩特萨莫方面增加压力。但是德国也对佩特萨莫很感兴趣，俄—德在佩特萨莫及其镍矿方面的利害冲突发展成为两国权力斗争的要点之一。到11月莫洛托夫同希特勒在柏林会谈时，这种冲突达到了严重关头。

根据德国提供的文件来看，希特勒在11月作出的建577议，即苏联政府应成为四强公约签字国之一，看来只不过是企图使苏联的注意力转向中亚细亚方面。因为就在莫洛托夫到达柏林的那天（1940年11月12日），希特勒已向他的司令官们下令，要他们准备东方战役。可是，要实现德国在东欧和东南欧的直接意图，不少事情要取决于苏联的态度，这种态度仍然得加以探索。希特勒的计划也许并不是不可改变的，至少在他同莫洛托夫会谈以前是这样。假如德俄之间要发展一种较为真诚的关系，即使是暂时的，那么造成紧张的论点就有必要用微妙而克制的手法加以处理，可是苏联外长在这方面的修养却很不够。莫洛托夫坚持要把讨论引向巴尔干和波罗的海问题，并且在11月12日又提出了芬兰问题。希特勒在下一天的讨论中向他保证说，就德国而言，芬兰在政治上仍然属于苏联势力范围。为了加强这项保证，他表示愿意终止根据过境协定正在通过芬兰领土的德国军队和装备的运送。但是作为这项保证的代价，希特勒强调德国在战争期间对芬兰的镍和木材所存在的利害关系。而且，他说，在波罗的海地区发生另一场战争可能会有“预见不到的后果”。然而，莫洛托夫决心要确切地试探一下希特勒对苏联在芬兰的计划究竟打算采取什么立场。他的持续不断的询问使希特勒作了一个明确的声明，大意是说德—俄关系将经受不起在波罗的海地区发生另一场战争的严峻考验。莫洛托夫在这个问题上最后感到满意了，虽然他执意要澄清一下德—苏在芬兰和东南欧的争论要点，一定使希特勒很恼火，并使他不大想再设法缓和和对苏的紧张关系，或把苏俄作为一个参加者算入轴心国划分世界为几个势力范围的计划。莫洛托夫对于希特勒所暗示的他们应该“背对背”地斗争这一点没有作出反应，相反地却坚持要“面对面”地对付德国。

不管希特勒凭什么理由决定要进攻苏俄，“巴巴罗萨578行动”的明确命令反正是在1940年12月18日发布的，其中芬兰和罗马尼亚全被算作这场战争的积极参加国。

保卢斯元帅和布申哈根将军在纽伦堡审讯中的证词，描述了从巴巴罗萨命令发布之日起芬兰和德国军事当局之间在对俄作战计划方面所进行的密切和真诚的合作。实际上，德国陆军参谋总长1941年2月3日同希特勒开会时所作的一项声明暗示出，德国军事领导人那时已同芬兰人进行过广泛的军事

讨论，虽然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表明，“直到不再需要隐瞒以前”，将不缔结任何协定。布申哈根叙述了德国和随后芬—德在芬兰北部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的计划的发展，这是在一系列会议中和2月份下半月的一次联合侦察中所进行的。他说，最终的计划由最高统帅部批准作为“蓝狐狸行动”。然而，如579果说德国人在北部的计划中完成了同芬兰人的合作，他们在南部想使芬兰主力部队卷入的尝试，看来却不十分成功。据后来承担同芬兰人联系的联络官德将瓦尔德马尔·埃尔富特说，1941年上半年的合作完全是德国人主动提出的。他描述了5月25日和26日在萨尔斯堡和柏林举行的会议，德军司令官约德尔和哈尔德在会上所作的试探并没有得到芬兰参谋长的反应。芬兰人讨论了假如他们受到俄国攻击时他们所要参加的那些行动，但是他们继续回避同德国直接结成联盟。与此同时，假如总的说来11月在柏林举行的会谈已经挫败了俄国人的芬兰计划，它们却并未使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在佩特萨莫的谋略感到泄气。1月和2月间，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利用各种各样的外交手腕打算在该地区获得一个立足点。可是，芬兰人设法不让他们提起镍矿的管理问题，到5月初以后，在德国人给予的道义支持下，芬兰人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芬兰卷入这次战争以前那一时期的真相，到本书写作时（1953年）还没有完全澄清。芬兰同德国的军事合作，特别是在北部，以及某些芬兰领导人的活动和同情，暗示出他们同德国的关系比事后所声称的还要密切。不论580实际情况如何，芬兰无疑是被卷入了一连串的事件之中，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芬兰存在着德国军队。当德国和俄国军队在德方发动进攻以前彼此严阵以待时，芬兰人于6月初开始分阶段进行动员，芬兰部队也逐步集结到了各防御阵地。德军在芬兰已驻了两个师，6月17日德国海军舰艇便着手保卫芬兰海域以防停泊在喀琅施塔得港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埃尔富特将军几天以前以德军联络官的身分到了芬军司令部。芬兰政策的主要目的显然是防御。然而德军司令官们已作了充分的准备，使德军北翼得到掩护，而人数极少的芬军如果需要支援时，也不应没有支援。

在6月22日德军发动进攻以后出现的那片混乱中，以及在希特勒把芬兰人牵连进去的那篇讲话所造成的气氛中，芬兰人想保持中立的企图，特别是在他们国土上驻有德军的情况下，真是枉费心机的。法尔肯霍斯特的山地军从基尔克内斯开进了佩特萨莫地区，来自挪威的另一个师正在穿过瑞典。芬兰和德国的海军舰艇开始一起用水雷去封锁芬兰湾外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航线。在这种情况下，要俄国人不相信希特勒向全世界发表的声明，必然是很困难的。既然德军在芬兰国土上驻有大量的兵力，不用说芬兰人在北部和波罗的海上的积极合作，俄国人不可避免地最终也将对芬兰人开火。他们向北部开火，从汉科向部署在该地区的芬军开火，同时俄国轰炸机也轰炸了芬兰海域里的芬兰船只。芬兰保持中立的企图突然被打断了。6月25日，混乱而含糊的局面已经澄清⁵⁸¹，俄国人对芬兰的主要城市进行了轰炸，苏联政府已经作出决定，要把战争扩大到芬兰去，这一点已经变得很明显了。不管芬兰人民原先的意图如何，他们就这样突然发觉自己又一次在同苏俄交战了。

当曼纳海姆在6月28日违背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愿望，决定于7月10日在那尼斯那尔维两侧朝东南方向发动进攻时，他背后无疑有着大多数芬兰国民的支持。从冬季战争开始以后的苏联政策，已经使芬兰人积累起一种对俄国人不满的情绪，大多数芬兰人民当时似乎都赞成收复根据莫斯科和约割让给苏俄的土地。他们觉得这次战争是上一次单独战争的继续。他们并不想

同其他几个大国拉扯在一起。当他们同东方的邻国结清旧帐的时刻似乎到来时，他们在7月10日的进攻所激起的热情中，一般忽略了这次战斗的更为广泛的各个方面。可是，大多数政治领袖们不久就看到克制是明智的，所以在深秋和冬季芬兰的战争目标逐渐固定为收复1940年的失地和确立军事安全。德国军事领导人曼纳海姆把主要的攻击对准拉多加湖以东斯维尔河畔的洛杰伊诺那波列，并同沿沃尔霍夫河对岸朝前推进的德军会师。可是，曼纳海姆坚持把卡累利阿地峡作为他主攻的目标，虽然他打算在后一阶段遵循德国的建议行事。由于越过俄国边境所牵涉到的微妙的政治问题，赖提总统延迟了两个月没有允许曼纳海姆用他的“卡累利阿军”继续进攻，但在9月初他最后同意了，条件是曼纳海姆不得同德军合作进攻列宁格勒。虽然曼纳海姆在9月里的计划是在列宁格勒郊区建立战术据点，那里只要用很少的部队便可以遏守，但德军想在对这个城市发动的一次进攻中取得芬军合作的努力被芬兰人成功地抵制住了。在芬兰，人力的严重缺乏是影响芬兰计划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到11月，当芬兰582人开始认识到战争并不象他们最初预料的那样很快就会结束时，促使国民经济有瘫痪危险的人力缺乏使芬兰军事计划的热情挫抑了。11月，在德军指挥下的北部芬兰军队应曼纳海姆的要求，被置于防守地位。

当芬兰军队为了“安全”的目的，开始越过1939年的边界去占领俄国的防御工事和基地时，英国政府应他们的俄国盟友的要求，着手施加压力要芬兰人撤退。美国政府虽然还是一个非交战国，却暗示他们愿意帮助芬兰人退出战争。但是芬兰人在俄国土地上获得战略基地以前不愿意停止前进，这就导致英国政府于11月28日发出一份最后通牒，声称假如芬兰人不停止军事行动和积极参加战争的活动，他们将发现自己同英国处于交战状态。丘吉尔本人给曼纳海姆写了一封信，作为英国照会的补充，信中向这个芬兰司令保证说，如果芬兰能够在实际上终止活动，那也就不需要予以公开宣布。曼纳海姆的含糊其词的答复和芬兰政府的答复都未能使英国政府感到满意，英国人于是在12月6日宣战。

据埃尔富特将军说，芬兰同德国的军事关系始终只限于联络和磋商，虽然政治领袖们在1941年11月甚至参加了防共公约。12月间，他们讨论了对摩尔曼斯克铁路线采取一致的行动，但并未执行，虽然曼纳海姆是对索罗卡（别洛莫尔斯克）发动主攻的那项计划的设计师。当军事形势的变化使德军不可能接替南部的芬军时，曼纳海姆就拒绝参加这次进攻。芬军战线最薄弱的环节是在奥涅加湖以南的斯维尔河畔。曼纳海姆坚持，德583军必须派遣部队先在南部防区接替他的部队，然后芬军才能参加对索罗卡的进攻。

当德军于1942年上半年在别处获得最大的军事成就时，从列宁格勒到北冰洋的这条战线却相当沉寂。德—芬战友关系由于希特勒在6月4日曼纳海姆七十五岁生日那天访问了赫尔辛基，和曼纳海姆不久以后又到德国希特勒的总部去进行了回访而得到了巩固。可是，德军未能攻占列宁格勒，证明为俄国战线上芬—德进一步联合行动的主要障碍。那年夏末，德军计划对摩尔曼斯克铁路发动一次攻势，他们指望芬军夺取索罗卡，这使军事合作面临一个危机。当曼纳海姆提到原先同德国人达成的协议，即芬兰参战要取决于德军在列宁格勒周围军事活动的胜利时，德方在8月15日送来一个粗鲁的答复，要求确切地知道芬军是否将参加这次进攻。他们答应在这种情况下支援芬军，但是说，假如曼纳海姆坚持要先在南部采取行动，那么拟议的这次进

攻（即“捕大麻哈鱼战役”）就不得不放弃。曼纳海姆并未直接答复，而是派他的参谋长和一个助手去讨论这件事。这场争端的结果是，到8月底，德国人已决定放弃对摩尔曼斯克铁路的进攻，而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进攻列宁格勒的一项计划上（“北极光战役”）。结果，德军在1942年秋季的几次挫败使他们放弃了对列宁格勒发动进攻的计划，并把注意力转向他们北翼的安全问题上去。在北部的德国部队奉命于10月间采取守势以后，芬—德磋商就变得日益关系到德军增援挪威各港口的运输问题了。

只要德国军事冒险运气好，特别是在1942年上半年684里，芬兰人对本国政府的“战友”政策就不会有什么反对。只是在1942—1943年冬季以后，当德军在俄国和别处遭到挫败时，反对参加德方作战的情绪才开始有所发展。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曼纳海姆向芬兰政府说明，德国非遭到失败不可，但是同德国的经济关系以及芬兰北部驻扎的大量德军，使芬兰人意识到突然单独媾和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

美国政府继续以某种方式同芬兰保持外交关系，虽然他们的俄国盟友，以及至少在理论上，他们的英国盟友，都在同芬兰交战。同时，美国人还继续尽力防止芬—德联盟或芬兰进一步参加对苏俄的进攻活动。当时，芬兰人并没有对1942年苏联的和平建议有所反应。只是到1943年2月，在战事一再失利以后，芬兰人中才表现出了单独媾和的愿望。1943年，在各个友好国家劝说芬兰退出战争的种种努力所激起的那种气氛中，美国政府于3月20日向芬兰人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由他们出面斡旋，为俄国和芬兰之间安排和谈。当时芬兰人没有回答，反而派他们新任命的外交部长亨里克·拉姆赛博士去同里宾特洛甫讨论这件事，结果不但同美国的关系恶化，而且同德国的关系也恶化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对芬兰人的这一姿态一点也不感激，却要求芬兰人不但应拒绝美国的提议，并把答复的措词通知德国，而且还应签署一个书面保证，决不单独媾和。芬兰人并没有接受这个要求，但是，当芬兰的复文于4月间先送给德国人去要求同意时，美国政府几乎同芬兰断绝了关系，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破裂始终没有完全成为事实。可是，在拉姆赛飞往柏林并在4月里引起反响以后，芬兰人和他们的德国战友之间的关系开始冷淡下去，德国人看到芬兰人中，特别是芬兰社会民主党人中，对于芬兰军政领导人在战争中一直奉行到那时的芬—德合作政策日益流露出反对的迹象，因而越来越感到气恼。

第四章 585 被瓜分了的捷克斯洛伐克

伊丽莎白·威斯克曼

第一节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

1939年3月至1945年5月按照过去哈布斯堡王朝较为顽固的日耳曼人的传统，特别是按照希特勒本人的传统，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最活跃的日耳曼族总是认为，这些“历史名省”已隐秘地，因此也永远地并入了一个大德意志帝国。这种信念由施潘教授和苏台德日耳曼人党的理论家们在第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时代便培养起来了。这些人在自己人中总谈到元首如何不久就会来“收回”这整片领土——他们只有对外人才表现得满足于苏台德日耳曼族自治这种细微的差别。虽然希特勒本人在思想意识的运用方面既是病态地又是十分现实地反复无常，他的一生却贯串着一条线，忠于他的那些在林茨，老师所特有的日耳曼—奥地利沙文主义。因此，1939年3月15日的进入赫拉德恰尼，在希特勒看来是他生平所获得的报酬性胜利之一。对他说来，他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在轴心国的欧洲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然而，这块领土从前一年秋季并入德国版图以后，已经残缺不全了，因为捷克人和日耳曼人都认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在其历史疆域内是不可分割的。起初，要正确看出这个支离破碎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何以竟成为一个保护国，而不只是一个新并吞的行政区，这是比较困难的。显而易见，德国人为了宣传起见，仍然认为玩弄捷克自治这套把戏是值得的。1939年3月16日建立保护国的那项法令使无依无靠的捷克人任凭德国保护长 586 官去摆布，而三个月以后，这个保护长官就取得权力，可以任意践踏当初设置他的职位的那项法令了。

在1939年3月15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头几周里，德国军方在进行着管制。然后，新任命的德国保护长官（即1938年2月不得不在威廉大街让位给里宾特洛甫的冯·牛赖特男爵）在4月5日来到布拉格。同他一起来的卡尔·赫尔曼·弗朗克，是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苏台德日耳曼人领袖中最为凶恶的人，他一身兼了国务秘书、警察长官和盖世太保代表三职。捷克人听到这个消息就意气消沉，因为他们非常理解任命弗朗克的意义。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全部日耳曼人的行政长官、不那么粗野的亨莱因之所以让位于弗朗克，因为弗朗克象征着他因以取名的卡尔·赫尔曼·沃尔夫的精神。1917年在从前奥地利国会的比较温和的气氛中，就是卡尔·赫尔曼·沃尔夫主张非日耳曼人应该被当作老虎来加以鞭撻，而他所说的非日耳曼人，就是指捷克人。有一个叫做比格斯多夫的日耳曼人被任命为弗朗克的副国务秘书，还有十五名日耳曼地方长官在各行政区代表着保护长官。

3月15日，捷克法西斯分子盖达为了他本人的利益发表一个声明，要求担任国家领导。但是他的追随者的人数始终少得可笑。虽然有一时期他还不易被控制，他却几乎没有为德国人所接纳，而且很快便被抛弃了。捷克自治这出滑稽戏由于保留着哈哈而彼维持下去。哈哈的头衔是总统，他还有一个实际上毫无权力的内阁，其捷克部长大多数是曾在贝兰手下，或者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担任过公职的专家。4月27日，毫无政治经验的职业军人埃利亚斯将军当了总理；外交部和国防部全被撤掉，捷克军队实际上已被解除了武装。保护长官公署里的德国工作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和捷克部长彼此重叠，而且德国代表不久就出现在捷克各个部里。虽然如此，仍有必要在保护长官公

署和捷克内阁之间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因为德国人对这两个机构之间的直接接触是不赞成 587 的。这一条规则看来有一个例外：捷克司法部长亚罗斯拉夫·克雷奇却获准同弗朗克直接接触。恰恰提名的、过去曾在最高法院为总统工作过的一个叫做哈维尔卡的人当上了副总理，大家认为他采取了一种不必要的亲德态度。捷克政府就其立法责任而言，是通过 1938 年 12 月议会生活完全终止以前通过的一项法律所准许颁布的紧急法令进行工作的。

在慕尼黑会议以后，只有两个政党或政治集团可以存在。现在，这两个政党在极权主义者的眼里也成为过多的了。正象报刊被搞成了清一色那样，政治集团也就只能有一个民族阵线，国家统一党。这个组织是由恰恰本人主持的，许许多多捷克人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为的是——绝不夸张他说——通过留给他们的唯一途径来表明他们国家的统一。1941 年 6 月，国家统一党的党员人数达到四百万以上这一高峰，但是该党同德国人经常发生摩擦，因为德国人对其工作人员始终是不满意的。1943 年初，国家统一党逐渐衰微下去了。

当英国和法国在 1939 年 9 月对希特勒宣战时，捷克人从绝望中顿时又产生了希望，但是西方国家在波兰被消灭时所呈现的那种软弱无能，不大适合于重新唤起被慕尼黑会议那么深切地挫伤了的同盟心。然而，1939 年 10 月 9 日在德国保护长官公署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卡·赫·弗朗克就抱怨“解决捷克问题的种种困难”。这一次，根据弗里德里齐将军于 1940 年 10 月 15 日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似乎曾考虑过对付捷克人的三种可能的办法。

1. 德国对摩拉维亚进行渗透，并将捷克民族限制于波希米亚一隅。

这个解决办法据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捷克问题即使在形式上缩小了，却将继续存在下去。5882. 最激烈的解决办法是，把所有的捷克人赶走，但是可以提出许多理由来反对这项解决办法……

3. 同化捷克人，即由德国人吸收大约半数的捷克民族，这项办法的重要性在于从种族或其他观点来看都是有价值的。这尤其是在德国领土上（苏台德日耳曼边境地区则是例外）增加雇用捷克人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把集中的捷克人口加以分散。

必须夺去另外半数捷克民族的力量，加以消灭，并用船运送出境……。对于在种族上是蒙古族的那部分人以及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大部分人，这尤其适用……。

凡是抗拒德意志化计划的人应严加处理，并应加以消灭。

上述工作的开展当然要以增加德国人从德国领土上涌入这个保护国为先决条件。

事实上，元首决定采用第三种解决办法。这意味着“虽然表面上维持保护国的自治权，德意志化工作……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却必须始终如一地予以执行”。赞成同化的这项决定可能说明了大德意志帝国内这个保护国的独特性质。这个决定同一周后希特勒对波兰所作的决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波兰将被孤立，并将充作发动进攻性军事行动的“跳板”。

1939 年秋季给了纳粹分子一个极好的机会去推行他们对捷克人的政策。从 1918 年以后，捷克人就把 10 月 28 日作为他们第一个共和国的生日来庆祝。虽然德国人已经把这个节日取消，许多捷克人佩戴着国徽还是在捷克各大城市示威。捷克当局曾请求公众谨慎行事，但是在德国人喜欢称之为“德国布拉格”的地方，德国党卫队人员故意向人民挑衅，扯下他们的国徽

等等，直到公众的反应导致残酷的德国警察进行干涉。许多捷克人遭到逮捕，被拖进设在佩切克宫的盖世太保总部去“惩处”。有一个捷克大学生扬·奥普列塔尔已经受伤，后来又遭到殴打，终于在两星期后死去了。11月15日，他的同学为他的葬礼举行了一次很有秩序的示威大游行。一辆德国汽车故意冲到人群中去。于是大学生的纪律被破坏了。大学生把那辆汽车推翻，扭打便开始了。卡·赫·589 弗朗克的司机设法把自己搞伤。11月16日，牛赖特和弗朗克带着这个司机飞往柏林去给希特勒看这些伤痕，希特勒作出决定，立即采取恐怖手段，当夜便派遣党卫队的特种部队前往布拉格，捷克大学的的大学生全部被捕。那些被认为是领袖的人都被处决，其他还有许多人当场遭到骇人听闻的虐待或者被押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去。布拉格的捷克大学和保护国境内的所有其他捷克大学——包括某些高等技校在内——一律关闭三年（事实上，它们一直关闭到捷克解放）。就捷克人来说，这是他们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的结束；大学生，甚至教授，如果能在他们寓所附近找到某种体力工作，就要比到德国境内的一家工厂或一处集中营去侥幸些。接着，许多中学，甚至小学，也逐渐受到取缔或者实行德意志化，所以在保护国的后半时期，一个十岁以上的捷克孩子很可能会被迫进厂劳动，而根本不能进任何学校求学。

这样，到 1939 年底，德国人已经在完成第三种解决办法和消灭捷克知识分子阶层那条路上迈步走了。1939 年 7 月 11 日，他们宣布德语和捷克语都是“官方”语言，而在行文时德语总应放在前面。根据 1939 年 3 月 16 日那项法令的第二条，保护国的日耳曼族居民成为国民兼德国公民，而捷克人则只是德国国民，他们在自己家乡与其说是公民，不如说是臣民。英国的空袭不久就有助于鼓励德国本土上的日耳曼人到保护国来就业，他们在这里享有通常称为治外法权的权利。首先变得很显眼地德意志化的是布拉格。如果我们回忆起占大多数的、以前未曾维护其民族性的捷克人，在 1861 年后才逐渐出现于这个都城的话，那么，对于“繁华的、斯拉夫人的布拉格”受此糟蹋所感到的怨恨是不难领会的。而由于捷克大学被迫关闭以后仅仅剩下的日耳曼大学的新校长是鲁道夫·容，这种怨恨便更为剧烈，因为容也是一个发表过著作，曾以粗暴野蛮的方式乱骂过捷克人的纳粹分子。鉴于布拉格的历史，这个城市大概比任何其他非日耳曼族的城镇更易德意志化，这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箝制住了捷克人的抵抗。

至于第三种解决办法的其余部分，1939 年 3 月 16 日那项法令的第九条，即保护国应成为德国海关区的一 590 部分的那条规定，在 1940 年年成歉收以后于 10 月里终于实行了。把工人调运往德国的工作也及时加速了。在 1939 年和 1941 年间，作为一个开端，大约有十五万名熟练的捷克工人被遣送到德国去。对捷克人自己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团和索科尔组织就象那些大学是他们民族生活中的支柱那样不可缺少，军团在 1939 年 8 月被德国人依法解散了，但是它的成员直到 1941 年初才被大规模地解除了行政职务。索科尔成员在 1941 年中受到镇压，最后在 10 月 12 日被海德里希消灭了。保护长官公署和埃里亚斯政府之间为了这类问题有着一阵阵的摩擦。这个捷克政府一再呈请辞职，但一直被挽留到 1941 年秋季。

同时，希特勒于 1941 年 6 月进攻俄国以后，保护国内的紧张情况明显地加剧了。慕尼黑的经验早已激发起泛斯拉夫民族的传统和对共产主义的同情。东方的战争看来要比德国同英国的空战和海战实际得多，而它所牵连到

的那些行动提供了切实的破坏机会。的确，希特勒感觉到捷克问题一点也“没有解决”（也就是说，捷克人的存在竟是这样持久），因此他在 1941 年 9 月“批准”牛赖特的长期病假，另派了一个半有教养的虐待狂者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到布拉格去当副保护长官，他大概也是党卫队头子中最精明的家伙。1941 年 9 月 28 日，即圣温塞斯洛斯日，海德里希宣布保护国各重要地区处于紧急状态，晚上十点钟起实行宵禁，并且成立了新的即决法庭，十足进行了恐怖统治。在以后的两个月中，这些新法庭在德国盖世太保庭长的操纵下，宣判了三百九十四人死刑，并把一千一百三十四名牺牲者移交给盖世太保，目的是为了进行那种可怖的“进一步调查”。知识分子和前陆军军官，军团团员和索科尔成员在牺牲者中处于突出地位。一开头，总理就被认为是同伦敦有接 591 触的“卖国贼”而遭到逮捕，递交给由蒂拉克本人主持的德国人民法院的一个陪审团，并于 10 月 1 日判处死刑，虽然这项判决直到下一年才执行。过了很短一段时间，他的前司法部长克雷奇才接替他当了总理。

1942 年 1 月，克雷奇组成了第二内阁。它带来了两项值得注意的改革。以前一直在保护长官公署担任职务的一个德国日耳曼族人瓦尔特·贝尔奇博士，当上了劳工部长，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职位，控制着保护国内的产业工人，但它所关注的显然是为德国本土提供必要的劳动力。3 月 8 日，他宣布了希特勒的决定，即保护国的经济必须适应德国的战争需要，并且必须为此目的加以利用。其次，捷克最大的吉斯林艾曼努尔·莫拉维茨上校当上了教育部长。莫拉维茨过去是捷克陆军的喉舌，他曾向西方国家呼吁，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要认识到捷克斯洛伐克在应付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的战略价值。但是西方国家没有听他的活。莫拉维茨从慕尼黑协定签订的时候起就急剧地改变了他的政策。在新的形势下，他认为捷克人别无办法，只有把他们的事业同德国的事业打成一片。当然，他的主张被纳粹控制的报刊向国外宣扬了。当他获得控制教育的大权这一赏赐以后，他就拼命去搞当时还保留的小学教育的纳粹化工作，并对那些不象莫拉维茨上校那样的、没有认识到他们在柏林的德国救星的知识分子大肆迫害。在海德里希领导下，把保护国作为大德意志一个——次等的——部分并入的过程加快了——诚然，与此相反的托词实际上全被放弃。这一点在希特勒 1942 年 5 月 7 日的法令里特别清楚，这项法令表面上的意图是要“简化”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的行政工作。从 6 月 15 日它生效之日起，所有地方当局和警察当局都要以德国行政委员会的名义，代表德国管理保护国。德国地方长官的人数这时减少到了七名。

这时候，消极地装傻和等待的帅克传统，已经变成了积极得多的行动，这也多亏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 592 的各种活动。贝奈斯博士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访问后，已于 1939 年 7 月 18 日回到伦敦。当战争在 9 月里爆发时，他向英国、法国和波兰政府坚决表示，捷克斯洛伐克从 1939 年 3 月 15 日起就已经在同德国交战了。10 月 6 日，他去巴黎，因为 3 月 15 日不曾辞职的捷克斯洛伐克前驻法公使，斯洛伐克人奥苏斯基在那里声称，是他在指挥着所有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奥苏斯基对贝奈斯的领导向来是不满的，他们之间于是出现了僵持的局面，后来，前不久才从布拉格来到巴黎的施腊麦克大主教终于说服奥苏斯基同贝奈斯达成了协议。一个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成立起来，并能够组织成一支捷克斯洛伐克武装部队，由法国政府编入了法国陆军。在法国崩溃以后，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就逃往英因，其主力于 1940 年 7 月 14 日在那里登陆。一周以后，英国政

府正式承认那些捷克政治领导人为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7月23日，贝奈斯重新就任总统，并任命施腊麦克为总理，以扬·马萨里克（外交）、斯拉维克（内政）、乌特拉塔（财政）、因格尔（国防）、费埃拉本德和那个不服从上级的奥苏斯基（国务部长）为其内阁同僚。这个临时政府具有一种模糊的中左色彩，它既不包括农民党人，也不包括斯洛伐克牧师派议员和共产党人。这位总统还指派了一个四十人的国务会议——后来增加到五十人——代表着各种颇为不同的观点。10月25日，捷克当局同英国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规定在英国指挥下组织和使用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部队。

到德国对俄国发动进攻一个月后，即到1941年7月18日，英国才正式承认贝奈斯总统为一国的首脑。苏联也在同一天正式予以承认。8月10日，据宣布，遵照7月18日的苏捷协定，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旅正在俄国境内组织起来，以便同在英国建立的或正在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593克武装部队保持平衡。可以肯定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有相当大一部分居民这时正冒着死刑的威胁在收听俄国的无线电广播，特别是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总之，听众人数相当多，足以使捷克公众消息十分灵通。海德里希的行为激起了新的沸腾的义愤；破坏活动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有增加的迹象，尤其是1942年春季在克拉德诺煤矿里。如同欧洲其他地方那样，共产党人的组织相当严密，他们的秘密报刊也相当顺利地发挥着作用。

5月27日早晨，正当海德里希驾车穿过利贝尼（布拉格）郊区到办公室去时，投来的一颗炸弹使他受了致命伤，他在6月4日毙命。这是欧洲抵抗希特勒运动的大事之一。一个显要的纳粹头子，而且是一个受到特别保护的党卫队头子被杀死，这还是第一次。的确，海德里希可以被看作是党卫队的智囊，他的丧生在希特勒看来，是不可弥补的。后来盖世太保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似乎或多或少是真实的，即这次突然袭击是伦敦的捷克人策划的，并由皇家空军空投下的英国境内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的两名伞兵——一个捷克人和一个斯洛伐克人——执行的。他们的任务完成以后，圣哈尔列斯·博罗麦奥教堂的东正教教士便把他们隐藏起来，并供给他们膳食。德国人于6月18日几乎就在那个教堂里搜捕到了他们，把他们同几个掩护者一起就地杀害了。

在保护国内，袭击海德里希的直接结果是一阵更加可怕的恐怖浪潮。当天，卡·赫·弗朗克就重新宣布了紧急状态，达吕格从柏林赶来接替海德里希。在5月28日和7月3日之间，有一千二百八十八名捷克人多少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处死了；那个倒楣的埃利亚斯也是一个牺牲者，他于6月19日被处决。有时，整个家庭的成员没有多大原因就全被枪毙，有两个村庄的全部男子都被非常残忍地消灭干净。6月10日，这种情况发生在克拉德诺附近的一个采矿村利迪策，而十天以后又发生在布拉格另一面赫鲁迪姆附近的一个叫列日阿基的小地方；每一次妇女都被送往集中营去，而儿童则就此无影无踪了。

就在利迪策和列日阿基遭殃的消息传出后不久，英 594 国政府在 1942 年 8 月 5 日终于觉得可以将正式废除慕尼黑协定的通知递交给贝奈斯和扬·马萨里克了。6 月间，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时，正式对贝奈斯说（6 月 9 日），“苏联政府……的立场是维持慕尼黑会议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这自然使捷克人认为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将归还给他们的国家。最后在 10 月 26 日，美国政府正式承认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1943年2月初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对东欧地区来说，无论如何标志着战争的转折点。早在1942年11月，已有大约七万名捷克青年被动员去德国劳动，接着在1943年2月2日，十六岁到六十五岁的所有男子和十七岁到四十五岁的所有妇女，以及十六岁以下的某几类学龄儿童都被征召到德国去从事战时工作。在轴心国统治下的欧洲各地，甚至总动员的叫喊似乎也并未严重地影响到保护国的日耳曼人，而捷克人却又记起他们过去所担心的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完全被赶走的那种情况。随着粮食供应的减少（无论如何，对捷克人来说是减少了），布拉格和捷克其他城市的生活变得空前未有地凄凉。1942年2月16日，在实行了德国通行的那些反对犹太人的措施以后，海德里希宣布把保护国的全体犹太人关进了犹太人区。特雷津（特雷津市）那个古堡市镇变成了一个犹太营，捷克犹太人全被送往那里去，让他们在痛苦的但还不是使人毛骨悚然的环境中等待进一步送往奥斯威辛的那些毒气室去。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有捷克人也有犹太人，为了逃避放逐和死亡，过着非法的、没有配给证的隐匿生活。

1943年8月，据宣布弗里克将接替牛赖特出任德国保护长官，他原来担任的德国内政部长职位已经由希姆莱免去了。弗里克于10月14日开始视事。当时这个官职已被公认只不过是一个挂名差使，卡尔·赫尔曼·弗朗克的权力终于得到了正式承认。8月20日，他被任命为一个德国部长，并兼任主管那个取代前德国保护长官 595 公署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事务部的国务部长。

1943年间，贝奈斯在他从伦敦广播的讲话中采取了攻势。每一次他宣称（稍微早了一些）布拉格当局即将垮台以后，布拉格当局总作出强烈的反应。就可能作出的判断来说，贝奈斯在国内的名望这时候不但已经恢复，而且他已成为全国杰出的象征性首脑了。（扬·马萨里克在战前始终不大出名，这时多亏了他的才气焕发的广播讲话，开始占有第二位，而莫斯科的捷克共产党人则无足轻重——只有南斯拉夫的铁托在年轻的捷克人中是备受爱戴的英雄。）另一方面，贝奈斯的重要性在这一年中也有所增长。因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果意味着德国将被打垮，还意味着英语国家的利益和俄国人的利益已不再一致了，同时俄国人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短暂的休战也告结束了。贝奈斯的政府是最可能有办法使苏联和西方世界之间避免或推迟一场破裂的政府——多亏捷克人保有他们同西方的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亲俄传统。贝奈斯早期同波兰人为战后更紧密的合作所进行的磋商一直是困难的；随着西科尔斯基于1943年7月4日逝世，磋商成为不可能的了。有一时期，捷波和解的设想因为热中于更大的目标而受到了忽视。事实上，这一年中，贝奈斯一直为自己对莫斯科的一次访问进行准备。英国人在10月份举行三国莫斯科会议之前一直反对这次访问。最后，贝奈斯于12月11日抵达了俄国首都。那里的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如哥特瓦尔德等，并不十分友好。他们指责这位总统，因为他在1938年不曾公然反抗西方世界，也不依靠苏联的支持，反而被诱骗而落入了慕尼黑的投降圈套。可是，对于将来，似乎可以设想出一种既是国内的又是国际的权宜之计，尤其是因为贝奈斯认识到，在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对国家经济生活的一大部分实行国有化将是值得想望的。12月12日，一项为期二十年的捷苏 596 同盟条约签订了。该条约规定，在日前的对德战争中以及在将来对同一敌人的任何一次战争中，都要相互援助。签字国双方都保证扩大它们的经济关系，并且不干涉彼此的内政。

1944 年的头几个月里，苏军缓慢地向着喀尔巴阡山推进。因此 3 月 13 日，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号召其人民——特别是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的人民，因为那里的条件较为有利——“从个人的英勇行为过渡到有组织的群众行动。成立战斗队。建立民族委员会。组织武装团体和游击队。……政府将竭尽全力使你们可以有足够的武器进行防御和进攻。”3 月 17 日，贝奈斯宣布这个新共和国将是一个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并不享有特权）。4 月 8 日，俄军会同斯沃博达将军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到达卢西尼亚的边境，即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边境。一个月后，在 5 月 8 日，签订了一项关于解放区的捷—俄协定：作战区的最高权力应归苏军总司令执掌，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一名代表予以协助，他将在肃清敌军的领土上建立并指导行政工作；当任何地区一旦不成为直接的作战区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将完全接管其行政工作。

就在解放大军到达卢西尼亚边境以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立即催促国内人民建立由经过考验的爱国者组成的民族委员会，以鼓舞抗战力量，并接过对于可能获得解放的任何内部地区的责任。但是在 1945 年 5 月以前，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几乎都没有公开的起义；德国机构压制得太紧了，而那些城市，尤其是首都的德意志化工作也太顺利了。夏季过去以后，人们潜越过边境去参加斯洛伐克游击队，或是在卢西尼亚试试运气，进行任何种类的反德战斗。

1944 年 8 月初的斯洛伐克起义当然在保护国内激起了强烈的骚动，直到 1944 年 10 月底才令人痛心逐渐停止了。两天之后，苏军同他们那些捷克斯洛伐克 597 分遣队进入了斯洛伐克，可是除了等待战争结束外，并没有什么事可做。正在 1944 年圣诞节以前，布拉格组成了一个民族委员会，就象民族希望再生时欧洲各重要中心曾经创建过的那种。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于 1945 年 3 月离开伦敦，4 月初暂时迁至斯洛伐克的科希策。但是捷克人直到战争结束时才最终获得解放。5 月 4 日，当布拉格居民开始示威游行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已死了，而邓尼茨也即将无条件投降。5 月 5 日，在民族委员会的普拉日阿克教授和阵特尔瓦什将军的指挥下，捷克爱国人士占领了广播电台，当夜街垒也开始建立起来。德军有坦克和飞机，而党卫队则把总部设在布拉格的切尔宁宫（即过去和现在的外交部）里，意味着将不顾德国 5 月 7 日在弗伦斯堡的投降，要设法坚持下去。虽然德军司令图桑将军于 5 月 8 日下午 4 时停止了抵抗，党卫队的飞机却继续轰炸这个不设防的城市，同时德军的坦克增援部队也从梅耳尼克和其他地方开到了。有好几天，局势看来是危急的；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求援的呼吁，但是什么援助也没有来，只有弗拉索夫的某些部队举行了起义，攻击德军。捷克斯洛伐克的亲西方人士后来为那段间歇时间深感痛惜，因为当时在捷克林山和比尔森的美军尊重西方国家同苏联达成的谅解，暂停推进，一直等到科尼耶夫元帅和他的军队于 5 月 11 日到达布拉格。5 月 14 日，哈哈、克雷奇、盖达和其他一些通敌分子被捷克人逮捕了；莫拉维茨和亨莱因总算能自杀，而卡·赫·弗朗克则向美军投降了。5 月 16 日，从 4 月 3 日就安身在科希策的贝奈斯总统回到了一个饱经战火但却热情洋溢的布拉格。

第二节 斯洛伐克，1939 年 3 月至 1945 年 3 月

虽然在纳粹眼中看来，捷克人属于即使不应消灭，也应遭到瓜分的次等

人那一类人，虽然保护国至少从 1941 年 9 月起受到了相应的对待，斯洛伐克人却被挑选出来，受到元首的偏爱。实际上，纳粹的意图是想用斯洛伐克为他们赐予那些通情达理地顺从希特勒意志的民族的报酬提出一个出色的榜样。根据 1939 年 3 月 23 日的 598 条约，斯洛伐克实际上已完全沦为德国的附庸，但德军却驻扎在该条约为他们提供的各个军事区内，并在五年以上的时间内允许斯洛伐克人在该国其余地区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在 1938 年的第一份维也纳议定书以后，以及在 1939 年 3 月同占领卢西尼亚的马扎尔人有过军事冲突以后，斯洛伐克人的愤慨是针对着匈牙利的。由于这个原因，斯洛伐克人对于受到德国的保护感到相当满意，因为匈牙利毕竟抵抗不了德国。

当时的问题是，斯洛伐克应该由格林卡的继承人蒂索神父按照格林卡从前的政党的那种教士传统进行治理呢，还是应该由马扎尔人图卡和格林卡卫队的领袖萨诺·马赫以彻头彻尾的纳粹方式来统治。在第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存在的时期，格林卡党一直是斯洛伐克独一无二的大党，虽然说得最早，在 1937 年以前，这个党始终没有得到超过百分之四十的斯洛伐克人民的拥护。1937 年，日耳曼族和马扎尔族的宣传才促成了一个变化。德军对波兰人的攻击，一点也没有使斯洛伐克人更同情于纳粹分子，因为斯洛伐克人（不象捷克人）一向对波兰人非常友好。他们被迫对波兰宣战，但是他们的情绪却变得更反图卡了。1939 年 10 月，蒂索当选为斯洛伐克总统，格林卡党重新被肯定为斯洛伐克唯一合法的政治集团。日耳曼和马扎尔少数民族也获准有“党”的组织。卡马辛是斯洛伐克的日耳曼族领袖，也是 1938 年 10 月以后的国务秘书，他享有特殊的威望，他的日耳曼族国务秘书处在斯洛伐克境内不受斯洛伐克政府的管辖而享有自主权（在杂居的地区，斯洛伐克族和日耳曼族当局互相合作）。图卡这时当了总理，马赫是宣传部长，杜尔昌斯基是外交部长兼内政部长，可是这三个人都非常不得人心。新教徒的唯一部长是国防部长恰特洛什将军。社会党人在斯洛伐克的实力始终不强，不过共产党人却有些追随者；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外，斯洛伐克中部还有些新教徒集团和一些反教士人士，新教徒集团一向是亲捷克的，反教士人士以前则投票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党人。另外，还有一定数目的捷克人和一个相当大的斯洛伐克犹太人集团。前者特别受到 1939 年 4 月 24 日法律的打击，因为这个法律便利了产业的没 599 收，而纽伦堡法律在理论上自 1941 年 9 月起便适用于后者。

毫无疑问，有好几年，蒂索都获得全国的支持。“一般的斯洛伐克人”对蒂索的组合国家计划（即遵循几年以前陶尔斐斯在奥地利所推行的那些方针）都不大反对，他们还认为蒂索最有办法维护斯洛伐克的自治。格林卡卫队把所有的斯洛伐克人都征募进去。另一方面，在民族委员会中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讨论，同时斯洛伐克报刊也可以发表比德国本土或保护国的报刊所发表的显然较为尖锐的评论。希特勒时常谴责蒂索，特别是 1940 年 7 月 28 日在萨尔茨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还对内阁成员作了某种调整，使图卡和马赫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他们的目的物。在 7 月这次会晤以后，图卡代替杜尔昌斯基出任外交部长，马赫则接替他担任内政部长。但是希特勒似乎已经看清楚，最可靠的还是通过蒂索去控制斯洛伐克，他也始终没有认真坚持要在布拉迪斯拉发实行全面的暴政。这一次，实际上用的是胡萝卜而不是鞭子。因为希特勒利用了一切机会去提醒斯洛伐克人，他们享有这种据说是主权国家的新地位：例如，1940 年 11 月 24 日，当斯洛伐克领导人应召去参加

三国公约时，这种新地位就曾被强调过，而马赫也宣称，斯洛伐克“第一次作为一个平等的因素出现在国际生活中”。虽然匈牙利也同样参加了三国公约，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随着斯洛伐克人的情绪——却是坚定地针对着它的。因此，斯洛伐克倾向于同匈牙利的其他敌国罗马尼亚和——在 1941 年春季以后——克罗地亚结盟。

在战争的年代，斯洛伐克可以开花结果的是在经济领域里，而当时希特勒的欧洲的所有其他国家——包括德国在内——却正在束紧裤带。斯洛伐克人以前一直抱怨说捷克人对于发展斯洛伐克什么工作也没有做，虽然严格他说来，这种指责是不真实的。但是现在，使斯洛伐克全面增产却合乎德国人的意图，他们直接控制的仅仅是这个国家的军事工业。他们购买了斯洛伐克所能提供的全部木材。德国武装部队照料着把公路和桥梁按着斯洛伐克人空前未有的规模修建起来。采矿业和化学制品部分是用德国资金发展的，而鞋子、毛织品和玻璃制品 600 也扩大了生产。斯洛伐克商人这时到瑞士去出售燃煤和木材，这是他们以前从未有过的。1943 年夏季，他们还领取了巨额的出差津贴。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在国内能吃得更好些，因为尽管从 1941 年秋季实行了配给制，多亏了十分普遍的贪污腐败，要搞到无限的食品以及几乎无限的汽油还是容易的——当然，市里赤贫的人不在此例。反犹太的法律被马虎地加以解释，不过蒂索却定期把一批批犹太人引渡过去，作为平息德国人怒气的贿赂（据说，德国人有时甚至接受金钱），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同德国和保护国的贸易关系是由 1939 年 3 月 23 日的德同一斯洛伐克贸易协定规定的。根据这项协定所附带的秘密议定书，斯洛伐克和前属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现在由德国控制的那部分地区之间将不设关卡，但是斯洛伐克和德奥合并后的德国之间则将有一条正常的边界。不过，蒂索除了同希特勒进行秘密的政治斗争外，还得开展一场商业战，以防止大得不适合其同胞心意的输出物资外流。有那么许多物资要流向德国，以致斯洛伐克发觉自身在柏林有一笔十分庞大的结余，同时它还得保护自己，防止德国商品倾销。因此，早在 1940 年 5 月，它就对输往德国和保护国的木材征收了出口税，并且还禁止从某些地区出口木材，以便把木料保留下来供国内工业使用。对出口的其他种种限制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也实行了。9 月 15 日，对指定给保护国的某些货物的铁道货运费用提高了百分之一百。可是，尽管斯洛伐克作出了所有这些努力，德国却继续在商业上吞食它，1942 年还是占去了其全部贸易额的百分之七十。对斯洛伐克人来说，如同捷克人一样，德国对俄国的进攻使形势改变了，尤其因为斯洛伐克提供了通向东线的那么重要的公路和铁道。现在，不可能再保持那种和平乐园的气氛不受到损害了，虽然德军和党卫队在 1944 年 9 月以前还设法力图不引人注目。作为三国公约和新秩序的一个公认的支持者，斯洛伐克不得不立即派出一支分遣队去同苏联作战，同时还有计划地向德国输送斯洛伐克劳动力。1942 年 3 月，据宣布，劳动服务将按着德国方针予以改组。下一个月，据称有将近半数身强力壮的斯洛伐克人不是在俄国当兵，就是在德国当工人：一年以后，据估计，这两类每一类拥有大约十二万人。驻在乌克兰的斯洛伐克军以松懈懒散、毫无斗志闻名。除了日耳曼族人的部队外，共产主义宣传似乎在其他部队中取得了进展。1943 年 1 月，改编斯洛伐克军队，把日耳曼族人分配到部队中予以加强，终于认为是必要的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甚至在日耳曼族人也缺乏亲德热情的官方抱怨增多了。斯洛伐克人还发觉自己正同有着相当高比例的斯洛伐克

公民的美国在作战，这使他们进一步同他们的领导人疏远了。

转折点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到来了。从那时起，斯洛伐克人的情绪就变得相当肯定地反德了。蒂索和他的朋友也开始盘算在时机许可时抛弃希特勒。蒂索的朋友西多尔在战争时期一直是斯洛伐克驻梵蒂冈的公使，他消息非常灵通，无疑使蒂索很熟悉国外大事的进展。1943年3月8日，斯洛伐克的主教们写了一封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反对极权主义和反犹太主义。6月21日，这封信由梵蒂冈向全世界公布了。1943年4月，斯洛伐克总统被召到萨尔斯堡去，象当时大多数卫星国的领导人那样，受到希特勒的重新鼓励，同时也受到警告，不要想到和平。4月25日，即希特勒和蒂索会晤后两天，贝奈斯博士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次广播中宣称，斯洛伐克政府的秘密使者已经来同他联系过：当然，这个说法在布拉迪斯拉发遭到断然的否认。斯洛伐克的感情大概始终不是热烈地亲捷克的；这时候，虽然每一个斯洛伐克人都特别希望保持斯洛伐克的自治，右派却倾向于霍尔602蒂，而中间派和中间偏左派则想同捷克人重新建立某种联系。实际上，在接下去的十八个月里，贝奈斯在斯洛伐克人中间享有空前未有的名望。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这时是由莫斯科派来的什米德凯和巴齐列克领导着，据说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这个国家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国。尽管有死刑（死刑也象蒂索统治下的大多数其他条例那样，并不实行），人们却越来越多地收听外国电台，尤其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虽然斯洛伐克的泛斯拉夫传统只存在于老一辈人中间，随着俄国军事胜利的消息，特别是1943年7月俄军反攻的消息传来，一股泛斯拉夫感情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斯洛伐克。有好几个月，说斯洛伐克军队里的共产党人正日益得势，已成了街谈巷议；天主教徒和新兴的斯洛伐克工业家们都感到害怕起来。据什米德凯本人说，斯洛伐克地下民族委员会是在1943年9月组成的，但是到圣诞节，共产党成员和其他成员才拟就了一个一致同意的纲领。

1943年12月贝奈斯访问莫斯科时，当然会晤了那里的斯洛伐克共产党人，他这次旅行有助于在往后好几年里使他同捷克共产党人和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关系缓和下来。同时，捷克—斯洛伐克重新联合的事业也有了明显的进展，虽然奥苏斯基还在利用他对伦敦的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影响来反对贝奈斯。不久，斯洛伐克的局势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军于1944年3月19日占领了匈牙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苏军和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一起，在1944年4月8日到达了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东部行省卢西尼亚的边境。以意大利为基地的盟国轰炸机这时威胁着布拉迪斯拉发地区的炼油厂，3月里斯洛伐克首都开始疏散人口了。从这时起，这个政权就动摇起来。上文已经叙述过，流亡政府在3月13日曾经特别对斯洛伐克人和卢西尼亚人发出呼吁，要他们公开起义。越来越多的斯洛伐克青年人这时逃往他们的“马基”，即伸向西贝斯基德斯山和塔特拉山的丘陵地区。正规军也流露出朝同一方向消失的明显倾向，而德国武装部队则遭到越来越多的破坏活动。1944年4月，斯洛伐克当局承认存在着紧急状态：7月27日，民族委员会对起义计划作出了决定。8月初，几乎在华沙起义的同时，公开的战斗开始了。8月12日，蒂索公布了军事管制法，并于8月24日宣布全国总动员。事实上，斯洛伐克603游击队在8月中旬就已采取攻势了。8月26日，马赫在一次广播中承认，斯洛伐克已处在伞兵和地下部队临时强加给它的一种战争状态中。下一天，德军开始占领这个国家——他们宣称，蒂索曾向他们求救。这

样一来，残余的斯洛伐克正规军中有一部分参加了游击队，蒂索在9月2日解除了正规军总司令恰特洛什将军的职务。战斗在9月里一直很激烈，尤其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和西利那的周围。斯洛伐克游击队天天盼望苏军同他们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赶来，但是很可能喀尔巴阡山的中部山峰象过去一样竟然是难以越过的，只有可能绕过这些丛山峻岭，取道罗马尼亚和地势低洼的卢西尼亚和匈牙利，这就必然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当然，人们也猜疑俄国人想独揽解放的任务。同样严重的是，奥苏斯基10月14日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封信中打算使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和游击队脱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虽然那个起义宣言（1944年9月1日）曾声明支持一个“进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0月里，贝奈斯政府有好几个代表飞往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去访问，而在10月13日，一个斯洛伐克代表团也由那里到达伦敦。与此同时，霍尔蒂正打算为匈牙利向俄国投降进行谈判，因此德国人在10月16日免了他的职。十一天以后，俄军在10月27日进入了乌日哥罗德，可是德军这时已由党卫队的好几师精锐部队大大地加强了，他们同时占领了斯洛伐克游击队在兹沃伦和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那些主要阵地。只是到10月29日，苏军才大量越过斯洛伐克边界，虽然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空降旅已在10月6日从俄国来到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领土上。

可是，直到1945年初，俄军才能往纵深推进。1月间，斯洛伐克大部分地方的敌人已经肃清。2月1日，贝奈斯政府的解放区事务部长奈麦茨来到了科希策。2月4日，贝奈斯曾颁布法令，把实际的行政工作指派给每一地区的民族委员会。尽管奥苏斯基反对，这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正式承认了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这一604步在1948年2月的那场革命以前一直给了斯洛伐克人以他们如此重视的自治权。1945年3月中旬，贝奈斯本人也离开了伦敦，取道莫斯科回国。他在莫斯科接纳了呆在苏联的捷克主要避难者，并于布拉迪斯拉发解放前一天的4月3日在科希策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这样，斯洛伐克人实际上比捷克人早五星期左右便获得解放了。

第五章 1941—1944 年的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伊丽莎白·威斯克曼

第一节 三个小国和德国对俄国的进攻，1941 年 6 月至 12 月

关于希特勒进攻俄国的“巴巴罗萨行动”的那些文件表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就象芬兰那样，至少在希特勒的眼里，纯粹是他的计划中的爪牙。可是，对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说来，对俄战争却产生了一种新的困境和一系列民族问题，其中虽然有其共同之处，但还是显出种种带有显著的地方色彩的不同特点。

保加利亚国王博里斯在某些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因为在他的统治下，并没有可以被利用来反对他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希特勒既无法胁迫他，也无法使他倾倒，而在整个 1941 年中，他能既准确又成功地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保加利亚的泛斯拉夫主义和亲俄情绪如此强烈，以致保加利亚同俄国无疑根本不可能公开交战。除了南部多布罗加，他的军队未经真正的战斗就已经在色雷斯西部以及南斯拉夫和希腊的东马其顿占领了大片领土；如果保加利亚本土被迫听任德军进驻的话，保加利亚的军队只须维持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治安，并监视土耳其就行了。随着俄国战争耗尽了德国的人力，保加利亚的这些任务自然也增加起来。与此同时，虽然实际上国王的权势是至高无上的，保加利亚却保留了政治上的自治，甚至保持着议会统治的形式。在议会中，在报刊上，特别是在一份独立保守的报纸《米尔》上，还可以提出一点批评意见。保加利亚犹太人，象塞尔维亚犹太人一样，向来受 605 号法令尊敬，这时虽然被剥夺了财产并被勒令迁出索非亚，但是，一般说来，在 1943 年以前，并没有受到什么骚扰。德国人经常提出要求，应该对犹太人采取措施，但是，每当盖世太保或其保加利亚的代理人扬言要采取严厉的反犹行动时，一批批议员就向国王有效地提出抗议。对付那些反德的保加利亚人的警察行动，按照巴尔干半岛的标准来说，哪怕还有盖世太保的某些干预，是并不厉害的，至于对共产党人，不论是嫌疑分子还是真正的党员，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从 1941 年 2 月德军占领保加利亚的时候起，著名的反德人士都被拘留在冈达一沃达集中营里，一般总要关上好几个月。左翼农民党领袖尼古拉·佩特科夫是在 1941 年 6 月获释的。他的首领格·M·季米特洛夫已逃往伊斯坦布尔，并在战争时期一直同英国人一道在中东工作。3 月 5 日，在德军进入保加利亚之后，英国政府很快就同保加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3 月 10 日，英国公使也撤离了。

虽然经常听到在保加利亚降落的俄国伞兵被“肃清”的消息，但是在战争时期，俄国公使从未中断地一直留在索非亚。更为不寻常的情况是，虽然苏联公使馆遭到保加利亚当局的一种可说是过分的监视，苏联公使却除了同秘密的共产党接触之外，还同其他方面有所接触。他甚至偶尔还公开地去访问一些非共产党人的反德政治家，因为他们就是不愿意通过他的公使馆四周所布置的警戒线，而并不在乎那些跟踪他的密探。1941 年 9 月，莫斯科和索非亚之间出现了一种近似危机的情况。9 月 10 日，莫洛托夫指责保加利亚打算加入德国一方。9 月 14 日，保加利亚人动员起来了，9 月 19 日，他们的政府宣布了戒严令。可是，保加利亚并没有同苏联交战，仅在三个月后的 1941 年 12 月 13 日，有点儿假设意味地对英国和美国宣战了。上文已经提到，英国在 3 月里就同保加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而在保加利亚加入两周前于柏林续订的三国公约之后，菲洛夫首相就宣布保加利亚对美国开战。在后一件事

发生时，一个保加利亚代表第一 606 次排进了反共产国际的队伍里。

罗马尼亚法西斯头子安东尼斯库将军于 1940 年 11 月 22 日在柏林第一次同希特勒会面时就赢得了他的赞许。如果我们信赖安东尼斯库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作证记录的话，那么，他在那一场合曾得到将会进攻俄国的暗示。扬·安东尼斯库不象希特勒那样，他不是个撒谎的人和虐待狂者，但是，虽然他很可能是一个有见识、有能力的军人，他却多少也是个狂热者，因而他能够对付伐斯拉夫人或俄罗斯人具有强烈的热情，正象他后来被苏联俘虏后在谈到“侵略意图”时所承认的那样。在希特勒的同盟者中，只有他得知希特勒的计划，而他看来也是真正把德国的对俄战争看作是罗马尼亚的战争。同时，他始终坚决认为，罗马尼亚对整个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要求在适当的时候必定会实现。希特勒不顾德国和意大利于 1940 年 8 月为了说服罗马尼亚接受维也纳第二议定书中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作出让步而对罗马尼亚所作的保证，只要提出要求的人可以派用处，就同意他对未来所提出的要求，况且他还很钦佩安东尼斯库那种“狂热的民族主义”精神。我们掌握着德国通译人员保罗·施密特的材料，可以证明希特勒似乎对于一个能详述自达西亚时代以来的罗马尼亚历史而驳倒了他的人印象很好，而此人就在 1940 年 11 月 22 日的那次会见中，不顾人家明白地给他提过警告，劝他不要提维也纳第二议定书，却还是一定要向希特勒对此大发牢骚。

1941 年 1 月，安东尼斯库又一次晋见了希特勒，这回是在贝格霍夫。他在那里会见了希特勒的朋友基林格，即未来的德国驻罗马尼亚公使。他还同凯特尔和约德尔交换了意见，并且更详细地讨论了对苏战争。他们向他保证说：布科维纳北部和比萨拉比亚不久就是他的了。这回他们还向他提出，罗马尼亚丧失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后，可以获得德涅斯特河彼岸俄国的领土作为安慰。希特勒于 6 月 2 日在勃伦纳山口同墨索里尼会晤时，闭口不提他那个巴巴罗萨行动，而恰恰在十天以后的 6 月 12 日，他在慕尼黑元首府接见安东尼斯库时，几乎是把所肩的细节都向这个法西斯头子讲了。希特勒提出，罗马尼亚除了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之外，还应该“占领和管理直至第聂伯河为止的其他苏联领土”。“我自然将从第一天起就支持你，”安东尼斯库高兴地喊道，“如果要打斯拉夫人，你永远可以依靠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人民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发现他们已同苏联处于交敌状态时，大概并不象他们那个领袖那么感到高兴，但是宪法规定给他们的公民权利都遭到破坏，他们的报刊也都被搞成清一色了，除了服从就没有什么可于的。1941 年 2 月 15 日，所有的政党都遭到取缔，虽然在这一年中还举行了两次公民投票，但也不过是比德国常常举行的那种公民投票稍微不那么可笑罢了。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罗马尼亚的舆论——这主要是指城镇内各派的政治观点——都支持安东尼斯库的决定，因为人心都热中于反俄和反共。在以前的一些政治领袖中，有许多人仍旧不愿意同德国结盟，但是，打俄国人的机会却好象是不该轻易错过的。还有，罗马尼亚人都已相信他们并不会同英国人打仗，英国人当然是会“了解的”。他们尤其希望抢在匈牙利人的前面，因为匈牙利人起先似乎并未觉得他们也会卷入这场战争。至于农民群众，要去猜测他们会有什么感觉，那是愚蠢的。当时罗马尼亚只有少数的共产党人，而且几乎全都在监狱里，又几乎全都是犹太人。罗马尼亚的反犹太主义极其普遍，这就有助于使这个国家心甘情愿地依附德国。虽然早在 1938 年就已经修改过戈加政府那种极端反犹的法规，但是，犹太人还是备受毫无自由之苦。

此外，罗马尼亚还有两个强大的亲德的“压力集团”，一个是人数很多且在特兰西瓦尼亚还很富裕的日耳曼少数民族，还有一个是霍里亚·西马的那些追随者。虽然西马在1941年1月事件后就已潜逃到德国去了，可是608直到现在，他在国内还不至于热烈的青年追随者。希特勒在安东尼斯库掌权的整个时期把西马窝藏在德国，这是相当突出的，也是很出人意料的做法——尽管元首很喜欢安东尼斯库，他却对于自己可以从政治上去讹诈安东尼斯库感到很高兴。

起初，罗马尼亚人的进攻很顺利。1941年7月5日，落在俄国人手里一年的布科维纳，宣告解放了。到7月底，又克复了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军队已到达了德涅斯特河边。8月间，罗马尼亚人渡过德涅斯特河，从而侵入了俄国的乌克兰，并于10月16日占领了敖德萨。10月18日，安东尼斯库颁布了一道法令，着手建立包括敖德萨在内的罗马尼亚行政区外尼斯特里亚。但是，这时，一个新的、较长、较糟的阶段正在取代最初的阶段了。全国农民党的一些政客，特别是马纽，以及自由党的某些政客，开始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罗马尼亚对德涅斯特河东岸并没有什么要求；马纽还说，倒是应该把罗马尼亚军队派往特兰西瓦尼亚去监视匈牙利的部队，他们现在已经动员起来了，因为匈牙利事实上已于6月27日向俄国宣战了。11月8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祝捷的游行中，有人当着凯特尔的面喊叫“我们要特兰西瓦尼亚！”。

一个月后，使许多罗马尼亚人惊慌的是，英国对他们的国家宣战了（12月6日）。12月12日，安东尼斯库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珍珠港事件后提出的要求，对美国宣战了。12月7日，德国人宣布他们的俄罗斯第一战役已告结束。

匈牙利在1941年的地位和政策，可以从若干方面区别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地位和政策。匈牙利甚至比保加利亚更渴望收复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统治过的所有领土，而主张修订凡尔赛条约者的宣传已经造成了一种渴望获得领土的怀乡症，这也许只有德国才治得了。马扎尔人的统治阶级和罗马尼亚的统治阶级都对俄罗斯人和共产主义怀有深仇大恨。这两种因素迫使匈牙利在一场对苏战争中倒向德国一边。但是，匈牙利的主张修订凡尔赛条约者，甚至在1940年8月以后，其矛头首先还是针对罗马尼亚的，而匈牙利的那些统治者则一直给搞得609得心烦意乱，一方面想抢在罗马尼亚人前面去博得希特勒的好感，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同德国的伙伴罗马尼亚结盟。有些马扎尔人争论说，暂且按兵不动，等到罗马尼亚在对俄战争中弄得筋疲力尽时再说，那样岂不是更好些吗？

匈牙利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重要阶层，特别是象拜特伦和捷列基（其影响近几年来日益不及较为亲德的地主阶级）这些权贵，都痛恨希特勒，把他看作一个暴发户兼革命者，因为他扰乱了他们的农民和工人，并且威胁到他们国家的政治独立；希特勒也打心底里厌恶他们。他在匈牙利的那些代理人和伙伴，即那里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和形形色色的匈牙利纳粹党，事实上已经煽动了广泛的不满意现社会的事件。1939年降灵节的选举已经显示出，布达佩斯一些工厂里有强烈的亲纳粹情绪，而且没有耕地的农民在把他们征召起来派往东线之前，人数上仍然是个非常大的因素，他们现在已给纳粹分子那些标语口号诱惑得心神不安了。政策当然都是由权贵和大地主们，由他们在议

会里和军队里的代表以及他们在好几年前选来当摄政的霍尔蒂海军上将制订的。反犹太主义在匈牙利所起的作用比在保加利亚所起的作用大，只是范围不象罗马尼亚那么广泛。

虽然那些议会领袖在抵制德国的压力方面往往是小心谨慎、优柔寡断的，可是，匈牙利参谋总部却是明确地亲德的。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所提出的证据表明，匈牙利的参谋总长维尔特将军早在1940年8月就一心一意在学习德国人的样子了。其实他和他的同僚在政府决定必须入侵南斯拉夫以前，就已经作出了入侵的部署。摄政肯定在1941年下半年以前就已被各种各样军事压力和获得领土的希望压得透不过气来。当时，他已经七十四岁了，而且也许还应该补充说明，他的政治判断力始终就不是非常敏锐的。况且在这阶段，许多比他聪明的人都认为德国“一定会打赢”。

在最初制订“巴巴罗萨行动”的时候，并没有提到匈牙利。甚至在1941年6月1日的指令中，也只是说到了6月中旬以后，将要求匈牙利允许德国南方军团的一部分部队进驻它的领土，以便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军队之间由德军打进一个楔子。希特勒怀疑意大利人和马扎尔人的流言蜚语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而他一贯想要求匈牙利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又在军事上提供积极的支援，这也决不是不可能的。看来哈尔德将军在1941年3月下旬致维尔特的信中要求马扎尔人合作，不仅是为了对付南斯拉夫，并且也是为了对付苏联。“关于对苏俄的战争，他〔维尔特在答复哈尔德时写道〕原则上是同意的，至少答应动员第八军（克赖希科希采）以及哈尔德所要求的那些机械化部队。”毫无疑问，6月26日正午轰炸拉霍（在卢西尼亚）和卡萨（即科希策）的那些飞机似乎都是涂上俄国标志的德国飞机，它们的行动为匈牙利提供了参战的口实。

1941年4月初捷列基死后，霍尔蒂挑选了当时的外交部长巴尔多希接替他出任总理。巴尔多希以前一直是个职业外交家，这项任命就是要表示一种不介入的态度——虽然他的妻子是日耳曼族人，但是，这个新总理始终就没有被认为是个亲德分子。他为人风趣，也爱虚荣，是一个处境极其困难的意志软弱的人。由于他那种屈从于希特勒的意志的态度，历史必然要谴责他——即使不象那些判他死刑的人那么严厉的话。他愚蠢而明显地对德国人作出了让步，同时还一直欺骗他的同僚和摄政。由于得到莫斯科方面种种友好的保证，巴尔多希在6月23日决定匈牙利将不参战，可是等到德国公使提出抗议时，他又立即同意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6月24日，匈牙利内阁投票反对维尔特将军提出的立即对俄宣战的要求，但是6月26日，巴尔多希又接受了维尔特的要求。这时，摄政有病，巴尔多希去探望他，想便他同意宣战。他在所谓俄国空袭事件上欺骗了摄政，并且蓄意不让他知道来自莫斯科方面的信息。第二天，6月27日，他既没有得到摄政的最后同意——当然也未经摄政签字——也没有同议会磋商，就公布了匈牙利对苏联宣战的文告。德国人并没有在1941年象占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那样占领匈牙利这一事实，使他们有机会可以利用德军入侵马扎尔人这个外加的威胁——他们也有效地利用了这个威胁直至言行一致为止。如果说德国人在1941年6月便向巴尔多希进行过这种恐吓的话，似乎也没有什么证据，但是匈牙利人心里一直明白，的确很有这种可能。

匈牙利人就这样参加了德国的进军，但是他们的统治者心里却一直觉得他们并没有同俄国作战的明确目标。事实上，从1941年秋季起，他们的精力

大都花在设法把他们的军队撤回来。到了那年年底，他们发觉自己就象自己的对头罗马尼亚人一样，同英国和美国都处于交战状态。这一新的困境不仅是由于英国同苏联结盟，而且也由于德国要求同日本加强轴心国的团结而出现的。在珍珠港事件前不到十天，希特勒召集他的伙伴和仆从们到柏林去把反共公约延长了五年。这时里宾特洛甫便激励所有的来宾要为欧洲（加上日本）反俄的事业通力合作。随着俄国人在莫斯科和罗斯托夫的抵抗日益强劲，大吹大擂的德军进展也就逐渐结束了。齐亚诺把这次柏林集会的气氛描绘为“实在不平常”。从1940年11月起，保加利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入伙了。齐亚诺指出，反共这个共同特性并没有使巴尔多希、图卡和米哈伊·安东尼斯库同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进行“一场真诚的相互诋毁的运动”。不管怎么说，当巴尔多希同齐亚诺谈话时，他对德国人也不免要插进几句俏皮话。这次会议附带还为米哈伊·安东尼斯库首次登上国际舞台提供了机会，他当时是罗马尼亚那个法西斯头子手下的副总理。齐亚诺认为他态度有点儿暧昧。后来他就以罗马尼亚的齐亚诺而出了名。

第二节 幻灭：从1942年1月到斯大林格勒战役

1942年的保加利亚历史比较平淡。3月中旬，德国人认为保加利亚对抗反俄战争，必须加以谴责，于是阿纳托利耶通讯社3月14日从柏林散发出一个半官方的声明，提醒保加利亚人说，“除非他们对反俄战争作出更有力的贡献，否则他们不能指望保住他们获得的领土，也不能指望得到另外什么东西。”对此，菲洛夫在3月28日的《时代报》上回答说，即使不是公开作战，“我们实际上已经处于有着种种战争风险的战争状态了。”4月初，他改组了内阁，内务部长加勃罗夫斯基的亲纳粹感情，由于扎恰里耶夫就任商务部长而有所加强。5月间，保加利亚进行了比平时略多的政治逮捕。可是，1942年这一年却颇为夸张地被称为祖国阵线的诞生年。祖国阵线这个名称是一个有点儿不固定的概念，它很简单地是以反德的保加利亚领袖诸如左翼农民党的尼古拉·佩特科夫、共产党人西里耳·德拉马利埃夫和兹维诺分子基蒙·格奥尔基耶夫之间加强联系为依据的。到1942年6月，社会民主党人格里戈尔·切什美季耶夫也同他们三人联合起来。7月17日，以这四个党派为基础的保加利亚祖国阵线从苏联控制的赫里斯托-博特夫无线电台广播了它的纲领。兹维诺分子得到陆军的支持，佩特科夫则有农民的支持，可是直到1943年，祖国阵线的活动似乎只不过是在这四个党派的领袖和他们的朋友之间举行一些秘密会议罢了。没有参加祖国阵线的其他反对团体有：穆沙诺夫领导的民主党和吉切夫领导的右翼农民党。每当公众对政府政策提出抗议的时候，另外这两个党也同样很活跃，而且由于人们不大怀疑他们，他们也就具有更大的影响。但是，多亏老资格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在战争期间一直逗留在俄国，苏联的宣传才树立起了祖国阵线这个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当哈塞尔于1942年4月以半官方的身分访问索非亚时，他认为保加利亚国王的地位非常巩固，不过他又补充说，“事情正在暗中酝酿着”。对于匈牙利来说，1942年是多事之秋。首先是里宾特洛甫进行了一次不祥的访问，他要求匈牙利全国总动员以对抗俄国。这个要求遭到了霍尔蒂的抵制。正如他不久之后得以对齐亚诺说的那样，抵制虽然是出于经济的理由，但主要还是因为有来自罗马尼亚的威胁。1942年1月20日，凯特尔来到了布达佩斯。在1941年下半年，部长们说服了摄政，以一个不那么亲德的、叫索姆鲍泰伊的将军去接替维尔特为参谋总长。凯特尔这时逼迫他作

出了这样的诺言，即一定将亚尼将军指挥的匈牙利第二集团军（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匈牙利武装部队）派往东线。

当时，匈牙利摄政的继承问题成了布达佩斯和柏林之间种种关系的关键问题。摄政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据说他一度怀有建立准王朝的野心。显然，一旦他死了，形形色色的匈牙利纳粹分子都将力图获得最高权力的控制权，并且一定会获得柏林的强有力的支持。霍尔蒂本人希望能作出这样二个安排，保证他的长子伊斯万可以成为继承者。伊斯万虽然默默无闻，却肯定不愿意充当德国的工具。由于这个家族这时已经获得了威望，又由于它已被看成马扎尔民族自治的象征，舆论都有利于伊斯万·霍尔蒂。甚至那批正统王权的拥护者这时候也支持由他来继承。最令人惊讶的是，希特勒在匈牙利的朋友现在竟提名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亲王作为他们的候选人，因为这位前大公阿尔布雷希特宁可要希特勒而不要霍尔蒂。可是，2月18日，匈牙利的两院都选举摄政的长子为匈牙利的副摄政，这个衔头就含有他将是下一任摄政的意思。

这种含意对匈牙利的纳粹阶层以外的某些人来说：也是不欢迎的。霍尔蒂知道巴尔多希不欢迎这样的安排。

总之，虽然摄政到了战后才知巴尔多希在1941年6月把他欺骗到什么地步，他当时对巴尔多希就已经很失望了。3月10日，他任命国家水利局长卡洛伊接替巴尔多希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虽然卡洛伊直到那时在政治上并没有起过什么作用，他在社会上却是一个知名人士，是摄政的朋友，也是拜特伦的朋友。卡洛伊是一个嘲弄人的能手，没有人在提起他时不会低声轻笑的。任命卡洛伊而不任命（为纳粹分子憎恨的）拜特伦来使匈牙利摆脱德国的束缚，这是很巧妙的一着，因为卡洛伊始终没有公开攻击过德国人，可是同时他却能把那些非讲不可的关于匈德团结的陈词滥调讲得使他的同胞一听就明白，他是要愚弄德国人。德国人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他，他们逐渐弄清楚，他肯定已经抑制住德国人在匈牙利国内的614影响了。

齐亚诺于1942年1月在布达佩斯时，觉得这个城市似乎一点也没有战争气氛而感受颇深。这里没有灯火管制，交通完全正常，吃的面包跟战前一样白（至少在他经常赴宴的餐桌上是这样）。他在写给墨索里尼的汇报中又补充说，这里也没有战时的紧张迹象，因为匈牙利在致力于战争方面一直是微不足道的——他说，“甚至派到俄国去的那一支小部队，冬天也舒舒服服地驻扎在第三道防线上的一些村庄里。”可是，到了那年年底，牛奶、肉类、食糖和面包全都不足了——在这个种植小麦的国家里面包配给量每天只有一百六十克——因为德国一再要求匈牙利提供小麦。在匈牙利的德国人仍然很少露面，不过在某些铁路中心，象索尔诺克，有些营房里似乎挤满了德国兵。至于匈牙利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德国政府虽然要他们参加德国陆军或党卫队，但是应征的热情并不高。匈牙利的犹太人多少受到了霍尔蒂和卡洛伊的保护，其中有许多人失业了，但是他们如果运气好的话，就留在商行里做那些非犹太人的继承者的顾问。如果运气不好，他们就被送往设在俄国前线的惩罚性“劳动营”去，他们在那里随时都会面临极大的危险，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回来。当然也有另外一些情况，显著的例子有没在布达佩斯郊外切佩尔的那家大兵工厂的厂主蒙弗赖德·韦伊斯和一家大制糖厂的厂主奥拜尔特·希尔什，他们就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与此同时，匈牙利的议会继续进行工作；事实上，在这一年中，人们甚至可以说，议会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倒是重新活跃起来了。反德分子，即小自耕农的政党和自由党的党员似乎变得比较容易得到发言的机会。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也多少能够喘口气了，尽管希特勒必然曾经要求镇压他们。报刊仍然小心谨慎，但有几份报纸，尤其是无党派的《匈牙利民族报》，有时也发表一点温和的 615 批评文章，而且完全避免显出敌视英美的态度来。

匈牙利在 1938 年 11 月到 1941 年 7 月这段期间重新并吞了斯洛伐克南部一片狭长的地带、卢西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北部，以及以前属于南斯拉夫的巴奇卡、普雷克穆尔耶和梅久穆尔耶，这使马扎尔族统治者们的任务复杂起来了。他们指派了一些代表这些地区的议员进入议会，但是这几乎不能防止人们发生这样的怀疑，认为派往俄国前线去的斯洛伐克、卢西尼亚或罗马尼亚后裔的新兵所占的比例过分。日耳曼少数民族享有的种种特权更使类似的怨言层出不穷，而一再发生的边境事件也使那些重新被并入匈牙利的非马扎尔人怨气冲天。斯洛伐克政府不断表示愤慨。帕韦刊奇在 1941 年 12 月向齐亚诺大发牢骚，与其说是为梅久穆尔耶而发的，倒不如说是对匈牙利大主教谢雷迪红衣主教而发的，因为他在最近的一次发言中表示希望收复圣斯蒂芬的全部土地。这样，匈牙利人便发觉他们自己同轴心国恢复小协约国的倡议不协调了。1942 年 5 月，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公开宣布了他们的反匈友谊。在 1942 年中，匈牙利同罗马尼亚的关系尤其变得比以前更富有爆炸性了。

1941 年，罗马尼亚迅速向俄国推进，使罗马尼亚士兵伤亡惨重。这就激起了罗马尼亚的怒火并对匈牙利感到非常担忧，因为匈牙利起初在军事努力上是微不足道的。1942 年 2 月，安东尼斯库元帅在东普鲁士最高统帅部晋见了希特勒，表达了罗马尼亚的情绪，他再次得到了元首的鼓励。1942 年 3 月 19 日，米哈伊·安东尼斯库在布达佩斯法学院所作的一次演说中，为居住在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同胞的苦难提出了抗议。这是一种为了突出他个人又为了突出这个题目的一箭双雕的做法。米哈伊·安东尼斯库年纪相当轻，他同扬·安东尼斯库并无亲属关系，不过在战前曾为这个法西斯头子和 616 他的妻子提供过有价值的法律上的帮助。这时，他已被树立为国内的第二号人物了。过去，他曾引导这个元帅离开铁卫军，在 1942 年，虽然他还是把赌注押在德国上，但是，正是他把马纽的口信转达给扬·安东尼斯库。因此，当米哈伊·安东尼斯库以副总理的身分公开提到同匈牙利的紧张关系时，人们大为激动。5 月 10 日罗马尼亚独立日那天，元帅亲自宣告，“不论友敌都同样必须懂得，罗马尼亚人不收复祖祖辈辈居住的全部土地是决不会罢休的。”正如匈牙利发言人有时指出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马纽同安东尼斯库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马纽几乎按月写给这个法西斯头子的那些抗议信〔往往也由自由党领袖迪努（孔斯塔廷）·布拉蒂亚努会同签署〕，只是为了罗马尼亚在俄国遭受的“长期不断流血”的苦难而攻击安东尼斯库的。值得注意的是，马纽似乎始终找不到机会可以在罗马尼亚犹太人的命运问题上指责这个法西斯头子。随着安东尼斯库同铁卫军的关系日益恶化，他的反犹太主义也变得不那么厉害了。可是，在战争初期，他似乎很想学希特勒的样，而且除了官方采取的行动外，还发生了许多可能是他控制不了的暴行。到了 1942 年底，那种极其残酷地加在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犹太人身上的押

送出境和屠杀，实际上似乎全停止了。在大战期间，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大概从八十万上下减少到三十万左右。匈牙利在对待犹太人方面拒绝仿效罗马尼亚的榜样，这使希特勒更感到不满。

到了1942年夏季，情况已经很清楚，卡洛伊再也不能推迟晋见希特勒的时间了，因为安东尼斯库在那一年已经两次晋见过希特勒。柏林方面担心，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之间的紧张关系很可能会为敌方所利用。事实上，已经有谣言传说德国人自己正在考虑占领特兰西瓦尼亚了。卡洛伊于6月5日到达德军最高统帅部。尽管希特勒厌恶匈牙利这个大老爷，他一定象他曾对安东尼斯库提过相反的说法那样向卡洛伊暗示过，等俄国人被解决了以后，匈牙利人立即“可以放手去揍”罗马尼亚人。这样的谣言就象上次里宾特洛甫访问后那样，立即传遍了布达佩斯，而且不久就传到了布加勒斯特和罗马。据说齐亚诺甚至还为匈牙利未来的胜利向匈牙利驻罗马的公使祝贺过。因此，希特勒同卡洛伊的会晤只有使情况变得更糟。7月24日，德国驻赫尔辛基的公使布吕歇尔向柏林汇报说，芬兰政府获得消息，认为匈牙利正准备进攻罗马尼亚，同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也在准备进攻匈牙利。7月20日，里宾特洛甫就希特勒在6月间同卡洛伊的会谈所引起的种种谣言向德国驻布达佩斯的公使（雅戈夫）发去了一份冗长、混乱而又不能令人信服的驳斥书并在7月24日命令马肯森在罗马澄清这个问题。

自从春季以后，匈牙利已经逐步加强了它在俄国的军队。5月间，副摄政参加了索尔诺克战斗机中队，并于7月初飞往前线。8月20日圣斯蒂芬纪念日，他的飞机坠毁，他也死了，有意思的是，在布达佩斯的一些咖啡馆里，大部分人部说这是德国人故意送了小霍尔蒂的命的。现在又得再来解决继承的问题了。据说摄政主张提名他那个一岁的孙子为他的继承人，但是连卡洛伊也不欢迎这个主意。8月27日举行了小霍尔蒂的葬礼，而葬礼的前一天齐亚诺到达布达佩斯时，坎姚曾向齐亚诺建议，意大利国王应该兼任匈牙利国王。这个建议几乎就象当时在匈牙利日益盛行的、要让哈布斯堡王朝的奥托大公本人复辟的想法一样，准会使得希特勒暴跳如雷。甚至某些具有强烈的反哈布斯堡传统的马扎尔人新教徒也开始认为，正统王权拥护者们的目标是一种可能会导致中欧重新联合起来、不必屈从于希特勒或斯大林的做法。

7月15日，奉派代表巴奇卡塞尔维亚人的下议员米兰·波波维奇在匈牙利议会中提出了1月间在诺维萨德618（乌伊代克）和扎巴利发生的大屠杀事件。那时，南斯拉夫的游击队活动正开始为人们所意识到。匈牙利占领军主要是由一些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军官指挥的，结果一些小冲突造成了简直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至少有三千名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被打死了。这个消息泄漏出来后，一方面造成了马扎尔人及其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匈牙利社会中比较接近纳粹和比较开明的两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卡洛伊在7月15日以一贯的外交手腕回答了波波维奇，承认的事情很少，然而又不算太少，他说已经开始对那些负责的军官提起公诉了。这个事件立即产生的一个即使是间接的后果是，巴尔塔将军在匈牙利陆军部里的职位由反德的维尔莫斯·纳吉取代了。1942年8月，就是小霍尔蒂毙命的那个月，匈牙利陆军在东线遭到了重大的损失。11月19日，即俄军在朱可夫指挥下发动进攻的那一天，白耕农党的一个成员鲍伊奇-日林斯基（他成为一个日益有名望的人），在下院作了一次激烈的演说，攻击德国人向罗马尼亚提供军事装备，而匈牙利的工厂则正在为德国武装部队提供军需品。他说，“时

间已经到来，匈牙利除了保卫自己的土地之外，不可能有别的政策了。”1943年1月中旬，匈牙利陆军在沃罗涅日遭到一次重大的灾难。从这时起，匈牙利的统治者即以德国人所允许的速度尽快地把它军队撤离东线。

形势的特点是，1942年11月，大约就在日林斯基提出抗议的时候，马纽又写信给安东尼斯库，反对再派遣一支强大的罗马尼亚部队去增援德军。希特勒不止一次向安东尼斯库提出，他必须肃清国内的所有政敌，但是这个法西斯头子觉得已经把马纽和其他一些人置于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不愿意以更严厉的手段去对付他们。1942年12月，希特勒在讲话里含意恶毒地加上一句，鼓励铁卫军东山再起。他听任霍里亚·西马从德国逃跑，但是，作为对罗马尼亚这个法西斯头子发来的那份措词强烈的电报的答复，西马在到达罗马尼亚之前便被截住了。正当盟军在北非从西面和东面向前推进，而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围的时候，两个安东尼斯库于1943年1月10日来到了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这时正是匈牙利军队在沃罗涅日大吃败仗的前一星期，而意大利军队和罗马尼亚军队也在垮下来。希特勒所有的盟友都沉痛地抱怨说，都是由于德国人的缘故，他们在11月间以劣等装备面临着朱可夫的攻势，希特勒则自然指责其他国家军队的“溃逃”。德军在撤退时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武器和给养，表现得比平常更为残暴。将近1942年底，匈牙利或罗马尼亚的普通士兵对他们那些纳粹盟友的冷酷无情已感到非常气恼了。大约与此同时，俄国对布加勒斯特和普洛耶什蒂的空袭并没有造成决定性的破坏，但是却在罗马尼亚老百姓中引起了对和平的渴望。这种形势加强了当时英国对东南欧广括的日益增长的作用。

第三节 溃败：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到投降（1943—1945年）

到了1942年底，匈牙利的政治局势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自从对苏战争爆发以来，耕者无地或几乎无地的这个带有威胁性的农民问题变得愈来愈尖锐了。在战时，东欧的农民都靠他们自己作为粮食来源的潜在价值来赚到钱，而各国政府大都急于作出满足他们渴望土地的要求的诺言。重新合并了原来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约有二十年并享有较大的土地平等的这些领土，促进了改革的推动力。到了1942年初，有一个叫做伊姆赖·科沃奇的农民领袖正在通过他的报纸《自由言论》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自耕农党的书记费伦茨·纳吉担任了1941年9月成立的一个自称为农民同盟的主席。这个同盟和纳吉本人在1942年6月20日的《佩斯特·劳埃德报》上受到了赞扬。可是，并没有采取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只是经常没收一些犹太人拥有的土地以讨好农民。德国人则致力于阻止必然会干扰生产的种种改革。

那些反德的政治集团，自耕农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少数自由党人和无党派人士，都利用这个农民问题作为他们在反对纳粹世界观的战斗中的一部分护身物。到了1942年圣诞节，一个粗具规模的反纳粹人民阵线已经形成，并以《匈牙利民族报》和社会党的《人民之声》为其喉舌。这个阵线在某种程度上是受鲍伊奇一日林斯基领导的。它也获得伊那什和P·韦赖什这些作家的支持。这些作家都是属于一个原来是秘密的小规模的亲农民运动，它比自耕农党更为左倾，并且在战争爆发前刚以全国农民党的名义暂时出现。在提倡土地改革的同时，反纳粹联盟还鼓吹对非马扎尔族的少数民族采取一种开明政策。事实上，1943年1月22日对一些应为一年前的诺维萨德大屠杀负责的人进行严守秘密的宣判时，可以说是反对派取得了一场胜利。

在 1943 年春季，尽管彼此有些猜疑，社会党和农民党的领袖互相靠拢了。大约就在这时，德国公使雅戈夫生气地谈到需要由伊姆赖来替换卡洛伊。4 月 30 日，两个亲纳粹的政客亚罗斯和劳伊尼什为了所谓人民阵线的活动对政府进行攻击。劳伊尼什不仅斥责犹太人，还把矛头明显地对准了霍尔蒂的朋友和顾问拜特伦伯爵，因为后者现在已以同情人民阵线而闻名了。到辩论结束时，下院几乎空无一人，政府仅以四十七票（包括社会党人的投票在内）对三十八票获胜。卡洛伊在所有这些辩论中的王牌是，他总能威胁这个国家的那些“搞颠覆阴谋的政客”，蹙眉蹙额地对左翼表示不满以抚慰德国人和他们的朋友。可是，那些左翼人士也越来越明确地知道，他发出来的这种指责实际上是针对那些搞颠覆阴谋的右翼人士的。

1943 年 1 月底，索姆鲍泰伊将军向德国参谋总部坚持说，匈牙利军队希望能自己保卫喀尔巴阡山区。将近 4 月底时，匈牙利政府总算能够把亚尼将军和他的残部从东线撤回来了。从这时起，卡洛伊的行动与其说是象一个交战国的总理，不如说是象一个中立国的总理。同时，匈牙利的纳粹分子正准备在议会里攻击那个犹太人的保护者内务部长凯赖斯泰斯-菲谢尔。5 月初，为了消除所有这些麻烦，卡洛伊在议会的一次例会上突然中途宣告休会。甚至后来成为新法西斯分子的意大利公使安富索也向罗马汇报说，伊姆雷季在匈牙利国内没 621 有获得多少支持。从 1943 年初开始，而且肯定直到俄国军队占领时为止，许多士兵、劳动者和产业工人都同情苏联了。这时公认的反对派的观点都表达在由自耕农党所写的、并于 1943 年 7 月 31 日送交卡洛伊的一份冗长的备忘录里；这份备忘录及时地受到了公众的注意。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对轴心国联盟的幻想破灭，即使不那么重要，在 1943 年上半年却同样是显著的。马纽继续不断地写信给安东尼斯库。他那种做法与其说是一种炮轰，不如说是一种古代的攻城槌。2 月间，保加利亚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暗杀事件，包括暗杀了亲德分子卢科夫将军（2 月 13 日），这种暗杀表示地下反对派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大约就在这时，保加利亚政府觉得不得不在犹太人问题上对德国的压力作出让步。可是，被牺牲的倒不是那些被遣送出索非亚的犹太人，而是为了配合盖世太保的灭绝政策被押送出境、后来又在“被解放了的”马其顿和色雷斯被发现的犹太人。随着盟军进攻欧洲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保加利亚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了。虽然一般都认为，保加利亚军队不会抵抗俄国军队，但是对于它是否也不会同英国人和美国人作战，那就不很清楚了。

虽然斯大林格勒的结局尚未确定，1943 年 1 月 10 日的德罗会谈却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个阶段中，所有希特勒的伙伴都力图使自己免于覆灭。米哈伊·安东尼斯库回到布加勒斯特后，对驻罗马尼亚的意大利公使说，元帅和他对德国的气氛印象很不好。看来希特勒被对俄战争缠住了，里宾特洛甫则怒气冲冲地说，对俄国只能用实力来对抗——不可能用政治解决办法，而说到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步兵最近给俄军一打就垮时，他真是坦率得粗鲁。最后，广播出来的一项德国公报声称，德国同小国的联盟是以“在赢得胜利以后按照各自的功绩分别对待”的原则为基础的。

经过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这对罗马尼亚和德国都是一场大灾难），所有希特勒的伙伴都对轴心国的胜利绝望了。随同保卢斯投降的消息而来的是齐亚诺的垮台。622 墨索里尼本人接管了外交部，并以巴斯蒂亚尼尼为次长。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巴斯蒂亚尼尼、卡洛伊、米哈伊·安东尼斯库，以

及其他一些人，都拼命想通过一种妥协的和平办法，包括某种保证小国权利的欧洲宪章以摆脱战争。1943年4月初，卡洛伊经过长期推迟，终于访问了墨索里尼，请求他对轴心国的目标略予澄清。

这时希特勒已经为害怕盟军入侵巴尔干各国而心烦意乱了，他决定把4月这一个月完全用来镇压那些保卫巴尔干各条路线的仆从中初出现的叛乱。他离开了东普鲁士，把他那些仆从一个一个召到靠近萨尔斯堡的克莱斯海姆堡去纠正错误。4月2日，他接见了保加利亚的博里斯。4月7—10日，他接见了墨索里尼和巴斯蒂亚尼尼；这两个意大利人则敦促他要不失时机地同俄国媾和。

4月12日，安东尼斯库元帅到了克莱斯海姆。他所要求的恰恰是相反的东西，那就是同西方媾和，全力对付苏联。这一回，元首和元帅的会晤是彻头彻尾不融洽的。希特勒已经掌握了相当详尽的情报，知道安卡拉、里斯本、马德里和伯尔尼各处的和平活动，因此狠狠地斥责了这个来访者，因为米哈伊·安东尼斯库甚至还企图由各个小国和中立国家搞出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联合声明来。元帅对于他那个部长的阴谋诡计一点也不知情，觉得自己处境十分尴尬。希特勒还指责罗马尼亚宫廷是反德的，并且，象他以前所做的那样，在提到马纽时奚落安东尼斯库说，“我把我的政敌都干掉了”，对此，这个罗马尼亚人似乎仅仅回答说，“我可没有这样干。”

四天以后，霍尔蒂到了克莱斯海姆，并在4月16日和17日受到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接见。他们先就德国在各方面都组织得极好的情况开导了一番，接着就长篇大论地叱责匈牙利，提到消灭一切犹太人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一直遭到霍尔蒂抵制的一项要求），随后又象过去指责安东尼斯库那样指责摄政，说他千方百计想逃出这条沉舟。作为对证，他还看到一些破译的电报，不过这一回看到的只是卡洛伊曾同意上土耳其的一些建议，赞同623在将来成立一个反苏的巴尔干联盟。摄政一如罗马尼亚那个法西斯头子那样，多少有点不知所措，不过他为卡洛伊的全部活动承担了责任——他忠诚地声明，是他本人选定卡洛伊的，并且对他绝对信任。根据施密特的记录，这两个德国人并没有硬要以伊姆雷季去替代卡洛伊。在这个月月底以前，蒂索、帕韦利奇和赖伐尔（还有巴斯蒂亚尼尼，他是第二次了）都曾被召到克莱斯海姆去。

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对他们每一个人都一再蛮横和强硬他说，没有什么政治出路，除了同世界上其他国家顽强地战斗下去外，别无他法。他们说，采取其他一切尝试都会被说成是懦弱，因此从军事——唯一可以接受的——观点看来，应该说是有害的。

这些来客全都没有被说服，不过政治上显得很灵活的米哈伊·安东尼斯库似乎在以后的一个月左右最为敏捷。象卡洛伊，也象墨索里尼的那些部长和将军们那样，他力促意大利那个领袖支持和平活动。他向博瓦·斯科普帕说，这时由墨索里尼出面搞一个战时慕尼黑，也许会再次使他本人永垂不朽。墨索里尼非但没有恢复他在1938年所取得的荣耀，反而正在顺着他的懦弱的下坡路滑向灭亡。经过几个月催逼，墨索里尼发出邀请，米哈伊·安东尼斯库终于能够在7月1日到罗加-德尔莱-卡米纳泰去拜访这个领袖。但是这次访问毫无结果。九天以后，盟军不是在巴尔干半岛而是在西西里登陆了。

墨索里尼于1943年7月底垮台，意大利于9月8日签订了停战协定，这对匈牙利和巴尔干各国来说，也许就象德国在斯大林格勒的溃败一样是关系

重大的。几个小国自然尽可能地挑拨意大利反对德国以坐收渔翁之利，而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则曾鼓励它们这样做。

保加利亚受到意大利国内变动的影晌最小，这就使它可以在表面上加强它对马其顿的控制。但是到意大利停战协定签订时，保加利亚的局势却由于另一个原因而变得严重起来。8月25日，博里斯再次到了希特勒的统帅部，三天以后他就莫名其妙地在索非亚死了。只有德国医生可以去验尸。一般都认为，甚至他那个亲德的胞弟西里耳也认为，博里斯的死亡是希特勒在一次吵吵624闹闹的会晤后给他安排下的。博里斯由他那个六岁半的儿子西美昂接位，同时由西里耳亲王、菲洛夫和前陆军部长米乔夫组成了一个摄政会议。真正的统治者是菲洛夫。鲍日洛夫组成了一个新内阁，既没有加勒罗夫斯基，也没有亲纳粹的黎科夫教授。然而，政府在公务上却越来越屈从于柏林，西里耳亲王在10月和11月两次晋见希特勒，接受他的命令。

博里斯从政治舞台上的消失，加强了秘密的反对派的活动。1943年9月30日，在索非亚遭到了盟军一次大空袭以后，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立即决定要发表新闻公报。那年秋季，它的成员经常对两种观点进行辩论：一种是佩特科夫的观点，即一定要等到正规部队准备就绪，可以发动进攻时再动，另一种是共产党人的观点，他们想以游击队来加速军事行动。当时在西部靠近南斯拉夫旧疆界一带的保加利亚游击队在1943年底以前人数大概还是无足轻重的。

意大利所发生的种种事态更为直接地影响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马纽在1943年8月初匆匆赶到布加勒斯特去同他那些朋友磋商。他们当时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巴多里奥会媾和，罗马尼亚将可以抛弃自己的独裁者，从战争中逃脱出去。米哈伊国王和他的母亲，长期以来就觉得自己象是被这个法西斯头子监禁起来似的，因此这个宫廷如同希特勒知道的那样，渴望效法萨伏依王室最近的榜样。7月里，安东尼斯库元帅因为希特勒（通过克洛迪乌斯）提出一个专横的要求而很恼火。希特勒要罗马尼亚政府立即馈赠大约一百八十亿列伊的款子，作为在摩尔达维亚构筑德军飞机场，进一步开发普洛耶什蒂等等的投资。据米哈伊·安东尼斯库说，希特勒这个要求的背后含有一种动摇这个法西斯头子的地位的威胁。经过氏时期的讨论后，罗马尼亚人同意为这些项目拨出八十七亿列伊。因此，墨索里尼被迫下台的消息正是在这个元帅为希特勒所激怒的时候传来的。接着又在布加勒斯特出现了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但是安东尼斯库寸步不让，并警告他的那些批评者说（克洛迪乌斯最近已经提醒过他），希特勒一直在准备建立一个铁卫军的政权。

在意大利宣布停战后四天，传来德国人救出了墨索里尼的消息。这种急转直下的形势真是十分严重的。9月62518日，墨索里尼以新成立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领袖的身分发表了广播演说。希特勒硬要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实际上硬要所有参加三国公约的国家都承认这个新成立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安东尼斯库的默然顺从促使马纽于1943年9月30日又写了一封信给他。在这封信里，马纽首先把墨索里尼斥责为罗马尼亚的死对头，接着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即由于在9月8日以前连德国和日本都承认意大利王国政府是合法的政府，现在它既然媾和了，这就等于取消了三国公约。“承认墨索里尼政权只不过是要制造一个假象，借以掩盖三国公约的每况愈下。”这时，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已经组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爱国同盟”，参加的有“农

民阵线”的领袖佩特鲁·格罗扎博士。当时，马纽拒绝了这个组织提出的一些建议。

匈牙利人也利用了这个题目来作文章，只是在细节上稍微有所不同。从1927年起，意大利就支持匈牙利修订凡尔赛条约的主张，而在贝尔维德莱第二议定书以后，匈牙利参加三国公约时，简直就象是意大利的保护国了。现在，这个公约既已失效，除了匈牙利的纳粹报刊外，所有的报刊全都开始暗示，匈牙利已经自由了。不应忘记的是，俄国人自从7月中旬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夺回了许多土地。9月25日，他们克复了斯摩棱斯克，不久又回到了长达四百英里的第聂伯河畔。1943年9月，布达佩斯开始组织疏散人口的工作，这一方面是因为俄军在推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意大利南部的空军基地这时都落在盟军的手里了。盟军未能充分利用墨索里尼的垮台所提供给他们有利条件，从而延迟了实现和平的希望，而且这么一来，使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再一次屈从于希特勒的意志——至少在表面上，情况是如此。

1943年12月，贝奈斯访问了莫斯科，这对多瑙河流域国家具有明显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个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明确地提出了特兰西瓦尼亚这一问题。1940年，俄国对特兰西瓦尼亚的政策是很动摇的，而且有点机会主义。可是现在，当贝奈斯强调捷克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团结一致以应付匈牙利时，莫洛托夫却坚持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必须留在苏联版图之内，但是这两个俄国人却都在原则上作出保证，将特兰西瓦尼亚归还给罗马尼亚。

贝奈斯通过国在瑞士的加芬库把他在莫斯科会谈的情况告诉了马纽；他还捎口信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期待着罗马尼亚国内出现更为切实的反德行动。马纽象佩特科夫一样，对于搞秘密抵抗和游击战信心不大，他指望一旦时机成熟就及时发动政变。他继续向安东尼斯库发出排炮般的信件，在1943年圣诞节抱怨这个法西斯头子的政策正在使苏联对罗马尼亚进行敌对性的占领成为不可避免。安东尼斯库在答复马纽时，向他指出，如果马纽竟能为罗马尼亚取得较好的投降条件，他这个法西斯头子是十分愿意让位给这个全国农民党领袖的。马纽对此回答说，如果要这么做，就必须让他直接同盟国接触。安东尼斯库最后同意他应该这样做。马纽和迪努·布拉蒂亚努同米哈伊国王取得一致意见后，挑选了巴布·斯蒂尔贝伊亲王作为他们派往盟国的使者，他于1944年3月1日及时抵达了伊斯坦布尔，打算转道前往伦敦，可是英国人却要他去开罗。他于3月15日抵达了那里。

3月18日，俄军到达德涅斯特河。3月19日，德国人占领了匈牙利。因此，与盟国达成协议就变成一项更为迫切、也是更为微妙的任务了。斯蒂尔贝伊坚持要俄国人保证罗马尼亚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俄国人在4月初回答他时又把他们已经向贝奈斯说过的关于比萨拉比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话重复了一遍，他们要求罗马尼亚同德国人断绝关系，以便同俄国人携起手来，而不是由俄国来全面占领罗马尼亚。

第二个罗马尼亚使节名叫维肖亚努，他于5月26日到达开罗，带去了马纽的一个信息，即有一个爱国（或全国民主）集团，其中既有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又有自由党人和农民党人。这个集团将成为改变现状的一个开端。马纽把这一点看作是一种大让步，因为他不相信那些马克思主义政党背后有什么支持力量；它们的代表抱怨说，他在红军渡过德涅斯特河以前，一直故意怠慢他们。

6月10日，马纽在某种压力下接受了盟国的建议。6月20日，他提出了推翻安东尼斯库和转向的计划，并且还要求盟国同时给予军事支援以打垮驻在罗马尼亚的德军。

俄国人在4月里提出的那些条件，既曾向安东尼斯库提出过，也曾向马纽提出过。苏联当局并不很想牺牲安东尼斯库以帮助马纽掌权。马纽是个出名的顽固分子，在比萨拉比亚问题上，他同安东尼斯库或俄国人自己一样固执，这个问题的民族性质是相当不好解决的。克里姆林宫可能认为同这个法西斯头子达成协议会有较大的军事价值。总之，斯大林在7月里通过俄国驻斯德哥尔摩的大使科隆泰夫人一直继续同安东尼斯库谈判，而马纽在6月间提出的建议却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经过3月到6月之间所进行的交换意见后，他和他的同僚全感到非常恼怒，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最后，马纽同国王安排好，不管开罗方面耽搁多久，必须在8月26日发动政变。可是，8月23日，那个法西斯头子（他是在8月5日最后一次晋见希特勒后回国的）和米哈伊·安东尼斯库一起去晋见米哈伊国王，国王趁机把两个人逮捕，然后向全世界宣布罗马尼亚已经参加盟国一方了。8月25日，他对德国宣战。这么一来，刚刚发动一场新攻势的俄国人就以一星期的朋友的身分于8月31日进入了布加勒斯特。米哈伊国王任命了一个民主的罗马尼亚政府，由国王的亲信萨纳泰斯库将军主持，并以马纽、布拉蒂亚努、社会党人帕特雷斯库和共产党人帕特拉什卡努为副总理。9月12日，他们终于同俄国人签署了一项停战协定，不是在开罗，而是在莫斯科。

有一件事也许应该提一下，作为这个法西斯头子统治的尾声。那就是8月24日，在德国的罗马尼亚铁卫军获准作一次反对米哈伊国王及其“巴多里奥集团”的广播：甚至到了12月13日那么晚的时候，他们还从德国发出关于在霍里亚·西马领导下重建“罗马尼亚国民政府”的一项声明。

1944年8月23日的罗马尼亚政变立刻改变了保加利亚的局势。而美国和英国在1944年1月——尤其是在3月间——对索非亚进行的空袭，也造成了相当重大628的印象。从这年年初起，原来以保加利亚共产党为基础的保加利亚游击队获得了许多开小差的政府军士兵来参加，并且在西部的丘陵和山区造成了声势。但是人们始终没有十分重视他们。虽然他们的领导人是共产党人，他们那种马其顿人的敏感性使他们对需要与之合作的人数众多的南斯拉夫游击运动怀疑猜忌。8月23日以后，俄国人很快来到了保加利亚北部边界的多瑙河畔。摄政们把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反对派的领袖全邀请了去。由于祖国阵线回避了这次召唤，一个亲西方的温和派内阁于9月2日在右翼农民党人穆拉维埃夫的领导下组成了。9月5日，苏联抢在保加利亚同德国绝交之前，向保加利亚宣战，并攻入其东北部。保加利亚人惊慌失措。保加利亚政府立刻要求俄国停战，并向德国宣战。可是祖国阵线觉得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就在9月8—9日的夜间，通过维尔切夫组织的一次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我们得救了，但是只有祖国阵线才能拯救我们，’人们都这样想，他们都上街来欢迎红军，把他们看作朋友和解放者，而不是看作敌人和复仇者。”

从1943年春天开始，德军占领匈牙利已变得不仅有可能，而且是势所必然的了。到了秋季，这更似乎迫在眉睫。在俄国的匈牙利科军队已被撤到战线后方，权充一支占领军，但是他们反正是在撤退。匈牙利政府希望把他们部署在喀尔巴阡山区，或者，鉴于铁托的实力日益强大，把他们部署在南斯拉

夫边境，但是，德国人总能找出反对的理由来。随着俄国人在1944年1月和2月间的推进，卡洛伊开始绝望了，因为他已把全部赌注都押在英美那张牌上。3月初，俄国人到达鲁夫内和卢茨克，正在逼近德涅斯特河。希特勒再次把霍尔蒂召到克莱斯海姆去。这个摄政率领了（外交部长）吉齐、（国防部长）乔陶伊和索姆鲍泰伊出发，卡洛伊直截了当地拒绝同他们一起去。霍尔蒂到达以后，希特勒就邀他密谈，指责他搞匈牙利式的背叛行为，并宣布德军不得不占领匈牙利。霍尔蒂愤慨地提出抗议后，大踏步走出了房，叫人去安排他来时所乘的专车。希特勒并没有象五年前对待哈恰那样令人震惊地对待他，但是捏造了一次空袭，并通知摄政说，他既不能离开克莱斯海姆，也无法同布达佩斯通电话。几小时后，希特勒认为霍尔蒂已经作出了充分的让步，可以让他冠冕堂皇地回去了，但是，他的专车又耽搁了时间，而且电话联络仍然被切断。等他于3月19日回到本国时，德军已完成对匈牙利的占领了。卡洛伊到土耳其公使馆去避难。3月22日，在现任匈牙利驻柏林公使德迈·斯托亚伊将军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新政府。从这时起，匈牙利的真正统治者是一个党卫队人物费森迈尔，他自命为东南欧事务的专家，这时接替雅戈失出任德国驻布达佩斯的公使。人们注意到，新政府既没有那个过激的萨拉希集团的成员，也没有日耳曼少数民族的成员。虽然伊姆雷季并没有立即就职，内阁却是以执政党中的亲德分子为基础的，同时也是以伊姆雷季分子为基础的。

德军占领的直接而显著的后果是，禁止“人民阵线”、自耕农党、社会党、工会和农民同盟公开活动，并取缔任意发表它们的观点的报纸。连沙文主义的《图拉尼-沃达佐克》（图拉尼猎户）也遭到了取缔，因为他们不但坚定地反对一切，而且还反德。盖世太保逮捕了所有以不喜欢匈牙利同纳粹德国联系和依赖纳粹德国而知名的人士。著名人物如前内政部长凯赖斯泰斯-菲谢尔等起先都被拘禁在盖世太保设在国民银行地窖里的一个临时监狱里，备受虐待。后来，德国式的集中营也建立起来了，不过有许多比较出名的匈牙利牺牲者都被送往奥地利的茅特豪森集中营。从这时起，匈牙利的犹太人至少在理论上被宣告有罪，遭到了彻头彻尾的纳粹式对待。有些人象希尔什那样死在茅特豪森集中营里，还有许多人则被送往波兰用毒气杀害了。

这时候对德国人进行的抵抗主要同犹太人有关。新教教会带头想方设法保护匈牙利的犹太人，而私人方面也常常帮助他们躲藏起来。当德军于3月19日第一次越过匈牙利边界时，在肖普朗和诺维萨德有过一些即使是短暂的、但也是积极的抵抗。若干匈牙利人越过边界去参加铁托的部队。在党卫队来逮捕鲍伊奇-日林斯基的时候，他进行了自卫，被逮捕他的人打伤了。但是整个说来，既没有什么重大的抵抗，抵抗也没有发展下去。失去了日林斯基以后，那些想当领袖的人诸如蒂尔迪和纳吉都不起作用；他们所做的组织工作，都被大多数天主教徒看作是一小撮新教徒所干的。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一个叫做劳伊克的人的领导下出现了，后来乌伊绍西将军还代表霍尔蒂同他进行过接触。但是匈牙利的共产党人是相当不得力的。例如，在切派尔的工厂里，3月份以前倒不时有人提出过要进行破坏，但是在德军来了以后，生产似乎进行得相当平稳了。切派尔兵工厂属于犹太人蒙弗赖德·韦伊斯一家和他的两个女婿乔林和科恩费尔德所有。大概就是乔林把整个企业交给了德国秘密警察，赎买了这个家族的生命和自由。

在1944年夏季，斯托亚伊政权完全无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匈牙利的局势

不免使人想起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同铁卫军冲突的情况来。因为，虽然所有的左翼反对派都已被迫转入地下，新政府同那些甚至更右的派别，如胡鲍伊国家社会主义者和萨拉希的箭头十字（尼伊拉什）等人之间还是不断发生摩擦。尽管霍尔蒂既尽力抵拒右翼极端分子又尽力抵拒德国人的压力，马扎尔族的右翼极端分子因为敌视那些“斯瓦比亚人”，还是经常同费森迈尔发生冲突。罗马尼亚人在8月23日的大转变，以及他们在8月24日否认1940年维也纳议定书，又在8月25日宣告俄国支持罗马尼亚对匈牙利提出的要求，促使匈牙利陷入一次新的危机。一切政党这时都被解散，斯托亚伊在8月30日辞职，同时以拉卡托什将军为总理的新政府就职了。“匈牙利的政策在本质上肯定已经回复到卡洛伊那个时期。”这是霍尔蒂想恢复匈牙利自治权的最后一次尝试。由于同罗马尼亚处于战争状态，舆论都支持这个摄政的意图。631事实上，霍尔蒂那些最亲密的顾问，尤其是拜特伦，都已经在考虑如何请求俄军停战了。这件事一天比一天紧急，但是要进行接触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10月初，俄军越过了匈牙利边界，进攻科洛什瓦尔。到了10月10日，他们已经抵达德布勒森。五天以后，布达佩斯的无线电台宣布摄政已向俄军方面请求停战了。这是要费森迈尔出来干预的信号，因为他早就使萨拉希处于准备状态了。德国党卫队袭击了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在沙多尔街），他们在那里遇到了抵抗，以致没有来得及阻止摄政发表声明。10月16日星期一清晨五时，由搭救过墨索里尼的斯科尔兹内率领的党卫队进攻布尔格宫，霍尔蒂只好听任他们摆布了。看来德国人以答应释放他的儿子来诓骗他签署一项声明，宣称他已任命萨拉希为总理，自己退位了。到了那天黄昏时分，德国人和他们的帮手，那些尼伊拉什流氓，已经打垮了所有的抵抗力量。他们犯下的严重暴行是，把通过布达佩斯铁索桥的一个犹太劳动营一人不剩地都枪杀了。萨拉希以霍尔蒂的名义取消了停战声明，并宣称匈牙利及时地从布尔什维主义的虎口里被抢救出来。匈牙利将通过战斗重新取得独立；匈牙利就象西德和东普鲁士一样是德国战略上一个必不可少的堡垒。萨拉希同霍里亚·西马或察科夫不一样，他至少已在本国的首都开始掌权，但是在11月里却撤到靠近奥地利边境的桑博特黑伊去；12月，他甚至以匈牙利国家元首的身分去晋见希特勒。与此同时，匈牙利总司令米科洛斯将军同他的参谋长于10月17日一起投奔俄国人方面。到了1945年1月20日，匈牙利才在莫斯科签订停战协定。而希特勒曾下令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保卫的布达要塞为俄国人从德国人手里夺去，则已是2月中旬以后的事。从这年初开始，匈牙利的大部分领土都已为俄军占领，但是直到1945年4月4日，最后一批德国人才逃往奥地利，投降了或者被打死了。

第六章 632 德国占领下的乌克兰，1941—1944 年

克利夫顿·J·蔡尔德

虽然德军入侵乌克兰是迅速而惊人的（1941年8月29日便抵达了哈尔科夫），可是没有多久，形势就开始发生了变化。1941年11月24日，红军在罗斯托夫以西发动了第一次反攻。到了1943年2月，第六军在斯大林格勒大难临头，德军开始溃退了。这样，虽然德国专员可以大吹一通说，“在发射出第一颗……子弹后两个月，德国行政官员就进入了该国，”可是也只不过过了大约两年，连远在西睡的卡扎亭的民政机关也都又撤走了。到了1943年11月初，俄国人又回到了基辅，而到了下一年的2月，就象戈林承认的那样，德国专员辖区变成“几乎完全又是军队的控制区了”。再过半年左右，俄国人便收复了全部领土。

根据德国人自己的说法，他们在相当短促的占领期间始终没有充分控制乌克兰。开始时德军倒被居民当作解放者来欢迎，居民代表还以传统的方式拿着面包和盐在城镇和乡村的入口迎接过他们。但是在权力从德国武装部队转移给民政机关以后，人们便迅速感到幻灭。过了不久，他们就开始公然抵抗了。早在1942年3月，海德里希就不得不承认。游击队的活动正在使农村的居民陷入“忧虑和恐怖”中。到了1943年6月，德国专员辖区两北部的日托米尔专区“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林区，即一百四十万公顷的森林”和“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耕地，都已处于游击队的控制之下。游击队能够按时供应农民种子，从而在当年秋季分享一部分收获。因此，被派往比较遥远的农村地区去的德国行政官员，其命运就决不会是幸福的了。而且根据《NS乡邮报》报道，有许多农业领导人633在那些抵抗组织手中“英勇地死去”，还有许多人由于同游击队作战而被授予铁十字勋章。

在占领期间，交通和通讯都无法满足军队或民政机构的需要。尤其是在占领的后来几个月中，公路运输完全为游击队所破坏，例如，在日托米尔专区，只有一条主要的公路（即从日托米尔到文尼察）可以不用护卫队通行。邮政系统常常中断，而在1943年2月以后，为平民服务的正常邮包业务也不得不暂停了。唯一可靠的电话网是德国武装部队使用的那条线路，甚至德国专员科赫也不得不发出怨言说，在他就职十八个月以后，他还只能同他的六个专区常务专员中的三个（即在尼古拉耶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美利托波尔的常务专员）用电报联络。

德国专员辖区的疆界也始终没有非常精确地加以划定。由于前线一会儿后撤，一会儿推进，整个整个地区一会儿属于民政管理，一会儿又属于军事管制，因此在德国报刊发表说明领土边界的地图时，他们不得不指出这些地图只供“说明”之用。罗森贝格从1941年4月起就担任“东欧空间问题中央研究代表”。虽然他在7月17日以前并没有被正式任命为德国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他却似乎曾企图使德国专员辖区包括除了克里木（德国人显然要保留该地作为控制黑海地区的基地）以外的所有“乌克兰实际居民区”。这就是说，德国专员辖区的疆界将向东扩展到库尔斯克、沃罗涅日、坦波夫和萨拉托夫，从而把苏联政府在战争初期已经取消了的前日耳曼伏尔加共和国的一角也包括进去，并使德国专员辖634区占有大约一百一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五千九百五十万人口。

可是，结果德国专员辖区大概始终没有超过这个面积的一半，同时它所

控制的人口肯定也始终没有超过三千万。德国报纸在 1913 年初发表的地图显示出，在东部，波尔塔瓦、克列缅楚格和扎波罗热是在（总之，在当时是这样）民政机关管辖区之内，虽然斯大林诺当时显然是军管的（即所谓后方军区）——同哈尔科夫和克里木一样。在西部，划定的疆界远远超过了 1939 年的苏联边界，把前波兰的沃林区也包括在内。可是，使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大失所望的是，它们并没有把加利西亚和乌克兰的文化大中心利沃夫也包括进去，因为希特勒本人坚持要把这些地方并入总督辖区。它们也没有把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前苏联乌克兰的那个地区包括进去，因为它是作为“外尼斯特里亚区”而划归罗马尼亚的。在北部，奥斯拉德国专员辖区的边界显然多少被推向普里皮亚特河以北，因此，它就深入到前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境内去了。

罗森贝格原来的意图是要把德国专员辖区划为八个专区。可是最后组成的只有六个这种低级行政区——或专区（这是 1941 年 7 月 17 日希特勒颁布的法令中的正式名称）。沃林-波多里亚、日托米尔、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尼古拉耶夫这几个专区是在 1941 年间建立起来的：克里木专区，以美利托波尔为其首府，是在 1942 年 9 月才成立的。这六个专区又分为一百一十四个县，而这一百一十四个县又再分成四百四十三“村”。每一专区由一个常务专员主持，每一县则设一县长。“村”是由一批小村庄组成的，由乌克兰“村长”管理。这种管理机构的基层单位就是农村公社和城市，前者处于乌克兰 635“执行吏”的监督之下，后者则有乌克兰市长。这些“村

长”、“执行吏”和市长，以及协助他们处理司法工作的“陪审员”和“调解员”，表明了本地人参加地方政府的极限。而就连这样谨慎地限制职责的措施，也只是因为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受过正规训练的德国人可以接管全部行政工作而才准予实行的。

德国在乌克兰的民政管理实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占领区的两个主要负责官员——就是在柏林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和在鲁夫内的名义上为其下属的德国专员——两者之间的倾轧和勾心斗角的经过。他们的分歧，正如拉默斯被迫在纽伦堡所指出的，终于填满了“一卷又一卷的卷宗”。希特勒的“东欧空间问题中央研究代表”罗森贝格在德国人进攻苏联以前，花了两个月在秘密地阐明德国的目标。在他看来，压倒一切的目的应该是，“使日耳曼族的德国在今后几百年不再受到大俄罗斯扩张主义者的压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沿着德国同那个从被肢解了的“大俄罗斯”的非俄罗斯部分毗邻的东方边界建立起一道防疫线来，同时还得“建立一个与大德意志帝国结成最紧密联盟的自由的乌克兰国”。为此目的，就必须从各方面鼓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必须给乌克兰的作家、学者和政治领袖“提出恢复乌克兰历史意识的任务”；就必须着手在基辅创办一所“伟大的大学”，同时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设立其他的大专院校；最后甚至还可以利用 1918 年的“自由乌克兰哥萨克组织”的残余分子来建立一个“乌克兰政党”，它将“在德国专员、他的那些乌克兰顾问和广大的乌克兰公众之间起着桥梁作用”。

罗森贝格在试图谋求人们接受他这个政策时，得到了他的东方事务部中那个政治司的热情支持。这个司几乎全部是由一些俄国通组成的，诸如纳粹党国外政治局 636 东方处前主任格奥尔格·莱布兰特（后来当了司长）和在苏联干了多年工作的前领事奥托·勃劳蒂加姆（后来当了莱布兰特的副手）。可是，这个政策只有为柏林东方事务部的官员和占领区的德国行政官员所接

受，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而在这方面，罗森贝格一开始就遭到了一种决定性的挫折，因为希特勒当时决定把德国专员这个职位授予东普鲁士的行政长官埃里希·科赫。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残忍的家伙”（戈培尔这样描绘他）。他的任命得到戈林的大力支持，因为戈林认为他独具慧眼，决不会放过乌克兰所能提供的经济开发的机会。科赫为了报答戈林的支持，在表示非常愿意执行作为四年计划负责人的戈林所给他下的命令的同时，却极其蔑视东方事务部里的同僚以及他们研究乌克兰问题的那种书生气十足的态度。他象过去那么夸张地说，他对斯拉夫人的态度是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阐明的那些观点为基础的，他把所有的东方居民——乌克兰人、高加索人和大俄罗斯人——全看成是“次等民族”。因此他坚决认为，“决没有什么自由乌克兰”可言；恰恰相反，德国民政机关的宗旨必须是“使乌克兰人为德国工作，而不是使他们幸福”。他于1943年3月5日在基辅宣称：

我将从这个国家榨出最后一点东西来。我不是到这里来散播幸福的。我是到这里来帮助元首的……。我们确实不是到这里来布施灵粮的；我们是到这里来为胜利创造基础的。我们是主宰民族，必须始终记住这一点，即最卑贱的德国工人在种族上和生物学上都比这里的居民要贵重一千倍。因此，有计划地迫害乌克兰知识分子，以使乌克兰人民丧失他们的领袖，压制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一切表现，并为德国的利益拼命剥削农民，这就是科赫的政策。

科赫是1941年8月20日被任命为乌克兰的德国专员的，虽然他的任命的消息直到这年较晚的时候才公布。可是，他还不曾就职，在一些主要方针上就已同罗森贝格大相径庭了。从理论上说，德国专员是罗森贝格的僚属，这是希特勒在1941年7月17日颁布的“东方新占领区的行政管理法令”规定得十分明确的。然而，科赫在德军占领乌克兰的头几个月里显然也只是次数有限地光临过乌克兰，因为他作为“一个老资格的行政长官”，自诩有权可以直接向元首诉苦，而且事实上，每当罗森贝格向他下达一些不称他意的命令时，他也就毫不踌躇地去见希特勒。至于罗森贝格，由于他并没有最终的和完整的权力，甚至在他作为德国部长的固有限制范围以内，掣肘也很大。在经济事务方面，戈林作为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绍克尔作为征募劳工的总负责人，都可以管他；在警察事务方面，他得听希姆莱的指挥，因为希姆莱是党卫队头子，又是德国警察总监，有权直接向所有参与东方地区“安全”行动计划的党卫队发布命令。他的地位还由于他那个部的各个司长（例如负责经济、劳工、粮食与农业、林业与木材各司的司长）也在其他政府部门（例如四年计划、东方经济事务处、德国粮食与农业部，等等）担任职务而有所削弱，这些部门不是把能力差的官员调配给他，就是把最得力的人送到他那里去，以便控制它们特别感到兴趣的业务。此外，他自己也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政治司同他那个部里的一些专业部门（即那些处理经济、劳工等的部门）放在同等的地位上，这就意味着永远不能优先考虑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而只能让638这些专业部门去处理它们主要关注的、掠夺这一地区的日常工作了。罗森贝格和科赫的第一次大冲突发生在他们开始为这个德国专员辖区制订一项农业政策的时候。在科赫看来，乌克兰完全是一个榨取对象，应当用纳粹官员代替布尔什维克官员来进行掠夺，并应让苏联的集体制度在其他方面保持原状。罗森贝格则认为，不废除“可恨的，集体农庄，不在农民中重新分配土地，就决不可能使乌克兰人热情地为德国人工作。可是罗森

贝格和科赫两人都得根据希特勒规定的全部目标来拟订他们的政策，而希特勒则认为乌克兰在占领的第一年里能提供三百万吨谷物，“在第二年里至少能提供七百万吨”。因此，归根到底，争论点与其说是基本目标问题，倒不如说是方法问题。科赫起初认为戈林本人是他的强有力的盟友，因为他的东方经济事务处担心把土地分成农民的自耕田以后，会使德国人无法控制农业的生产，因此发布命令对解散集体农庄的任何企图都要以“最严厉的方式与之斗争”。可是不久，由于缺乏集体农庄所赖以生产的重型机械，情况开始有利于罗森贝格，虽然武装部队这时纯粹出于政治原因，也开始催促在军事管制区逐渐恢复私有制。但是过了好多个月以后才作出了最后决定，而且直到1942年2月16日，罗森贝格才能够发布他那个被长期搁置的“新土地法规”。它把集体农庄改为公田，而且一旦具备了“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条件时”，就可以通过农业合作社把土地交给农民去“单独经营和使用”。

废除集体制的下一阶段取决于科赫，他继“新土地法规”之后颁布了他自己的一道法令，成立一个专业公司（乌克兰农田经营公司）来负责管理那些新设置的公田和农业合作社，以及前苏联的国营农场（现在根据“新土地法规”已改为德国国家财产了）、拖拉机站和育种试验站。这个德国专员虽然无法保住集体农庄，却决意要把国营农场保留下来，并以德国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布满乌克兰，使用当地人充作“最好的雇用工人”。他毫不隐瞒他对“新土地法规”的反感，也不隐瞒他决心要在可能的情况下阻止其实施的意向——结果是，原来想在1942年把百分之二十的公田改成农业合作社，而实际上只完成了半数。与此同时，他继续使乌克兰农民缴出很多产品（尤其是谷物），使他们觉得在“新土地法规”下，日子并不比以前在集体制度下过得好，从而使罗森贝格计划的道义价值大都丧失了。

在经济领域里，罗森贝格和科赫还在绍克尔的征募劳工计划上发生了冲突。根据这项计划，乌克兰在整个希特勒的欧洲中应当是作出最大的贡献的一个地区。可是，这次争论点到头来又是方法问题而不是什么总目标的问题。罗森贝格显然找不到理由可以怀疑绍克尔所提出的要求，但是他认为“出于政治上的理由”，采取志愿应募的制度要比采用强制手段好，只有在“最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应使用后一种办法。相反，科赫在1943年的新年献辞中却可以吹嘘说，他已在乌克兰“招募”了不下于七十一万名工人，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热衷于政治司所谓“只有在最凶恶的奴隶贸易时期”才找得到与之媲美的那种方法，他的拿手法宝是放火烧掉那些企图逃避被送往德国去的农民的房屋和农庄。罗森贝格认识到这种方法只能对他那个为德国争取乌克兰人作为盟友的计划招致灾难，便一再设法使科赫的招工命令变得缓和一些，甚至还采取纪律措施，制止官员执行这个德国专员的比较野蛮的指示。他还在1942年12月21日写了一封长信给绍克尔，指出在东方推行的整个招工制度正有利于游击队，他在信中“着重地”要求不要再使用那些“可能有一天会用来反对〔他〕和〔他的〕同僚”的方法。

在政治方面，由于罗森贝格和科赫在是否值得助长乌克兰民族主义上有分歧的意见，他们必然会在乌克兰流亡者的问题上发生冲突。在乌克兰流亡者中，有许多是西乌克兰人，战前就在德国十分活跃。在这件事上，情况一开始就十分混乱，因为在他们企图利用少数民族来对付总督辖区的波兰人的过程中，德国人已经承认了西乌克兰人中的一个所谓“民族委员会”。他们还通过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培训了一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积极分

子，因此进攻苏联的计划还在酝酿时，罗森贝格就觉得必须去访问一下卡纳里斯，请他提出一些可以考虑“以后可能加以使用”的“具有政治立场……的人”来。在这个阶段，他本人对那些流亡者的态度似乎是极端谨慎的。在进攻苏联的前夕，他指示他的僚属们在事先没有同他本人商量的情况下，不去利用那些乌克兰领袖。因此，当一个乌克兰“国民政府”在利沃夫进行拼凑时，它的成员立即遭到逮捕，并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去。

可是，等到乌克兰被占领以后，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团体的活动，即使实际上没有得到东方事务部的鼓励，至少也已经得到它的默许了。按照科赫的看法，流亡者的领袖，包括那个“驻斯洛伐克的乌克兰流亡者的全权代表”加列卡博士，都已经得到证书，使他们可以去乌克兰进行访问了；西乌克兰那些煽动分子也可以扮成开业医生进入该地区；而班德拉和麦尔尼克运动也得以达到在科赫看来只会危害到德国安全的活跃程度。

科赫极其看不起那个马克兰将军斯科罗帕兹克，他 641 当时仍由德国人在慷慨地提供资金。在科赫看来，这批流亡者只会捣乱，所以他打定主意，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敢于出现于德国专员辖区的话，就要无情地对付他们（事实上，他的确逮捕了一伙胆敢在基辅出现的流亡者）。就科赫而言，他认为 1918 年的那种“试验”决不应在乌克兰重复。事实上，他故意不理睬罗森贝格公开宣布过的要建立一个自治的乌克兰国的意图，他在 1943 年的新年献辞中公开警告各流亡组织说，他们不必盼望会建成一个傀儡政府，（他说）他的看法是，如果由他们去干，他们只会象以前那些布尔什维克那样，使这个国家陷于混乱之中。

这片混乱和吵闹的结果是，乌克兰民族团体对德国人的意图经常感到怀疑，因此他们的两个主要组织，即乌克兰独立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联盟和乌克兰起义军，直到最后对德国的事业都摇摆不定，一会儿给以半心半意的支持，一会儿又公开表示敌视。他们有时候鼓动他们那些追随者去参加利西亚党卫队；有时候又公开同德军打起来，就象后来同俄军打起来那样。但是德国人——尤其是对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执行一种积极得多的政策的武装部队——始终没有能觉得他们是得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可靠支持的。

就象科赫认为罗森贝格对那批流亡者和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纵容得过了分那样，他也有理由抱怨说这个德国部长忽略了日耳曼族人——即那些在卡德琳娜大帝时期已经到俄罗斯来寻求生存空间的老一辈德国人的后裔。这在德国专员看来特别感到可悲，因为德国人在 1941 年夺取这块土地时发现了日耳曼族人是过着怎样一种生活。他们发现俄罗斯日耳曼人所居住的村庄（在 1926 年人口普查时，他们有三十九万三千九百二十四人，主要聚居在南方的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一般地都是处于最糟的境况中”，由于布尔什维克“放逐了其中最优秀的人”，结果就不可能“在没有外来的帮助下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此外，他们同纳粹祖国完全被隔绝了：“他们中有一大部分人几乎连 642 元首的名字都不知道”，并且（显然被认为更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德国部队已经开进来以后，还未能采取措施去对付残余的犹太人”。他们与其他占领区里的日耳曼族人不同，因而并“没有民政和经济机构所能依恃的可靠的人”。

科赫认为德国民政当局对日耳曼族人有一种特殊的义务，因此在 1942 年夏季要求罗森贝格颁布一项法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使他们可以重新加入德国社会，并且恢复他们的各项权利，”他本人已经给予他们特殊的

免税权，还使他们受到德国婚姻法的管辖。可是，罗森贝格尽管十分钦佩“东方地区”日耳曼族移民的“巨大成就”，却不肯使他们具有一种会脱离其余的乌克兰公众的身分，也不肯把他们的定居点变成“日耳曼区”。因此，他不理会科赫的要求，结果后者就去求助于希姆莱。希姆莱作为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的会长，认为为了维护德国的“政治威信”，必须给那些残存下来的日耳曼族家庭“建立一个新家园”。因此，他决定，尽管由于苏联的放逐造成了人口丧亡十分之一，还是必须把他们集中在安排好的定居点里，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指导和特殊的支援”。因此，他要科赫颁布一道法令，根据1941年3月4日“关于东方合并区内日耳曼民族登记和德国公民权的命令”的基本精神，承认乌克兰的德意志人为日耳曼族人，并准许他们以这种身分把他们的姓名登入德意志种族登记册里。在颁布这个法令的同时，又发布了一道命令，赋予某几类日耳曼族人以耕种（但不是立即拥有）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曾拥有的面积和地价相当的农田的权利。可是，这些措施事先都没有上报给罗森贝格，罗森贝格认为科赫背着他去求希姆莱而大为恼怒，他于1942年9月28日颁布了一道法令，正式斥责这个德国专员所采取的行动。

如果不是由于罗森贝格和科赫两人基本上都抱着反基督教的态度，那么到了为乌克兰制订一项宗教政策时，就会再次发生同样的冲突。就科赫在宗教问题上所发表的见解而言，据说他曾谈到同时建立两三个对立的教会是合乎需要的，因为他能够利用这一派去反对另一派，以坐收渔翁之利。至于罗森贝格，他却认为德国人“既没有复兴一个受压制的教会生活的任务，也没有责任去持续布尔什维克的灭绝政策”，因此德国专员只应默认“忏悔团体”就行了，不必给予他们任何“国家的支持”。但是这两个人到头来都不热衷于主动采取行动，因此关于东方教会前途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既不是出自这个德国部长，也不是出自这个德国专员，而是出于德国武装部队。尽管希特勒明确表示不希望在东方地区恢复任何宗教活动，军事当局显然因为看到德军占领区里上教堂的人数日益增加而印象深刻，以致他们决定亲自来抓这件事，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宗教自由——使罗森贝格除了默认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外，别无他法。

由于武装部队方面这种仁慈的干预（当然也由于苏联秘密警察的销声匿迹），乌克兰的宗教复兴在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时采取了改组教会的步骤，包括在“解放了的乌克兰”为自治教会任命了一个“管理员”，即卢茨克和科威尔那个自封的大主教波利卡普·西科尔斯基，以及在基辅、日托米尔、波尔塔瓦、基洛夫格勒、卢勃内、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和比亚瓦-采尔珂夫分别任命了主教。可是，德军并没有发布过正式的宗教自由的通告，虽然情况已经很清楚，这件事不能再搁置下去了。因此，1942年5月8日在元首总部召开了一个研究宗教问题的会议，在应由罗森贝格还是应由科赫采取下一个步骤的问题上展开了某种辩论后，决定最好还是由科赫采取主动行动好。因此，6月间，这个德国专员就发布命令，调整乌克兰的宗教活动。可是，并没有正式宣布德国允许信仰自由的决议，而宗教自由的法令到头来只是采取了秘密指示的形式，指示科赫不要去干涉教会的重行开放、教士的授职，以及宗教仪式的举行。德国人以这种不适当的、鬼鬼祟祟的方式来处理宗教问题，使他们失去了一个利用形势进行宣传的宝贵机会，因此等到斯大林以他在战时所作出的最敏锐的宣传攻势之一于1943

年9月恢复了莫斯科大主教的职位时，德国人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进行迅速的回击。到了1942年夏季，罗森贝格和科赫之间的意见分歧已是如此明显，以致必须由元首总部来作出裁决了。这时科赫说来，倒是一个吉兆，因为他在奉承希特勒方面的本领显然比罗森贝格高明得多。此外，科赫还有博尔曼这个坐探，后者这时掌管着元首总部，而且同罗森贝格始终不友好。结果是博尔曼听从了科赫的话，于1942年7月给那位德国部长发出了指示，其蛮横和挖苦的语气，读起来好象是对科赫本人政策的一篇讽刺文，不过，作为对罗森贝格的一种安抚，希特勒同时颁布了一项法令，使后者成为（不论这项任命是真是假）“有关前苏联领土上各个民族的政策问题的德国政府全权代表”。

罗森贝格摸清了元首总部的风向以后，这时决定（他如此宣称）假装遵照新指示办事来满足博尔曼和希特勒645的要求。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这样一种希望，即他自己那些更有见识的意见可能最后还会得势，同时因为他决定要遏制科赫，于是集中力量使这个德国专员和他那些同伙更难接近希特勒。事实上，德国专员辖区的那些“下级机构”已于1942年8月21日奉令往后不得再直接向元首递送报告了。

这个禁令的作用只能使柏林和鲁夫内的关系更趋恶化。科赫对于这时强加于他的种种限制感到十分痛苦，便于1942年9月愤慨地要求罗森贝格“或者在乌克兰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不再考虑到有一个德国专员，”并相应地通知他本人，或者“向东方事务部发布命令，从今以后保证〔他〕恰如其分地参预有关乌克兰的一切问题”。（这一番话出自科赫之口，多少有点令人觉得可笑，因为他已有相当时期力图断绝他同东方事务部的关系，并禁止他的下属在乌克兰接待罗森贝格派来的官员或者在他们去柏林时到那个部里去。）一个月后，政治司的勃劳蒂加姆写了一个备忘录来进行反击，他扼要地重述了乌克兰长期完不成任务的记录，并且暗示现在应该“以一个有名望而在政治上又有充分资格的人才来主持这个德国专员辖区”了。

罗森贝格方面的下一步行动是坚决主张可以仔细检查科赫建议颁布的所有法令——这个做法的结果是，他把后者颁布的几乎每一项重要法令不是加以废除就是作了修改。10月20日，这个德国专员发布了一道命令，关闭乌克兰的所有职业学校，理由是德国境内的职业学校都早已关闭了。1943年2月23日，罗森贝格作出了答复，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撤销科赫的命令，在德国专员辖区内重新开办职业学校和许多其他学术中心。最后，在1943年3月13日，当罗森贝格下令收回科赫那道鼓励646其下属无情地搜罗春耕所需的劳动力和完成绍克尔的招工计划的通令时，双方之间的紧张程度到了破裂的地步。对此，科赫于3月16日写了一份又长又激烈的备忘录作为答复。这份备忘录在细述了他力图同罗森贝格及东方事务部合作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之后，声称他已无法在乌克兰继续工作，并说他的职务既然受到如此的“侵犯”，“只有元首才能加以恢复了”。这个备忘录的一份副本送交给了博尔曼，同时科赫亲自去晋见希特勒。结果是这个德国专员和那个德国部长两人都应召到德国总理府去。一场“冲突当着希特勒的面展开了”，但是科赫显然获得了胜利。罗森贝格只能以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来进行反击。从那时起，罗森贝格就不但得同科赫的恶意和干扰斗，还得同希特勒的种种成见斗。此外，他在纳粹统治集团里又没有一个是准备支持

他的。因此，他只得独自去恳求希特勒，而希特勒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憎恨一向是同他的反犹太主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反东方、反斯拉夫‘劣等人种’的变态心理了”。希特勒除了对一切斯拉夫事物怀有根深蒂固的憎恨外，始终不肯放弃那个要在东方建立一个殖民帝国的梦想。这是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已经向一个表示怀疑的世界表明过的。他认为这样一个帝国必须通过在战场上打垮苏联军队，而不是通过在被征服的领土上以给予独立的诺言来迷惑民众才能建立起来的。如果说东方民族在他的盘算中还占有任何地位的话，那也不过是他的残酷剥削政策的对象而已，就象科赫力图在乌克兰推行的那个政策一样。因此，科赫可以大肆吹嘘说，他的方案是以元首的愿望为根据的，而元首对这个德国专员的信任也始终未曾减弱过，这在后来德军从东方的撤退达到高峰时，又要科赫去管 647 理奥斯兰的工农业资产的“开发”和转移工作上就得到了证明。希特勒就这样以其特有的执拗态度，拒不听取人们对科赫的批评，而且对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和其他人等力图向他提出的有关制订一个比较开明的东方政策的种种建议也同样充耳不闻。

因此，希特勒不是设法解决罗森贝格和科赫之间的分歧，而是满足于把这个问题交给博尔曼和拉默斯两人设法去解决。1943 年 4 月初，当罗森贝格就臭名昭著的楚曼事件以报告形式对科赫的作法提出一项近似定罪的控告状时，希特勒并没有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只是平心静气地同意了科赫所提供的解释。接着在 6 月里，当罗森贝格视察乌克兰时，希特勒发出了一道命令，指示这个德国部长在东方占领区方面仅限于处理一些“基本原则”的问题，而不要对“行政方面的细节问题”过问得太多——这种新的奚落的直接结果是使罗森贝格和科赫为了一纸宣言而发生了一场争吵。这个宣言是罗森贝格于 6 月 3 日发表的，规定东方占领区的农民对于根据 1942 年 2 月的“新土地法规”所得到的土地，都拥有正式的所有权。

11 月，罗森贝格最后一次到元首总部去，此后他就只能通过博尔曼或拉默斯同希特勒通信了。同时，他认为委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到政治司工作，或许对情况有所帮助，于是用党卫队头子戈特利布·贝格尔取代了那个忠心耿耿的莱布兰特。可是，贝格尔显然既无力影响科赫，也无意去同科赫较量，他宁愿利用他的新职位在党卫队总部里建立一个影子东方事务部，因为他的主要兴趣还是在于党卫队总部。这样，罗森贝格除了亲自向希特勒恳求恢复他那日见缩小的权力外，终于别无他法了。他 648 于是在 1944 年 10 月 12 日写了一封信，请求元首或者使他那个部在东方具有名实相符的权力，或者就非常坦率地告诉他，不再需要他效劳出力了。他随信附了他所提出的一个方案（希特勒对这个方案显然完全置之不理），建议德国政府正式承认附属于他那个部的那些“民族委员会”，以便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东方各族人民的支持。

可是，这时苏联军队正在逐渐逼近德国边境，科赫也已经离开鲁夫内去鼓动东普鲁士的老人和小孩，要他们加入人民冲锋队去作最后抵抗了。在沃林和加利西亚地区，乌克兰独立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联盟和乌克兰起义军同时在跟德军和俄军作殊死战。至于别的地方，随着德国武装部队的劫掠民政机构，随着乌克兰民团的开小差、洗劫并射击任何胆敢干涉他们行动的德国军人，德国政权已经趋于结束。在这最后的时刻，乌克兰在两年多点的时

间内，经历了它的第二次焦土政策的考验，因为德军奉到命令，要做到“没有一所房屋不坍，没有一个煤矿不经过多年不能使用，没有一口井不曾放毒”，因而落进正在挺进的俄军手里的“只是一个完全被烧毁了的国家”。

第七章被瓜分了的南斯拉夫

伊丽莎白·威斯克曼

第一节克罗地亚“独立”国

在 1941 年 4 月中旬以前，那个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安特·帕韦利奇成为扩大了法西斯克罗地亚国的首领。这个国家不久就把整个波斯尼亚也包括进去，从希雷姆直到贝尔格莱德，虽然同时也丧失了达尔马提亚的大部分地方。4 月 16 日，他任命了“第一个克罗地亚国民政府”，由他本人担任总理，由斯拉夫科·克瓦特尼克将军担任国防部长。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领袖奥斯曼·库莱诺维奇（7 月间由他的弟弟扎法尔接任）成了副总理，而那个同 1934 年准备谋杀亚历山大国王有关的阿尔图科维奇则被任命为内政部长。在最先通过的法律中，有一项是禁止在克罗地亚使用西里字母以及区分克罗地亚国民和克罗地亚公民的规定，后者必须是雅利安人，并且从前没有“参与过反对克罗地亚人民解放运动的活动”。凡是同犹太人有关的或是犹太人之间的法律事务，即使是在这个政府成立之前的，也都一概作废。

当时存在的情况正是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马切克于 4 月 8 日在库皮尼克他的老家作广播时所想到的那种（他当时是针对着在德军控制下必然会有一段乌斯塔沙统治时期而有此想法的）。全体克罗地亚人仍然忠于克罗地亚农民党，谴责帕韦利奇是墨索里尼的代理人。但是一些趋炎附势的人都愿意安全地站在轴心国一边。至于那批乌斯塔沙恶棍，他们现在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来恐吓老百姓了。此外，反塞尔维亚的情绪确实非常强烈，而那种认为经过千年奴役以后克罗地亚重新获得了独立的炽热的假想必然博得了人们的称赞。农民党右翼常常同乌斯塔沙调情。这一点或许促使帕韦利奇作出这样的假定：他可以成功地把马切克争取过来，或者使得农民党抛弃马切克。这个新克罗地亚国能否长久存在，当时就取决于这一点。

因此，这个首领于 1942 年 1 月 24 日成立了一个克罗地亚国务会议，其成员不仅包括乌斯塔沙那些头头，自然也有日耳曼少数民族的代表，而且还包括 1918 年最后那届萨博尔和 1938 年选出的那个斯库普什蒂纳的那些克罗地亚残存的成员，以及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其他领袖。与此同时，成立了一个劳工阵线，其他一些法西斯花样也逐渐塞了进来。这个乌斯塔沙国家的最积极的作为就是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屠杀；在波斯尼亚的一批 650 批穆斯林的得力帮助下，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以及全国各地的犹太人，都成为帕韦利奇的野蛮的禁卫军狂热放肆的牺牲品。这好象是天主教徒和穆斯林联合起来反对正教徒和犹太人的一场新宗教战争。1942 年春，当首领为了加紧控制那些劫后余生的塞尔维亚人，而竟然建立起一个克罗地亚正教教会时，那似乎就只能是一种讽刺了。

虽然克罗地亚人当时憎恶塞尔维亚人，并且始终不喜欢犹太人，可是乌斯塔沙的所作所为却真正使他们毛骨悚然。然而，使帕韦利奇政权不能有任何真正团结的，主要是由于他过分明显地依赖意大利和德国了。在他治下的“公民”发现从他们国土上分出去一个意大利达尔马提亚，而萨格勒布的外交政策又听命于罗马，这实在是不能原谅的。起初，没有多少克罗地亚人是反德的，虽然有政治思想的一些小团体多年来就已经担忧地注视着日耳曼少数民族的活动了。现在，为了维持必要的交通线，由前奥地利帝国的将领格

拉斯-霍尔斯特瑞将军统率的德国部队占领着意大利占领区以外的克罗地亚所有重要城中。这个事实，加上克罗地亚日耳曼民团具有种种新的特权，激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懑，谁也不希望克罗地亚的日耳曼族人继承斯波拉祖姆（即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 1939 年 8 月所签订的协定）以前的时代塞尔维亚官员们的权力和特权。因为克罗地亚日耳曼民团的领袖阿尔特加耶尔象斯洛伐克的卡马辛那样，获得了专管日耳曼民族事务的国务秘书的权力，而且只对帕韦利奇一人负责。到了 1941—1942 年冬天，反德的情绪随着希特勒最后获胜的可能性不断降低而进一步加强了。

在 1942 年的头几个月里，克罗地亚人普遍知道有几支小游击队在波斯尼亚活动；他们大多是在抵抗乌斯塔沙的自卫运动中崛起的塞尔维亚人，但是他们却受一个 651 姓奥雷什科维奇的克罗地亚人的领导。在春季和夏季，由于从更南面的战斗中逃来了好些人，他们的人数激增了。1942 年 7 月 20 日，首领认为必须颁布一项法律，建立一些集中营来拘禁“那些破坏公共治安和秩序的个人或武装匪帮成员的家属”。克罗地亚人对于他们反对的、象征着大塞尔维亚思想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以及从前代表贝尔格莱德当局迫害他们的那些切尼克人是毫无同情心的。事实上，当切尼克人和意大利人在达尔马提亚公然勾结在一起的消息点点滴滴传来时，他们的情绪就更坚定了，一方面是反对那些似乎为了塞尔维亚人而抛弃克罗地亚人的意大利人，另一方面则是反对米哈伊洛维奇及其靠山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后来，到 1942 年 6 月，通过一系列协定，乌斯塔沙公开同切尼克人达成了协议，克罗地亚人反对帕韦利奇的情绪更为高昂了。与此同时，消息传来，说另外还有一些对抗切尼克人的游击队。关于他们领导人叫铁托的约瑟普·布罗兹的身分，曾经有过许多神秘的猜测，但是人们逐渐知道他也是克罗地亚人。克罗地亚人对于乌斯塔沙宣传人员提到他们是哥特族后裔这一点完全无动于衷，倒是俄国的抗德斗争使他们想到了他们应忠于泛斯拉夫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妖怪似乎被搞得太过火了。如果铁托的游击队是俄国的朋友，那就反而更好。克罗地亚农民和一些比较年轻的农民党领导人开始潜入森林，成了“绿林新干部”（人们这样称呼他们），他们对游击队的态度是友好的，甚至是合作的。1942 年夏收的征粮，激起了农民对帕韦利奇政权的愤怒。这动摇了国民军的忠诚。这支军队除了那些乌斯塔沙军官外，从一开始就毫无热情，决不能靠他们去同游击队作成。有一个分遣队被派往东线去，结果表现得并不好。在国内对付游击队的战争都由德国人负责，他们中既有来自别处的，也有就地应征加入党卫队欧根亲王率领的那几个师的。事实上，有一部分日耳曼少数民族已于 1942 年 10 月从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西南部疏散到德国本土上去了，这肯定是要使他们不致受到游击队的攻击。

马切克（他身体很不好）始终显得很被动、很孤僻，听任科舒蒂奇负责农民党的一切活动。为了孤立马切克并防止发生有利于他的示威行动，乌斯塔沙卫士们在库皮 652 尼克他的住宅周围布了哨，这就引起了怨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首领的话，农民们倒希望是马切克，而不是一个对待马切克并不比贝尔格莱德的统治者好多少的外地人。有少数几个农民党政客参加了国务会议召开的几次会议，但是他们不予合作，事实上，他们的历史已使他们成为阻挠议案通过的行家了。克瓦特尼克有一个儿子欧根，绰号迪多，他是乌斯塔沙秘密警察的头子，当然同萨格勒布的盖世太保合作。他这时坚决主张采取更加极权主义的严酷做法。1942 年 8 月 25 日，科舒蒂奇同党内的许多

同僚，包括那个以往持有部分乌斯塔沙观点的佩泽尔伊在内，一起被捕了。与此同时，克罗地亚的工商部长、马切克从前的追随者托特赫，遭到贬黜——据说是因为德国人对克罗地亚为轴心国作战所提供的经济贡献很不满意。一个日耳曼民团的领导人克拉夫特当了粮食总监，接管了托特赫的大部分工作。

逮捕在其他方面一点也没有能结束这种僵局，因此决定要重新请求马切克予以支持。9月底，派了外长洛尔科维奇去库皮尼克进行谈判，但是马切克寸步不让。这时，那个一直依靠德国人而不太依靠意大利人的老克瓦特尼克（现在是元帅了）向希特勒告了一状，斥责这个首领没有能力——他的确是这样——控制克罗地亚的局势。希特勒显然已经知照了墨索里尼，于是意大利公使卡塞塔诺在10月30日急忙去见首领。他们决定应该采取坚决行动，尤其因为意大利人对德国人多少是通过那个在萨格勒布的克瓦特尼克施加的那么巨大的压力感到愤慨，因为这公然违反了德国人原来提出的意大利人可以在克罗地亚自由行动的建议，也违反了意大利—克罗地亚所签订的那些条约。当天晚上，克瓦特尼克元帅被迫长期病休，乘飞机飞往斯洛伐克去了。帕韦利奇亲自接管了国防部，并任命普尔皮奇将军为新参谋长，他还把克罗地亚沙文主义的极端分子米尔·斯塔切维奇搜罗到内阁里去。德国人虽然听任事态这样发展，但是他们仍加强了他们的控制，逐渐在为对付游击队的“第四次攻势”调来了生力军。

帕韦利奇把那年的秋季和冬季都花在狂热地改组他的政府上。他的种种努力正如一个倒霉家伙在恶梦中看到自己的许多困难逐一获得解决、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那样徒劳无益。国务会议进行了改革，现存的乌斯塔沙组653织的成员都被免了职，控制警察和军队的大权都交在几个名声不那么臭的人手里，为的是希望这些人也许会表现得较为称职、较为廉洁，并且比较受人欢迎。部长们作了一系列的宣传性演说，几乎全在要求人们予以支持。

1943年3月1日，官方创办了一个农民协会，强迫所有农民一律参加。当局希望这既能动摇他们对马切克的忠诚，又能制止他们逃往森林中的队伍里去。他们还希望能够促进生产，因为这时的形势十分严重，萨格勒布已完全濒于饥饿状态，贫瘠的利卡地区和达尔马提亚也已处于饥荒之中了。首领的种种努力都是徒劳的——灾难只是有增无减。早在1942年10月，铁托本人统率的游击队就已经能够在波斯尼亚的比哈奇站住脚跟，逼近得令人难以安宁了。他们在11月26日和27日召开了第一次反法西斯会议。克罗地亚的年轻一代越来越为铁托的活动，而不是为马切克那种消极被动所吸引。在比哈奇第一次宣布的那个联邦方案，更加强了这种吸引力。克罗地亚局势的特征是，在1943年初，乌斯塔沙就有谋杀普尔皮奇的打算，因为他这个国民军的将领当时同游击队有着友好的关系。还有，差不多与此同时，克罗地亚最著名的诗人，年长的弗拉迪米尔·纳佐尔，在比哈奇参加了铁托的游击队。而这时，那些起初曾经大力支持帕韦利奇的波斯尼亚穆斯林都销声匿迹了。天主教会变得更加公开地批评政府。起先，那些下级教士都支持乌斯塔沙，认为他们是反对正教教会的天主教战士，萨格勒布的大主教斯特皮纳茨和大多数主教则一贯不那么友好。1943年3月，当最后一些幸存的犹太人被勒令向警察局报到时（这显示出，他们象他们的先行者那样，将被押送到波兰去），这个大主教提出了强有力的抗议。4月27日，帕韦利奇在克莱斯海姆受到希特勒接见时，甚至希特勒的随从也说，从来没有。一个市长受到一个国家首

脑如此隆重的接待——甚至在克朵斯海姆，人们也都知道，首领这时能控制的地区并不比萨格勒布市大多少。

墨索里尼的垮台和意大利向盟国的投降似乎使帕韦 654 利奇政权延长了寿命。自从 1942 年秋季以后，意大利的影响已在衰退，首领因而能够较为公开地参加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反匈牙利活动，这种活动是罗马方面始终不十分欢迎的。这时，斯波累托公爵放弃了克罗地亚王位，而帕韦利奇又赶紧同意意大利断绝了关系，并且着手去“解放”意大利的达尔马提亚省。在这个新基础上，他对克罗地亚农民党作出了新的建议，要求他们同他一起分担政府责任。有些意大利军人投降了克罗地亚正规军，不过帕韦利奇虽对阜姆和伊斯的利亚提出主权要求，但当时的实际占领者不是希特勒就是铁托。至于科舒蒂奇，他虽然应召再次来同首领谈判，却依然毫不妥协，并且同托巴尔（克罗地亚农民党的一个杰出的领导成员）一起在 9 月 30 日写给帕韦利奇的一封信中最后拒绝了后者对该党提出的建议。实权现在都集中在德国公使卡舍手里，他不信任马切克那一伙人，并且谴责同他们合作的那些新计划。可是，如果德军的控制比以前更强的话，那么他们这时却也更遭到人们憎恨，因为他们把弗拉索夫将军统率下、受过德军训练的两师俄罗斯逃兵调到了克罗地亚，而这些所谓哥萨克人到这里便乱砍乱杀。

1943—1944 年冬季和 1944 年夏季，帕韦利奇煞是可怜地抓住他那仅剩的一点权力不放：他把总理的职权委托给斯塔切维奇的一个年长的追随者曼迪奇，并且觉得自己不得不让亲德分子布达克担任外交部长。随着罗马的陷落和罗马尼亚的转向，整个巴尔干半岛都期望盟军会随时到来。大多数克罗地亚军队还准备欢迎他们。事实上，在 9 月初，最后的国防部长沃基奇计划在萨格勒布对德军反戈一击。德军风闻到这个阴谋，因此强迫帕韦利奇逮捕了他最后残存的同僚中最重要的人物；萨格勒布的局势现在确实变得荒唐可笑了。11 月里，帕韦利奇的一个特使的确带着一份关于克罗地亚权利的备忘录去到卡塞培的盟军司令部，但是象其余的意图一样，这个最后的尝试也是毫无结果的。形形色色的法西斯难民这时都集结在萨格勒布周围。这种阴惨的景象一直持续到 1945 年 5 月 4 日最后一批德军撤走和帕韦利奇通过迂回的路线终于逃到南美洲为止。这时，比较悲伤地离 655 开克罗地亚的是马切克，因为他直到这时始终想同他的人民共命运。

第二节 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巴纳特和巴奇卡：游击战；米哈伊洛维奇和铁托

巴奇卡和南斯拉夫巴纳特（南斯拉夫人将两处通称为伏伊伏丁那），即多瑙河北岸那片平坦地区的历史，在 1941 年至 1944 年间是比较平静无事的：这类地形是一支占领军所容易控制的。快到 1941 年底时，巴奇卡的一部分塞尔维亚人变得倔强起来，同时匈牙利军队在诺维萨德大屠杀中大施暴行作为报复。此后，许多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都往西南撤退到波斯尼亚，在那里成了游击队主力部队中的一个师。至于巴纳特，希特勒曾向霍尔蒂暗示，它在适当的时候也要归还给匈牙利，虽然他的宠儿安东尼斯库曾经要求把它并入 1918 年落在罗马尼亚手中的古代巴纳特那部分领土。可是，实际上，它象塞尔维亚本土一样，完全被德军占领着，而且由于它拥有相当多的日耳曼族人，它是由当地的日耳曼人进行管理的。当奈迪奇政府在贝尔格莱德组成时，它任命了当地的一个日耳曼人泽普·拉普为巴纳特地区的副总督。选定这个人得到巴纳特和塞尔维亚日耳曼社团领导人泽普·扬科博士同意的，

而且实际上还赋予他可以在巴纳特地区随意任命他所喜欢的人员的权力：他的地位类似于阿尔特加耶尔在克罗地亚，或德国元首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地位，但是他还处于拥有一个归他统治——也归德军统治——的特区的有利地位。

在塞尔维亚，1941年4月下半月和5月全月是一个难以形容的混乱时期。德因当局力图巩固他们的地位。只有一小批塞尔维亚法西斯分子组成了他们的党兹博尔，并在年长的廖蒂奇领导下支持德国当局。因为塞尔维亚人是一个不甘心失败的民族，而且他们居住的地方，其重要部分都是山峦起伏的荒野。此外，日耳曼族人和乌斯塔沙克罗地亚人所宣布的政策听起来象是要灭绝塞尔维亚人，这就使他们具有奋不顾身的勇气。一小股一小股战败的兵士带着他们所能保存的武器，逃进了塞尔维亚西部的舒马迪亚山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上校在那里带着一批杂凑的追随者于1941年5月11日到达了腊夫纳-果拉高原。形形色色的切尼克人集团，内战期间曾不时骚扰这个国家的各种武装队伍（过去曾获得卡拉盖奥尔盖维奇政权的支持），都期望他来领导。这显然是由各派具有政治侵略野心的军官的那种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激起来的，他们以前都把野心集中在搞什么黑手或白手的组织上。切尼克人的正式头领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科斯塔·佩查纳茨，他这时在东南边陲的累斯科伐次地区扯起了旗帜。其他一些军人集团则撤退到最险恶的门的内哥罗群山中去，受到意大利人不那么奏效的控制。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正在制订计划。它本身当时既不很大也不很强。可是，从1937年起，它已经由一个特别能干的克罗地亚人总书记（通称铁托）改组过了。

铁托多半是在萨格勒布进行工作。后来，由于克罗地亚成立了乌斯塔沙政权，他就在1941年5月初转移到贝尔格莱德去。他的最得力的政治助手大概是塞尔维亚人兰科维奇和斯洛文尼亚人卡德尔。后来，他那支军队的参谋和司令员大多数是曾经在西班牙同弗朗哥进行过战斗的南斯拉夫人。在德军进攻贝尔格莱德和德军入侵俄罗斯这段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任务成为当时和以后热烈争论的问题。他们的最粗暴的敌人攻击说，他们完全没有开展什么活动，而那个共产党员记者戴迪耶尔则在他的日记里宣称，他曾于1941年4月12日在贝尔格莱德收到过党的第一张战时传单，呼吁“南斯拉夫所有优秀的儿女起来保卫祖国，抵抗希特勒”。

随着1941年6月22日德军对俄国发动的进攻，一股激情席卷了南斯拉夫，其激烈程度可以同三个月前引起贝尔格莱德政变的那股浪潮相比拟，不过规模则要庞大得多。俄国再次成了南斯拉夫人的希望，他们从7月起德国人在11月反攻时为止，一直以一种还谈不上是连贯的或系统的反抗行动来对抗德军。起初，塞尔维亚战士们本能地同米哈伊洛维奇或其他一些切尼克人的司令们联合在一起，因为切尼克人基本上是塞尔维亚人，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属于正教教会。共产657党从一开始就组织得最好；它希望领导这股伟大的抵抗俄国的敌人的浪潮。9月里，铁托在离腊夫纳-果拉不远的乌日采附近设立了他的军事总部，并要求同米哈伊洛维奇举行一次会晤；这两个人在斯特鲁加尼克第一次会面，并比较含糊地同意合作去对付占领军。麻烦的是共产党军官的军阶问题，他们大多是前皇家陆军中的军士。但是愿意全力以赴的倒是共产党领导人，而不是切尼克人的头领，这就使得共产党人的运动具有一种可以吸收大批新兵的热忱和吸引力。1941年9月24

日进入乌日采的正是铁托的游击队。在这个小市镇里，还有一个轻武器兵工厂，装备这些起义者的问题可以对付过去。这个厂既供应切尼克人，也供应游击队员。不久以后，德国人于10月21日在克腊古耶伐次镇屠杀了大约七千名塞尔维亚人，作为对游击队活动的报复。六天以后，铁托又在布拉伊奇会晤了米哈伊洛维奇，但是后者虽然当时接受了铁托的建议，11月初却把他的一批追随者从预定要向克腊累伏的德军进攻的联合爱国部队中抽了出去，并打算把乌日采从游击队手里夺走。德军正在准备进攻起义军的首次战斗，他们的任务由于切尼克人和游击队发生这样的冲突而大获方便。

从这时起，这场悲剧性的争吵成为南斯拉夫历史中一个突出的主题：它确实导致了这类争吵中最激烈、最狂暴的争吵。双方都有爱国者和暴徒，但是他们之间也有某些明确的争论点。米哈伊洛维奇的动机是：（一）由于克腊古耶伐次大屠杀，以及德国和乌斯塔沙的报复政策，担心这是灭绝塞尔维亚人的先声；（二）害怕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这第二个动机意味着他是赞成恢复卡拉盖奥尔盖维奇政权的，因为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亚历山大国王规定的。这个国王要使这个政权，或者说故意听其成为既是塞尔维亚人对其他南斯拉夫人施行极端集权的专制政治，又是一种腐败的、在社会上消极的体制。当游击队占领一个市镇或一个乡村时，即使为时很短，他们也建立起一种全然不同的组织，一个往往为农民所尊重的农村委员会；它的命令看来都很公正，并且是以这样一种思想为基础的，即地方的管理主要应为当地那些穷苦居民谋利益，而不是为那些善于剥削别人的人谋利益。游击队那个口号：“法西斯主义必然灭亡，人民必然获得自由”，看来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意义。南斯拉夫农民并不是带有极其个人主义色彩的，农村自治组织这种主意也未必会使他们感到惊慌，因为许多村落本来就象——或者事实。上已是——一个个大家庭了。至于游击队之所以可怕，那就在于他们那种“一旦发现敌人就以各种方式加以袭击”的不调和的政策，这便导致德军进行骇人听闻的报复，死了一个德国兵，就枪毙数以百计的老百姓，烧光村子，有时候还把妇孺都活活地锁在教堂里。由于铁托的战略极其富有机动性，在袭击附近的敌人交通线时，暂时控制一个村子，等到敌人进行反击时，又把他的马分散开。这样，这个村子里的居民除非也参加游击队，否则就毫无防御能力了。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切尼克人既然一味担心德国人进行报复，而对游击队有所疑忌，他们在军事上无所作为的同时，就谋求政治“和解”了。到了1941年8月底，奈迪奇终于同意在贝尔格莱德主持一个表面上顺从德军的塞尔维亚“民族自救政府”。人们说他自己也认为是一个贝当式的爱国者，只想赢得时间以保存他的民族。当然，他和米哈伊洛维奇有着好多共同之处，并且彼此各按需要互相利用。至于切尼克组织的正式头领佩查纳茨则公开支持奈迪奇。

因此，到了当年年底，德军在进攻塞尔维亚游击队时既得到了奈迪奇的帮助，又得到了形形色色切尼克集团的帮助，从而把有的游击队赶进了新帕扎尔州，但更多的是赶进了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在波斯尼亚，乌斯塔沙的种种暴行竟然为游击队准备下了一场欢迎。1942年1月，游击队在波斯尼亚东部顶住了德军和乌斯塔沙的又一次联合进攻。

在塞尔维亚人第一次起来抗击德军的同时，门的内哥罗人也起来抗击意大利人。1941年7月12日，门的内659哥罗的分离主义者（“绿派”）在意大利人的支持下，在策丁耶召开了一次国民大会，但是下一天，大多数人

民都起来反对他们，使得意大利的占领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意大利军事长官皮齐奥·比罗利将军因此同当地的切尼克领导人斯塔尼西奇和久里西奇达成了协议（后者是米哈伊洛维奇的私人朋友），并通知他们，如果他们不干扰意大利驻在策丁耶、尼克希奇和波德哥里察这几个城市的驻防军，他就可以把山区让给他们。战斗时进时退，以游击队为一方和以切尼克人及意大利人为另一方的冲突，同门的内哥罗那种野蛮的部落世仇混在一起了。1942年2月，游击队“以门的内哥罗人那种典型的浮夸”宣布，解放了的门的内哥罗是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的反应使得皮尔齐奥·比罗利和那些切尼克头领们能够于1942年春季在赤色分子所谓敌军的第三次攻势中起来攻击游击队，并把他们赶了出去。米哈伊洛维奇暂时把他的司令部迁至门的内哥罗的上利波沃。最后，在6月里，铁托本人率领打败了的门的内哥罗和其他一些游击队从黑塞哥维那转移到波斯尼亚西部。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山区暂时落到了切尼克头领们的手里，他们有时并不受米哈伊洛维奇的控制。少数几支游击队留了下来，隐藏在各处。一些市镇和主要交通线依然掌握在德国或意大利军队的手里。

铁托到1942年10月初才到达了比哈奇的一个合适的作战中心。这时候，游击队已经控制了波斯尼亚的一大部分并且占据了西北方的利卡高地。铁托决定在比哈奇召开一次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大多数代表是来自各个解放区的共产党人，不过也有其他地区的代表，以及代表几种其他观点的人士——事实上，这次大会是由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年长的克罗地亚民主主义者伊万·里巴尔博士主持的。1921年当议会在贝尔格莱德开会，通过取缔原来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议案时，主持会议的就是他。南斯拉夫全国反法西斯解放委员会(A.V.N.O.J.)于1942年11月26日和27日举行了两天会议。它被认为是解放区政府的中央机关，其职能是协调许多地方性的新组织的活动，使共产党官员在解放以后可以通过这些新组织去进行政治教育。它还公布了一个六点纲领，其中第二点保证私有财产和个人的首创精神，第三点是在举行民主选举以前不作一切激烈的变革。但是，第六点最重要：“民族解放运动完全承认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以及所有其他地区的民族权利。……它保证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族权利得到维护。”在经历过民族与民族间的大屠杀后，铁托提出的成立真正的南斯拉夫联邦的这种希望，越来越吸引了观点极不相同的男女到他的运动中来。苏联控制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在英国广播公司继续为米哈伊洛维奇大唱赞歌的时候，广播了比哈奇大会的消息。

伦敦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最初继续由西莫维奇将军担任总理，但是在所有的流亡政府中，这个流亡政府大概是最惹是生非的了。它的克罗地亚成员显出了他们的好斗本性，它的塞尔维亚成员则发泄了他们对克罗地亚人的仇恨，从而把贝尔格莱德的最坏的传统保持下去；他们的习惯和偏见为他们那些具有较强的沙文主义的外交人员和军人所利用。在米哈伊洛维奇同伦敦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以后不久，斯洛博丹·约瓦诺维奇教授当了总理，米哈伊洛维奇晋升为陆军上将，并担任了军政部长（1942年1月）。由于他是在南斯拉夫领土上独一无二的部长，因此他就成为彼得国王在那里的唯一代表，好多塞尔维亚人都深受这一职务的威望的影响。英国广播公司出于礼节与策略，不得不尽力支持这个流亡政府，而它那些代表就利用他们的地位，使用自己的密码发出英国人不可能会同意的反克罗地亚和反共的电文。在米哈伊

洛维奇将军决定采取步骤按兵不动，或直接同意意大利人、间接同德国人断断续续地合作以反对那些从他自己的各项标准说来是根本的敌人——共产党人以后，他们还利用英国广播公司来描述这个将军的那些英勇作为。或许应该再说一遍，米哈伊洛维奇对许多切尼克领导人的控制是徒有其名的——他根本没有铁托那种中央集权的组织——而且象黑塞哥维那那个机警的塞尔维亚律师耶夫杰维奇等那些人都是自作主张地同皮尔齐奥·比罗利进行谈判的。

6611943年1月22日，轴心国军队发动了一次较为猛烈的攻势，德军称之为“白色行动”，其目标是攻击两个月前才在比哈奇宣布成立的那个尚在萌芽状态中的国家。铁托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他既没有飞机又没有可以对付德国空军的高射炮。在这“第四次攻势”中，米哈伊洛维奇和那些重要的切尼克人队伍，同某些乌斯塔沙军队一起，第一次公开地“作为轴心国司令部联合部署的大规模行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作战。铁托决定在讷雷特瓦河畔迎敌，于是切尼克人和游击队就在科尼奇展开了一场长时间的、极端险恶的战斗，游击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最后，切尼克人被打垮逃跑了。游击队员都是“进步的”，而且（一有可能）总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切尼克人则具有优雅的传统，蓄着浓密的胡子。这时那些切尼克士兵一碰到村民们就向他们要剃刀。如果他们能够及时把胡子刮干净，他们往往就开小差逃到游击队那边去。到了4月底，“第四次攻势”缓和下来了。游击队在这次攻势中得免于难，而这场战斗却使米哈伊洛维奇的官兵名誉扫地。比哈奇纲领就此在国内外都获得了新的意义。

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竟然指望英国广播公司播送同英国的盟友俄国所播出的新闻直接抵触的声明，这已经使英国人够尴尬的了。而且这种做法迅即变得荒谬可笑，因而是有损无益的，因为事态越来越明显，俄国人和南斯拉夫游击队所宣布的米哈伊洛维奇正在同铁托与之作殊死战的敌人进行勾结，完全是正确的。在“白色行动”进行期间，米哈伊洛维奇把他的总部转移了地方，他拒不允许从1941年起就派在他那里的贝利上校和英国代表团跟着他一起转移。这时候，情况已经很清楚，他从英国人那里得到的那些援助物资不是被囤积起来，就是被用去为轴心国作战。与此同时，比哈奇纲领却同英国公开宣布的作战目标完全一致。因此，英国决定派遣军官到铁托的司令部（现在设在门的内哥罗）去报道情况。1943年5月28—29日的夜间，比尔·斯图尔特上尉和F·W·迪金上尉被空投到那里。其他一些小型军事代表团也在662不久以后到达，其中包括在8月间到达的巴兹尔·戴维森小组。他们费了很大的周折才到达巴奇卡去鼓动那里的抵抗运动。大约从这时起，盟国就不再给米哈伊洛维奇以援助物资了，虽然它们那些军事代表团还在他那里暂时留了一个时期。

这个倒霉的切尼克领导人这时受到两方面的谴责。希特勒和纳粹党始终就不赞成同许多切尼克头领合作，虽然武装部队的许多军官，象驻意大利的总司令等曾经觉得有所方便。从1942年11月起，德国元首心里尽想着盟军可能进攻欧洲，他认为进攻大概要在巴尔干半岛发生。从这时起，希特勒便无保留地谴责同切尼克人所进行的一切合作了。就在1943年2月16日，即展开“白色行动”以后不久，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墨索里尼，警告他要当心米哈伊洛维奇。他写道，他得到情报，切尼克人正在进行广泛的准备工作，要把驻在黑塞哥维那和门的内哥罗的意大利军队加以消灭，或解除武装，还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使共产党人和米哈伊洛维奇的追随者进行合作方面所作

出的种种努力正在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他说，因此他已下令镇压米哈伊洛维奇的部队。希特勒的这封信于2月24日由里宾特洛甫交给了墨索里尼。德国外交部长还适当地强调了信中的内容。那个意大利领袖抗议说，德国人自己也曾利用过切尼克人，并在3月9日写给希特勒的一封信中一面勉强接受元首的命令，一面又显然话中有刺地补充说，他刚接到最新消息，德国武装部队还在继续武装切尼克人。在3月下旬，希特勒要求卡洛伊派匈牙利部队进据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一条防线。

在轴心国的第四次攻势失败以后，希特勒比过去更为坚决了。他于5月19日写信给墨索里尼，愤怒地攻击皮尔齐奥·比罗利的亲切尼克人的政策，并坚决主张必须把切尼克人解除武装。他还力图对铁托再发动一次攻击，专门为在山区消灭游击队这项任务进行了准备。因此，迪金和斯图尔特是在轴心国由门的内哥罗境内发动第五次攻势后不久到达那里的。在这次战斗中，铁托和迪金于6月9日一起负了伤。铁托朝一个意料不到方向，663即朝波斯尼亚东北部，突破了敌军的包围圈，敌军终于在7月中旬放弃了最后的这次企图。到了这时，由于听到盟军在西西利岛登陆的消息，意大利人的士气更为低落，德国人则面临俄国人在东线发动一次重大的反攻。

这里也许应该指出，英国派往游击队的代表团的到达，丝毫没有使1943年南斯拉夫的政治形式有所简化。铁托极其怀疑英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目的；如果这时盟军发动进攻的话，米哈伊洛维奇或许会掉过头来支持它们攻打轴心国，而游击队为了抵抗“英美帝国主义者”，便会迟至1943年4月9日，德国军事当局还在波斯尼亚那个重要城市班亚-卢卡张贴了一张布告，提到他们对切尼克人的信任（这里指的是那个切尼克司令拉戴·拉迪奇）。与此同时，布告中埋怨切尼克人破坏协议，同游击队保持联系。班亚-卢卡就是帕韦利奇于1942年1月7日设置克罗地亚最高法院的城市。虽然这时保加利亚游击队无足轻重，但卡洛伊还是拒绝了。威斯克曼，前引书，第298页。切尼克头领久里西奇和他的部队已经被解除了武装，送往德国拘留起来了。

执行相反的政策。正如麦克莱恩准将（不久便调派往铁托的司令部）等人已经懂得的那样，对每一个机会全作出反应而又不忽视最终的目标，这本是巴尔干的一种传统。

在9月的第一个周末，意大利公开宣布投降了。铁托对英国人没有预先通知他，心里很怨恨。这样，由于失去了他原来可能盼望的那种最初可以得到的利益，他只得去同帕韦利奇和德国人争夺战利品了。帕韦利奇从意大利那里要来的达尔马提亚那片领土，同他的影子王国的那些山区一样，都落入了游击队的手里。另一方面，铁托要保住达尔马提亚的重要港口斯普利特，力量还嫌太弱——他只能在德军到来前把那里的所有武器都搬走。许多意大利士兵都投奔到游击队这边来，但是德国人不久以后就把的里雅斯特连同伊斯的利亚半岛并入版图，并且占领了沿海一带的主要港口。

在这个月里（1943年9月），随着麦克莱恩准将（带着较多的人员）前来协调早些时候到达的那些代表团的工作，铁托得到了英国方面更为正式的承认。麦克莱恩不久就同意了迪金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认为值得认真援助游击队，因为他估计，游击队正牵制住十二个以上的师。他于是开始设法首先为铁托安排他所极其需要的空中支援。10月下旬，德军又来进攻游击队了，这回还得到保加利亚人和乌斯塔沙与奈迪奇部队的支援。这第六次攻势又如同其他几次一样，逐步停顿下来。

从 1943 年 8 月 25 日起，铁托的最高统帅部一直设在波斯尼亚的亚伊采。11 月 29 日，在比哈奇大会召开后一年，尽管德军又发动了新的进攻，这个游击队的领导人却再次召开了全国反法西斯解放委员会。在他当时向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中，他不仅攻击了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还攻击了包括国王在内的整个流亡政府。不管人们可能同情哪一边，毫无疑问，铁托的权力这时要比国王彼得二世的权力拥有更大的现实基础。亚伊采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把流亡政府的权力转移给了它自己“这个南斯拉夫国家的最高行政和立法机构”，同时禁止国王返回南斯拉夫。“国王和君主制的问题将在这个国家获得解放后由人民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来解决。”这次大会通过授予铁托元帅军衔，并选出了一个临时政府——民族解放委员会——由铁托担任总理，另外有三个副总理和十三个主管部一级职务的“委员”。在亚伊采，这个反法西斯会议还宣布了一项“关于南斯拉夫联邦组织的决议”，其第二段文字如下：为了使南斯拉夫可以成为各族人民的真正家园，而不再

是种种反动势力搞阴谋诡计的角逐场所，南斯拉夫正在按联邦原则建立起来，这项原则将保证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门的内哥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民族一律平等。最后三个地区是在比哈奇会议召开以后增加进去的。与此同时，还明确表示，斯洛文尼亚将包括所有斯洛文尼亚人居住的地方，加上的里雅斯特，而马其顿这个词则将得到宽宏大量的解释。克里姆林官方面似乎担心亚伊采的行动太大了。事实上，事态日趋更加明显，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很可能会做出一件戏剧性的大事来。

盟国，尤其是英国，给予铁托的援助只能在 1943—1944 年的冬季过去以后才变得有效。一个俄国军事代表团终于在 1944 年 2 月 22 日到来了，不过苏联并没有送来多少援助物资。从 1944 年 4 月起，各种各样的物资全是由西方送来的，游击队的伤员问题由于把最严重的伤员空运撤退，也得到部分的解决。德国人现在试图用游击队那套策略来打击游击队；他们组成了突击队，并试图采用铁托所谓“使部队快速渗透并分散开来的战术”。他们还利用空军进行迅捷的突然袭击，想把游击 665 队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消灭掉。1944 年 5 月 25 日，德国伞兵进攻铁托设在德尔瓦尔（在波斯尼亚）的司令部，成功地夺取了那个城市 and 包括若干岛屿在内的一大片土地。铁托本人死里逃生，然后由十六架盟军飞机护送，撤退到意大利去。铁托从这些飞机中挑了仅有的一架苏联飞机作为他的座机。从这时直到那年秋天，他的司令部一直设在南斯拉夫的维斯岛上，该岛由南斯拉夫和英国的一支联合部队保卫着，麦克莱恩准将也在这里同他一起呆到 8 月中旬。与此同时，米哈伊洛维奇和其他几个切尼克头领还扼守着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东部的阵地。人们注意到，他们由于公开同敌人勾结，尤其是由于他们自己按兵不动而声名扫地了。1943 年 10 月，英国人劝使米哈伊洛维奇破坏了维谢格腊特附近的一座桥梁。不然的话，切尼克人是躲躲闪闪的；他们似乎喜欢搞政治阴谋而不愿进行破坏活动。同时背叛行为日益增多，不仅是投向游击队方面，还投向德国人或廖蒂奇方面。米哈伊洛维奇想用扩大他的接触面和放宽他的纲领来同铁托竞争，但已经为时太晚了。他向帕韦利奇试探，企图加强他同斯洛文尼亚的鲁普尼克将军的联系；他还向匈牙利人以及其他一些外国政府呼吁合作反共。将近 1944 年 1 月底时，米哈伊洛维奇在塞尔维亚的巴城召开了一个政治代表大会，想得到一个几乎毫无追随者的社会党人托帕洛维奇的支持，以缓和切尼克人那种传统的调子。这个圣萨瓦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了不彻底的中央分权做

法，重行回到 1918 年那种包括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三族王国的概念上去，同时还强调了它效忠于君主制。

1943 年 6 月，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总理约瓦诺维奇 666 教授辞职了。他先由特里富诺维奇继任，后来又由前驻巴黎公使普里奇继任，普里奇坚决主张继续让米哈伊洛维奇担任军政部长，不因亚伊采的决定而有所动摇。直到 1944 年 6 月 1 日，英国施加的压力才使国王及其顾问们不得不屈从于实际情况。当天，克罗地亚人伊凡·舒巴希奇博士由彼得国王任命为总理。1941 年前担任过克罗地亚省长的舒巴希奇博士一贯不参与其他一些流亡分子的阴谋活动，并曾公开表示同情游击队。他立即准备到维斯去拜访铁托。这次访问在 1944 年 6 月 14 日到 17 日进行，并于 6 月 16 日以引人注目的速度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舒巴希奇答应说，他的政府将尽全力同全国解放委员会合作。双方同意，“国家组织的最后解决办法将由人民在全国解放以后作出决定”。

1944 年 8 月，铁托元帅应邀到卡塞塔总司令部去访问梅特兰·威尔逊将军，并讨论如何协调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军事计划。不久，丘吉尔也到了意大利，并邀请铁托于 8 月 12 日到那不勒斯郊外威尔逊将军的别墅会晤。这次会晤由于得到韦莱比特的协助，并由奥尔加·宁齐奇担任翻译，一般都认为是成功的。丘吉尔的发言是令人鼓舞的，但是他清楚说明，只有在全国解放委员会同国王达成某种协议以后，英国政府才能正式承认它。他还表示希望以后将不会把共产主义引进南斯拉夫。铁托否认有这样的意图。在元帅从意大利回到维斯之前，他又会见了舒巴希奇博士。等他回去以后，他代表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文告，坚持全国解放委员会的“独一无二的重要目标是：打击占领军及其走狗，建立一个联邦制的、民主的南斯拉夫，而不是象我们的敌人指责我们的那样，具有实行共产主义的目标”。文告接着提到同舒巴希奇达成的协议，最后还对“我们伟大的盟国，英国、美国和苏联”所给予的援助表示谢意。就在这个文告发表以前，伦敦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号召“我们的全体人民团结在铁托元帅领导下的联合战线的 667 周围”，并保证“集中全力为未来的民主的南斯拉夫联邦增进国内和平。……”8 月 26 日，南斯拉夫国王颁布了一道法令，结束了以米哈伊洛维奇将军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大约就在此时，麦克莱恩准将同铁托的茹约维奇将军到塞尔维亚去鼓励人们“摆脱切尼克人那种妥协与无所作为的政策，转向同情游击队的全面战争”。罗马尼亚的政变给战局带来了新背景的另一个部分；它加速了俄国人的前进。

在 9 月的第一周里，出现了德国人撤退的最初迹象。接下来就是保加利亚的倒戈，这使得保加利亚军队投向铁托一边来。9 月 12 日，彼得国王从伦敦发表广播，呼吁各界人士在铁托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这个呼吁终于使许多效忠王室的塞尔维亚农民甘心情愿去支持游击队——这个呼吁自然说服不了君主制的反对派，不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克罗地亚人。可是，英国同铁托的关系还是搞得不很好，因为元帅在 9 月 19 日一下子从维斯失踪了，这使得他那些最要好的英国朋友大为恼火。后来才知道他是到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首次会晤去了。等麦克莱恩准将知道他的消息时，他已经回到南斯拉夫——到了伏伊伏丁那。

从这时起，德国人，尽快撤退，不过他们和获得苏军增援的游击队之间并不是没有激烈的战斗。到了 1944 年 10 月 20 日，俄国人和南斯拉夫游击队终于把德国人赶出了贝尔格莱德，还把廖蒂奇和奈迪奇同德国人一起赶走

了。米哈伊洛维奇率领仅剩的一批追随者撤往波斯尼亚。铁托在南斯拉夫首都获得解放后一两天便到了那里。他在那里同刚从伦敦到达的舒巴希奇和韦莱比特会合了。11月1日，铁托和舒巴希奇共同制订了一个初步的协议，后者于是动身到莫斯科去，这回是由卡德尔陪着。12月7日，舒巴希奇飞回贝尔格莱德后，同铁托一起签署了这个协议。协议的主要条款是：在全国就国王是否应该回国的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前，成立一个摄政会议作为临时政府的授权机关。12月7日签署的一个附件规定在全国解放后三个月举行自由选举。668 在制宪会议召开之前，反法西斯委员会将起到立法机构的作用。可是，等舒巴希奇回到伦敦去取得彼得国王的同意时，国王却百般刁难。于是，贝尔格莱德发动了反对君主制的示威游行，丘吉尔于1945年1月18日在下院演说时，也表示赞同铁托—舒巴希奇协议，还说，“如果我们不幸未能取得彼得国王的同意，这件事事实上也得进行下去，因为我们认为他会同意的。”国王对这种奚落的反应是：在1945年1月22日发表声明说，他已对舒巴希奇失去了信任，暗示他自己要同铁托直接进行谈判。第二天，1944年11月1日的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在伦敦公布了。在铁托于贝尔格莱德作了几次毫无调和之意的讲话以后，国王同舒巴希奇和解了，于是开始就谁将是三个摄政的问题进行漫长的讨论。到了2月12日，雅尔塔公报声称应建议铁托和舒巴希奇立即将他们所达成的协议付诸实行，而没有提到彼得国王，国王这才在摄政人选的问题上屈服了。接着舒巴希奇和他的同僚们便匆匆赶往贝尔格莱德去。

三个摄政终于在1945年3月2日选定了：塞尔维亚人斯尔扬·布迪萨夫尔那维奇（他是在1941年3月20日辞职的几个部长之一），克罗地亚人安特·曼迪奇和斯洛文尼亚人杜尚·塞尔奈茨。他们在三天以后宣誓就职，铁托也向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里巴尔博士提出全国解放委员会的辞职书，并立即应邀组织一个新政府。他在3月7日着手进行。他的内阁包括八个克罗地亚人、六个来自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人和六个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四个斯洛文尼亚人、两个马其顿人、一个门的内哥罗人、一个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内阁中包括了原来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六个成员，由舒巴希奇担任外交部长，格罗尔担任一名副总理。另外一名副总理是卡德尔。其他的共产党人部长是茹约维奇（财政部长）、赫布朗（工业部长）和德热拉斯，他是专门负责门的内哥罗事务669的部长。内务部长这个要职由游击队的教士热夫采维奇担任，兰科维奇则在幕后工作。铁托在3月9日的一次广播中再次宣称，私有财产和个人的首创精神将得到保护，不过暂时必须实行某种形式的政府管制。在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物资分配的管理问题进行了多次争吵以后，联总的救济物资开始到达这个饥荒的国家。这时，克罗地亚的帕韦利奇和斯洛文尼亚的鲁普尼克没有几星期就要潜逃了，于是除了奥地利边界的问题之外，就只剩下的里雅斯特问题了。与此同时，铁托、韦莱比特和卡德尔抓住一切机会声明他们要把南斯拉夫的边界至少推进到伊松佐的要求。

第三节 斯洛文尼亚

在南斯拉夫被分裂以前，斯洛文尼亚人的总数几乎整整有一百万，虽然另外还有五十万人居住在斯洛文尼亚本土以外的地方，其中大多数是在伊斯的里亚半岛和意大利的威尼斯-朱利亚区，还有一些是在奥地利日耳曼族行省的卡林西亚。他们的重要性同他们的人数很不相称，战前由于他们在贝尔格莱德曾设法成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一种平衡力量，而在战争期

间则因为他们居住在的里雅斯特周围和亚得里亚海的北部之故。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大部分于 1941 年春季为德国所并吞，其余部分连同卢布尔雅那则交给了意大利。

斯洛文尼亚人在许多方面都象捷克人，因此德国人决定象对待捷克人那样对待他们，不过更为苛刻。因为希特勒根本就不肯承认有他们这个民族。希特勒象对待捷克人那样，觉得有必要灭绝斯洛文尼亚的知识分子和专业阶层。德国人于是着手安排把他们大批押送出境。在这些受害者中，比较幸运的被押送到克罗地亚或塞尔维亚去，运气较差的则被押送到德国去；有些就以这个或那个借口被杀害了。德国人告诉留下来的劳动人民，他们实在都是日耳曼族人，能够很容易地重操他们本来的日耳曼语；一个施蒂里亚同乡会成立了，帮助斯洛文尼亚人恢复他们的记忆。适龄的而又没有明显的敌对信念的斯洛文尼亚人都应召参加德国陆军。有些来自比萨拉比亚和波斯尼亚的日耳曼族人被安置在斯洛文尼亚，670 以替换那些被押送出境或不可救药的斯洛文尼亚人。

可是，如果德国人要灭绝斯洛文尼亚民族，他们为什么又把卢布尔雅那这个城市交给较为温和的意大利人去摆布，这就很难加以说明了，因为卢布尔雅那大学还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活动中心。教士在整个斯洛文尼亚的影响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在卢布尔雅那的大学生中却有很热诚的共产党人。1940 年，博里斯·基德里奇和小学校长爱德华·卡德尔（他从 1937 年起一直同铁托一起工作）竟然能够创办一个称为苏联之友的团体。在意大利人占领后不久，一些非共产党的党派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斯洛文尼亚联盟。4 月 27 日，共产党人和另外一些左翼分子又组成了解放阵线。斯洛文尼亚联盟尽快同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它包括一些著名的斯洛文尼亚代表人物）建立了联系，但是这个政府以一番大道理坚称，这么小一个种族团体如果想存在下去，就必须等待时机而不要冒什么风险。

解放阵线自然是赞成采取行动的。从 1942 年初起，它就开始对那些被指责为卖国贼的人组织了一系列大胆的袭击。最后，在 1942 年 10 月，斯洛文尼亚的前总督纳特拉琴被暗杀了，他是意大利人建立的顾问团中两个斯洛文尼亚成员之一。而且，斯洛文尼亚的意大利占领区具有比较适合于游击队活动的地形，因此属于解放阵线的一些青年团体得以在罗格山周围的森林和山区里建立起来。象其他地方一样，意军的小规模讨伐行动也把不问政治的人赶到马基中避难去了。到了那里以后，要回去并不容易，他们往往也就参加了游击队。卡德尔在 1942 年初去访问了铁托回来后，就鼓动解放阵线进行规模较大的活动。到 6 月里，斯洛文尼亚游击队已经大大地扩展了他们的控制区，甚至还到处成立了一些为时不长的共产主义小共和国。与此同时，在威尼斯-朱利亚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游击队给意军造成了不少麻烦。7 月，墨索里尼来到戈利齐亚，发表了一篇演讲，为地方当局打气。他还检阅了当时集结在那里准备发动一次反击的意大利部队。这次反击于 1942 年 7 月 16 日在罗博蒂将军的领导下展开了。其结果还是同轴心国对铁托所进行的几次攻势一样。游击队虽然遭到了重大的损失，但是象往常一样，通过分散的办法保全了他们的运动。意大利人自然尽量把居民编入他们的队伍以帮助他们打共产党 671 人，而许多斯洛文尼亚农民也很愿意加入为此目的而组成的白卫军。意大利人还供给诺瓦克少校武器，他是米哈伊洛维奇的代表，从 1942 年春季起一直呆在斯洛文尼亚，这时自己也成立了一支蓝卫军，同游击队作

战。

事实上，斯洛文尼亚为左派人士的解放斗争提供了类似于铁托直接领导的解放斗争的缩影。除了同卡德尔的一次次秘密往来外，它当时同铁托所领导的斗争完全隔绝。意大利的投降对斯洛文尼亚战场的影晌比对南斯拉夫其他战场的影晌更为直接，而且它以一种新的形式提出了的里雅斯特的问題。意大利垮台的直接后果是，游击队把白卫军和蓝卫军都包围起来，并在图尔亚克要塞俘虏了他们的士兵七百多名。许多意大利装备落到了游击队的手里，还有一批意大利士兵参加了斯洛文尼亚解放阵线。事实上，威尼斯-朱利亚和弗里乌利这些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杂处的地区，以及靠近瑞士边界的那些山区，都是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最早活动的场所。1943年9月底，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届议会选举举行了，卡德尔于10月1日在科切维主持了代表大会，会上选出了参加亚伊采大会的代表。对于克罗地亚人和马其顿人说来，亚伊采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有望获得自治，而对于斯洛文尼亚人说来，其重要意义则在于铁托的斯洛文尼亚民族统一主义，以及他着重提出的对的里雅斯特的领土要求。

可是，在1943年10月间，德军把斯洛文尼亚游击队赶回到他们原来隐藏的地方去了。德国人把伊斯的利亚连同的里雅斯特并入了版图，成为屈斯顿兰行政区。起初，他们想对那里的斯洛文尼亚居民进行安抚，但是不久，特别是在的里雅斯特，德国的政策又卷入了对代表萨洛的墨索里尼新法西斯共和国的那些意大利人的支持。在卢布尔雅那省，德国人派了一个斯洛文尼亚将军鲁普尼克去主持行政工作，并且鼓励居民参加现在称为国民军的那支队伍，以保卫自己抵挡游击队。由于人们真正担心共产党的计划，反应相当热烈，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武装起来，为德军撤走，西方盟军登陆的那一天作好准备。然而，斯洛文尼亚的游击队是组织得比较好的，而事态的发展（铁托逐步战胜了米哈伊洛维奇，加上这位元帅对卡德尔的信任）又对他们有利。斯洛文尼亚由于地处西北，自然是南斯拉夫最后获得解放的地区（在1945年5月初），672差不多是在南斯拉夫临时政府组成以后两个月（卡德尔在临时政府里担任了要职）。可是，巩固共产党在斯洛文尼亚的实力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就是铁托坚持不懈地支持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对的里雅斯特以及对斯洛文尼亚人所居住的意大利和奥地利地区的领土要求。

第四节马其顿

1941年，轴心国征服了南斯拉夫，使保加利亚人进入了瓦达成塞尔维亚马其顿，这就为整个马其顿问题揭开了一个新阶段。因为除了已为意大利军队占领的希腊西部的马其顿外，整个马其顿此时都落在保加利亚人手中，就象过去根据1878年的圣斯特法诺条约所规定过的那样。虽然德国人否决了保加利亚人的正式兼并行动，但是保加利亚人却把瓦达马其顿看作是解放了的保加利亚领土。他们在斯科普里办起了保加利亚小学，开设了一所民族剧院、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博物馆，并在1943年12月创办了“博里斯国王大学”。瓦达马其顿人看到南斯拉夫王朝这般结局，真是太高兴了，但是不久，他们又对保加利亚王朝同样感到愤满。

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都暴露出一种同各个政府官员所流露出来的相仿的沙文主义。两党都向马其顿人保证说，它们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自由而统一的马其顿，一面却尽力想实现南斯拉夫或保加利亚对整个马其顿，包括形式上处于希腊北部的那一部分在内的领土要求。事实上，这两个

兄弟党就谁应控制塞尔维亚南部的党组织这一问题展开了剧烈的竞争。1941年8月，共产国际作出了支持铁托的党的决议，理由似乎是，保加利亚同志们对俄德战争的态度过于消极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代表是由一个名叫科利舍夫斯基的南斯拉夫马其顿青年人率领的；他们着手在普里累普和库马诺沃组织了一些游击支队，可是1941年10月11日，他们就在那里被敌人消灭了。不久以后，这个科利舍夫斯基也落到保加利亚警察的手中。铁托在1942年秋天到达比哈奇以前简直没有时间来挽回马其顿的局势。比哈奇代表大会的纲领的第六点中有关马其顿的部分，上文已经提到过了。同年11月初，铁托派了他最信任的密使之一，通称滕波的门的内哥罗人斯韦托扎尔，武克马诺维奇，经由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前往马其顿。等滕波到达斯科普里（他早先曾在那里工作过的一个城市）时，已经是1943年2月下旬673了。他显然成功地地为铁托的纲领和把马其顿包括在南斯拉夫联邦里争取到很大的支持。人们曾经简明地指出过，这个计划是含糊不清的。它可能就指瓦达马其顿，认为它象以往那样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也可能意味着要把较大部分的马其顿地区并入南斯拉夫的疆界，又可能意味着大马其顿并入那个包括保加利亚在内的南方斯拉夫联邦。克罗地亚的政治领袖如斯特耶潘·拉迪奇，就经常坚持认为，保加利亚人象塞尔维亚人一样，也是南方的斯拉夫人，因此联邦制的南斯拉夫——实际上就是南方的斯拉夫——也要把保加利亚人包括在内。很可能克罗地亚人铁托就是在效法拉迪奇。

1943年10月初，一个新组成的亲铁托的“马其顿民族解放军和游击支队参谋部”在特什尔韦瑙沃达开会，发表了一个宣言，明确表示该参谋部愿意为之战斗的南斯拉夫境内的马其顿将是一个统一的大马其顿。但是在各有关方面中，保加利亚人对这种希望显然抱着敌视的态度。一个自称为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斯科普里团体提出了抗议。在亚伊采，人们都已知道，马其顿曾经象过去在比哈奇那样被提到，但并无任何迹象表示它将扩大到把皮临和希腊马其顿（它包括萨洛尼卡在内）也包括进去。而且，在亚伊采，马其顿出席的代表非常之少，同时并没有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马其顿委员参加。下一个月，即1943年12月，保加利亚祖国阵线宣称，唯一的解决办法应是成立“一个完整、自由和独立的马其顿”。

在滕波进行访问时，曾作出这样的决定，即从控制得并不十分严密的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占领区采取行动，同时滕波本人则同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共产党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随着意大利的垮台，游击队在马其顿西部获得了武器和土地。将近那年年底，保加利亚开小差的士兵开始投奔他们来了；事实上，赫里斯特·鲍特夫营和其他一些保加利亚游击队最初就是在马其顿地区建立起来的。1944年游击队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以后，马其顿民族解放委员会在8月2日召开了反法西斯大会，并宣告在南斯拉夫联邦内成立马其顿人民共和国。8月2日这一天是1903年马其顿人起义反对土耳其统治的纪念日。到了9月9日祖国阵线在索非亚夺取政权时，674先前一直同皮临马其顿的各支游击队合作的南斯拉夫马其顿游击队指望从保加利亚手里取得皮临马其顿，并把它并入他们自己的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可是，铁托这时却同意延缓就这个重要问题作出任何决定，并接受了保加利亚的诺言，实行广泛的自治，以便在一个较晚的日期再使马其顿实现统一。

第八章阿尔巴尼亚，1939—1945年

伊丽莎白·威斯克曼

在巴尔干半岛的所有国家中，阿尔巴尼亚是最落后、最异常的。它的人口在种族上同所有邻国都不相同。如同在斯洛文尼亚地区那样，当意大利人来到时，它境内的人口约为一百万，有五十万以上的人住在国外，少数住在希腊，还有很多住在南斯拉夫。而且，在塞尔维亚人历史上最珍爱的南塞尔维亚地区——科索沃平原——阿尔巴尼亚人恰巧正是占主要地位的种族。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在该地的存在使得对希腊的战争有一定的吸引力，虽然参战的阿尔巴尼亚部队证明是靠不住的。1941年春季对南斯拉夫的战争以及占领科索沃地区等情况发生得太晚了，不足以使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的关系长久受人欢迎。

意大利政府一方面想保持一种气氛，令人觉得阿尔巴尼亚人对意大利国王的效忠是自发的，一方面又想从行政上，当然也从经济上控制住阿尔巴尼亚，而且控制得比从前那些征服者更严密些。阿尔巴尼亚的人口包括什昆宾河以北的所谓切格人和该河以南的托斯克人。大多数切格人是穆斯林，但也有一些罗马天主教徒，他们过着一种原始的部落生活。托斯克人不是穆斯林就是希腊正教徒，在他们中可以看出现代经济发展的苗子。意大利人垂涎三尺的德沃里油井就在他们的地区以内。在沿海的平原上和在该地区所见到的城镇中，可以感觉到意大利的势力，但是山区里的切格部族实际上仍保持独立，而在托斯克人居住的许多地区内情况也差不多。

1941年5月中旬，在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起义以前将近两个月，出现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当维克托·艾曼努尔国王短暂地访问了阿尔巴尼亚以后，正准备离开地拉那时，一个怀有诗人抱负的青年朝国王坐的马车开675枪射击。下一个月，墨索里尼和亚科莫尼取得一致意见，认为需要给予阿尔巴尼亚人更多的自治，而且不仅要争取地方长官，对其他阶级也必须争取过来。可是局势并没有改善。与此同时，切格人的首领穆斯塔法·克鲁约开始搞阴谋来反对托斯克人的领袖维尔拉奇总理。他试图把另一个切格人首领阿巴斯·库皮争取到与意大利人合作的一边，但是没有成功。库皮是克鲁约的一个酋长，也是1939年4月同意大利人作战的唯一的阿尔巴尼亚领袖。到那年年底，克鲁约取代维尔拉奇出任总理。1942年2月，他访问了罗马，把阿尔巴尼亚的情况讲得天花乱坠，以致齐亚诺在谈到阿尔巴尼亚时，说它是到那时为止唯一没有骚扰和阴谋的被占领（原文如此）国家。阿尔巴尼亚抵抗运动的第一次突然出现是在西莫维奇治下的贝尔格莱德策划的。1941年4月7日夜间，大约三百名阿尔巴尼亚人在正统主义者阿巴斯·库皮、共产党人吉尼希和一个亚科伐（科索沃）部族的三个叫做克吕埃齐乌的爱国弟兄的率领下，确曾从南斯拉夫越过边界进入阿尔巴尼亚，以便攻击意大利人，但是在南斯拉夫军队总崩溃以后，他们便被迫分散，各尽其能来保全自己。

除了各种各样的切格人酋长和托斯克地主之外，还有少数在贝尔格莱德或巴黎学习的阿尔巴尼亚知识分子，持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观点，并于1941年6月以后对俄国表示仰慕和忠诚。在托斯克人中有一个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有助于为共产党提供一支基层队伍。直到1941年11月8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才在共产党科索沃-梅托西亚地区委员会中南斯拉夫成员的协助下成立了。尽管进行抵抗的酋长和共产党人之间意见有着巨大的分歧，双方的代表于1942年9月10日在比采开会时，仍然成立了一个民族解放运

动——民族解放统一阵线。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出现了吉尼希和一个名叫恩维尔·霍查的科尔察的前中学校长。这以后不久，托斯克人组成了一个较为保守的民族联盟，或称“国民阵线”。这个组织是共和主义的，由从前反对索古国王（包括弗拉舍里家族在内）的人来领导。民族解放统一阵线和国民阵线（尤其是后者）都是热烈的民族主义组织，这一点在这两个团体和盟国之间构成了持久的，虽然并非不可克服 676 的障碍，因为几乎不可能期望盟国对南斯拉夫和希腊提出的对科索沃和梅托西亚地区的领土要求充耳不闻。

上文已经讲过，1943 年 3 月铁托的密使滕波在斯科普里完成了任务以后，增强了他的部下和民族解放统一阵线之间的联系。克鲁约已于 1 月间辞职。2 月 1 日，齐亚诺注意到象维尔拉奇等其他一些老朋友这时都已撒手离去。他们于是决定以一个军政府来取代亚科莫尼。这时，意大利最高司令部已把阿尔巴尼亚人的敌意看得十分严重，因此它把驻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占领军实力增加到五个半师。同一时期，两名英国联络官奉派进入阿尔巴尼亚，他们所发现的情况同当时的其他地方一式一样，即互相对立的政治集团在对轴心国的恐惧减弱以后，开始钩心斗角，准备迎接解放的日子。英国军官和往常一样，打算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团结，直到击败敌人以后再说。因此，他们所关心的事同阿巴斯·库皮所关心的是一致的。库皮看到了派系斗争，对其后果感到忧虑，他认为应当恢复君主制度。英国军官和阿巴斯·库皮共同说服了民族解放统一阵线和国民阵线的领导人，使他们于 1943 年 7 月底在地拉那附近一个名叫穆凯的村庄中会晤。起先似乎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后来墨索里尼倒台的消息十分突兀地传来了，在一片热情的气氛中，他们达成了协议。

“墨索里尼的倒台是对意大利人全面造反的信号，是从最高尚的爱国主义到最卑鄙的抢劫掠夺的各种热情所激起的一场全民的自发运动。”两个意大利师站到了阿尔巴尼亚人一边，还使他们得到了许多装备。在 8 月和 9 月的上半个月，这个国家几乎整个获得解放，游击队在许多村庄中建立了通常的那种解放委员会。9 月下旬，德国人急剧地进行了干涉。他们只能抽调两个半师人来自于阿尔巴尼亚，因此在击退爱国部队以后，他们便集中全力去保护自己的交通线和亚德里亚海沿海地区。而且，他们还利用了自己作为阿尔巴尼亚从前的哈布斯堡保护人的继承者的利益，所以他们在阿尔巴尼亚事实上是相当受人欢迎的。一个摄政委员会在德国人的卵翼下建立起来，梅赫吉·弗拉舍里也是委员之一，国民阵线的人对这个委员会并不特别敌视。法西斯主义的宪法被废除了，阿尔巴尼亚仿效埃及的样子宣告中立。

恩维尔·霍查在游击队中已成为声望日高的人物，这时他谴责国民阵线通敌。10 月间，他命令他的部下攻 677 击国民阵线部队。于是阿巴斯·库皮放弃了想要建立一个真正统一战线的希望。他由于发现民族解放统一阵线各委员会总是在共产党的支配之下，已经非常愤懑，这时便决定脱离民族解放统一阵线。1943 年 11 月 21 日，他发表了一项“法统宣言”，主张索古复位，他说这是大多数阿尔巴尼亚人的愿望。他仍然愿意同民族解放统一阵线合作来抗击侵略者，但是民族解放统一阵线这时认为他是叛徒而予以拒绝。德国人当然从阿尔巴尼亚人的争吵中得到了利益。他们组成了一支阿尔巴尼亚军队，并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中招募了四营人，后来把他们编成了党卫队的“斯坎德培”师，这师人被用来对付民族解放统一阵线，又对付门的内哥罗的铁托游击队。他们还充分利用了阿尔巴尼亚经济中可能利用的一切，并

从罗马把阿尔巴尼亚的黄金储备搬到了柏林。敌对行动在冬天不得不暂停，到 1944 年春天又重新恢复。民族解放统一阵线的势力在切格人首领中仍然相当弱。4 月间，英国派了一个扩大的军事代表团到库皮那里去，鼓励他在北部进行抵抗，并在这些首领和民族解放统一阵线之间进行调解。但是民族解放统一阵线变得更加难以对付了。它这时自称是一支民族解放军，并于 5 月间同德国人和国民阵线的联军打了一仗。大约在同一时候，阿尔巴尼亚游击队仿照南斯拉夫的样子建立了一个反法西斯委员会和一个由恩维尔·霍查领导的临时政府。在贝尔梅特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索古国王和阿巴斯·库皮都受到谴责。要估计出阿尔巴尼亚人这时对于南斯拉夫所作出的关于希望把阿尔巴尼亚包括进铁托的大联邦中的含糊的暗示有何反应，那是很困难的。阿尔巴尼亚人不是斯拉夫人，但是很可能象科奇·召捷（他同铁托的代表保持接触，1944 年铁托的主要代表似乎是韦利米尔·斯托伊尼奇）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却注意到，无论战时或平时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是真正有益的。铁托想把科索沃地区重新并入他的塞尔维亚人民共和国，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他的部队这时在那里很活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塞尔维亚人的情绪是决不会满足的。

1944 年 6 月，德国人扶植的第一个阿尔巴尼亚政权垮台了，从此再没有能令人满意地重建起来。从这时开始，德国人显然已经失去了控制。游击队向北挺进，尽管从 7 月到 9 月克吕埃齐乌兄弟之一率领他和德国人作战，民族解放统一阵线的军队还是有办法把切格人的首领都赶跑了。德国人于 1944 年 10 月离开了阿尔巴尼亚。游击队袭击了他们的殿后部队，但却把精锐部队放走了。民族解放统一阵线的军队当月进入了发罗拉。11 月进入了地拉那和都拉斯。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恩维尔·霍查的领导下成立，阿巴斯·库皮被迫流亡意大利。

第九章 希腊

伊丽莎白·巴克

在 1941 年 4 月到 1944 年 10 月轴心国占领的年代里，希腊是一场混乱的三方冲突的战场。对抗的力量之一是德国占领当局（在 1943 年 9 月以前还受到意大利占领当局的微弱支持，而相继成立的三届通敌分子组织的希腊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也曾不很得力地多少为它出过力）。第二种力量是由英国政府及其在中东和希腊国内的军事与政治代表、希腊国王和流亡政府以及希腊山区非共产党的抵抗组织所组成的。第三种对抗的力量是由希腊共产党和它所建立的抵抗组织形成的。共产党领导的目的在于为俄国利益服务，但是直到 1944 年夏天以前，它只由俄国从远处加以指挥。

理论上，这第二和第三两股力量是对第一股力量——轴心国——共同进行斗争的盟友。实际上这种联盟一直是不稳定的，而且当解放的前景逐渐接近时，往往紧张到了破裂的程度。

希腊两种反轴心力量的对立，部分是由于英苏政策的潜在冲突，部分则是因为，在占领的后期，希腊只不过是远离战争主流的、在战略上处于停滞状态的一个地区。

在 1943 年 11 月德黑兰会议举行以前，庄吉尔仍然希望实现盟军把主要军事行动部署在东地中海地区的那项计划，这就将把希腊也包括在内。如果斯大林和罗斯福采纳了这项计划，它对希腊人所提出的军事上和道义上的要求将会迫使他们在战时团结起来。但是，这项计划在德黑兰遭到拒绝，会议赞成在法国南部登陆，以支持从西方进攻欧洲大陆的“霸王”计划。

结果，德国人从希腊的撤退并不是由于希腊人或盟军在该国境内的作战，而是因为红军远在北方通过罗马尼亚的进军，并在较小的程度上因为盟军在意大利的推进。因此，希腊人不可能象 1940 年击退意大利人时所感到的那样，觉得他们是团结一致地把侵略者逐出希腊国土的。

这就是占领期间希腊事态发展的战略背景。在最初几个月，占领并没有使希腊人受到特别沉重的压迫。1941 年 5 月取得控制权的意大利和德国占领当局，并没有作什么努力去创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国王乔治二世、他的政府，以及少数官员和人数较多的陆军军官都已逃跑，但是原有的政府机构，包括警察和宪兵在内，实际上原封未动。主要的变化是，在希腊国内已经不存在希腊陆军了。军队业已遣散，士兵都获准回家。只有政府是新的，尤其新在没有一个希腊人认为它是希腊政府。4 月底，德国人让乔治·特索拉科格罗将军出任首相，他就是一周以前没有奉到命令便签署一项停战协定的人。在他的没有效力的管辖下，政府最初几乎仍象在德军占领前那样发挥作用。

但是，它完全无法对付希腊在占领下所经历的第一场危机：1941 年冬天的饥荒。为了防止发生灾难，交战国与中立国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救济饥民。由瑞典人和瑞士人组成的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负责分发美国和加拿大提供的食物。尽管如此，那年冬天仍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主要是在雅典。墨索里尼访问雅典以后，于 1942 年 7 月 22 日曾致函希特勒，他估计饿死的人数为两万四千。等 1941 年冬季过去以后，食物供应的情况稍见好转。

1942 年夏天，紧接在饥荒后面的是通货膨胀，尽管经济已经局部恢复了。物价飞涨，到 1944 年下半年已成了天文学数字，德拉克马不再具有任何实际价值，希腊经济回到了物物交换制，大宗交易则用英国英镑支付作为辅

助办法。

1942年秋季以后，随着希腊抵抗运动的发展，游击队经常破坏交通，并“解放”了希腊中部相当大的地区，这进一步破坏了该国的经济。1942年底，希特勒的全权特使诺伊巴赫尔来到希腊，他并未能促使意大利当局更为积极地采取行动，也未能制止抵抗运动的增长或经济衰退的发展。

另一方面，保加利亚人实际上已把希腊东马其顿和680西色雷斯的烟草和粮食种植区据为己有，并把这些地方纳入保加利亚的经济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顺带没收了属于希腊人的土地，把希腊人征召入伍和押送出境，并把保加利亚人安置在希腊人以前的产业上。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以后，德国人又准许保加利亚人迁移到希腊西马其顿的某些中心去。

在意大利占领军盘踞在希腊的二十八个月里，他们不时对希腊人采取凶暴的报复手段，不过这些暴行都是孤立地进行的，往往是分别针对个人，而不是有系统或大规模进行的。随着希腊的抵抗活动在1943年蔓延开来后，德军的镇压措施变得日益严厉。1943年8月，德国当局宣布，杀死一个德国士兵就要处决五十个希腊人。这项命令在不同时期确实在雅典付诸实行。在农村，比较常用的一种报复形式是，进入一个据信是支持游击队的村庄，把能够抓到的所有男人杀死，再把房屋烧光。一个美国权威作家估计，在轴心国占领期间，希腊有四分之一的建筑物都在其种程度上受到损坏。在占领的后期，希腊游击队和英国官兵的破坏活动使桥梁、铁路（当时还通车的）和公路受到了广泛的损毁，主要是在希腊中部和北部。

因此在1943年以后，正常的经济生活和行政工作日趋瓦解，后来几乎刻了完全停顿的地步。在中部和北部游击队控制的山区，游击队用一种临时性的经济和行政管理制度（包括邮政和电话）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旧的制度。另一方面，在雅典的通敌分子政府则致力于组织反共保安营，旨在配合宪兵和德国部队在农村的活动。

这项任务主要是由第三任即最后一任通敌分子首相约翰·拉利斯主动完成的。特索拉科格罗将军在游击队开始形成后不久便于1942年12月辞职。他的继任人是前雅典大学的校长康斯坦丁·洛戈塞托普洛斯，一个亲德分子。但是，1943年4月，一个取得了内阁大臣身分的前保皇的人民党党员拉利斯接替了他。

拉利斯认为他的首要任务在于遏制共产党和维持秩681序。他的主要武器是在1943年下半年组成的保安营。保安营是军事单位，主要由以前的希腊正规军军官指挥，同德国占领军配合作战，不过他们似乎自认为是希腊的一支国家部队。人数最多达到五千名左右。

通敌分子接连组成的几届政府、保安营，以及主要活动于希腊马其顿的几支杂牌武装队伍，实际上就是在希腊积极协助轴心国的仅有的几股势力。事实是，直到1943年中期，希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一直显示出一种惊人的、几乎史无前例的团结精神。但在1943年以后，这种团结逐渐遭到了破坏，首先是关于君主政体的争论（共产党人很巧妙地利用了它），其次是由于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和希腊其余人士之间的远为严重的争论。

在希腊境外，希腊国王和他的几届流亡政府至少在1944年5月以前没有做出多少工作来结束这种日益恶化的局面。

1941年5月，当国王乔治二世首先逃往克里特岛，随后又逃往埃及的时候，他面对轴心国侵略的坚定立场和他同英国人的密切合作曾使大多数希

腊人对他比过去远为尊敬。但是这位国王在气质上缺乏那种使普通的希腊人能对他了解的才能，而且他对梅塔克萨斯的军事独裁政权支持了四年，这时也不容易洗刷干净。还有，希腊具有强烈的共和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在梅塔克萨斯执政的年代里甚至反而加强了。

当国王最初来到开罗时，他的内阁首脑是克里特人埃马努埃尔·特苏德鲁斯，一个在政治上曾经是自由派人士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内阁中的少数几个梅塔克萨分子全被逐步清除掉了。国王和他的政府于1941年7月迁往南非，然后又在1941年9月迁到伦敦。过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国王本人才迁回开罗。同时，宪政问题再度成为希腊国内热烈讨论的题目。

国王对这个问题迟迟没有表态。直到1942年1月，他才正式宣布结束了由梅塔克萨于1936年8月4日建立的独裁政权。这一行动采取得不够及时，未能阻止3月31日一群政治家在雅典签名发表的一项宣言。它宣布在国王返回希腊之前应当就他回国的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

英国政府在这时期并不准备对国王乔治二世施加任何压力。虽然英国官方的政策要过一些时候才公开提出来，但是这时它却已经赞成国王早日返回希腊了。英国希望这将会对混乱的希腊政局起稳定作用。

既然英国态度如此，国王当然不肯让步。1943年7月4日，他从开罗对希腊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答应一俟国家全面安定下来，就选举一个国民议会。但是他对自己何时返回希腊却只字不提。

不久以后，在1943年8月13日，由四名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组织的代表和两个非共产党组织各派的一名代表组成的一个游击队代表团，乘英国飞机来到了开罗。代表们一致要求国王承诺在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前不返回希腊。国王同丘吉尔和罗斯福商量之后，反对这项要求。代表团碰了个钉子返回希腊去。

然而，特苏德鲁斯政府继续催促国王进一步作出某种姿态。1943年11月8日，国王致函特苏德鲁斯，声言：“当长久渴望的我们祖国解放的时刻到来时，我将根据当时的政治与军事情况，并以民族利益……为怀，在同政府商定后重新审查我返回希腊的问题。”在这个妥协性的保证作出后的第二天，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一项声明，显然把国王是否在公民投票之前回国的问题罔给国王自己去决定。在回答一项质询时，丘吉尔否认他曾对希腊国王未来的地位问题作过任何承诺。他说：“按照大西洋宪章，希腊未来的政府应由希腊人民决定。”在提及国王1943年7月4日的广播讲话后，丘吉尔宣称：“直到希腊人民能够在自由平静的条件下表达其意愿以前，英王陛下政府的既定政策是支持希腊国王，他既是我们的忠实盟友，也是希腊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

但是，在丘吉尔的声明发表以后，英美的战时领导人立即进行磋商，接着就是德黑兰会议。结果，英国人放弃了盟国在希腊发动任何主要军事行动的计划，于是也就放弃了让乔治国王与盟军解放部队同时返回希腊的计划。1943年12月，艾登在开罗会见了乔治国王，对已经发生变化的形势进行了解释。他还提出一项建议，主张在德国人撤退后，应当提名雅典大主教扎马斯基诺斯出任雅典摄政委员会的首脑，这是特苏德鲁斯和雅典一群683希腊政治家交换意见的结果。在希腊国内，这一计划实际上获得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党派的支持。乔治国王在同罗斯福商量后，拒绝了这项建议。

虽然如此，特苏德鲁斯继续同雅典的政治家们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组织进行远距离的磋商。他的目标是扩大流亡政府，把希腊国内的政治代表也包括进去。雅典的政治家们迟迟不作决定，同时坚持国王在举行公民投票以前不应回国。1944年初，特苏德鲁斯再次吁请当时在伦敦的国王作出某种承诺。国王于1944年3月再次予以拒绝。这时，希腊共产党的领袖们决定加快事态的发展。3月中旬，他们发起在希腊山区建立一个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3月16日当该委员会第一次致函特苏德鲁斯时，它仍然宣称它的目标是为“一个民族大团结的政府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显然这个委员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宣称自己就是希腊的合法政府。

正在这个时刻，中东希腊部队中酝酿已久的风潮成熟了。武装部队中的一个反皇的政治组织共和同盟日益受到希腊共产党的代理人 and 同情者的影响。1944年3月，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在希腊山区的建立便成为危机爆发的起因。

3月31日，一群军官晋见了特苏德鲁斯，要求他同意这个委员会的意见，共和同盟断定进行打击的时间业已到来。4月3日，特苏德鲁斯辞职了。

叛变几乎蔓延到在埃及的希腊陆军所有部队，包括正准备开赴意大利的第一旅。它也扩展到希腊海军的舰艇。4月11日，国王乔治二世从英国来到开罗，次日他宣布，希腊在解放以后将通过一次自由投票来决定它希望要一个什么形式的政府。4月13日，维尼齐罗斯在开罗组成了一个不包括特苏德鲁斯的内阁。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宣布，希腊国内的各游击队组织已同意派代表到开罗来进行商讨，但是他未能有效地制止叛变。海军上将沃尔加里斯率领的一批希腊人员只得登上亚历山大的希腊舰艇加以接管，同时英国部队也只得迫使第一旅投降。维尼齐罗斯只当了两个星期的首相，然后就由一个从前的自由派人士，现为“民主社会党人”的乔治·帕潘德里欧接替，他是刚从雅典来到开罗的。

当时英国的政策在希腊政府人士中具有凌驾一切的力量。帕潘德里欧在同英国人密切协商下，力求与山区共产党主持的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各抵抗运动组织以及雅典的政治家们达成协议。1944年5月17日至20日在黎巴嫩举行的由所有这些方面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根据帕潘德里欧本人准备的一项文件，这个目的在原则上总算达到了。这个后来通称黎巴嫩协定的文件号召成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解放以后在希腊确保秩序和自由，并使人民可以自由而不受压力地决定“他们的宪法、政体和政府”。文件中没有特别提及国王回国的问题。黎巴嫩协定号召希腊国内一切游击队伍统一起来和遵守纪律。

尽管黎巴嫩会议表面上达成了协议，民族团结政府过了三个半月才真正组成。在这期间，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曾就民族团结政府的组成情况和政治比重提出过一系列变幻无常的要求。

1944年夏季，希腊国内外的政治发展也许受到了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巴尔干各国问题的讨论的影响。根据美国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回忆录，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于5月5日同苏联驻伦敦大使古谢夫举行过会谈。这次会谈导致英国提出了一项建议（如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后来向科德尔·赫尔转达的那样），即：“基本上，罗马尼亚事务应由苏联政府予以关注，而希腊事务则由联合王国予以关注。”古谢夫于5月18日（丘吉尔后来这样引述）转达了莫斯科方面表示的赞成，不过

在最后同意之前询问说，美国政府是否赞同。5月30日，英国向美国政府征求意见。科德尔·赫尔强烈反对这个意见，但是6月12日，罗斯福打电报同意将这项建议“试行三个月”，条件是这并不含有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意思。

7月26日，苏联的一个八人使团由波波夫上校率领降落在希腊，事先并没有通知当地的任何英国或美国当局。结果，苏联使团似乎对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伍的作战能力印象不佳。这一点可能是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突然同意在拟议中的民族团结政府中只要五个席位的原因之一，它原先一直坚持要有七个席位。9月2日，民族团结政府终于成立，该委员会的代表占有六席，其中只有两席是共产党员。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同时宣布解散。

就这样，流亡的国王和政府与希腊国内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组织之间暂时取得了团结。但是，那时希腊共产党在国内已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地位，这种团结因此势必是靠不住的。

占领初期，在希腊根据希腊文的缩写通称“KKE”的共产党是一个小组织，搞地下活动很有经验，它有一个坚实的核心，核心人员都曾在苏联受过严密的训练。在占领期间，他们的首领是乔治·西安托斯，一个不屈不挠和足智多谋的前烟草工人，三十年代初期曾在俄国呆过两年，并曾在希腊几次入狱服刑。其他的核心人物是：季米特罗斯·帕尔察利泽斯、米尔蒂阿泽斯·波尔非罗廷尼斯、佩特罗斯·鲁索斯、约翰·伊臭安尼泽斯、马其顿人安德烈亚斯·齐马斯，以及那个完全属于另一类的、名叫阿雷斯·维卢基奥蒂斯的人，他是军事领袖、冒险家、虐待狂者和背教者的奇特混合物。

希腊共产党是对占领当局展开抵抗的第一个团体。1941年9月27日，一个以希腊文缩写“EAM”闻名的“民族解放阵线”建立起来了。它名义上是希腊共产党和其他五个小政治团体的联盟。这五个团体是：人民民主联盟，社会党，联合社会党，农民党和共和党。只有前两个党算是独立于希腊共产党之外而存在的。实际上，这个组织从上到下的全部关键位置都是由希腊共产党党员担任的。后来在1942年用小册子形式发表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早期纲领是温和的，目的在于迎合几乎所有政党的希腊人。它主要号召对占领军进行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并且宣传，在把占领者赶走以后，将选举产生一个国民议会，由它决定政府未来的形式。在占领期间，民族解放阵线的宣传，至少在不很公开的形式中，逐步变得愈来愈敌视国王乔治二世，或者象这个组织喜欢称呼他的那样，“乔治·格拉克斯伯格”，并且也愈来愈具有反英的倾向。民族解放阵线的第一项工作便是通过组织产业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进行宣传 and 散发传单，以及组织示威游行和罢工来确立它对城市的控制。1942年春天，民族解放阵线也开始在军事方面组织抵抗运动。它定出计划，要建立一支全国人民解放军（希腊文缩写叫做ELAS）。兵员主要向农村招募，并对他们实行严格的纪律和灌输大量的政治思想。但是，在占领时期，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自始至终主要是一些对共产主义没有多大兴趣、但却真心诚意想要参加对祖国侵略者最有效的抵抗形式的人们。到了1943年夏天，全国人民解放军已发展成为拥有大约两万人的一支队伍，得到了远为众多的加入民族解放阵线的人的支持。

全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英国当局的紧张关系严重削弱了它作为一支抵抗德国人的战斗部队的效用。实际控制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希腊共产党领导人首先忙于消灭那些对抗的抵抗运动组织，后来又忙于准备解放后夺取政权的

工作。在追求这两个目标时，他们遇到了英国人的反对。尽管在高阶层中有这种对抗存在，但在全国入侵解放军的地方指挥官获准或者愿意主要致力于攻击占领军的希腊那些地区，他们却打得很出色。

在抵抗运动中，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竞争对手，实际上也是唯一能在占领期间一直存在下来的对手，是希腊西北角上由拿破仑·泽尔瓦斯上校（后为将军）指挥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部队。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人数虽然始终没有超过几千人，它虽然一直限于在一个战略重要性不大的地区活动，却同英国当局合作得很好，并且根据英国的计划同意意大利人和德国人进行了有效的战斗。它经常得到英国人的支援，这使它能够顶住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再进攻。然而，到1944年，雅典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组织竟然同占领当局进行勾结。泽尔瓦斯687手下的主力部队虽然同戈纳塔斯领导的雅典集团破裂，这时却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共和政策而采取保皇政策，并变得日益保守了。在占领的后期，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部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前希腊陆军军官，这些人尤其是反共的。

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在抵抗运动中的其他竞争者都不十分幸运。有些竞争的领袖，如萨腊菲斯将军，被生擒了去，然后通过威胁，劝诱他们接受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另一些集团干脆（不管有无根据）被控同轴心国勾结而由全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予以消灭。其中最悲惨的是普萨罗斯上校的实例。他是雅典一个自称为“民族与社会解放”（以希腊文缩写EKKA闻名）的虽小而进步的政治团体的军事代表。普萨罗斯上校的部队在1943年内两度遭到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击，几乎被消灭。1944年4月，它终于全部被歼。

在中东总司令部指挥下的若干英国军官奉命从1942年秋季直到占领结束期间与之保持联络的，就是这些不同的希腊抵抗运动团体。第一批英国军官于1942年10月1日从三架飞机上空降到希腊中部。他们的特定任务是破坏萨洛尼卡—雅典铁路，切断非洲隆美尔将军的供应。这组英国人顺利地同泽尔瓦斯将军取得联系，他从一百英里以外赶来支援他们。主要是偶然碰巧，他们也同共产党人阿雷斯·维卢基奥蒂斯建立了联系，他十分勉强地同意他手下的全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也进行合作。11月25—26日夜，混成的游击部队袭击了防守戈尔戈波塔莫斯桥的意大利人，同时英国人员则成功地毁坏了部分桥梁，从而完成了使命。这组英国人员与原先的预料相反，在希腊逗留下去，并扩充成为英国军事使团。为了作战目的，对希腊全国民主同盟和全国人民解放军都派驻了英国联络官，但在联络的初期，全国人民解放军便怀疑英国人在武器和金钱的供应方面偏袒希腊全国民主同盟。1943年夏初，全国人民解放军同边远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队伍的冲突，还有同“民族与社会解放”的队伍的冲突，都被英国人加以制止了。英国人经过一番困难，终于说服三方于1943年7月签署了“国家队伍”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三支部队都被承认为中东总司令部指挥下的独立兵团。688与此同时，在1943年6月，由于全国人民解放军拒绝合作，一组英国人员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希腊人的支援下再度对雅典—萨洛尼卡铁路发动攻击，这一次的目标是阿索波斯桥。中东总司令部曾要求进行一系列战斗，主要是破坏活动，作为战略上迷惑轴心国计划的一部分，使它们相信盟国即将进攻巴尔干各国，而不是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在这一系列战斗中，全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一般也表

现了同样的不合作态度。1943年9月，意大利的投降使希腊共产党的政治野心大为膨胀起来：全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地接受了意大利皮涅罗洛师的投降，随后又解除了这师人的武装。因此，意大利的垮台给全国人民解放军补充了大量的武器，使之成为最强大的抵抗运动组织。全国人民解放军迅速采取了行动：10月间，它不顾前一年7月的“国家队伍”协议，再次攻击了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队伍，并采取行动去消灭一些较小的竞争团体。

在这种局势下，盟国军事使团（第一个美国军官于1943年9月参加到希腊的英国人中来）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紧张到了几乎破裂的地步。英国人暂停向全国人民解放军供应武器。同时，他们增加了对泽尔瓦斯将军的供应，从而使他能够抵挡住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到1944年2月29日，盟国军事使团才设法促成了普拉卡协定，结束了民族解放阵线及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希腊全国民主同盟之间的敌对行动，划定他们各自的活动区域，并要求中东总司令部对希腊所有抵抗德国的部队提供一切可能的供应。作为普拉卡协定的初步措施，签字各方又于1944年2月19日签署了一份对保安营的联合谴责宣言，全国人民解放军一向怀疑英国人纵容保安营。

然而，正在局势似乎恢复稳定的时候，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于3月26日再次使盟国军事使团大吃一惊。它们宣布组成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以希腊文缩写 PEEA 闻名）作为一个“预备性的政府委员会”。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中只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和少数几个匆忙参加到他们那边去的无党派社会人士。它的第一任主席是埃夫里皮泽斯·瓦基尔齐斯上校，他从前曾加入“民族与社会解放”，但是4月间雅典大学的亚历山大·斯沃洛斯教授，一个持有社会党观点的知识分子，取代了他。

参加5月间黎巴嫩会议的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代表团名义上的领导人就是这个斯沃洛斯教授。也许部分由于受到同他接触的英国代表的影响，他的语气颇为和解，689有助于达成黎巴嫩协定。但是，当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的代表团回到希腊时，他们发现希腊共产党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决意阻挠协定的履行。结果是，在1944年夏天，全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盟国军事使团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敌对。

尽管如此，到1944年9月2日以帕潘德里欧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终于成立的时候，盟国于德国人撤退时在希腊登陆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做好。美国当局决定美国部队将不参与这次战役的军事行动，而只限于参加救济工作。结果，纯由英国人组成的登陆部队不可能超过四千人左右。这个数目太少了，如果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用武力反对英国人的话，英国人的处境将是极端危险的。快到8月底时，帕潘德里欧首相到意大利拜访了丘吉尔。丘吉尔终于同意，按照先前的计划，乔治国王几乎立即便回到希腊国土上去是不可取的；他的回国将延迟到可以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时候；而且民族团结政府在回到希腊后也将进行改组。

民族团结政府在成立后不多几天，便由开罗迁往意大利的萨勒诺。9月底以前，代表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萨腊菲斯将军，和泽尔瓦斯将军一起到达卡塞塔，同地中海地区总司令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和帕潘德里欧缔结了一项军事—政治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希腊国内的所有游击部队都承认民族团结政府的权力。政府则将这些部队置于盟国司令部代表罗纳兹·斯科维将军的指挥之下。各游击部队不得在解放的时刻图谋夺取政权，而应“结成一个民族联盟，以便协调它们的活动”。

9月底，英国军队开始在希腊登陆，虽然登陆情况直到10月5日才公开宣布。英国人、全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和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队伍全对退却的德国人进行袭击，但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事。英国登陆部队和当地的民族解放阵线及全国人民解放军首领之间的关系在有些地方十分紧张，不过一般说来表面上仍然相当正常。英国部队几乎在各地都受到希腊人极其友好的接待。

民族团结政府的主要成员同英国大使（雷金纳德·利珀先生，后为爵士）一起，在10月18日雅典解放后不多几天便抵达了该城。同退走的德国人之间的小战斗在希腊北部又延续了好些天，但是到11月初，德国人已完全撤退了。

保加利亚人从希腊北部的撤退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因为9月9日，根据保加利亚新成立的祖国阵线政府的看法，该国已经成为一个共同参战国，并且热切希望驻在希腊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占领军也能攻击退却的德国人。英国和希腊民族团结政府（或者说，它的大多数成员）都坚持保加利亚人必须离开希腊国土。俄国无意支持保加利亚的建议。驻莫斯科的保加利亚停战代表团受到了压力，于是到10月25日，最后一名保加利亚人离开了希腊。敌人对希腊的占领结束了。

